

Oeuvres Choies
de la Pensée et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s Contemporaines

Pierre Bourdieu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册）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Pierre Bourdieu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上册)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刘晖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上册)

Œuvres Choies
de la Pensée et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s Contemporaines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杜小真 高丙中 主编

Pierre Bourdieu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9

本书根据法国午夜出版社 1979 年版译出

我对科莱特·波尔科夫斯基、伊薇特·德尔索和玛丽·克里斯蒂娜·里维埃尔表示无尽的感谢，她们在帮助我写书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能力和慷慨。

目 录

导言	1
----------	---

第一部分 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

第一章 文化贵族的爵位和领地

文化贵族的爵位	25
爵位的作用	32
审美配置	42
纯粹趣味与“野蛮趣味”	45
大众“美学”	49
审美的间离效果	53
一种反康德的“美学”	67
美学、伦理学与唯美主义	70
中立化与可能性空间	82
与必然的距离	88
作为区分意识的审美意识	92
文化贵族的领地	105
风度与获得方式	108
“学者”与“社交家”	114
经验与知识	126

2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出生的世界	130
继承的资本与获得的资本	135
两个市场	144
因素与权力	155

第二部分 实践的经济

第二章 社会空间及其变化

阶级状况与社会影响	169
变量与变量系统	170
被构建的阶级	177
社会阶级与轨迹阶级	182
资本与市场	187
一个三维的空间	190
转移的策略	208
分类,降级,重新分类	211
转移的策略与形态学的变化	218
理解的时间	226
受骗的一代	229
幻想破灭的人	233
对抗降级的斗争	236
学校教育系统的变化	245
竞争的斗争与结构的平移	250

第三章 习性与生活风格的空间

空间之间的同源性	275
形式与实质	278
三种区分方式	288
毫不做作或毫无顾忌?	302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312
风格的可能性空间	323

第四章 场的动力学

财产生产与趣味生产之间的一致性	357
同源性作用	362
有选择的相似性	376
象征斗争	382

第三部分 等级趣味与生活风格

第五章 区分的意识

艺术作品的占有方式	417
占统治地位的趣味的变种	442
时间的标志	462
世俗荣誉与精神荣誉	498

第六章 良好的文化意愿

认识与认可	509
学校与白修者	519
趋向与癖性	525
小资产阶级趣味的变种	538
衰落的小资产阶级	553
执行的小资产阶级	555
新小资产阶级	566
从义务到快乐的义务	578

第七章 必然的选择

必然趣味与一致性原则	595
统治的作用	613

第八章 文化与政治

选举权与不信任投票	633
法定的能力与无能	641
合法的国家	652
个人观点	660
观点的生产方式	665
剥夺与侵占	679
道德秩序与政治秩序	689
阶级习性与政治观点	696

观点的供给与需求	701
政治空间	717
轨迹的固有作用	719
政治语言	728

结论 阶级与分类

被归并的社会结构	739
一种无概念的认识	744
利害相关的归因	751
分类斗争	758
表象的现实和现实的表象	762

附言 对“纯粹”批判的一种“通俗”批判的若干因素

对“浅薄”的厌恶	767
“反思的趣味”与“感官的趣味”	771
一种被否认的社会关系	778
附言与补遗	783
阅读的愉快	790

附录

附录 1 关于方法的几点思考	794
附录 2 补充资料	821
附录 3 统计资料	832
调查	832

6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其他资料	840
附录 4 一种社会游戏	848
索引	871
表目录	934
图目录	937
参照图片目录	939
译后记	941

导 言

“您说过，骑士！应该有保护已获知识的法律。

就拿我们的一个好学生来说吧，

他谦虚勤奋，从上语法课时就开始拿着他那小小的词汇笔记本，
它二十年间一直粘在老师的嘴上，

最终变成了一种小小的智力积蓄：

这积蓄难道不像一所房子或金钱一样属于他？”

——克洛代尔，《缎子鞋》

存在着一种文化产品的经济，但这种经济有一种特定的逻辑。为了摆脱经济主义，应该指出这种逻辑。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致力于建立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及其趣味在其中产生的条件，同时要致力于描述将这样一些产品据为己有的不同方式——这些产品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被视为艺术品——以及描述被视为合法的占有方式形成的社会条件。

科学考察反对将合法文化方面的趣味看作是天赋的超凡魅力观念，它指出文化需要是教育的产物：调查证实，所有文化实践（去博物馆、音乐会、展览会、阅读等等），以及文学、绘画和音乐方面的偏好，都与（依学历或学习年限衡量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其次与

社会出身相关。¹ 家庭教育和严格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其效果和持续时间与社会出身紧密相关)的相对分量,按照不同的文化实践被学校教育系统认可和教授的程度而变化,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社会出身在“自由文化”或先锋文化方面的影响从未如此之大。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与社会所认可的艺术等级相符,并在每种艺术内部,与社会认可的体裁、流派或时代的等级相符。这就使趣味预先作为“等级”的特别标志起作用。文化的获得方式在使用所获文化的方式中继续存在着:如果人们看到正是通过这些难以预料的实践因素,各种等级化的文化获得方式,无论是早期的或是迟来的,也无论是家庭的或是学校的,以及获得方式所显示出的各种个体类别(比如“学究”与“社交家”),才被辨认出来,人们给予风度的关注才能得到解释。文化贵族拥有学校授予的学历,以及取得贵族身份之资历所度量的领地。

文化贵族的定义是一场斗争的赌注(enjeu),从17世纪到当今,这场斗争不断地以多少有点公开的方式,使一些群体互相对立,这些群体在对文化的看法上,对与文化及与艺术创作的合法关系的看法上,进而在这些配置(dispositions)为其产物的获得条件上是有区别的:占统治地位的合法占有文化和艺术作品的方式的定义,甚至在学校教育领域,都有利于那些有教养家庭里的人,他们很早就在学校教育科目之外接触到合法文化;其实,这个定义为了赞扬直接的经验 and 单纯的愉悦,将知识和博学的阐释贬低为“书

¹ P. Bourdieu et als., *Un art moyen. essai sur les usages sociaux de la photographie*, Paris, 1965; P. Bourdieu et A. Darbel, *L'Amour de l'art. les musées et leur public*, Paris, 1966.

呆子的”，甚至是“卖弄学问的”。

有时典型的“卖弄学问”的语言会说对艺术作品进行“阅读”，这种阅读的逻辑为这种对立提供了一种客观基础。艺术作品只对掌握一种编码的人产生意义并引起他的兴趣，艺术作品是按照这种编码被编码的。一些或公开或隐含的认识和评价模式构成了绘画或音乐修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这些模式是认识的这种基本形式即风格辨认的暗含条件。未掌握特定编码的观众面对在他看来乱七八糟的莫明其妙的声音和节奏、色彩和线条，感到自己被吞没了，“被淹没了”。他由于没有学会采取适当的配置，就满足于帕诺夫斯基^①所说的“可感属性”，而觉得皮肤像天鹅绒一样或感觉花边轻飘飘的，或满足于这些属性引起的感情共鸣，谈论朴素的色彩或欢乐的旋律。实际上只有当人们掌握了超越可感属性、抓住作品固有风格特点的概念，才能从“我们能够以我们的存在经验为基础达到的初级感觉层次”过渡到“第二感觉层次”，也就是说过渡到“所指的意义领域”。^② 这就是说与艺术作品的相遇丝毫没有人们通常想从中看到的一见钟情的特点，而且，产生热爱艺术之愉悦的情感交融的行为、移情的行为，意味着一种认识行为，一种辨认、解码的活动，隐含着对一种认识资质、一种文化能力的运用。这种典型的唯智主义艺术认识理论与最符合合法定义的艺术爱好

① 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 美国艺术史学家。代表作有《圣像画法研究: 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题》(1939)、《惠更斯和达芬奇的艺术理论》(1940)、《丢勒》(1943)、《丢勒的生活和艺术》(1955)、《视觉艺术中的意义》(1955)等。——译者

② E. Panofsky,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econnaissance Art》,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 1955, p. 28.

者的经验截然相反：通过在家庭内部不知不觉的熟习获得合法文化，事实上倾向于对文化形成一种着迷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以忘记获得过程和无视占有工具为前提的。审美愉快的经验可能伴随着一种不恰当编码的应用所引起的种族中心主义误解。因此，今天有教养的观赏者投向作品的“纯粹”目光，与意大利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道德和精神眼光”，也即一整套既是认识的又是评价的配置，几乎毫无共同点，而这些配置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他们世界的绘画表象的认识的根源：正如各种契约所表明的，菲利普·利比^①、多梅尼科·吉兰达约^②或彼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③的主顾们一心想想要钱花得划算，在艺术作品中投入的是商人唯利是图的配置，他们精通数量和价格的直接计算，采取完全让人吃惊的评价标准，比如颜料的昂贵——将金色和云青色放在最高等级。³

“眼光”是由教育再生产出的一种历史产物。今天被规定为合法的艺术认识方式，即审美配置，也是历史的产物，审美配置

① 菲利普·利比(Filippo Lippi, 1406-146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家，心理现实主义的先锋。擅长画圣母子，其叙事性的作品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渗入到平凡的生活画面中，代表作有《圣母子》(1437)、《圣母领报》(1441-1443)、《圣母子及两天使》(约1465)等。——译者

② 多梅尼科·吉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 1448-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画家，擅长画故事情节丰富和人物肖像众多的层次分明的大壁画。画风纯净、写实，代表作有《哀悼基督》(1472-1473)、《圣析罗姆》(1480)等。——译者

③ 彼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 约1410/20-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画风恬淡、静谧、内敛、超然，代表作有《基督复活》、《基督受洗》、《真十字架的故事》等。——译者

3 Cf. M. Baxandall,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 Century Italy, A Primer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Pictorial Sty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作为一种能力,它不仅从作品本身并且为作品本身,从作品的形式而非功能来考察被指定要如此领会的艺术作品,也就是合法的艺术作品,而且考察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无论是尚未被承认的文化作品——比如,一个时期内的原始艺术,或今天的大众摄影或拙劣艺术品——抑或自然物。“纯粹的”目光是一种历史的创造,这种创造与一个艺术生产场的出现有关,这个艺术生产场是自主的,也就是说,无论在其产品的生产还是消费中,它都能推行自己固有的规则。⁴一种艺术,比如整个后印象派绘画,是一种被认定表现方式高于表现对象的艺术意图的产物,它明确地要求对形式给予一种绝对的关注,而先前的艺术只是有条件地要求这种关注。

艺术家的纯粹意图是一个生产者的意图,这个生产者想要自主,也就是完全成为其产品的主人,他倾向于不仅否认学者和文人先验地强加的“计划”,而且否认那种借助于做与说的陈旧等级后天附加给其作品的阐释:一部从本质上且有意识地是多义的“开放作品”的产生,可能因此被诗人和也许是仿效他们的画家理解为争取艺术自主的最后阶段,画家很久以来就依赖作家及其“显示”和“陪衬”作用。承认生产的自主性,就是赋予受作者支配的东西,即形式、手法、风格,相对于“主题”即外部参照对象的优先性,对功能——哪怕涉及的是最基本的功能,即表现、意指、言说某种东西的功能——的服从,通过外部参照对象来实现。同时这也是除了

⁴ Cf. P. Bourdieu, Le marché des biens symboliques, *L'Année sociologique*, Vol. 1971, pp. 49-126; *Éléments d'une théorie sociologique de la perception artistiqu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sociales*, XX, 4, 1968, pp. 640-664.

被纳入所考察艺术门类的固有传统中的必然性,拒绝承认其他必然性;这也是从一种模仿自然的艺术过渡到一种模仿艺术的艺术,后者在其自身的历史中发现其探索的绝对原则乃至它与传统决裂的绝对原则。

总是包含着参照自身历史的一种艺术呼唤一种历史的目光;这种艺术要求人们不参照外部参照对象,即被表现或被指涉的“现实”,而是参照过去和现在的艺术作品的世界。由于这样的艺术生产在一个场中发生,审美认识,只要它是区别性的、关系性的,并关注产生风格的差距,它就必然是历史性的:就像处于场及其特定传统之外的所谓“稚拙派”画家,仍然处在被考察艺术特有的历史之外那样,“天真的”观赏者无法达到对艺术作品的一种特定认识,艺术作品只有参照一种艺术传统的特定历史才有意义。一个达到高度自主程度的生产场的生产所要求的审美配置,与一种特定的文化才能密不可分:这种历史文化作为一种相关性原则而起作用,这种原则能够让人们在呈现给目光的因素中,识别所有区分的特征,而且仅仅识别这些特征,并有意或无意地将这些特征与可替代的可能性的空间相联系。这种往往处于实践状态的技艺,主要是通过单纯地熟悉作品,也就是通过一种暗中训练获得的,这种训练与
V 无需明确的规则和标准就可认出熟悉的面孔相似。这种技艺常常使人们能够识别各种风格,也就是一个时代、一种文明或一个流派的特有表达方式,而构成每种方式之创新性的特征无需清楚地区别和明确地陈述出来。一切都似乎说明,即使在最有资格的专家那里,决定典型作品的风格属性的标准,依旧常常处于不言明的状态,而所有的判断都依靠这些风格属性。

纯粹的目光意味着与对待世界的平常态度的一种决裂,鉴于这种决裂实现的条件,这种决裂是一种社会决裂。我们可以相信奥尔特嘉·伊·加塞特^①,他把现代艺术看成对一切“人类的”东西,也就是一般的、共同的——与区别的或卓越的相对——的东西,即“普通”人投入到他们的“普通”生活中的激情、感情、情感的一种有系统的拒绝。实际上,一切都好像“大众美学”(在这里引号意味着涉及的是一种自在的而非自为的美学)是建立在肯定艺术和生活的连续性的基础上,这种肯定意味着形式服从于功能。这在小说尤其是戏剧的状况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小说和戏剧中,民众拒绝任何种类的形式探索和下面这样一些效果,这些效果通过引入一种与(在布景、情节等方面)被接受的常规之间的距离,倾向于让观众保持距离,阻止他进入游戏并与人物完全认同(我想到了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或新小说实施的故事情节瓦解)。美学理论认为疏离、无关利害是视艺术作品为其所是,也就是视其为自主的、自觉的唯一方式,与此相反,大众“美学”无视甚至拒绝对“肤浅的”赞同和对“平庸的”放松之拒绝,后一种拒绝至少间接地是形式探索之兴趣的根源,而且如同民众对绘画和摄影的判断所表明的,大众“美学”恰好表现为康德美学的对立面:为了领会构成审美判断之特性的东西,康德竭尽全力区分愉悦的与快适的,而且更普遍地,将无关利害与理性利益区分开来,无关利害是静观特有的审美性质的唯一保证,而理性利益则规定着善;相反,民众阶级的主体期

^① 奥尔特嘉·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 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提出“生命理性的形而上学”哲学,主要著作有《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1922)、《群众的反抗》(1930)等。——译者

待一切形象都完成一种功能,哪怕是符号功能,他们在其判断中常常显示出对道德规则或娱乐规则的通常明确的参照。无论他们诋毁还是称赞,他们的评价都参照一个规则系统,这个系统的原则总是伦理性的。

VI 大众趣味和它投入到虚构和表象中的严肃(或天真),通过将一般生活情形有效的精神气质(ethos)模式应用于合法的作品,并由此通过对艺术事物或生活事物进行系统的还原,从而按照对立推理显示出,纯粹趣味对“天真的”赞同实行了一种悬置,而这种悬置是与世界的必然的几近无目的的游戏关系的一个维度。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相信表象——文学、戏剧、绘画——胜过被表现的事物,而“民众”首先要求表象和支配表象的惯例允许他们“天真地”相信被表现的事物。纯粹美学植根于有选择地与自然界和社会世界的必然保持距离的一种伦理学甚或一种精神气质,这种伦理学或精神气质可能采取一种道德不可知论(当违背伦理变成一种艺术立场时,这种不可知论很明显)的形式,或采取一种唯美主义的形式,这种唯美主义通过将审美配置变成普遍应用的原则,把资产阶级对社会世界的否认推向极限。我们知道,纯粹目光的超脱无法与一种对待世界的一般态度分开,这种态度是否定性的经济必然——人们称之为使生活安乐的东西——所施加影响的产物。这种产物是悖论性的,它有助于主动地与必然保持距离。

尽管艺术很明显地为审美配置提供了特别的领域,但没有哪个实践领域中,不出现原始的需要和冲动服从于精致和升华的意图的,也没有哪个领域中,生活的风格化(stylisation),也就是说形

式优于功能、方法优于质料这一点,不产生相同结果的。没什么能把把随便什么物品甚或“平常”物品(因为“普通人”特别要使这些物品合乎审美目的)视为美的这种能力,或没什么比在最平常的日常生活选择中,如烹饪、服装或装饰方面,通过彻底颠覆将美学与伦理学相连的民众配置、运用一种“纯粹”美学之原则的这种禀赋,更能分类,更特殊,更优雅。

实际上,与现实和虚构发生关系、相信虚构或虚构模拟的现实的或多或少超脱的或疏远的不同方式,借助于这些方式所假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与社会空间中不同的可能位置密切相关,并由此被严格纳入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特有配置[习性(habitus)]系统中。趣味进行分类,为实行分类的人分类:社会主体通过他们对美与丑、优雅与粗俗所做的区分而区分开来,他们在客观分类中的位置便表达或体现在这些区分之中。由此,统计学分析指出,比如,与在文化消费方面可见的对立具有相同结构的对立,也出现在食物消费方面:数量与质量、暴食与小饌、实质与形式或外形的对比,涵盖了必然的趣味与自由——或奢华——的趣味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与相对于必然的各种不均等距离相关。必然的趣味趋向最有营养和最经济的食物,而自由或奢华的趣味与民众的贪食相反,趋向于借助于一种风格化的方法而将重点从内容转向(展示、服务、食用等的)方式,这种风格化的方法要求形式和外形对功能进行否定。

关于趣味和文化消费的科学是通过一种丝毫没有审美特征的违反开始的:实际上这种科学应该消除将合法文化变为一个孤立空间的神圣界限,以便发现一些明白易懂的关系,这些关系将表面

上无法比较的“选择”，如音乐和饮食、绘画和运动、文学和发式方面的偏好联系在一起。这种将审美消费重新整合到普通消费空间中的野蛮做法，取消了自康德以来作为学院美学基础的“感官趣味”与“反思趣味”、“肤浅”愉快与“纯粹”愉快之间的对立，“肤浅”愉快是被归结为一种感官愉快的可感愉快，“纯粹”愉快则注定倾向于变成一种道德至善的象征和一种升华能力的标准。这种升华能力规定了真正有人性的人。文化是这种神奇区别的产物，因而具有神圣的价值。实际上，文化的认可使其所触及的物、人和情境得到了一种类似于质变的本体论的提升。我只提出两种评论作为证据，这些评论似乎是为了让社会学家高兴而产生的：“最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在我们的第一场演出中没有任何淫秽的东西，女芭蕾舞演员，即使打扮成裸体舞女、精灵、疯子或荡妇，仍旧保持一种始终不变的纯洁”⁵；“有淫秽的姿势，这些刺眼的模拟性交的动作。当然，谈不上赞同，尽管在芭蕾舞中插入这样的动作赋予了这些动作以审美的和象征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是电影每天展现给观众的隐秘场景所缺乏的……裸体？能说什么呢，除了时间很短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戏剧效果。我不想说这是纯洁的或无瑕的，因为任何属于商业的东西都不能如此定性。可以说不令人反感，但我们可以责备它成了为演出成功而设的圈套……《头发》^①的裸体缺乏象征性。”⁶对低级的、粗俗的、平庸的、贪财的、奴性的，总之是

5 O. Merlin,《Mlle Thibon dans la vision de Marguerite》, *Le Monde*, 9-2-1965.

① 《头发》(*Hair*)，美国摇滚音乐喜剧，1967年10月在外百老汇剧院首演，获得成功，后来曾在许多国家巡回演出。——译者

6 F. Chenique,《*Hair est-il immoral?*》, *Le Monde*, 28-1-70.

自然的享乐的否定,如是构成了文化的神圣性,并包含着对某些人的优越性的肯定,这些人懂得满足于升华的、精致的、无关利害的、无偿的、优雅的快乐,而这些快乐从来都是禁止普通门外汉享受的。这就使得艺术和艺术消费预先倾向于满足一种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无论人们知不知道。

第一部分

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

“而且今天,我们还不知道文化生活在仆人消失后能否幸存下来”。

——A. 贝藏松^①:《十九世纪俄国人的生活》

^① A. 贝藏松(Alain Besançon, 1932-), 法国历史学家, 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苏联史专家, 法兰西道德和政治科学学士院院士, 曾任《快报》的专栏作家, 代表作有《列宁主义的理性根源》(1977)、《被禁止的形象》(1994)、《教会中的三种诱惑》(1996)、《世纪的苦难》(1998)等。——译者

第一章 文化贵族的爵位和领地

只有当社会学面对类似趣味这样的对象时,才出现了少有的 9
它与社会精神分析如此相似的状况,趣味是某些斗争的最重要赌注之一,统治阶级的场和文化生产场是这些斗争的地点。这不仅因为趣味判断是判断力的最高表现,它通过判断力协调知性与感性,协调理解却无法感受的学术与享乐却不理解的社交家,从而为完整的人下定义。也不仅因为所有的规矩都事先将确定这难以定义的东西的计划当成一种缺乏修养的明确表现:学院的规矩,从里格尔^①和沃夫林^②到埃利·富尔^③和昂利·福西庸^④,以及从最具学校教育特点的古典评论家到先锋派的符号学家的规矩,都规定了一种对艺术作品的形式主义阅读;同样地,上流社会的规矩,将趣味变成真正贵族的最可靠的标志之一,它无法设想有人把它与它自身之外的东西连在一起。

① 里格尔(Alois Riegl, 1858-1905),奥地利中世纪艺术史家,代表作有《风格问题·装饰史的基础》(1893)、《对古建筑的现代崇拜》(1902)等。——译者

② 沃夫林(Heinrich Wölfflin, 1864-1945),瑞士艺术史家,第一个肯定巴洛克艺术,代表作有《文艺复兴与巴洛克》(1888)、《艺术史的基本原则》(1915)等。——译者

③ 埃利·富尔(Élie Faure, 1881-1943),法国艺术史家,随笔作家,代表作有《艺术史》(1919-1921)、《形式的精神》(1927)等。——译者

④ 昂利·福西庸(Henri Focillon, 1881-1943),法国艺术批评家,代表作有《罗马雕塑家的艺术》(1932)、《形式的生命力》(1934)、《西方艺术》(1938)等。——译者

社会学在这里尤其处于对社会加以否定的区域。对于社会学而言,反对自明性是不够的;将趣味,这个一切“创造”的非创造之源,与趣味为其产物的社会条件相联系,也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同样是这些社会学家努力掩盖趣味与教育、处于教养状态意义上的文化与作为教育活动的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明证性,他们会对有人要花那么大力气从科学上证明这种明证性感到惊讶。社会学还应该考察这种仅仅在表面上是自我解释的关系;并寻找这样一个悖论的原因,这个悖论是说,人们与学校教育资本的关系在学校不教授的领域也同样紧密。这永远不能完全依赖于对所谓事实的实证主义仲裁:在学校教育资本或社会出身与这种或那种知识,或这种或那种利用知识的方式之间的统计学关系后面,隐藏着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些群体按照它们获得其文化资本的条件和它们能够从中获得最大收益的市场,与文化保持着不同的甚至是对抗的关系。但我们仍没有摆脱自明性:应该对提问本身——也就是对这种提问暗中优待的与文化的关系——提问,从而确定提问的内容和形式的改变是否足以决定所考察关系的变化。我们无法脱离文化游戏;如果我们想将文化游戏的真理客观化,就只能将我们为了实现这种客观化而被迫采用的手段本身尽可能彻底地客观化。“故事可能发生在你身上”(De te fabula narratur)。这种呼唤不仅面向读者,也面向社会学家。自相矛盾的是,文化游戏在参与游戏的行动者互相实行的所有局部客观化的保护下,反对客观化:学者只有放弃把持自己的真理,才能掌握社交家的真理;他们的对手也是如此。明智与盲目交织的相同法则支配着“知识分子”与“资产者”(或者他们在文化生产场中的代言人)之间的对立。仅仅考虑到合法文化在阶级关系中完成的功能,并不能确保不受“知

识分子”和“资产者”不断地抛给对方的这种或那种与利益相关的文化表象的左右。如果说关于文化生产和生产者的社会学至此从未脱离对立形象的游戏,这是因为阐述注定是片面的,因而是虚假的,只要它拒绝领会它所陈述的观点,进而拒绝考虑整体上的游戏之建构,就是如此。在这个游戏中,通行的分类所说的“右派知识分子”与“左派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对手及其策略进行一种客观化的还原,这种还原越牵涉利害关系,就越容易:只有在位置的场的层次上,无论与参与游戏相关的一般利益,还是与不同位置相连的特殊利益,以及由此,这些利益表现于其中的占位(*prises de position*)之形式和内容,才能得到确定。尽管传统上属于“右派知识分子”事务的“知识分子社会学”与多半归于“左派知识分子”的“右派思想”批判,都摆出客观的样子,但它们不过是象征的攻击罢了,而且当这些攻击呈现出完美的科学中立的表象时,具有一种格外的有效性。它们心照不宣地保持一致,以掩盖本质的东西,也即客观位置的结构,这种结构是每个位置的占据者对其他位置的占据者可能持有的看法的根源之一,而且它把自身的形式和力量赋予这样一个倾向,即每个群体都把一个群体的片面真理误认为并当成是群体之间客观关系的真理。

我们力求确定这一点,即通过消费产品的性质和消费方式得以把握的有教养的配置和文化才能,是如何按照行动者的等级,并按照这些等级适合的领域——从最合法的领域,如绘画或音乐,到最自由的领域,如服装、家具或烹饪——发生变化的,以及在合法领域内部,是如何按照这些等级出现于其中的市场,即“学校教育”市场或“学校教育之外的”市场,发生变化的。这样,我们确立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方面是把文化实践(或相关的观点)与(由所获文凭

衡量的)学校教育资本,其次与(通过父亲的职业得到的)社会出身连在一起的非常紧密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这个事实,即在学校教育资本相等的情况下,离最合法的领域越远,社会出身在实践的或偏好的解释系统中的影响就越大。¹

被评估的能力越被学校教育所认可,用来评估这些能力的手段就越具有“学校教育特点”,成绩与学历之间的关系就越牢固。学历作为学校教育灌输年限的或多或少恰当的指标,依照文化资本是从家庭继承或从学校获得,或多或少彻底地保证了文化资本,因而,学历是文化资本的一个恰当程度不等的指标。当问题针对的是一系列音乐作品的作曲家时,提问采取一种学校教育色彩很浓²的知识练习的方式,而且这些知识非常接近学校教育机构传授的知识并在学校教育市场上得到很大认可时,就可看出成绩与学校教育资本即被学校教育制度(它在相当不同的程度上负责着学校教育资本的获得)认可和保证的文化资本之间最牢固的关联。

获得职业教育证书或初级教师资格证书的人中的67%,无法(在16部作品中)认出两位以上作曲家,这一比例与获得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的人中的45%,业士中的19%,上过普通大学或开始大学学习的人中的17%,最后与持有等于或高于大学文凭的人中仅有的7%相对。被问的工人或职员中没有任何人能在给出的16部作品中辨认出12位作曲家

1 呈现在这里的分析依靠1963年和1967-1968年对1217人所做的一项问卷调查。读者可在附录I(关于方法的几点思考)中看到与抽样结构、问卷和主要分析程序有关的所有情况。

2 调查者列出一个有16部音乐作品的名单,要求指出这些作品的作曲家的名字(参见问卷,附录1,关于方法的几点思考)。

以上,而艺术生产者和教授(大学教师中就有78%)中则有52%能辨认出。

对喜欢什么画家或音乐作品这个问题的不回答比率也与教育水平紧密相关,这个比率使得统治阶级与民众阶级、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截然对立。(无论如何,既然在这种情况下回答与否无疑既依赖配置也依赖纯粹的能力,那么新小资产阶级——中等商业管理者、社会医疗机构成员、秘书、文化中间人——的特有文化抱负,就找到了一个自我表达的机会。)同样,听最“博学”的广播电台,如法国音乐台、法国文化台,以及听音乐或文化节目,拥有一台电唱机,听唱片(种类不详,这就缩小了差距),参观博物馆,绘画方面的能力水平,这些特点彼此之间密切相关,遵循相同的逻辑,它们都与学校教育资本密切相关,从而将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严格等级化(收听娱乐节目的变化则成反比)。一些活动,比如从事一种造型艺术或演奏一种乐器,常常意味着一种从学校之外获得并(相对)独立于学校教育证书等级的文化资本,在这些活动中,与社会阶级的同样非常牢固的关联通过社会轨迹得以建立(这就解释了新兴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地位)。

人们越趋向最合法的领域,如音乐和绘画,并且在这些按照其合法模式程度而划分等级的空间内部,越趋向某些体裁或某些作品,学校教育资本的差别与无论知识上的还是偏好上的重要差别的联系就越密切:古典音乐与歌曲的差别也是按照同样的原则产生的一些差别,这些差别在它们各自内部区分了体裁,如歌剧与轻歌剧、四重奏与交响乐,区分了时代,如当代音乐与古代音乐,区分了作者,最终还区分了作品;因

此在音乐作品中,《平均律古钢琴曲集》^①和《左手钢琴协奏曲》^②(我们会看到它们通过它们意味着的获得方式和消费方式区分开来)与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马刀舞曲》^③对立,后者要么由于属于一种低等体裁(“轻音乐”),要么由于广为流传而遭到贬低(高雅与自负的辩证法将“普及了”的合法艺术作品打发到“中产阶级艺术”中),³如同歌曲方面,布拉桑^④或费雷^⑤、盖塔里^⑥和佩图拉·克拉克^⑦对立一样,在这两种情况

① 德国作曲家巴赫 1717-1723 年在柯登担任宫廷乐长时所作,是巴赫键盘音乐中最伟大的作品(包括 48 首前奏曲和赋格),被誉为音乐上的《旧约圣经》。——译者

② 法国作曲家拉威尔(1875-1937)的作品,1931 年为奥地利钢琴家保罗·维特根斯坦而作,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右臂,拉威尔 1932 年 1 月 6 日在维也纳亲自指挥它的首演。——译者

③ 前苏联亚美尼亚作曲家哈恰图良(1903-1978)的舞剧《加雅涅》中的一支舞曲,是库尔特族出征前的战斗舞曲,创作于 1942 年。——译者

3 这种情况在合法的音乐领域内的最典型表现是阿尔比诺尼·的“著名的柔板”(如同唱片封套所说的)和维瓦尔蒂许多作品的命运,这些作品在不到 20 年时间里从被音乐学家发现的权威地位落入大众广播电台和小资产阶级电唱机的流行曲目的状态。

* 阿尔比诺尼(Tomaso Albinoni, 1671-1750),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曾经创作 50 多部歌剧和大量器乐作品,最著名的是《弦乐柔板》,旋律忧伤而优美。——译者

④ 布拉桑(Georges Brassens, 1921-1981),法国诗人、创作歌手,他的歌曲反对社会虚伪和陈规,曾获法兰西学士院诗歌大奖。——译者

⑤ 费雷(Léo Ferré, 1916-1993),法国诗人、歌手,擅长抒情诗和音乐创作,他的歌曲以反抗社会和反映下层人生活著称。——译者

⑥ 盖塔里(Frédéric Guétary, 1915-1997),法国歌手,出生于埃及,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巴黎、伦敦、纽约的音乐舞台上大受欢迎,他为音乐表演增加了一种独特的拉丁魅力。——译者

⑦ 佩图拉·克拉克(Petula Clark, 1932-),英国女演员、创作歌手,20 世纪 60 年代演唱法国歌曲,享有国际声誉。——译者

下,这些差别与学校教育资本的差别相符。⁴ (参见表 1)

表 1 歌曲和音乐方面的偏好

14

所属 阶级	文凭	盖塔里	P. 克 拉克	布拉桑	费雷	蓝色 多瑙河	马刀 舞曲	平均律 古钢琴 曲集	左手 钢琴 协奏曲
大众 阶级	无文凭, CEP, CAP,	33	31	38	20	65	28	1	-
	BEPC ^① 及以上	17	17	61	22	62.5	12.5	-	-
中产 阶级	无文凭, CEP, CAP,	23	29	41	21	61	26	1.5	1.5
	BEPC 及以上	12.5	19	47.5	39	27	16	8	4
	—包括 BEPC, 业士	12	21	46.5	39	31	17.5	5	4
	—高等教育	17	9	54	39	3	5	21	4
高等 阶级	无文凭, CEP, CAP,	16	44	36	12	17	21	8	8
	BEPC 及以上	5	17	74	35	16	8	15	13
	—包括 BEPC, 业士	8.5	24	65	29	14	11	3	6
	—高等教育	4	14.5	77	39	16.5	7	19	15
	包括:								
	• 普通大学	5	20	73.5	32	19.5	5.5	10	18
	• 学士	4.5	17	73	34.5	17	9.5	29.5	12
• 学衔, 重点大学 ^②	—	3	90	49.5	11.5	3	19.5	12	

* 关于人数, 参见表 3。

要这样读这幅图: 在属于大众阶级、取得职业教育证书(CEP)或专业技能证书(CAP)或没有任何文凭的 100 人中, 在(一个有 12 名歌手的名单上)受喜爱的 3 名歌手中, 33 人选了盖塔里, 31 人选了佩图拉·克拉克, 在(一个有 16 部音乐作品的名单上)受喜爱的三部音乐作品中, 65 人选了《蓝色多瑙河》, 28 人选了《马刀舞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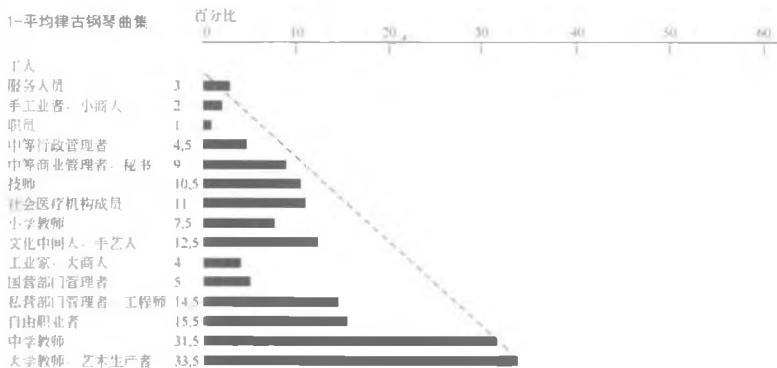
⁴ 实际上, 次要因素如资本结构、继承的文化资本总量(或社会轨迹)、年龄或住所的比重, 随作品而变化。因此, 当我们趋向(在被考察时刻)最不合法的作品, 就会看到诸如年龄这样的因素的比重增加了; 在《蓝色狂想曲》或《匈牙利狂想曲》的情形中, 与年龄的关系比与文凭、父亲的社会-职业等级、性别或住所关系更密切。

① 即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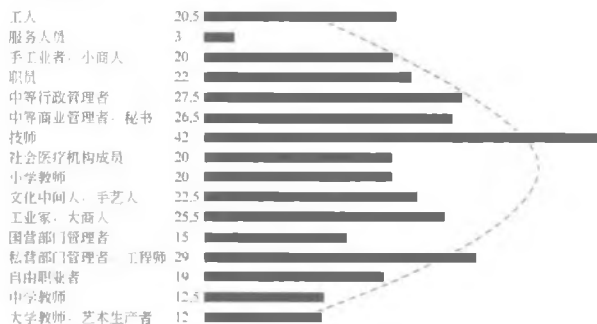
② 重点大学(Grande Ecole)指法国某些公立高等教育机构, 最早创办于 18 世纪, 为国家机构, 如军队、矿产局、河流森林管理局、商务部等提供技术和军事管理人员, 也包括后来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国家行政管理学校等。——译者

22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15 1-平均律古钢琴曲集



2-蓝色狂想曲



3-蓝色多瑙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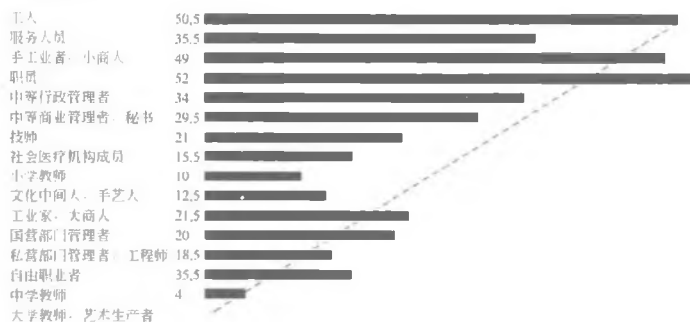


图1 对三部音乐作品的偏好的阶层分布

这就是说,在所有供消费者选择的对象中,没有什么比合法的艺术作品更能起到分类的作用了,这些作品在总体上是有所区别的,能够通过体裁、时代、手法、作者等的划分和细分游戏,产生无限的细微差别。在可以通过连续的划分重新产生的独特趣味的空间里,我们通过坚持主要的对立,可以区分出三个与学校教育水平和社会阶级大致相符的趣味空间:合法趣味,也就是对合法作品的喜爱,在这里合法作品由《平均律古钢琴曲集》(图1中的柱状统计图1)、《赋格艺术》^①、《左手钢琴协奏曲》,或绘画方面的勃鲁盖尔^②或戈雅来代表,最自信的审美家能够将正在合法化的艺术作品,即电影、爵士乐甚或歌曲(比如这里的莱奥·费雷、雅克·杜埃^③)中最合法的作品与它们联系起来,合法趣味随着学校教育水平而提高,在最富有学校教育资本的统治阶级层次中达到最高;“中产阶级”趣味,这种趣味集中了主要艺术的次要作品,如这里的《蓝色狂想曲》(图1中的柱状统计图2)、《匈牙利狂想曲》,或还有绘画方面

① 德国作曲家巴赫的最后一部音乐作品,大约创作于1749-1750年,被誉为音乐家的哲学著作,以音乐思维中的高度逻辑性和结构的严密性来反映音乐包含的数理和宇宙的和谐之美,海德格尔称“巴赫在键盘上用音乐记录和展现所有人性的秘密”。——译者

② 勃鲁盖尔(Brugel, 1525-1569), 弗兰德画家,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擅长描绘农民的日常生活和风景,画面充满真实、威严和神秘的精神力量,代表作有《农民的婚礼》、《巴别塔》、《暗日》等。——译者

③ 雅克·杜埃(Jacques Douai, 1920-2004), 法国歌手,第一个演唱名曲《落叶》,为阿拉贡、费雷的诗歌谱曲,大力推动法国歌曲和民间文化。——译者

的于特里约^①、布菲^②甚或雷诺阿，以及次要艺术的主要作品，如歌曲方面，雅克·布雷尔^③和吉尔贝·贝科^④，这种趣味在中产阶级身上比在民众阶级或统治阶级的“知识”层次身上更常见；最后，“民众”趣味，在这里这种趣味是由这样的选择所代表的，所选的是“轻”音乐作品或由于广为流传而贬值的深奥音乐作品，如《蓝色多瑙河》（图 1 中的柱状统计图 3）、《茶花女》、《阿莱城的姑娘》，以及完全没有艺术野心或抱负的歌曲，比如马里亚诺^⑤、盖塔里或佩图拉·克拉克的歌曲，这种趣味在民众阶级中出现的比率最高，并且它的变化与学校教育资本成反比（这就说明了为何这种趣味在工商企业主甚或高级管理者身上比在小学教师和文化中间人身上更常见）。

① 于特里约(Maurice Utrillo, 1883-1955), 法国画家, 出生在巴黎蒙马特尔高地, 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城市风景画家, 笔法简洁, 关注色彩关系。——译者

② 布菲(Paul Buffet, 1864-1941), 法国画家, 擅长东方风格的绘画、历史画和风景画。——译者

③ 雅克·布雷尔(Jacques Brel, 1929-1978), 比利时法语创作歌手、演员, 演唱风格热烈、感性, 其抒情歌曲的品质和风格受到流行音乐批评家的高度赞扬。——译者

④ 吉尔贝·贝科(Gilbert Bécaud, 1927-2001), 法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流行的歌手, 因为他的舞台表演充满活力, 他被称为“100000 伏特先生”。——译者

⑤ 马里亚诺(Mariano, 1914-1970), 西班牙裔法国歌手, 嗓音和演唱风格非常独特, 因演唱轻歌剧《卡迪克斯的美人》成名。——译者

⁵ 这里采用的三幅剖面图是我们用图表现(在每个等级内部按照学校教育资本划分等级的)不同阶层的一系列特有选择时所得到的剖面图的完美典型: 第一幅(《平均律古钢琴曲集》)的分布比率出现在上文提到的所有作者或作品的状况中, 还有选择阅读哲学随笔和参观博物馆等的状况中; 第二幅(《蓝色狂想曲》)的分布比率除了显示本书中引用的作品或作者(和《众神的黄昏》)的特征之外, 还显示了摄影、舒适而私密的室内装饰等的特征; 最后, 第三幅的分布比率也适用于感伤小说和干净整洁的房间等。

文化贵族的爵位

在与学校教育如此不相干的领域,如音乐、绘画领域,更不用说爵士乐或电影领域中,(按照教育水平衡量的)学校教育资本与认识或实践之间的一种密切关系,在更高程度上,就像参观博物馆与学历的关系一样,提出了它自身的意义问题,也就是关联在一起的两个项的真正同一性问题,这两个项在这一关系中确定自身:统计学关系既显示又掩盖了包含这种关系之真理的一种语义学关系。当人们确定在一种所谓的独立变量与一种所谓的从属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牢固的关联性时,还是什么也没解释,什么也没理解:只要人们没有确定在特定情况下,也就是在每种特定的关系中,每个关系项(比如教育水平,对作曲家的了解)说明什么,就会如此。统计关系无论在数字上多么精确地得到确定,它仍旧是一种缺乏意义的纯粹数据。在这类情况下人们往往满足于“直觉的”一知半解,把力气花在关系“强度”标准的精细上。一旦这种一知半解与关于变量或常数之恒定的幻想相结合——这种幻想来自指明变量或因素的各种指标或各关系项的名义上的同一性,人们就无法询问关联在一起的各项(即各种指标,不管它们指示的是什么)在所考察关系中表达的意义以及它们从这种关系中得到的意义。

每种情况之下都应该提出质疑的是两个关系项:独立变量,即职业、性别、年龄、父亲的职业、住所等,非常不同的作用可能通过这种变量表现出来;从属变量,各种配置可能通过这种变量传达出来,而这些配置本身则按照独立变量所划分的等级发生剧烈变化。

因此,为了确切说明在与不同的合法艺术,如绘画、音乐、戏剧、文学等的关系中观察到的阶级之间或同一阶级内部的差别,应该彻底分析合法或不合法的社会用途,每种被考察的艺术、体裁、作品、制度都服从这些社会用途。如果说没有什么比音乐上的趣味更能显示一个人的“阶层”,更能对一个人进行归类,这当然是因为,由于获得相应配置的条件之稀缺,没什么比听音乐会或演奏一种“高贵”乐器(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这没有看戏、参观博物馆甚或画廊那么普及)这种实践更能分类了。不过,这也是因为这种“音乐修养”展示的不是一种普通的文化装饰:从其社会定义来看,“音乐修养”不是知识和经验再加上谈论它们的才能之简单总和。音乐是最具崇高精神的精神艺术并且对音乐的热爱是“灵性”的一种保证。只要想想宗教语言的世俗化表达(比如心理分析表达)赋予“聆听”这个词的不同寻常的价值就够了。正如关于音乐的灵魂和灵魂的音乐的无数大同小异的说法所表明的,音乐与最“深刻的内在性”(“内心的音乐”)有关,而且只存在心灵的谐和……对一个按照灵魂与肉体之间关系的方式思考自己与民众关系的资产阶级世界而言,“对音乐无动于衷”也许代表了物质主义无教养的一种极端可耻的形式。而且事情不仅如此。音乐尤其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它什么也不说而且它也没什么要说的;它由于从不真正具有表达功能,从而与戏剧对立,而戏剧即使在最纯粹的形式中,仍然包含着社会信息,而且只能在与公众的价值和期待之间直接而深刻的一致基础上进行“传达”。戏剧进行划分且彼此区分:右岸戏剧与左岸戏剧之间的对立、资产阶级戏剧与先锋戏剧之间的对立,在审美上和政治上密不可分。而在音乐上丝毫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撇开最近的几个罕见特例):音乐代表了对世界,尤其是对

社会世界的最彻底、最绝对的否认形式，资产阶级精神气质导致在所有艺术形式中期待这种否认形式。

而且，为了恰当地说明被纳入这样一个列联表中的东西——这个表使得职业、年龄或性别与人们对《平均律古钢琴曲集》或《左手钢琴协奏曲》的偏好产生关联——，应该既与指标的盲目使用决裂，又与虚假的本质分析决裂，鉴于本质分析不过是一种个人经验的普遍化，从而彻底理解这些作品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向全体社会行动者，尤其向个人等级（在特定状况下，是继承者与迟来者）体现出来的多种多样互相矛盾的意义，个人等级被作品区分或由于作品而互相对抗：这就是说，一方面考虑与每部作品联系在一起的相关社会属性，即作品（“巴洛克”/“现代”、和谐/不和谐、严肃/抒情等）、作者，尤其是相应的乐器（拨弦乐器尖利而粗糙的音色/击弦乐器温暖而保守的音色）的社会形象，另一方面，考虑各种分布属性，这些属性出现在这些作品与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关系中——“这属于……”，出现在作品与其相应的接受条件（通过唱片——迟来的——认识/通过弹钢琴即资产阶级的典型乐器——很早的——认识）（根据情况多少被有意识地觉察到的）的关系中。⁶

⁶ 在分布属性层面上观察到的对立与严格意义上的风格特征层面上记录的对立往往是同源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产者（和作品）在生产场中的位置与消费者在社会空间中（即总体上的阶级结构中或统治阶级的结构中）的位置之间的同源性，似乎是最常见的情况，而且，简而言之，马拉美的爱好者与左拉的爱好者的关系极有可能类似于马拉美与左拉的一种关系；如果作品之间的差别预先倾向于表达作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作品无论从其风格还是内容上，都带有其作者的由社会构成的配置（也就是按照这些配置曾经大大帮助确定的生产场中的位置而重新体现出来的作者的社会出身）之标志；这也是因为，这些作品是由社会意义显示出来的，而社会意义是作品在生产场中从其对立面及其作者的对立面（比如，左/右、明/暗等）获得并由大学传统传递的。

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恰当地解释资产阶级偏好“印象主义派画家”会要求的一切。印象派画家对大自然或人类本性的抒情的和自然主义的赞同，使得他们既反对一种对社会世界的现实主义的或批判的表象（这也许就是雷诺阿与戈雅之间对立的维度之一，更不用说库尔贝或杜米埃^①了），又反对所有抽象形式。同样，为了理解不同体育运动在阶级之间的分布，应该考虑不同的阶级按照他们固有的认识和评价模式形成的与不同运动相关的（经济的、文化的和体力的）花费及利益的表象，这些利益包括即时的或延迟的“身体”利益（健康、美丽、力量；看得见的利益，比如健美，或者看不见的利益，比如保健等），经济的和社会的利益（社会晋升等），以及与每种被考察运动的分布价值或位置价值（即每种运动按稀缺程度，按它与一个阶级或多或少的明确联系，对它产生的一切影响，拳击、足球、橄榄球或健美让人想到民众阶级，网球和滑雪让人想到资产阶级，高尔夫球让人想到大资产阶级）相关的直接或延迟的象征利益，如对身体本身产生的作用（比如修长、古铜色的皮肤，多少看得见的肌肉组织等）或进入由某些运动（高尔夫球、马球等）打开门路的高度选择性的群体所提供的区分利益。

我们只有对每种被考察的属性或实践，如路易十五式五斗橱或勃拉姆斯的交响曲、阅读《历史》杂志或《费加罗报》、打橄榄球或拉手风琴之类的社会价值做严格意义上的无止境的

^① 杜米埃(Honore Daumier, 1808-1879), 法国讽刺画家、油画家、雕塑家。他的艺术生涯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创作石版画、漫画和雕刻, 后期趋于印象派艺术, 研究新技法, 受到波德莱尔、马奈和莫奈的赞赏, 主要题材有: 道德风尚、圣路易岛上的日常生活、洗衣妇、酒徒、戏院、车厢、法庭、画室等。译者

分析,才能彻底摆脱直觉主义,直觉主义是相信指标名义上的同一性的实证主义信念不可避免的附属物。毫无疑问,如果人们按照普鲁斯特的分析来解读阶层的读报分布,就会不那么盲目了,普鲁斯特分析了“叫作读报的可恶的享乐行为,由于这种行为,最近24小时内世间的所有不幸和灾难,夺去五万人生命的战争、罪行、罢工、破产、失火、中毒、自杀、离婚、国家元首和演员的残酷感情,全都借助于我们这些与之无利害关系的人的个人习惯,变成一顿丰盛的早餐,并以一种相当令人激动和让人振奋的方式与适时地吞入几口牛奶咖啡绝妙地配合。”(M. Proust, *Sentiments filiaux d'un parricide*, in *Pastiches et mélanges*, Paris, Gallimard, 1ère éd. 1919, Idées, 1970, p. 200)对审美变种的这种描绘,促使我们分析由等级而来的变化,分析关于社会世界的间接的和相对抽象的经验的不变量。读报按照比如说社会的和空间的距离变化(一端,是地区日报的地方新闻,婚礼、死亡、事故;另一端,是国际消息,或者按照另一种标准,杂志上的皇室婚礼和亲王订婚)或政治介入(从普鲁斯特的文章清楚表明²⁰的超脱到活动分子的愤怒或热情)提供了这些不变量。

实际上,这样一种对指标的社会意义的预先分析之缺乏,有时会使表面上最严格的调查不适合社会学阅读:许多消费调查不知道食品表面的稳定性掩盖了食品被分派的社会功用的多样性,将直接来自统计员的社会无意识的分类标准用在食品上,从而把应该分开的东西联在了一起(比如菜豆与豆角),把应该联在一起的东西分开了(比如菜豆与香蕉,后者之

于水果相当于前者之于蔬菜);实际上,如果人们知道单单“米饭”就隐含着更符合民众口味的“牛奶米饭”或“油米饭”,更符合资产阶级口味或更确切地说“知识分子”口味的“咖喱米饭”,更不用说本身就暗示着一种生活风格的白米饭了,那么,对于由表面上是中性的“谷物”聚集在一起的一系列产品,如面包、甜面包干、米饭、面条、面粉,尤其是对于这些食品的消费按照社会阶级产生的变化,该说什么呢?尽管显然没有什么“天然的”或加工的食品能同等地满足所有可能的社会功用,不过,仍要看到,完全单义的食品也许微乎其微,而且人们能在某种程度上从事物自身推导出其社会功用的状况实属罕见:如果我们除去为一种确定的用途专门制造的食品(比如所谓的保健面包),或要么由于传统(比如茶)要么由于价格(比如鱼子酱)与一个阶级密切联系的食品,那么大部分食品只是从食品被分派的社会功用中得到它们的社会价值;这样,我们要想在这些方面重新发现按照阶级而存在的变化,只能从一开始就引入这些变化,以社会功用来代替词或物,因为词或物表面上的单义性对学校教育无意识的抽象分类毫无疑义,词或物是在社会功用中得到完全确定的。社会功用包括诸如摄影方式,或烹饪方式——用文火或用压力锅,也就是不计时间和金钱或快速而经济地烹调,以及这些活动的产物,家庭照片或民间舞蹈照片,红酒洋葱烧牛肉或咖喱米饭。⁷

⁷ 是不是应该再说一次,表象总是为了表象的,而科学只有一上来就引进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别,才能重新发现这些差别,因此科学在某些人眼里注定显得有偏见之嫌疑,这些人仅仅通过沉溺在实证主义的无为之中,就单纯地和完全地消除了这些差别。

但是,也许是在对“解释因素”的寻求中,实体主义的思想方式才能表露出来,这种思想方式从实词滑向实质,大致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从实词的恒定滑向实质的恒定,将与行动者、职业、年龄、性别或文凭相关联的属性当成与这些属性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关系无关的力量;于是一个问题被排除了,这个问题就是,在决定的变量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是什么,在被决定的变量中被决定的是是什么,也就是在被选取的属性中,什么通过被考察的指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构成了相关的属性,而这种相关属性能够真正决定它在其中确定自身的关系。纯粹从统计学上考量一个指标与这种或那种实践之间关系的强度的变化,并不准许省去从社会学特有的角度考量表达在统计关系中的结果,统计学分析以寻求自身的可理解性为目标时,能够有助于发现这些结果。只有从事一种研究工作,而这种研究工作将关系本身当作研究对象,询问关系的社会学意义而非统计学意图,我们才能用一系列不同的结果,即社会学上可辨认的恒定关系,来代替一个被假设为恒定的变量与不同实践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学上可辨认的恒定关系既表现又隐藏在同一指标与不同实践之间的统计关系中。科学研究通过与直接理解的虚假明证性决裂(统计分析虚假的精细——我想到了比如路径分析——出乎意料地加强了这种虚假的明证性),力求用“定义明确的概念的一种严格关系”,⁸即统计关系不管怎样会记录下来的结果的理性原则——比如教育系统授予的这些贵族爵位(或相反,声名狼藉的标志)与它们所包含的实践之间的关系,或者合法的艺术作品要求的配置与学

⁸ G. Bachelard, *Le rationalisme appliqué*, Paris, PUF, 1949, p. 106.

校教育式的闲暇在人们没有明确知道或愿意的情况下反复灌输的配置之间的关系,来代替这种或那种“从属变量”与某些变量之间的现象关系,这些变量,诸如教育水平或社会出身,不过是共同观念,它们表面上的“解释功能”取决于人们对社会世界的共同认识习惯。

爵位的作用

由于文化资本的传承逻辑和学校教育系统的运行逻辑,从家庭继承的文化资本与学校教育资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关系。尽管人们知道这种关系,也不能把所观察到的音乐或绘画才能(和它假定的并使之成为可能的实践)与学校教育资本之间的联系仅仅归于学校教育系统的作用(更不要说,归于它所提供的显然几乎不存在的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教育);这种资本其实是由家庭保证的文化传承和学校保证的文化传承(其有效性依赖于直接从家庭继承的文化资本的重要性)的累积作用予以担保的产物。学校教育制度通过其实施的反复灌输和强制行为,也促使(按照原始配置也就是出身阶层程度不同地)形成相对于合法文化的普遍的和可改变的配置:这种配置是相对于学校教育所认可的知识和实践而获得的,并倾向于在“学校教育”范围之外应用,表现为一种“无关利害”的倾向,以积累无法在学校教育市场上直接赢利的经验和认识。⁹

⁹ 学校教育系统通过在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内部划定它纳入教学大纲并通过考试控制的东西的范围,至少是以否定的方式定义了“自由的”文化。众所周知,一个文化对象越是在学校教育课程的低层次上被教授和要求,它就越有“学校教育”性质(“学校教育”的范围是“初等教育”),而且随着教育等级逐渐提高,学校教育制度赋予“自由”文化一种越来越高的价值,越来越拒绝最具“学校教育”性质的文化尺度(如关于作者、年代和事件的直接而孤立的提问)。

事实上,有教养的配置普遍化的倾向不过是文化占有行为的许可条件,这种条件作为一个客观要求被纳入对资产阶级的隶属关系中,同时被纳入学历中,学历使得人们有可能获得资产阶级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为什么首先要停留在也许隐藏得最好的学校教育制度的作用上,学历的强制规定产生了这种作用,它是法定指定作用的特殊状况,这种法定指定可能是正面的(美化),也可能是负面的(谴责),一切群体都通过把个人归入等级化的阶级而产生这种作用。不具备学校教育证书的文化资本的持有者总是被责令展示他们的才能,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他们的文化活动的结果,与他们不同,文化贵族爵位的持有者——在这方面类似贵族爵位的持有者,他们的存在由对一种血缘、一片土地、一个种族、一种过去、一个祖国、一种传统的忠诚所确定,因而无法还原为一种行为、一种能力、一种功能——只应是他们的所是,因为他们所有实践的价值都等于其行为者的价值,是行为据以完成的本质的证明和延续。¹⁰ 文化贵族由爵位所确定,这些爵位²³使他们预先倾向于成为并使他们合法地成为他们的所是,使他们的行为变成先于并高于其表现的一种本质的表现,按照以存在等级为基础的柏拉图式区分功能的梦想,他们由一种本质的差别而与单纯的文化平民分开,这些文化平民注定要沦落到被加倍贬低

¹⁰ 对调查的最强烈抵制乃高学历的持有者所为,他们借此强调,他们从本质上是有教养的,人们不该询问他们的知识,而是应该询问他们的爱好(我们知道作家和艺术家如何自命不凡地回答“文学调查”的问题,文学调查是对他们的“创造者”和“发现者”“天才”的普遍性的致敬)。

的自修者和“代理人”的身份。¹¹ 贵族是本质主义者：他们将存在看作是本质的释放，因而不从行为本身如官僚报告书的勤务状况和犯罪记录所登记的事件或罪行来看待行为；只有当行为明显地表现在方式的细微差别上，当行为把自身据以完成的本质之永存和光大作为唯一原则时，他们才赋予行为以价值。这一本质主义使他们注定要将他们的本质强加给他们的东西强加给自身——“是贵族就要行为高尚”——，向自身要求别人不会向他们要求的东西，向自身证明他们符合他们自身，也就是他们的本质。¹² 我们明白学校分数和名次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但为了充分地理解这种作用，应该考虑所有贵族的另一种属性：贵族从中确认自身的本质不存在于任何定义中；这种本质摆脱了规则或规定的平庸的严格性，它本质上是自由。因此，对于学校教育贵族而言，与“有教养的人”的本质认同并接受这种本质中暗含的要求是唯一的和相同的一件事，被考察的学历越有权威性，这些要求就越高。

因此在这样一个事实中没有任何矛盾，这个事实是，学校教育
24 制度从目的和手段上定义了合法自修的做法，获得“普遍修养”要求这种做法，而且随着（在系、学科和专业等之间或水平之间的）教

¹¹ 只要认为爵位具有社会价值的信仰没有改变，这种本质主义就会暗中存在。当资本受到威胁时（比如在拥有爵位或学历的没落贵族身上），它必然要表现出来，至少以颠倒的种族主义形式。

¹² 这种作用是这样一种机制。在危机的状况下，这种机制使与旧体制联系最密切的最有特权的人，成为理解改变策略的必要性最慢的人，而且成为他们自身特权的受害者（比如不愿丧失贵族身份的破产贵族或宁愿单身也不降低条件结婚的农业大家庭的继承人，就属于这种情况）。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表明，某些农民或传统手工业者那里存在的“是贵族就要行为高尚”的道德观念，以不容忽视的方式加剧了这些阶级特有的自我剥削。

育等级逐渐升高,对这种做法的要求就越来越强烈。通过使用合法的自修这个本质上是矛盾的表达式,我们想要指出将学历持有者所看重的“自由文化”与自修者的不合法的自由文化分开的本质差别:《科学与生命》^①谈论的是遗传密码或乱伦禁忌,其读者只要到同好小圈子之外的领域冒险,就可能受到嘲笑,而列维-斯特劳斯或莫诺^②涉足音乐或哲学领域只会增加他们的威望。不合法的自由文化,要么涉及自修者积累的知识,要么涉及某种“经验”,这种经验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获得,不受专门被委任来反复灌输经验或正式认可经验之获得的制度的控制,比如烹饪技术或草药医术、手工业者的技艺或不可取代的替代性知识,但无论涉及哪一种,这种文化只有严格地与其技术效用相符才有价值,并且没有任何附加的社会价值,当这种文化脱离私人空间,与权威的技能进行竞争时,就有可能受到司法制裁(比如非法行医)。

因此,形式上保证一种特定能力的学历(比如工程师学历)在定义中暗中规定,学历实际上保证拥有一种“普遍修养”,学历越有权威性,修养就越深、越高;¹³反之,也规定,对于学历形式上和实际上所保证的东西,或者也可以说,对于学历保证它所保证的东西

① 欧洲最重要的科学动态杂志,1913年创刊,致力于以浅显明白的方式阐释科学技术,进行科学调查,鼓励真正的科学发现。——译者

② 莫诺(Jacques Monod, 1910-1976),法国生物学家、遗传学家,196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译者

¹³ 这种合法的或正在合法化的文化,乃是对合法的或正在合法化的作品的象征占有工具的实践的或熟练的掌握,正是这种文化描述了在一个特定时刻从古统治地位的定义来看的“有修养的人”特有的特征,问卷的宗旨就是衡量“有修养的人”。

的程度,人们无法要求任何保证。这种象征强制作用靠着文化资产阶级的文凭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法国重点大学颁发的文凭,在没有其他担保的情况下保证了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远远超出文凭被认为应该保证的东西,而且这是通过一则条文体现的,这则条文是心照不宣的,首先强加于文凭的持有人本身,他们因此被迫真正取得法定地分配给他们的属性。¹⁴

这种作用通过操纵愿望和要求——或者,也可以说通过操纵个人形象和自尊——在大学课程的所有阶段得以实现。学校教育
25 系统使学生趋向于有声望的位置或无价值的位置,以实行这种操纵,这些位置或包含着或排除了合法实践:英语作者所说的“分配”的作用,也就是分配一个专业、一门学科(哲学或地理学、数学或地质学这些处在极端位置的学科)、一所学校(或大或小的重点大学或学院)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被考察位置的社会形象和客观上被纳入这个形象之中的未来而得到发挥的,这个未来首先由某种文化积累活动和某种文化成就的形象构成。¹⁵ 教育分类产生的公开差别,倾向于产生(或加强)真正的差别,因为公开差别在被分类的个体身上产生得到共同承认和支持的对差别的信仰,并由此产生旨在使真实存在接近形式存在的行为。因此,像记私人日记或化浓

¹⁴ 在作为合法文化法定地分配给男人的所有领域(以及尤其是这种文化的最具男性特征的区域,比如历史或科学)尤其是政治中(尤其在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中),我们所看到的性别之间的差别大部分都可归因于法定指定的作用。

¹⁵ 在强大的教育资本在智力或科学竞争中提供的“好处”中,最明显的一个是高度的自尊和远大的抱负,这种自尊和抱负也可能表现在所接触问题的广泛性(比如更“有理论性的”问题)、采用风格的卓越性等之中。(cf. P. Bourdieu, *Le champ scientifiq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2-3, 1976, pp. 88-104)

妆、看戏或跳舞、写诗或玩橄榄球这些与制度的明白而明确的要求无关的活动,可能作为一种默认要求被纳入制度内部的指定位置,这种默认要求不断通过各种中介得到强调,而这些中介中教师的有意或无意的期待和同辈群体的共同压力并非微乎其微,这种压力本身的伦理方向,也是由被带入制度之中并由制度加强的等级价值所确定的。这种分配的作用和它所包含的法定指定的作用,无疑大大有助于学校教育制度推行文化实践,尽管学校教育制度并不灌输甚至不明确要求这些文化实践,但是它们构成了与学校教育制度分配的位置、授予的学历和这些学历导致的社会地位有关的法定特征。

毫无疑问,这种逻辑对下面这个事实并非无足轻重,即通过接触一种特定类型的作品,也就是学校教育标准认可的文学和哲学作品而获得的合法配置,扩展到了其他不那么合法的作品,比如先锋派文学,或不大被学校教育认可的领域,如电影:普遍化的倾向被纳入承认合法作品的配置之原则中,这种配置即承认合法作品的合法性并认为它们理当由于自身而受到崇敬的倾向和能力。这种能力与在合法作品中认出某种已知的东西的能力密不可分,已知的东西则是一种风格特征,它按照作品的独特性(“这是一幅伦勃朗的画”,甚至“这是《戴头盔的人》”)或作品属于某一类型(“这是一个印象派画家”)来描述作品的特征。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积累某些“无动机的”知识(如导演名字)的倾向和能力,与学校教育资本的联系比仅仅经常看电影更紧密和更全面,因为看电影的频率因收入、住所和年龄不同而有很大变化。

在给出的 20 部电影中,从看电影的数量来看,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看的少,同样,外省人(里尔人)比巴黎人,低收入的人比高收入的人,老年人比年轻人看的少。广告媒体研究中心的调查中显示了同样的关系:声称自己在调查前的那个星期中至少看过一次电影的那部分人的数量(这个指标比考察一年中通常看电影的次数问题更可靠,因为针对这个问题,多报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男人比女人多(7.8%对 5.3%),大巴黎(10.9%)比人口超过 10 万的城市(7.7%)或农村市镇(3.6%)多,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11.1%)比中等管理者(9.5%)、职员(9.7%)、技术工人和工长(7.3%)、普通工人(6.3%)、小企业主(5.2%)或农民(2.6%)多。但是在较年轻的人(前一个星期 21-24 岁的人中有 22.4%至少看过一次电影)与较年长的人(35-49 岁的人中只有 3.2%,50-64 岁的人中只有 1.7%,65 岁以上的人中只有 1.1%至少看过一次电影)之间,在学历较高的人与学历较低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有 18.2%,而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中有 9.5%,受过初等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有 2.2%至少看过一次电影)之间,差距尤其非常明显(cf. Centre d'étude des supports de publicité, *Etude sur l'audience du cinéma*, Paris, 1975, XVI, 100p. ; S. C. XIII bis)。¹⁶

对电影导演的了解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关联,比仅仅看电

¹⁶ 后面有一个罗马数字的首字母 S. C. 意指让读者参阅补充的统计资料名单(参见后面的附录 2)。

影与拥有文化资本之间的关联更密切:(在一个列有 20 部电影的名单中)有初等文凭的人中只有 5% 能够举出 4 个导演的名字,与有中等教育初级毕业证书或业士毕业证书的人中的 10%,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的 22% 相对,而且每个等级内部,至少看过 4 部所列电影的比例,分别是 22%,33% 和 40%。因此,尽管单纯的电影消费按照学校教育资本发生变化(但还是比参观博物馆或听音乐会变化小),但似乎消费的差别不足以充分解释对导演的了解的差别,后一种差别将持有不同学历的人分开,这种结论无疑对爵士乐、连环画、侦探小说或科幻小说也有效,只要这些体裁开始得到认可。¹⁷ 补充证据:尽管对演员的了解也随教育水平轻微上升(从学历最低的 13% 到受过中等教育的 18% 和学历最高的 23%),但这种了解尤其依照看电影的数量而变化,而且变化很大,对演员的了解,如同对电视男女主持人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事情的了解,意味着一种配置,这种配置更接近获得关于日常生活的物和人的普通知识所要求的配置而非合法的配置;实际上,经常看电影的学历最低的人知道的电影名字跟电影爱好者中学历

¹⁷ 在相同的层次上,对电影导演的了解在巴黎比在里尔更深,而且离学校教育程度最高和最合法的领域越远,巴黎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差距就越大。为了解释这一点,也许应该考虑,有修养的配置可能会在人们称为“文化氛围”的一切事物中,也就是在由一群地位相同的人实施的激励中,并不可避免地以一种或多或少及或多样或少样的文化供给中,得到不断强化。住所有助于确定这群人的社会构成和文化水平,进而决定他们的文化配置。

最高的人一样多。¹⁸相反,如果说在相同的教育水平上,对导演的了解随着看电影的数量增长,但在这个领域,经常看电影并不足以弥补学校教育资本的缺乏:在至少看过4部所列电影的人中,持有职业教育证书的人中有45.5%无法说出任何导演的名字,与持有中等教育初级证书或中学毕业证书的人中的27.5%,持有高等教育证书的人中的13%相对。

这样的能力并不一定是通过某些“影迷”或“爵士乐迷”(比如那些将电影片头字幕写在卡片上的人)投身其中的滑稽可笑的学校教育活动而获得的;¹⁹这种能力往往是无意图训练的产物,经由家庭或学校获得合法文化而获得的一种配置,使得这种无意图训练成为可能。这种可移植的配置配备着一整套可普遍应用的认知和评价模式,它是倾向于其他文化经验的东西并允许以其他方

¹⁸ 在至少看过4部所列电影的人中,只上过小学的人中有45%能够给出4个演员的名字,与上过中学的人中的35%,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的47%相对。办公室职员对演员最感兴趣:他们平均举出2.8个演员和一个导演,而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技术工人和工长平均只能举出0.8个演员和0.3个导演[秘书和中等商业管理者也知道很多演员(平均2.4个),但他们对导演更感兴趣(平均1.4个),社会医疗机构成员举出的导演(1.7个)甚至比演员(1.4个)还多]。阅读因发布明星生活消息而轰动的周刊是与关注演员的配置相似的配置的产物,这在女人那里比在男人那里更常见(在不到一星期之前阅读《今日巴黎》的女人有10.8%,男人有9.3%),在技术工人和工长(14.5%)、普通工人或职员(10.3%)那里比在中等管理者(8.6%)以及尤其是高级管理者或自由职业者(3.8%)那里更常见。(Centre d'étude des supports de publicité, *Onzième étude sur les lecteurs de la presse*, 1975, 1ère partie, p. 242.)

¹⁹ 尤其在拥有文化资本的小资产阶级中可遇到狂热的“影迷”,他们对导演和演员的了解超出了对相关电影的直接体验:31%的办公室职员能够说出他们没看过的电影的演员的名字,32%的社会医疗机构成员能够说出他们没机会看到的电影的导演的名字(而手工业者或小商人不属于这种情况,只有7%的技术工人或工长能够说出他们没看过的电影的演员的名字)。

式认识、划分和记录这些经验：一些人看到的不过是“伯特·兰开斯特^①演的西部片”，另一些人却“发现了崭露头角的某个约翰·斯特奇斯^②”或者“最后一个萨姆·佩金帕^③”，后者在他们所属的群体（通过“您看过……”或“应该看看这个……”这些要求遵守秩序的话）和这个群体委任的整个批评机构的帮助下，找到了什么是值得看的和看它的正确方式，从而产生了合法分类和一切名副其实的艺术鉴赏必然伴随的话语。

这些分析足以解释，学校教育制度不教授且从不明确要求的文化实践也相当紧密地随学历而变化（这显然意味着，在被考察的相互关系中，我暂不区分什么属于学校，什么属于其他社会化机构，尤其是家庭）。但如果不考虑另一种更隐蔽的作用，我们就无法全面解释学历何以作为进入合法文化空间的一种条件起作用，学校教育制度在这一点上加强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影响，它正是通过灌输的条件发挥这种隐蔽的作用。通过学历显示出来的，是某些存在条件，也就是构成学历还有审美配置之获得条件的存在条件，这是合法文化空间一向暗中规定的所有进入权中要求最严格的：若要预备论证，我们可以简要地提出，正是因为这些进入权要么与资产阶级出身相联系，要么与延长的学校教育训练所意味的几近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相联系，要么，最常见的情况是，与结合

① 伯特·兰开斯特(Burt Lancaster, 1913-1994), 美国电影演员, 他作为惊险动作演员成功地进入好莱坞, 但也擅长扮演诚挚而情绪敏感的角色。——译者

② 约翰·斯特奇斯(John Sturges, 1898-1959), 美国电影导演, 以 20 世纪 40 年代初的一系列讽刺喜剧片闻名。——译者

③ 萨姆·佩金帕(Sam Peckinpah, 1925-1984), 美国电影编剧和导演, 以场面壮观、动作激烈的西部片闻名。——译者

在一起的两个属性相联系，所以学历看起来像是运用审美配置的能力的一种保证。

29 审美配置

一切合法的作品事实上都倾向于推行自身的认识规则而且暗中将使用某种配置和某种能力的认识方式当成唯一合法的。承认这一点并不是将一种特定的认识方式变成本质，由此屈从于这种把对艺术合法性的认可合法化的幻想，而是考虑这个事实，即所有行动者，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无论他们是否有办法适应这些规则，他们在客观上都是受到这些规则限制的。这同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以确定这些配置和这些能力是天赋——如对与艺术作品的关系持超凡魅力观念的人所愿的那样，还是训练的产物，并有可能揭示一种奇特现象的隐蔽条件，这种现象是，与艺术作品或更普遍地与艰深文化作品神启般相遇的能力在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

对审美配置的一切本质分析，都注定要失败，这种分析在社会方面被认为是接触某些对象的唯一“合适”的方式，这些对象由社会指定为艺术作品，也就是说既要求又值得按照一种特有的审美意图被理解，这种审美意图能够识别这些对象并将它们指定为艺术作品：事实上，这种本质分析拒绝考虑这种历史产物的集体的和个体的生成(*genèse*)，而这种历史产物肯定是被教育无限再生产出来的，因此这种分析不能恢复这种历史产物唯一的存在理由，也就是构成制度的绝对必然性之基础的历史理由。如果艺术作品确如欧文·帕诺夫斯基看到的那样，是要求按照一种审美意图(要求

被审美地体验)被认识的东西,而且,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看,一切物品,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都可以按照一种审美意图被认识,那么如何避免这个结论:审美意图“造就”了艺术作品,或照搬索绪尔的一个说法,即审美观点创造了审美对象?为了摆脱这个恶性循环,帕诺夫斯基必须赋予艺术作品一种经院意义上的“意图”:纯粹“实践的”认识与这种客观意图相对立,就像一种审美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一个信号比如红灯的客观意图的实践否定,因为红灯要求一种“实践的”反应:踩刹车。鉴于被加工物被定义为是与自然物对立的,因此,在这个类别当中,艺术品的类别通过它要求按照一种特有的审美意图,也就是通过它的形式而不是它的功能被认识这个事实而被定义。但如何使这样一种定义可行?帕诺夫斯基本人也注意到,几乎不可能科学地确定一件被加工物何时变成一件艺术作品,也就是说形式何时战胜了功能:“当我给一位朋友写信请他吃晚餐时,我的信首先是一种交流工具;但我越把注意力放在我的字体形式上,这封信就越倾向于变成一件书法作品;我越关注我的语言形式,这封信就越倾向于变成一部文学或诗歌作品。”²⁰难道这就是说,技术产品的世界与审美产品的世界之间的分界线依靠这些产品的生产者的“意图”?事实上,这种“意图”本身也是社会规则和惯例的产物,社会规则和惯例致力于确定简单的技术产品与艺术品之间总是不确定的和在历史上多变的差别:“古典趣味,”帕诺夫斯基看到,“要求私人信件、官方演讲和英

30

²⁰ E. Panofsky,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5, p. 12.

雄的盾牌应该是艺术的……而现代趣味要求建筑和烟灰缸是功能的。”²¹但是,对作品的领会和评价既依靠欣赏者的意图——这种意图本身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支配与艺术作品之间关系的习惯性规则有关,又依靠欣赏者遵循这些规则的能力,进而依靠欣赏者的艺术训练。为了摆脱这种疑难,只要看到把艺术作品当成艺术作品的“纯粹”认识的理想是艺术特有的合法性原则的明确化和系统化的产物就够了,这些合法性原则与一个相对自主的艺术场同时形成。如今采取“纯粹”形式的审美认识方式,符合艺术生产方式的一种确定状态:一种艺术,比如整个后印象派绘画,是断定形式绝对高于功能、表现方式绝对高于表现对象的一种艺术意图的产物,这种艺术明确要求一种纯粹的审美配置,而之前的艺术只是有条件地要求这种配置;艺术家的创世抱负能够将以自身为目的的艺术探索的纯粹意图用于随便什么对象上,这种抱负要求审美家无限自由地运用能力,将特定的审美意图用在随便什么对象上,无论这对象是不是按照一种艺术意图生产的。

艺术博物馆作为这种要求的客观化,是制度化的审美配置:事实上没什么比作品的陈列更能表现和实现艺术活动相对于审美之外的利益和功能的自主化了,这些本来服从于完全不同甚至不可调和的功能的作品,如十字架和吉祥物、圣母哀悼耶稣画和静物画,都暗中要求关注形式而非功能,关注技艺而非主题,它们按照完全独有的但同样也是必然的风格被构造,它们实际上是对日常审美的任意规则所确定的一种现实主义表象之期待的质疑,因而

²¹ E. Panofsky, *ibid.*, p. 13.

自然而然地从风格的相对主义走向表现功能的中立化。此前被视为收藏家的珍品或历史文献和人种志文献的物品获得了艺术作品的地位,这就实现了审美目光的全部力量,与此同时,又使人很难忽视这一点:艺术静观如果不想冒这种风险,即成为这种绝对力量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并由此甚至是可疑的证明,它从此就应该包含可能损害对灵感闪现之幻想的博学成分,而这种闪现是纯粹愉快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纯粹趣味与“野蛮趣味”

总之,也许观赏者以前从未如此被要求,今后却被责令再生产艺术家(通过与整个知识场共谋)得以生产出这个新偶像的初始行为。²² 不过,观赏者也许从未得到这么多的回报:“炫耀性消费”的天真表现癖通过对一种奢华的难以克制的低级炫耀来追求与众不同,这种表现癖与纯粹目光独一无二的力量,即几近创造性的力量相比毫无价值。这种力量通过一种差别而不同寻常,这种差别是根本性的,因为它表面上存在于“个人”之中。只要读读奥尔特加-加塞特的作品就可以看到,关于天赋的超凡魅力观念在这种“本质上非大众的甚至是反大众的”艺术,以及这种艺术产生的“奇

²² 对“生成”的遗忘导致将“纯粹配置”变成“本性”,对于使特定的审美配置与一种“实践”配置相互对立的東西,以及对这种“纯粹”配置的集体生成和个体生成的更深入分析,参见 P. Bourdieu,《Disposition esthétique et compétence artistique》, *Les temps modernes*, 1971, 295, pp. 1345-1378 et P. Bourdieu,《L'invention de la vie d'artist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975, 2, pp. 67-93。关于幻象和产生幻象的共谋的分析,参见 P. Bourdieu, *La production et la croyanc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977, 13, pp. 3-43。

特的社会作用”中都得到了支持。在他看来,这种艺术是现代艺术,它通过将公众分为两个“敌对”“等级”,即“理解现代艺术的人与不理解现代艺术的人”而产生了这种奇特的结果。“这意味着”,奥尔特加说,“一些人拥有一种理解器官,同时另一些人被拒绝给予这种理解器官;而且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新艺术并不是为了所有人的,就像浪漫派艺术那样,而是留给少数特别有天赋的人的。”他将这种“特有的、精神高贵的、天性贵族的艺术”在“与艺术圣事不相称的”群众身上引起的愤怒归因于这种艺术引发的“屈辱”和“阴暗的卑微感”：“在一个半世纪里,‘人民’、群众自诩为整个社会。斯特拉文斯基^①的音乐或皮兰德娄^②的戏剧具有迫使他们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的社会学力量,他们是‘普通的人民’,社会结构的简单成分之一,历史进程的惰性材料,精神宇宙的次要因素。另一方面,年轻的艺术也促使‘最优秀的人’在多数人的单调乏味中互相认识和互相认可并了解自己的使命,即需要人数少并同多数人斗争。”²³为了证明少数幸福的人的自我合法的想象是有限度

① 斯特拉文斯基(Igor Fedorovitch Stravinsky, 1882-1971),俄国出生的作曲家,代表作有芭蕾舞剧《火鸟》(1910)和《春之祭》(1911-1913)、《管乐交响曲》(1920)、《三乐章交响曲》(1942-1945)、《安魂圣歌》(1966)等。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音乐概念,包括不断变化的节奏,不平衡的节拍、独特的配器法和极不和谐的和弦等。——译者

② 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 1867-1936),意大利戏剧家、小说家。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在《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1921)一剧中发明“戏中戏”,从而成为现代戏剧的重要革新者。——译者

²³ J. Ortega y Gasset, *La deshumanización del arte y otros ensayos de estética*, 11ème éd., Madrid, Revista de occidente, 1976(1ère éd. 1925), pp. 15-17.

的,只需举出苏珊·朗格^①最近发表的这篇文章即可。人们一致认为苏珊·朗格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从前大众无法接触艺术;音乐、绘画,甚至书籍,都是专门留给富人的快乐。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有可能的话,穷人、‘平常人’原本也可以享受这些。但是今天,每个人都能读书,参观博物馆,听高雅音乐,至少在收音机里,所以,大众对这些东西的判断变成了一种现实,但通过这种判断,变得非常明显的是,伟大的艺术并非一种直接的感官愉快。不然,它就会——像糕点或鸡尾酒一样——既取悦于没有受过教育的趣味也取悦于有教养的趣味。”²⁴

因此,不应该认为(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欲与众不同的有意识意图的)区分关系是审美配置的一种次要和辅助的成分。纯粹的目光意味着与对待世界的平常态度的决裂,这种决裂由此也是一种社会决裂。我们能够理解,奥尔特加-加塞特把现代艺术看作是对一切“人性的”东西的有系统拒绝,也即对平常人投入到他们的 33
 日常生活中的激情、感情、情感,以及能激发这些东西的所有主题和对象的有系统拒绝,尽管现代艺术不过是将自文艺复兴以来就被纳入艺术的一种意图推向极端的结果:“当人们最终对呈现给他们的人类命运感兴趣时,就喜欢一出戏”,而且“他们分担人类的

^① 苏珊·朗格(Suzanne Langer, 1895-1985),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语言分析和美学方面的著作颇丰,代表作有《哲学新解:理性、仪式和艺术的象征手法研究》(1942)、《感觉与形式》(1953)等。——译者

²⁴ Suzanne K. Langer, (On Significance in Music, in *Aesthetic and the Arts*, ed. par Lee A. Jacobus, Mc Graw-Hill Book Cy, New York, 1968, pp. 182-212, p. cit. 183. (我们可以辨认出——在对康德的一切有意识参照之外不断被再创造的——康德关于纯粹愉快与感官愉快之间的二律背反的主题,这种二律背反将会得到进一步分析。)

命运,好像这涉及的是真实的生活事件一样。”²⁵ 抛弃“人性”,显然就是抛弃一切总体的、也就是共同的、“容易的”和立刻可以理解的东西,首先是抛弃一切把审美本能还原为纯粹的兽性、感官愉快或肉欲的东西;这就是以漠然和距离反对对表现内容本身的关注,这种关注导致把美好事物的表象尤其是直接诉诸感官和感觉的美好事物的表象,说成是美好的,而漠然和距离则禁止关于表象的判断从属于被表现对象的性质。²⁶ 我们看到,描述“纯粹的”目光并不容易,如果不同时描述天真的观点的话,“纯粹的”目光通过与天真的目光对立而确定自身,反之亦然;不存在对这些对立观念的一方或另一方的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纯粹的”描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赞同一种审美上的相对主义,只要这样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大众美学”是相对于学院美学而确定自己的,而且对合法艺术与合法艺术对“民众”趣味的否定判断之参照,不断地困扰着民众对美的体验)。拒绝还是剥夺? 认为民众阶级客观的审美立场具有一种系统美学之连贯性的诱惑,跟不知不觉中接受对民众观念的完全否定的表象之倾向一样危险,而这种否定的表象是整个学院美学的基础。

²⁵ J. Ortega y Gasset, *op. cit.*, pp. 18-19.

²⁶ “有教养的”观众意欲与众不同的想法与(随着生产场逐渐赢得自主越来越强烈地)激励艺术家的想法不谋而合,艺术家意欲宣告他相对于外部要求(其最明显的形式是订购)的自主性并重视他可完全支配的形式胜过功能,这就导致艺术家通过把为艺术而艺术当作为艺术家而艺术,趋向一种纯粹形式的艺术。

大众“美学”

一切看来好像“大众美学”是以对艺术和生活的连续性的肯定为依据的,这种肯定意味着形式服从于功能,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大众美学”是以对作为学院美学根源的拒绝之拒绝为依据的,也就是以普通配置与特定的审美配置之间的明显决裂为依据的。民众阶级和在文化资本方面不那么富有的中产阶级各阶层对一切种类的形式探索的敌意,既表现在戏剧方面,也表现在绘画方面,或者更明显地表现在摄影或电影方面,因为它们的合法性更小一些。就像在电影方面和在戏剧方面,民众阶级的观众对合乎逻辑并按照时间顺序朝着一个愉快结局发展的情节津津乐道,而且他们在简单勾画的场景和人物中,比在模糊的和象征的形象和行动中,或按照《戏剧及其重影》(*Le théâtre et son double*)^①的说法,在谜一般的戏剧问题中,更不用说在贝克特的悲惨“角色”的非存在的存在和品特^②的特别平庸或不动声色的荒谬对话中,“感觉”都更好。沉默或拒绝的根源不仅在于熟悉气氛的缺乏,而

① 法国诗人、剧作家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的一部随笔集,1938年出版。他抨击戏剧传统手法和语言,主张以观众的感性经验的活力对抗戏剧做作的文学形式,以表达方式的急迫对抗对观众的逢迎。这部文集中最重要的有两篇,一篇是“不再有杰作”,在其中他攻击了一种无意义的和过时的戏剧文学标准,另一篇是“残酷戏剧”,在其中他提出了一种介于动作和思想之间的独特戏剧语言。他的戏剧思想对热内、尤奈斯库、贝克特等荒诞派戏剧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译者

② 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英国剧作家,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复杂和最有挑战性的剧作家。代表作有《归家》(1965)、《虚无乡》(1975)、《背叛》(1978)等。在他的剧本中,对话具有重要作用,人物的语言由不连贯的、奇特、互相矛盾的对话组成,而且常常被沉默打断。——译者

且在于对参与的深刻期待，而形式探索却完全辜负了这种期待，尤其是，当戏剧虚构拒绝利用幻想艺术的“庸俗”诱惑时，戏剧虚构就暴露了自身，如同在所有戏中戏的形式中那样。皮兰德娄在他的剧作《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像这样（或像那样）》、《今晚我们即兴演出》中提供了这种戏剧虚构的范式，它们上演了一种不可能表演的表演，热内^①在《黑人》的序言中给出了这种戏剧虚构的样式：“我们将以你们学会的彬彬有礼让交流变得不可能。将我们分开的最初距离，我们将通过我们的排场、我们的举止、我们的傲慢予以扩大，因为我们也是演员。”这种希望通过与人物同欢乐共痛苦、关注他们的命运、赞同他们的希望和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美好动机、体验他们的生活来进入游戏的愿望，依赖于一种投入形式，即善良观众的一种“天真”、坦率、轻信的决心（“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娱乐”），而形式探索和艺术特有的效果只有让人忘掉且没有妨碍对作品的实质本身的认识时，观众才倾向于接受它们。

文化分裂使每类作品与自己的公众联系在一起，这种分裂使得从民众阶级成员中获得对现代艺术探索的真正可感的判断并不容易。无论如何，将某些艰深的场景或某些文化体验——比如博堡^②或文化馆——移到了家中的电视里，在一段时间内，让大众面

① 热内(Jean Genet, 1910-1986), 法国小说家、戏剧家, 先锋派戏剧, 尤其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玫瑰奇迹》(1945-1946)、《小偷日记》(1930-1939)、《鲜花圣母》(1944), 剧本《女仆》(1947)、《阳台》(1956)等。——译者

② 即蓬皮杜中心, 法国国家文化中心, 20世纪视觉艺术中心和博物馆, 1977年建立, 位于博堡大街和沼泽区的边缘。——译者

对学院的,有时是前卫的作品的电视,创造了一些真正的实验情形,这些情形与在民众中展开的一切关于合法文化的调查所产生的情形一样做作或不真实,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因此我们看到面对某些陈列物——我想起了博堡开放不久展出的本^①的煤堆——的不安,这种不安可能发展为一种掺杂着反抗的恐惧——这些陈列物的戏仿意图似乎是一种挑衅,一种对良知和有良知的人的挑战,而这种意图完全是根据对一个场和这个场的相对自主的历史的参照来确定的。同样,当形式探索渗透到大众阶级观众熟悉的场景中时——比如具有阿韦蒂^②式特殊效果的电视综艺节目就是这种状况——,这些观众就会奋起反抗,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感受不到这些纯粹游戏的必要性,还因为他们有时这样理解,即这些游戏从某个生产场得到它们的逻辑必要性,而这个生产场正是通过这些游戏本身排斥了他们:“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些切割的玩艺儿,我看见脑袋,看见鼻子,看见大腿……我看见一个高个子的歌手,三米高,而且还有两米宽的胳膊,您觉得有趣吗?啊,我不喜欢,这真蠢,我看不出让东西变形有什么好处。”(女面包师,格勒诺布尔)

① 本(Ben,1935-),原名本雅明·沃蒂埃(Benjamin Vautier),出生于意大利的瑞士裔法国艺术家。他主张回到自由自在的绘画,提倡艺术的“自由形象化”,鼓励画家利用不合规则的材料和不和谐的颜色,他最有名的作品是《艺术无用,回家吧》。——译者

② 阿韦蒂(Jean-Christophe Averty,1928-),法国电台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他性格强硬、喜欢挑衅,具有电视视觉革新意识。他的综艺节目《酸葡萄》(1963)引起了很大丑闻,因为他坚持在每次节目中都让人把一个玩具娃娃绞碎。——译者

形式探索在文学或戏剧中导向了晦涩,这种探索在大众看来,是某种东西的标志,这种东西有时被看作是与外行保持距离的愿望,或如一个被调查者谈到某些电视文化节目所说的,是一种“凌驾于公众之上”对其他内行讲话的愿望。²⁷ 这种形式探索构成了合法文化神圣的、被分隔的和能分隔的特点,即大博物馆冰冷的庄重、歌剧院和大剧院庄严的奢华、音乐会的布景和礼仪等借以显示的机制。²⁸ 一切看起来就好像是,民众模糊地领会到无论在生活还是在艺术中,设置形式、讲究礼节这种做法中所包含的,是对表现内容,即在民众语言的表现性中大量存在的表现内容的禁止。与此同时,也是一切形式探索的有意漠然所固有的一种疏远,以及是

²⁷ 各种不同的调查证实了这种对一切种类的纯粹探索的敌意。一项研究记录了电视观众对《波斯人》的困惑,《波斯人》是由于缺乏对话和明显的情节而很难理解的风格化的戏剧(*Les Têlespectateurs en 1967*, Rapport des études de marche de l'ORTF, I, pp. 69sq.). 另外一项研究把人们对古典风格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盛会”和不那么传统的“快板”的反应进行对比,表明民众阶级观众把拍摄方面的探索和布景的风格化当成一种现实的贫乏,并且常常把过度曝光的拍摄视为技术欠缺;相反,他们赞成他们称之为“气氛”的东西,也就是在观众与艺术家之间建立的关系的某种性质,并且将没有主持人看作是“热情”的缺失,因而感到惋惜(*ibid.*, p. 78).

* 《波斯人》是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现存最古老的希腊悲剧,为纪念希腊军队在萨拉米斯湾大败波斯军队而作。此剧以抒情的哀歌和史诗的叙述闻名,戏剧感情不是通过高潮设置而是通过一种持续的期待和紧张气氛来实现。1961年,法国电视导演让·普拉(1927-1991)把它改编为电视剧,把合唱队奉为角色,制作相同的面具,面具不是像古希腊戏剧中那样为了扩张演员的面孔和夸大面部表情,而是赋予人物一种统一性,一种仪式的和非真实的特征。——译者

²⁸ 大商店是穷人的画廊,这不仅是因为大商店提供了属于日常世界的物品,这些物品的用途尽人皆知,它们能够融入日常生活场景,人们能够用日常用语(热或冷、简单或繁琐、花哨或朴素、富裕或贫困等)称呼和判断它们,而且尤其是因为人们在其中不会感到自己被超验的规则所评判,也就是被那认为是高等阶级的处世法则所评判,而是自以为有权以趣味和颜色的合法随意性的名义自由地判断。

暗藏于交流中心的对交流的拒绝,这种拒绝交流既存在于艺术之中——这种艺术回避和拒绝它似乎要传达的东西——也存在于资产阶级礼仪中,而资产阶级礼仪完美的形式主义是对不拘礼节的倾向的一种永久防备。相反,大众表演导致观众个人参加演出与集体加入节日密不可分,表演乘节日之机举行:其实,如果说(由某些体育活动,如摔跤或次一级的拳击,以及电视转播的所有集体游戏所再现的)马戏或轻松喜剧比舞蹈或戏剧更加“通俗”,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不那么形式化(如同杂技与舞蹈之间的比较所表明的),不那么委婉化,从而提供了更直接、更即时的满足。这也是因为,民众表演通过它们激起的集体表现和它们提供的奢华场面之展示(我们想到了杂耍歌舞剧场、轻歌剧或场面豪华的电影),布景的华美、服装的艳丽、音乐的活泼、情节的生动、演员的热情,从而像所有形式的喜剧,尤其是那些通过戏仿或讽刺“大人物”取得效果的喜剧(长于模仿的杂耍歌舞艺人、自编自唱的艺人等)那样,满足了人们对节日、心直口快和直率的打趣的爱好和欲求,因为节日、心直口快和直率的打趣通过颠倒社会世界并颠覆习俗和礼节解放人们。

审美的间离效果

常人与审美家所说的疏离是对立的。如人们所见,在审美家将大众趣味的对象之一如西部片或连环画据为己有的所有状况下,审美家通过把“内容”、人物、波折之关注转移到形式上,转移到艺术特有的效果——而人们只有在相互关系中通过与其他作品进行比较才能评判这种特有的艺术效果,引进了相对于“初级”认识

的一种距离、一种间隔——疏远的区分之标准，而这种比较把沉浸在直接呈现的作品中的独特性完全排除在外。审美理论不断重复说，疏离、无关利害、漠然是承认艺术作品之为艺术作品即艺术作品是自主的、独立的唯一方法，以至人们最终忘记了它们究其实意味着不投入、疏离、冷漠，也就是拒绝投入和拒绝认真。《论戏剧的书信》^①的幻灭的读者，很久以来就明白，没什么比在精神事物中投入过多的激情或从中期待过多的严肃性更天真和更庸俗的了，他们习惯于心照不宣地将精神自由与道德完美或政治稳定对立起来。当弗吉尼亚·伍尔夫批判 H. G. 威尔斯^②、约翰·高尔斯华绥^③和阿

① 法国哲学家卢梭写给达朗贝尔的书信，全名为《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书信》(1758)。卢梭在信中完全否定科学艺术的教育作用，认为戏剧对道德风俗无益：悲剧刺激人们的感情，喜剧培养嘲讽的情绪，他主张以健康有益的娱乐如节日庆祝活动或乡村舞会等代替演戏，这个观点与伏尔泰、狄德罗提倡的戏剧教益作用的观点完全对立。——译者

② 加拉*在《回忆叙亚尔*先生》(*Mémoire sur M. Suard*)中，对我们说，让·雅克·卢梭的《论文学和艺术的重建》(*Discours sur le rétablissement des lettres et des arts*)在一群习惯于什么都不严肃对待的公众中引起了“一种恐慌”。

* 加拉(Dominique Joseph Garat, 1749-1833)，法国律师、记者、哲学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译者

** 叙亚尔(Jean Baptiste Antoine Suard, 1733-1817)，法国文人、记者、文学批评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译者

② H. G.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英国小说家、记者、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代表作有科幻小说《时间机器》(1895)、《星际战争》(1898)、科幻小说《波里先生的历史》(1901)、《托诺-邦盖》(1909)等。他给英国小说带来活力，预见了20世纪技术世界的危险与希望。——译者

③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英国小说家、戏剧家。193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系列长篇小说《福尔赛世家》(1906-1929)，剧本《银匣》(1906)、《斗争》(1909)、《忠诚》(1922)等。——译者

诺德·班奈特^①的小说时,我们无从反对她,因为“这些小说留下了一种奇怪的空虚感和不满足感”,而且它们给人的感觉是必须“做点什么,加入一个团体,或更绝望的是,签一张支票”,它们与《项狄传》^②或《傲慢与偏见》这类作品不同,后者是完全自足的,“根本不引起做点什么的欲望,当然除了重读这本书,更深入地理解它之外。”³⁰

但是,拒绝任何一种参与,拒绝天真的赞同,拒绝“庸俗地”放任于浮浅的诱惑和集体冲动,至少间接地是形式探索和无对象表象的根源,而这种拒绝也许最清晰地表现在对绘画的反应中。因

① 阿诺德·班奈特(Arnold Bennett, 1867-1931),英国作家。他创作了一系列以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善于描写平凡的生活琐事,带有自然主义倾向,他在20世纪初期的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中与高尔斯华绥、威尔斯齐名。代表作有《老妇人的故事》(1908)、《克莱汉格》三部曲(1910, 1911, 1915)等。——译者

② 英国小说家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的小说,共九卷,写于1759-1767年。全书无情节,充满了插话、插曲、考证、论辩,颠倒时序。作品的基调是幽默、感伤、暗示、善意的戏谑。斯特恩为英国文学带来了创新意识,即人物的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印象和感情,预示了20世纪“意识流小说”的手法。——译者

30 V. Woolf, 《Mr Bennet and Mrs Brown》, in M. Schorer, J. Miles and G. McKenzie (eds.), *Criticism: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Literary Judgment*, rev.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48, p. 70.

* 1924年5月18日,伍尔夫在剑桥大学做了题为《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的演讲,指出威尔斯、班奈特和高尔斯华绥的小说从不关注人物性格本身或作品本身,而斯特恩和奥斯汀关注事物本身、人物本身、作品本身。她借此批判陈旧过时的文学规范,为新的小说形式辩护。——译者

此,我们看到,随着教育水平的增长,³¹两部分人的数目都在增长:当被问到是否能用一些对象拍出一张漂亮照片时,一部分人把那些大众赞赏的对象,如第一次领圣体、海上落日或景物,当成“庸俗”和“丑陋”的东西加以拒绝,或当成不重要、无意义、有点“可笑”或用奥尔特加·加塞特的话说天真地“表现人性”的东西予以抛弃;另一部分人则承认表象相对于被表现物的自主性,认为人们能用在社会方面被认定不重要的物品,比如金属架、树皮,尤其是白菜这种极其微不足道的东西,也能用社会认为丑陋或令人厌恶的东西,比如车祸、被选来暗示伦勃朗的肉案或指涉布瓦洛³²的蛇,还能用在社会方面被认定不得体的事物,如孕妇,拍出一张漂亮的照片,更不用说绘出一幅漂亮的画了(参见表2和表3)。

³¹ 指出随便什么物品都有可能被摄影这一最容易掌握的艺术生产工具所实行的艺术推动行为所改变的能力,完全按照与对导演的了解相同的方式发生变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涉及到一种适合某种能力的、相对具有学校教育性质的标准,这种能力比在音乐或绘画方面表现的偏好所意味的能力更远离学校教育制度。

① 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 1636-1711),法国诗人、作家和批评家,被誉为“帕纳斯山的立法者”,主要作品有《讽刺诗》(1660-1668)、《书简诗》(1669-1695)、《诗的艺术》(1674)等。《诗的艺术》是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经典,总结了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经验,概括了古典主义的基本理论,把文学体裁分为不同等级,为每种体裁明确指定了规则并提供了样板。这部著作用亚历山大诗体写成,分为四章。第一章为总论,第二章论次要的诗类:牧歌、悲歌、颂歌、十四行诗等,第三章论主要的诗体:悲剧、史诗、喜剧,第四章是关于道德修养的说教。在第三章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绝对没有一条蛇或一个狰狞怪物/经艺术模拟出来而不让人悦目;/一枝精细的画笔引人入胜的妙计/能将最惨的对象变成有趣的东西。”以此说明模仿的艺术重在手段的高明,对象的美丑无关紧要。——译者

表 2 按照学校教育资本划分的审美配置

	第一次领圣体						民间舞蹈					
	不回答 或 无条理	丑陋	无意义	有趣	漂亮	总数	不回答 或 无条理	丑陋	无意义	有趣	漂亮	总数
无文凭,职业教育 证书 n=314	2	5	19	23	51	100	1	0.5	3	41	54.5	100
专业技能证书 n=97	4	1	26	38	31	100	4		3	33	60	100
中等教育初级阶 段毕业证书 n= 197	2.5	7	27	31	32.5	100	3.5		7	33.5	56	100
中学毕业证书 n=217	2	12	43	24	19	100	2	0.5	13	47.5	37	100
高等教育初级 n=118	4	13	45	23	15	100	6	2.5	13	37	41.5	100
学士 n=182	1	11	53	28	7	100	2	1	11	49.5	36.5	100
学衔,重点大学 n=71	4	15.5	49	6	25.5	100	4	6	22.5	28	39.5	100

续表

	树皮						肉案						白菜					
	不回答 或 无条理	丑陋	无意义	有趣	漂亮	总数	不回答 或 无条理	丑陋	无意义	有趣	漂亮	总数	不回答 或 无条理	丑陋	无意义	有趣	漂亮	总数
无文凭,职业教育 证书 n=314	2	14.5	46.5	21.5	15.5	100	1.5	31	46	16.5	5	100	2	28	56	10	4	100
专业技能证书 n=97	5	1	20	37	37	100	6	15.5	48.5	24	6	100	5	16.5	63	7	8.5	100
中等教育初级阶 段毕业证书 n= 197	2.5	8.5	31.5	30	27.5	100	3	28	47	17	5	100	2	17	55	13	13	100
中学毕业证书 n=217	2	3	21	32	42	100	3	29.5	32	25	10.5	100	2	17.5	48.5	19	13	100
高等教育初级 n=18	6	1	23	25	45	100	4	30.5	29	18.5	18	100	6	9	47.5	19.5	18	100
学士 n=182		3	18	23	56	100	4.5	29.5	22.5	24	19.5	100	2	16	51.5	8	22.5	100
学衔,重点大学 n=71	4	3	8.5	24	60.5	100	4	23.5	23	18	25.5	100	3	11	38	21	27	100

被调查者要回答下面的问题:“用下面的主题,摄影师有可能拍出一张漂亮的、有趣的、有意义的照片,还是更有可能拍出一张丑陋的照片:一片风景,一次车祸,一个与猫嬉戏的小女孩,一个孕妇,一幅静物,一个哺乳妇女,一座金属架,流浪汉的一次吵架,一堆白菜,一轮海上落日,一个干活的织布工人,一段民间舞蹈,一条绳子,一个肉案,一块树皮,一处名胜古迹,一个废铁处理场,第一次领圣体,一个受伤的男人,一条蛇,一幅名画?”

表3 按照所属阶级和文凭划分的审美配置

39

		孕妇					
		不回答 或 无条理	丑陋	无意义	有趣	漂亮	总数
民众 阶级	• 无文凭, 职业教育证书, 专业技能证书(n=143)	1.5	40	36.5	14	8	100
	•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以上(n=18)		39	22	11	28	100
中产 阶级	• 无文凭, 职业教育证书, 专业技能证书(n=243)	1	46	27.5	15	10.5	100
	•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以上(n=335)其中:	3.5	34	30	13.5	19	100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n=149)	3.5	39	35	9	13.5	100
	—中学毕业证书(n=140)	3.5	37	21	17.5	21	100
	—高等教育(n=46)	4	8.5	42	13	32.5	100
高等 阶级	• 无文凭, 职业教育证书, 专业技能证书(n=25)	20	36	24	12	8	100
	•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以上(n=432)其中:	3	36	22	19	20	100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n=31)	6.5	48.5	38.5	-	6.5	100
	—中学毕业证书(n=76)	-	60.5	16	5	18.5	100
	—高等教育(n=325)其中:	3	30	22.5	23	21.5	100
	普通大学学士(n=80)	7.5	17.5	30.0	32.5	12.5	100
	普通大学学士(n=174)	0.5	36	21.5	19.5	22.5	100
	学衔, 重点大学(n=71)	4	29.5	17	20	29.5	100

续表

		白菜					
		不回答 或 无条理	丑陋	无意义	有趣	漂亮	总数
民众 阶级	• 无文凭, 职业教育证书, 专业技能证书(n=143)	1.5	28	57	8.5	5	100
	•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以上(n=18)	-	5.5	72.5	16.5	5.5	100
中产 阶级	• 无文凭, 职业教育证书, 专业技能证书(n=243)	2	22.5	61.5	10	4	100
	•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以上(n=335)其中:	2.5	17.5	49.5	14.5	16	100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n=149)	2	21	56	8.5	12.5	100
	中学毕业证书(n=140)	3	15.5	45	19.5	17	100
	高等教育(n=46)	4	13	41	20	22	100
高等 阶级	• 无文凭, 职业教育证书, 专业技能证书(n=25)	20	36	28	12	4	100
	•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以上(n=432)其中:	3	14.5	48	15.5	19	100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n=31)	6.5	6.5	38.5	32.5	16	100
	• 中学毕业证书(n=76)	-	21	55.5	17	6.5	100
	高等教育(n=325)其中:	3	14	47.5	13.5	22	100
	普通大学学士(n=80)	6.5	6.5	52	20	15	100
	普通大学学士(n=174)	2	18.5	49	7.5	23	100
	学衔, 重点大学(n=71)	3	11	38	21	27	100

续表

		蛇					总数
		不回答 或 无条理	丑陋	无意义	有趣	漂亮	
民众 阶级	• 无文凭, 职业教育证书, 专业技能证书(n=143)	1	35	16	38	10	100
	•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以上(n=18)	—	28	22	39	11	100
中产 阶级	• 无文凭, 职业教育证书, 专业技能证书(n=243)	1	25	23	35	16	100
	•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以上(n=335)其中:	3	28.5	14	30.5	24	100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n=149)	3	38	8.5	34	16.5	100
	—中学毕业证书(n=140)	4	21	17	34	24	100
	—高等教育(n=46)	2	19.5	24	9	45.5	100
高等 阶级	• 无文凭, 职业教育证书, 专业技能证书(n=25)	20	36	4	24	16	100
	•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以上(n=432)其中:	3	18	13	38	28	100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n=31)	6.5	19.5	16	29	29	100
	—中学毕业证书(n=76)	—	22.5	8	50	19.5	100
	—高等教育(n=325)其中:	4	16.5	14.5	35.5	29.5	100
	—普通大学学士(n=80)	5	14	20	36	25	100
	—普通大学学士(n=174)	2.5	20	14.5	35	28	100
	—学衔, 重点大学(n=71)	5.5	11.5	8.5	36.5	38	100

续表

		海上落日					总数
		不回答 或 无条理	丑陋	无意义	有趣	漂亮	
民众 阶级	• 无文凭, 职业教育证书, 专业技能证书(n=143)	1		1	10	88	100
	•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以上(n=18)			6	6	88	100
中产 阶级	• 无文凭, 职业教育证书, 专业技能证书(n=243)	1	0.5	2.5	6	90	100
	•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以上(n=335)其中:	3	1.5	9	8.5	78	100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n=149)	1.5	1.5	4.5	6.5	86	100
	—中学毕业证书(n=140)	4	2	10	9	75	100
	—高等教育(n=46)	2	2	20	13	63	100
高等 阶级	• 无文凭, 职业教育证书, 专业技能证书(n=25)	20		8	8	64	100
	•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以上(n=432)其中:	2		15	17	63	100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n=31)			22.5		77.5	100
	—中学毕业证书(n=76)			14.5	8	77.5	100
	—高等教育(n=325)其中:	3	4	14	21	58	100
	普通大学学士(n=80)	6	5	10	26.5	52.5	100
	普通大学学士(n=174)		5	13	24	58	100
	学衔, 重点大学(n=71)	5.5	1.5	19.5	8.5	65	100

我们立刻看到,(为形式比较的需要而建立的)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及以下的文凭等级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中丝毫不具有相同内涵。在高等文凭等级中的那部分人随着社会等级的上升而增加(这就基本说明了最罕见的选择——在白菜或蛇的情形中为“漂亮”,在落日的情形中为“丑陋”或“无意义”——随着阶级的上升而增加,在孕妇情形中表面上的例外源自妇女的缺乏,我们知道她们在这个等级中更认可这个对象)。

由于无法建立一种真正的实验机制,我们就收集了被调查者对他们认为“可拍照的”并因而在他们看来能够被审美地构造的东西(这些东西与由于无意义、丑陋或伦理原因而被排除的东西对立)发表的声明。因此运用一种审美配置的能力由被考察的个人或群体审美地构造的东西与艺术合法性的把持者在生产场的一个确定状况下审美地构造的东西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在一个其发展法则是区分的辩证法的生产场中,也是一种时间间隔,一种延迟)来衡量。

被调查者要回答下面的问题:“用下面的主题,如一片风景、一次车祸等,摄影师有可能拍出一张漂亮的、有趣的、有意义的照片,还是更有可能拍出一张丑陋的照片?”在预调查中,我们曾经让被调查者评判关于若干对象的、多数是有名的照片,这些对象如鹅卵石、孕妇等,在严格意义上的调查中仅仅被提到,被记录下来的在单纯的形象设想面前的反应表现得与实际形象引起的反应是完全一致的(这就证明了形象被赋予的价值倾向于符合实物被赋予的价值)。我们之所以借助于摄影,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绘画可能产生的强制合法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摄影技术被认为更容易掌握,所形成的评判不真实的可能性会小些。

尽管我们所做的测验更适于收集人们关于艺术意图的声明,而不是衡量在绘画、摄影甚或艺术作品的认识中应用这种意图的能力,但它使我们有可能确定若干因素,这些因素决定

了采取被社会认定为特定的审美态度的能力。³² 统计学除了确定文化资本和审美配置(或至少,还有实行这种随意的和像那样被忽视的的分类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加工物的空间内区分了被社会认定为可要求并值得按照审美配置去接触的对象,这种配置能够认出这些事物并且将它们构造成艺术作品)的否定标志(对“愚蠢可笑”的拒绝)与肯定标志(提升无意义的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还确定了这一点,即具备审美抱负的摄影所青睐的对象,如民间舞蹈或织布工人或小女孩和她的猫,占据了一个中间位置:那些认为能够用它们拍出一张漂亮照片的人在持有专业技能证书和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的人中最多,而高级层次上的人倾向于认为它们有趣或无意义。³³

统计学还显示,女人比男人更经常地对讨厌的、可怕的或不大体面的东西表示厌恶:她们中的 44.5%,男人中的 35%,认为人们以一个受伤的男人为题只能拍出一张丑陋的照片。
41 我们看到两者对肉案(33.5%对 27%)、蛇(30.5%对 21.5%)

³² 要素分析仅用于对可拍摄物的判断上,这种分析在每个阶级内部使得文化资本最富有而经济资本最不富有的阶层与经济资本最富有而文化资本最不富有的阶层互相对立。这就是说,在统治阶级中,大学教授和艺术生产者(以及,次之,中学教师和自由职业者)与商业经理和工业家对立,私营部门的管理者和工程师占据一个中间位置;而且,在小资产阶级中,文化中间人与跟他们最接近的阶层如小学教师、医疗机构人员、手艺人截然分开,与小商人或手工业者和办公室职员对立。

³³ 声称第一次领圣体可以拍出一张漂亮照片的那部分人,从无文凭到学士学位的层次一直在递减,但在更高学历层次上又重新上升,这是因为最稀有学位的持有者中相当多的人通过宣称一切事物都可成为艺术认识的对象而确认他们的美学配置;因此,在统治阶级中,判定落日能拍出漂亮照片的人数,在学校教育程度低的层次上最多,往中间层次(高等教育初级或大专)则下降了,但到了受过长期高等教育并倾向于认为一切对象都能为一张漂亮照片提供素材的人那里,又再度大量增加。

或孕妇(45%对33.5%)的态度具有同样的差别,而在对静物(6%对6.5%)或白菜(20.5%对19%)的态度方面,差别消失了。性别之间传统的劳动分工分配给妇女“仁慈的”或“人道的”使命和情感,使得她们更有理由以理性与感性对立的名义流露感情或流眼泪,她们感觉自己不像男人那样严格地受制于运用审美配置所要求的对“自然”情感的禁止和压抑,而男人则按职能(ex officio)处于文化一方(妇女像民众一样被置于自然一方)(这就顺便说明,如同我们将要进一步指出的那样,对自然的拒绝甚或对沉溺于自然的拒绝,是统治者的标志——懂得自制——是审美态度的根源)。³⁴

因此,没什么比某种配置、某种才能,以及更罕见地,某种能力,能更严格地区分不同的阶级了,这种配置是合法消费合法作品客观地要求的,这种才能是对某些对象采取一种特有的美学观点的才能,这些对象已经被审美地构造了——因而被指定要受到那些已经学会辨认可赞赏的东西的符号的人的赞赏,这种能力指的是将随便什么东西,甚或(由于无论是不是审美地被“庸人”占有而)“庸俗的”东西构造成审美的并在日常生活的最平常选择中如

³⁴ 妇女们对性别之间劳动分工的传统模式服从得越彻底,换句话说,她们的文化资本越少,她们在社会等级中所处的地位越低,她们表现的厌恶就越明显,甚至不顾审美的中立性。总的来说,新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这个阶级的男人更顺从于情感因素(而说白菜能拍出一张漂亮照片的女人跟男人比例相同),她们认为一张孕妇的照片几乎不会比任何其他种类的妇女照片更丑陋(在这个阶层中有31.5%的妇女,与工业家和大商人阶层中70%的妇女,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中69.5%的妇女,工人、职员或中等管理者阶层中47.5%的妇女相对)。由此可见,她们同时显示了她们的审美抱负和她们意欲“摆脱”强加给她们这个性别的伦理禁忌的愿望。

42 在烹饪、服装或装饰方面使用一种“纯粹”审美的原则的能力。但若说统计学调查对于以不可置辩的方式建立(应该更全面地阐明的)纯粹配置的社会可能性条件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调查却不可避免地采取一种学校教育测试的模样,这种测试力求以一种被默认为绝对的标准来衡量被提问者,因此这种调查有可能忽略这种配置和在这种配置中表现的对于世界的总体态度对不同社会阶级体现的意义。测试的逻辑致使人们把某种东西描述为一种无能(从确定对艺术作品的合法认识的标准观点来看正是如此),但这种无能也是一种拒绝,这种拒绝在对风格操练和纯粹形式探索的随意的或炫耀的无动机之揭露中找到了其根源。其实,工人们就是以一种“美学”的名义,几乎总是把为摄影而摄影的行为(比如单纯拍摄鹅卵石)当成无用的、反常的或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拒绝:“这是糟蹋胶卷”,“要浪费得起胶卷才行”,“我敢肯定,有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的人”,“没别的事儿干才拍这些东西”,“这是有产者的照片”,因为这种“美学”想要摄影在被拍摄物或拍摄图像的可能用途中找到其合法理由。³⁵

³⁵ 不要忘记,大众“美学”是一种被迫不断地参照占统治地位的美学而确定自身的被统治的“美学”。民众阶级的成员(尤其是妇女)无法忽略否认其“美学”的学院美学,也无法放弃他们受到社会影响的倾向,更无法宣告他们的倾向并使之合法化,他们往往在分裂中体会他们与美学规则的关系。某些工人对“纯粹的”摄影予以一种纯粹口头上的认可(这也是许多小资者甚至大量资产者的态度,比如在绘画方面,他们尤其与民众阶级区分开来,因为他们知道该做或该说什么甚或不该说什么):“这很美,但我不想买”,“是的,这很美,应该喜欢它,可这不符合我的口味”,这时,这种分裂就表现了出来。

一种反康德的“美学”

当我们努力重建大众“美学”的逻辑时，这种美学表现为康德美学的否定一面，民众的精神气质暗中以一个反论题对抗关于美的分析的每个命题，这并不是偶然的。而为了领会是什么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性，康德巧妙地将“令人愉快的”(ce qui plaît)与“给人满足的”(ce qui fait plaisir)区分开来，以及更普遍地，将“无关利害”即静观美学的特有品质的唯一保证，与决定“快适”的“感官趣味”，以及与决定“善”的“理性趣味”区别开来，而民众阶级的成员则期待所有形象都完成一种功能，哪怕是符号的功能，因而，在 43 他们的所有判断中，都表现出对道德或快适的规则的是常常是很明确的参照。因此，一个死去士兵的照片引起的不论是赞成还是不赞成的判断，这些判断总是对被表现物的现实或对表象所服务的功能的反应，对厌恶战争或揭露对战争的厌恶的反应，而摄影师被认为仅仅通过让人看到这种厌恶而进行揭露。³⁶ 同样，民众的自然主义承认美丽事物的形象中的美，或更罕见地，承认美丽事物的美丽形象中的美：“这个，不错，差不多是对称的。再说这是一个漂亮女人。一个漂亮女人总是很上相的。”巴黎工人用上了诡辩家希庇亚斯^①的直言不讳：“什么是美，我就这样回答他，而且我永远不会被反驳！其实，应该直说，一个漂亮女人，苏格拉底都知道，这就是美。”

* 关于这些分析所依据的文献，参见 P. Bourdieu et al., *Un art moyen*, pp. 113-114。

① 希庇亚斯(Hippias, 约公元前 465-396/390)，希腊诡辩派哲学家、数学家和修辞学家。他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被描述为苏格拉底的对话者。——译者

这种让形象的形式和存在从属于其功能的“美学”必然是多元论的和有条件的：主体一再强调其判断的有效性的局限和条件，区分了每张照片的可能用途和受众，或者更确切地说，区分了对每种受众而言可能的用途（“作为报道，还不错”，“给小孩儿看还行”），这种强调证明了他们否认一张照片能够“普遍”给人带来愉悦的观点。“一张孕妇的照片，我觉得好，但别人不觉得”，一个职员说，他只是出于合乎礼节的考虑，才表达了对什么是“可以展示的”，因而有权要求得到赞赏的东西的担忧。照片总是参照它为了那个观看它的人而实现的功能或者在这个人看来它能够为了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观看者而实现的功能而受到评判的。审美判断自然而然地采取一种假言判断的形式，这种假言判断暗中依赖对“类”的承认，而概念同时确定了“类”的完善性和应用的场：将近四分之三的判断以“如果”开头而且认可最终通过归为一类来完成，或者同样地，通过分派一个社会用途来完成，不同的类参照其用途和使用者得到确定（“这是广告照片”，“这是纯粹的证据照片”，“这是暗室照片”，“这是竞赛照片”，“这是教育类的”，等等）。裸体照片几乎总要承受将它们还原到其刻板的社会功能的话语：“对皮加勒^①来说不错”，“这是非法卖的那种照片”。我们理解，这种将感官的或道德的信息兴趣变成评价原则的“美学”，只能拒绝无意义的照片，或拒绝照片的无意义，按照这种逻辑，这是一回事：判断从来不准许对象之形象具有相对于形象之对象的自主。在照片固有的所有特征中，只有（康德认为不如形式那么纯粹的）颜色能够导致中止对无

^① 巴黎的一个区，在皮加勒广场(Place Pigalle)附近，以色情商业闻名。——译者

意义照片的拒绝。其实,对于民众意识来说,没有什么比一种审美愉快的观点更陌生了,因为这种审美愉快,如康德所说的,与感官快适无关。因此对于因无价值而被拒斥的相片(卵石、树皮、波浪),评判几乎总是有所保留地以“颜色,还算好看”下结论;当某些主体承认“如果颜色对了,彩色照片总是好看”时,就明确说出了支配他们态度的箴言。总之,当康德写道:“当鉴赏为了愉悦而需要混有刺激和激动时,甚至以此作为自己赞赏的尺度时,它就永远还是野蛮的”,³⁷他想着的确实是民众的鉴赏。

拒绝既缺乏价值又缺乏趣味的无意义的照片或模棱两可的照片,就是拒绝把照片当成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当成自我指涉的因而除了自身别无其他参照对象的照片:人们根据一张照片传达的信息趣味和它完成这种交流功能的明晰程度,总之,根据它的可读性来衡量它的价值,这种可读性本身也与它的意图或功能的可读性有关,能指与所指的表达一致性越彻底,这张照片引起的判断越有利。因此,照片包含着对标题或题词的期望,标题或题词通过宣告有意义的意图,使人们有可能判断这种创作是否确切地表示或说明了这种意图。形式探索,先锋派戏剧或非形象派绘画的形式探索,或者简单地说,古典音乐,之所以让人困惑,一方面就是因为人们感到无法理解它们作为符号应该意味着什么。这样人们可能把一种愉悦当成不恰当和不值得的,因为这种愉悦无法建立在一种脱离对象的意义基础上。由于不知道意图是什么,人们感到无法分清什么是壮举什么是蠢事,无法区分“真诚的”探索和厚颜无耻

³⁷ E. Kant, *Critique du jugement*, Paris, Vrin, 1946, p. 56.

45 的欺骗。³⁸ 但形式探索也是把形式，也就是艺术家，以及他特有的兴趣、他的技巧问题、他的作用、他的参照游戏置于首位的东西，这种东西将事物本身抛得远远的，禁止与世界的美、美丽的儿童、美丽的少女、美丽的动物或美丽的风景进行直接的交流。人们期待表象是眼睛的盛宴，如同静物一样，“它引起对过去的和即将来临的宴乐的回忆和向往”。³⁹ 没什么比立体派或抽象派绘画的探索与人们从艺术作品中期待的对美和喜悦的赞颂即“称赞的选择”更对立的了，这类探索被视为对被表现物、对自然秩序以及尤其对人类形象的侵犯，因而遭到一致的揭露。总之，只有当被表现物值得被表现，表现的功能服从一种更高的功能，即通过固定一种值得被永存的现实来赞颂这种现实时，作品才能表现得理由充足，无论它完成它的表现功能之完善程度如何。这就是这种“野蛮趣味”的基础，占统治地位的美学的对比最鲜明的形式总是否定性地参照这种趣味，而这种趣味只承认那些由于其美或社会重要性而被指定的对象的现实主义表象，也就是这些对象的可敬的、谦卑的、顺从的表象。

美学、伦理学与唯美主义

面对合法的艺术作品，最缺乏特殊才能的人将他们的精神气

³⁸ 面对现代绘画，工人通过招认表现了他们的排斥（“我不明白这要说什么”或“我喜欢，但我不理解”），与这种招认对立的是资产者狡黠的沉默，资产者也感到困惑，但他们至少懂得应该对“理解”的想法所泄露出来的要作品表达什么的天真期望（“标题音乐”和为许多奏鸣曲、协奏曲或交响曲冠名的标题足以表明这种期望并非专门属于大众）表示拒绝——或者无论如何要闭口不谈。

³⁹ E. H. Gombrich, *Meditations on a Hobby Horse*, London, Phaidon Press, 1963, p. 104.

质模式用于这些作品,这些模式构成了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日常认识,而且引起了一种并非有意的且对自身无意识的系统性的产物,从而与或多或少被清楚地阐明的一种美学的原则对立。⁴⁰ 由此而来的是将艺术事物系统地“还原”为生活事物,为了“人性的”内容而搁置形式,而从纯粹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搁置完全是不纯正的。⁴¹ 一切就好像是,形式只有通过取消对表现对象的任何一种情感的或伦理的关注,才能排在首位,这种取消与抓住区分属性的手段之掌握相伴而生(但人们无法因此假设一种因果关系),区分属性通过这种特殊形式与其他形式的关系(也就是通过参照艺术作品的空间及其历史)出现在这种特殊形式中。⁴⁶



双手的照片

⁴⁰ 民众主义把无产者视为难以捉摸的、密集的和顽固的“自在”,并与知识分子或审美家即对自身来说透明的且不可靠的“自为”完全对立,这种表象在这里找到了某种依据。

⁴¹ 对形式的关注,当它表现出来时,仍旧在精神气质的模式中找到了它的依据:人们只有将这种关注与其真正的根源即精工细作的趣味相联系,才能体现出它真实的意义。精工细作的趣味唤起了这种关注,令人想到与语言的过度校正、衣着的一丝不苟或居室的简朴相同的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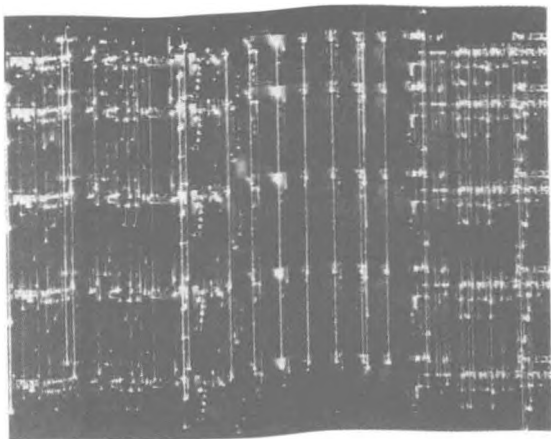
面对一张老年妇女的双手的照片,最贫穷的人表达了一种或多或少传统的感情或一种伦理的共鸣,但从未表达一种特有的审美(除了否定的)判断:“哦,看,她的手变形得多厉害……有个东西我不明白(左手):好像大拇指要从手上脱离。照片拍得很怪。老祖母,活干得应该很辛苦。好像她患有风湿病。是的,她残废了,这个妇女残废了,或者,她的手弯成这样(做动作)。啊!这很奇怪,是的,应该是这样,她的手弯成这样。啊!这表现的不是男爵夫人或打字员的手……没什么!看到这穷女人的手我很感动,可以说,手瘦骨嶙峋”(工人,巴黎)。至于中产阶级,对伦理道德的称颂占了首位(“被劳动弄粗糙的双手”),这种称颂有时带有一种民众主义的感伤主义色彩(“可怜的人,她的手受了多少苦!这让人感到难受”);有时候甚至出现了对审美属性的关注和对绘画的参照:“似乎这是被拍下来的一幅画;当成画来看倒是挺美的”(职员,外省)。“这让我想起了我在一个西班牙画家的展览上看到的一幅画,一个僧侣两手交叉在前面,他的手指扭曲了”(技师,巴黎)。“这是梵高的早期绘画中的手,一个老农妇或吃土豆的人”(中等管理者,巴黎)。随着社会等级升高,意见也变得越来越抽象,手、劳动和(别人的)衰老作为寓意或象征起作用,这些寓意或象征充当了对一般问题的一般思考的契机:“这是一个过度劳动、做过非常艰难的手工劳动的人的手……但看到这样的手是相当不寻常的”(工程师,巴黎)。“这双手确实让人想起一种贫困而不幸的晚年”(教师,外省)。更常见、更多样、运用得更巧妙的对绘画、雕塑或文学的唯美主义参

照,属于关于世界的资产阶级话语所假设和实行的这种中立化、疏远。“我觉得这是一张很美的照片。这是劳动的全部象征。这让我想到了福楼拜的老女仆。同时还有这个女人的姿势非常谦卑……很可惜劳动和苦难把人扭曲到这个程度”(工程师,巴黎)。

在一个奇特的角度和一种奇特的光线下拍摄的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的肖像,引起了极相似的反应。工人,甚至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产生的反应都是反感和厌恶:“我不愿意自己家里、房间里有这样一张照片。这没法让产生好感。这更让人难受”(工人,外省)。“一个死人?真可怕,夜里睡不着觉……丑陋,可怕,我不去看它”(小商人,外省)。如果说大部分职员和中等管理者拒绝一张除了让他们“感到可怕”或给他们“留下不愉快印象”之外无话可说的照片,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还是试图描述照片的技术特征:“照片拍得很好,很美但是可怕”(职员,巴黎)。“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可怕的印象,是因为构成照片主体的男人或女人脸上的表情和照片拍摄的角度,也就是说从下向上拍”(中等管理者,巴黎)。其他人提出了尤其是从电影中借鉴的美学参照:“某种神奇的人物,或者说相当奇怪的人物……可能是德赖尔^①的一个人物,严格地说是伯格曼的一个人物,甚至可以说是爱森斯坦的《伊凡雷帝》中的一

^① 德赖尔(Carl Theodor Dreyer, 1889-1968),丹麦电影导演。他致力于描述一个幻灭的社会里因对基督的爱而遭受的苦难,在画面上赋予女性面孔很大的重要性,对现代电影具有很大启示作用。代表作有《圣女贞德受难》(1928)、《吸血鬼》(1932)、《愤怒的日子》(1943)、《格特鲁德》(1964)等。——译者

个人物……我很喜欢这照片”（技师，巴黎）。大部分的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认为这张照片“漂亮”、“有表现力”，他们不仅参照了伯格曼、奥逊·韦尔斯^①、德赖尔以及其他人的电影，而且参照了戏剧，引用了哈姆雷特、麦克白或阿达莉^②。



拉克工厂夜景

拉克^③工厂的照片非常有可能让现实主义的期待感到困惑，无论从它的对象，即通常被逐出合法表象空间的工业建筑，还是从夜间拍摄对这建筑进行的处理，都是如此，在这张照片面前，工人们感到不知所措、犹豫不决，并往往以承认挫

① 奥逊·韦尔斯(Orson Welles, 1915-1985), 美国电影导演、演员、制片人。他拍摄了电影史上最杰出的电影之一《公民凯恩》(1941), 其他作品有《了不起的安培逊》(1942)、《麦克白》(1948)、《审判》(1962)、《福斯塔夫》(1965)等。——译者

② 法国剧作家拉辛的五幕悲剧《阿达莉》(Athalie, 1691)的同名女主人公, 伏尔泰认为这部剧作达到了古希腊悲剧的高度。——译者

③ 拉克(Lacq), 法国大西洋比利牛斯省的一个市镇。——译者

败感而告终：“一眼看上去，这是一座金属建筑，但是我什么也理解不了。这可能是用在大发电厂里的……我看不出这是什么，真是陌生”（工人，外省）。“这个东西，哎呀，让我难受，我什么也不能说……除了照明设备，我看不出什么。这又不是汽车探照灯，不该是这样的直线；在下面，有人看到栅栏和起重电梯，不，这个我看不到”（工人，巴黎）。“这，这是电子技术，我一点儿也不懂”（工人，巴黎）。至于小企业主，我们知道，他们对现代艺术的探索，更普遍地，对他们认不出劳动标志和痕迹的一切作品，判断相当苛刻，困惑往往使他们采取纯粹的拒绝：“这没什么价值，或许很好，但不符合我的口味；总是重复相同的东西。对我来说，这东西没价值”（手工业者，外省）。“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是一张照片。这或许是一张铅笔小素描的复制品……我不知道把这照片放在哪儿。总之，这真是现代趣味的。两笔的玩意儿，就让人满意。再说照片和摄影师没有任何功劳，什么也没做。画家做了一切，画家有功劳，是画家画了它”（小商人，外省）。职员和中等管理者也像工人或小企业主一样感到困惑，但他们不至于像前者那样承认这一点，也不倾向于像后者那样，对质疑他们的东西的合法性的人进行质疑，因而经常放弃判断⁴²：“作为照片我喜欢它

⁴² 由良好的意愿和不安安全感构成的态度表现了上升的小资产阶级的特征，这种态度表现在其庇护式选择中，即声称人们可以用给出的对象拍出一张“有趣味的”照片——与漂亮的、丑陋的或无意义的照片对立；因此40%的职员和中等管理者认为，可以用蛇拍出一张有趣味的照片（而新小资产阶级中的25.5%认为可以用蛇拍出一张漂亮的照片）。

……因为它拉得很长；这些线条让我觉得很丰富……一个巨大的脚手架……这是现场拍摄的光线”（职员，巴黎）。“布菲喜欢这么做事”（技术员，巴黎）。但只有在与被表现对象认同的人数最多的统治阶级的成员中，形式判断才获得相对于内容判断的完全自主性（“它是非人性的，但借助对比，从一种美学的观点来看，它很美”），表象才作为自身被领会，而无需参照它本身之外的其他东西或同一类别的现实事物（“抽象派绘画”、“先锋派剧作”等）。⁴³

49 把艺术意图变成生活艺术之原则的唯美主义，包含着一种道德上的不可知论，这种不可知论与让艺术服从生活艺术的价值的伦理配置完全相反。艺术意图只能与精神气质的配置或伦理规则背道而驰，因为精神气质的配置或伦理规则每时每刻都在为不同的社会阶级确定合法的表象对象和方式，从可能被表现的东西的空间中逐出某些现实和表现它们的某些方式：通过证明审美构造能力的范围而“让资产者惊愕”的最容易也是最常见和最明显的手法，难道不是无论如何都更彻底地违犯伦理审查（比如性方面的审查）吗？而其他阶级也被迫接受这种伦理审查，甚至在占统治地位的配置使之变成审美的东西的领域。或者，更微妙地，难道不是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美学排除的对象或表现它们的手法

43 针对一个完全相似的物体即一个金属构架的态度的差异为此提供了一个数字证据：认为一个金属构架能够拍出一张漂亮照片的人，工人和服务人员中有6%，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中有9%，职员和中等行政管理者中有9.5%，新小资产阶级中有24%，小学教师和技师中有24%，统治阶级中有24.5%，只有教授中有50%（这一切都让人设想，博堡建筑引起的反应遵循同样的原则）。

变成美学的，或者把被统治的“美学”在美学上构造的对象变成美学的？

只要读读《现实艺术》(*Art vivant*, 1974)刚刚出版的资料索引就够了，这是一本“有模糊的现代倾向的杂志，由大学教授即大约算是艺术史学家的圈子掌管”(如一个先锋派画家巧妙地指出的)，这本杂志在先锋派绘画批评场中，占据《闪光艺术》(*Flashart*)或《艺术评论》(*Art Press*)与《艺术态度》(*Artitude*)或《作品》(*Opus*)之间的一种中立地点。在标题或题目中，我们注意到：《非洲》(1篇：“艺术应该是为所有人创造的”)、《建筑》(2篇，包括“无建筑的建筑”)、《连环画》(5篇，占全部索引的46页中的9页)、《文字-表意文字-图画》(2篇，4页)、《(艺术与)儿童》、《媚俗》(3篇，5页)、《摄影》(2篇，3页)、《街(上的艺术)》(15篇，23页，其中包括“街上的艺术?”、“街上的艺术第一部”，“美在街上流动，只要懂得观看”、“例子来自一个郊区”)、《科学-虚构-乌托邦》(2篇，3页)、《先锋派运动》(1篇)。这种列举明确体现的颠倒或违反的意图，仍旧因此局限于被揭露的审美惯例和让人承认违反界限(由此得出准马尔可夫^①式的选择逻辑，比如，电影中的安东尼奥

① 马尔可夫(Andrei Markov, 1856⁺1922)，俄国数学家，提出了用数学分析方法研究自然过程的一般图式——马尔可夫链，他的研究方法和重要发现推动了概率论特别是随机过程理论的发展。——译者

尼^①、卓别林，电影资料馆中的爱森斯坦，色情描绘中的费里尼^②、戈达尔^③、克莱因^④、梦露，先锋派运动中的沃霍尔^⑤）也是审美的（也就是说符合违反者的群体的规则），这种必要性通过对立推理（a contrario）分派给它的界限内。

50 这种象征违反的立场往往与一种政治中立主义或一种革命的唯美主义相关，几乎与小资产阶级道德主义或萨特称为革命者的“严肃”的东西完全对立。⁴⁴ 当审美配置包含的伦理漠然变成生活艺术的原则时，这种漠然其实是对艺术家（或知识分子）的伦理厌恶的根源，这种厌恶非常强烈地表现在小资产阶级中地位下降和受到威胁的阶层（尤其是手工业者和商人）中，但也同样表现在这个阶级的地位上升的阶层中，前者由此在所有实践领域（尤其是在

① 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 1912-2007），意大利电影导演，新现实主义先驱。代表作有《爱情编年史》（1950）、《奇遇》（1960）、《红色沙漠》（1964）、《放大》（1966）、《云上的日子》（1995）等。——译者

② 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 1920-1993），意大利电影导演，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家。代表作有《甜蜜的生活》（1960）、《八又二分之一》（1963）、《罗马风情画》（1972）、《卡萨诺瓦》（1976）等。——译者

③ 戈达尔（Jean-Luc Godard, 1930-），原籍瑞士的法国电影导演，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代表作有《精疲力尽》（1959）、《随心所欲》（1962）、《卡宾枪手》（1963）、《疯狂的皮埃罗》（1965）等。——译者

④ 克莱因（Yves Klein, 1928-1962），法国艺术家，二战后法国先锋派艺术的代表。他用单一颜色（橙、绿、红、黄、蓝、粉红）作画，创造了国际克莱因蓝，表现物质与精神、身体与灵魂、时间和无限的关系，此外，他还开创了人体测量术画法，探索身体在绘画中的作用。——译者

⑤ 沃霍尔（Andy Warhol, 1928-1987），美国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他的绘画主题是坎贝尔汤罐头盒、商标、美元，丝网印刷的名人照片（如玛丽莲·梦露、杰奎琳·肯尼迪等）。他的作品表现图像在消费社会中的权力和它与死亡的联系。此外，他还从事音乐和先锋派电影创作。——译者

⁴⁴ 这一点在文学和戏剧方面体现得很明显（比如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新浪潮”）。

青年教育方面或关于大学生及其示威游行)表达他们倒退的或抑制的配置,而后的道德主义压力和他们深刻的不安全感使他们极易接受“娼妓政体”的幻想。

纯粹配置的合法性得到如此普遍的承认,乃至丝毫无需强调,艺术的定义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艺术的定义是阶级之间斗争的一个赌注。从未在实践上得到过系统表达的被统治者的生活艺术,几乎总是被其维护者本身以占统治地位的美学的毁灭观点或还原观点来看待,这样它们除了贬值或自我毁灭性的回复到原有地位(“大众文化”)外别无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应该让蒲鲁东^①给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美学的表达,这种表达从其天真性方面来看是有系统的,这种美学让艺术服从于生活艺术的基本价值,并在艺术家的生活艺术的无耻堕落中看到了形式被赋予的绝对至上的原则:“在财产影响下,艺术家理性上败坏,道德上颓废,唯利是图且毫无尊严,是自私自利的邪恶形象。正义和诚实的想法掠过他的心灵但没有扎根,而且在所有社会阶级中,艺术家阶级最缺乏坚定的灵魂和高贵的品格。”⁴⁵“为艺术而艺术,如同人们这样称呼的,本身

① 蒲鲁东(Proudhon, 1809-1865),法国社会主义者,他的主张成为激进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基础。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1840)出版后引起了很大轰动,他不仅宣布“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提出“财产即盗窃!”的口号。1846年蒲鲁东就社会主义问题同马克思发生争论,出版了《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7)对他进行猛烈的批判。1848年蒲鲁东因批评路易·波拿巴入狱,在狱中完成了两部主要著作《革命者白白》(1849)和《十九世纪革命的一般概念》(1851)。1858年出版《论革命与教会中的正义》。1863年出版《论联邦原则和重建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他的思想对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民粹派、意大利激进民族主义者、西班牙联邦主义者和法国工团主义运动都有一定影响。——译者

⁴⁵ 我们本来也可引用狄更斯的话。

⁴⁶ P. J. Proudon,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Paris, Rivière, 1939, p. 226(着重部分由布尔迪厄加)。

并不具备其合法性,没有任何依据,一无是处。这是心灵的放纵和精神的颓废。由于与权利和责任分离,艺术或理想虽作为心灵的最高思想和人性的至上表现受到培育和追求,却被剥夺了自身最好的部分,被归于不过是一种幻想和感官的刺激。这种艺术或理想是罪恶的根源,是一切奴役的起源,按照《圣经》的说法,是大地上所有奸淫和罪恶从中流淌的毒泉……我说,为艺术而艺术,为诗而诗,为风格而风格,为形式而形式,为幻想而幻想,所有这些疾病像一种虱病一样啃咬着我们的时代,这是最高雅的罪恶,这是最纯粹的邪恶。”⁴⁷受到谴责的,是形式的自主性和艺术家形式探索的权利,艺术家通过形式探索自认为掌握了应该归于一种“手法”的东西:“我不想讨论高贵、优雅、姿态、风格、动作,也不想讨论任何构成一种艺术作品的手法且变成陈旧批判的常见对象的东西。”⁴⁸艺术家服从他们选择的对象的要求,在手法中实施报复:“有宗教画家、历史画家、战争画家、风俗画家(也就是轶事或滑稽画家)、肖像画家、风景画家、动物画家、海景画家、裸体画家、幻想画家。一个工于裸体,另一个工于衣褶。然后每个人都拼命以一种提高手法的手段出人头地。一个致力于构图,另一个致力于色彩;这一个注重构思,那一个注重透视法,另一个注重服装或地方色彩;这一个以情感出众,那一个以其形象的理想性和现实主义出众,另一个则通过细节的完美弥补主题的无价值。每个人都尽量有一个绝活,一种特色,一种手法,于是在风尚的帮助下,或出名或毁誉。”⁴⁹

47 P. J. Proudon,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第 71 页。(着重由布尔迪厄加)。

48 同上书,第 166 页。

49 同上书,第 271 页。

名副其实的艺术与这种脱离了社会生活的无法无天的艺术对立，它应该服从科学、道德和正义；它应该以鼓励道德上的同情心、激发尊严和优雅的情感、美化现实为目的，以事物的理想代替事物，描绘逼真而非真实。总之，它应该教育；为此，它不该传达“个人印象”（如画《网球场宣誓》的大卫^①或德拉克洛瓦），而应该像库尔贝在《弗拉热的农民》中那样重建所有人都能判断的社会和历史真实。（“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只需自己思考，这样，经过简单了解，就可对随便什么艺术作品做出一种判断”。）⁵⁰我们如何不最终举出对个人小屋的一种颂扬，这种颂扬肯定会得到中产阶级和民众阶

52

级的强烈赞许：“我就当卢浮宫、杜伊勒里宫、巴黎圣母院——和市场上方圆柱——座落在我家里，在一间按照我的心愿建造的小屋里，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在十分之一公顷的一小块地的中央，有水流、阴影、草地和寂静。如果我想在这里放一座雕塑，这雕塑既不是朱庇特，也不是阿波罗：这些先生对我毫无用处；也没有伦敦、罗马、君士坦丁堡或威尼斯的风景：恳请上帝不要让我住在那些地方！我在这里只安置我缺少的东西：山峦、葡萄园、牧场、山羊、母牛、绵羊、收割者、牧羊少年。”⁵¹

① 大卫(Jacques-Louis David, 1748-1825), 法国画家, 新古典主义的奠基者和杰出代表。画风严谨, 手法精细, 主要作品为历史画和肖像画, 如《贺拉斯兄弟的誓言》(1874)、《马拉之死》(1793)、《拿破仑加冕》(1895-1807)等。《网球场宣誓》(1791)是他的未完成作品。——译者

⁵⁰ P. J. Proudhon, *Du principe de l'art et de sa destination sociale*, Paris, Rivière, 1939, p. 49.

⁵¹ P. J. Proudhon,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p. cit., p. 256. 我们无法彻底理解与蒲鲁东在不止一点上相似的日丹诺夫的论点, 若我们不考虑他的“美学”与一部分共产党领导的民众的或小资产阶级的精神气质之间的一致性。

中立化与可能性空间

与非特定的认识不同,关于艺术作品的特有审美认识(这种认识显然有其不同的实现程度),被装备了一条通过社会形成并获得的相关性原则:这条选择原则使得这种认识在呈现给日光的因素(比如一些叶子或云彩,它们只被看作是具有一种指示功能的标志或信号——“这是一棵杨树”,“暴风雨快来了”)中辨认并把握所有的风格特征,而且仅仅是被重新置于风格可能性空间中的风格特征,这些风格特征区分出一种处理被采用的因素如叶子或云彩的特殊手法,也就是区分出作为表现方式的一种风格;一个时代、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一群艺术家或一个单独艺术家固有的认识方式和思想方式在这种风格中表达出来。人们无从描述一部艺术作品的风格特征,若这部作品不意味着至少暗中参照同时的并存性——以便一部作品从其同代人中脱颖而出——或连续的并存性——以便这部作品与同一个作者或另一个作者的从前或以后的作品形成对比。关于一个画家的全部作品或一种体裁(比如1978年波尔多美术画廊的静物)的展览是这个具有可替换的风格可能性的场的客观成果,当人们“承认”一部艺术作品的典型风格的独特性时,就实现了这个成果。只有根据对蒙德里安^①作品的一种

^① 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荷兰画家,抽象派艺术的先锋。他深受立体派的影响,但在透视法上表现了很大的创新,用红、黄、蓝三元色和黑白色并以长方形构造几何图形,比如《百老汇的布基伍基》。布基伍基(Boogie Woogie)指布鲁斯的一种钢琴演奏手法,乐手以左手演奏固定低音音形,通常为每小节八拍,然后以右手高音部的即兴演奏覆盖,创造出一种对位的形态,突出节拍和律动。——译者

预先观念和这种观念所支持的期待,标题为《百老汇的布基伍基》的绘画,才能如 E. H. 贡布里希^①所指出的,获得它的全部意义:生动而对比强烈的色彩游戏提供的“快乐的放纵印象”只能出现在这样一种意图中,这种意图熟悉“建立在直线和几种基本色彩基础上”⁵⁴的一种艺术,这些色彩分布在精心保持平衡的长方形中”,并且这种意图能够在相对于它对“一种严格的精确性”之期待的差距中,抓住与“流行音乐的轻松风格”对等的东西。只要想想,正因为吉诺·塞维里尼^②被认为在他的这类作品中,试图表达“一种混响的乐曲中的舞蹈音乐节奏”,就可以看到,参照这种风格标志,蒙德里安的绘画无疑更让人联想到《勃兰登堡第一协奏曲》。⁵²

审美配置,作为认识和辨认特定风格特征的能力,与特定的艺术才能密不可分:这种实践本领是通过明确的学习或者仅仅通过熟悉作品尤其是博物馆收集的作品而获得的,这些作品由于其原始功能的多样性及其在一个专门用于艺术的地点的中立性展览,唤起了对于形式的纯粹兴趣;这种实践本领使人们有可能将一个艺术表象空间的每个因素放在一个等级中,这个等级相对于由所有有意或无意被排除的艺术表象组成的等级得到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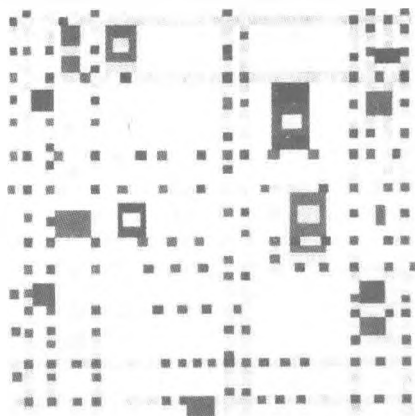
① 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1909-2001),奥地利裔英国艺术史家和肖像研究专家。代表作有《艺术史》(1950)、《秩序感》(1979)、《图像和眼睛》(1982)等。——译者

② 吉诺·塞维里尼(Gino Severini,1883-1966),意大利未来主义画家。他反对传统绘画的模仿,在他的作品中将不同的运动阶段分解,试图将科学与艺术、建构的严格性和想象的创造性结合在一起。——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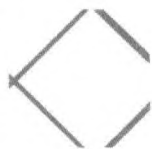
⁵² E. H. Gombrich, *L'art et l'illusion*, trad. G. Durand, Paris, Gallimard, 1971, p. 456.

53

P.蒙德里安：《百老汇的布基伍基》，



P.蒙德里安：《绘画 I》



G.塞维里尼：《塔巴兰舞场的动力象形文字》

因此,风格特征造成了一个时代的作品相对于另一个时代的作品风格创新,或者在这个等级内部,一个流派的作品相对于另一个流派的作品风格创新,或者还有,一个作家的作品相对于其流派或其时代的作品风格创新,甚或一个作家的一种手法或单个作品相对于其全部作品的风格创新,而对风格特征的领会,与对风格重复的领会密不可分,也就是与对决定一种风格的绘画材料的典型处理之领会密不可分。总之,对相似性的把握意味着对差别的暗中或明确参照,反之亦然;归类总是暗中依靠对有意或无意地被选取的“见证作品”的参照,因为这些“见证作品”在一个特别高的程度上,或多或少明确地将被认可的品质在一个确定的分类系统中表现为恰当的。一切都似乎表明,即使在专家那里,确定见证作品的风格属性的恰当标准也往往处于不言明的状态,而且为了区分、划分和排列艺术作品而暗中使用的美学分类,从未具备美学理论有时试图归于这种分类的严格性。

其实,爱好者或专家进行分类时采取的简单定位,与严格意义⁵⁵上的科学意图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这种科学意图通过重建被领会的情况、实际的问题体系来重新抓住作品的内在理由和存在理由,这个问题体系不是别的,恰是组成场的位置和占位空间本身,被考察的艺术家特有的艺术意图往往通过对立在这个问题体系中被确定。这样一种重建活动用以装备自己的参照,丝毫没有在赞颂话语中盛行的这类语义响应或情感呼应的特点,而是对具有主题或风格的可能性的场的构造而言必不可少的工具,艺术家选取的可能性在客观上且某种程度上在主观上相对于这些可能性显示出来。因此,为了解第一批浪漫派画家向原始艺术的回归,应该重

建大卫的这些留着长胡须和穿着希腊服装的学生的整个参照空间,这些学生“超过他们的先生固有的对古代的崇拜,试图上溯到荷马、圣经、莪相^①,将古典的古代风格贬低为‘洛可可的’、‘范洛^②的’、‘蓬巴杜^③的’”:⁵³因此我们再次看到伦理学与美学密不可分的取舍——如将天真等同于纯粹和自然,选择相对于这些取舍而定,这些取舍与形式主义美学所青睐的超历史对立毫无共同之处。⁵⁴

但是,主祭和信徒的意图并不是理解,而在对艺术作品的崇拜的日常惯例中,文人的或社交家的参照游戏除了让作品进入互相承认合法的循环没有其他功能,对扬·勃鲁盖尔·德·韦卢尔^④的《花束》的影射提高了让-米歇尔·皮卡尔^⑤的《花束与鸚鵡》的身

① 莪相(Ossian),3世纪爱尔兰凯尔特史诗《芬尼亚故事》的吟唱诗人。1762年,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发表了声称译自莪相史诗的诗篇,从此,莪相闻名欧洲,激发了英、法、德、匈牙利对古代历史和凯尔特神话的研究,并对浪漫派文学家和音乐家如司各特、歌德、赫尔德、瓦格纳、舒伯特等产生了很大影响。——译者

② 范洛(Van Loo),指17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个法国画家家族,原籍尼德兰,17世纪开始在法国定居。——译者

③ 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ampadour,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宠爱的情妇。她支持文学艺术,资助范洛、布歇、华托等洛可可画家,推动了洛可可艺术在法国的发展,并在建筑和装饰艺术、家具、服装等方面推广这种奢华、肤浅、矫饰的艺术,因此,她倡导的艺术风格也被称为“蓬巴杜风格”。——译者

⁵³ P. Bénichou, *Le sacre de l'écrivain, 1750-1830*, Paris, José Corti, 1973, p. 212.

⁵⁴ 对于将无意义的对立(软焦点与硬焦点之间的对立)用于德国浪漫派画家的一种类似批判,参见 E. H. Gombrich, *In 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p. 33.

④ 扬·勃鲁盖尔·德·韦卢尔(Jan Bruegel de Velours, 1568-1625),弗兰德斯画家,擅长花卉和圣经题材的绘画。——译者

⑤ 让·米歇尔·皮卡尔(Jean-Michel Picart, 1902-1982),法国画家,革新当代地毯业的地毯草图画家。——译者

价,如同在另一个背景下,对后者的参照由于不大常见而能够用来突出前者。博学的影射和类比无限地推向其他类比,这些类比像神话或仪式系统的基本对立那样,从来无法通过阐明它们产生关联的基础来为自己提供依据,于是这种影射和类比游戏在作品周围编织了一个紧密的互相呼应和互相加强的人工经验网络,这个网络制造了艺术静观的魅力:它就是普鲁斯特所说的“偶像崇拜”的根源,这种偶像崇拜致使人们认为“女演员的衣裙或上流社会妇女的衣裙”之所以漂亮,不是因为布料漂亮而是因为它是莫罗^①描绘的或巴尔扎克描写的布料。⁵⁵

① 莫罗(Gustave Moreau,1826-1898),法国画家、雕刻家、素描画家。他的作品属于充满神秘色彩的象征主义潮流,从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借鉴很多,并加入了异国风情和东方色彩的主题。——译者

⁵⁵ M. Proust, *Pastiches et mélanges*, Paris, Gallimard, 1947, p. 173. 类比作为循环思想方式,使得有可能在艺术和奢华的领域里兜圈子,永远不出来。人们会用描述马耳戈城堡葡萄酒得以冠名的城堡的词语谈论这种葡萄酒,如同人们谈论莫奈或弗朗克*时提到普鲁斯特一样,两者都不谈论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住所是葡萄产区的模样。高贵、严肃甚至有点庄严……马耳戈城堡显出为酒神献祭的一座古代神殿的样子……在马耳戈,无论葡萄园或房屋,装饰并不流行。但是,如同酒等人享用才施展它的魅力,房屋等人进去才散发它的魅力。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了相同的词:优雅、出众、温柔和这种难以觉察的满足,这种满足是世代代受到最殷勤的或者坦率地说最体贴的照顾的东西提供的。葡萄酒成熟很久了,房屋也被住了很久了;马耳戈葡萄酒和马耳戈城堡是两种变得同样稀有的东西,即严格与时间的产物”(Eveline Schlumberger, *Le charme enivrant de Château-Margaux, Connaissance des arts*, novembre 1973, pp. 101-105)。

* 弗朗克(César Franck, 1822-1890),比利时裔法国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法国音乐家之一。作品包括交响音乐、室内音乐、管风琴曲、钢琴曲、清唱剧和歌剧等。——译者

与必然的距离

随着学校教育资本增加,如某些最有文化抱负的人经常说的那样,欣赏一部作品时“不考虑其内容”的这种倾向或至少这种企图,以及更普遍地,合法作品要求的这些“无动机”和“无关利害”投入的倾向,也增加了。为了解释这一点,仅仅援引学校教育训练提供了语言工具和参照这个事实是不够的,虽然语言工具和参照使人们有可能表达审美经验,并通过表达这种经验来构造它:实际上在这种关系中显示出来的,是审美配置依赖过去和现在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无论是否得到学校教育承认的)文化资本的积累,物质生活条件既是审美配置的形成条件也是它的使用条件,文化资本只有付出一种脱离经济必然性的代价才能获得。审美配置倾向于搁置被表现对象的性质和功能并排除一切“天真的”反应——按照与所有纯粹伦理反应相同的理由,在令人厌恶的东西面前表现厌恶,在令人渴望的东西面前表现渴望,在神圣的东西面前表现虔敬——而只考虑表现方式即风格,这种风格是通过与其他风格的对照而被认识和评价的,因此审美配置是与世界和他人的一种总体关系的维度,一种生活风格的维度,特定生活条件的作用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表现在这种维度中:作为一切合法文化的习得条件,无论是不言明的和模糊的,比如常见的家庭熏陶,还是明确的和特定的,比如学校教育训练,这些生活条件以悬置和推延经济必然性,以及以与实践的急迫需要保持主观和客观距离为特点,这种距离是这些人与服从于决定性的其他群体之间的客观和主观距离的基础。

为了把柏拉图要求的游戏的严肃,即无严肃精神的严肃,在总是假定一种严肃游戏的游戏中的严肃,赋予文化游戏,应该成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即使不将他们的生活变成一种儿童游戏,如同艺术家那样,也至少要将与世界的童年关系推迟到很晚,有时甚至延长到一生(所有儿童都像资产者一样,在一种对别人且通过别人对世界施展的魔力关系中开始他们的生活,但他们迟早都要走出童年时代)。这一点显示得非常清楚,比如当一个社会生成的意外发生,在知识游戏的文明空间内出现了这些人时——我们想到了卢梭,或者在另外一个空间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将这个空间中并不通行的赌注和利益引进了文化游戏;他们如此地迷恋游戏,以致放弃了幻象包含的这最低限度的中立距离;他们将知识斗争的赌注即许多悲怆的信仰声明的对象视为一个单纯的真假问题、生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游戏的逻辑本身事先为他们分配了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在某些人眼中扮演的角色,怪诞的人或粗野的人的角色,而某些人懂得待在知识幻想的界限内,因而无法以别的眼光看待他们。

作为取消日常急需且搁置实践目的的普遍化了的能力,作为无实践功能的一种持久的实践倾向和才能,审美配置只有在一种脱离迫切需要的对于世界的体验中,且在本身就有其目的的活动如学校训练或对艺术作品的静观中,才能形成。换句话说,审美配置意味着与世界的距离(戈夫曼^①提出的“与角色的距离”是这种

① 戈夫曼(Goffman, 1922-1982),加拿大裔美国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第二代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符号互动论和拟剧论的倡导者。主要作品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1956)、《避难所》(1961)、《互动仪式》(1967)、《经验框架》(1974)等。译者

距离的一个特定维度),这种距离是资产阶级对于世界的体验的根源。与一种机械论表象可能让人相信的相反,家庭或学校的教育行动,即使在其最特定的艺术维度上,至少也是既通过作为其实现条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实现,又通过教育行动灌输的内容实现⁵⁸:有规则的游戏空间和为训练而训练的学校教育空间,至少在这个方面,离“资产阶级”空间和数不清的“非功利的”和“无动机的”行为,不像表面上那样遥远。造成这个空间的独特稀缺性是这些行为:比如房屋的维修和装饰,即精力、时间和劳动的一种日常浪费(通常通过仆人完成)的情形;散步和旅游,即除了锻炼身体别无目的的移动及对一个降为风景地位的世界的象征占有;或者仪式和招待,即一个习惯性铺张的借口,装饰、谈话、盛装,当然更不用说艺术活动和消费了。于是我们理解了,既在经济上享有特权又被(暂时)排斥出经济权力现实的资产阶级少年,有时以一种对同谋的拒绝来反对他们不能真正据为己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这种拒绝在审美或唯美主义倾向中找到了其特别的表达。他们在这方面与资产阶级妇女很接近,她们部分地被排斥出经济事业,若她们不在审美上寻求一种避难所或一种回报,就在资产阶级生活的装饰布置上找到她们的成就。

经济权力首先是一种远离经济必然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它

* 只要在这里强调这种分析就够了,这种分析针对学校教育条件(被分隔的空间,本身即为其目的的活动——练习——等)跟与在所有“官方”场合中被要求的语言的关系之间的关系(cf. P. Bourdieu,《Les doxosophes》,Minuit,1,1973,pp.26-45,et P. Bourdieu,avec L. Boltanski,《Le fétichisme de la langue》,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4,juillet 1975,pp.2-32)。

普遍通过毁灭财富、炫耀性消费、浪费和各种无理由的奢侈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资产阶级,不再以宫廷贵族的方式,将整个生活变成一种持续的炫耀,而是以对立的形式构造了有偿的和无偿的、关乎利害的和无关利害的对立,按照韦伯的观点,这种对立描述了他们处在工作场所与住所、工作日与节日、外部(男人)与内部(女人)、生意与情感、工业与艺术、经济必然的世界与被经济权力除去这种必然的艺术自由世界之间的固有特点。

日常语言赋予 *aisance*(富裕、自如)一词兼具客观条件和配置的意义,艺术作品的物质和象征消费构成了这个词的最高表现之一。⁵⁷ 纯粹目光的超脱无法脱离一种“无动机的”、“无关利害的”普遍配置,即一种否定的经济条件的自相矛盾的产物,这种配置通过安逸和自由产生与必然的距离。由此,审美配置也在客观上和 59 主观上,相对于其他配置确定自身:相对于必然和那些被困在必然中的人的客观距离,与一种有意的远离相配合,这种远离通过炫耀增加了自由。随着与必然的客观距离增加,生活风格总是愈发成为韦伯称之为“生活的风格化”的东西的产物,这种风格化是有系统的决定,它支配和构成各种各样的实践,如选择一个酒类制造年份和一块奶酪,或装饰一座乡间房屋。作为对施于受支配的必然

⁵⁷ 没有哪部古典时代的论著不曾明确地在风格的自如和优雅与生活风格的自如和优雅之间建立联系。比如,让我们想想轻蔑(*sprezzatura*)的信条吧,轻蔑即漫不经心,按照巴尔达萨雷·卡斯蒂里奥内^{*}的说法,漫不经心将完美的廷臣与完美的艺术家区分开。

^{*}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里奥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意大利作家和外交家。其著作《廷臣之书》(1528)获得很大成功,1537年起被译成法语、西班牙语、英语、德语、拉丁语,成为欧洲宫廷的礼仪手册。——译者

的一种权力的承认，它总是包含着对凌驾于某些人之上的一种合法优越性的要求：这些人由于无法表现出对无理由的奢华和炫耀性的浪费中的偶然性的这种轻视，仍旧被普通的利益和急需支配：自由趣味只有相对于必然趣味才能如是地表现出来，必然趣味由此被带入审美范畴，因而被当成平庸的。这种贵族企图受到质疑的可能性比其他任何企图更小，因为“纯粹”的和“无关利害的”配置与使得这种配置成为可能的条件，也就是与因为摆脱了经济必然性而变成最稀有的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极有可能被忽略，这样最有分类能力的权威就有了表现为本质上最合法的特权。

作为区分意识的审美意识

因此，审美配置是与世界和他人的一种疏远而可靠的关系的一种维度，这种关系意味着客观的保证和距离；审美配置是一种配置系统的表现，当与一种生活条件的特定等级有关的社会影响，在一个特定的时刻，相对于经济必然性的限制，采取可设想的最自由的矛盾形式时，就产生了这种配置系统。但是，审美配置也是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特权位置的一种区分表现，而社会空间的区分价值客观上在与从不同条件出发而产生的表现的关系中，确定自身。如同任何一种趣味，审美配置起聚集和分隔作用：作为与生活条件的一个特定等级相关的影响的产物，它将所有成为类似条件产物的人聚集在一起，但将他们按照他们拥有的最根本的东西与其他所有人分隔，因为趣味是一个人的全部所有即人和物的原则，是一个人对别人而言之全部所是的原则，是一个人借以给自身分类并

被分类的东西的原则。

趣味(也就是表现出来的偏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差别的实践证明。当趣味要为自己提供充足的理由时,它就以全然否定的方式通过对其他趣味的拒绝表现出来⁵⁸,这并非偶然:在趣味方面,60 超过任何方面,一切决定都是否定性的⁵⁹;而且趣味无疑首先是对其他趣味、别人趣味的厌恶,这种厌恶由讨厌或发自内心的无法忍受(“这令人作呕”)构成。人们无法讨论趣味或颜色:这不是因为所有趣味都存在于天性中,而是因为每种趣味都觉得建立在天性的基础上——作为习性,趣味几乎总是如此——,这就将其他趣味

⁵⁸ 无数例子中的两个典型例子可以说明“这有别于……”模式的明确用法:“《海盜的未婚妻》”是极为罕见的真正讽刺的、真正可笑的法国电影之一,因为它没有求助于制造《虎口脱险》和《小救生员》**的这种小心地被缓和、谨慎地不伤害的喜剧性……这终究有别于通俗喜剧娱乐的包工头们制造的令人沮丧的笑话”(J. L. Bory, *Le nouvel observateur*, n° 265, 8-14 décembre 1969, 着重由作者加)。“通过距离,至少通过区别,试图就绘画的现代性呈现一种有别于某种艺术批评集合的文本。在饶舌的失语症、对画面的全盘照抄、认可的热情和美学专著之间,也许显示了观念的、理论的活动与当代造型作品的几次接触或几次遭遇”(G. Gassiot-Talabot et al., *Figurations 1960/1973*,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es éditions, coll. 10-18, 1973, p. 7)。

* 《海盜的未婚妻》(*La Fiancée du pirate*, 1969), 奈莉·卡普朗(Nelly Kaplan)导演的法国电影,充满超现实主义色彩和黑色幽默,讽刺了持有正统观念的人的道德偏见和伪善。——译者

** 《小救生员》(*Le Petit Baigneur*, 1968), 罗贝尔·德里(Robert Dhéry)导演的法意合拍电影,主演是《虎口脱险》的主演、法国著名喜剧演员路易·德·菲奈斯。——译者

⁵⁹ 这种被纳入趣味构造及其变化的逻辑中的基本否定性,说明了这一点,即如贡布里希指出的,“艺术史的术语包含了如此多表达排斥原则的词语”;“许多艺术运动树立了一种新禁忌,一种新的否定原则,如在印象派那里所有‘轶事’因素被驱除。我们在过去或现在的艺术家或批评家宣言中读到的肯定的标语和口号通常并没有那么确定”(E. H. Gombrich, *Norm and Form, 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New York, Phaidon, 1966, p. 89)。

抛到违反天性的羞耻之中。审美的排斥异己具有可怕的暴力。对不同生活风格的厌恶无疑是阶级之间的最大障碍之一：内婚可以证明这一点。对那些认为自己是合法趣味的持有者的人来说，最无法忍受的，首先是趣味使之分开的各种趣味大逆不道地集合。这就是说艺术家和美学家和游戏以及他们为垄断艺术合法性而进行的斗争不如表面上那样单纯：没有什么关于艺术的斗争不以推行一种生活艺术也就是将一种随意的生活方式转化为合法的生存方式⁶¹为赌注，这种转化将其他一切生活方式抛入随意之中。⁶⁰ 艺术家生活的风格总是对资产阶级生活风格发出的一种挑战，它通过一种对资产阶级生活风格所追求的特权和权力的不稳定和空虚的实际揭露，试图展现这种生活风格的不现实甚至荒谬：与世界的中立化关系本身确定了审美配置，这种关系包含了对资产阶级投入所包含的严肃精神的非现实化。一些人无法将艺术变成其生活艺术的基础，无法通过文学上的无意识借用或图画上的参照看待世界和别人，那么，如同这些人的带有明显伦理色彩的判断，艺术家和美学家“纯粹”的和纯粹审美的判断，在一种精神气质的配置中找到了其根源；⁶¹但是，鉴于只要这些判断与一种强大的文化

⁶⁰ 这一点在戏剧状况中表现得非常清楚，这种状况以更直接更公开的方式触及生活艺术的暗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而且尤其在喜剧的状况中，意味着一种价值或利益的一致性甚或一种共谋或一种勾结，这种共谋或勾结建立在对同样的明证性即信念的明证性的直接赞同的基础上，信念即按照前反思的信仰方式被接受的一整套观点（这就说明了传播制度及其提供的产物的差别在戏剧方面比在其他任何艺术方面都更明显）。

⁶¹ 至于对为艺术而艺术作为艺术家生活风格之表达的分析，参见 P. Bourdieu, *L'invention de la vie d'artist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975, 2, pp. 67-93.

资本和一种菲薄的经济资本确定的一个群体所固有的配置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不为人知,它们的合法性就会被承认,这些判断为彼此相对化的必然不确定的趣味游戏提供了一种绝对项;因此,这些判断通过一种自相矛盾的颠倒,促使资产阶级“本质区分”之企图作为差别的绝对化而合法化。

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审美占位比如身体美容、服装或家庭装饰,构成了把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位置当成或表现为要占据的地位或要保持的距离的若干机会。自然而然的是,并非所有社会阶级都同样倾向于并准备进入这种拒绝其他拒绝的拒绝游戏、超越其他超越的超越游戏,而且某些策略事实上专属于统治阶级的成员,甚至大资产阶级,或属于“生活风格化”的创造者和专家即艺术家,唯有他们能够将他们的生活艺术变成一种美术,因为这些策略力求把一种生活风格的基本配置变成审美原则系统,把客观差别变成有选择的区分,把外部构成的被动选择通过区分关系的逻辑变成有意识的和有选择的占位,变成审美立场。相反,小资产阶级进入区分游戏的标志,除了其他迹象,便是焦虑,这种焦虑源于这种感觉:将他自身趣味的如此确定的标记,如服装或家具,类似纳塔莉·萨洛特^①某部小说中的一对椅子,呈现在他人的趣味面前时,可能会在分类中授人以柄。至于民众阶级,他们在审美占位系统中无疑只有陪衬物、否定的参照观点的功能,所有美学都参照这种观点从 62

^① 纳塔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 1900-1999),俄裔法国作家,新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她试图揭示隐藏在日常话语中的言外之意及其毁灭力量。代表作有文集《向性》(1939)、《怀疑的时代》(1956),小说《天象仪》(1959)、《金果》(1963),回忆录《童年》(1983)等。——译者

否定到否定地确定自身。⁶² 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中文化上最贫乏的层次的美学(本身)无视或拒绝方法或风格,把已经在邮局的日历和明信片的“美学”中被审美看待的东西,如落日或与猫嬉戏的小女孩、民间舞蹈或名画、第一次领圣体或儿童的仪式行列,当作“好看”、“漂亮”、“可爱”(而不是“美”)。区分的意图随着小资产阶级的审美观出现,这种审美观从所有高雅的事物和实践的贫乏替代品,轮裂木和着色的卵石、藤条和酒椰纤维、手工艺和艺术摄影中获得它的乐趣,并通过与民众阶级的“美学”对抗确定自身,它拒绝民众阶级偏爱的东西,即“蹩脚彩色画片”的主题,如山区景色、海上落日和森林内景,或纪念照片、第一次领圣体、名胜古迹或名画(参见图2)。在摄影方面,这种趣味趋向于与“民众”审美对象接近的对象,但这些对象已经由于对一种绘画传统或多或少明确的参照或一种明显的探索意图而变得半中性化了,这种探索意图将社会场景(做工的纺织工人、流浪汉的争吵、民间舞蹈)与形式的

⁶² 即使通过一种表面的例外,某些艺术家重拾某些民众偏好,但这些偏好也在由对他们而言完全不大可能——若非完全不可能——做的选择所支配的情形中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他们通常把回到“民众”乔装成回到人民,这种回归的原则不在于一种与往往被忽视的与民众阶级的真正关系之中——不在于作为一种拒绝的形式的理想化本身之中,而在于艺术生产场或统治阶级场的内部关系之中(这一点普遍有效,而且应该考察知识分子关于民众阶级的著作从知识分子在某些斗争中的特定利益中获得什么,这些斗争的赌注如果不是民众,至少是合法性,表现得像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这种做法在场的某些状态中授予了知识分子这种合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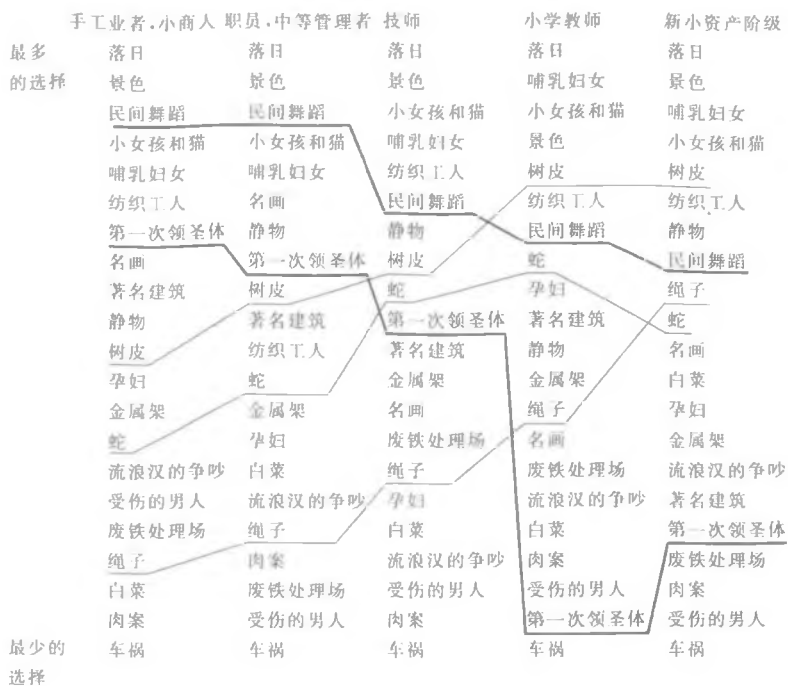


图2 小资产阶级的审美配置

不同的对象,依据不同的阶层,按照认为可以用它们拍出一张漂亮照片的人的百分比被分成等级。

无动机(卵石、绳子、树皮)相结合,⁶³而且很能说明问题的 63

⁶³ 也许在技师当中可遇到“中产阶级趣味”的最纯粹形式。由于他们在摄影方面的选择,他们在中产阶级的空间中占据了一个中间位置(参见图2),其余两方,一方是民众阶级,包括手工业者、小商人、职员和中等行政管理者,另一方面是高等阶级,包括小学教师和新小资产阶级。他们特别经常地趋向于摄影即中产阶级艺术的最典型对象:纺织工人、静物,而新小资产阶级的偏好则常常趋向于在他们看来不是由传统美学构造的对象,在他们看来更“别出心裁的”对象,绳子、白菜,也常常趋向于具有社会特色的对象(流浪汉的争吵)。

是,中等艺术正是在最具“中等文化”特色的表演(包括马戏团、轻歌剧和斗牛)之一的民间舞蹈(我们知道民间舞蹈尤其受到技术工人和工长、中等管理者和职员喜爱)中找到了其偏爱的对象之一。⁶⁴ 对社会场景的摄影记录带有的民众主义的客观主义,通过将民众阶级变成静观的对象甚或怜悯的或愤怒的对象而与他们保持距离,就像这种摄影记录一样,通过表演而呈现自身的“群众”的表演,如同在民间舞蹈中一样,它也是以审美现实主义和民众主义怀旧采取的非现实化形式体会疏远的邻近关系的一个机会,是小资产阶级与民众阶级及其传统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基本维度。但这种“中等的”审美观为中产阶级的新阶层成员中最有经验的人也为中学教师充当了陪衬角色,这些最有经验的人拒绝这种审美观青睐的对象,而中学教师的作为消费者的审美观(他们相对而言几乎不大从事摄影和其他艺术)表现为能把不管什么东西都变成审美的,除了小资产者的“中等艺术”所构造的对象(如被当成“有趣味”的纺织工人和民间舞蹈)。⁶⁵ 他们作为有明确意图的审美观者,通过他们的特定拒绝,表明他们拥有对对象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实践把握,这种把握是“这属于……”(“这属于小资产阶级”、“这属于暴发户”等)这种形式的判断的根源,但他们无法做出有力的举动,把

⁶⁴ S. C. VII, II, pp. 82-83.

⁶⁵ 也许在这两个等级中,对纪念照的最明确拒绝(“纪念照,愚蠢又平庸”;“照片首先是为了保留所爱的人的形象而拍的”),对绘画上的现实主义的最明确拒绝(“一幅美丽的绘画应该再现自然中美的东西”)或对摄影上的现实主义的最明确拒绝(“要一张照片拍得好,只要认出它拍的是什么就够了”)与对现代绘画的最坚决赞同(通过对这种判断——“现代绘画,就是无论怎么做都行;连个孩子都能做”——的拒绝)汇合在一起。

带有最明显的民众“美学”(第一次领圣体)或小资产阶级“美学”(妊娠、民间舞蹈)标志的对象说成是美的,结构上的邻近关系驱使他们自发地憎恨这些东西。

明确的审美选择其实往往通过与在社会空间中最接近的群体的选择之对立而形成,审美选择与这些选择的竞争是最直接和最急迫的,而且,无疑,更确切地,审美选择相对于这些选择中意图表现得最明显的选择而形成,这种意图被视为与低等群体区分开的企图,比如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就是与小学教师喜爱的布拉桑们、费拉^①们或费雷们区分开的企图。因此,歌曲以几乎(像摄影一样)可普遍获得的和真正共同的(鉴于几乎没人不在这个或那个时 65 刻享有一时的“成功”)文化产品的名义,在那些试图显示其差别的人身上唤起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警觉: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大学教授似乎在全部拒绝至多不过是“中等艺术”的东西与有选择地赞同之间摇摆,这种有选择的赞同足以表现他们的修养和他们的审美配置的普遍性;⁶⁶而很少趋向于所谓智识歌曲的企业主和自由职业成员,则显示他们相对于一般歌曲的距离,因为他们怀着厌恶拒绝

① 费拉(Jean Ferrat, 1930-2010),法国音乐家、歌词作者、歌手。他的歌曲非常流行,抨击战争,歌颂穷人的反抗,政治态度非常鲜明。——译者

⁶⁶ 预先制成的选择名单所强加的限制,在这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妨碍我们完全把握这些“冲突”和把握用于避开这些冲突的策略;那个可能“很不情愿地”选择乔治·布拉桑和雅克·杜埃的人本来可以既表现他对歌曲的拒绝,同时又通过一种暗中的重新定义举出库尔特·韦尔的“这个曲调或那首那不勒斯老歌(法国音乐台的“自我中心的音乐会”节目,在这方面非常能够说明问题)显示他的“开放”。

* 库尔特·韦尔(Kurt Weill, 1900-1950),德国作曲家。曾为布莱希特的剧本《三分钱歌剧》(1928)、《七宗死罪》(1933)等作曲。——译者

了流传最广和最“通俗”的歌曲，如歌友^①、米蕾耶·马蒂厄^②、阿达莫^③或希拉^④，而把资格最老、最被认可的歌手（如埃迪特·皮亚夫^⑤或夏尔·特雷内^⑥）和最接近轻歌剧和美声唱法的歌手当成例外。但是，正是中产阶级在歌曲（如同在摄影）中发现了显示其艺术抱负的机会，他们通过拒绝民众阶级所青睐的歌手，如米蕾耶·马蒂厄、阿达莫、阿兹纳伍尔^⑦或蒂诺·罗西^⑧，或通过表示他们对努力使这“低等”类型变得高贵的歌手之偏爱来显示这种抱负：因此小学教师只有在这个领域才与小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如此明显地区分开，他们在这个领域中，比在合法艺术的领地上，更能投入他们的学校教育配置，并在某些歌手的选择中显示他们特有的趣味，这些歌手，如杜埃或布拉桑（几年前他被纳入圣克鲁的

① 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1941 年的法国声乐组合，包括三个男高音，三个男中音，三个男低音。他们演唱法国古老的民间歌曲和当代歌曲，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获得世界声誉。——译者

② 米蕾耶·马蒂厄(Mireille Mathieu, 1946-), 法国歌手,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流行歌曲的代表, 被视为法国歌曲的象征, 唱片销售量超过了 100 万张。——译者

③ 阿达莫(Salvado Adamo, 1943-), 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法语创作歌手, 获得了国际声誉。——译者

④ 希拉(Sheila, 1945-), 原名安妮·尚塞尔(Anny Chancel), 法国歌手, 享誉世界,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译者

⑤ 埃迪特·皮亚夫(Edith Piaf, 1915-1963), 最富盛名的法国歌手, 喜剧演员和电影演员。她的声音被誉为“巴黎的灵魂”。——译者

⑥ 夏尔·特雷内(Charles Trenet, 1913-2001), 法国歌手, 号称“歌唱的狂人”, 创作了《大海》(1946)、《诗人之魂》(1951)等著名歌曲。——译者

⑦ 阿兹纳伍尔(Charles Aznavour, 1924-), 亚美尼亚裔法国歌手、演员, 享有世界声誉。他歌唱怀旧的情怀、放荡不羁的生活和逝去的青春, 同时关注社会问题。——译者

⑧ 蒂诺·罗西(Tino Rossi, 1907-1983), 法国歌手、演员, 具有“天鹅绒般的嗓音”, 唱片极为畅销。——译者

高等师范学校的大纲中),倡导在初等教育传统中加入一种民众主义诗歌。⁶⁷

按照相同的逻辑,我们看到,没落的小资产阶级一贯拒斥⁶⁶新小资产阶级最乐意归于自己的品质(有趣、雅致、高贵、有艺术气质、充满幻想);而新小资产阶级通过对最典型的资产阶级精英的拒绝和与一般判断对立的考虑,显示了他们的审美抱负,这种考虑为审美信仰的表白留出很大的位置:由此,比如关于朋友或居室的品质,他们会使用混杂的词语组合,比如“有艺术气质、合群、有趣、舒服、容易维护、充满幻想”(代理人,巴黎),“有活力、有进取心、高贵、混合风格、热情、充满幻想”(画廊经理,里尔),“有活力、雅致、坚决、舒服、和谐、私密”(电台节目主持人,里尔)。仍旧是同样的逻辑使得自由职业的成员与资产阶级的新成员区分开来,因为自由职业的成员拒绝最清楚地显示(往往被行政管理者选择的)一种“有意识的”野心和上升思想痕迹的品质,如“坚决”、“有进取心”,或拒绝往往在新小资产阶级中被采纳的最“自负的”形容词如“高贵”或“雅致”。

⁶⁷ 除了由调查问题而得到的数据之外,我们还使用了法国广播电视局进行的一次调查的结果(Service des études d'opinion, *Une enquête sur les variétés*, juillet 1972, 7 p.; S. C., XIX)和三十多次深入的访谈,这些访谈力图在尽可能接近日常谈话的条件下把握各种各样的偏好和拒绝。这些谈话有助于证实这一点,即如同法国广播电视局的调查得出的,歌手们越是被最没修养的人偏爱,就越被最有修养的人拒绝——他们在这方面的趣味几乎绝对地表现为拒绝;这类拒绝,几乎总是以厌恶的形式表现出来,通常夹杂着对相应趣味的怜悯或愤怒的看法(“我无法理解有人会喜欢这个”)。

我们也可以假设，对审美观点的无限权力的肯定，更多地得益于区分的意图而非一种真正的审美普遍主义。这种肯定来自大学教授，他们最倾向于说出所有被给出的对象都可以拍出一张漂亮照片，并且公开表明他们对现代艺术或摄影的艺术地位的认可。这一点逃不过最狡黠的先锋艺术生产者，他们拥有足够的权威，从而在必要时对艺术的万能提出质疑⁶⁸，他们能够在这种“计策”中认出这是学会吸取教训的结果，这是不要因为受谴责的预先拒绝态度而暴露自己的考虑：“谁会这么说：当我看一幅画的时候，我对它所表现的东西不感兴趣？——现在，只有在艺术上没什么修养的人才这样。对艺术没有任何概念的人才说这样的话。20年前，我不知道20年前抽象派画家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相信。这，这是不懂艺术的人说出的话：我，我不是老傻瓜，重要的是要好看。”（先锋派画家，35岁）无论如何，只有他们才敢于施加必要的强制力量，通过对所有拒绝的拒绝，对被低等的审美观拒绝的对象实行滑稽模仿式的或升华式的回收。社会空间或时间的距离越短，为“平庸的”对象“恢复名誉”冒的风险就越大，但也越“有利可图”，而且民众阶级低级艺术品的“恶俗”比小资产阶级贗品的“恶俗”更容易“回收”，就好像资产阶级趣味的“败坏”存在于足够遥远的过去中，不再“累及声誉”时，人们可能会开始认为这些“败坏”“有趣”。

⁶⁸ 这种信条在艺术生产场不那么先进的领域中依旧被承认和宣扬，如同这种典型声明所证明的：“但是，我要说加斯东·普拉内”的这些绘画完全无法理解。我要说我喜欢它们这个样子。不是谜语。但完全是沉默。没有参照点。没有消遣。”（Paul Louis Rossi, Catalogue de Gaston Planet）

· 加斯东·普拉内（Gaston Planet, 1938-1981），法国画家、雕塑家、插图画家。——译者

除了那些在调查之时已经被这种或那种绘画传统(如莱热^①或格罗迈尔^②的金属架、流浪汉的争吵,即被摄影多次重复的现实主义绘画的一个古老主题的变种,或肉案)或被摄影传统(如做工的纺织工人、民间舞蹈、树皮)构造的、呈现给判断的对象之外,大部分的“随便什么”对象从调查时刻起就被这个或那个先锋派画家构造了(比如海上落日,以及里彻^③根据照片描绘的典型浪漫主义风景,或英国画家朗^④和富尔顿^⑤拍摄的“观念”意图的风景照片,甚至土地环境艺术^⑥;或者车祸,以及安迪·沃霍尔;或者流浪汉的争吵,以及睡在美国极

① 莱热(Fernand Léger, 1881-1995),法国画家,被誉为“立体主义先锋”、“先锋派的农民”。他最早开展览带有立体主义倾向的作品。他表现的几何图形是被拆开的,不是静态的和不可分的,而是自主的,它们之间有一种动态的对立关系。他强调线条、形式和颜色的平衡。——译者

② 格罗迈尔(Marcel Gromaire, 1892-1971),法国画家。他构造的几何图形显示出坚定、简洁、有力的风格。——译者

③ 里彻(Alain-Charles Richer, 1943-),法国画家。他遵循19世纪表现主义绘画大师的手法,从事色彩鲜艳的半形象主义绘画,致力于描绘布列塔尼地区的风景和人物。——译者

④ 朗(Richard Long, 1945-),英国雕塑家、摄影家和画家,英国土地环境艺术的代表艺术家。他以自然为主题,试图从事一种新的艺术,也就是作为艺术的行走,他的作品以三种方式——地图、照片或文本——记录或描写这些行走,此外,他还创作行走中的风景雕塑。——译者

⑤ 富尔顿(Hamish Fulton, 1943-),英国观念艺术家和土地环境艺术家。他徒步行走了许多国家,他的艺术行为由展览、照片和文章构成。但对他而言,一个人在荒野中的行走是根本的,行走本身就是艺术作品。照片记录的是行走,而不是景色。——译者

⑥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出现在美国的一种按照艺术家的构思改变自然景物的艺术,自然景物和艺术作品密不可分。作品大多露天放置,远离人类文明,通常寿命很短,只留下录像或摄影资料。这种艺术反映了1960年代末艺术家对人工的造型美学和艺术商业化的抗议。——译者

现实主义^①艺术家的鲍厄里街^②上的流浪汉；或者第一次领圣体，以及波尔唐斯基^③，他甚至构造了家庭影集，等等）。没“被回收”且暂时“不可回收”的仅有对象，即低级美学的审美观看重的主题，包括做工的纺织工人；民间舞蹈、树皮、哺乳妇女，由于不够久远，它们不大适合展示审美构造的一种绝对能力；由于不大利于展现距离，它们更有被当成低级意图的危险。重新占有(réappropriation)所适用的美学本身越明显地表现出对占统治地位的美学的认可，而且区分的差距被忽略的可能性越大，重新占有就越困难。

艺术家与“资产者”还是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喜欢“天真”胜过“虚荣”。⁶⁹“民众”的主要长处在于不知道激起“小资产者”野心的艺术(或权力)虚荣；“民众”的漠然包含着对垄断的默认。这就

① 指一种在美国发端的艺术运动，具有极端现实的形象表现。艺术家以杂志上的照片或个人照片为原型加以复制，非常真实，让人怀疑绘画就是摄影。他们寻求的是中立立场，试图原封不动地展示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消费的和生产过剩的社会。——译者

② 美国纽约曼哈顿南部的一条著名街道，充斥了廉价酒吧、酒徒和乞丐，是朋克摇滚乐的发源地。——译者

③ 波尔唐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 1944-)，法国造型艺术家、雕塑家和电影家，以艺术品的造型设置闻名。他采用照片、电影、录像等艺术表达方式传达感情、回忆、无意识、童年、死亡，用时间和空间中的物重建一个个生活片段。——译者

⁶⁹ 事实上，这种“虚荣”使小资产者在享有文化特权的人丢弃给他们的不大合法或正在合法化的领域中尤其无能为力，无论在摄影还是电影领域都是如此，而他们的野心往往表现在这些领域中(如同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电影导演知识上的差距远没有在作曲家知识上的差距那么大这个事实所证明的)；新小资产者被放在客观上被等级化的判断面前时，懂得选择正确答案，但他们在美学构造行为面前几乎跟民众阶级一样无能为力(没有一个艺术商人说车祸可以拍出一张漂亮照片，而且废铁处理场引起了类似的反应)。

是为什么“民众”经常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神话中扮演一个与没落贵族的保守主义观念赋予农民的角色没多大差别角色，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则通过他们的相反策略和双重否定，有时重拾“民众”的趣味和观点。

文化贵族的领地

68

如果说学校教育资本的变化总是与能力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在不直接由学校教育机构教授和支配的领域如电影或爵士乐中也是如此，那么，在学校教育资本相同的情况下，社会出身的差别（其“作用”已经体现在学校教育资本的差别中）仍然与重要的差别联系在一起：首先，人们对一种严格的和可严格控制的能力要求越少，对文化的一种熟习要求就越多，其次，人们越远离最具“学校教育”特点的空间，最“正统的”空间，冒险进入所谓“自由”文化的不大合法却更有“风险”的领域，那么，这些差别就越重大且越明显（除了在过度选择的作用倾向于消除轨迹差别的最高学校教育水平上）。“自由”文化不是学校教授的，尽管它在学校教育市场上获得价值，这种文化可能在许多情况下具有一种巨大的象征收益，并提供一种丰厚的区分利益。当人们只要求被调查者表达对合法的或正在合法化的文化的一种法定熟习时，学校教育资本在解释因素系统中的相对比重可能比社会出身的比重低得多，这种法定的熟习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关系，由自信和（相对）无知混合而成，由资历衡量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权利体现在这种混合之中。

在学校教育资本相同的情况下，从民众阶级到统治阶级，

声称知道至少 12 部被提名的音乐作品的人的数量比能够列举至少 12 位作曲家的名字的人的数量增长更加明显(在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中差距很小)(参见表 4)。相同的逻辑支配着只是在幅度上差异较小的性别差异:在作曲家方面,我们看不到来自相同阶级的个人之间的性别差异,涉及妇女的巨大差异出现在熟习作品方面,尤其在中产阶级和高等阶级中(在民众阶级中,无论对哪个性别而言,这种了解都非常少);在最女性化的两个等级即社会医疗机构成员和秘书中,被提问的所有人说至少知道三部被提名的作品。这种与音乐的真实的或公开的关系中的差别,无疑部分地通过性别之间传统的角色分工使得妇女熟习艺术和文学事物这个事实得到解释。

与社会出身相关的差别在对导演的了解方面也表现得相当明显,在教育水平相同的情况下,社会出身越高,了解就越多。同样,在教育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声称可以用丑陋的或无意义的东西拍出一张漂亮照片的人的数量,随着出身升高而增加。难道需要说出被喜爱作品的性质上的差别也与不同的习得方式相对应?从文学到绘画或古典音乐更不必说到爵士乐或先锋派艺术,与社会出身相关的差别倾向于随着人们远离学校教育活动目标而扩大。⁷⁰ 那些通过学校并为了

⁷⁰ 我们在从前的一次调查中确定,尽管出身民众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大学生在传统文化方面获得的成绩与出身资产阶级的大学大致相同,只要转向“自由文化”,也就是说无论是先锋派戏剧还是通俗喜剧,前者都会得到较差的考试成绩。在这里我们看到与艺术生产者和中学教师(我们通过另一个正在被分析的调查得知,甚至当美术教师出身于中产阶级或民众阶级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有非常“传统的”趣味而且他们更接近教师而非艺术家)之间的对立完全相似的一种对立。

学校而获得其主要文化资本的人比那些得到重要的文化遗产的人拥有更“正统”且更少风险的文化投入。

因此,比如,如果说拥有最高文凭(大中学教师学衔或重点大学的文凭)的统治阶级成员的共同点是从来不提中等文化的某些典型作品和画家,如布菲或于特里约,而且他们熟知作曲家并偏爱《平均律古钢琴曲集》或《火鸟》,那么出身民众阶级或中产阶级的人往往做出别的选择,这些选择显示了他们对一种更有“学校教育”特色的文化的尊敬(戈雅、达芬奇、勃鲁盖尔、华托^①、拉斐尔),并且他们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人(25%)同意“绘画很好但难懂”的判断,而那些出身统治阶级的人了解更多的作品而且往往选择离“学校教育”文化更远的作品(布拉克^②、《左手钢琴协奏曲》)。同样,那些拥有一种相对微薄的学校教育资本(等于或低于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的地位稳固的小资产阶级成员(手工业者、小商人、职员、中等管理者)做出的选择往往明显带有他们的轨迹的标志。因此,他们当中处于上升阶段的人以各种方式显示了他们对合法文化的尊敬(比如比别人更经常地赞同“绘画很好但难懂”这个判断),并且选择典型中等趣味的作品(布菲、于特里约),甚或典型民众阶级趣味的作品(《蓝色多瑙河》)。相

① 华托(Antoine Watteau, 1684-1721),法国作家,洛可可艺术的早期代表之一。他擅长游乐画,表现愉快而忧郁的梦幻世界和人生的短暂虚幻之感。代表作有《发舟西苔岛》(1717)、《皮埃罗》(1718)、《热尔尚画店》(1720)等。——译者

② 布拉克(Georges Braque, 1882-1963),法国画家和雕塑家,立体主义的创始人,“立体主义”因他得名。他将字母和数字以及拼贴手法引入立体主义,对20世纪西方艺术产生很大影响。——译者

反,其父亲属于高等阶级的人,在学校教育资本相同的情况下,显出更熟习音乐作品(尽管他们也不知道作曲家的名字)。同样地,他们更经常说他们喜欢印象派,更经常去博物馆并更经常选择学校认可的作品(拉斐尔或达芬奇)。

69

表4 对作曲家和音乐作品的了解

文凭	社会出身	知道的作曲家数量					知道的作品数量				
		0-2	3-6	7-11	12个以上	总数	0-2	3-6	7-11	12个以上	总数
无文凭 CEP, CAP	大众阶级	69.5	23.5	5.5	1.5	100	32.5	48.5	17.5	1.5	100
	中产阶级	68.5	21.0	8.5	2.0	100	21.0	55.0	19.5	4.5	100
	高等阶级	46.0	25.0	8.5	20.5	100	12.5	33.5	29.0	25.0	100
	总数	67.0	22.0	7.5	3.5	100	24.5	51.0	19.5	5.0	100
BEPC	大众阶级	57.5	15.5	23.0	4.0	100	15.5	27.0	50.0	7.5	100
	中产阶级	48.5	35.5	9.5	6.5	100	8.5	43.0	34.5	14.0	100
	高等阶级	31.5	41.5	13.5	13.5	100	8.0	31.5	41.0	19.5	100
	总数	44.5	34.0	13.0	8.5	100	9.5	37.0	39.0	14.5	100
业士	大众阶级	11.0	59.5	18.5	11.0	100	—	33.0	52.0	15.0	100
	中产阶级	19.0	32.0	38.0	11.0	100	3.5	26.5	51.0	19.0	100
	高等阶级	21.5	21.5	37.5	19.5	100	5.0	19.5	42.5	33.0	100
	总数	18.5	32.5	35.5	13.5	100	3.5	25.5	48.5	22.5	100
普通大学 未上大学	大众阶级	20.0	—	70.0	10.0	100	—	30.0	60.0	10.0	100
	中产阶级	16.0	22.5	51.5	10.0	100	13.0	19.5	54.5	13.0	100
	高等阶级	17.5	11.5	39.0	32.0	100	11.5	11.5	33.5	43.5	100
	总数	17.5	13.5	45.5	23.5	100	11.0	15.5	42.0	31.5	100
学士 学衔 重点大学	大众阶级	—	35.0	32.5	32.5	100	—	7.0	66.5	26.5	100
	中产阶级	7.0	15.0	47.5	30.5	100	—	22.0	49.0	29.0	100
	高等阶级	7.5	15.5	44.5	32.5	100	8.0	13.5	38.5	40.0	100
	总数	7.0	16.5	44.5	32.0	100	5.5	15.0	43.0	36.5	100

风度与获得方式

文化(或语言)能力是在与某个既作为反复灌输的机构又作为市场起作用的场之间的关系之中获得的,这种能力仍旧是由它的

获得条件决定的,获得条件在使用方式中——也就是说在与文化或语言的一种确定关系中——得到永存,它们作为一种“出身标志”发挥作用,并通过使这种“出身标志”与某个市场互相依赖,仍在帮助确定它的产品在不同市场上的价值。换句话说,人们通过诸如教育水平或社会出身这些指标所把握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在将教育水平和社会出身联系在一起的关系结构中所把握的东西,可以说也是有教养的习性的生产方式,即不仅体现在获得的能力中而且在运用这些能力的方式中的差别的原则,也即一系列次要的属性,这些属性揭示了不同的获得条件,预先倾向于接受在不同市场上迥然不同的价值。

要知道,方式是一种象征表现,这种表现的意义和价值既依靠认识它的那些人又依靠产生它的那个人,于是我们理解了这一点,使用象征财产尤其是那些被视为卓越标志的象征财产的方式,构成了“等级”的特定标志之一,同时也构成了区分策略也就是照普鲁斯特的话说的“表示距离的千变万化的手段”的特有工具。借助文化能力及其应用的两种模式,天生趣味的观念使两种文化获得方式互相对立:⁷¹从儿童时期开始在家庭内部实行的全面的、早期的和不知不觉的教育,被以这种教育为前提并完成这种教育的学校教育所延长。这种教育之所以,与后来的、有系统的和快速的教

⁷¹ 当人们在调查或分析中忽视实践、趣味或观点(比如政治观点)的模式时,几乎总是会忽略根本的东西。因为这种模式被算作深层配置的最佳指标,因而被算作对行为的最好预测,因此它在所有社会中受到一种极大的关注;下面的情况真是不胜枚举,在这些情况中,配置的社会真实,即对实践的理解和预见的真正原则,在方式中且只有在方式中才显示出来。

育分开,并不像文化“幸运儿”的观念硬说的那样,要么由于其作用的深度和稳固性,要么由于它倾向于另外灌输的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模式。⁷² 这种教育给予自信和自如:自信与保持文化合法性的信心相关,而自如被等同于卓越;这种教育产生一种自相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由(相对)无知中的自信和熟习中的从容构成,出身世家的资产者与文化这种家庭财产保持着这种关系,他们感觉自己是这种家庭财产的合法继承者。

“行家”的能力,即对占有工具的无意识支配,是一个缓慢的熟练过程的产物,并以对作品的熟习为依据。这种能力是一种“艺术”,即实践支配,这种“艺术”如同一种思想艺术或一种生活艺术,不能只通过规则或规定传承,这种“艺术”的学习意味着与一种传统教育中徒弟和师父之间持久接触对等的东西,也就是与文化作品和有修养的人的反复接触。就像学徒或徒弟经过一种真正的舍弃自我,排除对标准方式的成分的分析 and 选择,可能会无意识地获取艺术的法则,包括那些未被师父本人明确认识的法则,同样,艺术爱好者能够通过某种程度上投入到作品中,将作品的构造原则内在化,而这些原则从未上升到意识并未被这样提出或未被明确地这样提出,这就造成了艺术理论与行家的经验之间的全部差别,行家往往无法说明他的判断原则。相反,任何制度化的训练至少以一种最小的理性化为前提,这种理性化在与被消费产品的关系中显示出它的迹象。唯美主义者的至高无上的快乐想要抛开概

⁷² 这就是使得合法的模式,尤其在与艺术作品的关系中,至少在上流社会的市场上保留一种无可比拟地高于学校教育模式(并且高于只能在学校获得的知识,如拼写、语法或数学)的收益,合法的模式是在资产阶级中的资历的最佳实用指标之一。

念。它既反对(意识形态通过新眼光的神话和童年的神话颂扬的)“天真的人”的无思想的快乐,也反对小资产者和“暴发户”认为的无快乐的思想。小资产者和“暴发户”总是受到这些禁欲的反常形式威胁,这些反常形式导致不顾经验看重知识,为了关于作品的话语而牺牲对作品的静观,为了幻影(askesis)而牺牲感觉(aisthesis),他们如同某些影迷那样,对没看过的电影,凡是应该知道的,无所不知。⁷³ 人们知道,这并不是学校教育系统完全实现了其本质:学校传达的根本东西也额外得到了,如分类系统,学校教育系统通过它在其中灌输知识的等级或通过它的组织(学科、专业、训练等的等级)或它的功能(评价方式、审查等)灌输这个系统。但是,出于传承的需要,学校教育系统总要对它所传达的东西实行一种最低限度的理性化;因此,比如,它以明确的和标准化的分类学代替总是局部的并与实践背景相关的实践分类模式,这种分类学以提纲或二元论类型学(比如“古典的”/“浪漫的”)的形式被一劳永逸地固定,并以知识的形式被明确地灌输因而被保留在记忆中,这些知识可能被服从学校教育系统活动的的所有行动者以大致相同的方式重复输出。⁷⁴ 学校教育系统提供了有可能将实践的偏好提到几乎

⁷³ 想到若要列举这部或那部著作,可能有点残酷,最好还是请读者以自身(或自身的经验)为参照,因为“有教养的人”对“小资产阶级”与文化的关系以及自修者的“反常行为”的描述,在这类著作中得到了表达。

⁷⁴ 为了避免对自修者的中等文化客观上据以确定自身的文化实行任何绝对化,应该强调,社会等级越高,趣味的真实越存在于学校教育系统的组织和功能中,学校教育系统负责反复灌输(学校和信息意义上的)大纲,这个大纲支配有教养的人,甚至到了支配他们的“个人风格”的探索和“创新”的抱负的程度。学历与文化能力之间的差距与社会轨迹相关,并且基本上可归于不被教育系统认可的文化资本的传承。这种差距毕竟是相当常见的,以至于“真正”的文化无法还原为照此被贬低的“学校教育”知识,甚至连学校也承认这一点。

有系统的话语层面并围绕明确的原则明确地构成这些偏好的表达工具,由此它通过完全类似于语法所实现的功能的一种功能,使得对趣味的实践原则的(多少恰当的)象征支配成为可能,在那些已经拥有“美感”的人身上将这种“美感”理性化,赋予他们参照法则(比如和声法或修辞法)、规则、方法的手段,而不是使他们信任即兴的偶然性,这样就用一种学院美学的有意识的准系统性代替本身由趣味的实践法则产生的自在美学的客观系统性。我们看到,学院主义的潜在性被封闭在整个理性的教育学中,这种教育学倾向于把传统教育以实践中直接被领会的一种总体风格的形式来传达的东西,变成一种明确的且被明确教授的、往往否定多于肯定的规则 and 程式的教理大全。但是,理性的艺术教育尤其提供了直接经验的替代品——而且这是唯美主义者对教育学家和教育学的神圣厌恶的根源——,它为漫长的熟习道路提供了捷径,它使得成为概念和规则的产物而非来自所谓的趣味自发性的实践成为可能,因而为那些希望弥补失去的时间的人提供了一种帮助。

天生趣味观念的表象和有效性来自这一点,即这种观念如同在日常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所有观念策略一样,使得真正的差别自然化,把文化获得方式的差别变成了自然差别并把带有最不明显的文化生成痕迹的与文化(或语言)的关系视为唯一合法的关系,从而将真正的差别自然化,而这种关系与“习得”、“假装”、“矫饰”、“做作”、“书生气”、“书呆子气”没有任何关系,它通过自如和自然来显示真正的文化是自然,即圣母玛利亚无原罪受胎的新奇迹。这在某个烹饪艺术方面的唯美主义者的谈话中表现得非常清

楚,他简直跟弗朗卡斯泰尔^①异口同声,后者在对一个艺术史学家而言相当于自我毁灭的一种招认中,为了“直观经验”即达到真正“观念”的唯一手段,而拒绝了只能“辨认”的“理性化知识”:⁷⁵“不应该混淆趣味与美食学。如果说趣味是这种辨认和喜爱完美的天赋,那么,相反,美食学是主宰趣味的培养和训练的一整套规则。美食学较之趣味,相当于语法和文学较之文学感觉。于是主要的问题提出来了:鉴赏的美食家是一个优雅的行家,而烹饪的美食家是一个没教养的人?……鉴赏的美食家是他自己的烹饪的美食家,如同有趣味的人是他自己的语法学家……并非所有人都是鉴赏的美食家,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烹饪的美食家……应该对烹饪的美食家和一般的教育家一视同仁:有时候会有让人无法忍受的没教养的人,但他们有他们的用处。他们属于低级的和谦卑的趣味,是否能够通过知轻重、懂分寸和表达优雅的轻松自如来提高这种有点低级的口味,取决于他们自己……存在着一种不良的趣味……而那些优雅的人在本能上就可感受到这一点。对那些感受

① 弗朗卡斯泰尔(Pierre Francastel, 1900-1970),法国历史学家和艺术批评家。艺术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比较历史社会学”。他认为艺术不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愉快,而是与它的政治、宗教、历史、科学环境密不可分。因此艺术史不应局限于作品分析,而应把作品与其时代和创作背景互相对照。他用这种理论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19世纪法国艺术和现代艺术,代表作有《艺术与社会学》(1948)、《绘画与社会学》(1951)等。——译者

⁷⁵ “人们在强光中看不见一幅画。这种幻觉只属于那些无法‘观看’、仅满足于‘辨认’一幅图画的人,他们不是以一种直观的经验而是以一种理性化的知识面对它”(P. Francastel, 《Problèmes de la sociologie de l'art》, in G. Gurvitch, *Traité de sociologie*, Paris, PUF, 1963, t. II, pp. 278-298)。

74 不到这一点的人来说,正好需要一条规则”。⁷⁶ 这种通过经验的认识,如同圣托马斯的实验认识(cognitio Dei experimentalis)一样,体会到词语和概念不适合神秘结合中“被感受的现实”并为此而痛惜,这种认识将对艺术的理性之爱视为可鄙的,因为理性之爱这种认识,把对作品的体验等同于一种理智的辨识活动。⁷⁷

“学者”与“社交家”

获得方式上——也就是说跻身统治阶级的资历上——的差别表现在风度上的差别之中,风度上的差别往往与拥有资本的结构

⁷⁶ P. de Pressac, *Considérations sur la cuisine*, Paris, NRF, 1931, pp. 23-24 (黑体部分力求更清楚地表现借自文化消费传统的一系列对立:天赋和本能/规则和训练,行家/没教养的人,文学感觉/语法)。我本来也可引用普鲁斯特(他从不忘记将风度与获得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话:“她让我恼火,这愈发不对了,不仅她说起话来不让人觉得她跟‘梅梅’很亲密,而且因为一种让她称呼这些贵族老爷的过快训练,让她以为这个地区的风俗便是如此。她在几个月之内便上完了她的课,没有按部就班”(M. Proust,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Paris, Gallimard, La Pleiade, 1973, vol. II, p. 660)。

⁷⁷ 关于艺术作品的神秘话语严格来说是无穷无尽的,当我们为了做出具体的分析说明,举出如下的这个样本时,我们无法避开随意之感,尽管这个样本说出了丝毫不亚于吉尔松·或海德格尔的深刻思考,但它的典范性或许恰恰来自它的由出版地点证实的平常性:“无知者,内行人,谁不在这种神秘——杰作——面前折服?我们全都反复摸索,犹豫不决,观察画布,我们窥视着这优雅的时刻,画家的信息在这个时刻传达给我们。伦勃朗沉默的喧嚣,弗美尔”无尽的温柔,任何文化都将使我们无法理解它们,如果我们不懂得保持安静,准备期待,在我们身上留出这种有利于感情的空虚。”(*Réalités*, mars 1960)

* 吉尔松(Etienne Gilson, 1884-1978),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中世纪哲学史和思想史专家。他致力于对哲学进行历史分析,依靠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维护哲学实在论。主要著作有《托马斯主义——圣托马斯研究导言》(1919)、《圣奥古斯丁研究导言》(1922)、《论中世纪思想在笛卡尔体系形成中的角色》(1930)等。——译者

** 弗美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荷兰画家。精于透视艺术,擅长肖像画和人物画。主要作品有《打盹的少女》(1657)、《倒牛奶的女仆》(1660-1661)、《戴珍珠耳环的少女》(1665-1666)等。——译者

差别相联系,而且预先倾向于显示统治阶级内部的差别,如同文化资本的差别显示阶级之间的差别一样。⁷⁸这是因为,方式尤其是与合法文化的关系的模式是一场永久斗争的赌注,于是,在这些方面没有中立的陈述,指涉对立配置的两项,按照人们对这些话语采取的这个或那个对立群体的观点,可被当成称赞或贬低。“学者”⁷⁵(或“学究”)与“社交家”之间的对立在所有时代都是关于趣味和文化的讨论的中心,这并非偶然:这种对立通过生产或评价艺术作品的两种方式,实际上非常清楚地指明了两种对立的获得方式,且至少对目前的时代而言,指明了与学校教育制度的两种不同关系。

让我们想想支配整个17世纪上半叶的学者夏普兰^①、巴尔查克^②、拉梅纳尔蒂埃^③、法雷^④、科勒泰^⑤、多比尼亚克^⑥等与“社交

⁷⁸ 在统治阶级内部,由社会轨迹而来的差别与所拥有资本的结构差别紧密相连,新来者的比例随着我们接近被统治的阶层(作家和艺术家除外)而增加。无论如何,在每个阶层内部(而且尤其也许在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内部),可非常明显地感受到由轨迹而来的差别。

① 夏普兰(Jean Chapelain, 1595-1674),法国诗人和文学批评家,法兰西学士院的创立者之一。曾执笔《法兰西学士院关于(勒·熙德)的意见》。——译者

② 巴尔查克(Guez de Balzac, 1597-1654),法国作家,法兰西学士院的创立者之一,被誉为“法国语言的复兴者”。他以《书信集》(1624-1654)和《谈话录》(1657)闻名,风格优雅、和谐、明晰,奠定了法国古典散文的基础。——译者

③ 拉梅纳尔蒂埃(Hippolyte Jules Pilet de La Mesnardière, 1610-1663),法国医生、诗人、剧作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译者

④ 法雷(Nicolas Faret, 1596-1646),法国政治家和文人,法兰西学士院的首批院士之一。——译者

⑤ 科勒泰(Guillaume Colletet, 1598-1659),法国诗人,法兰西学士院的首批院士之一。——译者

⑥ 多比尼亚克(Abbé d'Aubignac, 1604-1676),法国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以创立古典戏剧理论三一律和与高乃依之间的争论闻名。——译者

家”之间的对抗吧,这些学者在意大利理论家那里并通过他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寻找他们试图为文学作品的观念规定的法则,并努力将这些法则建立在理性依据的基础之上⁷⁹,而社交家拒绝受规则⁷⁷的拖累,他们把他们的愉快当作裁判并对无数细微的差别迷恋不已,这些差别产生“说不清是什么”(je ne sais quoi)的东西和礼仪的优雅完美:那些关于文学作品引起的或表现的趣味的重大争论(比如风雅之士的问题,风雅之士将上流社会的优雅,即这种被当成和被认为难以表达的生活艺术,进行规范化和理性化,从而使这种优雅经历了一种真正的性质变化),其赌注不仅是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在其中辨认自己的德行,而且如德·梅雷骑士^①所说,是“亲身实践德行的方式,方式本身就是各种各样的德行”,他们在这个阶级中的资历和他们获得资历的方式表达或体现在这些方式中。

我们可以无限地增加从这种无限的文学中借用的例证,这种文学力图把普通风俗与艺术作品的创造和认识,总之,把一切落入趣味即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的绝对裁判之中的东西,全都规范化(cf. M. Magendie, *La politesse mondaine et les théories de l'honnêteté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de 1600 à 1660*, Paris, PUF, 1925),但我们只要一个例子就够了,因为方式、获得方式和这种方式指涉的群体之间的联系在

⁷⁹ Cf. R. Bray, *La formation de la doctrine classique en France*, Paris, Nizet, 1951.

① 德·梅雷骑士(Antoine Gombaud, Chevalier de Méré, 1607-1884),法国作家。他是帕斯卡尔的同代人,曾与帕斯卡尔通信讨论或然性的计算问题,提出了与帕斯卡尔的打赌对立的“德·梅雷骑士的打赌”。他以论正人君子的哲学随笔闻名,作品有《论才智》、《论谈话》、《论事物和表达中的微妙》等。——译者

这个例子中被明确提出：“作者（菲勒蒂埃，《市民传奇》的
作者，他曾经抨击拉封丹和邦瑟拉德^①）清楚地显示出，他既不是来自上流社会也不是来自宫廷，而且他的趣味属于一种人们甚至无法希望他改正的学究气。有些事情人们永远也无法领会，若不是一开始就领会：人们无法让某些冷酷而野蛮的人理解邦瑟拉德的芭蕾舞和拉封丹的寓言的魅力和流畅。这扇门对他们关闭了，我的门也对他们关闭了……我决不反悔，对于这样一个人只有祈求上帝了，希望不要跟他打任何交道。”（Mme de Sévigné, lettre à Bussy-Rabutin, 14 mai 1686）

上流社会的才智与学究气的晦涩知识

特里索坦

1325 在我经历的斗争中，我不感到惊奇，

看到先生支持的论点受到攻击。

他深入宫廷，不言而喻：

宫廷，尽人皆知，没人当它有才智，

它倒是乐意支持无知。

1330 他替它辩护，只因身为内侍。

克里唐德尔

您太怨恨这可怜的宫廷，

它多么不幸

^① 邦瑟拉德(Isaac de Benserade, 1612-1691), 法国作家和戏剧家, 17世纪风雅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作品有喜剧《伊菲斯和伊安特》(1637)等。——译者

- 看到每天你们这些才子们声称跟它作对，
您满怀悲伤把它反对，
1335 您还抨击它的趣味平庸，
只不过通过它才显出您了不起的成功。
允许我，特里索坦先生，跟您说明，
以您的名字在我身上引起的全部尊敬，
你们最好，您的同伴和您，
1340 用更温和的语气谈论宫廷，
好好待它，毕竟，它并非那么愚蠢，
牢牢记住，你们这些先生们，
它有常识，能认识一切，
我们通过它能教趣味正确，
1345 上流社会的思想，不用吹嘘，
抵得上学究气的全部晦涩知识。

特里索坦

先生，它的正确趣味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

克里唐德尔

先生，您在哪里看到，它的趣味如此糟糕？

——莫里哀：《女才子》

自如或有教养的天性

“我希望一个人懂得一切而且从他说话的方式上，他并不显示出学过”。

——梅雷：《论交谈》

“应该纠正大部分教师的是某种过分协调的东西，这种东西给人以技巧和学习的印象。应该让它显得自然”。

——梅雷：《论愉悦》

“称赞一切出现的东西，而且以令人愉悦的方式说出，所有听到这些话的人都感觉更好；思想不能走得更远，这是智慧的杰作……他们不应该说给人留下学习的印象或显得深思熟虑的任何话；在一切方面，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价值很满意，应该避免在任何方面教导他们，也避免提醒他们，无论看到他们犯了什么错误”。

——梅雷：《论交谈》

“这种优雅体现在表情上，体现在过程中，体现在身体和精神的最细微的活动中；人们越是关注它，就越被吸引，却不知道这从何而来……因为一切通过限制或奴役形成的东西，或者一切表现得哪怕有一点点粗野的东西，都摧毁了这种优雅。为了让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可爱，应该尽量让他愉悦，并且切记不要对他施加令人厌烦的教导”。

——梅雷：《论愉悦》

“上流社会人士有时不得不介入一切，哪怕是他们知道最少的东西。发生这种情况时，他们不应该表现得像是职业手艺人一样，后者的目的不过是干完活儿。因为一个风雅之士与其说考虑在他的事情中完善自身，不如说考虑照风雅之士行事……这种来自幸运的出身和一种良好习惯的自如神态对于愉悦是必要的，这样，介

入一件事的那个人,无论这件事有多难,都应该以一种如此从容的态度着手,好让人认为这件事不费他任何力气”。

——梅雷:《论愉悦》

自相矛盾的是,早熟是资历的一种作用:贵族是早熟的典型形式,因为贵族就是古老家族的后代生来就有的资历(至少在资历和贵族——这两个大致相同的概念——作为价值得到承认的空间里如此)。而且这种法定的出身资本由于提早获得合法文化在文化训练方面提供的优势而得到增加,这些优势包括餐桌礼仪或谈话艺术、音乐修养或礼节意识、打网球或语言的发音:被归并的前代文化资本发挥一种(在初始的优势和投资或贴现这双重意义上的)领先作用,这种领先一上来就为新来者提供了在熟悉的模式中获得的文化的榜样,使他有可能从最初,也就是说以最无意识的和最让人觉察不到的方式,开始获得合法文化的基本要素——并且省去了脱离传统文化、矫正和修正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对于修正不适当的训练的作用是必要的。合法方式的价值来自这个事实,即它们表现了最稀有的获得条件,也就是一种对于时间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心照不宣地被认为是卓越的典型形式:拥有“从前”也就是拥有这些来自过去、来自被积累、被储存、被凝结的历史的现存之物,如贵族爵位和尊贵称号、城堡或“历史住宅”、绘画和收藏、陈年老酒和古代家具,这就是通过所有这些物支配时间这种最彻底地摆脱控制的东西,这些物的共同点是只能在时间中、通过时间、与时间对抗,也就是通过遗产,以及不妨在这里使用的词语——“资历”才获得的,或者多亏了某些配置才获得的,这些配置如同对古

物的喜好,同样只能在时间中获得,而且这些配置的使用意味着从容不迫的空闲。

一切群体都倾向于赋予自己超越个人行动者的有限性以达到永存的手段,每个群体又都体现在个人行动者身上(这是涂尔干所说的基本直觉之一)。因此,这个群体建立了一整套机制,如提供普遍存在和永久性的委托、代表和象征化。代表(比如国王)是永恒的;正如坎特罗威茨^①所指出的,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生物的、必死的和受生物缺陷、激情或愚蠢支配的身体,另一个是政治的、不朽的、非物质的和摆脱了缺陷和弱点的身体(H.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他可以通过将他被授予的权力委托给别人而获得普遍存在:有时人们谈到“无所不在的税务”(fiscus ubique presens),而且,正如波斯特(Post)指出的,拥有全部行为权力的代表,多亏他执行全部运作(procuratio ad omnia facienda),“能做委任者本人能做的一切”(cf. Gaines Post, *Plena Potestas and Consent, in Studies in Medieval Legal Thought, Public Law and the State, 1100-132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92-162)。法

^① 坎特罗威茨(Ernst H. Kantorowicz, 1895-1963),德裔美国历史学家。他致力于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和王权的神圣化研究。他最有名的著作《国王的两身体: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研究》(1957)揭示了历史学家、神学家和教会法学者如何构建国王的形象和国王的责任。其他著作有《菲特烈二世传》(1927)、《为祖国而死》(1984)等。——译者

人不死(*Universitas non moritur*)。从群体的角度来看,死亡不过是一个偶然,而且人格化的群体组织起来,以使曾经暂时代表群体的必死的人即代理人、代表、受委托人、代言人的死亡不影响群体的存在和群体在其中自我实现的功能的存在:尊严不死(*dignitas non moritur*)。若这一点成立(应该更系统地确定这一点),那么资本会把集体产生和积累的、真正克服人类局限性的手段据为己有。在有可能避免总体异化的这些工具中,包括使(有时在活着时通过一种同义选用)被表现的人变得不朽的表象、画像或雕像,或进行颂扬并“留给后世”的像青铜一样永恒的纪念碑、陵墓、著作,尤其是让人进入值得认识和学习的合法历史的历史著作——公众尤其是资产阶级公众赋予历史学家即科学的永久化大师的特殊地位由此而来——,还有群体借以给予死者甚至活人和有影响的人以尊崇和认可的赞辞的纪念仪式,等等。我们看到,永恒的生活是最珍贵的社会特权之一,永久化的资格当然依靠负责确保永久化的群体的资格和范围,因而能够从家庭组织的一周弥撒扩展到每年庆祝的国家节日。

- 79 如果以前的分析让人想到一种本质分析(尽管似乎离海德格尔及其“旧式中学”很远),这是因为大部分群体为了显示绝对的、无法克服的、最终的差别而利用了时间的不可逆转性,这种不可逆转性给予任何一种建立在继承顺序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一种不可改变的严格性:继承的把持者与觊觎者,父亲与儿子、拥有者与继承者、师父与徒弟、前任与继任,没有被任何东西分开,倘若不是时

间；但所有这些社会机制在这里都是为了把这种时间间隔变成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在使不同的方式也就是不同的获得方式对立的斗争中，统治者总是与最不易觉察的和最不可见的获得方式有关：就是这一点建立了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的不变量并赋予某些主题以常青的模样，但这些主题也如同所有关于天生趣味或“学究式”笨拙的上流社会话语的主题一样，在地点和时间上有严格限制。

对“经典作品”的普通阅读正是在对社会意义的实践支配的基础上实现的，而社会意义是由功能的和结构的同源性保证的，或者进一步说，这是因为这涉及的是一种实践的应用，即文学引用这种完全特殊的话语应用，这种注定以辩护者和证人的名义出现的传唤，这种传唤是以一种装扮成智力联系的社会联系为基础向过去的一位作者发出的。实际上，对意义的实践意识并未达到对使这种意识成为可能的社会亲缘关系的客观化——这就与所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驰，也就是导致文本和阅读的双重相对化，这种实践意识既允许有社会应用，又允许否认这种应用的社会基础。

然而，发现不变因素不应该导致将斗争的一种特定状况永久化，而且一种真正的比较研究应该考虑斗争体现的特定形式，以及各阶层之间的客观关系发生变化时斗争在其中得以表达的主题。比如，在17世纪下半叶，上流社会和宫廷的权力扩大，再加上上流社会的人倾向于变得更有修养，这就缩短了学者与社交家之间的差距，促进了一种新型文人的发展，这类文人以博学的修辞大师和

社交家耶稣会会士拉潘^①尤其是布乌尔^②为代表，⁸⁰他们频繁接触艺术家和上流社会的人，并促使产生一种上流社会要求和学校要求的综合（这样，就将讨论的中心从值得被研究的主题范畴转移到80 这些主题能够在其中得到处理的风格范畴）。⁸¹ 19 世纪的德国大学与大公宫廷之间的关系状况表现了权力关系的另一种状态，学校的功能和宫廷的功能的另一种表象的概貌来自这种状态：正如诺伯特·埃利亚斯^③指出的，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融入宫廷的上流社会早得多且彻底得多；支配学校教育系统和所有受到它培养的人的风格传统和礼仪形式，以及特

① 拉潘(René Rapin, 1621-1687), 法国诗人、神学家和历史学家, 耶稣会会士。主要著作有《对这个时代的雄辩用途的思考》(1672)、《基督教的精神》(1672)、《冉森教派的历史》(1861)、《关于教会、上流社会、宫廷、城市和冉森教派的回忆录》(1865)等。——译者

② 布乌尔(Dominique Bouhours, 1628-1702), 法国耶稣会会士, 语法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 对布瓦洛、拉辛等影响很大。主要著作有《阿里斯特和欧仁的谈话——对话录》(1671)等。——译者

③ G. Doncieux, *Un jésuite homme de lettres au XVIIe siècle. Le Père Bouhours*, Paris, Hachette, 1886.

⁸⁰ 同样, 今天, 越来越多的大商业资产阶级倾向于求助于教育体系(在法国尤其是重点大学), 这个事实在本质上改变了社交家与学者之间的关系形式——文化优越越来越属于那些集两种获得方式于一身的人——与此同时, 改变了“社交家”与学者之间的对立表现于其中的常见对立的内容(cf. P. Bourdieu et M. de Saint-Martin, *Le Patronat,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978, 20-21, pp. 3-82)。

③ 诺伯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 1897-1990), 德国社会学家。作为建构论社会学的先驱, 他试图在研究中超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传统对立。他反对历史进化论的观念, 在其代表作《文明的进程》(1939/1969)中提出西方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克制冲动的结果, 揭示了宫廷社会在这个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的重要作用。他还将研究扩展到艺术、音乐、体育、与时间和死亡的关系、暴力的控制、社会学方法论等方面, 写出了《宫廷社会》(1969)、《社会学是什么》(1970)、《介入与距离》(1983)、《论时间》(1984)、《个人的社会》(1987)等著作。——译者

别是对语言和社交思想惯例的关注,在法国的状况中,在宫廷社会内部找到了其根源,而在德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知识分子,是通过反对宫廷和宫廷引入的法国模式形成的,他们将他们关于“社交活动”的观念概括为以轻松和浮浅为标志的“文明”与以严肃、深刻和真诚为定义的“文化”之间的对立。⁸² 这就是说,学者与社交家之间的经典对立以相同的但受到一种颠倒的价值影响的内容重新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只有通过贬低上流社会的道德证明他们自身的道德,尤其是他们自身“实现道德的方式”,才能表现为自主的阶层。无论如何,“学究”的状况从未彻底让人无忧:由于他倾向于与民众对立并与社交家站在一边接受趣味天生的观念——社交家完全有理由接受这种观念,因为他们脱离不了自己的出身——这种观念构成了他的选择的唯一绝对的保证,但他不得不证明他的成果的价值,以及获取活动、康德所说的“内心培养的长久努力”本身的价值以反对社交家,这种长久的努力,在社交家眼中是瑕疵,在他自己眼中则构成了他的全部价值。

当接触艺术作品的恰当方式和获得这种方式的正确方式受到质疑时,学院人士即后天获得知识和品质的人的困窘便显露出来,而且这种矛盾处在他们的所有美学理论的核心,更不用说也处在他们为了创立一种艺术教育的企图的核心。天赋的观念势力过强,即使在学校教育世界也是如此,以至对于一种理性教育的权力的信仰无法确立,这种理性教育力图将熟习(*familiarité*)的实践模式简化为标准化的规则;尽管这种

⁸² N. Elias, *La civilisation des mœurs*, Paris, Calmann-Lévy, 1973.

对艺术的“自然权利”的实践确认被证明是一些人的自然武器，这些人本身拥有知识和概念，试图贬低无概念的经验 and 快乐的捍卫者的神圣权利，情况还是如此。比如，应该回顾所有围绕艺术教育（或者，更确切地，围绕绘画）的论战：对一些人而言，艺术教育是措辞上的矛盾，他们认为美无法传授和学习，美是有天赋的大师传给命中注定的弟子的一种恩惠；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艺术教育是一个普通的教育领地（比如，我们想到了第三共和国初期关于图画课是否纳入普通教育的争论，这场争论使得理性教育的代言人——如吉约姆^①——与超凡魅力表象的捍卫者——如拉韦松^②——互相对立）。

经验与知识

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乎利害的、但理由充分的幻想。那些援引经验以反对知识的人具有文化的家庭训练与文化的学校教育训练之间对立的全部特性：资产阶级文化及资产阶级与文化的关系的不可模仿的特征来自这个事实，即如同格勒图森^③所说的民间宗

① 吉约姆（James Guillaume, 1844-1916），瑞士无政府主义者、历史学家，编辑出版了巴枯宁的《作品》（1908），曾主编《小学教育和知识辞典》（1882-1887），代表作是《国际：文献与回忆》（1985）。——译者

② 拉韦松（Jean Gaspard Felix Ravaisson-Mollien, 1813-1900），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曾任法国公共教育总监和高等教育总监，柏格森的老师。主要著作有《论习惯》（1838）、《论亚里士多德》（1837-1845）、《关于法国 19 世纪哲学的报告》（1867）等。——译者

③ 格勒图森（Bernard Groethylen, 1880-1946），法国作家和哲学家，狄尔泰和齐美尔的学生。他从事法国革命研究，探索资产阶级思想的形成原因。主要著作有《让·雅克·卢梭》（1959）、《神话与肖像》（1947）、《法国革命哲学》（1956）等。——译者

教,这种文化和这种关系并非借助话语,而是通过很早进入一个有修养的人、实践和物的世界而形成。置身于一个不仅听音乐(比如今天的高保真组合音响或电台)而且演奏音乐(比如资产阶级回忆录的“音乐家母亲”)的家庭,更何况,很早就演奏一种“高贵的”乐器——尤其是钢琴。⁸³其作用至少是产生一种与音乐更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一向有别于一些人与音乐有点疏远的、静观的和通常高谈阔论的关系,这些人是通过音乐会并首先通过唱片接触音乐的,这种关系有点像很晚才在博物馆几近学校教育的气氛中发现绘画的人与绘画的关系,这些人与绘画的关系有别于那些出生在一个被艺术品萦绕的空间的人与绘画的关系,艺术品作为家庭的和熟悉的财产是世代代积累下来的,是他们的财富和他们的良好趣味的具体证明,有时是果酱和刺绣衬衣那样的“家庭产品”。

法定的熟习表现在比如关于艺术作品的获取机会和条件的信息中,这种信息不仅依靠物质和文化占有能力,还依靠对一个社会空间的以往隶属关系,艺术作为占有的对象,在这个社会空间里以熟悉的和个人的物品的形式存在。因此在应文化部的要求所做的调查中(S. C., VII),那些被问到以什么价

⁸³ 与社会出身相连的差别也许从未像在从事一种造型艺术或演奏一种乐器方面表现得那样明显;这些能力无论在获得方面还是运用方面,不仅意味着与艺术和文化世界中的一种古老建制相关的配置,而且意味着经济手段(尤其在钢琴方面)和自由时间,这些能力在学校教育水平相等的情况下,随社会出身变化很大;因此在获得业士文凭的人中,出身统治阶级的人有11.5%说他们经常演奏一种乐器,而出身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人只有5%说他们经常演奏一种乐器;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中,相应的比例则是22.5%和5%;持有最稀有文凭的人相对而言不大从事造型艺术,在文凭相同的情况下,从事造型艺术的人更多地是来自于统治阶级。

格“能在今天买到一位当代职业艺术家的一幅石版画或一幅丝网印刷原件”时给出答案的人,随所属的阶级变化很大,而且从在农业劳动者中占10.2%,在普通工人和普通熟练工人中占13.2%,在职员中占17.6%,上升到在高级管理人员和自由职业成员中占66.6%。

选择《左手钢琴协奏曲》(在演奏一种乐器——尤其是钢琴——的人中比在其他人中常见得多)或《儿童与巫术》^①这类作品与社会出身的联系比与学校教育资本的联系更紧密。相反,在《平均律古钢琴曲集》和《赋格艺术》这类作品的状况中,与学校教育资本的关联比与家庭出身的关联更大。无论这些指标多么不完善,与被等级化的和能够划分等级的文化作品世界的不同关系通过这些指标显示出来,这些关系与彼此之间互相联系的一系列差别密切相关,并在文化资本的——家庭的和学校教育的或专属学校教育的——获得方式(获得方式的延续作用)中找到了它们的根源。因此,当罗兰·巴特把与音乐的一种关系即一种早期的、家庭的、“实践的”认识产生的关系变成美学时,他把审美享乐描述为听众的身体与演奏家的“内在”身体之间的一种直接交流,演奏家的“内在”身体表现在歌唱者的“声音的纹理”(或羽管键琴演奏者的“手指的茧子”)中,实际上他提到的就是两种获得方式之间的对立。一方面,是唱片爱好者的一种音乐(与一种来自“倾听的延伸和演奏的消失”的需求有关)。“有表现力的、戏剧性的、情感清晰的”交流的、理解的“艺术”：“这种文化……很想要艺术、音乐,只要

① 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抒情幻想作品,显示出卓越的配器手法。——译者

这种艺术、这种音乐明白易懂，‘传达’一种感情并表现一种所指（诗的‘意义’）；这种艺术免受享乐的影响（将享乐还原为一种熟知的、标准化的感情），并让主体与音乐中可以说出的东西，即与学校、评论界、舆论断然说出的东西达成妥协”⁸⁴。另一方面，是一种喜欢感觉胜过意义，痛恨雄辩、浮夸、夸张、悲怆、表现力和戏剧性的艺术：这是法国歌曲、迪帕克^①、后期的福雷^②、德彪西、人们在另外一个时代称为纯音乐的一切、钢琴这种母性乐器表达的内心感情风格，以及资产阶级沙龙的亲密。与音乐的两种关系总是无意多于有意地彼此参照以确定自身，在这两种关系的对比中——过去的艺术家庞兹拉^③或科尔托^④，连他们的缺陷都受到喜爱，因为这些缺陷令人想起爱好者的自由，对他们的喜爱包含着对符合大众产业的完美要求的当今演奏家的拒绝和厌恶——我们发现了学者与社交家之间的古老对立，学者与规范（在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规则因而与学校和评论界有关联，而社交家处于本性和自然一边，满足于感觉，或如同人们今天喜欢说的，满足于享乐，并将一

⁸⁴ R. Barthes, « Le grain de la voix », *Musique en jeu*, n°9, novembre 1972, pp. 57-63.

① 迪帕克(Henri Duparc, 1848-1933), 法国作曲家, 作品包括交响诗和歌曲, 曾为波德莱尔等诗人的诗歌谱曲。——译者

② 福雷(Gabriel Fauré, 1845-1924), 法国作曲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法国音乐家之一。他的创作手法基本上是古典的, 作品以旋律的细腻和曲式的平衡独树一帜。——译者

③ 庞兹拉(Charles Panzera, 1896-1976), 瑞士男中音歌唱家。擅长演唱马斯奈、柏辽兹、德彪西的作品和室内乐作品, 福雷的歌曲《虚幻界》就是为他创作的。——译者

④ 科尔托(Alfred Cortot, 1877-1962), 法国钢琴家, 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钢琴家和教育家, 擅长演奏肖邦、舒曼、李斯特的作品。在《钢琴技巧的理性原则》一书中, 他强调艺术家的主观性和个人风格离不开手指和肌肉的运动。学院派钢琴家责备他的演奏过分自由。——译者

切唯智主义、说教主义、学究气的痕迹从艺术经验中除掉。

出生的世界

严格来说,没有什么物质遗产不同时是一种文化遗产的,家庭财产的功能不仅是在物质上证明世系的古老和连续性,并由此承认世系上与时间的永恒密不可分的社会身份,而且在实践上促进它的道德再生产,也就是价值、美德和能力的传承,价值、美德和能力建立了与资产阶级王朝的合法隶属关系。通过日常接触古物或定期光顾古玩店或画廊,或者更简单地,通过进入一个熟悉的和私人的物品的空间,如里尔克所说的“在那里的、没有不可告人的意义,只有美好的、朴素的、确定的”物品的空间而获得的,显然是某种“趣味”,这种趣味不是别的,恰恰是一种与有趣味的事物的即刻熟悉的关系;这也是隶属于一个世界之感,这个世界更有礼貌更有教养,这个世界在它的完美、和谐、美丽中找到其存在理由,这个世界曾经产生贝多芬和莫扎特而且不断地再生产能够演奏和鉴赏他们的人;这最终是一种被纳入习性的最深处的直接赞同,对喜欢与厌恶、同情与反感、幻觉与憎恨的赞同,而且它比公开的观点更能在无意识中建立一个阶级的统一性。

84 如果人们可以在一个群体的家具和服装的风格中解读它的整个生活风格,这不仅因为这些属性是曾经决定这个群体选择的经济和文化必然的体现,而且因为体现在日常用品,体现在它们的奢华或简陋、“高雅”或“平庸”、“美”或“丑”之中的社会关系,通过身体经验强迫人接受,这些身体经验,与天然羊毛地毯可靠而柔和的触感或裂开的刺目的地漆布的冰冷而粗劣的触感,漂白水刺鼻、浓

重、强烈的气味,或作为一种中和味道的不易让人觉察的芳香一样,都是深刻地无意识的。⁸⁵ 每种室内装饰都以其语言表达了居住者的现在甚至过去的状况,说出了不炫耀继承来的财富的自信,新贵的过分张扬的傲慢,穷人隐藏的贫困或企图过超出财力的生活的“穷亲戚”的镀金的贫困:我们想到了 D. H. 劳伦斯的小说《木马赢家》(*The Rocking-Horse Winner*)中的那个小男孩,他在整幢房子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听到了一种低语:“一定要有更多的钱”,尽管他的房间堆满了昂贵的玩具。社会精神分析无疑应该清点这种性质的经验,这种精神分析致力于把握一种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体现在事物中当然也体现在人身上的社会关系,不知不觉地被归并,因此进入一种与世界和他人的持久关系中,比如这种关系可表现为对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对噪音、对拥挤、对身体暴力或言语暴力等的忍受极限,而占有文化财产的方式是这种关系的一个维度。⁸⁶

获得方式的作用在日常生活的最平常选择如家具、服装或菜肴的选择中表现得从未如此明显,这些选择尤其揭示了深刻而长久的配置,因为这些选择处于学校教育制度的干预场之外,可以说

⁸⁵ 存在着一套使物的等级符合人的等级的物品外交礼仪。因此我们在关于用来接待共和国总统的外宾的马里尼公馆的一篇文章中可以读到:“礼仪非常严格:等级参照房间面积、家具风格和帷幔质地来确立。稀有的家具和里昂丝绸用于专为国家首脑准备的房间;拿破仑时代的桃花心木和德拉纶丝绒用在二楼为总理准备的房间;缎子和印花棉布用在三楼为技术顾问准备的房间。”(J. Michel, *Le Monde*, 27 janvier 1975)

⁸⁶ 只要强调这一点,即被占有物,无论是什么,都是被客观化了的社会(阶级)关系,就可以说明一种物品世界的社会学会朝什么方面发展,这种社会学不是装扮成现象学-逻辑学-符号学的分析的一种投射式检验的记录(我想到了 J. Baudrillard, *Le système des objets*, Paris, Gallimard, 1968)。

85 它们应该面对不加掩饰的趣味,无需考虑任何明确的规定或禁止,若非不怎么合法的合法化机构如女性杂志或家居周刊提出的规定或禁止。⁸⁷如果说为形容室内装饰或拥有的家具的来源而选用的修饰词与出身的社会地位而非学历的关系更密切(这与对摄影的判断或对作曲家的了解相反),这是因为无疑没什么比投入到服装、家具和烹饪,以及更确切地说,投入到购买服装、家具和食物的方式中的配置和知识更直接地依靠早期训练,尤其是在一切明确的教育活动之外完成的训练。因此,获取家具的方式(大商店、古董店、店铺、旧货市场)至少既依靠社会出身又依靠教育水平:在学校教育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出身资产阶级的统治阶级成员,尤其在巴黎,比出身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人更经常在古董店买家具,我们知道前者比他人更经常地继承一部分家具,而后者往往在大商店、专卖店或旧货市场买家具(经常去旧货市场的,一方面,是处于上升阶段的统治阶级成员,他们拥有最雄厚的学校教育资本;另一方面,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一部分统治阶级成员,也就是说只受过几年大学教育的人,他们拥有的学校教育资本少于他们的出身原本可能保证的)(参见表5)。

无疑,我们会在对食物的偏好中发现原始训练的最强大最永

⁸⁷ 这就意味着,无论学校教育系统当前运行的状况多么不完善,一切制度化的教育活动所包含的最低限度的理性化,尤其是通过实践状态起作用的分类“意识”转化为部分被规范化的知识(让我们想想文学史及其时代、体裁和风格的划分)这个过程,其作用是有助于至少在那些经过最严格挑选的幸存者那里减少由继承而来的“意识”支配的部分,进而减少与经济和文化遗产相关的差别。同样确实的是,在其他地方,这些差别继续起作用,只要为区分而斗争的逻辑将它真正的赌注放在这些地方,这些差别就重新大行其道。显然,这种逻辑总是倾向于这样做。

恒的标志,原始训练在远离出生世界时或出生世界覆灭之后仍会长久存在并坚定地支持对出生世界的眷恋;出生世界其实首先是整个母亲世界,原始趣味和最初食物的世界,与文化产品的原型形式之间的原型关系的世界,在这种关系中,制造快乐是快乐和选择快乐之配置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选择快乐之配置是在快乐中获得的。⁸⁸ 因此,某种东西进入最“纯粹的”、任何身体植入痕迹都被彻底清除的快乐(如同《斐莱布篇》^①中将这些快乐专门留给“少数人”的“独特而纯粹的音调”)中并不是偶然的,这种东西如同在

⁸⁸ 我们力图把握食物上的偏好时,对最经济因而最“概括”问题的寻求,导致我们考察不同寻常的场合中的烹饪,即表象状况中“被展示的”生活风格(家具也至少通过它的一个功能构成了这种生活风格)状况中的自我表现方式的相关指标。为了彻底理解这方面的选择,应该考虑一个特别复杂的因素系统:人们愿意招待别人的饮食的风格,也许构成人们愿意或避免给别人的印象的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因此它是一个因素系统的必然表达,这些因素除了包括在经济和文化等级中占据的位置的指标之外,还包括经济轨迹、社会轨迹、文化轨迹。在这些条件中没有什么让人惊奇的,除了我们能够小资产阶级中更好地把握这些条件的作用:地位稳固的小资产阶级成员比新小资产阶级成员更经常地以丰盛而美味、简单而摆放好看的菜肴招待朋友,而新小资产阶级成员更喜欢以创新的和有异国情调的或非常随便的菜肴招待客人。但是,我们此外还注意到与轨迹相连的差别:如果出身中产阶级和民众阶级的新小资产阶级成员有时会说喜欢以丰盛而美味的菜肴招待客人,而那些出身高等阶级的人从不这样,他们反而愿意以创新的和有异国情调的菜肴招待客人。在地位稳固的小资产阶级中,以丰盛而美味的菜肴招待客人的倾向,在处于没落地位的人身上和出身民众阶级处于上升地位的人身上一样强烈;但是,前者从不说以非常随便的或创新的和有异国情调的菜肴招待客人,而后者偶尔以这样的菜肴招待朋友(但是当然不如新小资产阶级成员那么经常)。

^① 柏拉图的晚期对话录。在这篇苏格拉底与斐莱布和普罗塔库关于快乐的本质的对话中,苏格拉底说:“有柔和清晰的声音,它们发出一种纯粹的音调,它们的美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属于自身的,随之而来的快乐也是它们自身固有的。”“应该说,学习的快乐……不适于大部分人,只适于很少的人”。总的来说,柏拉图认为,快乐就是源于一种满足的感觉。——译者

品尝食物味道的更“粗俗”的快乐中,作为一切形式的趣味的原型,直接诉诸最古老和最深刻的经验,决定和限定苦/甜、美味/无味、热/冷、粗俗/雅致、严肃/欢乐这些原始对立的经验,这些对立无论对美食评论还是对唯美主义者的高雅注释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依照艺术、体裁和风格划分的不同等级上,艺术作品从来也不仅仅是这种头脑的事(*cosa mentale*),即唯智主义观念将艺术作品变成的这种仅供阅读、解读和阐释的话语。艺术作品是涂尔干意义上的一种技艺的产物,也就是一种“无理论的纯粹实践”的产物,即使这并非来自一种简单的模仿,一种象征的智力体操,艺术作品也总是包含着由于某种并非如祝圣者所愿的过度而是由于欠缺而变得不可言喻的东西,某种可以说是像音乐的节奏或颜色的风格那样从身体到身体也就是说在言语和概念之外传递的东西。艺术也是“身体之物”,而且最“纯粹”、最“代表心灵”的艺术,音乐,也许就是最有身体特征的。音乐与“心灵状况”相连,而“心灵状况”也是“身体状况”,或者如人们所说是情绪,它让人狂喜,支配人、鼓动人并打动人:与其说它存在于言语之中,不如说它存在于言语之外,存在于身体的动作和运动中,存在于节奏中。皮亚杰在某处说,节奏如同一切支配趣味的东西一样,表现了处于身体与精神连接处的功能的特征,如狂热与减缓、渐强与渐弱、紧张与放松。⁸⁹ 这无疑

⁸⁹ 在这里,我们联想到的与其说是节奏的色情理论(色情理论是为了解释节奏的加快而引用的,因为这种加快导向一个顶峰,紧接着是一种休止),不如说是另外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援引音乐的速度与内心节奏之间的一种更大的一致性或呼应,这种一致性或呼应是由这种产生符合节奏的速度的倾向显示出来的(cf. P. Fraisse, *Les structures rythmiques*, Paris, Erasme, 1956; *Psychologie du temps*, 2ème ed., Paris, PUF, 1967)。

使得,关于音乐的话语在脱离纯粹的技艺之后只能通过形容词或感叹词表达。如同神秘主义者用人类的爱的语言谈论神圣的爱,对音乐引起的快乐的最确切展示是能够再现一种经验的独特形式的展示,这种经验与食物趣味一样,与身体和身体经验相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表5 统治阶级中按照社会出身和文凭购买家具的状况

文凭	社会出身	大商店	专卖店	旧货市场	拍卖行	古董店
低于业士	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	25.5	41.5	11.0	14.5	33.5
	高等阶级	11.5	23.5	15.0	31.5	43.5
普通大学	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	13.5	36.5	4.5	32.0	4.5
	高等阶级	6.0	24.5	30.5	20.5	65.5
学士	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	11.0	28.5	11.0	11.0	21.5
	高等阶级	4.5	21.5	21.5	14.5	49.0
学衔	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	21.5	46.5	32.0	21.5	43.0
重点大学	高等阶级	18.0	29.0	8.0	13.0	60.5

这指的是曾在这些不同地点购买家具的人的百分比。

继承的资本与获得的资本

88

因此,与学校教育资本的关系无法解释的且主要表现在与社会出身的关系上的差别,可能取决于实际拥有的文化资本的获得方式上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也可能取决于这种资本被学历承认和保证的程度上的差别,当实际上拥有的或多或少的一部分资本直接从家庭继承甚或当它通过学校教育获得时,这部分资本可能并没有得到学校教育的认可。鉴于获得方式的延续作用的重要性,同样的学历保证的可能是与文化的非常不同的关系,而且随着学校教育等级的提高和学校认可的利用知识方式的价值相对于知

识被赋予的价值的增加,学历越来越无法保证与文化的关系。如果作为被保证的文化资本的等量学校教育资本,可能对应于社会收益不等量的文化资本,这首先是因为学校教育制度垄断了资格证明,因而支配着继承的文化资本向学校教育资本的转化,但是它没有垄断文化资本的生产:学校教育制度彻底或不彻底地对继承的资本予以认可(继承的文化资本的不均等转化作用),这是因为,按照时间同时按照水平和领域,学校教育制度所要求的東西可彻底或不彻底地还原为“继承人”所带来的东西,因为学校教育制度或多或少承认其他种类的被归并资本和其他配置(比如对这种制度本身的顺从)的价值。⁹⁰

⁹⁰ 我们完全无需强调决定继承的文化资本有差别地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本的因素系统(应该严格地在整体上的家庭群体范围内衡量这个系统),我们仅仅满足于强调阶级的精神气质的影响,以及它与学校和学校认可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被占据的位置和这个位置的再生产依赖学校的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决定了在学校教育游戏和赌注中投入的力量和文化投资策略(通过学校和专业的选择、用于模糊的或明确的传授上的时间等),并由此有助于决定继承的文化资本的差别性收益;或者满足于强调性别的精神气质的影响,性别的精神气质是在一个确定的社会阶级中实现的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内在化的产物,它也有助于支配投资,比如,促使女孩倾向于学习文学和艺术,男孩倾向于学习科学或经济-法律。同样要强调学校教育制度自身的有效性,学校教育制度既通过认可继承的文化资本(既借助于明确认可,比如成绩、学历,也借助于或多或少有声望的学科、专业或学校导向),又通过灌输或多或少与继承的知识重合的学校教育知识发挥作用,于是,一方面,是最尖端的科学学习,另一方面,是一些学校,比如政治学院或国家行政学校,这些学校的主要作用也许是支配和认可一种等级的才能,这些学校的极端是卢浮宫学校*,业余爱好者的学校的完美形式,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措辞的话。

* 卢浮宫学校,法国大学,建立于1882年,设有艺术史、考古学、铭文学、博物馆学等专业,还开设夜校和暑期课程,供业余爱好者自修。——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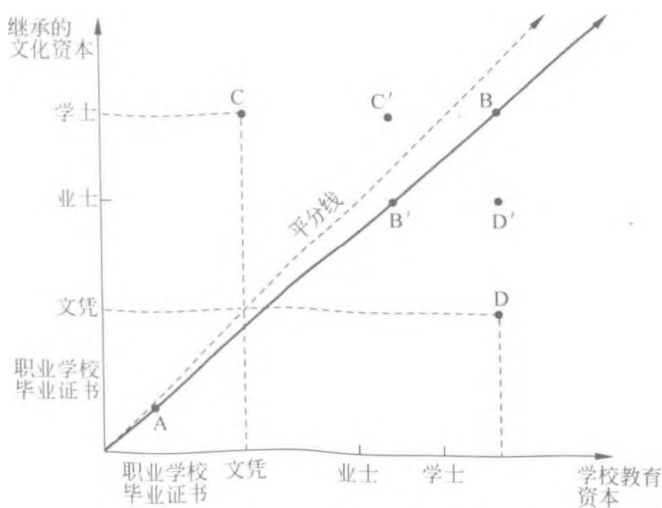


图3 继承的资本与学校教育资本之间的关系

拥有丰厚的学校教育资本的人，由于继承了丰厚的文化 89
 资本，同时拥有文化贵族的爵位和领地，合法从属性提供的信心和熟习保证的自如(B)，他们不仅与那些不具备学校教育资本和继承的文化资本的人(A)(因而与所有处在标志着从文化资本到学校教育资本的彻底再转化的坐标轴下方的人)对立。而且一方面，他们与在继承的文化资本相同的情况下获得低等的学校教育资本的那些人(C或C') (或继承的文化资本比其拥有的学校教育资本多的那些人——这就是C'相对于B'或D'相对于D的状况)对立，后者离他们比离持有相同文凭的人更近，尤其在“自由文化”方面；另一方面他们与拥有类似的学校教育资本的人对立，后者开始时并不拥有同样多的文化资本(D或D')，且与文化保持一种不那么亲近却更有

学校教育性质的关系,他们的文化更多来自学校而非家庭(这些次要对立在坐标轴的每个高度上都找到)。

我们可以为开始时和考察时刻所拥有的每种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画一个类似的图表,并接下来确定(按其总量和结构被确定的)原始资本与以相同方式被决定的既得资本(这样我们就有了在所有种类的资本上都居于衰退的人或在一种资本上居于衰退而在其他资本上居于上升——转行——的人等)之间关系的可能状况的空间。只要足够细致地分析资本的种类(比如在文化资本内部使文学资本、科学资本或法律-经济资本这些亚类互相对照)或层次,就能重新发现每个从经验上被考察的状况的几乎无限的全部复杂性和多样性。为了做到彻底的严格,应该考虑结构变化比如名义学历的贬值,这种贬值出现在学校教育系统的利用得到加强的时期,比如今天。⁹¹也应该考虑学习年限与获得的学历之间的差距(原始资本越多、学校教育越普及,这种差距的可能性越大——因此这种差距今天甚至触及了民众阶级,他们的子女离校时常常拿不到高等教育修业证书):于是我们看到,为了确切地解释某些实践(尤其是自学),应该在学历和学习年限之外考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自信或窘迫、满足或怨恨等的根源)。⁹²

90

⁹¹ 我们想通过把真正的同等学历点放在平分线之下来代表这种贬值,平分线标志着名义学历的价值同等。

⁹² 我们也可以考虑毕业年龄与取得文凭的合法年龄(比如17岁中学毕业或参加中学会考的年龄限制)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文化资本借以变成学校教育资本的媒介之一是入学的早晚。

学校教育资本与实际上拥有的文化资本之间的差距是拥有相同的学校教育资本的人之间的差别的根源,这种差距也可以来自这个事实,即同样的学历可以与非常不均等的受教育时间相对应(从学校教育中获得的文化资本的不均等转化的作用):一年或多年学习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可能实际上不被文凭承认——所有在三年级和最后一个学年之间辍学的人,或在另外一个层次上,那些在学院待了一两年而没有获得文凭的人就属于这种状况。但是此外,鉴于随着不同阶级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的机遇增加,这种差距的出现频率增加,属于(以年龄段的形式被把握的)不同代的行动者很有可能在因教师、教育方法、社会招生等而非常不同的学校教育机构中,花在学习上的年限相当不同(由此产生了所有相关作用,其中当然包括提高不被认可的能力,但也包括获得一种与文化的不同关系——“大学生化”作用——等),但获得一种相同的文凭。由此而来的是,与社会轨迹和继承的文化资本总量相关的差别,同时也是这样一些差别,它们尤其在出身小资产阶级或民众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成员身上表现明显(尤其表现在地位稳固的小资产阶级中),反映了教育系统与社会阶级结构之间关系的状态的变化:与这些不同的生成方式相对应的,是与学校教育体系的不同关系,这些不同的关系表现在并非由学校教育制度保证的文化投入(也就是自学)的不同策略之中。

由于缺乏人们喜爱的书籍、报纸或周刊这些文化消费的 91

总体风格的更确切指标(比如《鸭鸣报》^①与《查理周刊》^②之间的对立或科普方面《科学与生活》与《心理学》之间的对立等),我们可以依赖调查提供的关于人们喜爱的歌手的情况。我们可以认为,为了解释这个事实,即在学校教育资本的所有水平上,最年轻的人比年纪较大的人更经常地选择年轻一代的歌手(弗朗索瓦丝·阿迪^③或约翰尼·阿利代^④),而后者更经常地选择更老的歌手(盖塔里或马里亚诺),只要考虑这些歌手出现在文化生产场的日期就够了。事实上,在业士中,最年轻的人更经常地列举雅克·杜埃(1920年出生,1963年在老鸽舍剧院^⑤举办了独唱音乐会)、雅克·布雷尔(1929年出生,自1953年在巴黎的三愚人剧院^⑥登台演出,1958年和1961年在奥林匹亚^⑦举办独唱音乐会),甚或莱奥·费雷(1916年出

① 法国讽刺周刊,历史最悠久的法国报刊之一,创立于1915年,以揭露法国公共领域(政治、经济、司法等)的丑闻闻名。它注重客观性,以调查为依据,因而与只刊登新闻的一般报纸对立。——译者

② 法国讽刺周刊,创立于1969年,宗旨是捍卫个人和集体自由。它由多个专栏组成,插图丰富,以新闻调查为主,涉及国外报道以及邪教、极右派、天主教、伊斯兰教、政治、文化等方面。——译者

③ 弗朗索瓦丝·阿迪(Françoise Hardy,1944),法国创作歌手。她的歌曲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法国极为风行,旋律忧伤,表达了对感情生活的怀疑、忧虑和疑惑。——译者

④ 约翰尼·阿利代(Johnny Hallyday,1943-),法国歌手、演员,从20世纪60年代直至今现在最著名的法国歌手,以演唱摇滚歌曲、布鲁斯和法国歌曲闻名。——译者

⑤ 法兰西喜剧院的剧场之一,创立于1913年。——译者

⑥ 法国著名音乐制作人雅克·卡内蒂(Jacques Canetti,1909-1997)1943年建立的法国歌曲剧场。——译者

⑦ 至今仍仍在使用的法国最古老音乐厅之一,创立于1893年,许多著名的法国艺术家(尤其是歌唱家)曾在这里演出。——译者

生,文学学士,自由政治科学学校毕业生,1946年在巴黎的夜总会登台演出),而最年长的人更经常地列举埃迪特·皮亚夫(1915年出生,1963年去世,1937年在ABC^①登台演出)、路易·马利亚诺(1920年出生,1945年在帕纳斯山娱乐场首演成功)、吉尔贝·贝科(1927年出生,首先在右岸的夜总会,然后在奥林匹亚出名,1954年得到殊荣:“贝科年”),甚或佩图拉·克拉克(1933年出生,1960年在奥林匹亚成为明星,1963年当选为“最受喜爱和最受欢迎的明星”)。我们看到,只有不仅考虑这些歌手被推出的年代或时代甚或他们在调查时登台的地点,也要并且尤其要考虑他们的歌曲风格或大或小的相似性——有的歌曲更“智性”,而别的歌曲更接近小资产阶级的轻歌剧或现实主义歌曲的趣味——还要考虑由两种非常不同的学校教育系统状况产生的两个学校教育代的文化配置,才能理解这些关系(关于传记材料,参见C. Brunschwig, L. J. Calvet, J. C. Klein, *100 ans de chanson française*, Paris, Ed. du Seuil, 1972 et *Who's Who in France*)。

同样的差别区分了技师阶层内部的学校教育代,最年轻的人与最年长的人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来自他们的总体能力,不如说来自他们的投入领域和“自由”:虽然他们像他们的长者那样阅读科学和技术著作,但他们更经常地对哲学随笔或诗歌感兴趣;他们不经常去博物馆,如果他们去,他们更常去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些倾向在他们当中那些来自中产阶级或

① 巴黎最古老的剧场之一。——译者

高等阶级的人(人数比在年长者当中相对多)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了解(相对而言)数量很多的音乐作品和作曲家,对现代艺术、哲学感兴趣,经常看电影。但是,也许将两代技师分得最清楚的东西,就是外在特征——尤其是穿戴方式——,还有公开的爱好:最年轻的人努力靠近大学生风格,说自己追求时尚和喜欢“符合他们的个性”的衣服,而最年长的人更经常选择“简朴而得体”或“裁剪正统”的衣服(地位稳固的小资产阶级的典型选择)。

老派自修者基本上是通过文化的尊敬来确定自身的,这种尊敬是一种既粗暴又过早排斥的结果,它导致一种狂热的和不明
92 方向的虔诚,因而这种虔诚注定要被合法文化的把持者当成一种可笑的致敬。⁹³“无教养的人”在一种非常正统的自修中寻找一种通过他们自身的手段接续一个突然被中断的轨迹的方式,在这些人身,与合法文化和把持这种文化权力的权威的关系,仍旧由他们曾经受到一个系统的排斥这个事实显示出来,这个系统能够把受排斥者对自身受排斥的认可强加给他们自身。相反,新派自修者经常保持在学校教育系统之中,直至达到一个相对高的水平,并且在这个没有得到充分回报的漫长接触过程中获得了与合法文化

⁹³ 显示老派自修之特点的对无能力和无文化资格的承认,尤其体现在出身民众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地位稳固的小资产阶级成员身上,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70%,与出身于相同阶级的新小资产阶级中的31%相对)都说,“绘画很好,但是很难”。资深自修者的文化丧失从未如此清楚地表现在别人即使不问他们也要证明自己已有文化的倾向中,因此通过他们对证明自身归属的关心表现出他们之受排斥(他们与出身高贵的人相反,后者不理睬能够暴露无知的提问或情形,因而掩盖了他们的无知)。

的一种既“无拘无束”又“不抱幻想”、既熟悉又幻灭的关系,这种关系与老自修者的遥远敬意毫无共同之处,尽管这种关系导致同样大量的狂热投入,但是这类投入被放在其他区域,被学校教育空间放弃或蔑视的领域如连环画或爵士乐,而非历史或天文学,被放在心理学(甚至类心理学)或生态学,而非考古学或地质学。⁹⁴ 人们归入反文化的所有作品(《查理周刊》、《热带草原回声》^①、《性政治》^②等)的读者无疑都集中在这些等级中,这些作品今天以一种报纸的形式供给知识先锋派的产品,如同其他作品“普及”(也就是说在合法接受者群体的范围之外传播)学院后卫派的产品(比如《历史》^③)或被认可的先锋派的产品(《新观察家》^④)一样。

把持对神圣事物之操纵的垄断权的人,即所有教会的博学者,从未对那些宣称“在他们自己身上发现传统权威的根源”并无需中 93
介就可取得他们看守的委托物的人有多大宽容:正如热尔肖姆·肖勒姆^⑤指出的,他们总是“对在神秘道路上行走的候选人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当障碍令朝圣者畏缩并迫使他因为新路对他变

⁹⁴ 数学和物理学变成了淘汰或降级的主要标准这个事实,也许有助于加强非理性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倾向,而与学校教育系统的一种双重关系和一种下降或虚假上升的社会轨迹加强了这种倾向(这种虚假轨迹的作用强加给所有以未来为目标的人,这种未来,在系统的一种先前状况中,包含在他们的学历或学校教育位置中)。

① 1972年创刊的法国连环画杂志,刊登时事、色情方面的内容。——译者

② 1975年创刊的法国杂志,探讨性与政治的关系,六年后停刊。——译者

③ 法国历史月刊,普及性的历史杂志,1909年创刊,刊登知名历史学家撰写的文章和收集的文献。——译者

④ 法国新闻周刊,1964年创刊,带有社会民主倾向的中左派报刊。——译者

⑤ 热尔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 1897-1982),犹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致力于研究犹太人对《旧约全书》的传统解释和犹太神秘主义,主要著作有《犹太神秘主义的主要趋向》(1943)等。——译者

得不可企及而满足于走老路时，从权威的观点来看就更好了。”⁹⁵但是制度的预先审查无需任何人实行控制或限制就可以发挥作用：当传统的自修者仍在等待学校教育制度为他们指明和打开一向或多或少直接由制度支配的普及和通俗的捷径时，⁹⁶最不受束缚的新自修者在异端中寻找他们的思想老师，这些异端仍旧行使传统上分配给权威的功能，也就是如肖勒姆所说的，“向新教徒宣告他应该预感到的经验”并为他“提供他能够借以表达这些经验的符号”。

两个市场

家庭和学校作为两种密不可分的场所发挥作用，首先，在一个时刻被认为必要的能力通过应用本身在这些场所中构成，其次，这些能力的价值也在这些场所中形成，这就是说这些场所作为市场发挥作用，而市场通过其肯定的或否定的认可，支配成绩，加强“可以接受”的，阻止不可接受的，注定要消灭没有价值的配置，如“没人响应”的玩笑，这类玩笑在另一个环境中，在另一个市场上，如人们所说的，是“可以接受的”，但在这里则显得“不合时宜”且只能引起“难堪”或“谴责”，再如把人变成了“书呆子”或“学究”的引用（比如引用拉丁文）等。换句话说，文化能力的获得与对文化投入的一种投资意识的无意识获得密不可分，这种投资意识是与能力发挥的客观机遇配合的产物，它促进了与这些机遇的预先配合，而且它本身是与文化的或近或远、或随便或尊敬、或社交式或学究气的关

⁹⁵ G. . Scholem, *La Kabbale et sa symbolique*, Paris, Payot, 1975, p. 35.

⁹⁶ 正如普及杂志的负责人和读者赋予这类制度保证人即大学或学院的高级头衔的持有者的价值所证明的。

系的一个维度,即获得场所与“文化价值中心”之间的客观关系的被归并形式。谈论投资意识,如同人们谈论礼节意识或界限意识一样,就是指明,尽管我们出于客观化的需要,求助于从经济学词汇中借鉴而来的词语,我们却丝毫不愿让人联想到以下这一点,即如同这些概念的日常用法无疑错误地暗示的,相应的行为是由对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来支配的。如果说文化是不承认(méconnaissance)的典型地点,这是因为,投资意识产生了客观上符合利益的客观机遇的策略,投资意识是这种机遇的产物,它保证了无需被当作利益来追求的利益并由此为那些以合法文化为第二天性的人提供了一种额外的利益,一种被视为且自视完全无关利害并完全清除所有贪得无厌的或唯利是图的文化用途的利益。这就是说投入(investissement)这个术语应该从经济投入——它在客观上一向如此,然而却不被承认——和精神分析赋予它的情感投入的双重意义上来理解,甚或从作为游戏产物和产生游戏的幻象、信仰、介入、投入游戏的意义上来理解。艺术爱好者除了他对艺术的爱之外不认识的向导,当他仿佛出于本能地趋向每时每刻应该爱的东西,如同这些不经意赚钱的商人一样,他并没有听从任何厚颜无耻的算计,而是听从他的由衷的快乐、他的真诚的热情,这种热情在这些方面是投资成功的条件之一。因此,比如,人们确实可以将合法性的等级(艺术、体裁等的等级)作用描述为社会心理学家非常熟悉的标签作用(贴言语标签)的一个特殊状况:如同人们对一个人的看法依照他们给他的伦理标签而变化,⁹⁴艺

⁹⁴ Cf. G. Razzan, *Ethnic Dislikes and Stereotypes*, *Journal of Abnormal Social Psychology*, 45, 1950, pp. 7-27.

术、体裁、作品、作者的价值依赖每时每刻都与它们连在一起的社会标志(比如出版地点等)。无论如何,文化投资意识致使人们总是热爱且总是真诚地热爱应该热爱的东西,而且这只有借助对数不清的符号的无意识辨认才能形成,这些符号每时每刻都在说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而无需受到对文化投资所提供的象征利益的追求的明确指导。(在古典音乐或爵士乐、戏剧或电影等方面的)特殊能力,依靠不同的市场即家庭市场、学校教育市场或职业市场密不可分地提供的积累、运用和发挥这种能力的机遇,也就是依靠这些市场支持这种能力之获得的程度,这些市场通过准许或保证这种能力得到利益来支持这种能力的获得,这些利益加强并刺激了新的投入。在不同的市场上运用文化能力并使之“获利”的机遇,尤其有助于确定“学校教育”投入和人们有时所说的“自由”投入,因为“自由”投入与学校组织的投入不同,似乎丝毫不受益于制度的限制或鼓励。

一个领域的合法程度越高,能力就越受到强制要求且越“有收益”,无能力也就越严格地受到制裁且“付出的代价”越大。⁹⁵ 但

⁹⁵ 以文化或与文化的关系的合法定义甚或不同领域如体裁、作品或作者的等级是一种永久斗争的赌注这个事实为理由,否认时刻存在着一种合法等级,是很幼稚的:比如力图通过承认一个尚不合法的领域或体裁如摄影或连环画的合法性、通过为不大受尊敬或声名狼藉的作者恢复名誉等来改变或推翻法定的等级制度的斗争,甚或力图推行与另一种获得方式相关的一种新占有方式的斗争,恰恰制造了合法性,这些斗争通过制造并非对这种或那种赌注的信仰而是对所有赌注的价值在其中生产和再生产的游戏的价值的信仰来制造合法性。把这些通过其自身的逻辑也就是以一种变相的形式来再生产群体之间等级关系的等级,当成一种以本质为依据的绝对秩序,也是同样幼稚的,尽管这些等级是从它们被当成如此之事实获得它们的大部分象征有效性,也就是它们的大部分合法性的。

是,这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点,即越趋向最合法的领域,与学校教育资本相关的统计差别就越大,与此同时,越趋向最不内行的人以为任由趣味和颜色自由支配的不合法领域,如烹饪或家居装饰、朋友或家具的选择,与社会轨迹(和资本结构)相关的统计学差别显得越大。正在合法化的领域如所谓的“智识”歌曲、摄影或爵士乐,则占据了一个中间位置。还是在这里,在场的属性(尤其是场为任何一个行动者“平均”提供的肯定或否定的认可的机遇)与行动者的属性之间的关系中,这些属性的“有效性”得以确定:因此,“自由”投入的倾向和这些投入趋向的地域,严格地说,并不依赖被考察的领域提供的“平均”利润率,而是依赖这个领域有可能为每个行动者或每个等级的特定行动者按照其资本的总量和结构提供的利润率。

“平均”利润率的等级大致对应于合法性程度的等级,古典文学甚或先锋派文学方面的一种高度修养,在学校教育市场和别处提供了高于电影方面或更不必说高于连环画、侦探小说或体育运动方面的一种高度修养的“平均”利益;但是,特殊利益,进而投入到受这些利益支配的东西之中的倾向,只能在一个领域与一个具有个别属性的特点的单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中得到确定。因此,比如,那些从学校中获得主要的文化资本的人,如出身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小学教师和大学教师,对学校教育的合法性定义表现得非常顺从并倾向于使他们的投入非常严格地符合学校承认的不同领域的价值。相反,中等艺术诸如电影和爵士乐甚至连环画、科幻小说或侦探小说预先具有吸引某些人投入的倾向,这些人要么没有完全成功地将他们的文化资本重新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本,要

么没有按照合法获得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早期的熟习)获得合法文化,与合法文化保持着一种客观和/或主观上不幸的关系:这些被拥有丰厚学校教育资本的人蔑视或忽视的正在合法化的艺术,为某些人提供了一种避难所和一种报复,他们通过将 these 艺术据为己有,将他们的文化资本变成最好的投资(特别是当这种文化资本没有得到学校教育的完全认可时),与此同时他们以合法性和利益的现行等级的反对者自居。换句话说,将一种通常专属合法艺术的配置——比如对电影导演的了解所衡量的配置——用在“中等”艺术上的倾向,对学校教育资本的依赖不如对与学校教育文化和与学校的总体关系的依赖那么强烈,这种关系本身也依靠拥有的文化资本还原为在学校获得并被学校认可的资本的程度。(因此,尽管新小资产阶级成员继承了更多的文化资本,但是他们拥有与小学教师大致相同的学校教育资本,他们对电影导演的了解更多,然而,他们不大了解作曲家。)其实,人们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合法性的客观等级。鉴于一种文化产品的意义和价值本身随着这种产品被纳入的产品系统发生变化,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或连环画,可能凭借大胆和自由的表现成为完全享有盛名的文化产品,或者相反,被还原为它们的普通价值,这要看它们是与文学或音乐先锋派的发现相关,还是回到自身,形成一系列典型的“中等趣味”并因此表现为它们之所是,即合法产品的简单替代品。

鉴于每个社会空间,比如家庭或学校,既作为能力在其中产生的一个地点又作为能力在其中获得其价值的一个地点发挥作用,我们可以预料,每个场都会给予这个场中产生的产品最高价值,学校教育市场给予被学校教育证明的文化能力和学校教育模式最高

价值,而在被学校教育之外的价值支配的市场,无论是“上流”社会的沙龙或晚餐会,还是职业生活的所有机遇(招聘面试、领导阶层的会议、研讨会等)甚或学校教育生活(国立行政学校或政治学院的重要口试)的所有机遇中,需要评价全面的人,所以这个市场将最高价值给予与文化的熟习关系,同时贬低让人想到学校教育式获取条件的所有配置和能力。这没有把统治的作用考虑在内,统治的作用使得以学校教育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可能在学校教育市场上被贬低为“书生气”的东西。⁹⁹ 其实学校教育市场不自主的最明显标志体现在这个市场对待“学校教育”习性的产物的两面性上,学校教育系统总体上(随时代和国家而变化)的自主性越小,且构成学校教育系统的这种或那种制度相对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的要求的自主性越小,这种两面性越明显。¹⁰⁰

可以肯定的是,通过熟习合法文化获得的配置与“上流社会”市场(或学校教育市场的最具“上流社会”风格的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亲缘关系:社会生活的日常场合排除了像封闭问卷这种学校教育式提问之极限那样突兀的测验,连学校教育制度本身都拒绝这种提问,每当学校教育制度暗中接受上流社会对“书生气”的贬低,它就把用于检验和衡量能力的提问变成上流社会谈话的一个变种。与力图消除和阻止虚张声势策略的最具学校教育特

⁹⁹ 占统治地位的风度,如发音,“自如”,“与众不同”,倾向于强加于被统治阶级,并且只能以完全“文化外的”原则如男子气概的价值的名义被贬低,这些原则导致将占统治地位的模式当作女性化配置的一种指标。

¹⁰⁰ 关于所有这些方面,尤其是国立行政学校与综合工科大学之间的对立,参见 P. Bourdieu et M. de Saint-Martin, *Le Patronat*, *loc. cit.*

点的学校教育情形相反,上流社会的场合让人尽情发挥一种运用能力的艺术,这种艺术之于能力,相当于牌戏中,玩牌的技巧之于发牌:人们能够选择地盘,避开考验,把认识问题变成偏好问题,把无知变成轻蔑的拒绝,自信或不安全感、自如或窘迫在如此多的策略中表现出来,这些策略如同学校教育资本一样,依靠获得方式和相应的熟习或疏远。这就是说,尽管人们缺乏对合法文化的一个特殊领域中的一种深入的、合理的、系统的了解,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满足被纳入大部分社会情形中的文化要求,哪怕是调查关系创造的几近学校教育式的情形中的文化要求。¹⁰¹

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询问人们关于画家的知识,以致他们说出的知识无法得到任何检验,这与其说是试图设法衡量特殊能力(我们可以设想这种特殊能力跟对作曲家的了解一样,依靠相同的因素),不如说是设法间接地把握与合法文化的关系以及调查状况所产生的区分效应。因此,其知识与其熟习不相称的主体可能会自感有理由采取虚张声势的策略,这类策略在文化的日常使用中颇为有用(这尤其是新小资产阶级的状况)。但是虚张声势本身只有在被熟习带来的模糊知识所指引时才有收益:因此,如果这个问题留有的自由允许最贫困的人拼命抓住既不符合知识又不符合偏好的专有名词,如在调查时受到各种各样赞颂的(被21%的普通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列举的)毕加索或(被10%的普通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列

¹⁰¹ 我们知道,统治阶级成员,尤其是文化资本方面最富有的阶层,多么蔑视电台或电视台的知识节目,在他们看来,这些节目以社会学问卷的方式,表现为对与合法文化的合法关系的漫画式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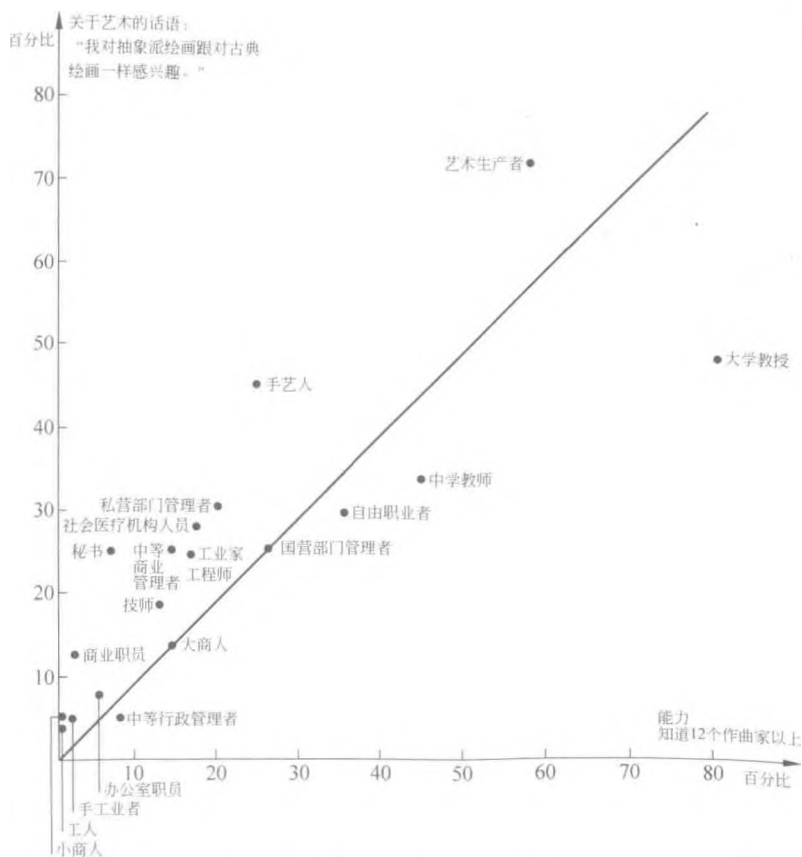


图4 特定能力与关于艺术的话语

举的)布拉克,那么,这种自由同时也起到了陷阱的作用,如卢梭^①的状况(10%)。实际上卢梭从未被别的阶级列举,他无

① 卢梭(Henri Rousseau, 1844-1910),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以其神秘、奇特、充满想象力的风景画、风俗画和肖像画闻名,尤其擅长描绘充满梦幻色彩的热带丛林和异国风情。——译者

疑被人与作家卢梭弄混了(相反,勃鲁盖尔从未被非技术工人或普通工人列举,无疑这是因为他们不敢冒险说出一个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听到的名字)。

这种无法归于可严格检验的知识总量的社交意识,往往与一种继承的强大文化资本相连,为了显示这种意识,只要将文化能力的以下两个维度的变化进行对比就够了,这两个维度即特殊知识的拥有如对作曲家的了解,以及利用这种了解必需的“预感”,这种“预感”是按照在给出的不同判断中辨认福楼拜所说的“讨人喜欢的观点”的能力而衡量的。¹¹²在每个等级中,那些了解至少十二部音乐作品的作曲家的人的比率和那些回答说“对抽象派绘画像对古典派绘画一样感兴趣”的人的比率,在曲线图中呈现出来。在这个图中,我们分辨出其严格的能力胜过巧妙的回答意识的阶层(教授),以及与之对立的,对合法姿态之意识与其特定能力无法相比的阶层(新大小资产阶级和艺术生产者),在处于上升阶段的小资产者或大资产者(小学教师、中等行政管理者、工程师、国营部门的高级管理者)身上,这种差距最小。

资产阶级(尤其是衰落的资产阶级)表现出的对于“学究气”的厌恶,无疑可以在学校教育市场无论如何使不确切知识和熟习的

¹¹² 我们无法考虑对于音乐的判断,因为——与关于绘画的一系列判断不同,绘画预示着一一种居中的判断(“我非常喜欢印象派画家”)——人们给出的关于音乐的一系列判断表现了典型的“中等”观点(“我喜欢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与讨人喜欢的观点(“一切好音乐我都感兴趣”)之间相当明显的非连续性,以致最合法的判断选择,以最有力的方式施加给所有不想满足于一种过于明显的“幼稚”判断的人。

模糊直觉受到贬值中找到其根源之一。因此,比如,如果我们知道地位稳固的小资产阶级拥有相对强大的学校教育资本和相对薄弱的文化遗产,而新小资产阶级(艺术家代表了其极限)拥有强大的文化遗产和相对薄弱的学校教育资本,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对学校教育陈规的揭露了,这种陈规是大部分新文化中间人(指导者、教育者等)的革新的根源。巴黎甚或外省的小学教师在纯粹的知识测验中,可能会胜过外省的小企业主、医生或巴黎的古董商,但他们很有可能在某些情形中显得比后者差很多,所有这些情形都要求自信或预感,甚至要求能够掩盖无知的虚张声势,而不是与学校教育的获得方式相连的谨慎、慎重和对局限性的意识:他们可能会混淆布菲和杜布菲^①而且表现出完全能够通过褒扬的陈词滥调或撇嘴的狡黠沉默,摇摇头或受启发的姿态来掩盖无知;他们可能把哲学等同于圣-埃克絮佩里、德日进^②甚至勒普兰斯-兰盖^③并能够跟得上今天最受重视的市场,如招待会、研讨会、采访、讨论会、研讨会、学会、委员会等。只要他们拥有一整套与众不同的特征,

① 杜布菲(Jean Dubuffet, 1901-1985),法国画家、雕塑家和造型艺术家。他第一个提出了“原生艺术”的概念,提倡绘画的自发性、独创性和无意识,摒弃文化教育陈规,禁止智力的介入。——译者

② 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法国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哲学家、耶稣会会士。他认为天主教信仰与科学不是对立的,宇宙、生物、人类精神是逐步进化的,基督处于进化过程的核心,人类最终要达到在上帝之中的统一。他曾参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掘。代表作有《人的现象》(1955)、《人的未来》(1959)、《科学与基督》(1965)等。——译者

③ 勒普兰斯-兰盖(Louis Leprince-Ringuet, 1901-2000),法国物理学家、电信工程师、科学史家、随笔作家。他致力于思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著作有《原子与人》(1956)、《魔药》(1981)、《物理学家的信仰》(1996)等。——译者

风度、仪表、举止、语调和发音、姿态和礼仪，就够了，若没有这些特征，至少在这个市场上，所有的学校知识都微不足道或一文不值，这些特征确定了资产阶级固有的高雅，这部分地是因为学校从未或从未彻底地传授这些特征。¹⁰³

最终，有一种方式表明品味制造者的可靠趣味，并揭露一种得来不当的文化的持有者的不当趣味，这种方式在所有市场上尤其是由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价值支配的市场上之所以如此重要，只是因为选择总是应该从那个做出选择的人的价值中获得其部分价值，只是因为这种价值基本上是通过做出选择的方式让人认识和认可的。但是在一个空间里，合法文化就像人们呼吸的空气一样，
101 通过沉浸在这个空间学到的东西，是一种对合法选择的意识，这种合法选择如此有把握，以至于它仅仅通过实现的方式，以一种成功的虚张声势，就可以让人接受：这不仅是一种对好地皮的投资意识，一种良好的文化投资的意识——当导演而非演员，先锋派而非传统派，或同样地，一种对良机的意识，以便进行投资，或当区分的利益变得过于不确定时，终止投资，换地盘；说到底，还是这种自信，这种自傲，这种信心，它们通常是那些对自己投资的收益最有信心的个人的专利，在一切都是信仰之事的空间里，他们很有可能将自己的投资规定为最合法的因而也是最有收益的。

¹⁰³ 教育程度相同的个人(比如重点大学学生)可能从身体素养、发音、穿衣方式、与合法文化的熟习关系的角度被分开，更不用说被一整套特定才能和能力分开，这些才能和能力，如跳舞、从事罕见的体育活动或社交游戏(如桥牌)，作为资产阶级空间的进入权起作用，而且通过它们提供的聚会和它们允许积累的社会资本，也许成为后来的前途差别的根源。

规定合法性的本义是阻止人们确定这一点,即统治者显得卓越或高贵,究竟是因为他是统治者,也就是说因为他拥有通过他自身的存在确定高贵或卓越就是他之所是的特权,而这种特权恰恰通过他的信心表现出来;还是仅仅因为他是统治者,他才显得好像具有这些品质并且好像唯独他有确定这些品质的合法权力。并非偶然的是,为了命名合法的风度或趣味,日常语言可能满足于说“风度”(les manières)或“趣味”(le goût),如同语法书所说的,这些词“非这么用不可”:与统治者有关的一些属性——巴黎或牛津“口音”、资产阶级的“与众不同”等——有权打消这种弄清它们自身且就自身而言“事实上”如何的意图,并拥有对它们在阶级之间分布的无意识参照赋予它们的区分价值。

因素与权力

最终,非常清楚的是,分析的困难来自这个事实,即分析工具本身指出的东西的表象,如教育水平或社会出身,在一些斗争中起作用,源自这些斗争的分析对象即艺术和与艺术作品的关系就是现实中的赌注:这些斗争使两种人互相对立,前一种人与文化的学校教育式定义和学校教育式获得方式有关,而后一种人自封为“更自由的”、不那么严格地服从学校教育训练和支配的一种文化和与文化的一种关系的维护者,虽然他们尤其来自资格最老的资产阶级阶层,但是他们在作家和艺术家身上并在艺术作品的生产和消费的超凡魅力表象中找到了一种无可辩驳的保证,作家和艺术家是这种超凡魅力表象的创造者和保证人。占据文学或艺术舞台之前沿的作家或流派的争论掩盖了无疑更重要的斗争,如使教授(在 102 整个 19 世纪,批评家也经常出现在当中)与作家互相对立的斗争,

作家由于其出身和关系，通常与统治阶级中的统治阶层联系更紧密；或者，还有关于完人的定义和负责制造完人的教育而展开的、不断地使整个被统治阶层与统治阶层互相对立的斗争。因此，比如，在19世纪末创立的一种为体育留有重要位置的私立教育——尤其通过罗什学校的创立者，弗雷德里克·勒普雷^①的弟子德莫兰^②，以及另一个新式教育的维护者德·顾拜旦男爵——中起作用的，就是在学校教育制度当中推行一种贵族的教育定义，这个定义通过某些价值反对由“兵营式中学”（常常被重复的主题由此产生）代表的知识、博学和“学校教育式”驯服，以及一切有利于小资产阶级子女的评价标准，学校正是通过这些标准证明自己的自主，而以下这些价值，包括“活力”、“勇气”、“意志”、领导（军队或企业的领导——这在当时大致是一回事）品质，也许尤其是被称作自助的（个人的）“创造性”，“事业心”，所有这些德行，都与从事体育运动有关。重视教育而非教诲，重视性格而非智力，重视体育而非文化，就是承认在学校教育世界中存在着一种不可归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校教育等级的一种等级，而学校教育等级看重的是这些对立的第二项。¹⁰⁴

① 弗雷德里克·勒普雷(Frédéric Le Play, 1806-1882)，法国社会学家，法国社会学和经验调查方法的先驱。他的思想深受德·迈斯特和德·波纳尔的影响，打上了保守主义和父权主义的印记。他关注“社会安定”，维护旧制度的价值（家庭、社会秩序和精英政治）。主要作品有《社会方法》（1879）、《社会经济》（1891）等。——译者

② 德莫兰(Edmond Demolins, 1852-1907)，法国教育家。他创立了法国第一所新式学校，罗什学校，提倡一种积极教育法，让学生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掌握知识，而不是被动接受现成的规则、定律。——译者

¹⁰⁴ 尤见 E. Demolin, *A quoi tient la supériorité des anglo-saxons?*, Paris, Firmin-Didot, 1897; *L'éducation nouvelle, l'École des Roches*, Paris, Firmin-Didot, 1898; *L'avenir de l'éducation nouvelle*, Paris, Firmin-Didot, 1899; P. de Coubertin, *L'éducation en Angleterre*, Paris, Hachette, 1888; *L'éducation anglaise en France*, Paris, Hachette, 1889.

这些斗争不属于过去,如同进入大企业领导职位的两个渠道的存在所证明的,一条渠道从罗什学校或(第十六区的)有名的耶稣会中学和有名的资产阶级公立中学通向法学院或越来越多地通向政治学院或高等商业学校,另一条渠道从普通的外省或巴黎公立中学通向综合工科大学,¹⁰⁵以及,更清楚地,在“精英学校”的层次上,如同两个学校教育市场的对立所证明的,这两个市场无论在所要求的文化能力的内容上,还是在风度被赋予的价值上,以及在评价它们所用的标准上,都迥然不同,一端是高等师范学校和综合工科大学,另一端是政治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这些为了文化的合法定义和评价文化的合法方式的斗争,不过是划分整个统治阶级的不间斗争的一个维度,而且不间断的斗争通过完人的品质,追求实施统治的合法资格:因此,赞颂体育、培养性格和重视经济-政治修养,而不考虑文学或艺术修养,构成了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的策略,他们借助这些策略拼命贬低统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阶层承认的价值——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具有最严格的学校教育定义的学校教育能力的领域与资产阶级子女展开了可怕的竞争。但是,更深入地,这些反智主义的表现不过是一种对抗的维度,这种维度远远超出了身体或修养的合法用途问题,触及存在的一切维度,统治阶层总是倾向于通过男人与女人、严肃与肤浅、有用与无用、负责与不负责、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对立来思考他们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

统计学为了产生它的等级和它“记录”的关于等级的“数据”所

¹⁰⁵ Cf. P. Bourdieu et M. de Saint-Martin, *Le Patronat*, *loc. cit.*

使用的逻辑划分的原则,因而也是社会逻辑划分原则:我们只有考虑到这一点,即统计学变化与合法文化的对立定义并且与跟文化的合法关系的对立定义相互关联,或更确切地,与不同的市场相互关联,才能正确阐释统计学变化,因为与这种定义或那种定义相关的属性在这些市场中获得不同的价值,而统计学变化与两个主要变量即教育水平和社会出身的天真定义相关。没什么比将一种有效性置于这些“因素”之中更错误的了,因为这种有效性只出现在某种关系之中,在另一个场或场的另一种状态中可能被取消或被颠倒。构成有教养的习性的配置只在一个场中,只在与一个场的关系中,形成、发挥作用和获得价值,这个场如巴什拉所说的物理场,本身是一个“充满可能力量”的场,是一种“活跃的状况”,¹⁰⁶在这个场中,各种力量只在与某些配置的关系中才表现出来:因此,相同的实践在不同的场中、在同一个场的不同状态或对立领域中,可能获得相反的意义和价值。

因而,对分析工具的反思性回顾并不是认识论学者的一种多虑,而是关于对象的科学认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实证主义的懒惰导致将纯属防御的证明意图集中在被观察到的关系的强度上,而不是让人对测定关系的条件本身提问,这些条件可能就是不同关系的相对强度的根源。为了相信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独立变量”的独立性,应该忽略以下这一点,即“解释性因素”其实是只能在某一个场中价值并得到实施的“权力”,而且“解释性因素”由

¹⁰⁶ G. Bachelard, *L'activité rationaliste de la physique contemporaine*, Paris, PUF, 2^{ème} édition, 1965, p. 60.

此依赖在每个场内部进行的斗争,以改变确定这个场的价值形成机制:如果说很容易设想一些场,两种占统治地位的“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场中被颠倒(并很容易设想一些测试,这些测试会成为这些场的实验结果并为不那么具有学校教育特点的提问对象和形式留有更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关于文化的日常斗争以改变价值形成机制为最终赌注,这些机制确定了与文化教育资本和社会轨迹相关的文化产品(和人们借以把握文化产品的原始变量)的相对价值。

如果说与行动者相关的属性与实践之间的统计学关系只在构成一个习性的配置与某一个场之间的关系中完全得到确定这一点是确实的,那么我们只有研究被观察到的关系建立于其中的关系,才能通过一种成为彻底普遍化之条件的表面上的严格限制,确定这些关系在其中保持其有效性的界限:一种主要针对合法文化的封闭问卷调查所建立的关系——如同与它非常接近的考试情形一样(尽管当中缺乏一种制度认可的赌注)——之于学校教育市场,相当于一个作为具体交换地点的市场之于经济理论市场。问卷调查,无论就它的对象还是就它强加给交流的形式(如巴利^①指出的,这种提问总是包含着一种干涉、暴力、质疑的形式——由此,它通常伴以语气的缓和),尤其当它采取一种有条理的和不对称的形式时,¹⁰⁷它是与日常谈话对立的,无论涉及“反文化”于其中建立的

^① 巴利(Charles Bally, 1865-1947),瑞士语言学家。作为索绪尔的合作者,他与结构主义的产生密切相关。他建立了与阐释风格学相对的言语风格学,研究从情感内容角度构成的语言表达事实。主要著作有《语言与生活》(1913)等。——译者

¹⁰⁷ 一切都让人相信,被提问的人与——由调查者及其问卷不管有理没理地代表的合法文化之间的差距越大,被施加的暴力越大。

咖啡馆的或大学校园的讨论，还是涉及学究气的精确和辩证法的笨拙被驱逐出去的上流社会交流，都是如此。我们在这种几近学校教育式的情形中，从形式和内容上最有学校教育特点的到形式（衡量精通程度又无严格知识限制的问题）或内容（关于电影知识或饮食方面的偏好的问题）上最少学校教育特点的，看到了在学历和继承的文化资本的相对比重中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助于对“因素”与市场之间的这种关系做出一种评判。如果说运用或表现、展示或突出能力的方式的（难以通过问卷获得的）所有迹象（自信、傲慢、从容、谦逊、严肃、不安等），在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上紧密依靠它们被放置的市场，这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家庭的或学校的）获得方式的明显痕迹，也就是一个市场的明显痕迹；这也是因为所有能够确立它们相对于学校教育支配的自主的市场，都给予这些迹象优先权：强调风度，并通过风度强调获得方式，就是获得把阶级中的资历变成阶级内部等级之根源的可能性；¹⁰⁸这也是赋予合法方式的法定持有者一种绝对的或绝对任意的认可或排斥权力。方式从本质上说只是为了他人存在，而且合法方式的法定持有者和确定风度如发音、举止、仪表的价值之权力的法定持有者，拥有对他们自身的方式漠不关心的特权（这就使他们不必矫揉造作）；相反，“暴发户”企图融入良好方式的合法持有者也就是继承者的群体，却不是相同社会条件的产物，无论他们做什么，总是陷入焦虑不安的过度认同或否定态度的取舍之中，这种否定态度恰在其反抗中

¹⁰⁸ 我们知道，在商业资产阶级内部按照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或学校教育）资本的
种类实现的划分，由按照在阶级中的资历的划分得到印证。

承认了它的失败：要么是一种“装出的”举止得体，这种得体的正确或过分正确本身强调了这种举止在假装或它假装的东西；要么是对差别的炫耀式证明，这种证明注定要表现为对无力认同的承认。¹⁰⁵

鉴于文化能力是在社会场中获得的，而社会场又不可避免地是文化能力在其中获得其价值的市场，所以文化能力与这些市场互相依赖，而且关于文化展开的所有斗争都是以创造最有利于产品的市场为赌注的，这些产品在方式上带有体现获取条件的某个特殊等级的标志，也就是某特定市场的标志。因此，今天人们所说的“反文化”可能是新派自修者努力通过创造另一个市场以摆脱学校教育市场的法则（老派的、不那么自信的自修者继续服从这些法则，尽管这些法则事先谴责了他们的产品）的产物，这另一个市场拥有自身的认可机构，并且能够从实践上以上流社会或知识市场的方式，质疑学校教育制度把对能力和风度的评价原则强加给一个完全统一的文化财产市场的企图，因为这些评价原则是在学校教育市场或至少是这个市场最具“学校教育特点”的领域强制推行的。

¹⁰⁵ 这是霍夫曼·在“有教养的青年”的比喻中提到的所有种族主义的最典型幻想之一，在议员家中被养大的一只猴子，学会了说话、阅读、写作和作曲，但仍忍不住在“几个小细节”如“内心活动”上暴露它的“外来出身”，当它听到砸核桃的时候，这些“内心活动”让他焦躁不安（Hoffman, *Kreislerriana*, Paris, Gallimard, 1949, p. 150）。

· 霍夫曼（E. T. A Hoffmann, 1776-1822），德国浪漫派作家。他的作品神秘、怪诞，以夸张手法对现实进行讽刺和揭露，其人际关系异化的主题、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对欧洲浪漫派和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魔鬼的长生不老药》（1815-1816）、《公猫穆尔》（1820-1822），中短篇小说集《卡罗风格幻想篇》（1814-1815）、《夜的故事》（1816-1817）、《谢皮拉翁兄弟》（1819-1821）等。译者

第二部分

实践的经济

“在那些法则和原则已经由她母亲教给她的事情上，在做某些菜、弹贝多芬的奏鸣曲和亲切待客的方式上，她肯定对完美和分辨别人是不是或多或少接近完美有了一种正确的看法。不过，在这三件事上，完美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一种手法上的简单、朴素和魅力。她讨厌菜里放不必要的香料，讨厌矫揉造作或过分用力的演奏，讨厌待客时脱离一种完全自然的风度和夸张地谈论自己。从第一口菜，从最初的音符，从一张简单的便条，她自诩知道是不是与一个出色的厨娘、一位真正的音乐家、一个很有教养的妇女打交道。‘她可能比我的指法高明，但她缺乏趣味，因为她演奏这首如此简单的行板时过分夸张。’‘这可能是一位非常杰出而且素质很高的妇女，但在这种场合下她谈论自己缺乏分寸。’‘这或许是一位非常有造诣的厨娘，可她不会做炸土豆牛排’。炸土豆牛排！理想的考试材料，正是它的简单制造了困难，某种烹饪的‘悲怆奏鸣

曲’，在美食学上相当于社会生活中一位贵妇人如何造访。这位贵妇人来向您打探一个仆人的情况，她能在一种如此简单的行为中，表明她多么有或没有分寸和教养”。

——M. 普鲁斯特：《仿作与杂集》

第二章 社会空间及其变化

我无疑本应将研究停止在这一点上，这样就不会引起强烈的反对。艺术趣味不可还原的观点表现得如此明显。但是，正如对审美配置的社会条件的分析已经表明的，我们只有将支配在合法文化财产之间的选择的配置重新纳入配置系统的整体之中，让通常所用的狭义的和标准意义的“文化”回到人类学的广义上的“文化”之中，并将关于最纯粹的物的精致趣味与关于食物味道的基本趣味联系在一起，才能彻底理解这些配置。¹ 趣味这个词，通常用来证明自发生成(*génération spontanée*)的幻想的合法性，这种有教养的配置倾向于借天生配置的外表显现出来，从而产生这种幻想，这个词的双重意义应该至少一次用来强调这一点，即作为“以直接的和直觉的方式判断美学价值的能力”的趣味，与分辨食物特有味道的能力意义上的趣味是分不开的，后一种趣味意味着对某些食物的偏爱。抽象作用导致把关于合法文化产品的配置单独抽出来，事实上引起了解释因素系统层面上的另一种抽象作用，这另一种抽象作用总是存在的和起作用的，但它只有通过它的某些成

109

110

1 我们选择对一系列合法或不合法的物质或文化的消费提问，恰恰就是想找办法检验一般被当成审美的配置与构成习性的配置的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些消费可能成为趣味判断的对象，包括烹饪和绘画、服装和音乐、电影和装饰。

分(以下被分析情形中的文化资本和轨迹)才能被观察到,这些成分是在所考察场中的有效性的根源。

最合法的文化财产消费是为了稀有财产和实践而进行的竞争的一个特殊状况,这个特殊状况的特性无疑更多取决于供给的逻辑,或者不如说,取决于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所体现的特定形式,而非取决于需求或趣味的逻辑,或者说,消费者之间的竞争逻辑。其实只需摧毁将合法文化变成一个被分隔空间的神奇壁垒,就可以看到表面上无法比较的“选择”诸如在音乐或烹饪、体育或政治、文学或发式方面的偏好之间的明白易懂的关系。这种将审美消费野蛮地重新合并到普通消费(审美消费不断地通过反对普通消费确定自身)的空间之中的做法,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提醒我们,消费无疑总是意味着按照财产和消费者而程度不同的一种占有活动;或者更确切地,是提醒我们,消费者有助于生产他以一种发现和辨认活动的代价来消费的产品,这种发现和辨认活动,在艺术作品的情形中,可以构成消费的全部和消费提供的全部满足,它还要求时间和随着时间而获得的配置。

经济学家们无需经过一种抽象作用,就能忽略产品在与消费者也就是与配置的关系中发生了什么,配置确定了产品的有用属性和真实用途:提出假设,如他们当中某一位所做的那样,说消费者领会到相同的决定性特征,这就等于假定产品具有客观特征——或者,如人们所说的,具有“技术”特征——这些特征能够像这样强加给所有认识主体,这就好像认识仅仅固定在生产者(和所谓“信息性”广告)给出的说明书所指出的特征上,就好像社会用途

可以从使用方式中推断出来一样。物品,即便是工业产品,在人们通常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上也不是客观的^①,也就是不是脱离那些领会它们的人的利益和趣味的,而且物品没有规定一种普遍的和被一致赞同的意义的明证性。如果社会学家面对一个“独立变量”与一个“从属变量”之间的每种统计学关系时,无需确定对“从属变量”指出的东西的认识和评价如何依照“独立变量”决定的阶级而变化,或者,不如说,无需确定每个行动者阶级真正据以确定自身的相关特征系统是什么,那么他的任务将会非常轻松。² 科学应该建立的,是这种客体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建立在一个客体与一个行动者或与一个行动者阶级的配置之间的关系之中,这个客体在它提供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中得到确定,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只出现在社会用途(其中,若涉及技术物品,则是生产者以之为目的并据之以设计该物品的用途)的空间中,而配置就是认识、评价和行动模式,这些模式构成一种实践用途中的客体的客观有用性。³ 这并不意味着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再次引进人们所说的“实际经验”的随便哪种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往往不过是研究者的“实际经

① 物品和客观的法文分别是 *objet* 和 *objectif*, 所以作者有上述说法。下面的客体和客观性同此。——译者

2 难道需要说出意识到这个前提的社会学家并不多,尤其在那些鼓吹方法论的社会学家当中?

3 关于许多技术物品,如同我们在摄影方面所做的那样(cf. P. Bourdieu et al., *op. cit.*), 我们也许可以指出,除了包含在否定的决定论即局限性中的东西,我们从物品的技术特征出发几乎得不出任何有关社会用途的结论。

验”的几乎不加掩盖的投射；⁴而是意味着以依据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必然地发生变化的趣味与被趣味赋予了社会不同身份的产品之间的关系，取代其趣味可互换的消费者与其属性被统一认识和评价的产品之间的关系。其实只要提出被经济学家奇怪地忽视的由经济设定的配置生产的经济条件问题，也就是在特定的状况下，⁵趣味的经济和社会决定因素问题，就可以看到将有差别的经验纳入产品的完整定义中的必要性，消费者依照他们从经济空间中的位置得来的配置形成了对产品的有差别的经验。这些经验，人们无需为了以一种理解力理解它们而感受它们，因为这种理解力丝毫无法得益于实际经验，更无法得益于同情；作为两种客观性之间的客观关系，习性使得有可能在实践与一种境况之间建立一种明白易懂的和必然的关系，习性按照本身由一种客观上可观察到的条件所产生的认识和评价范畴，来产生对这种境况的意识。

4 经济学家——今天在一部分社会学家中也有其模仿者，理论质询的意识和对真实的复杂性的关注丝毫无法阻碍这些模仿者——通过把“实际经验”或阶级无意识形式化的技艺而当上了大师。提到加里·S. 贝克尔——他有时会更好地放置他的建构理论模型的想象力——的最近研究成果，我很难抑制一种反常的快乐，他在这项成果中，试图解释这样一种悖论，这种悖论认为对某些产品的需求随着经验而稳定增长（G. J. Stigler and G. S. Becker,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March 1977, pp. 76-90）。为了解释诸如“乐迷”（典型的“有益癖”）和“毒瘾”（特定的“有害癖”）这类配置，他在一种状况中援引“音乐快乐”的生产费用的降低，这种降低来自人类特定资本的积累，相反，他在另一种状况中则援引“满足感”的生产费用的增长，这种增长来自满足能力的下降。这有待证明（*Quod erat demonstrandum*）。

5 关于这种自相矛盾的遗忘的另一个例子，参见 P. Bourdieu, *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 Paris, Mouton, 1963, et *Algérie 60*, Paris, Ed. de Minuit, 1978。

阶级状况与社会影响

因为分析只有逐步揭示作为实践根源的一系列作用才能解释某些实践,分析首先消除了一个行动者或一个行动者阶级的特有生活方式的结构,也就是隐藏在全部实践的多样性和繁复性之下的统一性,这些实践是在拥有不同的逻辑因而能够〔按照这个公式:(习性)(资本)+场=实践〕规定不同的实现形式的场中完成的;分析也消除了这一系列被建构的实践、不同的和特殊的生活风格所描绘的象征空间的结构,所有这些生活风格总是在客观上并有时在主观上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之中并通过它们的相互关系确定自身。因而这就意味着重新组合被分解的东西,这样做首先是为了验证,但也为了在共同认识的特有方法中找回真实的东西,也就是对生活风格的系统性和生活风格构成的整体的直觉。为此,应该回到实践的统一的和生成的原则,也就是阶级习性,即阶级条件和阶级条件施加的影响的内在化形式;因而,应该构建作为全体行动者的客观阶级,全体行动者被置于一致的生存条件中,一致的生存条件施加一致的影响并产生能够引起相似实践的一致的配置系统,而且全体行动者拥有一系列共同的属性,被客观化的、有时在法律上受保障的属性(比如财产或权力的拥有)或如阶级习性(特别是分类模式系统)那样的被归并的属性。⁶

⁶ 客观阶级不应该与被动员的阶级混淆,后者指以被客观化或具体的属性的一致性为出发点,为了斗争而被集中在一起的全体行动者,而被客观化或具体的属性确定了客观阶级,斗争是用来维护或改变被客观化的属性的分布结构的。

113 变量与变量系统

我们通过一个职业名称指明这些阶级(行动者阶级,或在这种关系下也是同样的生活条件阶级),不过是为了显示以下这一点,即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尤其通过某些机制支配着实践,这些机制操纵着位置的取得并产生或选择一个确定的习性阶级。但这并不是要回到像“社会职业等级”这样的一种先设变量的一种方式:事实上,被集中在按照一种特殊的然而特别关键的方面被构造的一个阶级中的个体,总是带有除了成为他们分类根源的相关属性之外的次要属性,这些次要属性因此也被偷偷引入解释模式中。⁷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不仅由它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确定,这个位置能够通过如职业、收入甚或教育水平这些指标被辨认出来,也由某种性别-比例,即一种在(从不是社会中立的)地理空间中被决定的分布确定,也由一整套附属特征确定,这些附属特征能够通过心照不宣的要求,作为真正的选择或排斥原则起作用,却

7 让·邦泽克里说得正是这一点:“即若个体 $\alpha \beta 1 \gamma 1, \alpha \beta 2 \gamma 2, \dots, \alpha \beta n \gamma n$, 每个被描述成有三个特征(或特点)。撇开每个描述的后两个成分,我们可以说所有这些个体都回到了由 α 这个特征确定的唯一一类,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称作 α 类。但即使 α 特征有助于确定这个类别并辨认这个类别中的个体,我们也不能在不考虑这些个体的 β 特征 γ 特征的情况下研究这个类别。从这个观点来看,如果我们将第二个特点能够具有的一整套 β 形态称作 B, 将第三个特点的整个 γ 形态称作 C, 那么研究 α 类就是研究 αBC , 也就是除了研究被固定的第一个特征之外,还研究一切可能是第二个(B)或第三个(C)特征的东西;另外也就是研究后两个特征之间的可能结合(β 与 γ 的结合而非 β 与 γ' 或 γ'' 的结合)”。J. Benzécri, « Définition logique et définition statistique; Notes de lecture sur un chapitre de Ernest Cassirer », *Cahiers de l'analyse des données*, Vol. III, 1978, n°2, pp. 239-242.

从未被明确地说明(种族或性别的归属就是这种情况);许多公认的标准实际上是用来掩盖隐藏的标准的,要求一定的文凭的做法实际上可能是要求一定的社会出身的一种方式。⁸

因此,建立在遴选基础上的群体的成员,如同一种明确或暗中的数目规定所保护的大部分团体的人员(医生、建筑师、大学教师、工程师等),总是共同拥有多于和不同于明确被要求的特点的东西;对职业的共同认识无疑是“天职”的真实原则之一,它不如统计学家的认识那么抽象和不真实,而且它不仅考虑职位的性质和收入的总额,还考虑一些次要特征,这些次要特征常常是职业的社会价值(有声誉或失去信誉)的根源,而且它们没有公认的定义,作为默认的要求,如年龄、性别、社会出身或种族出身的要求,或明或暗地支配着遴选,从业开始,这些就贯穿整个职业生涯,以至不具备这些特征的人员,被排斥在外或发配到其他边缘位置(女医生或女律师注

⁸ 应该检验分析者使用的若干标准从被这些标准分开的群体之间的斗争状况中,或更确切地,从被这些标准所确定的群体的让人这样认出他们的这种能力中,得到了什么:很可能,如果建立在性别或出生国籍基础上的群体在工人阶级内部形成,我们不太会忘记这一点,即普通工人中的一大部分都是妇女和移民。另一方面,关于表面因素的错误推理也不会如此常见,若这种错误推理不是合法化活动在科学领域的简单再现,而群体倾向于通过合法化活动强调这种或那种合法属性,即群体构成的公开原则,以掩盖群体存在的真正基础。因此,选择性最强的群体(比如音乐会听众或专科学校的学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两次(对自身)掩盖他们真正的选择原则:由于拒绝显示其存在及其再生产的真实原则,他们被迫信赖某些机制的有效性,这些机制不具备一种明确的进入权的特殊的和有系统的严格性,因此容忍例外(与俱乐部和建立在遴选基础上的所有“精英”不同,它们无法控制“当选者”的全部属性,也就是人的全体性)。

定要接待女主顾,且黑人医生或律师注定要接待黑人主顾或从事研究)。简而言之,由用来指明一个等级的名称即往往是职业的名称所阐明的属性,有可能掩盖所有次要属性的有效性,这些次要属性尽管确实组成了被如此划分的等级,却没有被明确指出。同样,如果涉及评价一个(由职业标明的)社会地位的变化时,人们通过只考虑唯一一种相关属性哪怕是最重要的属性这种做法,而无视也体现这种变化的所有替代作用,就要犯愚蠢的错误:一个社会阶级的集体轨迹可能表现在以下事实中,即这个轨迹可能“女性化”或“男性化”,可能衰老或更新,可能贫乏或丰富,所有这些变化可能是同时或交替发生的(一个位置的衰落也可能体现在这个位置女性化——这可能伴随着一种社会出身的提升——或这个位置“民主化”或“衰老”这个事实中)。这对由于在一个场中占据一个位置——比如学科等级中的一个大学学科或资格等级中的一个贵族爵位或学历等——而被确定的任何群体而言都是一样的。

一个从属变量(如政治观点)与所谓独立变量如性别、年龄和宗教甚或教育水平、收入和职业之间的特定关系,倾向于掩盖若干关系的完整系统,这些关系构成了被记录在这种特殊的关联中的作用的特定力量和形式的真正原则。“独立”变量中最独立的变量掩盖了统计学关系的整个网络,这些统计学关系暗中表现在这个变量与这种观点或那种实践的关系中。仍旧在这里,应该通过一种对划分和变化的分析对一切表现在阶级的真实定义中的东西提问,而不是要求统计学技术解决它只会加以转移的一个问题,不同的次要变量(性别、年龄等)将这些划分和变化引入了被主要变量

勾划的阶级内部,而表现在阶级的真实定义中的东西,在名义上的定义中,即由为了说明这个定义而使用的名称所概括的定义中,并没有被考虑,因而,在对这个定义被纳入其中的关系的阐释中,也没有被考虑。

学历与职业之间的关系,乃所谓独立变量之间的虚假无关性的典型:这不仅是因为至少在(人们或多或少按照学历达到的)社会空间的某些领域,职业依赖学历,而且因为学历被认定保证的文化资本依赖占据的职位,占据的职位可能意味着(通过和为了升职)维护或增加在家庭和/或在学校中获得的资本,或相反,意味着(由于降级)使这种资本缩减。对职业条件的这种作用——应该在这种作用中区分严格意义上的劳动作用和可能的职业作用,劳动作用由于其自身的性质,可能要求一种文化资本的或大或小和或多或少稳定的投入,因而要求一种对这种资本的或多或少持续的维护,而职业作用要求或排除能够保证升职并使升职合法的文化投入——加以补充的,是职业环境的作用,也就是一个群体对配置以及尤其是文化(或宗教和政治)配置实施的强化,这个群体在它被确定的大部分方面都是同质的:因此应该在每种情况下检验职业存在条件在什么程度上有利于或不利于这种作用的实现,这就致使考虑劳动本身的特点(难度等),劳动完成的条件——有利于交流的噪音或沉默等——,劳动规定的时间节奏和劳动赋予的空闲时间尤其是劳动在劳动地点——在劳动期间和休息间歇中——或在劳动之外等促进的横向的或纵向的关系的形式。这种作用无疑是把办公室职员(记账员、银行职员、

办公室职员、打字员)与商业雇员(大部分是商店的售货员)分开的许多差别的根源,与出身阶层相关的差别(办公室职员往往出身于农业经营者而商业雇员往往出身于小企业主)和学校教育资本的差别(前者往往拥有中等教育初级阶段证书而后者往往拥有专业技能合格证书)都没有考虑到这许多差别。⁹ 在阶层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即揭示又掩盖的作用当中,也存在着位置在与一个阶级相关的次要属性之分布中的作用:因此,不具备所有模态属性的阶级成员——比如从事一种非常女性化职业的男人或进入国家行政学院的工人子弟——不仅被这种从属关系和从属关系规定的社会形象在他们的社会身份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而且他们必然要参照这种从属关系确定自身的位置,无论他们接受还是摒弃这种从属关系。

同样,诸如将学校教育资本或年龄与收入联系在一起的关系掩盖了把另两个表面上独立的变量相连的关系,一个变量是年龄,它以一种随学校教育资本变化的效力决定收入,另一个是职业,职业本身在一定程度上由学校教育资本决定,同时由其他更加隐蔽的因素如性别或继承的文化和社会资本决定。在这另外的情形中,一个变量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另一个变量的一种被转变的形式:因此学校教育年龄(即处在一种

⁹ 商业雇员和办公室职员按照性别、年龄、收入,大致表现出相同的分布,他们在配置和实践层次上的重大差别分开。因此,更加严肃的办公室职员,往往期待他们的朋友有责任心或者他们有教养,往往希望家里整洁、干净和有条理,喜爱布雷尔、盖塔里、玛利亚诺、《匈牙利狂想曲》、《阿莱城的姑娘》、拉斐尔、华托、达芬奇。相反,商业雇员比别人更经常地寻求善交际的、乐天派的、有趣的和有教养的朋友,舒适而亲切的家居环境,往往说他们喜欢布拉桑、费雷、弗朗索瓦丝·阿尔迪、《众神的黄昏》、《四季》、《蓝色狂想曲》、于特里约或梵高。

学校教育水平的年龄)是继承的文化资本的一种被转变的形式,延迟是一个趋向降级或淘汰的阶段;更普遍地,在某个既定时刻持有的学校教育资本还表现了出身的家庭的经济和社会水平(这要经过丝毫没有一种机械关系特征的或长或短的阶段,因为初始的文化资本可能只是不完全地被重新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本或可能发挥不可归为学历作用的作用,如同我们在社会出身将学校教育水平相同的个体区分开的所有状况中看到的那样)。同样,在学校教育资本与这种或那种实践之间的整个关系中,我们把握了与性别相关的配置的作用,这些配置有助于确定被继承的文化资本重新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本的逻辑,也就是更确切地说,有助于确定对学校教育资本种类的选择,学校教育资本种类是从相同的初始资本出发而获得的,女孩多选择文科,而男孩多选择理科。还是同样地,这种或那种实践与年龄的关系可能掩盖了与学校教育资本的关系,当年龄实际上标志着——通过学历或升职——占据位置的不同方式和/或学校教育代(*génération*s scolaires)以及进入教育系统的不均等的机会(最年长的职员比最年轻的职员拥有更少的学校教育资本)时,或者这种或那种实践与年龄的关系掩盖了与社会阶级的一种关系,因为不同领域尤其是学校教育领域中的提早和落后的社会定义发生了变化。¹⁰ 最终

¹⁰ 事实上,入门机会的变化不过是一种更系统的转变的一个特征,这种转变也涉及能力本身的定义,除非万不得已,它禁止代与代之间的任何对比(使得具有因年龄而不同的能力和不同学校教育水平的人互相对立的冲突——旧初等文凭与新业工之间的对立——恰恰集中在能力的定义上,老一代责备新一代不具备在过去的定义中被认为是初级的和基本的能力:“他们不再懂拼写”,“他们甚至不会算数”)。

同样地,我们在检验地理空间中的分布(甚至在同样的职业等级中)所包含的学校教育资本的不平等作用被消除时是否依然存在差别之前,我们无法将因为居住区的规模不同而不同的文化实践变化归咎于纯粹空间的距离固有的作用以及归咎于文化供给的变化。¹¹

通过逐个对变量进行分析,如同人们常做的那样,人们有可能将全体变量的作用结果归于变量(比如性别或年龄,这些变量可能以它们的方式表现了一个阶级的整个状况或变化)中的一个(这个错误受到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倾向的支持,从而以一般丧失比如与性别或年龄相关的一般丧失取代与阶级相关的特定丧失)。通过职业得以把握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将它们的特定形式强加给所有年龄的或性别的属性,以至于与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相关的整个因素结构的有效性表现在年龄或性别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当我们看到这一点,即衰老在被优待的阶级成员身上与一种右倾相关,而在工人身上则伴随着一种左倾,那么把按照年龄记录的差别归于一种生物学衰老的一般作用的倾向多么幼稚,就一目了然了。同样,管理者的相对早熟由比如他们达到一定位置的年龄来

¹¹ 应该对巴黎与外省之间的对立进行分析,这种分析类似于人们对“教育水平”所做的分析:表现在住所这个变量进入其中的关系之中的,不仅有文化供给作用,还有源于财产空间和所有者(比如一种强大的学校教育资本的拥有者)空间中的不均等分布的所有作用,以及尤其是循环强化作用,文化供给与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的丰富程度有关,进而与由此提供给文化消费的客观机会和消费渴望的相应强化有关,一切群体都对自身实施循环强化作用,如果这个群体是有教养的,它就朝着加强文化实践的方向实施这种作用,如果这个群体没有教养,它就朝着漠视或敌视这种实践的方向实施这种作用。

衡量,但表现在他们的相对早熟中的是这一切,也就是他们以前和以后的整个轨迹与决定这个轨迹的资本总量和结构,这一切戳穿了条件的严格同一性的表象,将他们分开。

被构建的阶级

社会阶级既不是由一种属性(即便是资本总量和结构这样的最有决定性的属性),也不是由属性(性别、年龄、社会或种族出身的属性——比如黑人或白人、本地人和移民等的划分——收入、教育水平等的属性)的总和,或者是由一系列属性决定的——这一系列属性全部从一种从因到果的、从制约的到受制约的关系中的一种基本属性(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出发被排序,而是由所有相关属性之间关系的结构决定的,这个结构赋予每个属性和这个属性对实践发挥的作用以特有的价值。¹² 如同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在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施加的影响的基本决定因素方面构建尽可能同质的阶级,这就是在这些阶级本身的构建中与对属性和实践的分布按照这些阶级而产生的变化的阐释中,有意识地考虑次要特点的网络,每当人们依靠以唯一的一个标准为基础构建的等级,哪怕是职业这样恰当的标准,人们就或多或少无意识地利用这个次要特点的网络;这也是把握客观的,也就是被归入并体现在区分属性中的划分的原则,行动者以这些划分为基准,最有可能在他们的日常实践中真正彼此分开并重新聚集,与此同时通过和为

¹² 为了构建充当下列分析基础的阶级和阶层,我们不仅系统地考虑了(成为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社会职业等级根源的)职业和/或教育水平,而且考虑了每种状况下不同种类的资本(如性别、年龄和住所)之总量的可利用指标。

了个人或集体的政治活动(当然是按照与一种特定历史相关的鼓动性组织的特定逻辑)采取行动或被发动。¹³

119 人们只有与线性思想决裂,才能以既统一又特定的方式解释实践的无限多样性,从而致力于重建表现在每个因素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而线性思想只知道直接决定性的有条理的简单结构。¹⁴ 一个因素网络的结构因果关系完全不可还原为一系列不同解释力量的线性关系的累积的有效性,这些线性关系即建立在

¹³ 用于制造阶级的逻辑划分原则显然是由社会在先存的社会分类中非常不平等地被构造的(其中,一极是一个职业的或“社会等级”的名称的简单存在,即一个行政机构——如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分类行动的产物或比如形成集体协议的社会妥协的产物,另一极是拥有一种真正的社会身份、拥有负责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发言人和制度化渠道的群体)。次要的划分原则(如出身国籍或性别)很有可能被一般的分析所忽略,只要它们没有充当随便哪种动员形式的基础,这些原则指出了潜在的划分界线,根据这些界线,一个被社会认为统一的群体可能最终以或多或少深入而持久的方式分裂。鉴于不同因素拥有不同的功能分量并由此拥有一种非常不均等的构建的有效性——而这些组成阶级条件的决定性系统的不同因素能够作为客观上被分开或实际上被动员的群体之间的真正划分原则起作用——那么这些划分原则本身也被等级化了,而且以一种次要标准(比如性别或年龄)为基础被动员的群体较之以基本的条件决定因素为基础被动员的群体而言,其结合的持久性和相似性要弱。

¹⁴ 什么也没做,尤其没有得出数据的再收集和分析的实践逻辑以及在社会科学中通行的科学性的表象,以便让人们理解和接受这样一种思想模式。相反,一切都倾向于要求这种技术理论解决它不过是转移的一个问题:比如戈德堡(Goldberg)的做法就属于这种情况,他在一篇具有这类做法中不大常见的真正严格性的文章中,求助于“因果关系推理”的方法,以便依靠局部的相互关系检验不同的解释模式,这些局部的相互关系表现了对一个特殊领域如选举而言最具决定性的“因果关系”(A. S. Goldberg, 'Discerning Causal Pattern among Data on Voting Behavi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6, 60, pp. 913-922)。可见,数不清的局部模式是在这里或那里、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逐渐被创造的,以解释宗教修行、政治选择或食物消费等,但是,拒绝满足于这些局部模式并且拒绝考虑解释理论的细分是否取决于需要解释的东西的逻辑或解释方式的逻辑,这或许并不是迎合某种形而上学的怀旧。

被逐一考虑的不同因素与所考察实践之间的线性关系,分析的必要性迫使将它们单独抽出来;通过每个因素,所有其他因素的有效性得以发挥出来,决定的多样性并不导致不确定,而是相反,导致多种条件决定:因此,生物学的或心理的决定和社会决定的重叠在通过社会确定的性别身份(社会人格的基本维度)的形成中不过是一种逻辑的一个特殊的但非常重要的情形,这种逻辑在其他生物学决定的情形(比如衰老)中也起作用。

构成被构建的阶级的因素彼此并非全都在同等程度上互相依赖,而且这些因素构成的系统的结构是由这些因素当中具有最重要的功能力量的因素决定的,这是自然而然的,因此资本的总量和结构赋予其他因素(年龄、性别、住所等)强加给实践的决定性以特定的形式和价值。性别属性也与阶级属性密不可分,如同柠檬的黄色与它的酸味密不可分一样,一个阶级在它通过地位和价值具有的最根本的东西中确定自身,它赋予两性及其被社会构成的配置以地位和价值。这就使得,有多少种阶级和阶层,就有多少种体现女性特征的方式,而且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在不同社会阶级内部,在实践中如同在表象中,体现了完全不同的形式。因而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的真实体现在它按照性别和年龄的分布中,甚或,因为涉及到它的未来,体现在这种分布在时间进程中的变化:最低的位置通过这些位置上包括大量的——而且不断增加的——外国人和/或妇女(熟练工人、普通工人)或外国妇女(女佣)这个事实表现 120

出来，¹²¹同样，个人服务和护理行业，社会医疗服务，个人护理业务，过去的比如理发师或新兴的比如美容师，尤其是家政服务这些位置，实际上被留给妇女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类行业兼备妇女任务之传统定义的两个维度，即服务和家务。最古老的阶级或阶层比如农业经营者和工商企业主成为没落阶级也不是偶然的，出身这类阶级的大部分年轻人只能通过向正在壮大的职业转行而找到一种逃避集体没落的方法。同样，一种职业的整体变化，特别是绝对或相对的贬值，表现在妇女人数的增加中，这种贬值可能源自劳动本身的性质和组织的变化（比如办公室工作就属于这种状况，因为各种各样机械的和重复的任务通常留给妇女）或在社会空间中相对位置的改变（教师就属于这种状况，教师的位置受到行业的整体平移的影响，这种平移源自被提供的位置数目的总体增加）。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分析婚姻身份与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曾经指出，男人的独身不是小农的一个次要属性，而是影响这个农民阶层的危机的一种主要表现；象征统治的特定逻辑决定的生物学的和社会的再生产机制的失常是导致阶级产生深刻变化的集中过程借以实现的媒介之一。但仍旧在这里，应该如我们在分析教育水平时所做的那样，让共时观念服从一种真正的分析活动：结婚之事实与独身之事实对立，不只表现为有一个合法配偶之事实

¹²¹ 在1968年和1975年间，技术含量最高的工种男性化速度比过去更快了，相反，技术含量最低的工种非常迅速地女性化了：普通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中女性的比例经过1962年和1968年的下降之后，重新增长，从1968年的24%上升到1975年的28%（cf. L. Thévenot, *Les catégories sociales en 1975, L'extension du salariat, Economie et statistique*, 91, juillet-août 1977, p. 6）。

与没有一个合法配偶之事实对立。只要想想几个(非常不均等地常见的)极限状况,如无职业的妇女的状况、靠妻子养活的艺术家的状况、靠女婿身份谋得职位的企业主或企业管理者的状况,就会看到很难在不涉及所有属性的情况下描述一个人的特点,这些属性通过他者体现在每个配偶身上——不只是在女人身上,如名字(有时是一个表示贵族的介词)、财产、收入、关系、社会身份(夫妇中每一方的特点都在不同程度上依照其性别、社会位置和两个位置之间的差距,由其配偶的位置确定)。如果不把通过婚姻获得和/或拥有的财产计入能够决定实践和属性的财产的体系,就要如人们通常所做的,不去考虑什么是实践主体,或更简单地,不去考虑被提问的“主体”是否真是人们对之询问其实践的主体。其实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会看到许多策略不过是在家庭群体成员(家庭或有时是扩大的家族)之间的关系中具体地确定自身的,这种关系本身依靠与夫妻双方相关的两个财产系统之间的关系。当共同财产具有某种经济和社会重要性时,这些财产,比如住房或家具,甚或个人财产如衣服,如同在其他社会中为儿子或女儿选择配偶一样,是确定家庭统一的(被否认的)权力关系的共同结果:因此,比如,我们有充足理由假设,由于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的逻辑赋予女人在趣味方面(如同男人在政治方面)的优越性,男人在选择衣服方面特有的趣味的分量(进而他的衣服表达这种趣味的程度)不仅依靠继承的文化资本和他拥有的学校教育资本(在这个领域如同在别处,当学校教育资本增加时,传统的角色分工有减弱的倾向),也依靠他的妻子拥有的学校教育和文化资本以及把两者区分开的差距(妇女在政治方面的偏好的影响也是如此,妻子的学校教育

资本越多,她的资本和她的丈夫的资本之间的差距越小,甚或她越占上风,将政治变成男人事物的法定分配作用发挥的可能性就越小)。

122 社会阶级与轨迹阶级

但是并不尽然。一方面,行动者并非全然由他们在一个既定时刻拥有的财产——获得财产的条件在习性中继续存在(习性的滞后作用)——来界定,另一方面,原始资本与最终资本之间的关系,或者不如说,社会空间中的原始位置与当下位置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强度多变的统计学关系。尽管在共时性方面被统计的财产的获得条件总是存在于构成习性的配置中,但是这些条件只是在获得条件与应用条件之间不一致的状况中,¹⁶也就是当习性产生的实践表现得不大适合时得到强调,因为这些实践符合客观条件的一种过去状况(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堂吉诃德效应)。将在一个特定时刻拥有相同的财产和占据相同社会地位但是被其出身分开的行动者的实践进行比较的统计学分析,完成了一种类似于普通感知的行为,普通感知依靠风度或举止的微妙迹象,在一个群体中指明暴发户或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在一个被考察的群体中,不同于当前条件的存在条件的作用,或同样地,不同于模态轨迹(trajectoire modale)的某种社会轨迹,表现在这些微妙的迹象中。

个体在空间中并非偶然地迁移,这部分是因为一些力量把这

¹⁶ 获得方式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状况下非常明显这个事实是这种作用的一种特殊表现(比如学校教育式获得方式与“社交”情形之间的不一致)。

个空间的结构赋予了这个空间并(通过比如淘汰和指导的客观机制)强加给他们,部分是因为他们以自身的惯性也就是他们的属性抵制场的力量,这些属性能够在被归并的状态下以配置的形式存在,或者在被客观化的状态下存在于财产、头衔等中。与被继承资本的一个确定总量相对应的是可能性大致相等的、导向大致相等位置的一连串轨迹——这是客观上呈现给一个确定行动者的可能性的场——;而且从一个轨迹到另一个轨迹的过渡往往依靠战争、危机等集体事件或相遇、联系、保护等个人事件,人们通常把这些事件描述为(幸运或不幸的)偶然,尽管在没有被个人或群体的制度化干预(俱乐部、家庭会议、老友联谊会等)或“自发”干预明确改变时,它们本身与它们的降临者的位置和配置(比如有助于拥有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的人保持或增加这种资本的“关系”意识)具有统计相关性。由此,位置和个人轨迹在统计学上并不是独立的,所有到达位置并非对于所有出发点都有均等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位置与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的配置之间,或同样地,与导致他们占据这些位置的轨迹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紧密的相互关系,因此,这就意味着模态轨迹是组成阶级的因素之系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轨迹越是分散,如同小资产阶级所处的状况,实践就越不可归于按照共时性被确定的位置的作用)。¹²³

与一个位置有关的若干配置之间的一致性以及这些配置与存在于位置中的要求的表面上神奇的配合,一方面,是将提前适应的个人导向位置的机制的产物,要么他们自感适合这些职位如同它们为他们而设——这就是“天职”即对客观命运的预先赞许,它是由对出身阶级中的模态轨迹的实践参照规定的,要么在这些职位

的占据者看来它们原本就是这样的——这是建立在配置的直接和谐基础上的遴选,另一方面,这种一致性和配合是在一种生存的整个过程中建立在配置与位置、渴望与实现之间的辩证法的产物。社会衰老恰恰就是这种漫长的放弃活动,或不如说是(社会支持和鼓励的)终止投入的活动,这种活动促使行动者令其愿望符合其客观机遇,因此致使他们顺应自身的条件,变成其所是,满足其所有,哪怕是在其所是和所有方面努力地欺骗自己,并且借助集体的共谋,放弃逐渐地半途而废的所有间接可能性,以及由于不去实现而被认为不可实现的所有希望。

建立在原有资本与最终资本之间关系上的统计学特征使得人们无法仅仅依照属性充分解释实践,因为属性确定的是在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特定时刻所占据的位置:说明最初拥有某种经济和文化资本的一个阶级的成员由于一种已知的可能性注定遵循一种导向一个已知位置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轨迹,其实就是说明(无法在被考察的解释系统的范围内得到先验确定的)这个阶级的一部分人
124 注定要偏离这个阶级总体上最常见的轨迹,采取原本对另一个阶级的成员而言最可能的或高或低的轨迹,并因此由于上升或下降丧失身份。¹⁷ 轨迹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如同表现在以下这种状况中,即在一个特定时刻占据类似位置的个人被与其资本总量和结构在时间进程中的变化有关的差别分开,也就是被其个人轨迹分开,然而轨迹的作用很有可能被错误理解。一种实践

¹⁷ 这些“偏离的”轨迹的方向并不完全是偶然的:比如,一切都似乎指明,在下降的状况中,出身于自由职业者的个体更多地跌落到中产阶级的新阶层而教授的子女往往再次下降到稳固的小资产阶级行列。

与社会出身(社会出身由父亲的地位衡量,父亲的真实价值可能遭受被名义上的价值的恒定性掩盖的一种贬值)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两种(意义相同或不同的)作用的共同结果:一方面是由家庭或最初的生活条件直接实施的灌输作用;另一方面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轨迹的作用,¹⁸也就是社会上升或下降的经验对配置和观点实施的作用,原始位置在这种逻辑中不过是一条轨迹的原始起点,即社会职业的倾向据以确定自身的标志。这种区分显然体现在所有这类状况中,在这类状况中,出身于相同的阶层或相同家庭,进而服从人们可能以为相同的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灌输的个人,通过他们从不同的个人轨迹中得到的与社会世界的不同关系,依据他们是否成功地实现对于逃避其阶级的集体衰落必需的改行策略,倾向于在宗教或政治方面采取不同的占位。这种轨迹的作用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使社会阶级与宗教或政治观点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因为这种作用支配着在社会世界中所占据的位置的表象并进而支配着对这个世界及其未来的观念:走向衰落的个人或群体与处于上升阶段的个人或群体对立,后者即在他们面前拥有其未来也就是其存在的出身的平民阶级或文化的平民阶级,前者则永远重新创造着所有贵族的话语,即对天性的永恒的本质主义信仰,对过去和传统的赞颂,对历史及其惯例的不妥协保守主义的崇拜,因为他们对未来一无所求,只期待回到过去的秩序,他们期

¹⁸ 这种作用本身是灌输作用的一个基本维度,因为父亲轨迹的衰落倾向于有助于培养主动融入社会空间的原始经验。

125 待从这种回归中恢复他们的社会存在。¹⁹ 这种模糊不清在中产阶级中特别是在这些阶级的新阶层中是非常明显的,这些新阶层,作为不确定地带,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稳定的地位,在最高程度上实现了这个阶级总体上的特有属性,即使得轨迹极其分散的个人共存。这种轨迹的分散甚至在家庭单位的层次上也可以看到,这个层次比在其他阶级中更有可能把不仅由于其出身和社会轨迹而且由于其职业身份和学校教育水平而(相对)不一致的夫妻结合在一起(此外,这还有这样一个作用,即将新老生常谈中所说的“夫妻问题”也就是基本上是劳动的性别划分和性行为的划分问题提到首位)。

作为对(可能是零斜率的)集体轨迹的偏离,个人轨迹的作用是直接可见的,而集体轨迹的作用与个人轨迹的作用相反,它有不被照原样领会的危险:当轨迹对整个阶级或阶层,也就是对共同占据一个相同位置并加入相同的集体轨迹即确定上升或衰落的阶级的轨迹之全部个体发挥作用时,人们就可能将实际上是集体变化之产物的作用(如政治或宗教观点)归于共时地与阶级相连的属性。分析被这个事实弄复杂了,即一个阶层的某些成员可能进入一种与这个阶层总体上的轨迹方向相反的个人轨迹: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实践没有打上集体命运的标记(比如我们可以考虑,个人成功似乎与集体衰落背道而驰的手工业者或农业劳动者是否不再

¹⁹ 应该避免通过简单的对称性来思考处于上升阶段的群体:如果说学历对处于上升阶段的群体——而且他们越是被统治越是如此——是一种保护和一种反剥削的工具,那么学历总是倾向于作为一种区分和合法化的工具发挥作用,甚至在这种状况下也是如此。

那么受集体衰落的影响)。²⁰ 但仍旧在这里,应该避免实体论。因此,某些与社会阶级相关的属性可能在一个确定的场中既无效用又无价值——比如轻松自如和文化熟习在一个受到学校教育制度严格控制的领域中——,但这些属性可能在另一个场中,比如在一个上流社会的空间里或在同一场的另一种状况中,表现出其全部力量,比如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使得法国贵族有可能成为马克思所说的“欧洲舞蹈大师”的才能。 126

资本与市场

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用一个主要由其结构确定的因素系统取代一个甚至像社会职业等级——其主要影响来自它所支配的次要变量——那样有力的因素或一个一劳永逸地建立的指标,仍旧过于简单。²¹ 实际上,按照所考察的领域,是一种组成阶级的属性

²⁰ 应该考虑个人衰落是否与集体衰落具有相同的社会作用。我们可以假设后者比前者更允许或更支持集体反应(比如布热德²运动)。

²¹ 布热德(Pierre Poujade, 1920-2003),法国政治家,工会领袖。他发起了布热德运动,呼吁维护商人和手工业者,谴责第四共和国的议会制度无用,以良知和小人物的名义反对名人、显贵、税收、摒弃知识分子。布热德运动近来越来越具有蛊惑人心的行会主义、民众主义的含义。——译者

²² 这自然不意味着拒绝使用某些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兼并由一系列因素包含的基本信息,如路德维克·勒巴尔(Ludovic Lebart)和尼科尔·塔巴尔(Nicole Tabard)为“概括”由父亲和母亲的直系亲属的职业、夫妇两人的职业、毕业年龄和教育水平提供的有关每个家庭的信息而建立的社会文化身份指标。无论如何,如这些作者非常正确地指出的,我们只有在严格统计学的意义上理解“解释”这个词,才能承认这个综合变量的一种“解释能力”(cf. L. Lebart, A. Morineau et N. Tabard, *Techniques de la description statistique*, Paris, Dunod, 1977, p. 221);对这些指标的天真使用远远没有推动研究,倒很可能起到排除在每个状况中都有效的变量的特定构型之问题的作用。

体系的特定构型 (configuration) 在发挥效用, 这个阶级是由在所有实践领域中都有效的所有因素的整体以完全理论的方式构造和确定的, 这些因素包括在具体情况下并在其变化 (轨迹) 中被确定的资本总量和结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住所等。是场的特定逻辑, 是在场中起作用的东西的特定逻辑和为了加入场的游戏必不可少的那种资本的特定逻辑, 支配着阶级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借以建立的那些属性。²² 为了理解 (决定在阶级斗争场中所占据的位置和被这个位置决定的) 相同的属性系统总是具有最大的解释力量, 无论所考察的领域是什么, 食物消费、贷款或生育、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等, 并且为了理解为什么与此同时, 构成这个系统的因素的相对分量从一个场到另一个场不断变化, 在不同的领域, 这个或那个因素会被排在首位, 这里是学校教育资本, 那里是经济资本, 别处是社会关系资本, 诸如此类。我们必须认识到, 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 也就是一种社会能量, 这种能量只在它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场中存在和产生其作用, 每个与阶级有关的属性都从每个场的特定法则中获得其价值和有效性: 在实践中, 也就是在特定的场中, 与行动者相连的所有被归并的属性 (配置) 或被客观化的属性 (经济或文化财产) 并非总是同时有效的; 每个场的特定逻辑决定

²² 由于无法对每个解释性因素进行这种双重联系, 人们可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无视以下这一点, 即在被考察因素中“发挥作用”的东西依靠它被纳入的体系和它在当中“发挥作用”的条件; 或者更简单地说, 这些错误在于没有提出“独立变量”的真正有效性原则问题, 就好像在由往往不过是一个指标的东西 (比如教育水平) 所指明的因素与这种或那种实践 (比如回答政治问题的比率, 或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运用审美配置的能力、参观博物馆或对音乐家的了解等) 之间观察到的关系本身不需要得到解释一样。

了在这个市场上通行的属性,这些属性在所考察的活动中是合理的和有效的,并在与这个场的关系中,作为特定资本且由此作为实践的解释因素发挥作用。这非常具体地说明,行动者在一个特殊场中被分配的社会地位和特定权力首先是依靠他们能够动用的特定资本,无论他们的财富表现为这种还是那种类型的资本(这种资本还是能够发挥一种传染作用)。因此这种分析在阶级与实践之间发现的关系似乎在每种情况下都可以通过依据场而变化的一个因素或各种因素的特定组合建立起来,便可以得到解释了。这种表面现象本身是以下这个错误的根源,这个错误在于只要有场,就要创造那么多解释系统,而不是在每个场中看到所有其他场的一种被转变的形式,或更糟的,这个错误在于将一个特殊的实践场中的有效因素的特殊组合变成普遍的解释原则。为了解释某个特定的财产或实践阶级的分布状况,也就是在某个确定的时刻建立的一种阶级斗争情况——而这场斗争是以这个特定的财产或实践阶级为赌注(鱼子酱或先锋派绘画、诺贝尔奖或国家市场、激进观点或高雅体育运动等)的——需要建立解释因素系统的特定构形,这种构形是被客观化的资本(属性)也是被归并的资本(习性)体现在这个场中的形式,这种资本从本质上确定了社会阶级并构成了区分的也就是被划分的和能够划分的实践的产生原则;它表现了属性系统的一种状况,这些属性将阶级变成了一条普遍的解释和划分原则,这条原则确定了在所有可能的场中占据的地位。

一个三维的空间

出于这种考虑,即重构从习性的生产条件观点来看最有一致性的统一体,也就是在基本生活条件和这些条件施加的影响方面重构这些统一体,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的三个基本维度将由资本总量、资本结构和(由社会空间的过去的和潜在的轨迹表现的)这两个属性在时间中的变化来确定。²³

最初的差别,即将各大阶级的生存条件区分开来的差别,在作为实际上可利用的一系列资源和权力的资本总量中找到了其根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按照从那些同时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方面最富有的阶级到那些在这两方面最匮乏的阶级分布(参见下面的图5)。自由职业的成员拥有高收入和高学历,他们往往(52.9%)来自统治阶级(自由职业者或高级管理者),收入很高而且消费很大,无论在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方面都是如此,他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办公室职员以及更明确地与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尤其是普通工人和农业雇佣工人形成对立:办公室职员几乎没有文凭,往往出身于民众阶级或中产阶级,收入很低,几乎不消费并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保养汽车和干零活上,而普通工人和农业雇佣工人则拥有最低收入,没有学历并且几乎全都(因为农业

²³ 为了不将对构成这种研究的中心对象的东西的分析过分复杂化,我将在另外一本论述社会阶级的著作中说明这种构建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关于资本的类型及其特定属性、支配社会能量的这些不同状态之间转换的法则的理论,这种理论也与阶级和阶层的理论密不可分,阶级和阶层是由拥有总量和结构确定的一种资本决定的。

雇佣工人占 90.5%且普通工人占 84.5%)出身于民众阶级。²⁴

以资本总量为原则的差别大约总是无论对常识认识还是对“学者”认识都掩盖了次要差别,在每个被其资本总量确定的阶级内部,次要差别分开了由不同的财产结构也就是由资本总量在不同种类资本之间的分布的不同形式确定的各个阶层。²⁵ 考虑财产的结构——而并非如人们总是暗中所做的那样,仅仅考虑在一个确定的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种类,如“出身”、“财富”或“才能”,如同人们在 19 世纪所做的——就是设法进行更准确的划分,与此同时领会不同种类之间的分布结构本身的特定作用,这种结构可能是对称的(比如在将一种非常强大的文化资本与非常高的收入相结合的自由职业者状况中)或是不对称的(在中学、大学教师或企业主的状况中,占统治地位的种类在前一种状况中是文化资本,在后一种状况中则是经济资本)。于是我们获得了两个同源位置系列。其再生产依靠往往是经由继承而来的经济资本的阶层,在高

²⁴ 教育方面的差距比收入方面的差距更加鲜明而且不管怎么说都更明显,这是因为(建立在纳税申报基础上的)收入情况不像学历情况那么可靠;尤其是对工商企业主(在广告宣传手段研究中心——S. C., V——的调查中,他们和医生对收入问题不予回答的比例最高)、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业经营者而言。

²⁵ 在这个模式力求以统一而有系统的方式分析的诸难点中,最明显的是往往由其他人得出的看法(例如 S. C., VIII),这种看法认为,无论是在统治阶级内部由高等管理者构成的一方与工商企业主构成的另一方之间可观察到的等级,还是在中产阶级内部中等管理者与手工业者或商人之间可观察到的等级,都随着被考察的实践或财产变化——这好像为社会阶级的相对主义批判提供了一种依据,只要人们看不到这些实践或这些财产的性质之间的关系,比如一方是看戏,另一方是拥有彩色电视机,并看不到相应的群体的资本特点,就会这样认为。

等层次上是工业家和大商人，²⁶在中等层次上是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与（当然相对地）最缺少经济资本且其再生产主要依靠文化资本的阶层对立，后者在高等层次上是大学教授，在中等层次上是小学教师。²⁷

130 从艺术家到工商企业主，经济资本的总量持续增长而文化资本的总量则在下降，鉴于这一点，我们看到统治阶级按照一种交错配列法的结构组织起来。为了建立这种结构，应该通过一项调查获得的不同指标，依次检验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各阶层中的分布并让这些分布的结构彼此互相联系，这项调查的优点是将国营部门的管理者与私营部门的管理者区分开来(S. C., V)。

当我们考虑财产指标时（如我们在下面将要做的），等级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等级依据拥有经济资本的数量在各个阶层之间建立，而且从工商企业主到教授递减，而当我们如同在这里一样只涉及消费指标（汽车、游艇、旅馆）时，这种等级就不那么显眼，消费指标既不完全恰当也不完全对应：第一个（汽车）也取决于从事职业类型而另外两个取决于空闲时间，

²⁶ 在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中，工业家人数不怎么多，他们与商人分在一起，他们申报的收入明显高于后者（33.6%的工业家公布自己的收入在100 000法郎以上，只有14.5%的商人公布自己的收入在100 000法郎以上）。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调查(S. C., I)指出的那些人因此更接近新兴资产阶级而非商人：他们公布的大多是工资、薪水、股票，很少是工业、商业或非商业利润。

²⁷ 至于按照资本总量而被明显分成各等级的民众阶级，可使用的数据使我们不能把握第二维度上的差别：尽管将熟练工人与技术工人分开的差别也许是生活风格和宗教或政治观点上的差别的根源，情况依旧如此。熟练工人出身农村，来自一个外省工厂，没有文凭，生活在农村的一个由继承而来的农场里；而技术工人来自巴黎地区的一个企业，世代属于工人阶级，拥有一种特长或技术职称。

此外据我们所知,空闲时间大致与经济资本成反比;拥有一所住房也依据居住相同住所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在管理者、工程师和教授中较差)。至于收入,则不同程度地被缩减到最低程度(不申报的比率可以被视为低报倾向的一个指标)并不同程度地附加了次要收入,如用餐或公务旅行(此外我们知道这些次要收入从教授到私营部门的管理者和企业主递增)。

表 6 统治阶级各阶层的经济资本的几个指标的变化(S. C., V)

	教授	国营部门 管理者	自由 职业者	工程师	私营部门 管理者	企业主	商业经理
房主	51	38	54	44	40	70	70
车主							
高等阶级	12	20	28	21	22	34	33
船主	8	8	14	10	12	14	13
旅馆度假	15	17	23	17	21	26	32
中等收入(几 千法郎)	33	32	41	36	37	36	33
不申报收入的 比例	6	8	27	9	13	28	24

在涉及文化资本的方面,除了几个相反的例子,次要变量如住房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供给和收入连同保证收入的手段表现在文化资本中,不同的阶层按照一种颠倒的等级组成(按照拥有的资本种类,文学的、科学的或经济的种类的区分,看起来非常明显,尤其是因为工程师对音乐和对“智力游戏”如桥牌或国际象棋表现出的兴趣比对文学活动——阅读《费加罗报文学版》或看戏——表现出的兴趣大)。

131 表 7 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的文化实践的几个指标的变化(S. C., V)

	教授	国营部门 管理者	自由 职业者	工程师	私营部门 管理者	企业主	商业经理
读非专业书(1)	21	18	18	16	16	10	10
演出,戏剧(2)	38	29	29	28	34	16	20
听古典音乐	83	89	86	89	89	75	73
参观博物馆	75	66	68	58	69	47	52
参观画廊	58	54	57	45	47	37	34
有调频收音机	59	54	57	56	53	48	48
没有电视机	46	30	28	33	28	14	24
读《世界报》(3)	410	235	230	145	151	82	49
读《费加罗报 文学版》(3)	168	132	131	68	100	64	24

1. 每星期 15 小时以上。
2. 至少两三个月一次。
3. 分辨指标为 1000。

这些指标无疑倾向于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其实,大部分文化消费也意味着一种经济成本,比如看戏不仅依靠教育水平也依靠收入;此外,类似调频收音机或高保真组合音响这类机器可能被派上非常不同的用场(例如听古典音乐或舞曲)并参照其可能用途所占的统治地位等级,与读书或看戏的不同形式一样具有非常不均等的价值。其实,不同阶层是按照他们对不同类型的阅读表现出的兴趣而被划分等级的,随着不断趋向最少见的阅读,他们的地位倾向于接近他们在按照拥有文化资本的总量建立的等级中的地位,这种阅读往往与教育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处在文化合法程度等级的较高处(见图 8)。

同样我们看到(S. C. XVI, 表 215a),随着从先锋戏剧或被这样看待的戏剧到古典戏剧,以及尤其是从古典戏剧到大

部分观众来自统治阶级中最无“智识”的阶层的通俗喜剧,教授(和大学生)在不同的戏剧观众中的代表之过多现象在持续减弱,而其他阶层(不幸在统计中被混同的工厂主、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的代表之过多现象在增强。

表 8 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的阅读类型(S. C., V)

132

	教授	国营部门 管理者	自由 职业者	工程师	私营部门 管理者	企业主	商业经理
侦探小说	25(6)	29(1)	27(4)	28(3)	29(1)	27(4)	25(6)
惊险小说	17(7)	20(3)	18(6)	24(1)	22(2)	19(4)	19(4)
历史故事	44(4)	47(2)	49(1)	47(2)	44(4)	36(6)	27(7)
美术书	28(2)	20(3)	31(1)	19(5)	20(3)	17(6)	14(7)
小说	64(2)	68(1)	59(5)	62(3)	62(3)	45(6)	42(7)
哲学	20(1)	13(3)	12(5)	13(3)	15(2)	10(7)	12(5)
政治	15(1)	12(2)	9(4)	7(5)	10(3)	5(6)	4(7)
经济	10(1)	8(3)	5(6)	7(5)	9(2)	8(3)	5(6)
科学	15(3)	14(4)	18(2)	21(1)	9(7)	10(6)	11(5)

* 我们已经通过加重强调了最强烈的倾向。括号内的数字表现了每个阶层的排名。我们把经济和科学作品的阅读单独分开,因为这些文类的兴趣取决于一些次要因素,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从事职业的类型(私营部门的管理者和企业主的排名由此而来),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智识培养的类型(工程师的排名由此而来)。

表 9 统治阶级成员的社会出身依阶层的变化(S. C., II)

	儿子:					
	企业主	商业经理	自由 职业者	工程师	国营部门 管理者	教授
父亲:						
企业主	33.5	2.8	2.3	6.1	4.4	1.5
商业经理	1.9	31.0	—	1.8	5.0	0.8
自由职业者	0.6	0.9	20.0	0.9	2.4	7.6
工程师	—	—	6.4	6.7	2.3	4.6
国营部门管理者	1.9	3.3	9.9	13.2	14.2	7.6
教授	0.6	—	2.9	2.7	0.3	6.1
整个阶级	38.5	38.0	41.5	31.4	28.7	28.2

在确定了经济资本的分布结构是对称的并与文化资本的分布结构相反之后,我们就能提出两个等级化原则的等级问题(不要忘记这一点,即这个等级时时刻刻都是一个斗争赌注而且在某些场合下,比如今天的法国,文化资本可能是对经济资本实行支配的条件之一)。我们可以把这些阶层之间几代内的迁移频率当成这两条统治原则之间的力量关系状态的指标。如果我们把一个位置的成员来自总体上的统治阶级或本身被视为统治阶层之人数视为一个位置的稀缺(或者同样地,它的封闭)指标,我们就会看到,如此获得的等级,对于一个或另一个指标而言,非常符合按照经济资本总量确立的等级:从企业主到教授,来自统治阶级的每个阶层成员的数量,如同其目前所属阶层与其出身阶层相同的个体的数量一样,同时在降低,其中三个高级阶层(企业主、商业经理和自由职业者)与三个低级阶层(工程师、国营部门的管理者和教授)之间被明显隔开。

我们可以用不同阶层对其社会再生产条件的支配非常不均等这个事实与这些指标的使用进行对照,这样,内生的企业主的高比例只能表明这些阶层(或至少他们的一部分成员)具有能无中介无限制地传承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能力。事实上,这种能力本身是一种最稀缺的特权,这种特权给予一种相对于学校教育评判的更大自由,使得那些完全依靠学校教育系统进行再生产的人无法避免的文化投入变得不那么必要,不那么急迫。事实上,那些在文化资本方面最富有的阶层倾向于在其子女的教育方面,同时在能够保持和增加其特定稀缺性的文化方面投入更多;而在经济资本方面最富有的阶层则为了经济投入而搁置文化和教育投入,在这点

上工商企业主比私营部门管理者组成的新小资产阶级更甚,后者表现出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都进行合理投资的相同想法;自由职业者(尤其是医生和律师)在两种形式的资本方面相对富有,但是很少融入经济生活,无法在当中主动地投入他们的资本,因此他们既在子女教育方面也在某些消费方面进行投入,这些消费足以代表对符合资产阶级生活艺术之法则的物质和文化手段的拥有并能够由此提供一种社会资本,即如有必要能够提供有用“支持”的社交关系资本、声望和尊严的资本,这种资本对于招来或获得上流社会的信任并由此招来或获得它的主顾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通过比如一种政治职业兑现。

鉴于学业成功主要依靠继承而来的文化资本和在学校教育系统中投资的倾向(而且对于一个确定的个体或群体来说,维持或提高其社会地位越是完全依靠学校教育成功,学业成功就越重要),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即一个学校教育机构在教育机构的(由从前的学校教育成功指标衡量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校教育等级中所处的地位越高,来自在文化资本方面最富有阶层的学生在这个机构中的数量就越多,并在负责保证职业机构的再生产的机构中达到了极点(高等师范学校)。¹³⁴事实上,高等教育机构促进了统治阶级的再生产,如同统治阶级,高等教育机构也按照两条对立的等级化原则构成:在学校教育机构内部的占统治地位的等级,与学校教育机构之外的占统治地位的等级截然对立,前者对机构进行的排列,是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标准并相应地按照属于在文化资本方面最富有的阶层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后者对机构进行的排列,是按照其成员在经济资本或权力方面最富有的阶层中的比例

和这些阶层导向的职业在经济资本和权力的等级中所占的位置。如果被统治阶层的子女在世俗的最高机构(比如国家行政学院或高等商业学校)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于人们根据他们先前的学业成功和这些机构在严格意义上的学校教育等级中所占的位置所预测的比例,这当然是因为这些机构与严格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标准保持距离,但也因为对学校教育系统的依赖越彻底(对其他等级化原则缺乏理解能力在教师子女的身上从未表现得如此彻底,他们的家庭培养使他们倾向于将一切成功等同于学校教育成功),学校教育等级就越绝对地建立起来(比如它让人决定选择高等师范学校的理学院而非综合工科学校,或选择高等师范学校的文学院而非政治科学院)。

在中产阶级的层次上可以看到同样处于交错配列的相同结构,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看到文化资本的总量下降而经济资本的总量上升,这是从小学教师到中等工商企业主、中等管理者的序列展开的,技师和办公室职员占据了一个中间位置,这个位置类似于在高等空间中属于工程师和管理者的位置。靠工商业利益生活的艺术工业者和商人,在这种关系下接近其他小企业主,但他们通过一种相对丰厚的文化资本,与后者区分开来,这种文化资本使得他们接近新小资产阶级。至于社会医疗机构的人员,他们在较大的比例上来自统治阶级,²⁸他们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大致相当于自由职业者(尽管他们稍微偏向文化资本一极)的位置:唯有他们不仅拥有工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像自由职业者一样)也拥有非商业利益。

²⁸ 社会医疗机构这个等级的特征表现在这个事实中,即它接纳大部分出身于民众阶级的男人和很大一部分(25%)出身于高等阶级的妇女(参见两幅柱状统计图)。

我们立刻看到,统治阶级空间与中产阶级空间之间的同源性通过这些空间的结构是相同原则的产物这个事实而得到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看到,通常年纪更大、几乎没有什么自由时间、通常是企业主或农业经营者的后代的所有者(拥有房屋、农村或城市财产和有价值证券的人)与尤其拥有学校教育资本和自由时间、出身中高等阶级或工人阶级的被雇佣阶层的非所有者之间互相对立。同源位置的占据者,比如小学教师与教授或小商人与大商人,主要由在他们的财产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那类资本的总量分开,也就是被等级差别分开,这些差别把不均等地拥有相同稀缺资源的个体分开。低级位置——以及相应地,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的配置——的部分属性得自这些位置客观上参照它们所倾向的和预先倾向(覬覦)的高级层次的相应位置;这一点在被雇佣的小资产阶级状况中非常明显,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如上夜校,在图书馆注册,搞收藏——表现的苦行道德和良好的文化意愿,非常明显地表达了对升至高位的渴望,这些更高位置是显示这种配置的低级位置占据者的客观命运。²⁹

²⁹ 为了尽可能彻底地重建习性生产的社会条件,也应该考虑行动者所属的阶级和阶层的社會轨迹和父母两个世系的财产在多代之内的变化,这种社会轨迹通过共同未来的可能倾向,支配相对于未来的前进或后退的配置,而两个世系的财产的变化,通过在习性中持续存在,将划分引入了像阶层一样同质的群体内部。为了对状况的多样性有一个总体概念,只要指出以下这一点就够了,即一种社会轨迹表现了在一个人自我的生活过程中变化着的诸因素之组合,这些因素包括可能非常粗略地被描述为增加的、下降的或停滞的资本总量,(可接受相同区分的)每种类型的资本总量,进而是资本的结构(稳定的总量可以掩盖结构变化),而且同样地还有父亲和母亲的财产的总量和结构以及他们不同种类的财产的各自分量(比如父亲在经济资本方面中所占的优势和母亲在文化资本方面中所占的优势的不对称性,或情形相反,或均等),进而是祖父和外祖父的资本的总量和结构。

为了更全面地解释不同阶层之间的生活风格的差别——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的差别，应该考虑这些差别在一个被社会划分等级的地理空间内的分布。其实，一个群体可能拥有的占有某个等级的（由获得期待值衡量的）稀缺财产的机会，一方面依靠这个群体的特定占有能力，这种能力是由这个群体为了在物质和/或象征方面占有既定财产而利用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决定的，也就是依靠它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依靠这个群体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与稀有财产在这个空间中的分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够按照与财产或设施的平均距离或移动时间来衡量——这就涉及个人或集体的交通手段之获得）。³⁰ 换句话说，一个群体与财产的真正社会距离应该包括地理距离，而地理距离本身依靠群体在空间中的分布，以及更确切地，依靠群体相对于经济和文化“价值发源地”，也就是相对于巴黎或地区大都市的分布（比如我们知道某些职业要求的住所方面的限制，在这些职业中，入职——比如邮政金融业务——或升职服从于一种时间延续或长或短的迁居）。³¹

³⁰ 应该清点所有这些文化属性，这些属性按照个人在地理空间中的位置，此外通过空间的邻近所支持的社会接触（“经常光顾”）的性质出现在这些个人身上。最显著的属性之一也许是发音，发音以最可靠的方式说明了一种或多或少被贬低或被看重的出身。

³¹ 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在被社会分成等级的地理空间中的分布——尤其是这个阶级或阶层与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距离——除了构成它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的表现之一，大约总是它内部等级的一种表现。因此，比如，如果人们通过对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1967年进行的娱乐调查的二度分析认定，在所有社会职业等级内，当居民点的规模（文化供给的良好指标）扩大时，文化活动就增加了，这无疑部分地因为，所使用的等级表面上的一致性掩盖了这些等级内部按照居民点的规模尤其是在拥有的文化资本方面的差别。

因此,比如说,如果固有的文化距离不因地理差距而加剧,农业劳动者与合法文化财产之间的距离不会那么大,这种文化距离与他们菲薄的文化资本相关,而地理差距来自表明这个阶级特征的空间分散性。同样,在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的(文化或其他)实践中可见的许多差别无疑与他们按照居住城市规模的分布有关,因此,由工程师和私营部门的管理者构成的一方与由工商企业主构成的另一方之间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事实,即前者多是巴黎人并且属于相对重要的企业(私营部门管理者在只有1—5个雇员的企业工作的只有7%,在中等企业中工作的有34%,而在50个雇员以上的企业中工作的有40%),而后者大多数是小企业的领导(据1966年的法国民意调查公司的调查——S. C. V——工业家 137 中的6%雇用1—5个雇员;70%雇佣6—49个,24%雇佣50个以上,对于商业经理来说,相应的数字是30%、42%和12%),并且大部分来自外省甚至农村(根据1968年的统计,22.3%的工业家和15.5%的商业经理住在农村市镇,14.1%的工业家和11.8%的商业经理居住在少于10 000居民的市镇)。

我们这样获得的表象不该如此难以获得,如果这种表象不意味着与关于世界的自发表象决裂,“社会阶梯”的比喻概括了这种自发表象,有关“流动性”的全部日常用语以及“上升”或“衰落”的用词说明了这种自发表象;如果这种表象不同时意味着与整个社会学传统的断然决裂:当这种社会学传统不满足于自己暗中重拾社会空间的一维表象时,如同关于“社会流动性”的研究所做的那样,就让这种表象服从于一种虚假的科学构建,将社会空间还原为一个抽象阶层(上层资产阶级、中层资产阶级等)的连续体,这些抽

象阶层是通过指标构建(消灭结构的典型工具)许可的不同种类的资本之集合获得的。³² 构建连续的、线性的、同质的和一维的系列意味着向唯一一条中心线的投射,人们通常将这种构建等同于社会等级,这种投射要求一种非常困难的操作(当这种操作无意识时,就非常危险),这种操作旨在将不同种类的资本还原为单一的标准并且按照相同的尺度衡量比如企业主与教授(或手工业者与小学教师)之间的对立以及企业主与工人(或高级管理者与职员)之间的对立。这种抽象的操作在按转换比率把一种资本转换为另一种资本的这种总是呈现的可能性中找到了一种客观基础,而这种转换的比率随时间而变化,也就是随不同种类的资本的持有者之间的力量关系状况而变化。一个二维空间的构建迫使我们提出不同种类的资本的可转换性的公设,而这个公设是将空间还原为一维性的条件,而这种构造其实有助于使我们看到这一点,即不同种类的资本的转换比率是不同阶层之间斗争的基本赌注之一,尤其是为了占统治地位的统治原则(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最后一种资本通过声望和关系网的范围和质量与在阶级中的资历密切相连)的斗争的基本赌注之一,不同阶层的权力和权威与这种或那种资本有关,占统治地位的统治原则每时每刻都使得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互相对立。

³² 格哈德·伦斯基(Gerhard Lenski)的功绩在于看到了不同种类资本之间的不协调并指出了这些资本可能发挥的某些隐藏最深的作用(尤其是与一种强烈的身份“幻灭”有关的“自由主义”倾向)。无疑由于迎合一种指标构建的实证主义惯例,他阻止自己得出他直觉上的所有结论(Cf. G. Lenski, Status Crystallisation: A Non-ver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 1954, pp. 405-413)。

社会学话语的困难之一来自这个事实,即社会学话语如同任何话语一样,都是以严格的线性方式展开的,于是为了避免片面的观点和偏颇的直觉的简单主义和错误,应该在社会学话语的每一点上强调关系网的全体性,这种全体性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种话语。这就是为什么看来有必要以一种简图的形式,给出一种抓住社会空间结构与象征属性的空间结构之间的关联的方法,这种图具有如索绪尔所说的能够“在许多维度上呈现同时发生的错综复杂关系”的属性,而社会空间的两个基本维度与分布在这个空间中的群体的资本的总量和结构一致,象征属性与在这个空间中分布的群体有关。但是我们并不希望这个图成为炼金术士眼里的水晶球,让人一眼就能看到在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我们准备像数学家——他们总是将其叫做“形象”的东西视为一种必然的缺陷——那样,把这个图表从运动中抽出以便展示它。其实如何能不担心,这个图会支持这类阅读,这类阅读将有区别的差距系统之间的同源性还原为群体与属性之间的直接而机械的关系?或者它鼓励客观主义意图固有的这种观淫癖的形式,这种形式将社会学家放在瘸腿魔鬼^①的角色中,这个角色掀开屋瓦,让惊奇的读者发现私人家庭生活的秘密?

为了对提出的理论模式有一个尽可能准确的想法,应该设想,我们将三个图叠加在一起(如同人们用彩色衬布所做的那样):第一个(这里的图5)表现不同种类的资本的总量和结构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分布所组成的社会条件的空间,每个群体(阶层)在这个空

^① 法国作家勒萨日(Alain-René Lesage, 1668-1747)的小说《瘸腿魔鬼》中的同名人物。小说主人公让瘸腿魔鬼把他放在每家每户的屋顶上,偷看这一家发生的事情,并借机讲述一个无头无尾的冒险故事。——译者

间中的位置是在这样被确定为直接相关的方面由一系列特有的属性来决定的；第二个(图6)表现生活风格的空间，也就是构成生活风格的实践和属性的分布，每个条件都体现在这种生活风格之中；最后，在前两个图之间，还应该引进第三个图，以表现习性的理论空间，也就是成为每个阶级的实践和属性之起源的生成公式(比如对教授而言，就是贵族式的苦行主义)的理论空间，也就是一种条件和一个位置的特有必然性和便利性变成一种区分的和特殊的生活风格的理论空间。'

在这样一种建构的局限中，最重要的局限来自统计学的缺陷，统计学能比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尤其是投入经济的资本)更好地衡量消费甚或在必要时衡量收入(除了次要的和隐藏的收益)和遗产即分派给个人或家庭的全部财产；接下来，最重要的局限来自分析142 的等级的不完善，这些等级即便是从直接相关的标准来看，其一致性也是非常不均等的，而且在工业家和大商人的状况中，禁止把拥有一种能够掌控资本的资本的人——也就是大老板分离出来。(由于不具备不同等级分布的严格指标，我们强调了成分最不均一的等级即农业经营者、工商企业家、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经济和文化分布，在确定这种分散性的界限中间，在垂直方向写出了相应的名称)。应该牢记，名称标志的位置只代表一个或大或小的空间的中心点，这个中心点能在某些状况下形成一个竞争的场。

由于不具备这样一种(也许在实践上是无法实现的)调查，这

i 尽管这个理论模式具有某些表面性，尽管我们是靠不同的对应分析建立了这个模式，尽管许多对应分析产生了按照相同的结构组成的空间(从对我们调查数据的分析开始，这些分析将被展示在下面)，但是在这里展示的图并不是对应分析的平面图。

种调查提供关于相同的代表样本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遗产及其变化的一系列指标,而这些指标对于构造社会空间的一种恰当表象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只好从以前的研究过程中获得的认识出发并且以从不同的调查中抽取的一整套数据为基础,建立这个空间的一个简化模式,这些调查全部是由国家统计局和经济研究所开展的,因而至少在涉及等级的构建方面是一致的(参见附录3):在国家统计局和经济研究所1967年所做的关于娱乐(关于男人的表)调查中,我们选取类似劳动时间这样的自由时间的指标(S. C., IV);在1970年关于职业培训和技能的调查中,我们记下了关于父亲的社会职业等级(社会轨迹)、父亲的文凭(继承而来的文化资本)和本人的文凭(学校教育资本)的数据(S. C., II);从关于1970年收入的调查中,我们获得了关于收入总额、农村和城市财产、股票、工商业利润和工资(经济资本)的资料(S. C., I);最后我们在1972年关于家庭消费的调查中抽取了有关消费总额、洗碗机、电话的拥有量、住房身份和别墅的数据(S. C., III),并且在1968年的人口普查中,抽取了关于居住地规模的数据。

对于每个用图形表示的群体,我们也首先用柱状统计图说明了每个位置的占据者依据将他们导向这个位置的社会轨迹的分布状况,这个柱状统计图表现了每个阶层中来自不同阶级的个体的部分"其次,说明了阶层总体的历史:上升的、下降的和水平的箭

ii 为了避免损害这个图的可读性,我们仅仅复制了几个标志性等级的柱状统计图:这足以显示来自高等级个体的部分——黑色柱状图——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而明显增加,而来自民众阶级的个体的部分——白色柱状图——则随之减少(未被复制的普通工人的柱状图表现了介于普通工人与技术工人之间的特征)。我们原本应该至少给出高等级和中产阶级从出身阶层来看的分布状况。

头表明着 1962 到 1968 年间所考察的阶层增加了(至少 25%)、减少了还是保持平稳,并由此明确表现了大力扩张的新阶层和既定的、稳定的或衰落的阶层之间的对立。因此我们努力表现在一个既定时刻构成社会空间结构的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状况,同时也表现既构成这种结构变化的一个结果又构成这种结构变化的一个因素的东西,也就是转换策略,个体(或群体)通过转换策略竭力维持或提高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

这个综合图把属于由一般分类系统分开——这种分开甚至使得简单的联系变得不可思议或耸人听闻——的领域的情况叠加在一起,并由此显示即时直觉所领会的一个群体特有的所有属性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而日常生活的分类就是靠直觉指导的,于是此图迫使我们寻找这些“选择”系统中的每一个的基础,一方面到以无法辨认的形式表现在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客观空间中的一个确定位置所特有的社会条件和影响中寻找,另一方面到与其他“选择”系统的关系中寻找,这个系统固有的象征意义和价值相对于其他“选择”系统确定自己:由于生活风格基本是区分性的,许多特征只有不仅与它们表现的社会位置而且与位于空间的另一极的特征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其全部的意义:这是首先在社会空间的两个基本维度中的一个和/或另一个上(也就是在资本的总量和结构方面)相距最远的位置之间建立的对立的情形:戈雅与雷诺阿、先锋派戏剧与通俗喜剧、雅克·布雷尔与迪诺·罗西、法国音乐台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或卢森堡电台、电影俱乐部与综艺节目,等等。除了调查直接收集的情况,我们还使用了全都从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 1967 年有关娱乐的调查(S. C. IV)中抽取的一系列文化消费指

标,这些文化消费包括比如拥有钢琴或唱片,看电视,参观博物馆、展览会,看综艺节目,看电影,在图书馆、学校注册,搞收藏,从事体育运动;从法国民意调查公司和广告宣传手段研究中心的调查(S. C. ,V 和 VI)中提取的关于统治阶级成员的消费和生活风格的情况(高保真音响、游艇、旅行、桥牌、收藏绘画、香槟、威士忌、从事的运动等);艺术行业促进协会的调查(S. C. ,XIV)提供的关于看戏的情况,法国民意调查所(S. C. ,IX 和 X)提供的关于受人喜爱的演员的情况,欧洲社会学中心和广告宣传手段研究中心的调查(S. C. ,XXVIII)提供的关于阅读报纸、周刊、杂志的情况;国家文化秘书处的调查(S. C. ,VII)提供的关于各种文化活动和实践的情况(瓷器、陶艺、集市日等)等等。

在这张如此绘制的图上,每个直接相关的情况只出现一次而且对社会空间的(因情况不同或大或小的)整个区域都有效,尽管这个情况出现的地方离一个等级的名称越近,越能代表这个阶层的特点(于是在表 5 左边的半高处标注的工资,与工商业利润对立,这种标注对于社会空间的整个左半边都有效,也就是既对教授、管理者或工程师有效,也对小学教师、中等管理者、技师、职员或工人有效;同样,拥有有价证券——在右上方——同时对企业家、自由职业者、私营部门管理者和工程师有效)。我们立刻就读144出,拥有钢琴或选择《左手钢琴协奏曲》尤其发生在自由职业者身上;步行和爬山尤其既代表中学教师又代表国营部门管理者的特点;被放在新小资产阶级和私营部门管理者或工程师中间的游泳,具有这两种职业的生活风格特征。这样,围绕每个阶层的名称集中了这个阶层的生活风格的因为最有区分性质所以最相关的特

征——此外这个阶层可以与其他群体分享这些特征：比如在图书馆注册就属于这种情况，注册这一行为大致代表了中等管理者、小学教师和技师，尽管它在教授身上至少同样常见，但毕竟不那么明显，因为这种做法构成了他们的职业角色。

转移的策略

个人或家庭倾向于通过再生产策略，即表面上非常不同的一系列实践，有意无意地保持或增加他们的财产，并相应地，维护或提高他们在阶级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再生产策略构成了这样一个系统，它是一个统一的、生成性原则的产物，并倾向于以一种系统性的方式发挥作用并发生改变。通过未来取向的配置——其本身由群体再生产的客观机会决定——的中介，这些策略首先取决于需要再生产的资本的总量和结构，也就是群体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现在和潜在的总量以及这些资本在财产结构中的相对分量；其次取决于无论是否制度化的再生产工具系统的状况（习惯法和继承法状况、劳动市场状况、学校教育系统状况等），这种状况本身与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状况有关。更确切地说，这些策略依靠每时每刻建立在不同的群体的财产与不同的再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规定财产传承的条件，确定了财产的转让，也就是有区别的收益，不同的再生产工具能够为每个阶级或阶层的投资提供这种有区别的收益。

由于再生产策略构成了一个系统而且这些策略依靠再生产工具系统的状况和需要再生产的资本的（总量和结构）状况，这方面

或那方面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再生产策略系统的一次重构：在再生产工具系统的既定状况下，拥有的一种特殊资本转变为另一种更容易获得的、更有收益的和/或更合法的资本，这种转变倾向于引起财产结构的一种变化。

这些转变通过一个社会空间中的各种转移体现出来，这个空间与所谓的“社会流动”研究的既不真实又天真地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空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同样的实证主义天真导致把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形态学变化的结果描述为“上升运动”，这种天真致使忽略了这一点，即在某些条件下，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可能要求一种非常微弱的“职业继承”：每当行动者只有在付出与一种状况变化 146 相关的平移的代价（比如从小地主状况转到小官员状况或从小手工业者状况转到办公室职员或商业职员状况）才能维持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与这些位置相联的次序属性时，情况就是如此。

由于社会空间在其两个维度上——一方面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全部资本总量，另一方面从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种类到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资本种类——被划分等级，社会空间准许两种转移形式，传统的流动研究混淆了这两种形式，尽管它们丝毫不均等而且具有不均等的可能性：首先是在相同的垂直空间区域也就是在相同的场中的垂直转移，即上升的或下降的转移（如小学教师变成大教授，小企业家变成大企业家）；接下来是横向转移，这种转移意味着从一个场转移到另一个场，它可能要么在相同的平面上（当小学教师或他的儿子变成小商人时）要么在不同的平面上实现（小学教师或他的儿子变成企业家）。最常见的垂直转移，仅仅意味着已经在财产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那种资本（在小学教师变成大中学教

师状况下的学校教育资本)的总量的一种改变,进而意味着资本总量分布结构中的一种转移,这种转移采取了在一个特定场(企业场、学校教育场、管理场、医疗场等)的范围内的一种转移形式。相反,横向转移意味着转移到另一个场,因而意味着一类资本转变为另一类资本,或者,经济或文化资本的一个亚种转变为另一个亚种(比如地产转变为工业资本或者一种文学或历史修养转变为经济修养),进而意味着财产结构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是维护资本总量和保持社会空间的垂直维度上的位置的条件。

我们看到,按经济资本衡量,统治阶级的某个既定阶层在阶层等级中占据的地位越高,从另一个阶级进入这个阶层的可能性越小(唯一的¹不一致来自自由职业者,他们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同时继承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他们的内部招收比率最高)。同样,在阶级内部的大幅度转移,企业家的儿子变成教授或教授的儿子变成企业家,都是非常罕见的。在1970年,一个教授的儿子变成工商企业家的可能性是1.9%,而一个工业家的儿子变成教授的可能性是0.8%,一个商业经理的儿子变成教授的可能性是1.5%(自由职业者无疑代表了统治阶级的两极之间一种必不可少的过渡地点);一个小学教师的儿子变成手工业者或商人的可能性是1.2%,一个手工业者的儿子变成小学教师的可能性是2.4%,而一个小商人的儿子变成小学教师的可能性是1.4%(S. C., II, 附属分析)。

分类,降级,重新分类

不同社会阶级与教育系统之间关系的新近变化,是围绕学历的竞争之强化的结果,统治阶级(工商企业家)和中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商人)中的最富有阶层为了保证他们的再生产而大力加强他们对教育系统的利用这个事实无疑大大推动了竞争的强化,这些变化的后果是学校教育突飞猛进以及教育系统本身的所有相应变化,还有社会结构的所有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至少部分地)来自建立在学历与职位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由持有等于或高于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者的比率衡量的)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学校教育资本与相应的青少年入学率之间的差距,在手工业者、商人和工业家那里比在职员和中等管理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通常在青少年入学的机会与成年人的文化财产之间可看到的这种一致性的中断,是学校教育投资意向的一种深刻变化的指标。于是,持有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或更高级证书的人的数量,在年龄在45—54岁之间的小手工业者和商人中比在办公室职员中要少得多(1962年,5.7%对10.1%),而他们的子女(18岁)却有着相同的入学率(1962年,42.1%和43.3%)。同样地,工业家和大商人拥有的学校教育资本比技师和中等管理者更少(持有至少相当于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的人分别是20%和28.9%),但他们的子女被送入学校的比率相同(65.8%和64.2%)。对于农业经营者来说,正如来自这个阶级的儿童入学率在1962年和1975年之间的极迅速增长表

明的,同样的过程加速了(来源:M. Praderic, *Héritage social et chances d'ascension*, in Darras, *Le partage des bénéfiques*, Paris, Ed. de Minuit, 1966; INSEE, *Recensement général de la population de 1968, Résultats du sondage au 1/20e pour la France entière, Formation*,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71)。

此前很少利用学校的阶层进入了为学历的竞赛和竞争,他们的进入迫使其再生产主要或专门由学校得到保证的阶层加大投入,从而保持其学历的相对稀缺性,并相应地保持他们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学历和颁发学历的学校教育系统因此成为阶级之间竞争的特别重要的赌注之一,这个赌注引起了教育需求的一种普遍和持续的增长和学历的贬值。³³

148 将持有有一个确定文凭的人的数量与每个通过考试的同龄青少年的数量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对持有文凭的人的相对稀缺性的变化有一个粗略的估计:100个15岁的少年中,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初中毕业证书、职业证书的新持有者,1936年有6.8个,1946年有7.9个,1960年有23.6个,1965年有29.5个。在100个18岁的青年中,业士1936年

³³ 为重新分类和反降级而斗争的群体之间的竞争作用,还要用一个人所说的结构的贬值因素加以补充,这种竞争围绕学历(以及更普遍地,围绕一些群体借以表明和形成其相对于另一些群体的稀缺性的任何一种头衔)展开。受教育人数的普遍化增长的结果是增加了文化资本的总量,文化资本的总量随时都以被归并的状态存在,因此,既然我们了解到学校教育行动的成功及其作用的持久性取决于直接由家庭传承的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就可以推测,若其他情况都一样,学校教育行动的收益倾向于持续增加。总之,同一种教育投入的收益更大了,这无疑令获得文凭的人更多,促使产生一种通货膨胀作用。

有3个,1946年有4.5个,1960年有12.6个,1970年有16.1个。在100个23岁的青年中,高等教育证书的新持有者1936年有1.2个,1946年有2个,1950年有1.5个,1960年有2.4个,1968年有6.6个。

持有相同文凭的人在两个不同时代拥有的职位的对比,可以让人对文凭在劳动市场上的价值的变化有一种大致的看法。从15到24岁没有文凭或仅有职业教育证书的人在1968年与跟他们同等状况的人在1962年占据的职位完全类似,而持有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的同龄人,在1962年主要占据职员的位置,但到了1968年他们看到自己更有可能成为工长、职业熟练工人甚或普通熟练工人。1962年直接进入就业适龄期的持有中学毕业文凭的人大部分成了小学教师,而1968年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技师、办公室职员甚或工人。同样的倾向表现在持有高于中学毕业文凭、年龄在25—34岁之间的人身上,他们在1968年比在1962年更有可能成为小学教师或技师,而成为高级行政管理者、工程师或自由职业者的可能性明显更小。³⁴

持有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的15—24岁的100个在职(男)青年中,1962年有41.7个职员,而1968年仅有36.3个,相反,1962年有5.8个熟练工人和2个普通工人,1968年有7.9个熟练工人和3.8个普通工人。仅持有中学毕业文凭的同龄青年在1968年成为中等管理者的机会

³⁴ 参看:C. Delcourt, Les jeunes dans la vie active, *Economie et statistique*, n°18, décembre 1970, pp. 3-15。

(57.4%)比在1962年的机会(73.9%)少得多,相反,他们成为职员(19.9%对8.8%)或工人(11%对6.4%)的机会更大。至于拥有高于中学毕业文凭的25—34岁的男人,他们从事高等职业的机会在1968年(68%)比在1962年(73.3%)少,尤其是从事自由职业(7.6%对9.4%)的机会更少,相反,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小学教师(10.4%对7.5%)或技师(5.4%对3.7%)。至于女孩,我们看到类似的但有所减弱的情形:1968年,如果一个15—24岁的持有中学毕业文凭的女孩工作,那么她成为职员的机会更多(23.7%对12%)且成为学校教师的更少(50%对71.7%)。

考虑到相应职位的总量在相同的时间间隔内也可能变化,我们可以认为,当持有学历的人数比这些学历在初期导向的职位数量增加的速度更快时,一个职位完全有可能遭到贬值。一切都似乎说明,中学毕业文凭和低等文凭受贬值的影响最大:其实,在可就业的男人中,持有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或中学毕业文凭(除了高等教育文凭)的人数在1954年和1968年增加了97%,而在相同时间里职员和中等管理者的职位数量只增加了41%;同样,男人中持有高于中学毕业文凭的人数增加了85%,而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的人数只增加了68%(高级职位的总量增加了49%)。这种差距无疑比数字更能表明:其实拥有抗拒贬值的手段尤其是拥有与高等社会出身相连的社会资本的那部分人,随着学历等级的升高而增加。

还应该用更隐蔽的贬值予以补充,这种贬值来自这个事实,即位置(和导向位置的学历)可能已经丧失了区分价值,尽管职位数

量与初期通往这些职位的学历以相同的比例增长而且原因恰在于此：这就是教师的位置状况，这类位置在所有等级上都丧失了稀缺性。

女孩入学率的迅速增长对于学历的贬值并非毫无影响。这尤其是因为(女孩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所必然造成的)性别之间劳动分工的表象的变化与妇女人数的增加同时产生，妇女把到那时为止一直部分地储备(并仅仅“投放”到婚姻市场上)的学历投到劳动市场上；拥有的学历越高，增加就越明显：于是从25—34岁持有 150 高于中学毕业文凭且从事一种职业的妇女人数从1962年的67.9%上升到1968年的77.5%，1975年达到将近85%。

这附带说明了一点，即鉴于任何(按照性别或其他任何标准的)隔离都有助于通过一种数目规定的作用限制贬值，那么任何废除隔离都倾向于恢复贬值机制的全部有效性(这就使得，如同对废除种族隔离之经济作用的一项美国研究所表明的，最缺少学历的人最直接地感受到这种贬值机制的作用)。

表 10 1962 年和 1968 年 25-34 岁妇女依照文凭的就业比率

	职业教育证书	专业技能证书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	中学毕业文凭	低于中学毕业文凭
1962	43.8	59.7	59.8	67.1	67.9
1968	46.3	60.6	63.5	74.3	77.5

来源：INSEE, *Recensement général de la population de 1968. Résultats du sondage au 1/20ème pour la France entière. Formation*,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71(我们无法将没文凭的妇女单独抽出)。

我们可以在不自相矛盾的情况下提出这一点，即学历贬值的主要受害者是那些进入劳动市场时没有学历的人。其实，学历贬

值伴随着学历持有者的垄断逐渐扩展至到那时为止面向无学历者的职位的过程,这就产生了通过限制竞争来限制学历贬值的作用,但这种限制是以控制无学历者被给予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通过小门”)和加强学校教育对职业轨迹的机会的预先决定为代价的。在中等行政管理者(25-34岁的男人)中,不具备任何普通教育文凭或只拥有职业教育证书的人在1975年只有43.1%,而在1962年则有56%;就高等行政管理者而言,相应的比例是25.5%和33%,就工程师而言,相应的比例是12%和17.4%。相反,在1962年和1975年之间,持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数,就中等行政管理者而言,从7.4%上升到13.8%,就高级行政管理者而言,从32.2%上升到40.1%,就工程师而言,从68%上升到73.4%。由此,在社会空间的某些领域尤其是公共职能领域中,相同文凭的持有者分散在不同职位中和相同职位的占据者依照学历分散开来的现象都减少了,换句话说,学历与被占据职位之间的相互依赖加强了。

151 我们看到,为学历提供的职位的市场不断增长,这当然不利于没文凭的人。对学历予以承认的普遍化无疑产生了统一学历和资格的官方系统并降低隔离作用的后果,官方系统赋予学历持有者占据社会职位的权利,而隔离作用与拥有自身等级化原则的社会空间的存在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学历最终作为经济行动者价值的唯一和普遍的标准让人完全接受,至少在学校教育系统范围之外并非如此。

在严格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市场之外,文凭的价值等于文凭持有者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学校教育资本的收益随经济和

社会资本而变化,经济和社会资本可能被用来增强学校教育资本。普遍来看,管理者的社会出身越高,他们越有机会进入领导职务而非生产、制造、维修的职务。我们从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1964年所做的关于职业流动性的调查中得出的二度分析表明,自由职业者子女的41.7%、教授子女的38.9%,是工厂中的工程师、高级或中等行政管理者和技师,他们占据了行政职务和最高领导职务,与总体上的25.7%相对。相反,技术工人子女的47.9%,工长子女的43.8%,技师子女的41.1%,占据生产、制造、维修的职务,与总体上的29.7%相对。我们也知道,1962年在高级管理者中,出身职员家庭的人平均年收入为18 027法郎,而工业家或大商人子女的平均年收入为29 470法郎;在工程师中,农业雇佣工人或农民子女的平均年收入为20 227法郎,而工业家和大商人子女的平均年收入为31 388法郎。

文凭持有者之间职位分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来自持有者数量的增加,这种变化使得一部分文凭持有者——首先无疑是那些最缺乏继承而来的利用文凭手段的人——成为贬值的受害者。那些最有可能遭到贬值的人借助某些策略努力地通过短期斗争(在他们自身的职业中)或长期斗争(通过他们子女的教育策略)对抗这种贬值,这些策略是使颁发的文凭增加的决定因素之一,而这个因素本身又促进了贬值。因此贬值和补救的辩证法倾向于自我哺育。

转移的策略与形态学的变化

个人和家庭为了维护或提高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而求助的策略再次表现在既影响不同阶层的总数又影响其财产结构的变化中。

152 为了对这些变化有一种大致的了解，我们绘制了一张表（表 11），这张表使我们有可能将不同阶层的总数的变化与这些阶层持有资本的总量和结构的（可惜非常不完备的）指标联系在一起。由于无法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一方面通过 1954-1975 年间收入总额的细微分类，另一方面通过这期间的收入结构的细微分类确立这种变化（这就导致再造一张表——表 12——以表现 1954—1968 年间的粗略等级的这种变化），我们指出，除了按照收入来源的分布，还有向税务局申报的收入，即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利用的资料，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些收入在相当不同的比例上被低估：根据 A. 维尔纳夫——1975 年家庭的初级收入，《经济与统计》，103 期，1978 年 9 月，第 61 页——应该加上 1.1 的工资和薪金，3.6 的农业利润，2.9 的动产资本收入，等等；我们看到只要采用这些修正就可以恢复自由职业者尤其是农业经营者和手工业者或小商人的真正位置。在（我们可以通过拥有有价证券、农村或城市产业等指标把握的）经济资本方面（相对）富有的等级，倾向于骤然衰退，如同他们总数的减少（这是农业经营者、手工业者和商人及工业家的状况）和当中的年轻人减少或不如别处增加的速度快（25-34 岁的变化速度在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那里

等于或略高于整个等级的变化速度这个事实,可以通过具有一种新风格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到来得到解释)这个事实所表明的。这些等级的学校教育的(和无疑是经济的)资本的一部分表面增长无疑来自以下事实,即成为他们数量减少之根源的外流对他们的底层造成了影响。在(由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中学毕业文凭或高等教育文凭的持有率衡量的)文化资本方面最富有的阶层与前者相反,他们增长很快,这种增长意味着一种更新,并往往通过女性从业人员大大增加和持有文凭率增加表现出来(这个过程最典型的等级是办公室和商业职员、技师、中高级管理者、教师即小学教师以及尤其是教授的等级,在他们身上,各种相关过程异常显著,特别是在最年轻一代身上——这与工程师的状况不同,这个过程在他们身上似乎停止了——最年轻一代的增长率比总体的增长率更低)。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自由职业者的相对稳定性,他们通过采取有意识的数目规定(*numerus clausus*)策略,限制了人数增加和女性从业(比拥有强大学校教育资本的高级职业中低得多),与此同时避开了稀缺性的丧失尤其是职位的或多或少有点危险的重新定义,文凭持有者的增加还有文凭持有者相对于职位的盈余的存在导致了对职位的重新定义。

成为这些形态学变化根源的再生产策略的变化,一方面表现在所谓独立等级的收入中工资部分的增加上,另一方面表现在高级管理者的财产和投资的多样性上,与企业家尤其是经济资本的持有者相反,高级管理者倾向于既持有经济类

表 11 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形态变化和财产结构(1954-1975)

	1975年 总量	1975年 男子的 百分比	变化指数 1954年 基数为 100				学校教育资本的变化 文凭比率						经济资本					
			总量		20-34岁		1962年			1975年			家庭平均 收入(法郎) 1975年		拥有以下文凭的家 庭的比率(1970年)			
			总量	仅 男子	总量	仅 男子	中等 教育 初级 阶段 毕业 证书	中学 毕业 证书	大学 毕业 证书 重点 大学	中等 教育 初级 阶段 毕业 证书	中学 毕业 证书	大学 毕业 证书			工资 与 报酬	工商 业 利润	城市 地产 收入	不动 产 证券
农业雇佣工人	375 480	88.4	32	33	27	27	0.5	0.2	0.1	2.7	0.6	0.3	27 740	86.0	1.5	0.8	6.3	
农业经营者	1 650 865	65.7	42	46	26	31	0.9	0.5	0.2	3.5	0.9	0.6	22 061	19.3	5.3	6.4	16.5	
普通工人	1 612 725	61.9	143	115	146	108	0.4	0.1	-	2.9	0.7	0.4	27 057	93.4	1.3	2.3	3.3	
熟练工人	2 946 860	73.2	162	167	185	186	1.0	0.2	0.1	3.5	0.5	0.2	35 515	97.7	2.2	2.4	3.6	
技术工人	2 985 865	86.5	112	126	120	128	2.1	0.5	0.1	5.5	0.7	0.3	39 527	98.2	2.2	2.7	3.6	
工长	443 305	94.1					6.0	1.7	0.5	10.4	2.5	1.1	56 692	99.5	1.4	4.1	6.7	
办公室职员	3 104 105	35.0	191	141	218	168	11.5	2.9	1.2	19.6	5.3	2.6	42 785	98.8	2.1	5.1	8.6	
商务职员	736 595	40.6	167	138	183	158	6.5	2.6	1.3	13.4	5.2	2.2	46 196	97.5	3.4	8.9	9.5	
手工业者	533 635	88.1	71	77	81	88	2.8	1.0	0.5	6.1	1.8	1.3	50 335	34.1	96.9	12.9	14.2	
小商人	912 695	51.8	73	78	73	81	4.7	2.4	0.9	9.3	3.7	2.3	60 160	24.3	93.2	20.2	19.2	
中等行政管理者	970 185	55.1	182	132	218	152	20.1	11.6	5.3	26.5	12.8	9.0	73 478	99.3	4.0	11.1	17.5	
技师	758 890	85.6	393	367	417	374	16.3	7.0	2.7	25.8	9.6	6.0	59 003	98.5	2.4	5.8	8.7	

续表

	1975年 总量	1975年 男子的 百分比	变化指数 1954年 基数为 100				学校教育资本的变化 文凭比率						经济资本					
			总量		20-34岁		1962年			1975年			家庭平均 收入(法郎) 1975年		拥有以下文凭的家 庭的比率(1970年)			
			总量	仅 男子	总量	仅 男子	中等 教育 初级 阶段 毕业 证书	中 学 毕 业 证 书	大 学 毕 业 证 书 重 点 大 学	中 等 教 育 初 级 阶 段 毕 业 证 书	中 学 毕 业 证 书	大 学 毕 业 证 书			工 资 与 报 酬	工 商 业 利 润	城 市 地 产 收 入	不 动 产 证 券
社会医疗服务人员、	298 455	21.0	269	261	345	340	9.7	7.7	6.1	17.7	18.1	20.3	53 450	84.2	-	10.0	12.4	
小学教师	737 420	36.5					10.0	55.0	14.5	11.3	39.4	29.4	54 013	96.7	0.9	7.6	10.4	
工业家	59 845	86.5	66	71	66	65	8.5	6.7	7.5	12.9	6.1	6.3	132 594	83.0	26.0	34.7	40.0	
大商人	186 915	69.2	103	100	98	95	9.0	7.3	5.7	14.6	9.1	6.3	132 435	64.0	47.5	29.7	30.2	
高级行政管理者	653 755	83.8	236	217	293	254	15.5	18.9	25.5	19.3	16.2	32.0	107 342	99.6	3.6	15.2	27.7	
工程师	256 290	95.6	338	305	272	263	7.3	9.0	59.8	10.0	18.1	63.2	105 989	98.7	3.1	15.5	30.4	
教授	377 215	53.0	469	402	612	517	2.7	10.8	71.4	3.6	7.4	77.7	87 795	97.6	2.1	10.4	21.0	
自由职业者	172 025	77.8	143	130	145	137	4.5	10.3	65.1	4.2	6.0	79.9	150 108	41.0	17.5	30.3	40.6	

来源: INSEE, Recensement de 1954, 1962, 1968 et 1975; 学校教育资本的发展, 参见: INSEE, *Recensement général de la population de 1968: résultats du sondage au 1/20 ème pour la France entière. Formation*, Paris, Impr. nationale, 1971(这张表也展现了关于 1962 年统计构成的材料); et INSEE, Recensement de 1975, Tableau de la population totale de plus de 16 ans par catégorie socio-professionnelle, âge, sexe, diplôme d'enseignement général[即出, 资料由 L. 泰弗诺(Thévenot)提供]; 关于收入, 参见: INSEE, *Enquêtes revenus 1975 et 1970*. 1975 年的调查资料由 A. 维尔纳夫提供, 1970 年的调查资料由 P. 吉格利亚扎(Ghigliazza)提供。

表 12 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形态变化和财产结构(1954-1968)

	等级总量(1968)		等级变化指标 (其数 100 1954年)		不到 35岁 的变化比 率(基 数 100 1962年) (1)	学校教育 资本文凭 持有比率 (男子)1968年			收入总额 (1965) (初级收入) (2)	家庭平均 财产 (1-1-1966) (3)	家庭持 有比率				收入结构				收入结构 的变化									
	总数 (1)	仅男子 (1)	总 数 (1)	仅 男 子 (1)		中 等 教 育 初 级 阶 段 毕 业 证 书 (1)	中 学 毕 业 证 书 (1)	高 等 教 育 毕 业 证 书 (1)			有价 证 券 (4)	城 市 地 产 (4)	股 票 (5)	不 动 产 (5)	劳 动 收 入 (2)	证 券 转 让 收 入 (2)	企 业 收 入 (2)	资 本 收 入 (2)	报 酬 年 金 (1)	城 乡 地 产 和 有 价 证 券 (4)	1956	1965	1956	1965				
																									1965	1965	1966	1966
农业雇佣工人	588 200	527 200	51	54	67	1.0	0.4	0.2	9 859F		10.2	2.3			59.5	29.8	9.2	1.5	96.7	95.9	1.4	1.8						
农业经营者	2 459 840	1 527 780	62	65	72	1.6	0.7	0.4	23 854F		27.6	5.2			6.9	10.9	78.5	3.7	23.8	23.5	16.1	9.9						
工人	7 698 600	6 128 840	119	123	116	2.3	0.4	0.2	14 811F	35 000F	4.8	2.9	3.2	39	66.7	27.9	4.6	0.8	98.8	97.5	0.8	0.8						
职员	3 029 900	1 188 300	146	121	133	14.0	3.7	1.5	16 149F	16 000F	11.8	6.0	6.6	40.8	69.6	23.2	5.4	1.8	95.9	95.9	2.6	2.1						
中等管理者	2 014 000	1 197 360	177	168	151	19.0	16.5	7.7	26 887F	92 000F	14.0	8.1	8.5	50.3	73.1	18.5	6.8	1.8	91.6	94.4	4.9	2.1						
手工业者	622 800	532 340	85	88	109	4.1	1.5	1.0																				
小商人	1 028 160	515 440	81	85	107	6.7	2.8	1.4																				
大商人	213 500	143 840	116	110	148	12.1	8.0	5.2																				
工业家	79 160	68 940	93	93	98	10.8	6.1	7.5																				
ens. des patrons de l'ind. et du comm.	1 943 620	1 360 560	86	96	110	6.4	3.0	1.9	45 851F		28.6	20.7			7.1	6.4	79.2	7.3	12.9	16.4	7.0	6.7						
自由职业者	142 520	114 920	119	112	122	5.1	6.3	76.8																				
高级管理者	840 280	691 680	196	183	144	12.6	13.3	45.0	58 021F	214 000F	38.2	18.9	33.1	166.3	56.5	9.6	28.9	5.0	71.8	73.0	9.4	6.0						

来源:1)INSEE, Recensements; 2)H. Roze, Prestation sociales, impôt direct et échelle des revenus, *Economie et statistique*, février 1971; 3)P. L. Hardy, Les disparités du patrimoine, *Economie et statistiques*, février 1973; 4)G. Banderier, Les revenus des ménages en 1965, *Collections de l'INSEE*, M7, décembre 1970; 5)P. L. Hardy, Structure de l'épargne et du patrimoine des ménages en 1966, *Collections de l'INSEE*, M13, mars 1972.

别的资本又持有文化类别的资本。企业家收入中工资、薪金、年金的部分 1956 年占 12.9%，1965 年占 16.4%；1975 年，组合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占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收入的 19.2%，占工业家和大商人收入的 31.8%。（相反，在农业经营者身上这个部分几乎是恒定的：1956 年占 23.8%，1965 年占 23.5%，1975 年占 24.8%）。我们知 155 道，1975 年，城市或农村土地收入和动产收入在收入来源中的部分，对私营部门的高级管理者而言（5.9%）比对国营部门的高级管理者而言（2.7%）高得多。[A. 维尔纳夫 (Villeneuve) 提供资料]。

经济资本转化为教育资本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允许商业资产阶级以工资的形式——比年金更隐蔽——但无疑是更可靠的占有方式——抽取工商企业的一部分利润，从而部分地或全部地保持其工商企业继承者的地位。因此，在 1954-1975 年间，工业家和大商人的相对数量骤然下降而靠学历获得其地位的雇佣劳动者即管理者、工程师、教授和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像私营部门的管理者一样，能够从他们的活动中获得他们的一大部分收入）的人数增加很快（参见表 13）。同样，许多小商业和手工业企业的消失掩盖了或多或少成功的转化作用，而特定的行动者按照在每种情况下都因其特定状况而不同的逻辑，实现了这种转化作用，这种转化作用导致中产阶级的不同阶层的数量发生变化（参见表 14）：还是在这里，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人数，如同农业经营者的人数一样，明显下降，而小学教师、技师或医疗或社会人员的比例则增加了。此

表 13 统治阶级内部的形态变化

	结构(%)				年变化率(%)			妇女比例(%)			
	1954	1962	1968	1975	1954	1962	1968	1954	1962	1968	1975
					1962	1968	1975				
大商人	22.0	17.0	16.4	11.0	-1.5	0.0	-4.2	29.2	30.2	32.9	30.8
工业家	11.0	7.9	6.3	3.5	-0.6	3.3	-1.7	14.9	14.2	13.7	13.5
自由职业者	14.6	12.3	10.9	10.1	0.5	2.0	2.9	15.6	17.3	19.3	22.2
高级行政管理者	33.5	37.0	35.3	38.3	3.9	3.1	5.3	8.6	11.1	13.4	17.1
工程师	9.2	13.5	14.5	15.0	7.8	5.1	4.7	2.1	3.2	3.4	4.4
教授	9.7	12.3	16.6	22.1	5.7	9.3	8.5	39.9	43.0	44.7	47.0
文学家和科学家											

表 14 中产阶级内部的形态变化

	结构(%)				年变化率(%)			妇女比例(%)			
	1954	1962	1968	1975	1954	1962	1968	1954	1962	1968	1975
					1962	1968	1975				
手工业者	14.6	11.2	9.3	16.6	-2.1	-0.5	-2.1	18.3	16.0	14.7	11.9
小商人	24.1	20.0	15.4	11.3	-1.2	-1.7	-1.7	51.7	51.3	50.2	48.2
商业雇员	8.5	9.0	9.4	9.1	1.9	3.4	2.4	52.0	57.0	57.7	59.4
办公室职员	31.3	33.2	35.7	38.5	1.9	3.9	3.0	53.0	59.4	61.9	65.0
中等行政管理者	10.2	11.0	11.1	12.0	2.0	2.8	3.9	24.6	31.9	34.9	44.9
小学教师	7.4*	7.4	8.4	9.1	4.1*	4.9	4.0	68.3*	65.1	62.7	63.5
技师	3.7	6.1	8.0	9.4	7.5	7.5	5.2	7.1	7.9	11.3	14.4
社会医疗人员		1.9	2.6	3.7		7.8	8.1		84.8	83.2	79.0

* 包括社会医疗服务人员

来源: L. Thèvenot, *Les catégories sociales en 1975; l'extension du salariat, Economie et statistique*, 91, juillet-août 1977, pp. 4-5. 这个表的数据取自 1954 年和 1962 年人口普查的详尽摘要, 取自 1968 年的四分之一抽样调查和 1975 年的五分之一抽样调查。这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可以利用的最准确的比较数据。

我们知道, 在 1954 年和 1975 年之间, 就业人口的结构变化非常明显: 当农业经营者、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的比例从 26.7% 下降到 9.3%, 而工人的比例略微增加(从 33.8% 到 37.7%) 时, 整个中产阶级的比例则大量增加(从就业人口的 27% 到 37%), 如同表 14 所显示的, 这种大量增加是由这个部门的雇佣劳动人口增加造成的, 而统治阶级的人数则从 4.3% 上升到 7.8%。

外,一个专业群体的相对的形态学稳定性可能掩盖了其结构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源于初期出现在群体中的行动者(或者他们的子女)的就地转化或者源于他们被来自其他群体的行动者所取代。因此,比如,商人等级即大部分个人小企业的持有者(93%)的总量的相对微弱的减少,掩盖了这种职业的一种结构变化,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靠家庭消费的增长才能抵抗危机;尤其受到超级市场的竞争打击的小食品业或小服装业的停滞或减少,差不多由汽车、家庭装备(家具、装饰等)尤其是体育、娱乐或文化(书店、唱片店等)和药店产业的增加得到补偿。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食品业中,数字所描述的演变掩盖了导向职业的一种逐步再定义的变化,受危机影响最大的普通食品业和乡村面包店的倒闭,可能与以营养学、地区天然产品、天然食品为特色的店铺或擅长老式面包加工的面包店的开业共同出现。商业企业性质的这些变化与同一时期的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而家庭消费结构本身与收入增加也许尤其与由进入学校教育体系的机会的结构平移引起的文化资本的增加密切相关,这些变化经由一种辩证的关系与所有者或管理者的文化资本的增加联系在一起。这一切让人想到,手工业者等级经历了与商人大致相同的内部变化,奢侈品手工业和艺术手工业的发展,挽回了传统手工业中最不受优待的阶层的衰落,奢侈品手工业和艺术手工业要求拥有一种经济财产,但也要求拥有一种文化资本。我们知道,这些中间等级的总量的减少伴随的是由教育水平衡量的文化资本的一种提升。

奢侈品、文化或艺术手工业者或商人，成衣“店”的管理者，卖撕掉商标商品的转卖商，卖外国服装和珠宝或土产的商人，唱片商，古玩商，室内装饰家，设计师，摄影师，甚或时髦的饭店老板或“酒吧”老板，外省“陶瓷商”，先锋派书商，全都致力于将娱乐与工作、奋斗精神与业余爱好之间的无差别状态即大学生状况的典型特征扩展到学校教育之外，所有这些文化财产或服务的出售者在这些随心所欲的模棱两可的职业中，找到了获得一种文化资本的最大收益的办法。在这些职业中，成功至少既依靠出售者及其产品带有的微妙洒脱的与众不同，也依靠商品的性质和品质，而在这种文化资本中，技术能力比不上熟习统治阶级的文化修养与掌握区分和趣味的符号和标志。所有这些特征使这种具有强大的文化投资的新型手工业和商业预先倾向于为被学校淘汰的统治阶级的后代提供避难所，这种新型手工业和商业使得直接由家庭传承的文化遗产可以赢利。

理解的时间

学历膨胀和相应贬值过程逐步迫使所有阶级和阶层，首先是学校的最大用户，不断地强化他们对学校的利用并由此使他们的学历生产过剩，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是被贬值学历的持有者为了保持他们由继承而来的位置或为了获得他们的学历在学历与职位之间的从前的关系状态所保证的真正对等物而使用的全部策略。

学历所保证的东西，在这方面更接近贵族爵位而非严格技术意义上的定义所保证的这种资历证书，它在社会经验中，远远胜过

且有别于占据一个职位的权利和尽职的能力,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贬值学历的持有者不大倾向于觉察(这无论如何都是很难的事情)并且承认学历的贬值,他们无论在客观上(学历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们的社会身份)还是在主观上都与学历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拯救自尊的想法倾向于关注学历和职位的名义上的价值,但是如果这种想法没遇上客观机制的同谋,就无法支持和推行这种对贬值的忽视。而最重要的客观机制是习性的滞后作用,这种滞后作用导致将符合客观评价机遇的一种从前状况的认识和评价范畴应用于学历市场的新状况;其次是相对自主的市场的存在,在这里,学历价值降低的节奏不那么快。 158

与学校教育体系的距离越大,关于学历市场的信息就越少或越抽象,滞后作用就越明显。在构成由继承而来的文化资本的信息中,最珍贵的一条信息就是对学历市场变化的实践的或理论的认识,即投资意识,这种投资意识可以使在学校教育市场上获得所继承的文化资本的最大收益或在劳动市场上获得学校教育资本的最大收益,比如让人知道及时离开被贬值的专业或职业从而奔向有前途的专业或职业,而不是固守在以前的市场状况中提供最高利益的学校教育价值。相反,认识和评价范畴的滞后作用使得被贬值学历的持有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自身骗局的同谋,因为他们通过一种典型的误识(allodoxia)作用,赋予颁发给他们的被贬值学历以一种客观上不被承认的价值。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学历市场上最不了解信息的人,尽管很久以来就承认名义上的报酬之维持背后的真正报酬减弱了,但他们仍然继续接受和追求他们经过数年学习而作为回报得到的学校教育

信用券(尽管他们由于缺乏社会资本而成为最早受学历贬值影响的人,仍旧如此)。

坚持习性的滞后作用所支持的关于学历价值的一种陈旧观念,无疑促进了某些市场的存在,在这些市场中,学历能够(至少在表面上)逃避贬值;其实,在主观和客观上对学历价值的依附只能通过学历被派上的全部社会用途确定自身。因此在最直接可靠的互相认可的群体如全体亲戚、邻居、同学(“同届生”)、同事中通行的学历评价,可能有助于大大掩盖贬值的作用。个人和集体的所有这些忽视作用没什么让人迷惑的,因为它们能够真正支配实践以及尤其是个人和集体策略,这些策略力求确立或恢复主观上隶属于学历或职位的价值的客观性,并能够有助于确定对学历或职位真正的重新评价。

要知道在确定学历的商品价值的交易中,出卖劳动力者的力量,取决于他们的学历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考虑他们的社会资本),而且学历与职位之间的关系越是严格地规范化(这是与新位置对立的稳固位置的状况),这种依赖性就越强,我们看到学历的贬值直接为职位持有者的利益服务;如果说学历持有者与学历名义上的价值——也就是学历在从前的状态下通过权利所保证的东西——有关联,职位持有者则与学历的真正价值即当时在持有者之间的竞争中确定自身的价值有关联(这种结构性降级(déqualification)强化了企业很久以来实行的所有降级策略的效果)。学历在学历等级中拥有的相对价值越少,学历越被贬值,这种斗争越不平等。在这种斗争中,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学历持有者为了捍卫其学历的价值,除了拒绝按照提供给他们的价格出

卖劳动力之外别无他法,于是选择失业体现了一种(个人)罢工的意义。³⁵

受骗的一代

在学历泛滥时期,教育系统产生的期望与它实际提供的机遇之间的差距是一种结构现实,这一现实依受教育的整代人学历的稀缺及其社会出身而对他们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新近接受中等教育的阶级仅凭他们获得中等教育这个事实,就倾向于期待中等教育为他们提供他们实际上被排除在这种教育之外的东西。¹⁶¹ 161 这些东西。这些期望在另外一个时期且对另外一种公众而言完全是现实的,因为它们符合客观机遇,但现在它们往往或快或慢地与学校教育市场或劳动市场的评判相抵牾。人们所说的“学校教育民主化”的悖论丝毫也不在于民众阶级只有进入中等教育通过降级和淘汰才最终发现学校的保守主义性质,因为民众阶级到那时为止不大思考或者似懂非懂地接受“自由主义学校”的观念。集体幻灭源自期望与机遇之间、教育系统表面上允诺的社会身份或它暂时给出的身份与走出校门之后劳动市场真正提供的社会身份之间的

³⁵ 对职业需求与供给的变化变化的研究使我们可以对行动者的渴望与实际上提供给他们的职业之间的差距产生某种看法,这种看法无疑是完全片面和有缺陷的;因此我们看到从1958年9月到1967年9月,不到18岁的求职者的人数几乎翻了三倍,而职位供给的数量停滞不动;在涉及最难找的办公室工作和类似的工作方面,差距更大;涉及办公室工作的需求表现为总需求的30.2%,而相应的供给不过占总供给的3.3%。大部分找工作的年轻人至少既希望获得一份适合他们技能的工作又希望拥有一份符合他们愿望的工资;44%的人不接受不适合他们技能的工作;35%的人拒绝领取低于他们认为应得的工资(cf. M. Mangenot, N. Alisé, F. Remoussin, *Les jeunes face à l'emploi*, Paris, Ed. universitaires, 1972, p. 230)。

结构差距,它是对劳动不满和拒绝社会有限性的表现的根源,拒绝社会有限性是构成青少年“反文化”的所有逃避和所有拒绝的根源。这种不协调——和由此而产生的幻灭——依不同社会阶级而在主观和客观上具有不同的形式。因此,对于工人阶级子女而言,进入中等教育和取得暂时脱离劳动世界的必然的暧昧“大学生”身份,其作用是将失败者引进期望与机遇的辩证法中,这种辩证法导致他们几乎总是自然而然地、有时甚至迫不及待地接受社会命运(比如矿工的儿子把下井当成进入成年的标志)。降级的最明显受害者,比如这些沦为熟练工人或邮递员角色的业士,在工作中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和表现出不安,这种不安在某种形式下是整个一代人共有的;如果说这种不安表现在往往不大被传统的工会或政治斗争组织理解的斗争、请愿或逃避的独特形式中,这是因为这种不安之症结是超出并有别于工作岗位的东西,而是人们有时所说的“境况”。由于学校教育系统和用空话敷衍他们的社会系统对他们的社会身份、他们自身的形象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他们只有以一种总体的拒绝来反对这些评判,才能恢复他们个人的和社会的完整性。一切的发生就好像他们感到,起作用的东西不再完全像从前那样是一种个人失败,而是学校制度本身的逻辑,而在学校教育系统的支持之下,个人失败被归咎于个人的局限性。对整个一代人产生影响的结构性降级是这种集体幻灭的根源,这一代人从他们的

164 的文凭中获得的东_西注定比他们前代人获得的要少,这种集体幻灭使这受骗的和幻灭的一代倾向于将他们被教育系统激起的、掺杂着怨恨的反抗延伸到所有制度。这种(充满意识形态的和科学的批判的)反制度情绪,在极端情况下,导致对社会秩序的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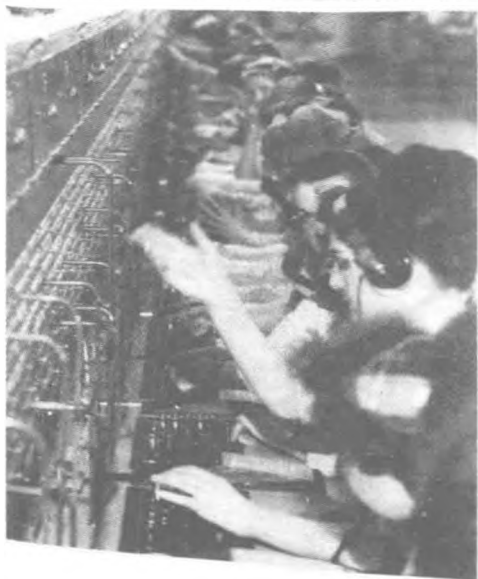
默认前提的一种揭露,对社会秩序提出的赌注、对它宣扬的价值的信念式赞同的一种实践悬置,对成为社会秩序的运行条件之投入的拒绝。

我们知道,代与代之间的冲突往往采取针对社会秩序的基础本身的一种最终冲突形式,代与代之间的冲突不仅表现在家庭中,也表现在学校教育制度中、政治或工会组织中以及也许尤其是工作环境中。每当三十年前带着学习证书或文凭和一种无限的良好文化意愿出发的老派自修者,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将反制度情绪带入制度之中的年轻业士或新式自修者,工作环境中的冲突就产生了:这种幻灭情绪在一般形式上比政治不满更加激进也更加不确定,它让人想起了浪漫派第一代的幻灭情绪,它实际上攻击的是小资产阶级领域的基本信条,即“职业”、“职位”、“提升”、“晋级”。

1962年,年龄在15-24岁的熟练工人中持有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的仅占1.5%,持有中学毕业证书或更高文凭的人仅占0.2%,而1975年相应的比率是8.2%和1.0%。在职员中,从1962年起,即使在年龄最大的人中,持有文凭的人数也相对较多,而年轻人的最高文凭的数量增加速度快于年长者中的,因此前者持有的高等文凭的数量比后者多(1962年,15-24岁的职员中25%有文凭,2%有中学毕业文凭,0.2%有大学文凭或重点大学文凭,1975年的相应比例是38%,8%和1.7%,年长者的相应比例是16.1%,3.3%和1.4%)。除了要考虑这些统计资料所包含的不同代的同行之间关系的所有变化之外,还要考虑与工作的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持有比过去更高文凭的行动者在往往被降级的

岗位上就职这个事实(自动化和任务的所有机械化形式将许多职员变成了庞大官僚机构中的熟练工人)。一切都让人想到,年长者有点严格的严谨与无疑被当成放任自流的年轻人的轻松的对立,尤其是与他们兼蓄须与长发于一体的这种放荡不羁的传统特征之间的对立,表现的不只是代与代之间的一种简单对立。

160



幻想破灭的人

“我先是找工作信息。我发现 L. 的一个朋友在干这行。我就有了巴黎的全部工作信息。我打电话,我找了两个月,最后找到了一家。然后,又过了几个月,没人再跟我联系了,我不再找了。我有权领失业津贴(每月 1000 法郎),我这样过了七个月,接下来收了两个月葡萄。然后我又找了大约七个月,当过临时工,后来又离职了,因为那儿都是女同性恋,她们工作起来反复无常,我不干了。总之,我们每个人都干点儿工作。在这种社会中,工作对我来说不是主要的。想想在中国吧,也许我每天要工作十小时”(F., 24 岁,已婚,业士,上过几个月文学院,父亲靠年金生活)。

“一个人一旦没通过中学毕业会考,那就已经滑到边缘了:在一个既定时刻,再也没有可能的方向,另外,他找到的工作,不是别人认为有用的工作。

我总是干不太有意思的工作,于是我为了能歇几个月就存钱。总之,我更愿意歇着,不愿陷于某种既定轨道。

我没通过中学毕业会考,放假期间我搞了一个假日郊外托儿所。后来我在德勒的一家报社找到一份工作。我当实习编辑,但两个月之后我得办一张记者证,于是我成了计件取酬的记者,然而,我与他们格格不入。我写的所有东西都被他们毙掉。我也拍照片。但在工作中有权力关系,我不好斗而且我也不想争斗。六个月后,他们不再给我工作,我离开了。接着,我被公共服务的神话迷住了,进入邮电部门工作。我当了分拣员,干了三个星期。我

被逼得喘不过气来,我进入了一个我不了解的工作世界。让我震惊的并不是那些人,也许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揭发,丝毫不团结。三个星期后,我辞职了:总共有五个临时工,其中一个(多休息了一刻钟)立刻就被开除了,于是大家都辞职了。最要命的是,你没有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你对学习从不感兴趣,可你很快发现自己被当成了知识分子。

163 接着我通过国家职业介绍所在一个牛肉调配机构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然后发生了不给所有人发销售奖金的事,于是一场谩骂之后,我走了。我在那儿待了两个半月。九月,我收了一个月葡萄,然后我又去国家职业介绍所找工作。我当了六个月的轻便摩托车运动员。这是我做过的最疯狂的事。这是一件可怕的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在摩托车上彻底成了精神病,你感到他们全都盼着你死,我不干了,我厌烦了。

失业两个月后,我进了法国国家铁路公司,我被雇用做假期工,我做电子预订(他们叫作操作员什么的),我在那儿待了四个月,然后离开了,因为我想在乡下生活,后来我一直都在那儿”(G., 21岁,未通过法学业士学位会考,父亲是治安警察,母亲是清洁工)。

Cf. C. Mathey, Recherche de travail et temps de chômage, interview de 50 jeunes travailleurs privés d'emploi, *L'entrée dans la vie collective*, Cahiers du Centre d'étude de l'emploi, 15, Paris, PUF, 1977, pp. 479-658.





166 对抗降级的斗争

由学校教育构成的再生产方式的特定矛盾在于，学校在统计意义上为之服务的阶级的利益与学校所牺牲的阶级成员的利益之间的对立，这些成员就是人们所说的“没通过考试的人”，由于他们不持有具有充分权利的成员被正式要求的文凭，他们就有被降级的危险；不要忘记，持有“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说在学历与职位之间关系的先前状况中——授予一种资产阶级职业权利的文凭的人，并不出身于这个阶级，不具备让他们的学历获得最大的收益所必需的社会资本。当理论上相等的文凭获得机会被赋予所有资产阶级子女（无论长子幼子、男孩女孩），而其他阶级取得的这些文凭（绝对数量）增加时，文凭的生产过剩以及随之而来的贬值，倾向于变成一个结构恒量。某一群体为了试图逃避降级和逃避回到他

们的阶级轨迹中去而采取的策略,以及另一群体为了延续期望轨迹之被中断的运行而采取的策略,是今天社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实,个人的调整策略与集体的追还策略(*stratégies de revendication*)互相结合,个人的调整策略通过转向社会空间中尚不太官僚化的地区(在这里社会配置比学校教育保证的“能力”更重要),使得持有一种由继承关系构成的社会资本的人,有可能弥补文凭的缺乏或从他们能够获得的文凭中得到最大的收益,而集体的追还策略力求突出文凭并获得在从前状况中文凭能得到的报偿,两种策略的结合便于创造大量的半资产阶级位置,这些位置来自对从前位置的重新定义或新位置的创造,非常适于避免无文凭“继承人”的降级并为“暴发户”提供对他们被贬值的文凭的一种大致补偿。

行动者为了避免与文凭合法持有者增加相关的学历贬值而采取的策略,在一个既定时刻客观上呈现的机遇与实际期望之间的差距找到了依据,这些期望不过是客观机遇的另一种状态的产物,而这种差距在某些状况与某些社会位置中特别明显:这种差距往往是相对于个人或集体轨迹的一种下降的作用,这种轨迹作为客观可能性被纳入从前的位置和导致这个位置的轨迹中。这种非连续轨迹的作用使得期望如同被其惯性带走的一颗弹丸一样,在实际轨迹——变成商业工程师或心理学家的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的儿子或孙子的轨迹,或由于缺乏社会资本成了文化策划人的法学士的轨迹——上方,画出一个同样真实的轨迹,这个轨迹无论如何丝毫没有人们通常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所带有的虚构成分:这种不可能的客观可能性,一种被辜负的希望或允诺,被纳入配置的最深层,它可能超越所有差别,拉近某些资产阶级子女与某些中产阶级

和民众阶级的子女之间的距离,某些资产阶级子女没有从学校教育系统获得延续其阶级最可能实现的轨迹的手段,而某些中产阶级和民众阶级的子女由于缺乏文化和社会资本,没有从他们的学历中获得学历在另一种市场状况中所保证的东西,于是两个等级特别倾向于转向新位置。

那些试图摆脱降级的人实际上能够要么创造更适合他们(由社会建立在学历与职位之间的从前的关系状况中的)抱负的新职业,要么通过一种意味着重新评价的重新定义,根据他们的抱负更改他们的文凭给予他们的职业。³⁶ 行动者就任一个职位必然引起此职位的变化,因为他们拥有与普通的占据者学历不同的学历,他们把陌生的才能、配置和要求带入他们与职位的关系中,而这个职位无论从技术定义还是社会定义方面都要予以考虑:当新来者拥有高等文凭时,在可看到的变化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劳动分工的增加以及常常是职业的重新定义,劳动分工的增加源于一部分任务的自动化,这些任务之前一直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由范围更广的职业完成(让我们想想教育或救济职业的多样化),而职业的重新定

³⁶ 与包含在某些劳动社会学传统中的现实主义的和物种不变论的表象相反,应该强调这一点,即职位既不可归为理论的职业,即可用规章、通告、组织机构图表描述的活动,也不可归为可以由对占据职位的人的真实活动的观察来描述的真实职位,亦不可归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职位,无论就其理论定义还是实际现实,都是永久斗争的赌注,这种斗争使得职位的把持者与其上级或下属或邻近的和竞争的职位的占据者之间甚或他们彼此之间(比如资历深者和新来者、有文凭的人和无文凭的人之间等)互相对立。那些谋求或把持一个职位的人事实上和/或有权利以这样一种方式对职位重新定义,以至于职位只能被其与其属性相似的人占据,他们这样做是有益处的(我们可以想想国家行政学院和综合工科大学的毕业生之间的斗争或中产阶级中不同代的护士之间的斗争)。

义与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的新要求的出现有关。一切都让人设想,对一个职位的重新定义,来自这个职位的占据者的学校教育属性——以及所有与其相关的属性——的变化,职位的技术和社会定义的弹性(这种弹性很可能随着职位等级的升高而增加)越大,新占据者的社会出身越高(进而越不倾向于接受普通小资产者在一种生活范围内的有限的、逐步的和可预见的抱负),这种重新定义的范围就越广泛。这两种特征无疑不是无关的:事实上,受到降

168

级威胁的资产阶级子女无论是受到投资意识还是受到不降低身份之想法的驱使,在转向由于其透明的单一性而令人特别难以忍受的稳固职业时,他们首先趋向旧职业中最不确定的那些和新职业建立在其中的领域。创造性的重新定义的作用尤其可在分布广泛和不太专业化的职业中,以及文化和艺术生产的最新领域,比如国营或私营的大文化生产大企业(电台、电视台、销售、广告、社会科学等)中观察到,在这些大企业中,职位和前途尚未具有旧式官僚职业的严格性,招聘往往通过遴选,也就是以“关系”和习性的相似性为基准,而不是以学历的名义进行(于是巴黎资产阶级子女有更多机会达到如文化生产的大官僚机构提供的介于学习和职业之间并且能够更“持久”的地位,而不是直接进入一个非常确定但是终身的职业——比如教师的职业,而且他们有更多机会进入某些职位并获得成功,特殊学历——高等电影研究院或摄影或电影技术学院的文凭、社会学或心理学学士学位等——事实上只为那些能够为这些形式上的职衔加上真正学历的

人提供这些职位。)》³⁷

169

介入文化生产体系中的不同等级的相对分量在近20年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源于电台或电视台或国营或私营研究机构（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方面）发展的新型雇佣生产者大大增加，还有教育机构人员，尤其是在其低层，而艺术职业或法律职业也就是说知识手工业则衰退了；这些形态变化伴随着智识生活组织的新机构（思考、研究等任务）和制度化的新交流方式（研讨会、讨论等）的发展，在本质上有助于知识生产者的出现，这些知识生产者更直接地服从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需要并且拥有新的思想和表达方式、新的主题和看待知识劳动和知识分子功能的新方式。这些变化，再加上处于知识学徒状态中的大学生人数的大量增加，以及一系列半知识职业的发展，其主要作用很可能就是为“知识”生产提供从前仅由“资产阶级艺术”支配的东西，也就是读者大众，他们的人数相当多，足以证明特定的生产和传播机构的发展和运作，以及在大学场和知识场的边缘出现的一种高度普及化——“新哲学家”代表了这种普及化的典型。（关于不同社会职业等级的发展，参见 L. Thévenot, *Les catégories sociales en 1975. L'extension du salariat*, *Economie et statistique*, n°91, juillet-

³⁷ 这些新策略与已用过的策略重合或取代了这些策略，如直接的财政援助的授予，即一种预支的遗产，或家庭的社会资本在一桩富裕婚姻中的转化，甚或转向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市场的趋势，在这些市场中，经济、文化或社会资本的收益更大（这些市场类似从前的殖民地或权威的或至少体面的机构，比如军队或教会，进入这些机构既不必拥有经济资本，甚至也不必拥有文化资本）。

août 1977, pp. 3-31, “为企业提供调查和建议”的领域——司法推事、会计和财经专家、广告代理人、建筑师事务所等——雇佣了许多妇女并且构成了持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的一条重要出路,关于这个领域的常规发展,参见 P. Trogan, Croissance régulière de l'emploi dans les activités d'études et de conseils, *Economie et statistique*, n°93, oct., 1977, pp. 73-80)。

但是,这种变化形式的典型地点应该到一系列这类职业中去寻找,这些职业共同点是保证最直接地由家庭传承的文化资本如文雅的举止、良好的趣味或容貌的魅力的最大收益。这些职业包括:艺术或半艺术职业,知识或半知识职业,咨询职业(心理学家、就业或就学指导者、发音矫正医生、美容师、家庭顾问、营养师等),教育或教育辅助职业(辅导员、文化指导人等),推广和表现职业(旅游推广人、空中小姐、艺术指导、电台或电视台主持人、新闻专员等)。

国营以及尤其是私营官僚机构行使的接待和招待功能,与它们传统上赋予男人(外交官、内阁成员)的功能,无论在其规模上还是风格上,都有深刻的差别,这些男人往往出身于在社会资本方面和对维护这种资本必不可少的社交技巧方面最富有的统治阶层(贵族、资深的资产阶级)。而这些机构行使接待和招待功能的必要性促使一系列女性职业和一个身体属性的合法市场的出现。某些妇女从她们的魅力中获得一种职业收益且美丽因此在劳动市场上获得一种价值这个事实,无疑有助于引起不仅许多衣着、化妆等标准的变化,而且还有一 170

系列伦理变化,与此同时引起对女性的合法形象的一种重新定义:女性杂志以及身体形象和身体合法使用之定义方面的所有合法机构,都在传播由这些拥有职场魅力的职业女性代表的妇女形象,这些职业女性按照一种严格规划的道路(通过特定的学校、选美比赛等)被合理地挑选和培养,为的是按照职场标准完成最传统的女性功能。

L'AUBRE *8 avril 1966*

Cette école où l'on acquiert la « class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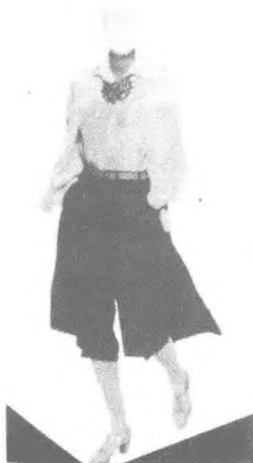
Si vous pensez, Madame, que votre mari n'est pas le parfait gentleman que vous aimeriez avoir à vos côtés; si vous trouvez, Mademoiselle, que votre fiancé, ou votre amoureux, manque de raffinement, donnez-lui donc cette adresse avec tact: 59, rue de Penthièvre. C'est là, en effet, que Claude Lelief, déjà directrice de la célèbre école de mannequins Lucky, vient d'ouvrir la première « école de bon goût et de galanterie française ».

Les élèves — dont l'âge varie entre 18 et 60 ans — y apprennent, en dix leçons particulières d'une heure et demie, à s'habiller avec chic et recherche (tout comme Cary Grant et le duc de Windsor, qui figurent parmi les hommes les plus élégants du monde), à se conduire d'une manière irréprochable, à bien se tenir à table, à connaître les fleurs et à les offrir.

On se familiarise également avec la façon de marcher comme un grand de ce monde et d'éternuer discrètement (ce que, paraît-il, une personne sur sept sait faire). En un mot, cette école de bon goût dispense ce qui possède peut-être le plus de valeur dans la vie: la classe. Les répétiteurs du sexe faible, quant à elles, y apprendront l'art de descendre d'une voiture sans attirer les regards indiscrets des messieurs et de repousser avec tact les avances d'un patron trop entreprenant.

Les célibataires désireux de se perfectionner auront une raison supplémentaire de fréquenter cet établissement: Michael, fils d'un grand diplomate, qui tient à conserver l'anonymat, a mis au point un « cours accéléré de séduction » dont les leçons suivent — affirme-t-il — tous les canons féminins.

这是《黎明报》1966年4月8日的一篇文章的残页,标题为“人们学习‘品味’的这所学校”。——译者



这两幅图来自 1978 年 10 月 23 日的《伊人杂志》。

左图标题为“延长您的妇女天职的职业”(指空中小姐)

右图标题为“第二章：如何不知不觉地变瘦？”下面写有“把身份证上的头像剪下来，贴在这幅剪影上。亲眼看着节食的目标和结果有助于忍受饥饿。”——译者

力求产生出特定专长尤其是“建议”之专长的威力，只有在社会结构的最不确定的领域才最有可能成功，这种威力的实施只要求上等文化才能的一种合理化形式。一个被社会承认的性方面的建议专家机构，正在通过义务的、慈善的或政治的协会的逐步职业化而实现，这个机构的形成表现了一个过程的典范形式，行动者并深信作为一切信仰传布之根源的无关利害，并倾向于通过以下这个过程满足他们的等级利益，即为了生产他们的上等文化的需求和稀缺性，他们以自己通过教育系统获得的些许文化合法性为借口，接近被排斥出合法文化的阶级。从家庭顾问到营养品销售者，他们今天都从事这类职业，为涉及身体的形象或用途的一切方面 171

提供弥补存在与理当(*devoir-être*)之间差距的手段,但若无那些推动产生一个永不枯竭的产品市场的人的无意识串通,他们将会一事无成,他们在向后者提供产品的同时,规定身体的新用途和一种新的身体素养,即喜欢蒸汽浴、体操房、滑雪的新小资产阶级为自身发现的¹⁷²身体素养,与此同时制造如此多的需求、期待和不满。医生和营养师,他们借助科学权威推广他们的正常状态定义,如“正常人的体重和身高的关系表”,平衡的饮食制度或性满足的模式;裁缝,他们把认定不可及的模特测量值才符合优雅趣味;广告代理人,他们在身体的必不可少的新用途中找到无数要求遵守秩序的机会(“注意您的体重”等);记者,他们在女性周刊和面向富裕的管理者的杂志上展示和炫耀他们自己的生活艺术,他们创办了这些周刊杂志,他们在上面露面,他们全都致力于推进一项事业,甚至在有时使他们互相对立的竞争中也是如此,他们如此尽力地支持这项事业,只是因为并非总是意识到他们在为这项事业服务,也没意识到在为这项事业服务的时候是在为自己服务。这种新小资产阶级发挥了它在拥有新操纵工具的阶级之间的中介功能,而且,他们通过其存在本身,引起了旧小资产阶级的位置和配置的一种转变,但我们只有参照统治方式的变化才能理解新小资产阶级的出现,这种统治方式以诱惑代替压迫,以公共关系代替国家暴力,以广告代替权威,以温和的方式代替强硬的方式,期待通过需求的强制规定而不是规范的灌输达到被统治阶级的象征一体化。

学校教育系统的变化

我们看到,试图将这一系列变化尤其是将所有这些转变还原为一个恶性膨胀和贬值的机械过程,是很幼稚的,这一系列变化在学校教育系统内外是由受教育人口的大量增加决定的;而所有这些转变通过出现在学校教育系统所有层次的形态变化,但也通过传统的系统使用者的防卫反应,影响了系统的组织和运行,比如被微妙划分等级的部门和被巧妙掩盖的备用职位的增加,使得对等级的认识模糊化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比较中学教育系统的两种状况:在最早的状况中,制度本身的组织、它规定的专业、它提供的教育、它颁发的学历,依靠明显的分隔、鲜明的界限,初中和高中的区分决定了被传授文化的所有维度上的系统差别:教学方法,可预见的前途(颇能说明问题的是,这种分隔在得以进入统治阶级的地点,也就是说进入中学的时刻并在高等教育的层次上 173 得到维护甚或加强,在中学中存在着“精英”学校、C 中学^①与其他中学的对立,而在高等教育中存在着重点大学或更确切地说,权力学校与其他学校的对立)。在目前状况下,大批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子女之受排斥不再是从升六年级开始的,而是逐渐地、不知不觉地,在中学的最初几年,通过被否认的淘汰形式实现,这些淘汰形式就是作为被推迟的淘汰的落后(或留级),就是降级到二流的系科中,这种降级意味着一种打上烙印和污名的作用,而这种作用能够强加对一种学校教育的和命运的认可,而且最终就是被

^① 指法国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侧重理科的中学。——译者

授予贬值的文凭。³⁸

如果说不同社会职业等级的子女在四年级和职业教育水平预备班(CPPN)的比例反映了法国就业人口的总体分布,阶级之间的差别在部门之间的分布已经非常明显:实际上被长期教育淘汰(也就是被贬到职业教育水平预备班或实用班级)的儿童的比例,与社会等级成反比,从农业雇工中的42%或工人和服务人员中的29%,到中等管理者中的4%和高级管理者中的1%。出身于民众阶级的儿童在短期技术教育中所占比例过多,但从一年期的培训(职业教育证书),经预备班到(手工业者的子女最多的)学徒期和专业技能合格证书的第一年,直到(中学水平的)职业教育证书和技术中学,中等管理者和职员的子女的数量则有规律增加,而工人子女的数量则同步减少(统治阶级子女的数量则最少)。若更深一步,我们看到,在专业技能合格证书的水平上,中产阶级的男孩多选择电力而非建筑并且比其他人的选择范围更广;而中产阶级的女孩往往趋向经济或金融教育,民众阶级的子女在服装行业的人数更多。或者,中产阶级的男孩,在职业学校毕业证书的水平上,比在专业技能合格证书的水平上人数更多,他们更倾向于商业服务,而工人的儿子大部分都从事工业制图。于是

³⁸ 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两个等级——严格地说,一向有三个等级,连同高等小学及尤其是所有高级行政机构提供的一系列内部培训和考试——的划分倾向于消失从而在另一个层次上重组的时候,博德洛(Baudelot)和埃斯塔布莱(Estabet)发现了没人会想到怀疑其存在的这种对立,因为这种对立构成了学校教育再生产机制的最明显表现。

我们接触到所有被划分等级的错综复杂的部门,从最理论性的和最抽象的到最有技术性的、最实用的,每个部门都包含着遵循相同原则的一个等级——比如电力与建筑之间的对立[参见厄弗拉尔(F. Oeuvarard)即将发表的文章]。在中学水平上,出身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别,在人数比例上明晰可鉴,也非常清楚地表现在学科之间的分布上,一极是“精英”阶级,174 C 中学,其中中等管理者、高级管理者、自由职业者、工业家和大商人的子女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另一极是特殊的中学,短期中学教育与长期中学教育之间的“跳板”,实际上这种跳板是专门留给一小部分人的,工人子女在当中的人数所占比例过大,这两极之间是 A, B 或 T^① 学科。贬值进行强制的补救并作为培训机制发挥作用,而技术性最强的专业职位的变化依据技术进步,要求少数人具有一种增强的技术能力,所以贬值和职位的变化,使得工人阶级的子女尤其是那些出身于这个阶级最“受优待”的阶层(技师、技工)的人越来越依靠长期或短期的教育,作为维持地位的条件和避免走向赤贫无产者的消极前途的唯一手段。

界限非常明确的系统将明确符合社会分工的学校教育分工内在化,而分类含糊不清的系统(至少在学校教育空间的中间水平上)支持或许可本身含糊不清的愿望,因为它虽推行“期望水平”与学校教育壁垒和水平之间的契合,在方式上却不如旧系统那么严格和粗暴,而旧系统则是竞争的残酷严格性的象征。如果说分类

① A 指以古典语言为主的文科, B 指现代语言的文科, T 指技术学科。——译者

含糊不清的系统用贬值的文凭应付大部分使用者——利用既相对地不可替代又微妙地被等级化的学科和文凭的无秩序繁荣所支持的认识错误——无论如何,它没有像旧系统那样粗暴地强制使用者中止投资(*désin vestissement*),而且被选中者与落选者、真文凭与假文凭之间的等级和界限的模糊,促使推行温和的淘汰和对淘汰的温和接受,但它支持以下这种关系的建立,这种关系不如从前的界限意识(*sens des limites*)那么注重实际且那么受客观未来支配,因为这种界限意识是对等级的一种非常敏锐的认识的基础。新系统以无数方式鼓励的误识(*allodoxia*)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得被降级的人通过过高估计他们加入的学科,过高评价他们的学历并给予自己实际上被拒给予的可能性,参与到他们自己的降级之中,它也使得他们并不真正接受他们的位置和学历的客观真实。新的或创新的位置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吸引力,是因为这些位置模糊、定义不清,在社会空间中定位不明确,并常常像从前的艺术家或知识分子行业那样,不提供任何一种物质的或象征的标准,如提升、报酬、加薪,而社会时间还有社会等级就是以这些标准体会和衡量自身的;是因为这些位置无法为期望留这么大的余地,因此使得有可能避免突然的和最终的终止投入,而从入门一直到退休都有着明确划分的范围和特点的职业则强制规定了投入的中止:这些位置提供的不确定的未来,即到此为止一直留给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175 特权,使得有可能将现在变成一种不断被更新的延期,并把以前的语言称为身份的东西看成一种暂时的条件,就像画家那样,尽管他从事广告业,却继续把自己看成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并且抗议说,这个唯利是图的职业不过是权宜之计,他一旦赚到足够的

钱能够保持经济独立时,他就会放弃这个职业。³⁹ 这类模棱两可的职业使得从哲学家的“天职”到哲学教授的“天职”、从绘画艺术家到广告画家或图画老师的转变所包含的中止投入和重新投入的活动有可能被省去,或至少把它无限向后推迟。我们明白,这些延迟的行动者与终身教育(或与教育系统中的终身性)密切相关,终身教育与激烈竞争的系统截然对立,这个系统致力于标明时间界限,一劳永逸且尽早地说明完毕的业已完毕,而终身教育提供了一种开放的、无限的未来。⁴⁰ 我们知道,这些延迟的行动者像艺术家一样,无比殷勤地迎合青春时代的美学和伦理学方式和模式,以这种方式对自己和对他人表明他们最后且最终没有完结,没有定论。通过不易觉察的和无限小的变动完成的转变代替了学习与就职、在职与退休之间不可折中的突然中断(让我们想想通常由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从事的所有临时的或半永久性的职业,他们填补了科学研究或高等教育的稳固位置,或在另一个范畴内,“先锋派”企业实行的逐步退休制)。这一切就好像学校教育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新逻辑鼓励尽可能长时间地推迟界限最终确定的时刻,也就是推迟有时表现为一种“个人危机”的终结,而所有无限小的变化,都趋向这

³⁹ M. Griff, *Les conflits intérieurs de l'artiste dans une société de masse*, *Diogène*, n°46, 1964, pp. 61-94. 我们在马松·格里夫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了广告人即“商业艺术家”的老一套手段的一种非常明确的描述,他们让他们的学徒即通常是想象中的艺术家接受这一套手段,致使他们中止投入(“跑腿打杂”等)并在一个“低等的”场中重新投入。

⁴⁰ 因此,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剩余产品设法在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的管理中派上用场,这些问题和冲突是由学校教育的“生产过剩”和这种生产过剩导致的新“需要”(比如终身教育的需要等)引起的。

个界限。需要指出,如此获得的客观机会与期望之间的契合,既是更加微妙的又是更巧妙地强行取得的,但也是最冒风险的和最不稳定的吗? 现在的和未来的位置表象中的模糊是通过对自身掩盖界限的努力来接受界限的一种方式,而这种努力等于拒绝了界限,或者,不如说,这种模糊也是通过一种模棱两可的革命主义的自欺来拒绝界限的一种方式,这种自欺是以怨恨为原则的,以对抗相对于想象中的期待的降级。于是旧系统倾向于产生鲜明的社会身份,这些社会身份几乎没为社会梦幻留有什么余地,但它们在这种自己毫不让步地要求的弃绝中,也是让人无忧和令人安心的,然而,社会身份的表象和合法地包含在社会身份中的期望的表象的这种结构不稳定性,却倾向于通过丝毫没有个人特点的一种运动,把行动者从社会危机和社会批判的领域打发到个人批判和个人危机的领域。

竞争的斗争与结构的平移

我们看到,其首要考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革新”引进话语之中的所有这些人是多么天真,他们宣称通过在社会空间中为“革新”或“创新”规定一个地点(lieu)就能解决“社会变化”问题,而这个地点对一些人而言是最高的,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则是最低的,这些人总是在别处,在所有“新兴的”、“边缘的”、“受排斥的”群体中;用“保守”或“革新”描述一个阶级的特点(甚至没有说明在什么方面),就是暗中依靠一种必然由社会确定的伦理尺度来制造一种话语,这种话语除了说出它所处的地点之外,几乎什么也没说,因为它消除了根本,也就是作为客观关系系统的斗争场,在这个场中,位置与占位在关系上互相确定,而且这个场支配着力图改变它

的斗争：只有参照游戏空间，人们才能理解力求维持、改变或为了维持而改变的自发的或有组织的个人或集体策略，因为游戏空间确定了这些策略，而这些策略力求照此、或多或少彻底地维持游戏空间或重新为它下定义。

转变的策略不过是永久的作用和反作用的一个方面，每个群体都通过这些作用，尽力维持或改变其社会结构中或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的某个发展阶段上的位置，在这个发展阶段，人们只能通过改变来维持或者为了维持而改变。在特定的但最常见的状况中，每个阶级或阶层都尽力通过一些作用，获得新优势，也就是说取得压倒其他阶级的优势，因而在客观上改变阶级之间的客观关系（财产的统计学分配数列所记录的客观关系）结构，而这些作用被其他阶级趋向相同目标的反作用抵消（因而顺次被取消），由此这些对立的作用在它们引起的运动中被取消，其结果是阶级或阶层之间的财产分配结构的一种总体平移。这些财产是竞争的赌注（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属于这种情况——参见图与表）。177

我们在这幅图上可以看到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形态学变化与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成员利用学校教育再生产工具的程度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一些群体的总数倾向于减少或停滞，这些群体的再生产方式尤其在开始时期建立在经济财产的传承基础上，而在相同时期，出身于这些群体的子女的入学率增加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壮大了处在一个相同的社会等级水平上的雇佣劳动者等级；在形态上扩张的阶层的成员（中等管理者、高级管理者、职员）尤其在文化资本上富有，他们主要依靠学校保证他们的再生产，他们倾向于与在阶级结构中占据同等

地位的自由职业者在子女入学率提高方面保持大致相同的比例。商业经理与职员的相对位置的颠倒,以及农业经营者与工人的相对位置的颠倒,既可以通过两个在数量上下降的等级被迫接受的学校教育的增强,以及这些等级的总体统计学特征的(比如在文凭方面明显的)增加得到解释,这种增加来自其内部结构——在不那么分散的方向上——的变化,而且更确切地,也可以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解释,即他们的底层特别受到危机的触动,因而被迫消失或转化。出现在图中的入学率无疑被高估了,这是因为统计数字只考虑在家庭中被统计的青少年——不包括那些单独生活或住在寄宿学校、宿舍等中的人——而且,无疑越往社会等级下层,高估越常见。似乎在近期显示出来的曲线形扇状图的轻微收缩,一方面可归因于最高等级的饱和,另一方面归因于这一事实,即统计学忽视了不同阶级的少年在本身具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的学科中的分布。在1967-1968、1976-1977年间,在公立学校的中学班级中,工人子女(1975年占17岁青年的40.7%)的比例仍旧非常稳定(从25.7%到25.9%),而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的子女在同一时期从15.4%上升到16.8%。此外,在1976-1977年,在中学生中,在(理科主导的)C学科,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子女中的57.6%,与农业雇工子女中的20.6%,工人子女中的23%相对。相反,在技术主导的一个学科,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的子女中仅有9.8%,与农业雇工的子女中的24.6%,工人的子女中的28.7%相对(参见F.厄弗拉尔,同前面引文)。类似倾向在高等教育的层次上也可看到,在这个层次上,出身于民众阶级的大学生越来越明显地被打

实际上,观念的顽固无法解释以下这些幼稚的看法,比如谈到1950-1960年期间大学“平均招生”的增加(这几乎等于什么都没说)并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大学变成“被中产阶级支配的大学”(Cf. R. Boudon, *La crise universitaire française: essai de diagnostic sociologique, Annales*, 3, mai-juin 1969, pp. 747-748)。只要看一眼学院——尤其是文学院和理学院——在按照其主顾的社会出身在高等教育制度的分布中占据的位置,就足以显示被《法国的不幸》的作者高度赞扬的这样一种统计学分析的重要性,这位作者对这种分析没有获得它应得的全部成功深感痛惜,因而这种分析为对大学现实的深刻认识提供了另一个证据(cf. Peyrefitte, *Le Mal français*, Paris, Plon, 1978, *passim* et spécial. pp. 408-409 et pp. 509-511)。文学院和理学院处于一个显然由重点大学支配的场的最低点,如果我们从这些学院提供的文凭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行判断,它们今天所处的位置甚至比几年来兴盛一时的不那么有名望的、最近出现的商业学校更低,因此它们具有降级位置的所有属性,从特别高的“民主化”(和女性化)比率开始——连审慎的测定者也会对这种比率感到惊讶。对那个以奥贝尔维里耶的技术专科学校或圣德尼的中等教育学校衡量中学教育的“民主化”的人,我们能说什么呢?为了说明“由中产阶级支配”的大学,此外应该在(由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大学人在学校人口中的百分比表示的)中产阶级占学校人口的比率和客观上与这些阶级相联的入学机遇之间,在学校的社会构成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具有重要作用——比如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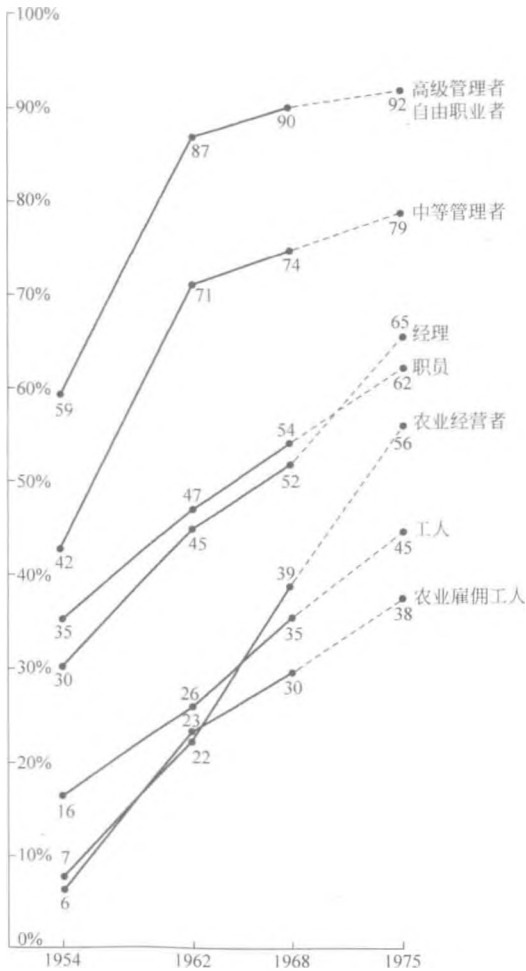


图7 1954到1968年之间16-18岁青少年入学率的平移

• 我用虚线指出了1975年18岁青年的入学率。

来源 INSEE, *Recensement de la population 1954, 1962, 1968*; *Probabilités d'accès à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P. Bourdieu, J. C. Passeron, *Les héritiers*, Paris, Ed. de Minuit, 1964, p. 15 et P. Bourdieu, J. C. Passeron, *La reproduction*, Paris, Ed. de Minuit, 1970, p. 260; *Taux de scolarisation de 16 à 18 ans, Données Sociales*. INSEE, 1973, p. 105 (至于1975年, 计算从表SCO 38C的人口普查的1/5抽样调查开始)。

180 授课方面,不具备旧系统中暗中要求的前先决条件的大学学生增加,而且,这种重要作用依旧存在,因为尽管一个群体在人数上处于统治地位,却很可能在社会方面仍旧处于被统治地位)与不同阶级特有的入学可能性的结构的变化之间,实行一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混同,入学可能性是把(在大学课程的一个已知水平上)每个阶级受教育的幸存者人数与其出身的整个阶级(而不是与他们的全体同学)联系在一起计算的,入学可能性的结构经历了一个向高处的简单平移,而不是经历了一种真正的变化。

每当为了某种确定的稀有财产或头衔而竞争的群体的力量和努力,倾向于像在一种赛跑中那样保持均衡;在赛跑中,经过一系列的超越和追赶,最初的差距仍旧保持下来。这就是说,每当起初最贫困的群体,为了占有到那时为止一直被社会等级中刚好在他们上面或者赛跑中刚好在他们前边位置的群体所拥有的财产或头衔而进行的尝试,几乎在所有层次上都被处于更有利位置的群体为保持其财产和头衔的稀缺和卓越所付出的努力大致抵消,我们似乎可看到同样的相似变换的发展过程。我们想到了16世纪下半叶英国贵族中间贵族爵位的出售通过引发这些爵位的激增和贬值的自我维护过程而引起的斗争:最低的爵位,比如候补骑士或骑士随从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然后轮到了骑士爵位,骑士爵位贬值如此迅速,乃至最古老的爵位持有者不得不施加压力,确保创造一个新爵位即从男爵;但这个填充骑士与王国封臣之间空隙的新爵位,是作为对高级爵位的持有者的一种威胁出现的,高级爵位的价值

与一定的差距相连。⁴¹ 因此, 觊觎者通过占有构成这些持有者的稀缺性的爵位这种做法, 齐心协力毁灭他们: 当一个人是平民时, 没什么比购买爵位更能令一个爵位贬值了。至于持有者, 他们客观上顺应觊觎者的贬值, 要么在某种程度上将他们的爵位丢弃给他们, 以追求更高的爵位, 要么在有爵位的人中引入与得到爵位的资历相关的差别(比如风度)。于是, 所有参加赛跑的人, 无论处于什么地位, 只有为了保持他们与那些紧随其后的人的距离并因此以他们的差别威胁跑在他们前面的人而奔跑; 或者在另一个方面, 181 只有渴望拥有在同一时刻刚好处在他们前面的人持有的而且他们自己只是在以后才会拥有的东西, 才能保持他们的位置、他们的稀缺和他们的地位。

最稀有头衔的持有者也可通过建立一种数目规定, 在某种程度上置身于赛跑之外、比赛之外、竞争之外。总的来看, 当“在正常情况下”确保受优待群体的稀缺性的统计机制表现不足时, 这种措施的使用通常就成为必要, 而这些统计机制的不引人注目的效力和真正的逻辑(尤其是真正的淘汰标准)只能由统计学分析得到把握: 一种有意识的保护主义取代了放任自流——只要对受优待群体利益的保护得到保证, 这种放任自流就适用——而有意识的保护主义要求制度公开地做某些机制暗中做的事情, 这些机制呈现出自然而然的必要性的所有表象。为了保护自身免受超额人数的影响, 稀缺头衔和稀缺头衔提供的稀缺职位的持有者, 只得维护职

⁴¹ I. Stone, *The Inflation of Honours, 1558-1641, Past and Present*, 14, 1958, pp. 45-70.

位的一种定义,这种定义不过是那些在一种头衔和职位稀缺性的确定状况下占据这个职位的人的定义:他们宣称,未来的医生、建筑师或教师应该是他们今天这样,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样子,他们把所有这些属性永久地纳入职位的定义,但这些属性被赋予这个职位,是通过职位占据者的人数少(比如与一种精心选择相关的次要属性,如一种高等的社会出身),也就是通过为竞争并由此为竞争不可避免地引起的职位变化规定界限而实现的。

数目规定在区别措施为它提供的极限形式下,大致以明确的界限取代了统计的界限。统计界限在群体周围勾画了这块“折中”地带,在涉及存在和不存在的界限时,柏拉图谈到了这个地带,这个地带乃是对社会分类系统的区别权力(年轻还是年老?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富裕还是贫穷?资产者还是小资产者?等等)发出的挑战;数目规定以一种制度化的、因而有意识的和有组织的分离、区别的程序取代了选择、包含和淘汰的原则,这种程序建立在不为在分类中落选的任何人留任何余地的一个和唯一一个标准基础上(妇女、犹太人或黑人不予考虑),而这些原则建立在彼此之间或多或少密切联系而且往往是不言明的多种标准基础上。事实上,最具选择性的群体更愿意避免区别措施的粗暴性而且兼有表面上无衡量标准的魅力与选择的保证,这是因为无标准让群体成员心存一种以个人独特性为依据的挑选之幻想,而选择确保群体具有最大的一致性。

高级俱乐部要求其新会员履行非常严格的手续,包括候选人资格证明,推荐,有时要若干年来已经成为俱乐部成员的介绍人的——严格意义上的——介绍,委托给全体成员或一

个接纳委员会加以挑选。有时要交纳极其高昂的入会费，如布洛涅森林俱乐部 1973 年每人交纳 5000 法郎，圣克鲁高尔夫俱乐部 1975 年每人交纳 9500 法郎，还要加上每年的会费，圣克鲁高尔夫俱乐部是 2050 法郎，这样高级俱乐部就能保护其一致性。实际上，试图确定形式上的规则是不是用来掩盖选择的随意性，或者相反，这种公开的随意性是不是用来掩盖正式的规则，这是徒劳的，形式上的规则尤其用来保护群体从而抵挡外界，与其说是抵挡事先被淘汰的其他阶级，不如说抵挡这个阶级的其他层次或这个层次本身的暴发户，而且形式上的规则往往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而公开的随意性将选择的责任留给了一种难以确定的分寸：“这是看在客户的面子上”，一家俱乐部的经理说；另一个经理说，“有的俱乐部需要两个介绍人并且接受所有人；有的俱乐部需要两个介绍人并且差不多接受所有人；有的俱乐部需要两个介绍人但很难接受什么人”。另外，一切都依靠介绍人的分量：“等待的期限是两年或三年，若介绍人过硬，就不用等”（公司经理，布洛涅森林俱乐部成员）。同样，尽管所有权表面上无法继承，但人们会询问一个想要加入布洛涅森林俱乐部的年轻妇女，她的父亲或哥哥是否属于该俱乐部。一切都似乎说明，尽管许多高级俱乐部表面上都是围绕一种罕见的和有选择性的活动组织起来的，但这种活动诸如高尔夫、马球、打猎、骑马、泥鸽射击、帆船，不过是一个借口，这些俱乐部与专业俱乐部对立，因为专业俱乐部的成员通过拥有一份共同财产比如巴黎帆船俱乐部的一条船来确定自身，而高级俱乐部则考虑整个社会人，这个

人持有的所有社会资本,高级俱乐部越有威信,越想实现一个完全的利益和价值共同体,就越是如此(比如骑马俱乐部、布洛涅森林俱乐部或新俱乐部)。

鉴于选择标准的实际情况只能来自外部,也就是说来自一种客观化,这种客观化事先被拒斥为还原性的和粗略的,那么群体会坚信,其自身的集合除了一种无法确定的契合意识,没有别的原则,唯有归属能够提供这种意识。互相选择的奇迹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达到极致,知识分子群体不会天真地允许为了结社所需要的任何客观化:由于他们相信近乎神秘的参与感——正是这种参与感可以界定参与者——他们使被排斥者想要指出把自己与当选者分开的看不见的界限时注定要捕风捉影,因为被排斥者除了能够提供他们通过揭发无意中披露的证据之外,无法提供排他群体存在的其他证据。如果说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最有权威的群体受到如此严密的保护,以对抗客观化,这不只是因为需要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才能在实践中支配决定归属的机制,不只是因为那些成为智识群体的群体显然不是最倾向于将智识群体客观化的群体,而那些不是智识群体的群体总是有忽视根本的危险,并且无论如何都有被他们之被排斥推向一种怨恨观念进而是还原的怨恨观念的嫌疑。这也是因为人们只有拿自身对游戏的所属即一种既微不足道又绝对的风险作赌注,才能将智力游戏客观化。

降级与重新分类的辩证法是各种各样的社会过程的根源,这种辩证法意味着并强制规定以下这一点,即所有相关的群体在相同方向上奔向相同的目标、相同的属性,这些属性是由在赛跑中占

据第一位的群体为这些群体指定的,因而从本质上说是跟随者无法企及的,因为无论这些属性在自身和对本身而言是什么,它们都被自身卓越的稀缺性改变和确定,而且一旦它们增多并被暴露,为低等的团体获得,它们就不再是它们了。因此,通过一种明显的悖论,对秩序也就是对一整套差距、区别、地位、优先权、优待、独占权、高贵、顺序属性的维护,以及由此对将其结构赋予一种社会形成的顺序关系的维护,是由实体的(也就是说非关系性的)属性的一种不断变化来实现的。这就意味着一个既定时期的稳定秩序与一种时间秩序即一种演变顺序密不可分,每个群体过去都拥有一个直接的低级群体而且将来都拥有一个高级群体(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进化论模式的完整倾向)。竞争的群体被差别分开,这些差别基本上处于时间顺序中。这个系统给予信用这样一个地位并非偶然:通过竞争的斗争实现的对合法性的规定,被所有传布文化信仰的热忱行动强化,这种对合法性的规定,乃温和的暴力,依靠受害者的同谋得到实施,并且能够赋予对需要的随意规定以一种由遭受暴力的人所要求的解放使命的外表,所以,这种对合法性的规定倾向于产生作为需要的奢望,这种奢望先于完全实现自我满足的手段而存在;而且这种奢望与一种社会秩序对立,这种社会秩序承认即使最贫穷的人也有权得到一切满足,只是这种满足只能最终地、经过长时期才能实现,因此这种奢望除了信用别无选择,这种信用允许立刻享受被允诺的财产,但包含着对一种未来的接受,这种未来不过是现在的延续或赝品,如假冒的豪华汽车或伪造的奢华度假。但是降级和重新分类的辩证法预先也倾向于作为一种观念机制发挥作用,保守主义话语尽力夸大这种机制的作用,而且这

种机制急于通过信用推动即刻的享受，因此它倾向于强加给被统治者这样一种幻想，即他们只需等待就可以获得他们只能通过斗争获得的东西，尤其当他们将现在的条件与过去的条件进行比较时：通过把阶级之间的差别置于继承的顺序中，竞争的斗争建立了一种差别，这种差别如同在由牢不可破的继承法支配的一种社会秩序中把先来者与后继者分开的差别一样，既是最绝对的，也是最不可克服的——因为除了等待之外别无他法，有时要等待一生，比如那些退休回家的小资产者，有时要经过几代人，比如那些将其自身残缺的轨迹延伸到子女身上的所有人⁴²——而且这种差别还是最不现实的、最缥缈的，因为人们知道，只要他们善于等待，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拥有不可抗拒的进化法则允诺给他们的东西。总之，竞争的斗争使之永存的，并不是有差别的条件，而是条件的差别。

理解了这个机制，就是首先意识到某些讨论是无用的，这些讨论在永久与变化、结构与历史、社会再生产与“生产”之间的学究式取舍中产生，而且这些讨论的真正原则是拒绝承认如下几点，即社会冲突和斗争并非全都且总是与法定秩序的永存发生矛盾；在“对立组合思想”的反命题之外，永久性可能由变化保证，而结构可能

⁴² 应该分析集体或个人延迟的所有社会结果：迟到（与早来对立）的后果不仅仅是使用时间的减少；迟到意味着与实践或所考察的财产不那么熟识、不那么“自然”的关系（这可能产生技术后果——如果涉及一辆汽车，或象征后果——如果涉及一种文化财产）；此外当财产或实践的价值更多来自其区分能力（这种能力显然与受优待的或专门的占有——“专有权”——或优先的占有——“头等舱”——有关）而非财产或实践提供的内在满足时，它代表了纯粹丧失的隐蔽对等物。（服务或产品销售者可以从误识的作用中获益，他们尽量利用这些差距，比如提供不适时的优惠——组织反季节旅游，或延迟的优惠——过时的服装或活动，而这些优惠只有正当时令才能拥有其全部价值）。

被运动永久化；合法需要（市场营销的专业人士的最流行语言把这些需要叫做必需，他们引进、选择并规定了这些需要）的强制规定与满足需要的实现手段之间的差距必然引起“受挫的期望”，这些受挫的期望允许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信用）获得一种剩余劳动，产生经济效用，它们并不必然地且自动地威胁系统的继续存在；结构差距和相应挫败乃是通过平移实现的再生产的根源，这种平移确保通过改变条件“性质”实现位置结构的永存。理解这个机制，也是理解以下两种人显然都忽视了一点，即他们抓住的现实的矛盾特征事实上是同一个过程密不可分的维度，前一种人依靠可以称之为基本的属性，谈论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后一种人援引顺序属性，试图反驳他们。被统治阶级只要且只需要以分散的顺序，也就是说通过作用和反作用进入斗争，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能够在一种竞争的斗争中并通过这种斗争实现，这种斗争导向一种分布结构的简单平移，但作用和反作用在统计学上只通过外部作用得到总计，而外部作用是一些人的行动对另外一些人的行动，在任何互动和妥协之外的实施的，因而也是在客观性之中的，不受集体和个人的控制，而且往往有悖于行动者的集体或个人利益。⁴³ 当

⁴³ 这些统计行动过程的极限由恐慌或混乱的过程构成，在这些过程中，每个行动者通过完成恐惧作用引起的行动，促成了他所恐惧的东西（这是金融恐慌的状况）；在所有情况下，集体行动，即未经协调的个人行动的简单统计总和，会达到一个集体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可还原为集体利益且与集体利益互相矛盾，同时甚至不可还原为个人行动追求的个人利益且与个人利益互相矛盾（当关于阶级未来的一种悲观表象产生的降低士气作用加速了引起衰落的阶级的衰落时，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处于衰落的阶级的成员通过他们的许多行为加速了集体衰落，比如手工业者促使他们的子女就学，但同时又责备学校教育使年轻人转行）。

被统治阶级的成员接受统治者向他们提议的赌注时，这种阶级斗争的特定形式即竞争斗争是他们被强加的斗争形式，是同化的斗争，并且由于其最初的落后，它也是再生产的斗争，因为那些进入这种追逐赛的人，仅仅通过参加竞赛这个做法，就暗中承认他们追赶的人所追求的目标的合法性，而在这种追逐赛中，他们在起跑时就被打败了，如同差距的持久性所证明的。

竞争(或混乱)过程的逻辑迫使每个行动者单独对其他行动者数不清的反应的作用，或更确切地，对他们单独行动的统计总和的结果，做出反应，这个逻辑将阶级还原为由其自身的数量和自身的总量支配的群体状态，通过建立这个逻辑，我们就能提出今天在历史学家当中激烈争论的若干条件(经济危机、在一个膨胀时期之后出现的经济危机等问题)，⁴⁴即相互再生产的客观机遇与主观愿望的辩证法中断的条件问题；一切都让人设想，客观机遇相对于客观机遇的从前状态所要求的主观愿望的一种突然中断，在本质上决定了被统治阶级赞同的一种中断——忽然从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被从赛跑中排除的被统治阶级对到那时为止一直被默认的统治目标是赞同的，这样，这种突然中断使得对价值标准的一种真正颠覆成为可能。

44 cf. L. Stone, Theories of Revolution, *World Politics*, 18(2), janv. 1966.



187



第三章 习性与生活风格的空间

正如社会空间可以通过一个简图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事实足以强调的,被这样描绘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抽象的表象(représentation abstraite),这种表象是经过一种特定的建构活动产生的,它以一种图形的方式提供了一个粗略的观念,即一个关于一整套观点的观点,普通行动者(包括日常行为中的社会学家或读者本人)从这一整套观点出发形成他们对社会世界的看法。这个社会空间使得行动者永远无法从整体上且在其多种关系中体会的各种位置同时存在于在一眼就可觉察的一种全体性中——这个社会空间的启示功能就在这里,这个社会空间之于日常生活的实践空间,相当于几何空间之于日常经验中的行程空间,这是因为,在这个社会空间里需要保持或强调距离,邻人可能比陌生人还要疏远,而且它有其空白和非连续性。但最重要的无疑是这个空间的问题是在这个空间中被提出的,而且行动者对这个人们无法否认其客观性的空间持有的观点依赖于他们在这个空间中占据的位置,他们想要改变或保留这个空间的意志表现在这个位置之中。因此科学为了指明它建构的等级而使用的许多词语是从日常用法中借鉴而来的,这些词语在日常用法中表达群体相互之间产生的往往具有论战性的观念。社会学家好像被他们的热情引向更大的客观性,但他们几乎

总是忘记这一点，即他们为之分类的“物”产生了客观上可分类的实践，也产生了同样客观的分类活动，而这些活动本身是可分类的。科学进行的分类导向行动者产生的可分类的实践和他们针对他人的或他们自身的实践的分类判断的共同根源：其实习性既是客观上可分类的实践的发生原则也是这些实践的分类系统（划分原则）。被表现的社会世界也就是生活风格的空间就是在确定习性的两种能力之间的关系中形成的，这两种能力分别是产生可分类的实践和作品的能与区分和评价这些实践和这些产品的能力（趣味）。

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相关特点（从共时性和历时性方面所领会的资本总量和结构）与跟在风格空间中的相应位置密切联系的区分特征之间事实上建立的关系，只有通过习性的构建才能变成一种明白易懂的关系，习性作为一个发生公式，使我们有可能既对可分类的实践和产品又对本身被分类的判断进行解释，这些判断将这些实践和这些作品变成区分符号系统。谈论教授的贵族式苦行或小资产阶级的抱负，这不仅是描绘这些群体的某个属性，哪怕是最重要的属性，而且是试图说出他们所有属性的发生原则与他们对自身的和别人的属性的所有判断的发生原则。习性乃被归并的必然，它变成了配置，以产生合乎情理的实践和能够由此产生的实践提供意义的认识，习性作为普遍的和可移植的配置，实现了一种系统的和普遍的应用，这种应用被延伸到直接获得的东西的界限之外，即学习条件固有的必然的界限之外；习性即使一个行动者（或成为类似条件产物的全体行动者）的全部实践既是系统性的，因为这些实践是相似（或可互相转换）的模式应用的产物，也使

这些实践系统地区别于构成另外一种生活风格的实践。

鉴于不同的生活条件产生不同的习性——习性即能够通过简单的转移用于迥然不同的实践领域的发生模式系统——，那么不同的习性产生的实践表现为有系统的属性的整体特征，这些整体特征表现了客观上有区别的差距系统的形式被纳入生活条件中的差别，这些差距系统被具有必要的认识和评价模式以便发现、阐释和评估其合乎情理的特征的行动者所领会，作为生活风格发挥作用。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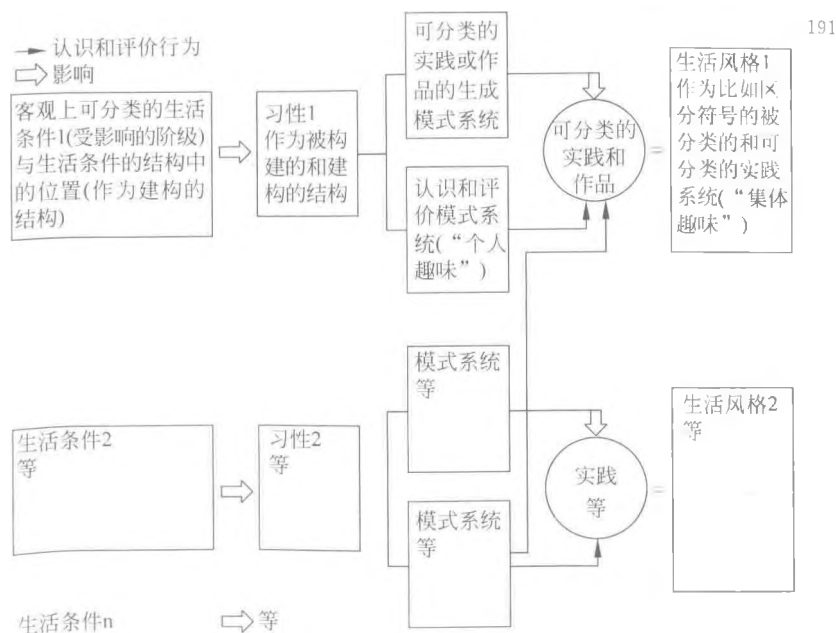


图8 生活条件、习性和生活风格

¹ 这就是说，生活条件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或实践意识既不应该通过机械论的逻辑也不应该通过意识的逻辑被理解。

作为建构的结构,习性构成实践和对实践的认识,但习性也是被建构的结构:逻辑分类的原则构成了对社会世界的认识,这个原则本身也是归并社会阶级划分的产物。每个条件都不可分割地被其内在属性和这个条件从它在条件系统中的位置得来的关系属性确定,也就是被一切把它与它不是的一切尤其是它与之对立的一切区分开来的东西确定;而条件系统也是一个差别系统,即有区别的位置的系统,社会身份在差别中确定和表现出来。这就是说,表现在对一种条件的经验中的整个条件系统的结构,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习性的配置之中,而这种条件在这个结构中占据一个被确定的位置:条件结构的最基本对立(高/低、富/贫等)倾向于作为实践和对实践的认识的基本构造原则让人接受。习性乃产生实践的模式系统,这个系统以系统的方式表现了阶级条件固有的必然和自由,以及构成位置的差别,习性按照区别的原则领会条件的差别,它以(作为习性产物的)被分类的和能够分类的实践之间的差别的形式把握条件的差别,而区别的原则本身也是这些差别的产物,在客观上与这些差别一致并倾向于将这些差别视为自然而然的。² 如果为了反对机械论的所有形式,应该重申关于社会世界的普通经验是一种认识,那么为了反对意识自发生成的幻想,同样重要的是要看到,最初的认识是对同样在头脑中建立的一种秩序的无知

² 将一个群体分成阶级的观察者实现了一种行动,这种行动在社会实践中拥有它的对等物。如果他不知道这一点,除了他有可能将一种本地分类的或多或少被改变的一种形式当成一种科学分类(许多“类型论”正是如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可能让他的分类行动的真实达到意识层次,他的分类活动在这方面如同本地认识的活动一样,意味着联系、比较,而且当他的分类活动似乎处于社会物理学的领域时,这种活动事实上是在产生和阐释有意义的区分,总之是处于象征性的秩序之内。

和认可,许多“觉悟”的理论可还原为意识自发生成的幻想。因此生活风格是习性的有系统的产物,这些产物按照习性模式在它们的互相关系中被认识,它们变成了被社会定性(为“高雅的”、“庸俗的”等)的符号系统。条件与习性之间的辩证法是一种炼金术的基础,这种炼金术将资本分配即一种力量关系的平衡变成被觉察的差别、区分的属性的系统,也就是变成象征资本即合法资本的分配,这种资本的客观真理却不为人知。

相同的建构结构(生产方式),通过付出转换(retraductions)的代价产生了被建构的产物(行动结果),这种转换是由不同场特有的逻辑强加的,作为被建构的产物,同一个行动者的所有实践和作品在客观上彼此之间协调,根本无需有意地寻求一致,而且在客观上与同一阶层的所有成员的所有实践和作品配合,根本无需有意识地商讨。习性不断地产生实践的隐喻,用另一种话说,也就是产生转移(驱动性的习惯的转移不过是一个特例)甚或产生由习性实现的特定条件强加的系统移植(transpositions systématiques),人们原以为吃苦的天性总是表现在节俭中,但同样的吃苦精神也可能在一个确定的背景下表现在使用贷款的某种特定方式上。同一个行动者的实践,且更广泛地,同一个阶级的所有行动者的实践,从以下这个事实中获得风格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使得每种实践成为其他无论哪种实践的一种隐喻;这个事实即这些实践是相同的行动模式从一个场到另一个场的转移的产物,人们称为“笔法”的配置,也就是写字的一种独特手法,乃是这种相似的操纵机构即习性的常见范式,这种配置总是产生相同的字体,也就是书写的笔迹,尽管它们在大小、内容和颜色方面有差别,这些差别与材

质诸如纸张或黑板有关,与工具诸如钢笔或粉笔有关,尽管它们在使用运动肌肉之间有差别,但这些笔迹以所有风格或手法的特征的方式,表现出一种可直接识别的相似性,我们通过这些特征可准确无误地辨认一位画家或一位作家,如同通过步伐认出一个人。³

系统性在行动结果之中,因为系统性在生产方式⁴之中:系统性之所以在个人或群体被包围的“属性”(或“财产”)如房屋、家具、绘画、书籍、汽车、酒、香烟、香水、服装之中,并在他们借以表现自身的高雅的实践如运动、游戏、文化娱乐之中,仅仅是因为系统性在习性的原本综合的统一性之中,习性乃所有实践的统一和发生原则。趣味,即一个确定的阶级对被分类的和能分类的客体和实践的(物质的和/或象征的)占有的倾向和能力,是作为生活风格之根源的发生公式,生活风格即特殊偏好的统一整体,这些偏好在每个象征亚种如家具、服装、语言或身体素养的特定逻辑中表达了相同的表现意图。生活风格的每个维度都与其他维度“一起发挥象征作用”,如莱布尼茨所说的,并且象征着其他维度:一个年老的手工细木匠的世界观、他管理收支的方式、他的时间或他的身体、他

3 普鲁斯特树立了真正模仿的榜样,真正的模仿不是——以滑稽模仿或漫画手法的方式——复制一种风格的最显著特征,而是要复制习性,即雅克·里维埃(Jacques Rivière)所说的“精神活动的发源地”,原创的话语在这里产生:“看到每个作家在接触他不了解的一件事时,完全回到并重做相同的动作,我们感到很好笑,他恰恰就是通过这些动作对他带来活力的动作产生反应的。他精神活动的发源地重新被找回了,他头脑中的灯盏被点亮了”(J. Rivière, in M. Proust et J. Rivière, *Correspondance, 1914-1922*, Paris, Gallimard, 1976, Appendice B, p. 326)。

4 一种社会心理学的原子主义打破了实践的统一性,建立了自诩能解释一些产物、行动结果(*opus operatum*)的片面“法则”,为了反对这种原子主义,我力求建立能再生产生产法则的普遍法则,即生产方式(*modus operandi*)。

的措辞和他的服装选择,全都表现在他的精细和完美做工、仔细认真、精雕细刻、尽善尽美的伦理中,以及为了做工而做工的美学中,这种美学使他以其产品需要的细心和耐心来衡量产品的美。

(说到)搭配协调的属性系统,还应该把人算在这些属性内——人们说起“很般配的夫妇”,朋友们喜欢说他们志趣相投——这个系统的原则是趣味,即分类模式的系统,这些分类模式只能非常不完全地达到意识层面,尽管随着社会等级升高,生活风格为韦伯所说的“生活的风格化”留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趣味是与一个人相关的所有特点之间的这种相互配合的根源,古典美学推崇这种相互配合是为了这些特点产生的相互强化:一个人有意无意地泄漏的数不清的信息无限地互相加强并互相确认,为经验丰富的观察者带来了这种快乐,这种快乐正是由重复信息的一种和谐分布所产生的对称和呼应为艺术爱好者提供的。观察或计量迫使单独抽出的不同特点,对一般认识而言,彼此越是强烈渗透,实践透露的每个信息因素(比如一种绘画上的判断)越是被从前或同时辨出的整体特点的作用感染——而且在偏离可能特点的情况下被修正——,人们就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这些重复信息的复因决定的作用。调查倾向于单独抽出特点——比如将被言说的事物与言说这些事物的方式分开——并让这些特点脱离相关特点的系统,由此,调查倾向于在每一点上缩小阶级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小资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差距:在资产阶级生活的日常状况中,关于艺术、文学或电影的平庸见解配上了低沉而平稳的嗓音、平缓而从容的语调、淡然或自信的笑容、审慎的举止、裁剪得体的服装和发

表这些平庸见解的人的资产阶级沙龙。⁵

因此,趣味是将物变成区分的和特殊的符号、将持续的分布变成中断的对立的实践操纵机构;趣味使被纳入身体的物质范畴内的区别进入有意义的区分的象征范畴内。趣味通过在客观上被分类的实践的相互关系中并按照社会分类模式来认识这些实践的这种做法,将这些实践变成能够分类的实践,也就是变成等级位置的象征表现,而在客观上被分类的实践中,某种条件自身(通过它的既能感觉又能理解的事物)会产生意义。因此趣味是区分性特点之系统的根源,这个系统注定要被随便一个拥有实践认识的人当成一个特定的生活条件阶级的一种系统表现,也就是当成一种区分的生活风格,而实践认识针对的是区分符号与分类中的位置之间、客观属性空间与同样客观的生活风格的空间之间的关系,客观属性空间是由科学建构揭示的,而生活风格的空间是为了并通过日常经验而这样存在的。这个分类系统是社会空间的结构归并的产物,这种归并是通过对这个空间中的一个确定位置的体验而实现的,因此这个分类系统在(它倾向于在自身的逻辑中再生产的)经济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范围内,是与一种条件固有的规律性相符的实践的原则;这个分类系统持续地把必然变成策略,把限制变

⁵ 因此缺陷可以变成轻蔑的拒绝而困窘可以变成消遣。资产者尤其通过他们操纵调查局面的才能表现卓越(对结果的任何分析都应该考虑这种才能)。对文化在其中起作用的社会关系的操纵,尤其是由与语言建立这种关系的才能实现的,而这种才能分配非常不均,在上流社会谈话的所有情形中(比如有关电影或旅行的闲聊)被要求的这种与语言的关系,意味着这样一种艺术,它轻描淡写、闪烁其辞、遮遮掩掩,大量使用语言学家找出的作为资产阶级语言特点的所有多余的词句、所有冗长的废话和所有句法上的谨小慎微。

成偏好,并撇开一切机械论的决定性,产生一整套“选择”,这些选择构成被分类的和能分类的生活风格,而这些生活风格从它们在一个对立的和关联的系统中的位置获得其意义也就是其价值。⁶ 分类系统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乐事,倾向于采取与它成为其产物的条件相符的“选择”,由此不断地倾向于乐意做不得已的事:在某些状况中,由于社会位置的一种变化,习性在其中产生的条件与习性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条件不一致,而在另一些状况中,人们能够单独抽出习性自身的有效性,所以,如同人们在上述所有状况中看到的,是趣味,必然的趣味或奢侈的趣味,而非一份低收入或高收入,支配客观上符合这些收入的实践。分类系统使一个人拥有他热爱的,是因为他热爱他拥有的,也就是说热爱他在分配中实际上被给予的和在分类中被合法地规定的属性。⁷

空间之间的同源性

196

考虑到先前的一切,尤其是考虑到这个事实,即习性的发生模式通过简单的转移而被用在相当不同的实践领域,我们立刻就会明白这一点,即与不同实践领域中的不同阶级相关的实践或财产,是按照对立结构组成的,这些对立结构彼此之间完全是同源的,因

⁶ 将经济行动者视为可互换的主体的经济理论,自相矛盾地不去考虑经济配置的可能性的经济条件,与此同时,使自己不能真正阐明偏好系统,而偏好系统界定了无从比较的和独立自主的主观功利。

⁷ 一种伦理学企图把一种精神气质的原则也就是一种条件的被迫选择规定为普遍的法则,这种伦理学仍旧是服从于命定之爱(amor fati)、满足于人们之所是和人们之所有的一种更微妙的方式。这就是伦理学与革命意图之间的切实矛盾的基础。

为它们全都与条件之间的客观对立的¹空间是同源的。在这里我无意通过几页纸的篇幅揭示整个下文应该确立的东西,而是为了让人看到分析的细节有可能整个掩盖的一系列关系,于是我仅满足于非常简略地指出社会空间的两大组成原则如何支配文化消费空间的结构和变化,以及更普遍地,如何支配整个生活风格空间的结构和变化,这些消费是整个风格空间的一个特点。在文化消费方面,按照资本总量衡量的主要对立,在这里,在两类消费之间建立起来:前一类因其稀缺性而被指定为高雅的,属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最富有的阶层,后一类则被社会认为是平常的,因为这类消费既是容易的又是普通的,属于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两方面最贫困的阶层,而在中间位置,是注定要显得自不量力的实践,因为抱负与在这些位置中显示的可能性之间是很不协调的。在统治者看来,被统治状况的典型特征是被迫的苦行和无根据的宽容的组合,因此占统治地位的美学以自如和苦行的组合反对被统治状况,艺术作品和审美配置是占统治地位的美学的最完美的实现,而自如和苦行的组合乃是有选择的苦行主义,即深思熟虑的限制、手段的简省、克制、保留,它们表现在这种绝对的卓越表现即紧张中的松弛中。

这种根本的对立可以通过资本的结构得到详细说明:通过占有手段和源自这些手段的与艺术作品的关系的不同形式,占统治地位的不同阶层倾向于选择在风格和对象上如此不同而且有时如此公开对立的²文化实践(比如“艺术家”的文化实践和“资产者”的文化实践)⁸,以至于人们最终忘记了这些实践是与必然和那些服

⁸ “资产者”在这里用作“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的一种缩写,“知识分子”以同样的方式充当“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

从必然的人的同一种根本关系的变种,忘记了这些实践的共同点是追求对合法的文化财产的独占和这种独占提供的区分利益。而这些阶层拥有的占有手段,一方面专门地或主要地是文化的,另一方面大多是经济的。统治阶层的成员要求艺术对社会世界的一种极度否认并倾向于一种自如和安逸的享乐主义美学,这种美学是由通俗喜剧或印象派绘画所象征的,与统治阶层的成员相反,被统治阶层的成员与基本上是苦行主义的美学有关联,因此他们倾向于支持所有艺术革命,这些艺术革命是以纯粹和净化的名义、以拒绝炫耀和拒绝资产阶级的装饰趣味的名义实现的,他们从他们的穷亲戚身份中得来的相对于社会世界的配置,还使他们倾向于接受关于社会世界的一种悲观主义表象。

如果说很显然艺术为实践提供了绝佳领地,那么无论如何,没有哪个实践领域中,让轻易的冲动和初级的需要服从净化、精致、升华的意图不显示出来,没有哪个实践领域中,“生活的风格化”,也就是形式被赋予的高于功能的优先性,不会产生相同的作用,这种优先性导致对功能的否认。在语言方面,是民众的心直口快与资产阶级的高度压抑的语言之间的对立,是对形象化或效果的表现主义追求与克制和假装简洁(希腊语是 *litotès*, 曲言法)的立场之间的对立。在使用身体语言上也是同样的经营手段:仍旧是指手划脚和急急忙忙、丰富表情和滑稽手势与平缓——尼采所说的贵族的“平缓的动作、平缓的目光”^①对立,与高贵借以显示的克制

^① F. Nietzsche, *Der Wille zur Macht*, Stuttgart, Alfred Kröer Verlag, 1964, Aph. 943, p. 630.

和沉着对立。甚至没有哪个初级趣味的领域不是按照根本的对立构成,不包含着数量与质量、暴饮暴食与精美小菜、材料与手法、实质与形式之间的对比。

形式与实质

在食物消费方面的主要对立大致与收入的差别相符这个事实,掩盖了次要对立,次要对立在¹⁹⁸中产阶级内部如同在统治阶级内部一样,在文化资本最富有和经济资本最不富有的阶层与拥有一种相反结构的财产的阶层之间建立起来。因此,观察者在这个事实中看到收入的一种简单作用,这个事实是,随着社会等级升高,食物消费的比重降低,或者热量高的、脂肪多的、增肥的但也便宜的食物如肉糜、土豆、菜豆、肥肉、猪肉(S. C., XXXIII)同时还有酒¹⁹⁸的消费比重减少,而脂肪少的、清淡的(容易消化的)而且不增肥的食物(牛肉、小牛肉、羊肉、羔羊肉,尤其是新鲜水果和蔬菜等)的比重增加。¹⁰ 鉴于偏好的真正原则是以做迫不得已之事为乐的趣味,把消费变成收入的一项简单功能的理论本身包含了全部假象,因为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支配与必然的距离。不过毕竟这种理论无法解释相同的收入与结构迥然不同的消费相关联的状况:因此工长仍旧附属于“大众”趣味,尽管他拥有比职员更高的收入,

¹⁰ 香蕉是工人和农业雇佣劳动者的人均年消费量(23.36 法郎和 25.20 法郎)高于其他阶级尤其是高级管理者的人均年消费量(19.15 法郎)的唯一水果,高级管理者的苹果消费量排在首位(31.60 法郎,工人的消费量是 21.00 法郎),而昂贵和贵重的果品如葡萄、桃、胡桃和榛子主要是由自由职业者、工业家和大商人消费的(分别是 29.04 法郎,19.09 法郎,17.33 法郎,工人的消费分别是 6.74 法郎,11.78 法郎和 4.90 法郎)。

而职员的趣味毕竟标志着与工人的趣味的断然决裂并接近教授的趣味。

为了真正解释恩格尔定律^①不过予以记录的变化,应该考虑社会条件的全部特点,这些特点从童年起就与拥有或高或低的收入(在统计学上)相关,而且这些特点能够培养符合这些条件的趣味。¹¹ 在消费领域和此外的其他领域看到的差别的真正根源是奢侈趣味(或自由趣味)与必然趣味之间的对立:奢侈趣味是成为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的个体固有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由与必然的距离,即由资本拥有所保证的自由,或如人们有时所说的宽裕确定的;必然趣味正是通过与必然的配合本身表现了必然,必然趣味是必然的产物。因此人们可以从以最低成本再生产劳动力的必然中推导出大众对既最有营养又最经济(这种双重的同义选用表明了这是还原为纯粹的原始功能)的食物的喜爱,这种必然作为定义强加给了无产阶级。典型资产阶级的趣味观念,因为意味着绝对的选择自由,所以与自由观念密切相关,以至于人们很难设想必然趣味的悖论。要么人们干脆取消必然趣味,将实践变成经济必然的一种直接产物(工人吃菜豆是因为他们买不起别的),并且忽视以下这一点,即大部分时间,必然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行动者倾向于实现这种必然,因为他们喜爱他们无论如何都要被强加的

199

^① 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 1857 年根据统计资料得出的一个消费结构变化的规律: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越大,而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译者

¹¹ 我在这一整段中依靠对国家统计局和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的图表的二度分析,这项调查针对的是 1972 年从 39 个职位的社会职业等级来看的家庭消费。

东西。要么人们将必然趣味变成一种自由趣味,忘记必然趣味得以产生的条件,因此人们将这种趣味还原为对(第一)需要之物的一种病理的或病态的偏好,一种先天的贫困,即一种阶级种族主义的借口,这种种族主义将民众与粗鄙和下流联系在一起,与质次的红葡萄酒、不良的居心、粗活儿、粗野的笑声、粗俗的玩笑、普普通通的常识、下流玩笑联系在一起。趣味是命定之爱,命运的选择,但也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由存在条件产生的,这些存在条件将其他一切可能作为纯粹的梦想排除,除了必然的趣味没有给出其他选择。

只要把必然趣味当成好像是奢侈趣味来描述¹²(每次当人们忽视了实践模式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这种情况),就足以产生社会空间的两个极端位置之间的虚假一致:无论涉及生育还是单身(或同样地,涉及晚婚),我们看到,对一些人而言是一种有选择的奢侈的东西,对另一些人则是一种被剥夺的结果。因此,尼科尔·塔巴尔(Nicole Tabard)对一些针对妇女工作的态度的分析是很典型的:对工人阶级妇女而言,“工作是一种束缚,一旦丈夫的收入增加,这种束缚就解除了”;相反,对特权阶级而言,妇女工作是一种选择,如同“当地位提高时妇女就业的比率并不降低”这个事实证明的。¹³ 当

¹² 我们说奢侈趣味而非自由趣味,为的是让人避免忘记这一点,即自由趣味也是一种社会必然的产物,这种社会必然是通过“宽裕”也就是与必然的距离被确定的,社会必然造成了这种距离。

¹³ N. Tabard, *Besoins et aspirations des familles et des jeunes*, CREDOC et CNAF, s. d., p. 153.

人们阅读统计数据时,应该记住这个例子,因为在这些数据中,提问的同源性强加的名义上的一致性掩盖了完全不同的现实,当人们从社会空间的一极走到另一极时,经常是这种情况:如果说在一种状况下,工作的妇女声称支持妇女工作,而在另一种状况下,她们可能在工作的同时并不支持妇女工作,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妇女暗自作为参照的工作是她们被允许期待的唯一工作,也就是一种艰苦的和报酬很低的体力劳动,这种劳动与工作一词让资产阶级妇女联想到的东西毫无共同点。为了让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实施的意识形态作用有一个大致的看法,只要强调一种社会心理经验就够了,这种社会心理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即同一个行为如献血,或被视为自愿的或被视为被迫的,这要看这个行为是由特权阶级成员还是由民众阶级成员来完成,而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本质主义的和反生成的,它仅仅通过让必然的趣味(康德的“野蛮人的鉴赏力”)脱离它的经济和社会存在理由这种做法,就将这种趣味变成一种天生的爱好,从而有意无意地将这种趣味自然化。¹⁴

必然的趣味只能产生一种自在的(en soi)生活风格,这种风格 200
只是由于匮乏,才被它与其他生活风格形成的被剥夺关系从否定方面这样确定。对一些人而言是有选择的标志,对另外一些人而言是他们甚至在身体上带着的烙印。“如同上帝的选民在前额上写着他们属于耶和华,劳动分工在手工工场的工人身上打上了一

¹⁴ J. W. Thibaut and A. W. Riecken, Some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56, vol. 24, pp. 113-133.

个承认他的资本的属性的戳记”。马克思所说的这个戳记，正是生活风格本身，通过生活风格，最贫困的人立刻暴露无遗，这甚至体现在他们对空闲时间的利用上，因此他们注定要充当所有高雅举动的陪衬物并以全然否定的方式支持奢望与区分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趣味不断变化的根源。他们不只是几乎毫不具备在学校教育考试或上流社会谈话的市场上获得价值的知识或风度，不只是仅仅拥有在这些市场上无价值的本领，他们还是“不懂得生活”的人，是在物质食粮尤其是当中脂肪最多、最粗劣、最增肥的食物如面包、土豆和油脂以及最平常的食物如葡萄酒上花钱最多的人，是最不讲究衣着和身体护理、化妆和美容的人，是“不懂得休息”的人，“总是要找点事儿干”的人，把帐篷搭在拥挤的露营地的人，在国家公路边野餐的人，驾驶雷诺 5 或桑卡 1000 堵在度假出发点的人，沉迷于由大批量文化生产的工程师按照他们的意图设计的预制准备好的娱乐的人，是通过如此缺乏灵感的“选择”在必要时证实了阶级种族主义的人，因为他们确信他们只拥有与他们相称的东西。

吃喝的艺术无疑是民众阶级明确反对合法生活艺术的唯一领域。农民尤其是工人以一种幸福生活的道德反对为了身材苗条而节食的新伦理，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越高，这种新伦理就越得到认可。享乐派不仅是喜欢美食和美酒的人。享乐派也是懂得加入慷慨而亲密也就是既简单又自由的关系的人，一起吃喝支持并标志着这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克制、沉默、保留消失了，因为克制、沉默、保留表现了由于拒绝参与和放纵而产生的距离。

高级管理者、自由职业者和工业家中的 64% 与中等管理者和职员中的 60% 认为，“法国人吃得太多”。农业劳动者

(他们堪称最倾向于认为自己吃得“正常”的人——所占比例是54%，而高等阶级持此观点者所占比例是32%)和工人最不倾向于接受新文化规则(40%和46%)，这种新文化规则在妇女中比在男人中、在年轻人中比在老年人中的认可程度更高。在饮酒方面，只有农业劳动者与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截然对立(32%的人说“法国人喝酒正常”)，工人还是比其他等级更不经常接受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工人中的63%(和农民中的56%，相对于管理者、自由职业者和工业家中的48%)声称他们对喜欢美食和美酒的人持赞同观点。他们倾向于在这个领域要求他们在文化方面尽力掩盖的非正统实践的另一个标志：他们说在饭馆他们宁愿选择一个经过烹调的菜而不是一份烤肉(如高级管理者所做的那样)或者他们既吃奶酪也吃甜食(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知道，由于很少去饭馆吃饭，对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而言，去饭馆吃饭——农业劳动者中的51%，工人中的44%，高等阶级成员中的6%实际上从来不去饭馆——是某种异乎寻常的事，这件事与富裕和中止日常的食品配给限制有关)。甚至在合法性比重无疑更大的白酒消费方面，民众阶级成员(农业劳动者中的35%，工人中的46%，相对于高等阶级中的55%)最不倾向于把儿童可被允许喝白酒的年龄确定在15岁以上(S. C. ,XXXIV)。

对民众与食物的关系的中断在一种界线中显示出来，这种界线毫无疑问地建立在工人与职员之间：与技术工人相比，无论从食物的绝对价值(9.377法郎相对于10.347法郎)还是相对价值(34.2%相对于38.3%)来看，职员消费的面包、猪肉、猪肉食品、

202 表 16 职员、工长和技术工人的食物消费结构(S. C., III)

	技术工人		工长		职员	
每个家庭的平均人数	3.61		3.85		2.95	
每个家庭的平均消费总额(法郎)	26 981		35 311		27 376	
每个家庭的食物平均消费额(法郎)	10 347		12 503		9 376	
食物消费占总消费的百分比	38.3		35.4		34.2	
按法郎计算的平均消费额和食物总消费的百分比	法郎	%	法郎	%	法郎	%
粮食:	925	8.9	1 054	8.4	789	8.4
· 面包	464	4.5	512	4.1	349	3.7
· 糕点,甜面包干	331	3.2	439	3.5	322	4
· 米饭	27	0.3	28	0.2	24	0.2
· 面条	65	0.6	46	0.4	49	0.5
· 面粉	37	0.3	27	0.2	45	0.5
蔬菜:	858	8.3	979	7.8	766	8.2
· 土豆	141	1.4	146	1.2	112	1.2
· 新鲜蔬菜	556	5.4	656	5.2	527	5.6
· 干蔬菜和罐头蔬菜	162	1.6	177	1.4	127	1.3
水果:	515	5.0	642	5.1	518	5.5
· 新鲜水果	248	2.4	329	2.6	278	3.0
· 柑橘,香蕉	202	1.9	229	1.8	177	1.9
· 干果	65	0.6	86	0.7	62	0.7
肉店里的肉:	1 753	16.9	2 176	17.4	1 560	16.5
· 牛肉	840	8.1	1 086	8.7	801	8.5
· 小牛肉	302	2.9	380	3.0	296	3.1
· 羊肉,羔羊肉	169	1.6	170	1.3	154	1.6
· 马肉	88	0.8	112	0.9	74	0.8
· 猪肉	354	3.4	428	3.4	235	2.5
猪肉食品,现成菜	893	8.6	1 046	8.4	758	8.0
鱼,虾,蟹	268	2.6	330	2.6	280	3.0
家禽	389	3.7	403	3.2	317	3.4
兔,野味	173	1.7	156	1.2	131	1.4
鸡蛋	164	1.6	184	1.5	146	1.5
牛奶	342	3.3	337	2.7	252	2.7
奶酪,酸奶	631	6.1	700	5.6	521	5.5

续表

	技术工人		工长		职员	
油脂:	547	5.3	629	5.0	439	4.7
· 黄油	365	3.5	445	3.5	292	3.1
· 食用油	149	1.4	146	1.2	125	1.3
· 人造奶油	30	0.3	37	0.3	21	0.2
· 猪油	2	—	—	—	1	—
糖,糖果,可可粉	345	3.3	402	3.2	290	3.1
酒:	883	8.6	1459	11.7	771	8.2
· 葡萄酒	555	5.4	1017	8.1	466	5.0
· 啤酒	100	1.0	109	0.9	68	0.7
· 果酒	13	—	5	—	8	—
· 开胃酒,甜烧酒等	215	2.1	328	2.6	229	2.4
不含酒精饮料	236	2.3	251	2.0	224	2.4
咖啡,茶	199	1.9	252	2.0	179	1.9
饭馆用餐	506	4.9	583	4.7	572	6.1
食堂用餐	457	4.4	559	4.5	473	5.0
其他	263	2.5	359	2.9	389	4.1

牛奶和奶酪、兔肉和家禽肉、干蔬菜和肥肉都要少,而且在一种更有限的食物预算之内,消费的肉类如牛肉、小牛肉、羊肉、羔羊肉一样多,消费的酒类、新鲜蔬菜和开胃酒多一些。食物消费结构的这些变化伴随着在个人保健或护理(也就是说既为了健康也为了美)和衣着方面消费的增加,同样伴随着文化和娱乐消费的轻微增长。只要看到食物消费的局限,尤其是这些食物消费中最接近陆生的、最平凡的和最下等的消费的局限,伴随着一种出身的限制,我们就有理由推测,这种下降构成了与世界关系的总体变化的一个特征:懂得为了将来的欲望和满足而牺牲眼前的欲望和享乐的“节制”趣味与民众阶级自发的唯物主义对立,民众阶级拒绝进入边沁的快乐与痛苦、利益与代价的计算(比如为了健康和美)。这就是说,这

两种与地上食粮的关系的根源是相对于未来的两种配置,这两种配置本身处在与两种客观的未来的一种循环因果关系中:经济科学的想象人类学从未放弃提出“物质偏好”这一普遍法则,为了反对这种人类学,应该强调这一点,即让现在的欲望服从于未来的欲望的倾向依靠这种牺牲的“合理”程度,也就是说依靠一个人无论如何获得大于被牺牲的满足的未来满足的机会。¹⁵ 在为期待中的满足而牺牲眼前的满足这种倾向的若干经济条件中,应该把这些未来满足的可能性计算在内,这种可能性存在于现在的条件中。仍旧是一种经济计算促使人们打消让生活服从于经济计算的想法:享乐主义致使人得过且过地抓住眼前稀有的满足(“美好的时刻”),这种享乐主义对于某些人而言是唯一可设想的哲学,因为这些人如人们所说的,没有未来而且无论如何他们对未来几乎毫无期待。¹⁶ 因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尤其表现在与食物的关系中

¹⁵ 只要从伯姆-巴韦尔克(Böhm-Bawerk)那里借鉴关于这些错误的本质分析的一个典型例子就够了:“我们现在必须考虑人类经验的第二个现象——一个充满因果关系的现象。这就是,我们不那么关心未来的喜悦和忧伤的感觉,仅仅是因为这些感觉确实属于将来,我们关心的减少与这种未来的遥远是成比例的。因此我们赋予被指定为未来目的服务的物品以一种达不到其未来的边际效益的真正强度的价值。我们有系统地低估了我们未来的需要并同样低估了用来满足它们的手段”(E. Böhm-Bawerk, *Capital and interest*, vol 2, South Holland, IL, 1959, p. 268, 转引自 G. J. Stigler and G. S. Becker, *loc. cit.*)。

¹⁶ 我们可以设想,与未来的深远关系(同时与一个人自身的深远关系——这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越高,就越看重这种关系)表现在这个事实中,即那些声称“死后有一种新生活”的人在工人中所占比例很小(工人占15%,而手工业者和商人或职员和中等管理者占18%,高级管理者占32%)(Sofres, *Antenne 2, Les Français et la mort*, octobre 1977)。

的实践唯物主义是精神气质乃至民众伦理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构成因素：眼前的存在表现在享受美好时刻和及时行乐的想法中，在这种现世的内在论是对确定了条件的若干限制之承认的情况下，这种存在本身是与他人的团结一致的一种表现（他人毕竟常常是现在对抗未来威胁的唯一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小资产者的节制被当成一种决裂：渴望上升的小资产者放弃了及时行乐及与他人一起及时行乐，当他没有围绕家与咖啡馆、弃绝与纵欲，也就是个人拯救与集体一致之间的对立构建他的整个自我形象时，他表现出脱离共同的现在的野心。 204

咖啡馆不仅是人们去喝东西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人们去一起喝东西的地点。在咖啡馆，人们可以建立亲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以暂时中止陌生人之间的交流中出现的审慎、常规和礼仪为基础的。与每个桌子都构成一个隔开的和独占的小地盘（人们要经允许才可借用椅子或盐瓶）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咖啡馆或饭馆相反，大众咖啡馆是一个人人融入的群体（新来者问候“大家好！”或“大伙儿早晨好！”或“哥儿们好！”表明了这一点）。咖啡馆的中心是柜台，人们与处在主人位置的“老板”（往往是他在调动气氛）有时甚至与所有在场的人握手后，就把胳膊肘倚在柜台上（桌子——并不是总有——留给“外人”或来这里给孩子喝点东西或打个电话的妇女）。典型大众的玩笑艺术就是在咖啡馆里展开的，这是一种拿一切开玩笑的艺术（别开玩笑或说正经的这些手法就是从这儿

来的,人们通过这些说法表示回到严肃的事情上,不过这些说法会引来一种暗示性的玩笑),但也是一种讲笑话或编造笑话的艺术。好脾气的胖子总是成为这类玩笑的被指定的受害者,因为他比别人更具备适合开玩笑的属性,按照大众标准,这个属性与其说是一个缺陷,还不如说是一个生动的独特性,因为他们归于他的善良天性预先使他倾向于接受这些玩笑并看到好的方面。总之,这是一种通过习惯的玩笑或辱骂嘲笑别人又不激怒他们的艺术,这些玩笑或辱骂由于太过分反而被抵消了,而且它们无论从使用的信息还是表现出的自由来看都意味着一种很强烈的亲近感,因此它们事实上是关注或友爱的证明,是表面诽谤实则颂扬、表面谴责实则接受的态度,尽管这种态度也可用来考验那些想与群体保持距离的人。¹⁷

三种区分方式

奢侈趣味与必然趣味之间的主要对立可细分为这么多对立,以至于存在着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及其初级需要相区分的不同方式,或者同样地,存在着使统治阶级有可能与必然保持距离的权力。因此,在统治阶级中,我们可以简单地区分三种消费结构,这三种消费结构被分成三个主要项目即食物、文化与展示自我和外

¹⁷ 指出这种有其被认可的高手和玩家的艺术可能堕入玩笑和谈话的漫画式形象不是无用的,因为这些玩笑和谈话按照民众趣味自身的标准也显得刻板、愚蠢或粗俗。

表的消费(服装、美容、化妆品、佣人)。这些结构在教授和工业家或大商人身上表现为截然相反的形式——如同他们资本的结构一样:工业家或大商人的食物消费非常高(占预算的 37%),而文化消费非常低,展示自我和外表的消费中等;而教授的平均整体消费更低,他们的食物消费低(相对低于工人的消费),展示自我和外表的消费有限(保健消费居于最高之列),而文化消费(图书、报纸、演出、体育运动、玩具、音乐、收音机和电唱机)相对高。自由职业者则与两者对立,他们用于食物的预算比例与教授的预算比例相同(24.4%),但消费总额高得多(57 122 法郎,而不是 40 884 法郎),展示自我和外表的费用远远超过所有其他阶层的费用,尤其还要加上佣人方面的消费,而他们的文化消费低于教授的文化消费(甚至低于工程师和高级管理者的文化消费,工程师和高级管理者处于教授与自由职业者中间,尽管几乎在所有消费方面都与后者更接近)。

表 17 教授、自由职业者、工业家和大商人的消费结构(S. C., III)

205

	教授		自由职业者		工业家,大商人	
	法郎	%	法郎	%	法郎	%
食物*	9 969	24.4	13 956	24.4	15 578	37.4
外观**	4 912	12.0	12 680	22.2	5 616	12.7
文化***	1 753	4.3	1 298	2.3	574	1.3

* 食物:包括饭馆或食堂用餐。

** 外表:衣服,鞋,修理和清洁,化妆品,理发,佣人。

*** 文化:图书,报纸,文具,唱片,体育运动,玩具,音乐,演出。

我们若详细观察食物消费如何分布,就能确定差别系统:工业家和商人在这一点上与自由职业者更不必说与教授迥然不同,这

是因为他们更重视以粮食为主要成分的食品(尤其是糕点)、酒、肉罐头、野味,而他们留给鲜肉和新鲜水果蔬菜的份额相对较小。教授的食物消费结构与办公室职员的消费结构相同,教授在面包、奶制品、糖、果酱、不含酒精的饮料上的花费比其他阶层更多,而在葡萄酒和烈性酒上的花费比自由职业者少,在昂贵的食品比如鲜肉——尤其是最贵的鲜肉,如羊肉和羔羊肉——和新鲜水果蔬菜上的花费比自由职业者明显要少。至于自由职业者,尤其因为他们

他们在昂贵的食品特别是鲜肉(占食物消费的 18.3%)尤其是最贵

206 表 18 按照统治阶级的阶层划分的食物消费结构(S.C., III)

	教授		高级 管理者		自由 职业者		工程师		工业家、 大商人	
每个家庭的平均人数	3.11		3.6		3.5		3.6		3.6	
每个家庭的平均消费总额 (法郎)	40 844		52 156		57 122		49 822		44 339	
每个家庭的食物平均消费 额(法郎)	9 969		13 158		13 956		12 666		16 578	
食物消费占总消费的百 分比	24.4		25.2		24.4		25.4		37.4	
按法郎计算的平均消费和 食物总消费的百分比	法郎	%	法郎	%	法郎	%	法郎	%	法郎	%
粮食:	865	8.7	993	7.5	1 011	7.2	951	7.5	1 535	9.2
• 面包	322	3.2	347	2.6	326	2.3	312	2.5	454	2.5
• 糕点,甜面包干	452	4.5	552	4.1	548	4.0	539	4.2	989	5.6
• 米饭	16	0.2	27	0.2	33	0.2	28	0.2	29	0.1
• 面条	35	0.3	32	0.2	62	0.4	41	0.3	33	0.1
• 面粉	40	0.4	35	0.2	41	0.3	31	0.2	28	0.1

续表

	教授		高级 管理者		自由 职业者		工程师		工业家、 大商人	
蔬菜:	766	7.7	1 015	7.7	1 100	7.9	899	7.1	1 222	7.4
· 土豆	81	0.8	94	0.7	95	0.7	98	0.7	152	0.8
· 新鲜蔬菜	555	5.6	729	5.5	811	5.8	647	5.1	915	5.1
· 干蔬菜和罐头蔬菜	131	1.3	191	1.4	216	1.5	154	1.2	153	0.8
水果:	632	6.3	871	6.6	990	7.2	864	6.8	877	5.2
· 新鲜水果	295	2.9	405	3.1	586	4.2	424	3.3	547	3.1
· 柑橘、香蕉	236	2.4	343	2.6	303	2.2	324	2.5	256	1.4
· 干果	102	1.0	122	0.9	98	0.7	116	0.9	73	0.4
肉店里的肉:	1 556	15.6	2 376	18.0	2 552	18.3	2 073	16.4	2 323	14.0
· 牛肉	814	8.1	1 291	9.8	1 212	8.7	1 144	9.0	1 273	7.2
· 小牛肉	335	3.4	452	3.4	630	4.5	402	3.1	377	2.3
· 羊肉,羔羊肉	156	1.6	315	2.3	438	3.2	242	1.9	390	2.2
· 马肉	31	0.3	49	0.3	31	0.2	37	0.3	94	0.5
· 鲜猪肉	221	2.2	251	1.7	239	1.7	247	3.4	187	1.3
猪肉食品	634	6.3	741	5.6	774	5.5	705	5.6	812	4.9
肉罐头	336	3.4	350	2.6	233	1.7	310	2.4	1 362	8.0
鱼,虾,蟹	336	3.4	503	3.8	719	5.1	396	3.1	588	3.5
家禽	235	2.3	311	2.4	399	2.8	310	2.4	333	2.0
兔,野味	36	0.3	97	0.7	148	1.1	89	0.7	289	1.7
鸡蛋	149	1.4	172	1.3	190	1.4	178	1.4	185	1.1
牛奶	299	3.0	271	2.0	249	1.8	287	2.3	309	1.9
奶酪,酸奶	692	6.9	776	5.9	843	6.0	785	6.1	1 090	6.5
油脂:	399	4.0	564	4.3	525	3.8	504	4.0	551	3.3
· 黄油	320	3.2	408	3.1	379	2.7	371	2.9	405	2.4
· 食用油	66	0.6	136	1.0	132	1.0	103	0.8	112	0.6
· 人造奶油	12	0.1	17	0.1	12	0.1	29	0.2	19	0.1
· 猪油	1	—	2	—	1	—	1	—	13	0.1
糖,糖果,可可粉	304	3.0	395	3.0	265	1.9	327	2.6	407	2.4
酒:	711	7.1	1 365	10.3	1 329	9.5	937	9.4	2 218	13.4
· 葡萄酒	457	4.6	869	6.6	899	6.4	392	3.1	1 881	11.8
· 啤酒	82	0.8	91	0.7	40	0.3	184	1.4	93	0.5
· 果酒	13	0.1	12	—	—	—	8	—	5	—
· 开胃酒,甜烧酒等	157	1.6	391	3.0	389	2.8	352	2.8	237	1.4

续表

	教授		高级管理者		自由职业者		工程师		工业家、大商人	
不含酒精饮料	344	3.4	342	2.6	267	1.9	295	2.3	327	2.0
咖啡,茶	152	1.5	215	1.5	291	2.1	178	1.4	298	1.8
饭馆用餐	829	8.3	1863	13.0	1562	11.2	1372	10.8	1179	7.1
食堂用餐	745	7.5	562	4.0	221	1.6	773	6.1	299	1.8
其他	264	2.6	379	2.7	258	1.8	432	3.4	324	1.9

的鲜肉(小牛肉、羔羊肉、羊肉)、新鲜蔬菜水果、鱼虾、奶酪和开胃酒上消费最多,他们显得特别突出。¹⁸

207 因此,从工人到工商业经理,中间经过工长和手艺人以及小商人,经济限制倾向于松动,而消费选择的基本原则不变:两个极端之间的对立建立在穷人与(新)富人、“饱食”与“暴食”之间;消费的食物越来越丰盛(也就是既昂贵又富含卡路里)而且越来越难消化(野味、肥鹅肝)。相反,自由职业者和高级管理者的口味则以否定的方面把大众的口味定为高热量的、增肥的和粗俗的口味,而自己偏向清淡的、细腻的、精致的口味;经济限制的取消伴随着社会审查的增强,社会审查趋向高雅和苗条,禁止粗俗和肥胖。对罕见的和贵族的食物的爱好倾向于昂贵的或罕见的食物(新鲜蔬菜、鲜肉等)居多的一种传统烹饪。最后,教授在文化资本方面比在经济资本方面更富有,因此他们倾向于在所有领域中的禁欲消费,通过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寻求一种创新,几乎有意识地与(新)富人和他们的丰盛食物对立,创新的寻求趋向于异国情调(意大利菜、中国菜

¹⁸ 在中产阶级中,对立更不明显,尽管我们看到了在小学教师和办公室职员一方与小商人一方之间的同源性差别。

等)和烹调民众主义(农家菜),而(新)富人是“暴食”的出售者和消费者,有时被称为“有钱人”,身体肥胖和精神粗野的人,他们拥有经济手段,便以一种被视为“庸俗”的傲慢显示一种生活风格,这种生活风格在经济和文化消费方面,非常接近民众阶级的生活风格。¹⁹

我们自然不能将食物消费尤其是仅仅通过所消费的食品来把握的食物消费,与整个生活风格隔绝:难道不是因为菜肴(构成菜肴的食品,尤其鉴于统计学把握这些食品的不确定程度,只能让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的口味,通过做菜方式与家庭经济和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的整个表象相联吗?对经过烹调的菜(蔬菜牛肉浓汤、白汁块肉、焖肉)的喜爱与女性角色的一种传统观念有关,因为这种菜要求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因此在这方面,民众阶级与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对立特别明显,在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中,妇女的劳动具有一种很大的商业价值(这无疑有助于说明妇女相当了解她们的价值),妇女想把时间首先花在照顾孩子和传承文化资本上,并倾向于对性别之间的传统劳动分工提出质疑;追求做菜时间和劳力的节省与追求食物的清淡和低热量相结合,这样就倾向于选择烤肉和生吃(“配制色拉”)还有速冻食品和菜肴,酸奶和甜乳制品,许多这样的选择与大众菜肴截然相反。最典型的大众菜肴是蔬菜牛肉浓汤,由便宜的肉和肉糜——与烧烤相反——做成,这种低级的烹调方式特别需要时间。这种烹饪形式——人

¹⁹ 对外国的如意大利的、中国的、日本的以及在较低的程度上的俄国的餐馆的偏好,随着社会等级的提高而增加(唯有西班牙餐馆除外,无疑因为西班牙餐馆与一种更大众化的旅游形式相关,随着社会等级的降低,西班牙餐馆越来越成为选择对象,而中等管理者更多地选择北非餐馆)。(S. C., XXXIV)

们说一个全身心投入家务的女人是“汤婆”——象征着妇女条件和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的一种状况，并不是偶然的，如同晚餐前穿的拖鞋象征着属于男人的补充角色一样。²⁰

工人在烹调上花最多的时间和精力：被提问的人中的69%声称喜欢做大菜，相应地，中等管理者中的59%，小商人中的52%，高级管理者、自由职业者和工业家中的51%声称喜欢做大菜(S. C. XXXIV bis)。这是在劳动的性别分工方面的这些差别的另一个间接指标：教授和高级管理者似乎优先考虑洗碗机和洗衣机，而自由职业者和工业家或大商人似乎优先考虑电视机和汽车(S. C. III)。最后，他们应邀在包括七个菜的菜单上选择两个喜欢的菜，农业劳动者和工人，如同其他所有等级一样，将羊腿放在首位，他们此外更倾向于(45%和34%——相对于职员中的28%，高级管理者中的20%和小企业主中的19%)列举蔬菜牛肉浓汤(大概唯有农业劳动者选择小香肠——占14%，相对于工人、职员和中等管理者的4%，高级管理者的3%，以及小企业主的0%)。工人和小企业主同样选中了白葡萄酒焖仔鸡(50%和48%)，他们想要追求别致的普通小餐馆的典型菜，因此这道菜无疑与“外出”到饭馆吃饭的想法有关(相对于职员中的42%，高级管理者

²⁰ 工商企业的小企业主，即传统上被艺术家唾弃的“小市民”的化身，最经常说(60%)每天在晚餐前穿上拖鞋，而自由职业者和高级管理者最倾向于摒弃这个小市民的象征(35%的人说从来不穿)。至于女工和农妇，她们的拖鞋消费量特别大而突出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了与身体、化妆和美容的关系，而居家和家庭生活导致这种关系(比如，我们知道，手工业者或商人和工人的妻子最倾向于说她们在挑选衣服时要考虑到取悦他们的丈夫)。

中的 39% 和农业劳动者中的 37%)。管理者、自由职业者和企业主只是通过选择对他们来说特别有限的菜单列出的某个菜,才以相对明显的方式有所区别,这个菜与小资产阶级的常规菜普罗旺斯鱼汤相比相对“清淡”而且象征意义明显(占 31%,相对于职员中的 22%,小企业主中的 17%,工人中的 10%,农业劳动者中的 7%),而且在这个菜单中,鱼与肉(尤其是腌酸菜烧猪肉或什锦砂锅猪肉)之间的对立明显地带有地方主义的和旅游的色彩(S. C. XXXIV)。自然而然地,由于所使用的分类不明确,我们在这里不能把握阶层之间的次要对立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单独考虑教授,如果列出的菜单在社会学上相关的方面能够更多样化,所观察到的倾向无疑会更加明显。

在食物方面的趣味也依靠每个阶级形成的关于身体,关于食物对身体也就是对身体的力量、健康和美丽的作用的概念,依靠这个阶级用来评价这类作用的范畴,于是,可能被一个阶级牢记的某些作用,会被另一个阶级忽视,而且不同的阶级可能在不同作用之间建立迥然不同的等级。因此,关注(男性)体力超过体形的民众阶级,倾向于寻找既便宜又有营养的食品,而自由职业者更喜欢美味的、有益健康的、清淡的和不增肥的食品。作为变成自然的文化,也就是被归并的文化,物化的等级,趣味有助于形成身体的等级:作为支配所有归并形式的被归并的分类原则,趣味选择和改变了身体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摄入、消化、吸收的一切。于是身体是等级趣味的最不容置疑的客观化,身体以多种方式体现了等级趣味。首先表现在身体表面上最自然的东西上,也就是在身材(身量、身高、体重等)和明显的外形(浑圆的或方正的、僵硬的或灵活的、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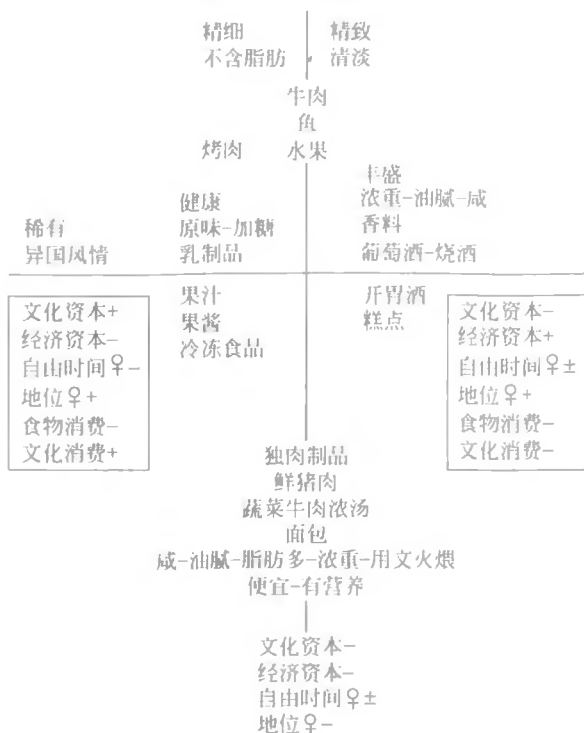


图9 食物消费的空间

挺的或弯曲的)上,而与身体的整个关系,也就是一种对待、照顾、维持和保养身体的方法,以多种方式表现在身材和外形上,这种方法体现了习性的最深层的配置。其实,身体属性在阶级之间的分配就是通过食物消费方面的偏好确定的,当然也是通过在劳动中和娱乐中的身体用途确定的,食物消费方面的偏好(如同在其他方面的口音、步态等)能够超越它们产生的社会条件永存下来,²¹而

²¹ 这就是为什么身体不仅指明目前的位置也指明轨迹。

娱乐中的身体用途与劳动中的身体用途是相互关联的。

适宜的食物社会定义得以确立的中介，不只是被感知的身体的受称赞的外形尤其是肥胖或苗条的几乎有意识的表象。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整个身体图示，尤其是通过吃的行为维护身体的方法，成为选择某些食物的根源。因此，比如，鱼在民众阶级中是对男人来说不大适宜的一种食物，这不仅是因为这涉及一种清淡的、不顶饱的食物——实际上，人们出于保健的理由，只为病人和孩子准备这种食物——而且因为，鱼和水果（香蕉除外）都属于这类棘手的东西，男人的手无法操纵这些东西，男人在这些东西面前就像是一个孩子（是由处于母亲角色的女人，如同她在所有类似状况中所做的那样，来负责对付盘子里的鱼或削梨皮）；而且尤其因为，吃鱼所要求的方式完全与男人固有的吃法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吃鱼要谨慎，小口地吃，轻轻地咀嚼，用嘴的前部，在牙尖上（剔除鱼刺）。整个男性身份——人们称为男子气概的东西——被纳入以下两种吃法之中，要么从嘴边并且小块吃，像女人那样，因为女人适宜细嚼慢咽；要么张大嘴巴，贪婪地大口吃，像男人适宜的那样，就好像男性身份被纳入两种完全同源的谈话方式一样：要么用嘴的前部，要么用整张嘴，尤其是嘴的底部和喉咙（按照已经在别处指出的嘴、口味高、撇嘴或嘴唇，与嘴脸——贪吃、大喊大叫、谩骂还有“大口吞咽”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会出现在所有的身体用途中，尤其是表面上最微不足道的身体用途中，因此身体用途预先倾向于用作备忘录，群体的最深层价值、它的最基本的“信仰”被保存在这种备忘录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以下这种联系：纤维素棉手帕之于机织大手帕，相当于有节制的笑之于放声大笑；用纤维素

棉手帕要轻轻地擤鼻涕,不要太用力,要求几乎可以说是从鼻子底部一点一点地擤鼻涕,而用机织大手帕则猛地使劲擤,发出很大声音,用力眯缝着眼睛,全部手指捏着鼻子;有节制的笑抑制明显的笑容和响亮的声音,而放声大笑则全身抖动、皱起鼻子、张大嘴巴、大声喘气(“我笑弯了腰”),好像为了尽量夸大一种无法忍受的体验,首先是因为这种体验应该与人分享,应该明确地让别人知道。男性身体,作为一种强大力量,有异乎寻常的需要,它强劲、粗暴,它的实践哲学,显示在支配身体尤其是面对食物时的整个男性化的方法中。这种实践哲学是性别之间的食物区分的根源,这种区分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话语中都被两性承认。男人应该按照他们的形象喝得和吃得更多,而且要吃更刺激的食品。因此喝开胃酒时,要给男人上两次酒(如逢节日,则更多)并且要喝满杯,用的是大杯。(力加^①或保乐的成功无疑由于它是一种刺激而又量大的饮料——而不是“一丁点儿”),他们把餐前零食(咸饼干、花生米等)留给孩子和女人,女人喝一小杯(“应该保持庄重”)她们自己制作的(她们交换制作秘诀的)一种开胃酒。同样地,在第一道菜中,猪肉制品多是给男人的,如同接下来的奶酪一样,奶酪味道越浓烈,就越是这样;而生食的菜则是给女人的,比如凉拌生菜;男人或女人再吃或分吃剩下的菜。肉类,乃特别有营养的食物,味道浓重而且增长力量、活力、血气和健康,是男人的菜,他们吃两次,而女人则吃一小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严格来说克制自己不吃;

^① 力加和保乐是世界第二大葡萄酒和烈酒群体保乐—力加(Pernod Ricard)生产的两种茴香酒。——译者

她们确实不想要别人首先是男人可能缺的东西,因为肉类从根本上是属于男人的,而且她们从不被当作克己的做法中获得某种威信;再说,她们不喜欢男人的食物,据说女人吃这些食物太多是有害的(比如吃肉太多“让人恐惧”,产生一种不正常的力量、长粉刺等),这些食物甚至可能让人倒胃口。

212



身体的应用



纯粹外表的差别由姿态的差别即表现身体、行为、举止的方式上的差别而增大了，而且在象征意义上加强了，与社会世界的整个关系都表现在这种方式中。对此还要加上所有有意识地对身体的可变特征进行的改造，尤其是通过一系列美容标志（发式、化妆、胡须、小胡子、颊髯等）或衣服标志进行的改造，这些标志依靠有可能被投入到当中的经济和文化财产，也成为社会标志，这些社会标志从它们在区分的符号系统中的位置获得它们的意义和它们的价值，它们构成了这个符号系统，而这个符号系统本身与社会位置系统是同源的。身体乃符号的持有者，也是符号的生产者，这些符号由与身体的关系记录在它们可被感知的实质里：因此对男性气概的赞颂，可能通过说话时嘴巴不动和吐字徐缓的方式，支配着民众阶级的整个发音。作为社会产物，“人格”的唯一可感的表现，身体被公认为内在本质的最自然的表现：不存在固有的“身体”符号，而且口红的颜色和厚度或一种面部表情的特征，就像脸型或口型，立刻被读作一种具有社会特点的“精神”面貌的标志，也就是“平庸

的”或“高雅的”、天生的“自然的”或天生的“有教养”的精神状态的标志。构成被认知的身体的符号,乃一种特有的文化制造的这些产物,其作用是从文化程度也就是从与自然的距离方面对群体进行区分,尽管这些符号似乎是以本性为依据的。人们称为举止的东西,也就是说支配身体和表现身体的合法方式,自发地被视为精神风度的一个标志,并把让身体呈现“本来”面目的做法当成放任自流、应受到谴责的贪图省事。²¹⁵

于是出现了一个身体的等级空间,这个空间除了生物学的偶然之外,倾向于按照它自身的特定逻辑再生产社会空间的结构。因此,身体属性通过社会分类系统被人领会并不是偶然的,社会分类系统与不同的身体属性在社会阶级之间的分布并非无关:通用的分类倾向于将统治者身上最常见的(也就是最稀有的)属性与被统治者身上最常见的属性分成等级,使它们互相对立。²² 每个行动者为了建立他关于自己身体的主观表象和身体素养,应该从一开始就考虑身体本身的社会表象,身体的社会表象就这样通过一个社会分类系统的应用而获得,这个分类系统的原则正是这个系统适用的社会产物的原则。因此,身体很可能得到与其主人在其他基本属性的分布结构中的位置严格地相称的一种价值,除非生物继承性的逻辑相对于社会继承性的逻辑的自主性,有时给予在其他所有方面最贫困的人最稀有的身体属性,比如美貌(人们有时说这种美貌是致命的,因为它威胁了等级),以及相反,除非生物学

²² 也就是说用在被认知的身体上的分类(胖/瘦、强/弱、大/小等),一向既是任意的(女性美的观念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有可能或与胖或与瘦相关)又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是以一个确定的社会秩序的特定性为依据的。

的意外有时剥夺了“大人物”的地位应有的身体特点如高大的身材或美貌。

毫不做作或毫无顾忌？

因此，这一点很清楚，即食物方面的趣味不能脱离与世界、与他人、与身体本身的关系这些其他维度而完全单独考虑，每个阶级特有的实践哲学也都在这些维度中形成。为了让人信服，应该对民众和资产阶级对待食物、摆放食物、呈现食物、供给食物的方式进行一种系统的比较，这种比较比相关食品本身的性质更能说明问题（尤其当人们如同大部分消费调查那样忽视了质量差别的时候）。这种分析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只有与其他生活风格相比较，才能真正思考每种生活风格，其他生活风格是这种生活风格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否定。这样，行为举止的意义，就依据人们从这个或那个观点领会这种生活风格，依据人们将民众的或资产阶级的意义注入为了命名这些行为举止（比如“风度”）而必须使用的常用词（比如“风度”）之解读，发生从赞同到反对的逆转。

我们可以想象一些误会，这些误会可能源于所有问卷调查中对这种机制的忽略，这些问卷调查总是词语的交换。更不必说，当人们力求收集对词语的评论或引起对词语的反应时（如同在“伦理学测试”中，这种测试旨在向所有被调查者提供相同的形容词名单，以描述一个朋友、一件衣服或一种理想的室内装饰的特点）：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记录的答案，实际上是相对于若干刺激得到确定的，这些刺激超越它们名义上的同一性（被提出的词语的同一性），根据人们想要衡量其效力

的变化原则本身(首先是社会阶级),在它们的被认知的现实上,因而在它们的实践效用上发生变化(这就导致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完全缺乏意义的汇合)。这些群体,连同使它们与其他群体对立的一切,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常用词语中,它们的社会身份也就是它们的区别在这些常用词语中得到了表达。尽管诸如实用、简洁、干净、功能性、有趣、细腻、私密、高雅这些普通词语表面上是中性的,其本身却具有分歧,这是因为要么不同的阶级赋予这些词语不同的意义,要么不同的阶级赋予这些词语以相同的意义,但对被命名的事物却赋予相反的价值:比如仔细(soigné)这个词,由于它频频被一些人拿来说明他们对出色的劳动、对精细的爱好或他们对外表的小心翼翼的关注,乃至这个词无疑让那些摒弃它的人联想起他们在小资产阶级的生活风格中看到的有点狭隘或平庸的严格;或者还有有趣(drôle)这个词,这个词的社会内涵与多半带有资产阶级的或冒充高雅的社会标记的一种发音、一种口头表达有关,因此与被表达的价值产生了矛盾,欺骗了那些在民众的对应词如逗乐(bidonnant)、滑稽(marrant)或好笑(rigolo)中认出自己的人;或者还有朴素(sobre)这个词,这个词用在一件衣服或一种室内装饰上,按照它是用来表达一个小手艺人的谨慎的和防卫的美学策略、教授的唯美主义苦行还是传统的大资产阶级在奢华中的朴素趣味,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意义。我们看到,任何为了得出所有阶级共有的全部伦理的企图都事先受到谴责,除非如一切“普遍的”道德或宗教所做的那样,有系统地利用这一点,即语言既是不同阶级共有的,又

能够在特定的甚至对立的用途中获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义，而用途是从意义中得出的。

我们可以说民众阶级狼吞虎咽，如同说他们直言不讳一样。饭菜以充足（这不排除约束和限制）尤其是随便为标志：他们做菜“灵活”、“充足”，比如（几乎总是与蔬菜有关的）汤羹或调味汁、面条或土豆，这些菜用大汤勺或匙盛，避免过分计量和计算——与一切被切开的东西如烤肉对立。²³ 这种充裕的印象，在特殊的场合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对男人有效，他们的盘子被盛满两次（标志着从男孩进入成年身份的特权），在一般场合下，这种印象的反面往往是妇女对自己强加的限制——两人吃一份或者吃前一天晚上的剩饭——，少女进入成年身份表现在她们开始节食这个事实上。吃饭和大吃（还有大喝）构成了男人的身份：人们援引“不应该客气”的原则，尤其坚持要他们那样，而拒绝则带有某种可疑的东西；星期天，当总是站着的妇女忙着上菜和收拾桌子及洗碗时，男人还是坐着，继续吃喝。由于这些（与性别或年龄相关的）社会身份之间如此明显的差别，并不会引起任何实践上的区别（比如资产阶级对餐厅和配餐室的划分，仆人以及有时孩子在配餐室吃饭），人们倾向于忽略对严格的上菜次序的考虑：一切都大致可以同时这样摆上桌子（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来回跑），以至妇女们可能已经在和孩子们吃甜点，而孩子们把盘子拿到电视机前时，

²³ 我们同样可以将碗与杯对立，人们用碗时一下子盛很多，双手捧碗，随便喝，而用杯子时则有点是为了接下来再添加——“您还加点咖啡吗？”——人们两个手指夹住杯子，用后嘴唇喝。（区分和“回归”的游戏使得“木碗”成为反文化的符号之一。）

男人们还在吃主菜,或晚来的“男孩”在大口喝汤。这种可能被视为混乱或放纵的随意,是合乎时宜的。首先,它保证省力,而且这种省力是明确寻求的:这是由于男人参与家务劳动不被许可,而且首先不被女人许可,因为她们看到男人处于被他们的定义排斥的一个角色时会感到耻辱,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消耗”降到最低。因此,在咖啡馆,人们可能只要一个咖啡勺,用它搅拌之后再传给邻座的人,这样邻座的人就可以用它“搅拌他的糖”。但人们同意这样省力只是因为他们自感并想要在自己人之间,在自己家里,同家人在一起,这恰恰避免了装腔作势:比如,为了节省甜点盘,人们可以一边把糕点盒切割成临时的盘子——一边开玩笑,以此表明这意味着人们“能够允许自己冒昧地进行的”一种违反,而且被邀请吃甜点的邻人也会接受纸板上的蛋糕(给他盘子等于排斥他),作为主人与他亲密相处的一种证明。同样,在各道菜之间不换盘子,人们用面包擦拭干净的汤盘,能够这样一直用到进餐 218 完毕。家里的女主人不会忘了提议“换盘子”,一只手已经推开了她的座椅,另一只手已经伸向了她的邻座的盘子,但所有人都叫了起来(“在肚子里全都混在一起”),如果她坚持,她就可能显得是在炫耀她的餐具(如果有人送了她餐具,她可以这样做)或把她的客人当外人,人们有时故意这样对待不速之客或因从不“回请”而闻名的吃白食的人,主人不顾他们的抗议,通过换盘子与他们拉开距离,他们开玩笑时不笑,或训斥孩子的举止(“不,随他们去吧,他们肯定能……”客人会说;“他们到懂规矩的时候了”,父母回答)。人们获得的所有这些“许可”的共同根源无疑

是人们不再另外施加有意识的控制、限制和规定之感——而且这是在食物即首要的需要和回报方面——，再加上这是在家庭生活内部，家庭生活乃唯一的自由庇护所，尽管人们来自四面八方并在所有其余时间服从必然。

资产阶级以注重按照形式吃饭与民众阶级的“大吃大喝”对立。形式首先是节奏，意味着等待、拖延、节制；人们好像从不着急用餐，等到最后一个上菜的人开始吃之后，才悄悄地用餐和加餐。人们按顺序吃饭，而且任何由顺序隔开的菜肴的共存，如烤肉和鱼，奶酪和甜点，都是不予考虑的：比如，在上甜点之前，人们会撤去餐桌上剩余的一切东西，乃至盐瓶，而且将面包屑清理干净。这种将规则的严格引入日常生活的方式（每天早晨刮胡子和穿礼服，不仅仅为了“出门”），这种除掉家中与外面、日常生活与脱离日常生活（对于民众阶级而言，脱离日常生活与穿节日服装的做法相关）之间的分隔的方式，不只通过这些外人即仆人和客人出现在家庭的和熟悉的世界中这一点得到解释。这种方式是无法放弃的一种秩序的、举止的和节制的习性的表达。而且上述解释愈发不足，特别是因为与食物——典型的原始需要和快感——的关系不过是资产阶级与社会世界的关系的一个维度：立刻与延迟、容易与艰难、实质或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对立，以非常显著的方式表现在这种关系中，而这些对立是一切关于实践的唯一美观和一切美学的根源。通过强加给急迫的食欲的所有形式和所有形式主义，被要求的——和被灌输的——东西，不仅仅是通过形式化来规范食物消费的一种配置，而形式化也是一种温和的、不直接的、看不见的审

查(与对节食的粗暴规定完全相反),并且与一种生活艺术密不可分,按照形式吃饭这种做法是向主人和女主人致意的一种方式,人们通过尊重上菜的严格次序尊重他们的照顾和劳动。这也是与动物本性、与原始需要、与无节制地沉溺在原始需要之中的庸俗的整个关系;这是否定本来平常的消费的原始意义和功能的一种方式,将吃饭变成一种社会仪式,一种对伦理举止和美学雅致的确认。呈现食物和消费食物的方式,如上菜的次序和按照上菜顺序严格区分并为了悦目而布置的餐具的摆放,既要像艺术品那样在形状和颜色搭配上,又要在独有的可消费物质上予以考虑的菜式本身的呈现,支配上菜和吃菜以及使用不同用具的仪表、举止和方式的礼仪,服从非常严格的却总是委婉的等级化原则的客人的座次排列,对吃的行为(如声响)和快乐(如迫不及待)的所有身体表现施加的审查,质量胜过数量的消费物本身的精细(酒和菜都是如此),所有这些风格化的方法都倾向于将物质的重点和功能转移到形式和方式上,并由此否定甚或否认消费行为和消费物的粗俗的物质现实,或者,同样地,否认某些人低下的物质主义粗俗,这些人沉溺在食物消费的即刻满足即单纯感知(aisthesis)的典型形式之中。²⁴

²⁴ 形式化,这也是否认社会世界和社会关系的真实性的一种方式。正如民众阶级在食物方面的“功能主义”被拒绝,导致民众阶级如是接受社会交换(比如对某个做了好事或提供帮助的人,他们会说:“她很清楚我会还她的”,尽管这个人的做法丝毫没有冒犯或提示之意)的现实主义观念也同样是被拒绝的。人们不愿意承认渗透于社会关系中的各种算计,在收到或准备的礼物中只愿意看到友谊、尊敬、爱情的“纯粹”证明与慷慨和道德价值的同样“纯粹”的表现。

表 19 待客方式的变化(S. C., XLIII)

	工人	职员 中等管理者	管理者 工业家 自由职业者
临时邀请发给			
· 至亲	51.7	34.7	32.5
· 好友	20.9	35.9	33.2
· 孩子的朋友	2.8	3.4	8.3
· 职业关系	1.9	3.1	4.2
提前邀请发给			
· 至亲	41.2	33.1	30.2
· 职业关系	2.6	8.4	18.9
比较或相当经常请人			
· 喝咖啡	49.2	48.4	38.2
· 吃甜点	23.7	24.7	15.1
· 吃晚饭	51.3	67.8	70.2
发出临时邀请			
· 喝开胃酒	52.8	46.3	39.2
· 吃饭	23.9	31.9	40.0
在临时邀请中最重要的			
· 吃好	10.1	5.9	9.4
· 吃饱	33.6	28.4	26.0
· 客人不厌烦	33.4	46.6	47.9
喜欢给客人提供			
· 自助餐或一道菜	19.4	25.3	26.1
· 真正的菜单	77.2	71.6	70.9
请客时(一般和经常)使用			
· 银餐具	27.8	40.7	61.5
· 水晶餐具	29.3	49.7	57.3
· 陶瓷餐具	39.6	46.3	60.0
· 普通玻璃餐具	84.8	56.5	55.4
· 陶质餐具	60.6	55.9	54.8
希望客人			
· 优雅	10.8	15.9	30.6
· 穿着随便	79.7	70.9	58.5
· 被安排座位	29.7	31.3	46.0
· 自己选择座位	65.7	63.1	46.8

续表

	工人	职员 中等管理者	管理者 工业家 自由职业者
喜欢			
· 把夫妻分开	22.8	35.0	50.6
· 不把他们分开	26.0	38.4	26.0
同意孩子(少年、儿童)			
· 一起吃饭	6.5	7.5	8.8
· 待到晚餐结束	10.9	11.9	12.9
· 参与谈话	12.0	12.2	12.1
收到客人的			
· 鲜花	41.8	56.3	68.3
· 甜点	24.6	16.6	9.8
· 酒	18.6	16.9	14.0
有客人来时喜欢			
· 背景音乐	48.1	56.6	57.7
· 看电视	14.4	4.7	4.2
· 饭后唱歌	64.9	55.3	45.3
· 组织游戏	66.4	59.7	50.9

这幅图可这样解读：工人中的 51.7% 向他们的至亲，20.9% 向好友等，发出临时邀请；职员和中等管理者中的 34.7% 向至亲，35.9% 向好友等发出临时邀请。每个问题的百分比总和可能低于或高于 100；被调查者实际上（针对每个问题）可以接受多个被提议的选择，或相反，一个也不接受。我们用粗体标出了每一行内最强烈的倾向。

我们在这幅综合表中集中了一项关于待客艺术的异常丰富的调查的主要结果(S. C. XLIII)，这项调查使得有可能证实和明确这些分析。我们在这项调查中首先看到，在工人阶级中，临时的或安排的互相邀请的空间与家庭和熟人的空间重合，他们可以把熟人当成“好像是家人”并且与熟人在一起“感到自在”，而在职业关系意义上，在职场中有用的狭义上的关系，出现在中产阶级的层次上并且尤其是统治阶级的事情。

221 这种随意性的证明，来自这个事实，即他们尤其请人喝咖啡、吃甜点或喝开胃酒（而在社会空间的另一极，则多是请人喝茶、吃午饭或晚饭或去饭馆）。如果他们愿意将临时的邀请限制在开胃酒或咖啡上，这是因为他们不请“一半”，并把“做事得当”视为有关面子的事，所以不考虑注定能够省力的（女性周刊教授的）“实用解决方法”如自助餐或一道菜。²⁵ 如果我们分析上菜的组成，这种对于伪装的拒绝（他们首先要客人吃饱并吃好，其次让客人感到不烦闷）表现得更加明显。工人想表明，一顿饭包含着被认为组成一顿真正的饭的所有因素，从开胃酒到甜点（而在其他阶级中，人们往往愿意“简化”，省去第一道菜、沙拉或甜点）。²⁶ 赋予物质相对于形式的优先权使得若有“简化”，这也只能在形式、举止的范畴内，举止被视为非本质的、纯粹象征性的。餐桌的服务平常无关紧要，如果饭菜异乎寻常：他们喜欢这样声明而且许多习惯性的考虑都针对这个主题。来客不按形式落座也不讲究穿着，这无关紧要。孩子加入丝毫不墨守成规的就餐也无关紧要——只要他们不要干扰谈话，谈话是成年人的事情。没有对形式的崇拜，人们可以看电视，吃完饭之后可以唱歌甚或组织游戏。还是在这里，功能得到了明确的承认——“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玩

²⁵ 在整个分析中，应该考虑一系列一致的倾向，而不是差距的重要性，差距无论如何都被这个事实缩小了，即统治阶级分成了各种层次，他们的趣味尤其是在食物方面的趣味是在相反方向上变化的。

²⁶ 鱼是例外的，随着社会等级升高，鱼越来越常见了。对于鲷鱼和鲑鱼即与奢侈的观念相关的鱼类而言，差距特别明显，而对于鱈鱼和淡水鱼而言，差距则相对较小。

儿”——，人们努力实现这个功能，利用所有可利用的手段，酒、游戏、笑话等，来制造节日。物质之于形式的优先，即对包含在形式化这种做法中的否认的拒绝，还表现在收到的礼物的内容上：鲜花，由于处在无偿、艺术、为艺术而艺术一边（人们喜欢拿“它没法吃”这个事实开玩笑），由于地上的粮食如酒或甜点这类礼物的缘故而被弃置，这类礼物“总是让人愉悦”，人们能够以对饭菜的花费的一种现实主义观念和帮助减少花费之意愿的名义，允许自己随意地送这类礼物，而这种意愿被视为自然而然的并被一致接受。

我们可以从形式与物质之间的对立出发，再次构造对待食物和吃饭行为的两种对立方式之间的所有对立：在一种情况下，食物被要求体现其作为营养物质的事实，这种营养物质与身体有关并产生力量（这就倾向于优先考虑难消化的、油腻的和浓烈的食物，这类食物的典型是油腻的和腌制的猪肉，与脂肪少的、清淡的和无味的鱼形成对照）；在另一种情况下，外形（比如身体的外形）和形式被赋予的优先权，导致将对力量的寻求和物质的考虑打发到次要地位，并承认为自身规定一种规则的这种有选择的苦行中的真正自由。我们还要说明这一点，即两种对立的世界观，两个世界，人类卓越的两种表象被封闭在这种模式中：物质——或材料——是实在的，它的首要意义是有营养的但也是真实的，与所有外表，所有（优美的）动作，总之一切如人们所说的纯粹象征的东西对立；这是以真实反对伪造、仿制、欺骗；这是配备大理石餐桌和纸桌布的其貌不扬的小酒馆，但在这里钱花得值而且没人像在过分客气的饭馆里那样拿空话敷衍你；这是以存在反对表现，以自然（“他自

自然然”)和本性、简单(随便、不客气、不拘礼节)反对窘迫、装模作样、装腔作势、彬彬有礼和客客气气,后者总是被怀疑不过是实质也就是真诚、感情、被感受到的和通过行为体现的东西的替代品;这是直言不讳和内心的礼节(它们造就了真正的“雅士”,他直爽、倔强、诚实、正直、坦率、表里如一),与一切纯粹形式的东西,与人们只是为了形式(“嘴上说说”)而做的一切、与客套话(“太客气则不诚实”)对立;这是以随意和对繁文缛节的拒绝,与对形式的尊重对立,形式自发地被视为区分和权力的工具。关于这些伦理,这些世界观,没有中立的观点:一些人从中看到毫无顾忌、放任自流,而另一些人则从中看到不拘礼节、不装模作样;对一些人而言,亲密是最绝对的认可形式,是抛开一切距离,是满怀信任的随便,是互相平等的关系,而对另一些刻意不与人亲近的人而言,则是过于随便的不得体。

民众的现实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审美否认(dénégation esthétique)差不多完全相反,民众的现实主义导致把实践还原为实践功能的真理,导致人们做他们所做的,成为他们所是的(“我,我就是这样”),“不讲客套”(“就是这样”);实践的唯物主义倾向于通过暴力或粗俗消除感情的表达或避免感情的波动,而审美否认通过一种(比如在淫秽与色情之间的对立中可见的)本质的虚伪,通过形式被赋予的优先权,掩盖了人们对功能的关注并导致人们做他们所做的,好像他们过去没有这么做一样。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但是民众阶级将食物归于物质和存在一边,而资产阶级拒绝家里与外面、在家中与对他人、日常与超乎日常之间的区分,已经

引入形式、表现的范畴,食物本身之于服装,相当于从里到外、从隐秘到外在、从家庭到公众场合、从存在到表现的关系。食物和服装 223
 被给予的分量在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中是颠倒的,民众阶级承认存在的优先,而在中产阶级中出现了对外表的考虑,这种颠倒是对整个世界观的一种颠覆的标志。民众阶级从服装中得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或不如说是功能主义的用途。民众阶级看重物质和功能胜过形式,可以说,他们想要钱花得值,因此选择某种“有用的”东西。他们无视资产阶级将仪表引入家庭空间的考虑,因为家庭空间乃自由自在的场所,(妇女)可以扎围裙和穿拖鞋,(男人)可以裸露上半身或穿紧身内衣,他们几乎不大强调看得见的和供人看的外衣与看不见的或隐秘的内衣之间的区别,而中产阶级则相反,他们开始考虑穿衣的和化妆的外表,至少在外面和工作中(妇女往往参加工作)。



224

因此,尽管可利用的数据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在(产品的统计学所能把握的层次上,比女人服装更明显的)男人服装的范畴内,重新发现了在烹饪方面看到的重要对立的对等物。在空间的第一个维度,分隔在这里仍旧体现在职员与工人之间,并尤其通过灰色长衫与蓝色工作服、日常便鞋与更放松的运动鞋、球鞋或篮球鞋之间的对立显示出来(更不要说便袍了,职员买便袍是工人的3.5倍)。所有男装的购买在数量和质量上非常明显的增加,可概括为套装即高级管理者的专利与蓝色工作服即农业劳动者和工人

的区分标志(蓝色工作服几乎被除了手工业者之外的其他群体所忽略)之间的对立上;或者还可概括为大衣与羊皮衬里上衣或夹克之间的对立上,男大衣总是比女大衣更罕见,但在高级管理者比在其他阶级中明显更加普遍,而羊皮衬里上衣或夹克尤其是由农民和工人穿着。在中间的中等管理者几乎不再穿工作服,但经常买套装。

所有职业等级(农业劳动者和农业雇佣工人除外)中,女人的消费都高于男人(在中等管理者、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或高收入的人身上差距特别明显),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购买量逐渐增加,在成衣、套装(昂贵物品)上的差距最大,而在裙子尤其是短裙和上装上的差距最小。我们看到,大衣与防雨服之间的对立跟男人大衣与夹克之间形成的对立相似,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大衣越来越常见,而防雨服则“有各种用途”。女衫或围裙的使用在民众阶级中是一种家庭主妇的功能装束,它随着社会等级的降低而大量增加(与便袍相反,便袍几乎不被农民和工人的世界所知)。

从年平均数量来看,工人买手帕、紧身内衣、游泳裤比其他阶级多,买袜子、短袜、翻领运动衫、毛线衫等与其他阶级大致一样多,但买睡衣(这种衣服,像便袍一样,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特征)和衬衫总要比其他阶级少。就妇女而言,内衣方面的阶级差别在价格上很明显,而在数量上则不大(而在连衫衬裙、长睡衣、袜子、紧身衣和手帕上正好相反)。相反,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而言,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外衣的购买在数量和价格上逐渐增加。

至于横向对立,则更难把握,这是因为关于家庭生活的条件的调查只考虑非常粗略的事项,尽管这种调查使我们有可能按照细微的等级研究变化。毕竟我们注意到,用于内衣方面的服装消费差不多微乎其微,这些消费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各层次之间则变化很大,而且通常从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方面在这一项上花钱最少的教授(每年1523法郎,相当于3.7%)、工业家和大商人(4.5%)、高级管理者和工程师(5.7%和6.1%)到自由职业者(4361法郎,相当于7.6%)递增。他们赋予这些自我表现的工具的这些价格上的差别(鞋的消费与衣服的消费发生同样的变化),在一些发生公式(formules génératrices)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发生公式在一种特定的生活风格中再现了一种条件和一个位置的特有需要和便利,决定了社交生活被赋予的价值和地位——社交生活在教授中似乎微不足道,在这方面他们与小资产阶级相似,而在自由职业者或未被统计学单独考虑的大商业资产阶级中则举足轻重,他们将社交生活当成积累社会资本的机会。但我们只有在拥有对被考察物的质量即料子(比如英国人将粗花呢与“乡绅”联系在一起)、颜色、剪裁的细致描述的情况下,才能充分说明每种生活风格的基本原则在这个特殊领域中体现的特定形式,因为这些描述使我们有可能把握被使用的分类和有意或无意寻求的表达意图(“年轻”或“传统”、“运动”或“华丽”等)。但一切都使我们有可能推断,穿着和装扮随着人们逐渐远离统治中心而越来越年轻,随着人们逐渐接近统治中

心而越来越严肃(也就是灰暗、朴素、传统)。²⁷一个人在社会意义上越年轻,也就是说在阶层空间中越接近被统治中心和/或职业空间的新领域(新职业),他与所有新式穿着就越契合(所谓男女通用的青春版服装、牛仔裤、短袖运动衫等),这些新式衣着通过对人们所谓的正装的限制和惯例的拒绝,为自己下定义。

不同阶级对自我表现的兴趣,对自我表现的关注,对自我表现带来的利益的意识和他们真正给予自我表现的时间、精力、节食、保养的投入,是与他们可能从自我表现中合理地期待的物质或象征利益的机会成比例的;而且更确切地,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一个劳动市场的存在与进入这个市场和这个市场的各个部门的机会,在这个劳动市场中,美容属性可能就在从业过程中或在职业关系中(按照职业的性质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价值,而在这个市场的各个部门中,美貌和举止最有助于增强职业价值。我们可以在一种差距中看到美容投资的倾向符合利益机会的第一个证明,这种差距从所有身体保养上,按照妇女们是否从事一种职业把她们分开(而且这种差距还应该按照工作性质和职业环境的性质变化)。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可以理解以下这一点,即民众阶级的妇女比所有其他妇女对美貌的“商业价值”更缺乏意识并且更不倾向于把时间、

²⁷ 在这方面,对男人而言是这样,但对女人而言,对立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一种形式,因为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在被统治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女人被贬得一文不值)和统治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女人可能因为被排除了经济责任,所以被打发到年轻角色和“艺术家”角色一边;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或贵族阶级妇女——和她们的沙龙——在艺术世界与商业世界之间不断扮演的中介角色)中体现出迥异的形式。

精力、节制、金钱投入到对身体的修饰中,因为她们很少有机会从事一种职业,尤其是那些严格要求符合在身体美容方面占支配地位的规则的²²⁸职业。而小资产阶级妇女尤其是以展示和表演为职业的新小资产阶级妇女则完全不同,这些职业往往规定一种举止,这种举止除了其他功能,还用来消除一种不正统趣味的所有痕迹;而且这些职业总是要求人们所说的“行为端庄和风度得体”意义上的举止,按照罗贝尔词典的说法,这种举止意味着“拒绝对平庸、随意让步”(专门培养空中小姐的学校让依据“自然”美被挑选出来的民众阶级少女经受走、坐、笑、微笑、说话、穿衣、化妆等方式的一种根本转变)。小资产阶级妇女在身体属性能够作为资本发挥作用的市场上,得到相当大的好处,从而对占统治地位的表象予以一种无条件的承认,却不具备一种足以获得最高利益的身体资本,至少在她们自己的眼中(而且可能客观上)如此,她们在这里仍旧处在最紧张的地点。实际上,对自身价值尤其是对自己身体的价值或自己语言的价值的确信带来的信心,与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位置(而且当然与轨迹)密切相关。因此,自认为容貌中等以下或自认为比实际年龄大的那部分妇女,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而骤然减少;同样,妇女们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位置越高,她们倾向于为身体的不同部位打的分数就越高,尽管对身体的要求无疑也同样增加。我们看到,小资产阶级妇女与民众阶级的妇女几乎对她们的身體怀着同样的不满(她们甚至是愿意改变容貌并声称对身体的不同部位不满意最多的人),与此同时,她们比后者更深刻地意识到美貌的用处,而且更经常承认占统治地位的完美身材的典型,她们在改善身体外表方面投入巨大——尤其是时间和节食——并对美容上

的唯意志论的所有形式(比如求助于整容手术)予以无条件的赞同。至于统治阶级的妇女,她们从她们的身体中获得双重的信心:她们像小资产阶级妇女一样相信美貌的价值和为了打扮而付出的努力的价值,因此把美学价值和道德价值结合在一起,她们自感无论是从身体内在的、自然的美来看,还是从化妆的艺术和她们称为举止的一切来看,都高高在上,这种举止是道德和美学密不可分的德行,它从否定方面把“自然”当作放任。因此美可能既是一种自然的恩惠,又是一种价值的获得,既是一种天生的、进而被合法化的天赋,又是再次被合法化的一种道德获取,这种获取既与平庸的放纵和随意又与丑陋对立。

226 表 20 身体、容貌和身体保养被赋予的价值的变化(S. C. XLIV)

	男主人的职业				被提问妇女的就业状况	
	农民	工人	职员 中等管理者	高级管理者 工业家 自由职业者	不工作	工作
标准尺寸超过 42 ^①	33.7	24.2	20.4	11.4	24.7	17.3
在容貌方面自认为 中等以下	40.2	36.0	33.2	24.2	34.2	31.0
认为比实际年龄大	13.0	14.0	10.1	7.6	13.6	9.8
被提问妇女给自己的 平均分数:						
· 头发	5.22	5.47	5.40	5.88	5.47	5.62
· 脸	5.36	5.53	5.51	5.67	5.54	5.58
· 眼睛	6.18	6.44	6.30	6.48	6.35	6.41
· 皮肤	5.88	5.63	5.64	5.75	5.63	5.74
· 牙齿	5.24	5.45	5.40	5.74	5.40	5.59
· 身体	5.35	5.78	5.75	5.91	5.76	5.83

① 女子身材适中的尺寸。——译者

续表

	男主人的职业				被提问妇女的就业状况	
	农民	工人	职员 中等管理者	高级管理者 工业家 自由职业者	不工作	工作
· 鼻子	5.94	5.48	5.56	5.65	5.41	5.74
· 手	5.88	5.99	6.10	5.82	5.78	6.17
经常或有时想要 改变容貌	45.7	60.8	68.2	64.4	60.1	64.6
美貌						
· 靠自己的保养	33.7	46.9	52.0	54.7	45.8	53.1
· 靠收入	15.2	18.8	9.2	8.9	16.7	10.3
容貌的保养增加成功 机会	75.0	68.8	72.9	74.5	70.1	72.1
在容貌上喜欢						
· 自然	69.6	69.8	62.8	57.6	68.8	61.6
· 精致	12.0	15.6	22.9	25.0	16.8	22.3
认为丈夫喜欢妻子						
· 自然	65.2	65.0	51.4	50.8	60.6	54.1
· 精致	6.5	8.1	15.1	16.1	10.6	12.3
认为最好能够						
· 漂亮	52.2	58.5	59.2	61.9	59.5	58.7
· 富有	39.1	35.4	33.5	27.5	32.7	33.9
认为最好能够						
· 漂亮	9.8	14.0	17.5	17.4	15.7	14.4
· 运气好	83.7	83.3	76.8	75.8	80.2	80.3
认为用化妆掩盖年龄 是正常的	53.3	51.9	62.3	67.8	52.1	63.6
为了减肥						
· 节食	23.9	19.8	28.8	23.3	23.9	23.1
· 运动、练体操	4.3	8.3	14.0	16.9	10.6	11.8
· 吃药治疗	2.2	4.6	3.6	3.0	3.8	3.6
· 什么也不做	69.6	71.7	60.6	66.1	68.3	66.4
赞成为了变年轻做整 容手术	50.0	50.0	56.4	52.0	51.3	53.4

续表

	男主人的职业				被提问妇女的就业状况	
	农民	工人	职员 中等管理者	高级管理者 工业家 自由职业者	不工作	工作
每天至少洗澡或淋浴一次	9.8	16.9	36.6	43.2	23.2	32.0
每天都化妆	12.0	29.6	45.0	54.7	30.1	44.8
从不或很少化妆	48.9	35.6	21.2	17.3	35.1	22.9
梳洗和美容时间超过半小时	12.3	45.6	48.9	45.3	42.1	48.2
为精神状态化妆	4.3	15.9	25.9	27.8	21.0	22.1
至少半个月理发一次	6.5	8.1	16.9	20.8	9.8	13.5
晚上洗脸						
· 用香皂	34.8	35.4	20.1	15.7	28.1	25.7
· 用卸妆液	47.8	59.4	86.0	91.4	67.5	78.8

因此,对“被异化的”身体的典型体验即窘迫,和相反的体验即自如,显然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成员呈现出不均等的可能性,他们对合法外表和姿态的相同表象予以相同的认可,但他们为实现这种表象所需要的装备则是不均等的:身体能力越是与认可相称,事实上以持续的优雅和神奇的方式体验自己身体的机会就越多;或相反,理想的身体与实际的身体、梦想的身体与其他人的反应导致的人们有时说的镜像自我(looking-glass self)越不相符,在不安、困窘、害羞中体验身体的可能性越大(同样的法则也适用于语言)。

最难得的身体属性(苗条、美丽等)在阶级之间并不是被随意分配的(比如衣服的一般尺寸大于标准尺寸的妇女的人数随着社会等级的降低显著增加),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使我

们无法把行动者与其身体的社会表象之间形成的关系,当作构成了“为他人的身体”的“一般异化”,当作发生在一切身体上的“异化”,而本质分析把行动者的身体说成“异化的身体”,一般身体,当这个身体被感知并被命名,因而被他人的目光和话语客观化时,异化就发生在这个身体上(cf. J. P. Sartre, 229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Gallimard, 1943, pp. 404-427)。现象学家所说的“为他人的身体”是一种双重的社会产物:这个身体的区分属性得自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而且这种社会目光不是像萨特的目光那样的一种普遍的和抽象的客观化权力,而是一种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总是从一个事实中获得它的一部分有效性,这个事实即这种社会权力总是在它适用的那个人身上获得他对自己用于社会权力的认识和评价范畴的认可。

尽管这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专利,但小资产阶级对社会世界的体验首先是羞怯,即那个对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语言感到不安的人的窘迫,这个人并没有与它们结成一体,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从外面以他人的眼光观察它们、监督自己、纠正自己、完善自己,而且这个人为了重新占有一个为他人的——被异化的——存在而付出绝望的努力,由此他给占有以可乘之机,既通过多余校正又通过笨拙暴露了他自己:羞怯不由自主地占据被客观化的身体,身体被禁闭在集体认识和陈述提供的命运中(让我们想想外号和绰号),羞怯由一个服从于他人表象的身体表露出来,哪怕是在被动的和无意识的反应中(一个人感到自己脸红)。相反,自如,即这种对他人的客观化目光的漠不关心,遏制了他人的权力,它意味着一种信心,

这种信心来自人们确信能够对这种客观化予以客观化,将这种占有据为己有,能够规定对其身体的认识标准,总之能够拥有一切权力,然而,即便当这一切权力存在于身体中并在表面上借用身体的特定武器如仪表或魅力,但它在本质上仍然不能还原为身体。因此应该理解丹内迈耶(Dannemaier)和苏明(Thumin)的实验结果,在这个实验中,主体被要求凭记忆对熟人的身高进行估计,这些人在他们眼中拥有的权力或特权越大,他们就越倾向于高估这些人的身高。²⁸一切都倾向于让人认为,促使人们把“伟人”看得更高大的逻辑非常普遍地适用,而且无论何种等级内的权力都包含着一种诱惑的权力,将这种权力还原为一种有利害关系的奴性作用是天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政治抗议总是求助于漫画,这种对身体形象的歪曲用来除魅并嘲笑权力的强制作用的一种原则。

230 魅力和超凡魅力实际上指的是属于某些人的权力,这些人有权将他们自身的表象规定为他们自己的身体和存在的客观的和集体的表象,有权让他人,如同在爱或信仰中,放弃其客观化的一般权力,从而把这种权力委托给一个可能会是爱或信仰的对象的人,这个人因此变成了一个绝对的、无外在的(因为他本人就是他人)、具有充分的存在依据的、合法化的主体。超凡魅力首领能够把为了自身而存在当为了群体而存在,而不是像象征斗争中的被统治者那样把为了他人而存在当作是为了自身而存在;他如同人们所说的,“制造”了制造他的观点;他通过一种权力的象征把自己变

²⁸ W. D. Dannemaier and F. J. Thumin, Authority Status as Factor in Perceptual Distorsion of Siz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3, 1964, pp. 361-365.

成了攻不下的、无外在的、绝对的东西,这种象征构成了他的权力,因为这种象征允许他产生和规定他自身的客观化。

风格的可能性空间

因此,食物的、服装的、化妆的偏好空间,依照相同的基本结构也就是由资本的总量和结构决定的社会空间的基本结构组成。文化消费在生活风格空间中确定自身,为了全面构造这个空间,应该针对每个阶级和阶层,也就是每种资本配置,建立习性的发生公式,这个发生公式通过一种特定的生活风格传达了生活条件(相对)一致的阶级特有的必然和便利,并因此决定了习性的配置在每个重大的实践领域如何特定化,并实现每个场提供的这种或那种风格的可能性,如体育运动的可能性和音乐的可能性、饮食的可能性和装饰的可能性、政治的可能性和语言的可能性,如此连续下去。将这些同源的空间重叠,我们就会得到一种对风格空间的严格描述,这种描述有助于在两个方面说明每个区分特征的特点(戴鸭舌帽或弹钢琴),这个区分特征在这两个方面从客观上为自身下定义,也就是说它为自身下定义,一方面相对于构成所考察领域的全体特征,即它在当中取得区分价值的可能性系统(比如美容系统),另一方面相对于构成一种特殊生活风格(民众生活风格)的全体特征,它的社会意义在这种特殊生活风格中得到确定。因此, 231
比如体育运动和表演的空间在每个新来者面前表现为一系列精心准备的选择、客观上被确立的可能性,比如传统、规则、价值、装备、技术、象征,这一切从它们构成的系统中获得它们的意义并且每时

每刻都从历史中获得它们的一部分属性。

我们只有牢记两个过程的历史，才能理解类似橄榄球这样一种运动的社会暧昧性，至少在英国的“精英学校”中仍旧有人在从事橄榄球运动，然而橄榄球在法国变成了卢瓦尔河南部地区的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专利（与此同时保留了几个大学“据点”，如法兰西竞赛俱乐部或波尔多体育场大学俱乐部）。第一个过程在十九世纪英国的“精英学校”中，通过付出意义和功能的一种根本转变的代价，把民众游戏变成精英运动，精英运动与一种贵族的道德和世界观有关（公平竞赛、求胜意愿等），而且这种根本转变与影响民间舞蹈的根本转变非常相似，当民间舞蹈进入学院音乐的复杂形式时，经历了这样的转变；第二个过程的历史是无疑更不为人知的传播过程的历史，这个过程在不止一个特征上与通过密纹唱片实现的学院音乐或民间音乐的传播类似，它在第二个阶段，把精英运动变成群众运动，无论是表演还是从事这项运动。

当不同的实践被行动者领会时，结构属性就出现在这些实践中，行动者对实践在行动者之间的分布具有一种实践认识，甚或不如说对不同阶级从事实践的可能性具有一种实践认识，而行动者本身也是按等级分布的，所以结构属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滞后作用得益于这些分布的过去：诸如网球或马术，更不必说高尔夫运动的“贵族”形象，可能在从事这类运动的物质条件（相对）变化之后，持续存在，而滚球游戏从它的起源以及它与民众和南方的联系这双重的不幸中，得到了一种结构的意义，这种意义非常接近力

加或其他烈性酒和所有不仅便宜而且味道浓重并因为难消化、油腻和辛辣而被看作长力气的食物的意义。

但是,结构属性不是由人们对财产的认识被赋予财产的仅有属性。由于行动者是通过他们习性的认识和评价模式领会事物的,所以假定所有从事同一种运动(和其他任何实践)的人赋予他们的实践相同的意义甚或假定他们确切地说在从事相同的实践,是很天真的。我们很容易指出不同阶级对从事同一种运动的预期利益的意见并不一致,比如涉及身体固有的特定利益——无需讨论这些特定利益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因为它们确实是在期待之中的,比如对身体外形的作用,苗条、优雅或一种明显的肌肉组织;还是对身体内部的作用,比如健康或心理平衡——更不用说外在的²³²利益,比如从事运动有助于巩固它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益处。而且,尽管存在着实践的主导功能无过多歧义地显示出来的若干状况,但人们实际上永远无法假定不同阶级从相同的实践中期待相同的东西。因此,比如,人们可以要求体操塑造出一个强壮的带有外在力量特征的身体——这是民众阶级的要求,由健美运动满足,或者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是资产阶级的要求,这种要求在一种基本上以保健为功能的体操中得到了满足——或者还有,通过“新体操”,一个“自由的”身体——这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新层次的妇女的特有要求。²³ 只有通过不同的体育运动被赋予的意义和功能之变化进行一种系统分析,才

²³ Cf. J. Defrance, *Esquisse d'une histoire sociale de la gymnastique (1760-1870)*,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6, déc. 1976, pp. 22-47.



力量和体形

“我在这个年龄已经相当强壮。我的肩宽增加了12厘米，胸围增加了8厘米，胳膊粗了3厘米，这只用了三个月。真是神奇。”

“超出了我的所有期待。我的肌肉长了许多厘米，我的力量倍增。”

“我感到换了一个人。我的父母和朋友过去嘲笑我，现在父亲让我脱掉衬衫向客人展示。多亏了你们。”



“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网球课，巴黎，1978年7月——如同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一样，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对网球兴致盎然。为了提高他的水平，他现在常常大清早在巴黎郊区的一家俱乐部上网球课，我们的摄影师就是在这里拍到了他。”

Tennis-magazine/Syigma

“一个人若是对身体的协调不敏感，就无法成为时尚的审美家”，卡尔·拉格菲尔德说。这位巴黎的设计师每天早晨至少花三十分钟保持体形。他的卧室被改造成一个小小的体操房，包括各种设施：健身车、把杆、臂力机、振动按摩器等。所有这些器材使他从圣特罗佩度假回来后（他在那儿经常游泳）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家中训练：“我想自由地选择我的形象。”

La Maison de Marie-Claire, n°56,
octobre 1971.

有可能摆脱以研究者的实际经验的普遍化为依据的抽象的和形式的“类型学”——这是通病——并且建立在社会学方面合理的特征表,行动者根据这个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选择他们从事的运动来确定自身。

体育运动的意义与从事运动的频率和资历,与运动得以完成的合格的社会条件(地点、时间、装备、器械等),并与从事运动的方式(比如在队中占据的地位、风格等)如此密切相关,以致大部分可利用的统计数据很难得到阐明,尤其是所有非常分散的运动。比如滚球游戏,是每个周末按时在一块合适的场地上与相投的伙伴玩的,还是在假期偶尔作为一种临时游戏,供孩子们娱乐,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甚或,还有体操,也是区别很大的,这要看是在家中无特殊设备的情况下每天或每周从事的简单身体锻炼,还是在一个专业化的体操房练习体操,这个体操房的“品质”(和价格)按照它所提供的不同设备和服务而变化(更不用说竞赛体操或传统体操与各种形式的“新体操”之间的差别了)。但是,我们能够把那些从幼年时就滑雪或打网球的人与那些在成年时才从事这类运动的人,甚或那些在学校假期滑雪的人与那些有财力反季节或者可以说不分地点比如在专用道之外滑雪或远足滑雪的人,按照相同的频次归入同一阶级吗?实际上,从事体育运动的人的社会同源性如此之大,以至于因从事同一种活动而被界定的公众不像场那样发挥作用是很罕见的,合法运动的定义本身就是在这些场中起作用的:在从事体育运动的合法方式或多少稀有的体育运动条件(经费、器械、场地等)方面的冲突,几乎

总是传达了场的特定逻辑中的社会差别。因此“民主化”的体育运动可能使得不同的社会公众聚集在一起(往往是在分开的场地或时间里),这些公众与所考察的体育运动的不同时期相对应。因此,在网球运动中,私人俱乐部的会员、资格老的网球手,比任何时候都要忠于着装的严谨(鳄鱼衬衫,白色短裤——或短裙,特殊的鞋子)和与这种严谨相关的一切,不管从哪方面来看,他们都与市镇俱乐部或假期俱乐部的新手对立,这些新手使人认识到,穿衣的惯例并不只是合法体育运动的一种表面标志:穿齐膝盖的短裤和T恤衫,穿厚运动衫甚或紧身衣和阿迪达斯运动衣打网球是另一种网球,无论从打球的方式上还是从网球提供的满足上而言。人们也无法指望援引所谓“技术”定义来打破这种循环,因为这种循环既要求实践意义说明实践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布,又要求这种分布说明依照阶级不同而有差别的实践意义:“技术定义”远远无法避开场及其斗争的逻辑,它往往是一些人做出的,他们像体育教师那样,必须保证系统地规定和灌输认识模式和行动模式,这些模式在实践中组织实践,于是他们倾向于把对于他们制造的这些实践模式的或多或少成功的阐明,建立在理性或本性依据上。

无论如何,只要意识到体育运动因阶级不同而产生的变化既取决于对这些变化注定要带来的对即刻或推迟的利益的认知和评价的变化,又取决于经济的、文化的,还有我们可以说的身体的代价(或大或小的危险、或大或小的体力消耗,等等)的变化,就可以大致理解体育运动在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分布。这一切的发生就好像从事各种不同体育运动的可能性,在经济(和文化)资本和空闲

时间确定的范围内,依靠根据习性的配置对每种运动的内在和外
在的利益和代价的认识和评价,并且更确切地,依靠与自己身体的
关系,这种关系是习性的配置的一个维度。³⁰ 民众阶级在所有以
身体为对象或赌注的实践如饮食制度或美容、与疾病的关系或保
健中,表现出与自己身体的工具式关系,这种关系也表现在对体育
运动的选择上,这些运动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体力甚或遭受痛苦
(比如拳击),并且有时要求拿身体本身当赌注(比如摩托车、跳伞、
各种形式的杂技,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所有格斗运动)。

橄榄球集中了大球(或小球)游戏和格斗的民众特征,它
拿身体本身当赌注并且准许对身体暴力的一种——有一部分节
制的——表达和对“自然的”体质(力量、速度等)的一种直接 235
利用,因此它与典型的民众配置即崇拜男子气概和喜欢争斗、
不惧怕“接触”、耐得住疲劳和痛苦、有团结意识(“伙伴”)和节
日意识(“第三个下半场”)等有关。这并不妨碍橄榄球被注入
一种美学-伦理学的内容,尤其被来自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成
员(或有意无意地表达这些成员的价值)的知识分子,这种注
入有时会导致人们从事这种运动:对坚韧的寻求、对男性美德

³⁰ 不同的体育运动与年龄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因为这种关系只有在—项运动
与一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中,通过被要求的体力强度和针对这种消耗的态度,才能被确
定,而这种态度是阶级的精神气质的一个维度:在“大众”体育运动的属性中,最重要
的是这些运动暗中与青春相关并且很早(往往在进入以结婚为标志的成年生活时)就
被放弃这个事实,因为青春自发地且明确地被赋予一种临时的许可,这种临时的许可
尤其表现在浪费一种过于充沛的身体(和性)能量上;相反,资产阶级从事体育运动,
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的功能和为了这些运动提供的社会利益,这些运动的共同点
是从事运动的年龄限制被远远推迟到青春期之后,而且运动越奢侈(比如高尔夫),
推迟的时间越长。

的崇拜——尽管这种崇拜有时夹杂着对暴力和角斗的一种唯美主义态度，导致把初级球员的深层配置提到话语的层面，而这些球员几乎不大擅长言语表达和理论化，他们被指导（教练、经理和一部分记者）的话语推向对原始的和服从的力量（“好小子”）和表现为被赞颂的形式的民众力量（克己、忠于“集体”等）的驯服。但贵族主义的重新阐释在传统上依靠与中卫的战术相关的“勇敢”价值，所以它在现代橄榄球的现实中显示了它的局限性，现代橄榄球在比赛和训练技术的合理化与球员的社会招收和观众扩大之变化的共同作用下，给予前锋的战术以主导地位，人们越来越以最隐晦的工业劳动（“干苦差事”）或短兵相接（“有责任感的人”）这类语言谈论这种前锋的战术。³¹

一切似乎说明了这一点，即对身体修养的考虑在其基本形式上，也就是作为对保健的崇尚，往往与中产阶级（中等管理者、医疗机构的职员以及尤其是小学教师，特别是这些女性化程度非常高的等级中的妇女）中对朴素和严格饮食的一种禁欲式颂扬有关，我们知道，中产阶级非常在乎他们的外表，因而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身体，他们相当刻苦地投身于体操这种典型的苦行运动，
236 因为它被还原为一种为了训练的训练（askesis）。如果我们知道，正如社会心理学揭示的，一个人越对自己不在意，越倾向于将他的注意力从自身移开，越能够摆脱被他人目光审视的一个特定身体

³¹ 来自民众阶级或中产阶级底层的球员带入集体体育运动的配置——以及尤其是一种脱离阶级的神奇出路的希望——与训练和踢球的理性化要求是一致的。

引起的迷惑(应该指出,充满焦虑的疑问目光令他人的目光返回到自己身上,今天这种他人的目光在不能衰老的资产阶级妇女身上如此常见),就越能接受自己(这就是自在本身的定义),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小资产阶级妇女为什么愿意花许多时间和精力,以达到符合自我表现的社会规则之感觉,这种感觉是忘记自己并忘记了为他人的身体的条件(S. C., LXI)。

但是体育和所有严格意义上的健身,比如行走或步行,通过其他相似性与中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中文化资本最富有的那部分人的配置相连:体育和健身往往只是相对于对某种练习的作用的非常理论的和抽象的认识才有意义,这种练习在体操上被还原为一系列抽象的动作,这些动作按照一个特定的和深奥的目的(比如“腹肌运动”)被分解和被构成,并与整体的和导向日常生活的实践目的的动作完全对立,因此体育和健身意味着对它们所保证的被推迟的且往往感受不到的利益(比如预防衰老或与年龄有关的事故这种抽象的和无效果的利益)的一种理性信仰。我们也理解,它们在处于上升的个人的苦行配置中找到了其实现条件,这些人预备在努力过程中得到满足并把推迟的满足当作事实——这就是他们全部生活的意义——来接受,被推迟的满足是为他们现在的牺牲做出的许诺。但除此之外,由于它们通过几乎有意识寻求与他人的最远距离——在森林里跑步、走偏僻的道路等,可以单独地或反季节和反地点进行,因此它们排除了任何竞赛和竞争(这是竞走与步行之间的差别),它们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伦理和美学立场之中,伦理和美学立场确定了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层的禁欲式贵族主义。

很清楚,团体运动只要求在阶级之间大致平等分配的(“身体”的或后天的)能力,因此在可随意使用的时间和体能范围内,从事这些运动的机会是同等的,它应该和个人运动一样,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人们从事运动的程度也越高。因为按照在其他领域——
237 如摄影——中观察到的一种逻辑,这些运动的从事方式本身和所有相应属性,比如不受欢迎的社会接触,并没有使统治阶级的成员脱离这些运动。实际上,最典型的民众运动,足球和橄榄球,或者格斗和拳击,最初在法国时,深受贵族喜爱(或者至少,他们当中不太多的人,以此冒充高雅),但当这些运动逐渐“普及”时,它们在现实中和统治者对它们形成的观念中不再是从前那样了,因为它们具备了排斥统治阶级成员的所有理由:这些运动的观众的社会构成加强了存在于普及行为中的庸俗化;同时也由于它所要求的价值和品德,如力量、吃苦耐劳、暴力倾向、“献身”精神、听从和服从集体纪律的精神——这种精神跟包含在资产阶级角色中的“与角色的距离”截然对立——以及对竞争的颂扬。

经常从事运动的人依社会阶级不同变化很大,从农业劳动者中的 1.7%到工人和职员中的 10.1%和 10.6%,中等管理者中的 24%,自由职业者中的 32.3%——我们依照教育水平可看到同等幅度的变化;而当社会等级下降时,性别之间的差别如同在别处一样扩大了(cf. *Collections de l'INSEE*, Série M, n°2, juillet 1970)。这在个人运动比如网球的情形中差距更明显,而在足球的情形中,等级发生了颠倒,工人从事这项运动的比率最高,然后是手工业者和商人。这些部分地通过学校的激励作用得到解释的差距,也来自以下这个事实,

表 21 从事体育运动与关于体育运动的观点的变化(S. C. XXXVIII)

238

	农业 劳动者	工人	手工业者, 小商人	职员 中等管理者	高级管理者 自由职业者	男人	女人
经常或比较经常参加体育比赛	20	22	24	18	16	26	10
经常或比较经常(在电视或收音机上)收看体育比赛	50	62	60	60	50	71	47
希望他们的子女成为伟大的体育运动冠军	50	61	55	44	33	52	47
认为目前在课程表范围内人们对儿童身体的良性发展没给予足够重视	23	48	41	60	71	47	39
经常从事一种或多种运动(如果游泳仅在假期进行,那么游泳除外)	17	18	24	29	45	25	15
目前不定期从事任何运动但曾经从事过	26	34	41	34	33	42	21
从未定期从事过运动	57	48	35	37	22	33	64
定期从事的运动							
· 网球	—	1.5	2.5	2.5	15.5	2	2.5
· 骑马	1.5	0.5	1	1.5	3.5	1	1
· 滑雪	3.5	1.5	6.5	4.5	8	3	3
· 游泳	2.0	2.5	3.5	6.5	10	4	3
· 体操	0.5	3	0.5	5	7	1.5	4
· 田径	—	1.5	0.5	2.5	4	2	0.5
· 足球	2.5	6	4.5	4	4	7	0.5

我们只能从可利用的统计数据(参见补充资料表)中得出到处被证明的最普遍倾向,尽管存在着与运动的定义、运动的频率和运动的机会等的定义不确切有关的变化。(且不说高估了运动的真正比率,这种高估无疑因阶级不同而不均等,它来自这个事实,即所有调查都依靠被调查者的声明,它们无法代替有关众多运动者或观众的真实调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览表中展示了具有—种属性的每个阶级或每种性别的行动者的人数,这种属性是依据关于体育运动和对体育运动的观点的最新调查确定的(S. C. XXXVIII)。

即随着年龄的增长,民众阶级忽然地和相对较早地停止运动而统治阶级停止运动慢得多,因为在民众阶级中,停止运动与毕业或结婚同时发生(四分之三农业劳动者和工人25岁就停止了体育运动),而在统治阶级中,体育运动明确地被赋予一种保健功能(比如对儿童的身体发育的关注所表明的)。(因此在一览表中,那些在所考察时期有规律地从事某种运动的人随着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的升高而大量增加,而那些在一段时间后不再从事运动的人的数量不怎么变化,并在手工业者和商人中达到顶点。)

经常看体育比赛(尤其是最大众的比赛)的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商人、工人、中等管理者和职员(他们也是《队报》的读者)的事情;对电视报道(足球、橄榄球、自行车、赛马)的关注也是如此。相反,统治阶级的成员看体育比赛要少得多。无论是在体育场还是看电视,都是如此,但网球还有橄榄球或滑雪例外。

在某些时候,体育运动是少数人的专利,对公平游戏的崇拜,

239 不过是导致实现了基本上起区分作用的运动真理,公平游戏是那些足以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被游戏操纵以至忘记这不过是一场游戏的人玩游戏的方式,同样地,当从事运动的行为并不总是足以显示运动者的独特性的时候,那些试图证明其卓越的人应该通过他们与某些运动保持距离来显示他们的非功利性,这些运动在变得更加普及的同时,由于它们体现的盲从的保守主义外表而遭到贬值。为了逃避大众娱乐,特权者只需跟随自己对平庸的聚众的厌恶和对运动合法性的意识的指引就够了,这种平庸的聚众注定要使他们总是在别处,在更高处,在更远处,反季节,反地点,寻求对

新体验和处女地的独占权或优先权,而对运动合法性的意识当然与他们的结构价值有关,但也与他们在实践或话语中赞同审美化的程度有关。³²

占统治地位的趣味发现和重视的所有特征集中在高尔夫、网球、快艇、马术(或障碍赛马)、滑雪(尤其是通过最与众不同的形式,比如远足滑雪)、击剑这类运动中:这些运动在专门的和单独的场所(私人俱乐部)中进行,在选定的时刻,要么单独要么与选定的伙伴一起从事(所有这些特征都与集体纪律、团体运动的被迫的节奏和强迫的努力背道而驰),只付出较低的且无论如何随意决定的一种身体消耗,但也付出较高的投入——这种投入在特定的人门时间和努力上越早,收益越大(这就使它们相对独立于身体资本的变化——身体资本随年龄增大而减少),所以这些运动只产生超出规则的、由公平游戏的不成文法严格规定和支配的竞争:体育运动的交流在这些竞争中体现了一种高度文明的社会交流的态度,排斥任何身体的和言语的暴力,任何对身体的混乱运用(叫喊、不规矩的动作等)尤其是(往往被游戏空间的布局以及不同的开始和结束仪式分开的)对手之间任何形式的直接身体接触。或者,还有快艇、滑雪和所有加利福尼亚式运动,这些运动以所有时代被颂扬的对抗自然的斗争代替人与人之间一对一的争斗,代替民众体育运动(更不用说比赛了,比赛与关于人的一种高贵观念不相符)。

³² 在这些方面也存在着一一种合法性的等级,这个等级确定了资产阶级谈话中不同运动有可能被承认的价值,而且《世界报》也通过发表大量关于网球和橄榄球(其次是田径)且往往由名人署名的真正“批评”文章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这种等级,而它对待足球和自行车则疏远和冷淡得多。

240 我们知道,经济障碍——尽管在高尔夫、滑雪、快艇甚或马术和网球中如此重要——并不足以解释这些运动在阶级之间的分布;更为隐蔽的入门费,比如家庭传统和早期训练甚或仪表(或穿着)和严格的社交技巧,禁止民众阶级和处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或高等阶级的个人从事这些运动,并把这些运动(与上流社会的高雅游戏如国际象棋尤其是桥牌一起)列为在资产阶级中的资历的最可靠指标。³³

同种运动可能在不同的时刻,可能由于意义和功能的一种变化,吸引贵族的或民众的公众,或者在相同时刻,对运动吸引的不同公众体现出不同的意义和形式,这个事实本身足以令人警惕从体育运动的“性质”本身获得对这些运动在阶级之间分布的全面解释这个企图。即使区分的逻辑本身足以从根本上说明民众阶级运动与资产阶级运动之间的对立,可是我们只有考虑制度化的不同运动的客观可能性,也就是由这些运动赞同、不赞同或排斥的社会用途,才能完全理解不同群体与不同运动之间的关系,而这些运动是按照其内在逻辑及其位置价值和结构价值被考察的。我们可以提出一条普遍的法则,即一种体育运动越不排斥与身体的关系中最深层和最深层无意识的东西,也就是身体概貌,这种运动就越有可能被一个社会阶级的成员接受,因为身体概貌容纳了整个世界

³³ 我们知道,与玩贝特洛纸牌(更不用说马尼拉纸牌)的人相反,打桥牌的人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而增加,在自由职业者中最多(IFOP,1948)。同样,在重点大学的学生中,打桥牌,尤其是集训(加上比赛),随社会等级不同变化很大。(宣称)下国际象棋似乎不像桥牌那样与社会传统和社会资本积累之寻求紧密联系,相反,更紧密地依靠文化资本:这就说明了下象棋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而增加,尤其是趋向由一种强大的文化资本确定的空间的领域(S. C., VII)。

观、整个人格和身体特有的哲学。因此,一项体育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会预先倾向于资产阶级用途,若这种运动要求的身体功用丝毫不侵犯个人的强烈尊严感,因为这种尊严感不让一个人将身体投入到采用前锋战术的橄榄球的无名争斗之中,或投入到损害个人尊严的田径比赛中,而是要求一个人一心让他人承认他的权威、尊严或高雅的不容置疑的表象,把身体当成一种目的,把身体变成一个表现他个人的自如的一个标志:资产阶级举止的最典型风度是把风格置于首位,它可以通过动作、步态的某种幅度尤其是一种克制的、节制的和坚定的速度被辨认出来,这种幅度通过在空间中占据的地位表明一个人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的地位,这种速度与民众阶级的匆忙或小资产阶级的急切截然相反,体现了资产阶级使用语言的特点,在这种速度中显示出有理由从容不迫和占用他人时间的自信。客观上被纳入实践的可能性与配置之间的一致性从未在军事飞行的状况中表现得如此清楚:普鲁士贵族和建立飞行小队的昔日法国索莫贵族(《大幻灭》^①展示的一切)的个人功绩和骑士道德,包含在飞行本身之中,这种飞行,如同所有飞跃和升高的比喻让人想到的,与社会高位和道德高尚相连,“对海拔高度的某种感受与精神生活有关”,普鲁斯特在谈到斯丹达尔时如是说。³⁴ 鉴于一种好战的和尚武的资产阶级将领袖的道德等同于寻求男人的冒险和行动的人的果断,而一种国际主义的和自由交流主义的资产阶级将其权力的原则确定为其决策的和组织的或简而言之控

① 让·雷诺阿(Jean Renoir)执导的法国电影,1937年上映。——译者

³⁴ M. Prou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Paris, Gallimard (Pléiade), 1954, T. III, p. 377.

制论的能力,两者之间的全部对立,凝聚在世纪初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马术、击剑、拳击或飞行与现代高级管理者的滑雪、快艇或滑翔飞行之间的对立中。

如同一部统治阶级的体育运动史无疑会导向伦理配置、资产阶级关于人类理想的表象及尤其是协调身体道德与被视为趋于女性方向的智力道德方式之变化的根由;同样地,对某一时刻的体育运动在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之间分布的分析,无疑会导向这些阶层之间对立的某些最隐秘的根源,如被埋藏在无意识最深处的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与统治的劳动分工之间关系的表象。而且这在今天无疑更是前所未有的:当涉及实施身体和精神培养时,通过体育训练和饮食制度实行的温和的和暗中的教育适应新的健身伦理,越来越倾向于取代过去的明确的伦理教育。由于赋予统治阶级以特有结构的不同区分原则从来不是完全孤立的,那么,如同经济资本方面最富有的人与文化资本方面最富有的人、继承人与暴发户、老人与青年(或少年)之间的对立,不同阶层的体育运动倾向于从统治阶层到被统治阶层按照一系列对立分布,这些对立本身可以部分地互相还原:最昂贵的运动和最高雅的运动(高尔夫、快艇、马术、网球)或从事这些运动的最昂贵和最高雅方式(私人俱乐部)与最便宜的运动(步行、远足、散步、自行车旅行、登山等)或从事高雅运动的最便宜方式(比如,在市镇俱乐部或假期打网球)之间的对立;可能要求一种巨大精力投入的男性运动(打猎、抛饵钓鱼、格斗、泥鸽射击等)与面向自我探索和自我表达的“内倾运动”(瑜伽、舞蹈、身体表达)或要求一种重大的文化投入而精力投入相对较小的“控制论”运动之间的对立。

因此,将教授、自由职业者和企业主分开的差别似乎集中在三种体育运动中,这三种运动尽管在它们区分的阶层中相对罕见——占总数的10%——,仍表现为每个阶层的区分特征,因为在年龄相同的情况下,它们在这些阶层中比其他阶层中显然更加常见(S. C. V 和 S. C. VI,二度分析):教授的贵族禁欲主义在登山中找到了一种典型的表达,登山比远足及其专用的道路——我们想到了海德格尔——或自行车旅行及其罗曼风格的教堂,更能提供一种手段,让人感到既能支配自己的身体又能支配常人无法企及的一种自然,从而以最低的经济耗费赢得最大的卓越、距离、高度、精神升华;³⁵而医生和现代管理者拥有从事最有声望的体育运动并脱离聚集的人群的(与很早从事运动有关的)物质和文化手段,他们在健身上的享乐主义体现在开船出海、深海水浴、远足滑雪或潜水钓鱼上;而企业主从高尔夫运动、从高尔夫的贵族标签、从高尔夫的借鉴自英文的词汇、从高尔夫广阔的专门场地中期待同样的区分利益,更不用说外在的利益,比如这项运动另外保证的243社会资本积累。³⁶

要知道,年龄在这里显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变量,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即社会年龄的差别,既在社会位置相同的情况下,使生物学上最年轻的人与最年长的人互相对立,但也在生物年龄相同

³⁵ 另一个区分特征,集中体现了与身体以及与社交生活的两种关系的对立,三分之二(59.8%)的教授声称从不跳舞,而自由职业者经常跳舞(只有18%的人声称从不跳舞,这是整个人口中比例最低的)(S. C. IV)。

³⁶ 圣依拉布列泰什(Saint-Nom-la-Brétèche)高尔夫俱乐部的一半以上的会员是银行家、工业家、商人、社会行政管理者,26%的会员是社会指导者、管理者、工程师,16%的会员是自由职业者。

的情况下,使被统治阶层与统治阶层或新阶层与稳定阶层互相对立,这些差别表现在传统运动与传统运动的所有新形式(越野骑马、远程滑雪、探险滑雪等)或所有新运动之间的对立上。所有新运动往往由新兴的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员,尤其是所有时尚人士,服装设计师、摄影师、时装模特、广告代理人、记者从美国引进的,他们创造并销售一种简约精英主义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接近体现教授特点的精英主义,但更不加掩饰地摆脱了传统和礼仪。这种“反—文化”事实上复活了对自然、纯粹和本真的典型学院式陈旧崇拜的所有传统,它的真理也许从未如此清晰地表现在这些新兴的先锋生活风格用品商店,如全国文体用品联营店、波布尔市场、新观察家、假期俱乐部向远足爱好者提供的装备上:风雪衣、灯笼裤、设得兰羊毛或本地羊毛的正宗花毛衣、真正天然羊毛套衫、加拿大捕猎者短上衣、英国渔夫套头衫、美国军队雨衣、瑞典护林员衬衫、耐磨裤、美国劳动鞋、军用高帮鞋、印第安人软皮鞋、爱尔兰劳动帽、挪威羊毛帽、运动帽,还有哨子、高度表、计步器、远足书籍、尼康相机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小器具,没有这些装备,就谈不上自然地回归自然。从所有新体育运动包括远足、骑马、骑自行车、骑摩托、驾船、划海豹皮独木舟、开越野车的远足、射箭、帆板、长距离滑雪、滑翔飞行、三角式滑翔机的源头,如何辨认不出梦想社会飞跃的动力?这些运动在从事运动方面,如工具的准备、保养和使用,或许尤其是在经验的表达方面,全都要求文化资本的一种巨大投入,因此它们之于自由职业者和企业管理者的奢侈运动,有点相当于艺术作品的象征占有之于物质占有。

或文学方面的趣味中一样,清楚地表现了两种与社会世界对立的方式:一方面是尊重形式和礼节,这种尊重表现在对举止和礼仪的考虑与所有对财富和奢侈的泰然自若的炫耀中;另一方面首先是通过夸示贫困对资产阶级仪式进行象征性颠覆,这种夸示将迫不得已变为乐事,并不拘泥于形式且无法忍受束缚,这种无法忍受束缚首先表现在衣着或化妆上,舒适的衣服和长发(如同在其他领域内的小巴士和野营车或民间音乐和摇滚乐)是对资产阶级礼仪的必不可少的属性的挑战,这些属性包括传统剪裁的衣服或豪华汽车、通俗喜剧和歌剧。与社会世界的两种关系之间的这种对立,完全可以归结为与自然世界的两种关系,一方面是爱好天然的、未开化的自然,另一方面是爱好文明的、有标志的、有教养的自然。

因此,体育运动和表演在一个固定时刻可供可能的“消费者”进行选择,这个体育运动和表演系统仿佛预先倾向于表达与这个时刻直接有关的所有社会学上的差别,即两性之间的对立,各个阶级与各个阶层之间的对立;行动者只要投入到其习性的倾向之中,就可以按照他们的方法不知不觉中重拾相应的体育运动固有的意图,并在这些运动中找到完整的自己,与此同时,从中找到所有从中找到自己人,他们的同类。在所有实践领域都是如此:每个消费者都应该重视供给的一种确定状态,也就是被客观化的可能性(财产、服务或行动模式等),占有这些可能性是阶级之间斗争的赌注之一,由于这些可能性与阶级或阶层存在着可能的联系,因此它们是自动被分类的并能够进行分类的,被分成等级的和能够划分等级的。被观察到的财产或实践的分布状况在(现在的和过去的)不同生产场在一个固定的时刻提供的可能性与被社会区分的配置

之间的契合中得到了确定,这些被社会区分的配置与(从其总量和结构上被确定的)资本有关,它们多少彻底地是资本的产物(从轨迹来看),它们在资本中找到了它们实现的手段,因此这些配置确定了对这些可能性的关注,也就是确定了获得这些可能性并且将这些可能性(通过占有这种做法)转化为区分符号的倾向和能力。

247 因此,比如,从这个角度对玩具市场进行的一种研究应该首先建立一个生产场的特定构成原则,这个场在这里如同在别处,无疑使各种企业共存,这些企业的差别通过它们的“资历”(从生产木玩具的小厂到现代大工厂)、规模(营业额、雇员人数),并且也许尤其通过它们给予“文化投资”的份额,也就是通过生产不仅依靠一种技术研究也依靠一种心理研究的程度表现出来。其次,我们从对购买玩具实现的条件的一种分析出发,尤其从购买玩具与传统的因而是季节性的礼物交换时节(圣诞节、新年)相联系的程度——无疑这种程度按照阶级不同而变化的——出发,这样,我们就可以尝试确定不同阶级按照他们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模式,以及更确切地,按照他们的教育策略,有意无意地赋予玩具的意义和功能。教育策略原本就是他们的再生产策略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位置的再生产越专门依靠文化资本的传承,进而文化资本在财产结构中占的比重越大,赋予玩具一种教育功能的倾向无疑越强烈。而且我们应该检验使不同类型的企业互相对立的竞争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是怎么被不同等级的顾客评判的,企业的类型不同,装备也不同并由此倾向于维护不同的产品,当木玩具与智识阶层对天然材料和简单形式的爱好契合时,手工

业企业可能复兴其产业,而智识阶层也受到能够“启发”或“开发”智力的各种形式的逻辑游戏的吸引,于是文化投资很大的企业在为了学历的竞争的强化中和教育投资的普遍增长中,但也在这种自发的广告中,找到了一种自发的支持。正是那些不断地以其自身生活风格为示范并将其精神气质的倾向树立为普遍伦理的人,为符合他们的趣味的产品做了自发的广告:³⁷文化玩具的生产者取消了玩具市场从与仪式性的节日的联系中得来的季节特点,他们这样做是很有好处的,他们可以依靠所有这些人传布信仰的热忱,这些人都是倾向于相信且让他人相信玩具和游戏的——严格来说无法论证的——教育功用的人,诸如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教育家,儿童玩具馆的引导员,以及所有与儿童的一种定义有关联的人,这种定义能够产生一个用于儿童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³⁸

■ 没有什么比无意识的然而被社会证实的信心更能证明一种合法性和合法实践的定义在所有事物中的存在了,新趣味制造者(taste-makers)借助这种信心,以他们自己的高雅趣味为尺度衡量一切实践,这种高雅趣味被当成未来的规则(与一切陈旧的、过时的、僵化的、落后的东西对立):他们为了销售需要进行消费统计,他们对这些统计附加的某些评论是很天真的,这种天真泄露了一点,即他们根据与供应咸猪肉煎蛋的早餐或搭配矿泉水的清淡午餐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距离来划分所有食物消费,如同其他人根据在哈佛、普林斯顿或帕洛阿尔托^{*}正在做(或没做)什么,来裁决在政治方面或在哲学风尚的最新必修课方面什么是时髦的一样。

* 帕洛阿尔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市镇,被誉为硅谷的摇篮,还以心理学和传媒科学闻名。——译者

³⁸ 我们本来也可提到对于作为一个语言可能性空间的生产场的文学场与阶级习性之间关系的分析(cf. P. Bourdieu, avec L. Boltanski, Le fétichisme de la lang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4, 1975, pp. 2-23, et P. Bourdieu, L'économie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 *Langue française*, 34, mai 1977, pp. 17-34),甚或提到后面将要提到的报纸和周刊的空间或政治党派的空间与不同社会阶级的期待之间的关系。

248 于是，只有增加对一个特定等级的产品的相对自主的生产场与消费大众之间关系的经验分析，我们才能真正脱离经济理论的抽象化并由此建立实践经济的一种真正科学的理论。这是因为相对自主的生产场集中了消费大众，消费大众有时起到一个（不断被其社会阶级场中的位置决定的）场的作用，而经济理论只想认识一个消费者和一个产品，这个消费者被还原为（本身也被还原为其收入的）他的购买力，这个产品的特点则由一种假定对所有人都相同的技术功能以同样抽象的方式加以描述。³⁹

244 体育新资源目录

《资源目录》摘录，

抉择书店和平行书店联合出版，

1977年

身体表达

卡塞勒

她深受方舟教育的熏陶，在方舟中生活了十几年，朗扎·德尔·瓦斯托^①这样描写她：“她的艺术不是腿的事，而是在心灵和头脑

³⁹ 应该对劳动市场的抽象概念进行一种同样的批判，并按照双方的力量关系同时描述生产资料——进而是劳动职位——的持有者与劳动力的出卖者之间关系的恒量和变化，双方的力量关系尤其取决于职位和职位提供的物质和象征利益的稀缺性与供给的劳动力和保证劳动力的学历的稀缺性；或者换句话说，取决于职位的持有者能够承受劳动力的个人或集体放弃（拒绝职位、罢工等）的程度和劳动力的持有者能够承受求职被拒绝的程度（比如从学历、年龄、家庭负担来看，年轻的单身者更不易受到伤害），等等。

^① 朗扎·德尔·瓦斯托（Lanza del Vasto, 1901-1981），意大利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和平推动者。1948年，他仿照甘地的经修处模式在法国建立了第一个方舟公社，主张精神觉醒、简朴生活与和平主义。——译者

中成熟已久”；“如果我让她展示几次，这是为了让这门既受到印度舞蹈又受到中世纪基督教细密画启发的珍贵艺术不被丢弃。”

内心生活的方法通过整个集会日的活动实现，为的是继续生活下去；其实，对内心统一性的寻求是这些活动的中心主题。舞蹈具有名誉地位，无论是民间舞蹈、宗教舞蹈还是创作舞蹈。它不是一个自在的目的，而是内心生活的依靠。技术当然是要下功夫的，但从不损害对人格和谐必不可少的放松。

女人通过舞蹈发现她们的身体

对女人来说，舞蹈首先代表了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意识的一种手段，而且在这个意义上，这是对她们自身的一种发现……对被采访女性而言，身体的觉悟有时与对作为特定表达手段的身体的觉悟同时产生。对女性而言，舞蹈被当成允许表现自我的一种新语言……另外，这种活动对一半的被采访女性而言，似乎属于一种原始的情欲甚或一种原始的自体情欲，这种身体的觉悟被当成一种快乐……“这是我感到我有一个身体的时刻……我觉得舞蹈能够为我提供与自身的一种和谐……”“……对自我的一种寻求，在身体上发现我的行为”，“这是透过身体的感觉……这是一种说话的手段，你能说很多！”“这是一种证明……”“我跳舞时感觉很好。我意识到了我自己。有段时间，我停了两年，我感到缺了点什么……这是一种需要”。

有篷马车

我们总共四个女孩，两个男孩，一匹租来的马，一辆买来的马车和一辆自行车。

我们从涅夫勒省的卢瓦尔河畔的拉沙里(La Charité-sur-Loire)出发,没有明确目的地。我们月行300公里,经波旁内(Bourbonnais)的辅路来到(多姆山省的)蒙台居昂贡布拉耶(Montaigut-en-Combraille)。我们平均每小时走3公里(马的体质和性情不允许走得再多)。我们每天走15至20公里。每小时走3公里的做法使我们可以做许多乘汽车不可能的事情:采桑葚、骑自行车、与偏远地方的人交谈、赶马车、游泳、做爱……几日之后,我们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日常的时间:吃饭、工作、睡觉)。

自由飞翔

三角滑翔机是一张绑在铝管上的帆,一个大风筝,它的线被一个悬挂在安全带上的人的重量代替,人们可以借助它从一座山峰俯冲下来,实现飞翔。

245 飞行最初在山上、草坡上、在采砂场中进行,离地面只有几米。从地理上来看,人们可以到处飞翔:从比利牛斯山到孚日山,从北方的废石堆和悬崖经由多姆山到汝拉山和阿尔卑斯山。

远足

真想不到有人活着却不知道只需离开令人窒息的“圣克鲁门”地铁站的世界……就可踏上一流的伟大远足之路!!!千真万确!!!好像一个人第二天早晨吃早餐时讲述自己做的模糊混乱的梦一样。但这是真的:在凡尔赛大街尽头就是565公里路(不能再少!)起始处。

无需经过一个居民点!

平易近人的足球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目睹一种“边缘”足球的发展:在俱乐部之

外,在冠军赛之外,甚至在体育场之外。颜色单一的传统队服让位给五颜六色的T恤衫,各种衬衫,甚至印花棉布短衬衫。短裤不多而牛仔褲风行。缠满有点复杂的鞋带的大钉鞋非常罕见,并会在“比赛”前引来一群好奇的人。网球鞋和“其乐”鞋则常见得多。

球员的数量多变且很少达到规定的11个人。性别并不总是男性而且我还记得有些比赛是在印章公园冬天的泥地里进行的,每个队有三四个女孩,她们的高跟鞋让脚踝或胫骨有好受的了,不只是她们对手的!

这是传奇般的比赛,有两三次休息,在休息期间喘气还好的人又踢了一两脚。通常的比分是32:28。

年龄通常变化很大。没有儿童组,少年组,青少年组,青年组,成年组或老年组之分。11-12岁的少年就是小孩子的模样,人们很难把他们与小孩子区别开来。

显然,规则并不是被严格遵守的。何况,大部分时间没有裁判。越位只是在明显犯规的情况下(比如一个球员整个身体贴在对方守门员身上等着某个回传球)才被判罚。没有边线,这往往使得球场更宽,而不是更长!许多角球被发出,这样就有机会让球员们稍稍争夺拉扯一下。球队随着比赛期间球员的到来逐渐组成。

比赛精神并未完全被排除,但人们离某些“超级”球队的幻想仍旧很远。其实,来踢球的人不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在球场上取胜,鉴于没有赌注,球队很少有两次是一样的,鉴于比赛的阶段是很灵活的,比分有时非常接近(约有一两个球之差)。当一个队明显占了上风,人们便在两个队之间进行“调换”,重新取得平衡……这还是……与人们大部分时间在初中和高中校队里见到的一种精

神状态相当不同。

最终结果？有可能部分地由某一类体操教师引起。一个教师曾给每个球员发一个球，以便完全没有竞争思想（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提到的这个教师甚至有点担心无法让人遵守公认的规则）。

下个星期，如果你看见几伙长发青年奋力追一个球，索性跟他们说要跟他们一起玩。他们不会嘲笑你的。

第四章 场的动力学

因此,有多少风格的可能性的空间,就有多少偏好的空间。²⁴⁹ 这些空间中的每一个,饮料(矿泉水、酒和开胃酒)或汽车,报纸和周刊或度假的地点和形式,房子和花园的陈设或布置,更不用说政治纲领,都提供了几个区分特征,这些区分特征作为差别和差距系统起作用,表达出最基本的社会差别,而且表达得几乎像合法艺术能够提供的最复杂和最细腻的表达系统那样彻底;我们看到了这些空间中的空间为寻求区分准备的几乎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如果说在所有可能性空间中,没有任何一个空间能够像奢侈财产空间而且是奢侈财产中的文化财产空间那样,似乎预先具有表达社会差别的倾向,这是因为区分关系客观上被纳入了这个空间中,并且无论人们是否知道,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区分关系在每个消费行为中,通过这种关系要求的经济和文化占有工具复活。这不仅意味着随着文化生产场的自主的确立,作家和艺术家争先

恐后地宣告的差别的确认，¹而且意味着文化物品固有的意图。因此我们可以想到合法语言的全部社会负荷，想到比如伦理和美学价值系统，这些价值系统准备、预备几乎自动地在形容词对立组合或学术语言的逻辑中发挥作用，而学术语言的全部价值体现在一种差距之中，也就是与简单而普通的谈话方式之间的距离之中：修辞格，作为普通用法的变形，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关系的客观化，这些变形在社会关系中产生并且发挥作用，而且在修辞学论著所统计的比喻的存在本身中寻找一些属性完全是徒劳的，因为这些属性如同所有区分属性一样，只在关系中并通过关系而存在，在差别中并通过差别而存在。词语或风格的格式从来只是用途的一种变化并由此是一个区分标志——当与一种被认为过分的区分（给“自命不凡”下定义的区分）意图或简而言之“过时的”、“落伍的”区分意图相区分的意图，强迫实行这些双重否定时，这个区分

1 无论如何，还是有几个例子的：“若不是否定一切自由、一切优越感和天性本身，那平等是什么？平等，就是奴役。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艺术。”（G. Flaubert, A Louise Colet, 15-16 mai 1852）“在平等的统治下，而且这种统治就要来了，人们会活剥一切没被瑕疵掩盖的东西。艺术，诗歌，风格，对大众算什么？大众不需要这一切。还是给他们看轻歌剧，有关监狱劳动、工人住宅和眼前的物质利益的契约什么的吧。存在着反对原创的永久咒语。”（G. Flaubert, A la même, 20 juin 1853）“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真理从这一切当中脱颖而出；这就是我们丝毫不需要平庸，不需要大多数的人多势众，不需要赞赏，不需要承认，1789年打倒了王公贵族，1848年打倒了资产阶级，1851年打倒了人民。什么都没有了，除了一群流氓和傻瓜。我们都在同等程度上堕入一种共同的平庸。社会平等深入人心。人们为所有人书写，为所有人弄艺术，为所有人搞科学，好像建铁路和公共取暖室一样。人类热衷于道德堕落，我恨他们，因为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A la même, 28-29 septembre 1853）还要举出马拉美的“为所有人的艺术”（L'Art pour tous）或“文学中的奥秘”（Le mystère dans les lettres）（*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Pléiade, pp. 257-260 et 382-387）。

标志可能建立在任何标志的不存在上,而这些双重否定是社会空间的对立极端之间的如此多虚假契合的根源:我们知道所有占统治地位的美学赋予手段的节制、简洁、简约这些品质的价值,而这些品质既与初级的简单和贫乏对立,又与“一知半解的人”的夸张或浮夸、矫饰或做作对立。

几乎无需证实这一点,即艺术品是一种区分关系的客观化,而且由此艺术品明确地预先倾向于在差别最大的背景中蕴含这样一种关系。自从艺术对自身产生了意识,比如在阿尔贝蒂^①身上,如同贡布里希指出的,艺术通过一种否定、一种拒绝、一种放弃来为自己下定义,否定、拒绝、放弃就是雅致的根源,与感官的单纯享乐、与金粉和装饰的肤浅诱惑之间的距离显示在这种雅致之中,缺乏修养的人的粗俗趣味听从这种肤浅的诱惑。“在严格按等级划分的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中,‘粗俗’与‘高雅’之间的对立变成了批评家的主要事务之一”,这些批评家认为,“某些形式和某些方式‘真地’是庸俗的,因为它们吸引下等人,而某些形式和某些方式则在本质上是高贵的,因为只有一种高级的趣味才能欣赏它们”。² 艺术家特有的关注体现在区分的意图中,艺术家越来越倾向于冒着辜负其资助人的“低级趣味”的风险,要求对形式的绝对支配,这种区分的意图与订购或收藏艺术品的人真正赋予艺术品的功能远非背道而驰:“我们从纯粹美学的角度作为一种固定风格

① 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意大利作家、哲学家、建筑师、绘画和雕塑理论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他在《论绘画》(1435)中第一次对透视法进行了科学研究并提出了可用于绘画的透视法计算公式。——译者

² E. H. Gombrich, *Meditations... op. cit.*, pp. 17-18.

的变种加以考察的这些文化作品,被当时的人们当成某些社会身份的相当特殊的表达”³,如同诺伯特·埃利亚斯谈到伟大世纪的社会时强调的。

这就是说,如同叶芝眼中的艺术(“艺术是单个人的社会行为”),对一件艺术作品的一切占有都是一种实现的、形成的区分关系,这种占有本身是一种社会关系并与文化共产主义的幻想相悖,是一种区分关系。文化财产的象征占有工具的把持者只要求相信这一点,即艺术作品,以及更普遍地,文化财产,仅仅通过它们的经济维度获得独特性。他们乐于将在他们眼中唯一合法的象征占有视为对一种人人有份和大家全有的公共财产的一种神秘分享,视为一种自相矛盾的占有,这种占有与物质占有不同,它排除权威和垄断,而物质占有实际上承认独占权因而承认排斥。“无论我看普桑^①的一幅画还是读柏拉图的一段对话,这并不意味着我剥夺了谁这些东西,有多少可能的观众或读者,就应该产生多少普桑和柏拉图”(哲学教师,30岁)。对艺术之爱被当成“对上帝的智性之爱”的一种世俗化形式,照斯宾诺莎的说法,“享有这种爱的人越多,这种爱就越美好”。毫无疑问,从过去继承并被纳入博物馆或私人收藏的艺术作品以及此外的所有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即以书籍、文章、文献、工具等形式积累的历史的产物,都是这些理论或

252 对这些理论的批判、问题体系和概念系统的痕迹或成果,它们表现

3 N. Elias, *La Société...*, *op. cit.*, p. 38.

① 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法国巴洛克时期重要画家,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他的作品构思富于哲理,人物庄重典雅。代表作为《阿卡迪亚的牧人》。——译者

为一个自主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是历史行动的产物,却拥有超越个人意志的自身的法则,并且不可还原为每个行动者甚或全体行动者能够据为己有的东西(也就是不可还原为被归并的文化资本),如同在字典和语法书中被客观化的语言不可还原为实际上被占有的语言,也就是被每个行动者甚或全体行动者归并的东西。不过,为了反对思想世界的自主理论或“无认识主体的客观认识”和“无主体的过程”的理论(阿尔都塞和波普尔在这里汇合),应该强调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作为物质上和象征上起作用的文化资本只有在斗争中并通过斗争才存在和继续存在,文化生产场(艺术场、科学场等)以及额外的社会阶级场是斗争的场所,行动者在斗争中投入他们的力量并且获得与他们对这种被客观化的资本的掌握成比例因而与被他们归并的资本相称的利益。⁴

鉴于文化作品的占有意味着并非被普遍分配的配置和能力(尽管它们表面上是天生的),文化作品成为一种物质的或象征的专门占有的对象,它们作为(被客观化的或被归并的)文化资本起作用,提供一种区分的利益和一种合法性的利益,区分的利益是与

⁴ 涂尔干先于波普尔(cf. K.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尤其是第三章)提出这些论断,但他与波普尔不同,提出了科学世界即“被集中和被积累的人类存在的结果”与个人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但他立刻取消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以分享这个用语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而分享是文化共产主义幻想的基础:“哲学家们经常想象,在人类知性之上,有一种普遍的和非个人的知性,哲学家们想要通过神秘的途径分享这种普遍的和非个人的知性;好吧!这种知性存在,它不是存在于一个超验的世界中,而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中;它存在于科学之中或至少它是在科学中逐渐实现的,这就是个人的理性能够来汲取的最高逻辑生活的源泉”(E. Durkheim, *L'évolution pédagogique en France*, vol. 1, Paris, Alcan, 1938, pp. 215-216)。

文化作品的占有所必需的工具的稀缺性成比例的，而合法性的利益乃卓越的利益，包含在自感有理由存在（如同人们存在那样）、像理当（存在）那样存在这个行为中。⁵ 这就造成了分成阶级的社会的合法文化与差别很小或没有差别的社会的文化之间的差别，前一种文化倾向于表达统治和承认统治的合法性，在后一种文化中，
253 占有文化遗产的工具之取得，大致是平等分配的，因此，文化大致被群体的所有成员在同等程度上掌握，无法作为文化资本也就是说作为统治工具发挥作用，或者仅仅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并在非常隐晦的程度上。

一件艺术作品的物质占有或象征占有提供的象征利益，可以根据这件作品的区分价值得到衡量，这件作品从它要求的配置和才能的稀缺性中获得区分价值，区分价值支配着作品在阶级之间的分布形式。⁶ 文化作品被微妙地划分成等级，预先倾向于表明入门进展的阶段和程度，这种进展决定了瓦雷里·拉尔博^①眼中的文化事业，这种进展类似于“基督徒向神圣的耶路撒冷进发”，它从“不识字”经“不懂文学”和“半调子”到“文人”，或从简单的“读

⁵ 艺术作品的拥有被认定不仅证明了其主人的财富，而且证明了他的高雅趣味，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值得的并倾向于通过自身构成一种合法性的保证。

⁶ 一件深奥的作品越“现代”，也就是说它处于生产场的相对自主的历史阶段越晚，它要求的能力的稀缺性越大，这段相对自主的历史的准一累积性来自这个事实，即从属于场和场的历史（“划时代”）意味着一个人通过参照并往往通过反对不久以前的艺术给自己下定义（这就导致场的被接受的一致性或被容忍的变化幅度不断扩展，这一点我们在音乐的状况中看得特别清楚）。因此，个人趣味的历史倾向于略有偏差地再现相应艺术的历史这一点便得到了解释。

^① 瓦雷里·拉尔博（Valéry Larbaud, 1881-1957），法国作家、翻译家。代表作有《一个富有的爱好者的诗篇》（1908）、《费米娜·马尔克斯》（1911）等。——译者

者”——不考虑“藏书家”——到真正的“爱读书者”：文化的宗教祭祀拥有其初学者、入门者，还有修行者这种“隐秘的精英”，这种隐秘的精英被不可模仿的风格的细微差别与常人分开，由“一种品质”聚集，这种品质是“某种属于人本身的东西，构成了他的幸福，可能间接地对他很有用，但从未给他带来一分钱，跟他的礼貌、他的勇气或他的善良一样”。⁷ 我们由此理解信奉各种宗教的读经的文人对他们的经典文本进行的不断的修订、重新阐释和重新发现：“读物”水平参照读者等级，只要且只需改变读物等级就可颠覆读者等级。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得出，一种财产或一种实践在阶级之间的分布结构的简单平移（也就是说这种财产的持有者人数在每个阶级中大致同等的增加），其作用是降低了这种财产或实践的稀缺性和区分价值并威胁到从前的持有者的卓越。我们由此理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对传播文化信仰的热忱的兴趣与对他们的文化卓越的担忧之间左右为难，对传播文化信仰的热忱的兴趣也就是对通过自动传播征服市场的兴趣，自动传播使他们倾向于普及事业，²⁵⁴ 而他们的文化卓越是他们的稀缺性的唯一客观基础，因此他们与一切触及“文化民主化”的东西保持一种充满矛盾心绪的关系，这种矛盾心绪表现在比如关于文化传播制度与大众之间关系的一种

⁷ 我在此处参照了让·达尼埃尔·雷诺。

· 让·达尼埃尔·雷诺(Jean-Daniel Reynaud, 1926)，法国社会学家。他致力于阐释协商与协商在社会中的角色，提出了社会调节理论，认为规则的创造、维持和破坏依靠一种永久实行的调节活动。代表作为《游戏规则：集体行动和社会调节》(1989)。——译者

自相矛盾的甚或分裂的话语中。

统治阶级的成员——尤其是艺术教授和专家——被问到博物馆的作品展示能否带来改进，尤其是有无机会进行教育革新——这种教育革新力求通过提供技术的、历史的或美学的解释降低作品的“入门水平”——时，他们试图逃避矛盾，在他人所希望的与他们自己所希望的之间进行一种区分。这是因为博物馆原本是他们的专利；因此它对他们这样的人，也就是对博物馆适合的人，是相宜的。改变博物馆，让它变得更容易接受，就是剥夺他们某种东西，他们的一部分价值、他们的一部分稀缺性。但他们绝对对被首先询问他们这些内行该如何做这一点极为敏感，因为这是承认他们给予他人自身的一部分特权的特权。接受教育改进，就是他们同意将他们的博物馆，唯有他们能够拥有的博物馆，也就是严肃的、禁欲的和高贵的博物馆交给他人。⁸

鉴于当那些能够将文化财产或文化消费据为己有的人的绝对数量增加时，文化财产或文化消费如艺术作品、学历或电影修养的区分权力倾向于减小，那么，如果本身由觊觎和区分的辩证法支配的文化财产生产场，若不持续地提供新财产或提供将这些财产据为己有的新方法，区分的利益则注定要消亡。

⁸ 关于围绕袖珍本出现的争论的一种分析也揭示了这种矛盾心绪，袖珍本的出现对作者而言是流传的预兆，而对读者而言则是普及的威胁。

财产生产与趣味生产之间的一致性

255

在文化财产方面——无疑还有别处——供求之间的配合既不是生产对消费实施的简单强制作用，也不是生产借以迎合消费者需要的一种有意识寻求(une recherche consciente)的作用，而是两种相对独立的逻辑即生产场的逻辑与消费场的逻辑的客观配合的结果：产品在其中确立的特定生产场与趣味在其中确定的场(社会阶级场或统治阶级场)之间或多或少完全的同源性，使得在竞争斗争中确立的产品无需特意寻找就可遇到需求，每个生产场都是竞争斗争的场所，竞争斗争是这些产品不断变化的根源，而需求是在主观上或客观上对立的关系中建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竞争斗争中建立的，不同阶级和阶层由于物质的或文化的消费产品保持这种对立的关系，竞争斗争使他们由于这些产品互相对立并成为趣味变化的根源。这种供求的客观配合使得千差万别的那些趣味在各个生产场都为它们提供的可能性的空间中找到其实现条件，而这些生产场会在不同的趣味中找到它们的形成和运行条件，不同趣味为它们的不同产品提供了一个——长期或短期的——市场。⁹

⁹ 因此我们可以说明这一点，即一个提供风格多样的产品的相对自主的艺术生产场的构成条件，是有不同艺术需求的两个或多个艺术赞助人群体的存在和一种选择符合其需要的作品的同等权力(E. B. Henning,《Patronage and Style in the Arts: a Suggestion concerning their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8, n°4, June 1960, pp. 464-471)。

如果生产场无法依靠已经存在的趣味,即消费若干或多或少被严格定义的产品的或强或弱之倾向,那么它显然无法运行,因此生产场是促使趣味得到实现的东西,它每时每刻都为趣味提供作为风格可能性系统的文化财产空间,趣味可以在这些风格的可能性中选择构成一种生活风格的风格特征系统。其实,我们忘记了,每个生产场提供的产品的空间倾向于在事实上限制在某个固定时刻客观上可能的(美学的、伦理的、政治的等)经验形式的空间。¹⁰ 由此而来的后果之一就是,所有统治阶级及其所有属性的差别被承认,这种差别按照事实上可利用的“等级”区分符号的状况,体现出不同形式。其实,至少在文化财产生产的状况中,供求关系体现了一种特定的形式,供给总是发挥着一种象征强制作用:一种文化产品,如先锋派绘画、政治纲领或表达政党观点的报纸,是一种法定的趣味,这种趣味通过一种客观化活动,从部分表达或未表达的实际经验的模糊的半存在,从不言明的甚至无意识的欲望,达到被完成作品的完满现实,而这种客观化活动在目前的状况下几乎总是落在专业人士身上;由此,这种文化产品包含了客观化一向包含的正当化、合法化和强化的力量,尤其当结构同源性将这种文化产品分配给一个特权群体而且它发挥权威的作用时,情况就是如此,这种权威使配置得

¹⁰ 实际上这个在一个固定时刻呈现的伦理的、美学的、政治的可能性的系统,无疑是产生思想方式和世界观的历史性并产生与同一时代和地点相连的个人和群体的同时代性的一个基本维度。

到一种被集体认可的实现,从而许可和加强这些配置。¹¹ 从趣味方面来看,趣味是由与一个条件相关的影响构成的分类系统,这个条件处在不同条件的空间中的一个确定位置上,因此趣味支配着与被客观化的资本、与这个被划分等级的和能够划分等级的物品的世界的关系,而这些物品有助于确定趣味,允许趣味通过专门化得到实现。¹²

因此,实际上得以实现的趣味取决于被供给财产的系统的状况,财产系统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趣味的变化;反之,趣味的任何变化都来自生存条件和相应配置的一种变化,而且能够或多或少直接地引起生产场的一种变化,这是因为趣味的变化在构成这个场的斗争中促进了某些生产者的成功,而这些生产者最适合生产符合新配置的需求。因此不必求助于迫使生产符合需求的至高趣味的假设,或求助于把趣味本身当作生产的一个产物的相反假设,就可以解释每时每刻建立在由一个生产场提供的产品与由社会产

257

¹¹ 我们知道奢侈品广告有系统地利用特定产品与特定群体之间的联系。无论什么场中的制度都不如奢侈品商业中的制度那样公开地通过其主顾为自己定义,这无疑是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供给的产品的准专有职能就是将其拥有者分类。象征物的价值与拥有象征物的群体的价值之间的联系因此非常具体地表现在古董市场中,在这个市场中一件物品的价值可能取决于其从前主人的社会地位。

¹² 被归并的趣味分类应该时刻考虑在诸如文化认可和保护机构这些制度中被客观化的分类,还要考虑所有已形成的等级,趣味分类总是部分地成为这些等级的产物;但是反过来,占统治地位的分类系统不断地在分类斗争中受到质疑并得到修正,不同的阶级或阶层通过分类斗争尽力直接地或通过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在专业化的生产场中互相对抗——使他们自身的分类体系变得合法。

生的趣味场之间的近乎神奇的一致性。生产者在与其他生产者竞争的逻辑和与他们在生产场中的位置有关的特定利益(进而在导致他们达到这个位置的习性)的引导下,生产符合不同文化利益的有差别的产品,从而为消费者提供自我满足的真正可能性,消费者是从他们的状况和阶级位置中获得不同的文化利益的。总之,是这种逻辑促使,如同人们所说的,“一切爱好皆可满足”,统治阶级的每个阶层都拥有其艺术家和哲学家,报纸和批评家,如同拥有其美容师、室内装饰家或裁缝一样,或者,如一个画家所说,“什么人都卖画”,这话的意思是风格差别最大的绘画最终都能找到买主,因此,这种逻辑不是一种有意寻求的产物,而是两个差别系统之间契合的产物。

功能的和结构的同源性原则使得生产场的逻辑与消费者的逻辑在客观上是协调的,这个同源性原则存在于这个事实中,即所有专门场(高级时装场或绘画场、戏剧场或文学场等)都倾向于按照相同逻辑,也就是按照持有的特定资本总量(并按照往往与资本总量相关的持有资历)构成,而且一些对立倾向于在每种情况下在特定资本方面最富有的人与不那么富有的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把持者与觊觎者、资深者与新来者、高雅与自负、正统与异端、后卫与先锋、秩序与变动等之间建立,这些对立彼此之间是同源的(于是就有了各种恒量)并且与组成社会阶级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或统治阶级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对立

是同源的。¹³ 于是产品的阶级与消费者的阶级之间在客观上建立 258 的一致性,只有通过这种对财产与群体之间的同源性的意识才能在消费中实现。这种意识决定了趣味:一个人按照他的趣味选择,就是对财产实行定位,这些财产在客观上与他的位置一致并彼此协调,因为它们处在其各自空间中的大致同等的位置上,包括诸如电影或戏剧、连环画或小说、家具或衣服,他在这方面得到了若干机制如店铺、(右岸或左岸的)剧场、评论界、报纸或周刊的支持,而且他按照相同的原则选择这些机制,这些机制由它们在一个场中的位置确定,本身也该得到一种区分的定位。从统治阶级来看,供求关系采取了一种先设和谐的形式:统治阶级是为了推行占统治地位的统治原则而进行斗争的地点,作为这种斗争的维度,为“等级”标志即奢侈品进行的竞争规定了若干策略,这些策略的共同点是在客观上以专有财产的区别性收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它们为了完成这个共同功能必然要以不同的手段装备自己;而在生产场方面,为了生产这些有区别的和特殊的“等级”符号,生产场可以说只

¹³ 由于在这里无法重述用场的术语进行分析的所有前提(尤其是将一种特定资本与场连在一起的互相依赖关系,这种资本在场中通行并产生作用),只好请读者参见使用这些概念的以往研究成果(尤见 P. Bourdieu, *Le marché des biens symboliques*, *L'Année sociologique*, 22, 1971;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religieux*,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12(3), 1971; *Champ du pouvoir, champ intellectuel et habitus de classe*, *Scolie*, 1, 1971; *Le Couturier et sa griff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 janvier 1975; *L'invention de la vie d'artist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2, mars 1975; *L'ontologie politique de Martin Heidegger*,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5/6, novembre 1975; *Le champ scientifiq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2/3, juin 1976; 最后,尤其参见 *La production de la croyance: contribution à une économie des biens symbolique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3, février 1977)。

有任由自身的逻辑即区分的逻辑支配,这种逻辑总是促使生产场按照一种与象征系统的结构相似的结构组成,生产场通过自身的运行产生象征系统,在象征系统中每个因素都完成一种区分的功能。

同源性作用

因此,尽管时装行业表面上为一种模式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这种模式如同涓滴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①的模式,把有意寻求区分当作服装变化的动力,但这个行业是相对自主的两个空间与两段历史之间相遇的一个近乎完美的例子:259 时装的不断变化是两种逻辑之间的客观协调的产物:一方面是生产场内在的斗争逻辑,这些斗争按照旧与新之间的对立形成,这种对立通过昂贵与(相对)便宜以及传统与实用(或后卫与先锋)之间的对立,跟老年与青年(重量级的,在这里,比如在体育方面)之间的对立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场的内在斗争逻辑,这种逻辑,如人们所见,使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或更确切地说是把持者与觊觎者互相对立,这就是说,鉴于权力(更确切地,经济权力)与年龄之间的对等促使在生物年龄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越接近权力中心,且时间越长,就越世故,于是这种逻辑使拥有与成人的成熟年龄相关的社会属性的人和拥有与青年的未成熟相关的人互相对立。在时装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妇女高级时装店经营者只需听从谨慎和克制

① 涓滴效应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或富裕。——译者

的消极策略,就可直接配合老牌资产阶级的需求,觊觎者的有点咄咄逼人的竞争迫使他们采取这种策略,与新兴资产阶级引人注目的大胆属于同源的一种关系将老牌资产阶级引向对夸张的拒绝,同样地,年轻的妇女高级时装店经营者或服装设计师这些新来者试图推行他们的颠覆观念,他们是资产阶级统治阶层和新阶层的青年的“客观的盟友”,这些青年在以服装和化妆的大胆为范式的象征革命中发现了理想的领域,从而显示他们对于与世俗权势的“穷亲戚”关系的矛盾心绪。¹⁴

文化生产场的运行逻辑和成为文化生产场的活力根源的区分策略,使得文化生产场的运行产物,无论涉及时尚的还是小说的创造,都倾向于作为区分工具首先在阶层之间然后在阶级之间发挥 260 区别的作用。生产者置身于并被封闭在使他们互相对立的内部斗争中,他们确信在其实践中只投入特定利益,他们可能因此感到自己是完全无关利害的,完全不了解他们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要作为一种特定的公众完成的社会功能,然而他们却不断满足有时非常严格地满足这个或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期待。这一点没有比在戏剧的情形中看得更清楚了,在这种情形中,许多相对自主的空间,如

¹⁴ Cf. P. Bourdieu et Y. Delsaut, *Le couturier et sa griffe*, contribution à la théorie de la magi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1, janvier 1975, pp. 7-36. 成衣“革命”来自一个在时装场中占据一个特殊地位的高级时装经营者(库雷热)的配置与一种“现代的”、“有活力的”和“放松的”新兴资产阶级生活风格之间的一种契合,这种生活风格将传统表现功能的引入了职业生活中,同样地,最“时髦的”商店将“真正的”新时尚(真正的中国服装,真正的军队剩余装束——风雪衣、作战裤、轻便雨衣——,加拿大猎装,日本柔道服,狩猎远征的军用高帮鞋)高价出售给由时尚人士如模特、广告人、记者等组成的顾客,这种新时尚的成功源于这个事实,即它符合了与青年新近的反文化相关的需求。

生产者即作家和演员的空间、批评家的空间(以及借助他们的报纸和周刊的空间)与公众空间也就是统治阶级的空间之间的重合,是如此彻底、如此必要且如此不可预测,乃至每个演员都会把他与他所偏爱的对象之间的相遇当成一种上帝选择的奇迹。¹⁵ 通俗喜剧提供了经过检验的表演(改编外国戏剧,重演通俗喜剧的“经典作品”),这些表演按照可靠的秘方构思,由得到认可的演员出演,所以通俗喜剧针对一批年长的、“资产阶级的”并准备出高价的观众,因此,通俗喜剧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与探索戏剧对立,探索戏剧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提供与伦理和美学传统决裂的表演并吸引一批年轻的和“爱思考的”观众。生产空间的这个结构既通过若干机制在现实中发挥作用——这些机制产生作者或演员与其剧院、批评家和报纸之间的对立;又在头脑中以认识和评价范畴系统的形式发挥作用——这个系统允许对作者、作品、风格、主题进行分类和评判;因此,在文化生产场中占据对立位置的批评家会按照恰好成为其客观差别之根源的若干对立来考虑作品,但在这些对立的各项之间建立相反的等级。弗朗索瓦丝·多兰^①的一出戏《转变》

¹⁵ Cf. P. Bourdieu, La production de la croyanc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 13, février 1977, pp. 3-43. 我们无需费力就可指出即使市场调查的时代,这些特定类型的文化产品即报纸从为了广告客户和读者的竞争的逻辑中得到的好处,这个逻辑使得报纸喉舌,如同政治党派一样,需要不断地致力于尽可能地扩大其顾客群,哪怕损害它们在生产场中最接近的竞争者,并以多少隐蔽地借用主题、格式甚至记者为代价,同时还要不失去特定读者,因为特定读者为报纸定义,报纸的结构价值与他们密切相关。

^① 弗朗索瓦丝·多兰(Françoise Dorin, 1928-), 法国女喜剧演员、作家。曾为法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许多歌手的著名流行歌曲写歌词。——译者

(*Le tournant*), 体现了一个通俗喜剧作家想要变成先锋作家的意图, 这出戏引起的反应在其内容和形式上, 根据这些反应在其中得到表达的报纸喉舌的位置, 也就是按照批评家及其受众与“资产阶级”中心并由此与弗朗索瓦丝·多兰的戏剧的距离大小而变化; 如果人们检视一下从右到左、从右岸到左岸、从《黎明》到《新观察家》的报纸空间, 还有公众空间, 就可看到这些反应的分布, 从最无条件的赞同经过一个折中的观点(由《世界报》代表)到蔑视的沉默, 而公众空间本身按照若干对立构成, 这些对立相当准确地与确定戏剧空间的对立对应。批评家被置于一个如此清楚地按照典型对立构成的一个对象面前, 而他们本身也是按照一个结构分布的, 这个结构是被分类的对象的根源和他们用于这个对象的分类系统的根源, 他们在评论空间中再生产他们本身在其中被分类的空间, 他们通过评论为这个对象分类并且为自己分类(这是一个完美的循环, 只有将这个循环客观化, 才能摆脱它)。在这出戏中, 弗朗索瓦丝·多兰用伪装成一种“炫耀式简朴”的“自负”和“虚张声势”、严肃精神、布景的阴郁, 与“资产阶级”戏剧——她的戏剧——对抗, 前者体现了另一种戏剧的特点, 后者则以其巧妙的手法为快活、轻松和随意这些“典型法国的”品质服务。右岸批评家抓住了一系列对比鲜明的属性, 手法的巧妙、生活的欢乐、明晰、自如、轻松、美好的生活, 与烦恼、忧愁、晦涩、自负、沉重、悲惨的生活对立, 这些属性差不多也可在左岸批评家那里找到, 但有了一种征象的变化, 这种变化来自对指涉属性之等级的一种颠倒。

一个社会学测试

从“右”到“左”，或从“右岸”到“左岸”，首先是《黎明报》(L'Aurore)^①：“弗朗索瓦丝·多兰的不合情理有可能与我们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和冒充高雅的——两者相伴而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分歧。这是因为作为“一个肮脏的自私自利者”的作者没有对带有所谓‘先锋派’戏剧作品的许多特征的庄重的烦闷、深刻的空虚、混乱的虚无表现出丝毫的尊敬。她敢于以一种大逆不道的笑玷污这种著名的“人类不可沟通性”，这种不可沟通性是当代舞台上的始与终。这个反常的反动派，迎合了消费社会的最低级欲望，远远没有承认她的错误并谦卑地保持通俗喜剧作家的名声，竟然喜欢萨沙·吉特里^②的异想天开和费多^③的卑俗演出胜过玛格丽特·杜拉斯或阿拉巴尔^④的晦涩的明晰。这是她很难被原谅的一桩罪过。尤其因为这是一桩在快活和喜悦中犯下的罪过，采用了

① 法国一家右派报纸，创立于1944年，1985年并入《费加罗报》。——译者

② 萨沙·吉特里(Sacha Guitry, 1885-1957)，法国演员、剧作家、戏剧和电影导演。代表作有《一个骗子的传奇》、《我父亲有理》、《毒药》、《凶手和小偷》等。——译者

③ 费多(Feydeau, 1821-1873)，法国作家和考古学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范妮》(1858)，这部描写通奸和嫉妒的小说引起了很大轰动，被视为现实主义风格的胜利。——译者

④ 阿拉巴尔(Arrabal, 1931-)，生活在法国的西班牙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他的作品继承了卡夫卡的明晰和雅里的幽默，萨德和阿尔托的狂暴，带有一种疯狂的、暴力的和挑衅的特点，兼有政治性和娱乐性、反抗性和放浪不羁，显示了这个时代的症候，如小说《塔楼警戒》(1983)、诗集《疯狂的石头》(1963)、《谦卑的天堂》(1985)、戏剧《建筑师和亚述国王》(1967)、散文《色情的兽性》(1968)、《费舍尔，被诅咒的国王》(1980)等。——译者

造就持久成功的所有该受谴责的手法”(Gilbert Guilleminaud, *L'Aurore*, 12 janvier 1973)。《黎明报》的批评家处在知识场的分界线上,站在一个已经以外人身份说话的观点上(“我们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直截了当(他把一个反动派说成反动派)且并不掩盖他的策略。旨在令对手在他的话语状况下开口的修辞效果,起到一种讽刺性的夸张的作用,意味着客观上与他要说的相反,并以批评场的结构和直接的同谋关系为前提和赌注,这种同谋关系建立在他与他的公众之间形成的位置同源性基础上。

我们从《黎明报》转到《费加罗报》:《费加罗报》的批评家与《转变》的作者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和谐,即互相配合的习性的和谐,他在如此符合他的认识和评价范畴与他的戏剧观和他的世界观的一出戏面前,只能感受到绝对的愉快体验。毕竟,迫于一种更高程度的委婉措辞,他排除了公开的政治评论而局限于美学或伦理的领地:“人们应该承认弗朗索瓦丝·多兰女士是一个勇于轻快的作家,这就意味着精神上是戏剧的,微笑中带着严肃,不软弱的无拘无束,将喜剧推向最直白的轻喜剧,但尽可能以最微妙的方式;一位优雅地运用讽刺的作家,一位时时刻刻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精湛技艺的作家……弗朗索瓦丝·多兰比我们所有人都熟谙戏剧艺术的力量、喜剧的手法、情境的能量、准确用词的可笑或尖刻的力量……是的,在有意识的打岔中蕴含着何等的解析艺术,何等的讽刺,在次要手段的掌握上又是多么娴熟啊!在这《转变》中,让人愉悦的东西,应有尽有,丝毫没有逢迎或平庸。也没有取巧,

因为可以肯定的是，此刻因循守旧完全在先锋派那边，可笑在庄严一边，欺骗在烦闷一边。弗朗索瓦丝·多兰使平静的观众卸下负担，以一种健康的轻快让观众重新得到平静……赶紧去看吧，我相信您会发自内心地笑出来，乃至忘了去想一个作家是否仍与他生活的时代一致这个可能让人苦恼的问题……这最终是所有人为自己提出的问题，而且，只有幽默和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问题！”(Jean-Jacques Gautier, *Le Figaro*, 12 janvier 1973)。

从《费加罗报》自然就到了《快报》(*L'Express*)，《快报》在赞同与疏远之间摇摆，由此达到了一种明显更高的委婉程度：“这理应大获成功……非常机智可笑的一出戏。一个人物。一个非常适合角色的演员：让·皮亚^①……以一种无瑕的精湛技艺，除了有点冗长，以一种狡猾的智慧，一种对职业手段的完美把握，弗朗索瓦丝·多兰写了一出关于通俗喜剧转变的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出戏是最传统的通俗喜剧。只有忧郁的老学究才对两种戏剧的对立与政治生活和隐蔽的私人生活的两种概念的对立刨根问底。充满警句和箴言的杰出对话，往往具有报复性的讽刺。但是罗曼^②不是一种不真实的丑陋形象，与一般的先锋派作家相比，他远非那么愚蠢。

① 让·皮亚(Jean Piat, 1924-), 法国喜剧演员、导演和作家。他说：“我喜欢让人笑，给人带来一点儿幸福。”——译者

② 罗曼(Jules Romains, 1885-1972), 法国诗人、作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曾担任《黎明报》的专栏作家，代表作有剧本《克诺克或医学的胜利》(1923)、小说《善良的人们》(1932-1946)等。——译者

菲利普有一桩美差：因为他在自己的地盘上。《如在剧中》的作者意欲善意地灌输的，是人们向通俗喜剧讲话，人们‘像在在生活中’那样行动，这是真实的，但这是一种局部的真实，不只是因为这是一种阶级的真实”（Robert Kanters, *L'Express*, 15-21 janvier 1973）。这里，赞同已经是彻底的，这种赞同通过系统地采用关于相关对立的观点的暧昧表达方式，而产生微妙的差别：“这应该大获成功”，“一种狡猾的智慧，一种对职业手段的完美把握”，“菲利普有一桩美差”，这些说法也可被理解为贬义的。人们甚至通过否认，对另一种真实（“只有忧郁的老学究刨根问底”）甚或简单的、但被否认和暧昧加倍遏制的真实（“不只是因为这是一种阶级的真实”）有点怀疑。

《世界报》提供了炫耀性的折中话语的一个完美典型，像体育评论员所说的，它将两种对立位置的把持者即《黎明报》公开的政治话语和《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①轻蔑的沉默同等对待：“简单的或过于简单化的论据由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多层次’的表达方式而复杂化了，好像两场戏互相重叠。一场戏是由传统作家弗朗索瓦丝·多兰写的，另一场戏是由试图‘转向’现代戏剧的菲利普·鲁塞尔创造的。这个游戏被描写为一种自食其果的行为、一种循环的运动。弗朗索瓦丝·多兰有意识揭露了受菲利普质疑的通俗喜剧的陈词滥调，并借助他的声音对资产阶级进行一种猛烈的批评。其

① 法国中左派新闻周刊，1964年创刊，具有社会民主倾向。——译者

次,她用这种话语与她大肆抨击的一个青年作家的话语进行对抗。最后,这个过程重新将武器对准了通俗喜剧舞台,机制的空洞被传统戏剧的程式揭穿了。因此,传统戏剧的程式并没有丧失任何价值。菲利普可自称为一个‘敢于轻松’的作者,他想象出‘像常人一样说话的人物’,他可以要求一种‘无国界的’进而非政治的艺术。但论证完全被弗朗索瓦丝·多兰选择的先锋派作家的模式歪曲了。旺柯维茨(Vankovicz)是迟到的、具有模糊的战斗性的存在主义者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个追随者。他是极端地滑稽丑陋的,如同人们在这里揭露的戏剧一样(‘黑幕和绞刑架,有用!’或一出戏的这个标题:您将在咖啡中喝到一点儿无限,卡尔佐夫先生)。观众因为这种对现代戏剧的可笑描绘而狂喜;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愉快地挑动他们,条件是这种批判重新回到被憎恨的受害者,给他致命一击……在《转变》反映资产阶级戏剧的状况并揭示其防御体系的情况下,这出戏可被视为一部重要作品。没有什么剧本如此明显地泄漏对一种‘外部’威胁的忧虑并以如此无意识的激烈态度来回收这种忧虑”(Louis Dandrel, *Le Monde*, 13 janvier 1973)。罗贝尔·康泰已经培养起的暧昧,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论据是“简单的或过于简单化的”,可供选择;剧本分成两个,仍旧为读者的选择提供了两部作品,也就是说对资产阶级的“一种激烈的”然而“可收回的”批判和一种对非政治的艺术的捍卫。如果有人天真地询问批评家到底是“赞同还是反对”,他认为剧本是“好还是坏”,两个答案:首先是“客观信息员”的一种澄清,这种澄清依据事实,强调被展现的先锋

派作家“极端地滑稽丑陋”，而且“公众狂喜”（但人们不知道批评家与这公众的关系，进而狂喜的意义是什么）；接下来，经过一系列倚仗谨小慎微、细微差别和学究气的缓和（“在……情况下”，“可能被视为……”）的暧昧判断之后，是关于《转变》是一部重要作品的论断，但是，人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剧本是作为关于当代文明的危机的文献被评论的，无疑如同人们在政治科学院说的那样。

这种协调和妥协的艺术在《基督教》^①(*La Croix*)的记者那里达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精湛技艺，他对如此微妙地构成的期待、双重否定的曲言法、自我保留且自我修正的细微差别予以无条件的赞同，乃至显得如此天真地伪善的最终的对立面的协调(*conciliatio oppositorum*)，如他说的，即“内容和形式”，几乎表现为自然而然的：“我说过，《转变》在我看来是一部令人钦佩的作品，内容和形式。这并不是说它不让人咬牙切齿。我偶然坐在一个先锋派的无条件的支持者旁边，整个晚上我看到他压抑怒火。我并不因此而得出弗朗索瓦丝·多兰对待当代戏剧的某些探索——即使这些探索往往是令人厌烦的——不公正的结论……如果她以‘通俗喜剧’——而这种通俗喜剧本身也是先锋派的——的胜利结尾。此举是很容易的，这是因为一个像阿努依^②这样的大师很久以来就担当这两条道路的交叉点的引路人”(Jean Vigneron, *La Croix*, 21

① 法国天主教报纸，1880年创刊。——译者

② 阿努依(Jean Anouilh, 1910-1987)，法国作家和剧作家。代表作有《不带行李的旅人》(1937)、《安提格涅》(1944)等。——译者

janvier 1973)。

尽管《新观察家》的沉默本身无疑意味着某种东西，但人们仍旧可以通过阅读《新观察家》上发表的对费利西安·马索^①的戏剧《四个人的证词》(*La Preuve par quatre*)的评论，或菲利普·泰松当《战斗报》(*Combat*)主编时发表在《鸭鸣报》(*Canard enchaîné*)上的《转折》评论，对这份周刊可能的立场有一个大致的看法：“我不认为商人和女实业家的这些上流社会聚会应该叫作戏剧，在这些聚会过程中，一个著名的和颇受重视的演员在一个舞台设置中，朗读一个同样著名的作家的生硬的诙谐之作，哪怕这种设置是迷惑人的并带有福隆^②的有节制的幽默色彩……这里丝毫没有‘仪式’，也没有‘净化’或‘揭露’，更没有即兴。对于有别的胃口的人来说，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厨房的现成菜罢了……剧场观众，如同巴黎所有剧场观众一样，在合适的时候，在最循规蹈矩的地方，大笑，这种仁慈的理性主义精神在这些地方大行其道。他们完全互相串通而且演员是导火线。这是一个本该在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前写的剧本”(M. Pierret, *Le Nouvel observateur*, 12 février 1964, 关于费利西安·马索的《四个人的证词》)。

“弗朗索瓦丝·多兰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既是一个一流的回收员，又是一个异常矫揉造作的人。她的《转变》是一出优秀的通俗喜剧，这出喜剧的主要手段是欺骗和蛊惑人心。

① 费利西安·马索(Félicien Marceau, 1913-2012), 比利时裔法国剧作家、小说家和随笔作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译者

② 福隆(Jean Michel Folon, 1934-2005), 比利时艺术家、建筑家、设计师。——译者

这位女士想要证明先锋派戏剧是徒劳无益的事。为此，她暗中操纵，不用说你也知道，只要她设下个圈套，公众就笑弯了腰，大叫：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作者期待的就是这个，她添油加醋。她把一个年轻的左派剧作家搬上舞台，给他取名旺科维茨——请注意！——她将他放在可笑的、为难的和不太适当的场景中，为了证明这个家伙并不比你我更无私，更少些市侩气。多么有良知，多兰女士，多么有洞察力，多么坦率啊！您至少有勇气表达您的观点，非常健全的观点和符合我们心意的观点”（Philippe Tesson, *Canard enchaîné*, 17 mars 1973）。

如同在一场镜子游戏中，处于极端位置的每个批评家都能确切地说出对立面的批评家所说的东西，但这是以他的话产生一种讽刺的价值并通过说反话指明对立面的批评家恰恰颂扬的东西为条件的。因此，当左岸批评家授予弗朗索瓦丝·多兰她本人自夸的那些品质，但是他没法不这么说：在她嘴里和在她的公众面前，这些品质自动变得微不足道（技巧变成“粗俗的”诡计而“良知”直接被理解为资产阶级愚蠢的同义词），他拿弗朗索瓦丝·多兰本人用来反对先锋派戏剧的武器对她反戈一击，因为她运用场的结构逻辑，用先锋派戏剧的武器对先锋派戏剧反戈一击，先锋派戏剧喜欢拿这种武器反对“资产阶级”长篇大论和“资产阶级”戏剧，因为“资产阶级”戏剧再生产这种长篇大论的自明之理和陈词滥调（我想起了尤奈斯库，他将《秃头歌女》或《雅克》描述为“对通俗喜剧的一种滑稽模仿或讽刺描绘，一种正在解体且变得疯狂的通俗戏剧”）。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同样的过程，这个过程旨在以一个人与

266 自己的观众形成的伦理和美学的同谋关系为借口,打破被戏仿的话语与自身话语的同谋关系并将这种关系变成一系列“不合时宜的”话语,这些不合时宜的话语让人震惊或发笑,因为它们不是在合适的场合中和合适的观众面前说出的,而且它们之所以与观众建立即刻的发笑同谋,若不是提前就有这种把握,只是因为它们能够让观众废除被戏仿话语的前提。

正如这个典型状况指出的,是源性逻辑而不是厚颜无耻的计算使得作品符合其观众的期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使他们互相对立的斗争中采取的片面客观化,忽视了基本的东西,将实际上是(可以在“资产阶级”作家本人身上共存的)两个利益系统之间的先设和谐的结果,或更确切地,一个在生产场中被确定的作家或艺术家的位置与其观众在阶级和阶层场中的位置之间的结构和功能同源性的结果,描写为一种在观众那里有意追求成功的结果。作家和艺术家拒绝承认除了厚颜无耻的计算和纯粹的无关利害之外生产者与其观众之间其他任何可能的关系,他们为自己提供了一种自视为无关利害的权宜之计,与此同时发现他们对手的活动根源在于不惜一切代价地——按右岸的理由,是通过挑衅和丑闻,按左岸的理由,则是通过唯利是图的奴性——取得成功。所谓的“帮佣作家”有充分理由认为和宣称他们没有为任何严格意义上的个人服务:他们之所以在客观上服务,那是因为他们无比真诚地服务于他们自身的利益,特定的利益,高度升华和委婉表达的利益,比如对一种戏剧和哲学形式的“兴趣”,这种“兴趣”在逻辑上与在某个场中的某个位置相关,而且(除非在危机时期)恰好用来掩盖它

所包含的政治影响,甚至连它的维护者也看不到。在纯粹的无利害与厚颜无耻的奴性之间,还为一些关系留了位置,这些关系客观地并在一切有意识的意图之外,在一个生产者与一群观众之间建立,它们使得在一个特定的和相对自主的生产场中产生的实践和作品必然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它们在内部斗争中完成的功能不可避免地也是外部功能,即它们在统治阶级的阶层之间且至少最终在阶级之间的象征斗争中获得的功能。“真诚”(它是象征有效性的条件之一)只有在被纳入占据的位置(在一个不大被认可的空间中,似乎是“职位的定义”)之中的期待与占据者的配置之间的267一种完全的、直接的协调状况中,才是可能的——和真实的。它是那些受其社会意识(用英语说是“一个人的地位意识”)引导在生产场中找到其自然领地的人的特权。按照这条想让人们只对改宗者布道的法则,一个批评家对赋予他这种权力的读者有“影响”,只是就他们给予他这种权力而言的,因为他们在结构上、从其社会世界观、其趣味及其整个习性方面与他达成一致。让-雅克·戈蒂耶(Jean-Jacques Gautiers)长期以来是《费加罗报》的文学批评家,他非常清楚地描述了把记者与其报纸并通过报纸与其公众连在一起的这种有选择的相似性:一个出色的《费加罗报》主编是自己选择并按照同样的机制被选择的,他知道如何从行为上辨认《费加罗报》的一个文学批评家,这就是“他有面向报纸的读者讲话的合适语调”,而且并非有意为之,“他自然地讲《费加罗报》的语言”,他应该是这家报纸的“典型-读者”。“如果明天我在《费加罗报》上开始讲《现代杂志》和《文学圣殿》的语言,没有人读我、懂我、听我的,

因为我使用的将是读者大加嘲弄的某些概念或论据”。¹⁶ 与每个位置对应的是若干前提、一种定见，而且生产者与其顾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同源性是这种同谋的条件，投入的东西越重要，越接近最根本的投入，如同在剧场中一样，这种同谋就越发强烈地被要求。

有选择的相似性

这个极端个案迫使人们针对供给对需求或需求对供给的直接作用的外表提出疑问，并且导致以另一种眼光考虑财产生产的逻辑与趣味生产的逻辑之间的所有契合。被占有物即物品、人、知识、回忆等的空间都是通过些契合构成的。所有这些同源性的结构和程序的重合的界限是由所有同情、友谊或爱情的遴选行为表现的，一个被社会分类的人和与他相配的事物或本身也被社会分类的那些人之间的协调通过这些重合实现，而遴选行为导向被社会认可或不认可的持久关系。社会意义在彼此相关的无限过剩的符号的系统中找到了它的标志，每个身体都携带
268 这些符号，衣着、发音、风度、步态、举止，而且这些符号被无意识地记录下来，成为“反感”或“好感”的基础；表面上最直接的“有选择的相似性”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对有表现力的特征的无意识辨认，每个特征不过是在按照阶级而变化的系统内部获得

¹⁶ J. J. Gautier, *Théâtre d'aujourd'hui*, Paris, Julliard, 1972, pp. 25-26. 当他承认他的批评的有效性原则并非存在于与公众期待的经过计算的配合中，而是存在于一种客观的一致中，我们应该相信他。这种一致使批评家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完全的真诚，这种真诚对于被人相信进而产生效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其意义和价值(只要想想日常语言统计的笑或微笑的形式就够了)。趣味是让物与人相配和相似的东西,物与人彼此融洽,互相契合。

无疑,没什么比阶级甚或阶层的内婚制更能明白无疑地证明这种对社会相容性和不相容性的直接意识了,爱情选择的自由活动和家族的有意干预几乎同样严格地保证了这种内婚制。我们知道,婚姻交换程序的结构倾向于再生产类似这里描述的社会空间的结构(cf. A. Desrosière, *Marché matrimonial et structure des classes sociale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20/21, 1978, pp. 97-107)。很可能我们还是低估了夫妻之间的一致性,对配偶及其家族的“次要”属性的进一步认识会减少表面上的偶然性成分。因此,比如,1964年进行的六届高师文科毕业生(1948—1953)的婚姻策略调查表明,在这期间结婚的人(占总数的85%),其中有59%娶了教师,而与教师结婚的人中的58%娶了有学衔的人(cf. P. Bourdieu et M. de Saint-Martin, *Les catégories de l'entendement professoral,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3, 1975, pp. 87 et 90)。同样地,在占据公务员与政治职务之间的一个中间位置的中央政府的领导者中,其中22.6%的人的父亲担任公务员,22%的人的父亲从政,16.6%的已婚者的岳父是官员,25.2%的已婚者的岳父从政(cf. Ezra N. Suleiman, *Politics, Power and Bureaucracy in France. The Administrative Eli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69)。最终,

同样地，在招收私营企业未来领导者的国立欧洲高级商业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中，28%是工商企业经理之子，19.5%是高级管理者或工程师之子，23.5%的已婚者的岳父是经理，21%的已婚者的岳父是管理者或工程师，极少人的父亲(2%)或岳父(5%)是教师(cf. J. Marceau, *The Social Origins, Educational Experience and Career Paths of a Young Business Elite*, Final Report for SSRS Grant of 1973-1975, Paris, 1975, 117p. dactyl.)。而且我们知道婚姻交换的逻辑为大资产阶级的再生产带来的决定性贡献(cf. P. Bourdieu et M. de Saint-Martin, *Le patronat*, *loc. cit.*)。

趣味进行搭配；它使颜色也使人相配，颜色和人形成“非常相配的组合”，而且首先是在趣味方面。所有成为“第一群体”基础的遴选行为都是对他人的认识行为，因为遴选行为是认识行为的原因，或用一种唯智主义色彩不那么浓厚的话来说，是(第一次相遇
270 中非常明显的)辨认行动的原因，一个习性通过辨认活动获得与其他习性的相似性。于是我们就理解了普通夫妇的令人惊异的和谐，这些夫妇往往从一开始就般配，他们通过一种互相的文化适应越来越般配。¹⁷ 通过习性的习性辨认是直接相似性的根源，这些相似性左右社会契合，阻止在社会方面不和谐的关系，鼓励相配的关系，而且这些活动从来都是通过社会意义单纯的同情或反感的

¹⁷ 在提出不合和离婚的反例之前，我们应该想想习性的和谐构成的凝聚力应该有多大，才能抵消习俗和社会法则确定的婚姻事业固有的矛盾。



语言来表达的。¹⁸ 独特的人之间的独特相遇的极端不可能性,掩盖了可替换的偶然的可能性,导致将互相的选择视为一种幸运的偶然,即模仿合目的性的巧合(“因为是他,因为是我”),因而增强了神奇之感。

我们发现符合我们的趣味的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注入了一种趣味,这种趣味与我们在对他们实践的认识中运用的趣味没有区别。两个人只有互相喜爱才能提供他们的趣味相似性的最好证明。正如艺术爱好者自感为他的宝物而存在,而这宝物似乎从

¹⁸ 习性的直觉提供了(只有长期的阐述活动才能确立的)一种直接理解,这是因为,当各个行业的人被要求从一个人物名单中指出他们愿意接待的人时,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比所有其他阶级更愿意选择西蒙娜·韦伊^{*}、吉斯卡尔·德斯坦、巴尔^{**}、弗朗索瓦丝·吉鲁^{***}、希拉克,但还有吉凯尔^{****}和穆鲁西^{*****},而工人比所有其他人更愿意选择科吕什^{*****}、普利多尔^{*****}、泰弗内^{*****}和马歇^{*****},而中产阶级选择勒吕龙^{*****}、密特朗、卡罗琳·德·摩纳哥^{*****}、普拉蒂尼和若弗雷^{*****}的居于首位(S. C., XLIII)。

* 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 1927-),法国女政治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曾任法国卫生部长和欧洲议会议长。
 ** 巴尔(Raymond Barre, 1924-2007),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曾任欧洲委员会副主任和法国总理。
 *** 弗朗索瓦丝·吉鲁(Françoise Giroud, 1916-2003),法国女作家、记者、政治家,曾任法国激进社会党和法国民主联盟副主席。
 **** 吉凯尔(Roger Gicquel, 1933-),法国记者,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 穆鲁西(Yves Mourousi, 1942-1998),法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大改变和革新了法国新闻节目风格。
 ***** 科吕什(Coluche, 1944-1986),法国喜剧演员和幽默大师,曾参加1981年法国总统竞选,后退出。
 ***** 普利多尔(Raymond Poulidor, 1936-),法国深受欢迎的优秀自行车运动员。
 ***** 泰弗内(Bernard Thévenet, 1948-),法国自行车运动员,曾经两次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
 ***** 马歇(Georges Marchais, 1920-1997),法国政治家,1972-1994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
 ***** 勒吕龙(Thierry Le Luron, 1952-1986),法国歌手、模仿家、幽默家、电视主持人。
 ***** 卡罗琳·德·摩纳哥(Caroline de Monaco, 1957-),摩纳哥公主,致力于推动妇女儿童事业。
 ***** 若弗雷(François Jauffret, 1942-),法国网球运动员,多次获得法国网球单打和双打冠军。——译者

来都是在对“发现者”的日光的期待中存在的,那些相爱的人感到“有充分的理由存在”,用萨特的话说,就是“为了彼此而生的”,变成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存在的另一个存在的目的和理由,因而在他们具有的最无关紧要的方面如一种笑或说话的方式中被接受、被承认、被认可,总之在一种存在的和行为的方式、一种生物的和社会的命运的随意性中被合法化。爱情也是在另一个人身上爱自己的命运并感到在自己的命运中被爱的一种方式。爱情无疑是体验一种原始直觉(intuitus originarius)的良机,拥有(为其主人而制造的)奢侈财产和艺术作品是这种体验的一种类似形式,这种体验把感知的和命名的主体(我们知道恋爱关系中命名所扮演的角色)变成原因和目的,总之,变成被感知的存在的存在理由。 271

“主人,以深情的眼神,回首时
抚慰了乐园中不安的美人
最终的颤抖,只通过她的嗓音,
为了玫瑰和百合,唤醒一个名字的神秘”。^①

趣味是命定之爱(amor fati)的典型形式。习性引起某些表象和实践,这些表象和实践总是比表面看来更符合它们成为其产物的客观条件。像马克思那样说“小资产者无法超越其头脑的局限性”(其他人会说其智力的局限性),这就是说他的思想与他的状况具有相同的局限性,他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他两次,一次通过

^① 法国诗人马拉美的诗句,参见 Mallarmé, *Toast funèbre, Œuvres complètes*, Gallimard, 1945。——译者

它为他的实践规定的物质局限性，一次是通过它为他的思想进而为他的实践规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使他接受甚至喜爱这些局限性。¹⁹ 于是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觉悟固有的作用：阐明已知条件，会要求并导致对于这个已知条件的直接赞同之悬置，这种悬置可能导致对可能的关系的认识与对这些关系的认可分离，于是命定之爱可能反过来变成命定之恨(odium fati)。

象征斗争

鉴于主观主义幻想将社会空间还原为互动的现状空间也就是抽象情境的一种中断的连续，²⁰ 如果为了摆脱主观主义幻想，应该如我们所做的那样，构建作为客观空间的社会空间，即客观关系的结构——这个结构决定了互动可能采取的形式和那些投身互动的
272 人可能对互动形成的表象，那么还应该超越一种临时的客观主义，后者将社会事实当成物，将它所描述的东西静止化：社会位置作为一种静止的状态下互相外在的(partes extra partes)并列位置呈现在观察者面前，提出了占据这些位置的群体之间的界限这个全

¹⁹ 应该收集这类层出不穷的怨恨话，人们通过这类话力求满足于他们所拥有的（比如这句狡黠的话：“你说，他们得花多少钱才能紧挨海边租一幢别墅”）。

²⁰ 情境概念是互动论错误的核心，这个概念致使把公开地被构成的和被保证的若干位置之间关系的客观的和持久的结构，还原为在互动中实现的有限的、局部的、不稳定的状况（如同在陌生人的偶然相遇中）以及往往人为的状况（如同在社会心理学的实验中），但客观的和持久的结构构成了整个真正的互动：互动的个人将他们的全部属性带到最依赖形势的互动中，而且在社会结构（或在一个场）中的相对位置支配着在互动中的位置（关于“情境”与场或市场之间的对立，参见 P. Bourdieu,《L'économie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 *Langue française*, 34, mai 1977, pp. 17-34）。

然理论的问题,而这些位置也不可避免地是各种策略化的定位,即需要在一个斗争的场中维护的和取得的地位。

应该警惕(在空间图表中得到实现和加强的)客观主义倾向,因为它旨在将这个空间切割成在唯一一个方面一劳永逸地被确定的并由明确勾勒的界限划定范围的若干区域: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企业主的状况,以及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中产阶级新阶层即小资产阶级代表的这个相对不确定地点的非常不确定的区域的状况,统计学的一般分类迫使我们建构的每个位置阶级,本身都能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发挥作用,只要用更严格地确定的职位代替统计学积累的必然所规定的相对抽象的等级,就可以看到竞争关系的网络显示出来,能力的冲突在这个网络中产生——比如针对赋予合法从业权利的学历的冲突和针对从业的合法手段的冲突,这些冲突使具备不同的合法学历的行动者如医生、麻醉师、护士、运动疗法医士和江湖医生互相对立(这个空间中的每一个都作为一个斗争的场发挥作用),甚或还有大部分刚刚创立的职业之间的冲突,这些职业提供了“社会”管理人员(女社会福利员、家庭和社会经济顾问、监护代表、家庭女工等)或教育机构人员(特殊教育者、自学教育的教育者等)、文化机构人员(辅导员、成人培训者等)或医学-心理学机构人员(家庭生活顾问、保姆、运动疗法医士等),这些职业的共同点是,只在使它们互相对立的竞争中并通过这种竞争确定自身,只在对立的策略中确定自身,它们力求通过这些策略改变法定秩序,从而在这种秩序中获得一个被认可的地位。

这样提出的空间模式的局限性,不只来自被利用的(和可利用的)数据的性质,尤其来自实践上的不可能性,即我们在实践上不可能把结构的行为作为某些个人或某些群体把持的经济权力甚或作为与这种权力相关的数不清的间接或隐藏的利益纳入分析。如果说大部分从事经验研究的人往往倾向于暗中或明确地接受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将阶级还原为被等级化却不互相对立的简单阶层,这尤其是因为他们的实践逻辑本身致使他们忽视了客观上被纳入整个分配的东西:统计学意义上的但也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分配,作为在从前斗争中获得的并能够投入到以后斗争中的东西在

273 一个固定时刻的总结,表现了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的一种状况,或者更确切地说,表现了为占有稀有财产和获得利益分配或再分配的特有政治权力而进行斗争的一种状况。这就是说,用分层话语描述社会世界的理论与谈论阶级斗争的理论之间的对立,符合领会社会世界的两种方式,尽管这两种方式在实践上是很难调和的,在原则上却丝毫不互相排斥:如果说“经验论者”似乎注定要采取第一种方式,而第二种方式似乎是“理论家”的事情,这是因为描述的或解释的调查,只能将阶级或阶层表现为在个体之间分配的一系列特定属性,这种调查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事后(或事先)状况而且必然忽略斗争,而这种分配是斗争的产物。当统计学家忘记了这一点,即他处理的所有属性,他予以分类和衡量的所有属性,但还有他用以分类和衡量的所有属性,都是阶级之间斗争的武器和赌注,统计学家就倾向于从一个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中抽象出这个阶级来,而这种关系不仅是赋予属性以区分价值的对立

关系,而且是作为分配根源的权力关系和为了权力的斗争关系。如同拍摄一局弹子球赛或牌戏要在一个固定时刻建立一个弹子球或筹码的资产负债表一样,调查也设定了一个斗争时刻,在这场斗争中,行动者时时刻刻都在动用作为武器和作为投资的资本,他们在从前的斗争阶段获得了这种资本,这种资本可能意味着对斗争本身及由此对他人把持的资本的一种权力。阶级关系的结构是人们通过一种共时切割来设定阶级斗争场的一种或多或少稳定的状态而获得的东西:个人能够投入到这场斗争中的相对力量,或换句话说,不同类型的资本在被考察时刻的分配,决定了这个场的结构;但是反过来,个人拥有的力量则取决于为了斗争赌注的定义而进行斗争的状况。合法的斗争工具和赌注的定义其实构成了斗争的赌注,而使有可能支配游戏的工具(各种类型的资本)的相对有效性本身也被牵涉其中,因而这种有效性服从于按照游戏过程而产生的变化。因此,正如我们不断强调的(哪怕所谓的强调),我们为了解释实践的某些特征被迫构造的“资本总量”概念,不过是一个理论赝品,而且可能产生非常危险的作用,假如我们忘记了为构造这个概念我们不得不进行的一切抽象活动,而且首先忘记了这个事实,即一种资本转化为另一种资本的比率时时刻刻都是斗争的一个赌注因而有可能不断产生变化。²⁷⁴

作为一系列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配置符合一种阶级状况,也符合一个在关系方面被确定的位置,一个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因此配置总是参照与其他位置相关的配置,至少在客观上如此。这就是说,阶级“道德”与“美学”适合拥有某种生存条件的一个特定阶

级,而与必然的距离体现了这种生存条件的特点,因此阶级“道德”与“美学”按照平庸或高雅程度的标准密不可分地互相依存,而且这种“道德”与“美学”产生的所有“选择”都自动与一个区分性的位置相关,因而具备区分的价值。这一切根本不涉及任何区分的意图,不涉及任何对差别的明确追求;尽管严格意义上的有意识的策略导致与直观上低级的——或被认为这样的——被当成陪衬角色的群体区分开来,并与直观上高级的——或被认为这样的——因此被当成合法生活风格的把持者的群体认同,这些策略不过通过有意识的强化,为稀有与普通、新鲜与过时的辩证法的自动的和无意识的作用提供了一种充分的有效性,这种辩证法被纳入条件和配置的客观差异之中。其实,即便小资产阶级对严格的一切宣扬,对整洁、简朴和仔细的一切称颂,丝毫未受到有意识地与民众的宽容主义保持距离的想法的启发,也包含了与词或物上的肮脏、与暴饮暴食或与缺乏远见的一种暗中对照;而资产阶级对自如或谨慎、对超脱或无私的要求,无需服从一种对区分的有意寻求,就包含了对“狭隘的”或“大吹大擂的”、“傲慢的”或“奴颜婢膝的”、“没有文化的”或“学究气的”小资产阶级或多或少表现出的“自命不凡”的一种暗中揭露;每个群体都倾向于在索绪尔意义上构成其价值的东西中,也就是在最终的差别中,辨认其特有的价值,这最终的差别也往往是在为群体本身定义的结构的和生成的差距中最终获得的。民众阶级限于“首要必然”的财产和功用,要求整洁和舒适,在这方面,已经摆脱急需的中产阶级,希望有一个温暖的、私密的、舒

适的或精心布置的室内环境或一件时髦的和别出心裁的衣服。²¹ 特权阶级将这些价值打发到次要地位,因为这些价值很久以来就为他们所获得因而在他们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这些价值获得了被社会认可为美学的意图,比如对和谐和结构的追求,它们无法将自身的卓越与某些不再被希求的也就是说变得普通的属性、实践或“功用”等同起来,它们无法再这样,是因为如果它们保留这些惯用价值,就会丧失它们的区分价值。 275

如同表现用于描述理想的室内装饰的形容词按照阶层发生变化的矩形统计图所展示的(除了当中的三个形容词——传统的、仔细的和简朴的,它们的意义显得比较模糊),强调特有的美学(混合搭配的、充满奇思妙想的、和谐的)属性的选择比例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而增加,与此同时,人们所说的“功能主义的”(整齐和干净、实用和容易保养)选择数量在减少。我们看到的矩形统计图的持续变形实际上指向相对地无从比较的三项,即升至工业家和大商人的小商人,升至中学教师的小学教师,升至艺术生产者的文化中间人。²²

²¹ 小资产阶级在这里仍旧由于非常频繁地选择形容词而与众不同,这些形容词非常清楚地宣告了区分的意图,即在涉及室内装饰时讲究“混合搭配”及在衣着方面崇尚“优雅和高贵”。同样,半奢侈品商店(圣安托万郊区)在广告中公开给出奢侈品商店(圣-奥诺雷郊区)仅限于(通过对艺术的参照)暗示的“价值”,因此授人以柄,被人谴责“庸俗”即有意追求“效果”：“克洛德装饰(圣安托万郊区的店铺)的家具具有这种‘说不出的东西’,它是优雅和高贵的精神。”

²² 在被拒绝的形容词方面,逻辑是一样的:民众阶级从不拒绝整齐和干净、容易打理或实用。而在中产阶级的层次,稳固的阶层(办公室职员、中等行政管理者、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明确拒绝奇思异想胜过传统,新小资产阶级则相反(除了艺术工匠),他们像统治阶级的大部分阶层(尤其是教授和自由职业者)一样,拒绝传统往往胜过奇思异想。

388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276

工人

手工业者
小商人

办公室职员
中等行政管理者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干净、整洁

容易打理

实用

私密

舒适

热烈

和谐

充满奇思异想

混合搭配

干净、整洁

容易打理

实用

私密

舒适

热烈

和谐

充满奇思异想

混合搭配

干净、整洁

容易打理

实用

私密

舒适

热烈

和谐

充满奇思异想

混合搭配

小学教师
技师

中等商业管理者
秘书

医疗服务人员
文化中间人
手工业者

277

图 10 室内装饰的品质



因此趣味遵守一种普遍化的恩格尔定律：在每个分布层次上，对先前的或低级的层次的占据者而言是稀有的并构成一种无法企及的奢侈或一种荒诞的奇思异想的东西，由于更稀有的和更特别的新消费的出现变成一般的和普遍的，并被打发到自然而然的范围内；这一点，仍旧无需任何有意识地寻求区分的和卓越的稀有性。²³ 投资意识引导着这种提前的、预先的、先锋的回避，放弃过时的或不过是贬值的对象、场所、实践，转向常新的对象，这种回避为充高雅(snobisme)下定义并适用于所有领域：体育运动抑或饮食、度假地点抑或饭馆，以无数的不同标志和信息为指导，从明确的警告(“圣-特罗佩——或里昂火车站的餐厅或其他无论什么地方——不能去”)到几乎有意识的强调，这些强调作为对普及或拥挤的体验，不知不觉中倾向于对变得常见的对象和实践产生厌恶和反感(绘画或音乐方面的趣味往往因循这类途径并不是偶然的，除了复古和恢复名誉之外，这类途径通过传记重建历史)。追求卓越并不需要如是表现和显示自己，而且一种资产阶级教育灌输的所有——对噪音、接触等的——的无法容忍，往往足以引起地域或对象的变化，这些变化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娱乐中，都趋向在一个确定时刻最稀有的对象、场所和实践。被视为卓越的人拥有不必考虑他们是否卓越的特权：他们在这方面可以信任为他们提供

278

²³ “涓滴效应”模式固有的错误在于这个事实，即把事实上是消费者的条件和配置的差别与生产场的差别的一种客观的和自动的效应的东西，约简为对区别的一种有意追求，无论这种效应是否被有意强化(cf. B. Barber and L. S. Lobel, *Fashion in Women's Clothes and the American Social System*, *Social Forces*, XXXI, 1952, pp. 124-131; L. A. Fallers, *A Note on the Trickle Effec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18, 1954, pp. 314-321).

卓越属性的客观机制并使他们远离一切“平常”东西的“区分意识”。小资产阶级或新兴小资产阶级“做得过分”，因而泄露了他们的不安全感，资产阶级的高雅恰恰在此通过一种谨慎、朴素和低调的炫耀，一种对一切“刺眼”、“卖弄”和“自负”的东西的拒绝而显示出来；那些“刺眼”、“卖弄”和“自负”的东西，正是通过区分意图贬低了自己的身价，因为区分的意图是“平庸”的最令人厌恶的形式之一，与人们所说的自然的优雅和卓越，即不刻意追求优雅的优雅、非有意表现卓越的卓越截然相反。²⁴

为了获得经济或文化财产而进行的斗争也必然是象征斗争。象征斗争是为了占有这些区分符号，即被划分等级的和能够划分等级的财产或实践，或为了维护或颠覆这些区分属性的分类原则。
 279 因此，生活风格的空间，也就是各种属性的空间，本身不过是在象征斗争的一个固定时刻的一种状况，社会空间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无论有无区分意图，都借助这些特征互相区别，而象征斗争的赌注是推行合法的生活风格，象征斗争在为垄断“等级”标志即奢侈财产、合法的文化财产或占有这些财产的合法方式而进行的斗争中得到了一种典型的实现。文化财产在场中通过提供区分的利益得以生产、再生产和流通，这个场的动力在一些策略中找到了其根源，这些财产的稀有性和对它们价值的信仰在这些

²⁴ 被问到去“丈夫的老板家中”吃晚饭如何穿戴时，33%的中等管理者或职员妻子(32%的工人妻子、29%的农业劳动者的妻子)说她们穿“自己最好的衣服”，与仅19%的工业家或大商人或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的妻子相对，后者中的81%说她们会换衣服“但不会盛装出席”，与做此选择的67%的中等管理者的妻子和68%的工人或农业劳动者妻子相对(S. C., XLII)。

策略中产生,这些策略通过使得文化产品对立的竞争本身促进这些客观作用的实现:“区分”甚或“等级”,即合法的表现,只通过为专门占有区分符号而进行的斗争存在,区分符号造就了“自然的区分”。

文化是一种赌注,它如同所有社会赌注一样,既假定又要求人们进入游戏,被游戏抓住;没有对文化的兴趣,就没有竞赛,没有比赛,没有竞争,这种兴趣正是由游戏产生的竞赛和比赛产生的。文化的价值乃偶像中的偶像,它产生于原始投资,进入游戏、进入对游戏价值的集体信仰的行为本身包含着原始投资,这种集体信仰制造了游戏,为了赌注的竞争不断地重新制造这种集体信仰。“真货”与“赝品”、“真正的”文化与“普及”文化之间的对立,通过创立对赌注的绝对价值的信仰创立游戏,掩盖了一种同样必不可少的幻象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同谋,而这种幻象乃对游戏和文化赌注的基本认可:高雅与自命不凡、高等文化与中等文化——如同在别处高级时装与服装、高级美容与理发,依此类推——不过互相依存,它们之间的关系甚或它们的生产机器和它们各自自主顾的客观合作,产生了文化价值和将这种价值据为已有的需要。因此,在这些客观上成为同谋的对手之间的斗争中,产生了文化的价值,或者,同样地,产生了对文化价值的信仰、对文化的兴趣和文化的利益——这一切并非理所当然,尽管让人相信欲望的先天性和游戏的快乐是游戏的作用之一。野蛮,就是询问文化有何用;就是承认以下这个假定,即文化可能不具备内在的利益,对文化的兴趣不是一种不平等分配的、好像为了将不文明的人与有天赋的人分开的自然属性,而是一个单纯的社会赝品,一种特别的和特别受到赞同

280 的拜物教形式；就是提出因为不提供任何固有的利益（比如任何可感的快乐）就被说成无关利害的活动的利益问题，而且就是由此引入无关利害的利益问题。

因此，斗争本身产生了能够消除斗争的存在本身的作用。如果我们可以不加区别地以哈布瓦赫^①惯用的“与文化价值中心的距离”的话语或冲突的话语来表达不同社会阶级与文化保持的关系，这是因为阶级之间的象征斗争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这样显示和形成并且注定要采取有助于再生产差距的竞赛斗争形式，而差距就是比赛的根源。普鲁东通过对艺术家的颓废和放荡生活风格的小资产阶级式厌恶，通过马克思说他的“正直的愤怒”（*ira hominis probi*），得到了勇气，揭露小资产阶级对艺术形成的矛盾的甚或双重的表象下被隐藏、被压抑的一面，如果我们将普鲁东除外，实际上没什么对艺术和文化的质疑能够导致对文化游戏的一种真正客观化，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被统治阶级的成员和他们的代言人无法不强烈地感到自己在文化上是无资格的。²⁵

被统治阶级只是以被动的标志或陪衬物的身份加入为了占有区分属性而进行的象征斗争中，尤其是加入为了给值得占有的属

①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法国社会学家，属于涂尔干学派，但也受到柏格森的影响，他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主要著作有《自杀的原因》（1930）、《集体记忆》（1950）等。——译者

²⁵ 没什么比某些艺术家采取的对艺术的艺术质疑（参见 P. Bourdieu, *La production de la croyance, loc. cit.*）或以反文化的名义被聚集在一起的活动更远离这样一种客观化了，这些活动只能使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对立，一种在相对自主的文化生产和传播场中被统治的文化（但并不是被统治者的文化）与一种统治的文化对立，因此它们扮演了注定要永恒的文化先锋角色，这个角色通过其存在本身，支持了文化游戏的运作。

性和合法的占有方式定义的象征斗争中,而区分属性将其外观赋予不同的生活风格。文化在这种状况下通过反对自然建立起来,自然不过是一切“人民的”、“民众的”、“通俗的”、“一般的”东西。因此,想要“发达”的人应该达到经过一种真正的本性变化的、严格人类意义上的人为之定义的一切[这是谈论变种(*metabasis eis allo genos*)的最好时机],即“社会提升”,这种社会提升被当成一种本体论的提升,或者,不如说,被当成一个教化的过程(雨果在某处谈到了“艺术的教化力量”),是从自然向文化、从兽性到人性的一个飞跃;但它也带来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文化的核心,它注
281
定要过去的人和他的语言、身体、爱好以及与这个人相连的一切,如起源(*genos*)、出身、父亲、同辈,有时甚至是母语,产生羞愧、恐惧甚至怨恨,他被一条比所有的禁忌都要绝对的界线与这一切分开了。

一些斗争的赌注是在社会世界中属于信仰、威信和丧失威信、认识和评价、认识和认可之范畴内的一切,名字、名声、威信、荣誉、功绩、权威,这一切造成了作为被认可的权力的象征权力,这些斗争从来只涉及“高雅”的持有者和“自命不凡的”覬覦者。对高雅的认可,表现在为把高雅据为己有而付出的努力中,哪怕是以吹嘘或模仿的虚幻形式,目的是为了与那些不具备高雅特征的人划清界限。作为对高雅的认可,覬覦支配着之前最高雅的属性之获取,这种获取本身也正在变得平庸,由此覬覦有助于持续地支持象征财产市场的紧张程度,迫使受到传播和普及威胁的高雅属性的持有

者无限度地在新属性中寻找其稀缺性的证明。²⁶ 不断地在这种辩证法中产生的需求在本质上是无穷无尽的,因为构成这种需求的被统治者的需要无限地相对于一种区分重新为自己定义,而这种区分总是从否定方面相对于被统治者为自己定义。

关于存在和表现、关于象征表现的象征斗争的基础和赌注是相对于象征表现固有的逻辑提供的条件之自由的程度。得体或不得体的意识几乎与古老的奢侈法则一样严格,它赋予不同的条件以象征表现(“他把自己当谁了?”),将真正的“优雅”与单纯的“装腔作势”分开,“优雅”由随和、轻松和随便构成,而“装腔作势”则由于有故意和假装进而篡夺之嫌疑而被贬低。所有这类社会配置不胜枚举,这类社会配置力求调节表现与存在的关系,从针对非法穿制服或佩带勋章和各种形式的篡夺身份的法律,到最温和的压制形式,这些压制的形式力求让某些人回到现实,现状意义上的现实,限制意义上的现实,这些人炫耀与高于本人的一种条件相关的外在财富标志,显示出他们“自以为”有别于他们的所是即自命不凡的觊觎者,但他们通过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表情,他们自己拥有的和他们愿意给人的“外表”,泄漏了一种表象,这种表象与他人对

²⁶ 尼采毫不掩饰的精英主义与生产文化价值的信仰的机制的科学真理相距不远:“你们习惯说没有人渴望文化,因为人们知道真正有文化的人最终而且只能令人不可置信地属于少数;但这一小部分真正有文化的人之所以可能存在,只是因为大众实际上是违反其本性并单单由诱人的幻想支配,才投身于文化,因此人们丝毫不该公开表现真正有文化的人与庞大的文化机器之间的这种可笑的不均衡;文化的真正秘密在这里:数不清的人为获得文化而斗争,为文化而劳动,表面上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但实际上仅仅是为了允许少数人的存在”(F. Nietzsche, *Sur l'avenir de no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Paris, Gallimard, 1973, pp. 41-42)。

他们形成的表象的真实性过分不相符,但他们需要根据这种表象调整自己的表象(“改变想法”)。²⁷ 这并不意味着覬覦的策略事先就失败了。合法性的最可靠标志就是合法性表现出来的自信,这种自信如人们所说的,是“制造假象”,而吹嘘若能成功,并首先在吹嘘者本人身上成功,是因为吹嘘就是一种逃避条件之局限性的独有方式之一,它利用象征性的相对自主(也就是提供表象和认识表象的能力),强加一种通常与高级条件相关的自我表象并对这种表象予以赞同和认可——赞同和认可把这种表象变成一种合法的、客观的表象。如果说应该避免接受把社会世界看成表象与意志的互动论的——和典型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那么把行动者对社会现实形成的表象从这种现实中排除出去,也是荒谬的:其实,社会世界的现实部分地在斗争中起作用,斗争使行动者由于他们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的表象和由此而来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表象而互相对立。

正如在食物上和衣服上的花费以及更普遍地在物质上和表象上的花费之间的关系的倒置所证明的,按照我们从工人阶级到小资产阶级的考察,中产阶级与象征性有关。他们对表现的重视,可以通过有时伪装成傲慢的痛苦意识(就是小资产阶级别墅“对我足

²⁷ 与自己身体的关系是早期和反复接触典型环境所产生的作用的最明显迹象之一。这些典型环境对于不同的阶级具有非常不均等的可能性,这种与自己身体的关系表现在某种行为举止的方式上,如那个自感有权如此表现的人的自信、自然的轻松和感召力(“他能够让自己这么做”)上,或那个让人怀疑其合法性的人的窘迫或傲慢上,这个人的合法性之所以受到怀疑,是因为他急于确认他的合法性,这暴露出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具备这种合法性,因此这种与自己身体的关系无疑是最有力的社会标志之一并因此是策略操纵的一个优先对象,那个想让人上当的人的被迫的或假装的自如,总有可能遭到那些不会受骗的认清真相的人的讽刺。

够了”、“让我高兴”这类说法)的方式来体会,这种重视也是他们的
283 觊觎的根源,觊觎即这种吹嘘或篡夺社会身份的永久配置,这种配置旨在以表现超过存在,旨在将外表据为己有以拥有现实,将名义上的据为己有以拥有真实的,旨在尽力通过改变在分类中的地位和分类原则的表象来改变在客观分类中的位置。小资产者被迫卷入一种客观上被统治的状况与意图上和意愿上对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赞同之间的所有冲突,因此小资产者被他向他人展示的外表和他人对他的外表的评价所困扰。由于担心做得不够,他只好做得过分,在他展示或让人注意他是什么人的这种想法中,泄漏了他对自身存在的踌躇和忧虑,因此他注定要被无论是民众阶级还是特权阶级的成员看作外表上的人,这个人被他人的目光困扰,不断地致力于在他人眼中“提高自己的身价”(“炫耀”,“刺眼”)。民众阶级则没有这种为了他人存在的忧虑,而特权阶级的成员则确信他们的存在,可能并不关心他们的外表。小资产者与外表密切相关,他展示外表是为了完成其功能,也就是扮演他的角色,让人相信并让人上当,博得信任或尊敬并将他的社会人格即他的“表现”、他的表象,当成他推销的产品或服务的保证(这是售货员、商务代表、空中小姐等的状况),但也是为了显示他的自命不凡和他的要求、推动他的利益和他的上升计划,所以他倾向于对社会世界持一种贝克莱式的观念,于是社会世界被还原为一个剧场,在这个剧场中,存在从来只是一个被感知的存在甚或一种(戏剧)表演的(精神)表象。²⁸

²⁸ 我试图在这里指出,戈夫曼对社会世界的观念就是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构建的,这种观念乃一种社会边际主义,它将社会范畴内的现实还原为若干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向他们呈现的(戏剧)表现形成的(主观)表象的总和。

他在社会结构中的暧昧位置,有时被阶级之间的被操纵的操纵者、被欺骗的骗子——这往往是他的轨迹——的所有中间功能所固有的暧昧强化了,这种暧昧将他引向第二的、次要的、幕后的、配角的、附属的、补充的、代理人的、替代者的地位,他被剥夺了与被认可的地位和正式授权相关的象征利益,而象征利益造成了合法的欺骗(而且他完全有资格怀疑这种合法欺骗的真正依据),一切都使他倾向于按照外表和现实的范畴看待社会世界,他自己越是想让他人改变看法,他就越倾向于对操纵和欺骗进行一种怀疑的怨恨的关注。²⁹ 284

但是象征斗争的特定场所就是统治阶级本身:使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互相对立的、为合法文化的定义而进行的斗争,不过是持续斗争的一个特征,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在持续斗争中互相冲突,是为了规定社会斗争的合法赌注和合法武器的定义,或者不如说,是为了合法统治的原则即经济资本、学校教育资本或社会资本这些社会权力的定义,这些权力的特定有效性可能被特有的象征有效性所强化,也就是被集体信仰承认、委托这个事实提供的权威所强化。使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被统治阶层也构成了被一些斗争划分的场,这些斗争是按照与统治阶级总体上的结构相似的一个结构组织起来的)互相对立的斗争,倾向于在其由被统治阶层发起和支配的观念转译中,按照与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建立的对立大致重叠的对立组织起来:一方面,是自

²⁹ 由于自命不凡的覬覦者的根本矛盾心绪导致服从和攻击交替出现,也由于这种矛盾心绪总有受到侮辱的危险,他与自信的持有者之间的关系便充满了情感的紧张并产生怨恨。

由、无关利害、升华了的趣味的“纯粹性”、来世的拯救等等，另一方面，是必然、利益、物质满足的低级、尘世的拯救。由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为反对“资产阶级”而采用的所有策略，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在一切明确的意图之外并按照这些策略在其中产生的空间的结构，具有双重作用并且不加区别地反对服从物质利益的所有形式，无论是民众的形式还是资产阶级的形式：“我把任何思想低下的人都叫作资产者”。这种基本的多元决定使“资产者”能够非常容易地在艺术家为反对他们而产生的艺术中找到一个证明他们的卓越的机会，当他们试图表明，相对于被统治阶级，他们处于“无关利害”、“自由”、“纯粹”、“灵魂”一边时，他们拿为了对抗他们而铸造的武器对其他阶级反戈一击。

我们看到，占统治地位的艺术和生活艺术在相同的基本区分上达成一致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区分的共同原则都是强加给普通人的粗暴的和严酷的必然与作为远离必然的证明之奢侈或作为有意实行的限制之苦行之间的对立，奢侈和苦行乃否定自然、需求、
285 欲望、愿望的两种对立方式；是从反面提醒人们日常生活的穷困的这种恣意浪费与无动机消费这种炫耀性自由或有选择的限制这种苦行之间的对立；是耽于直接而简单的满足与节约财富之间的对立，节约财富乃对财富之占有与被占有之财富相称的证明。自如之所以如此普遍地受到赞同，是因为自如表现了相对于支配普通人之局限性的自由的最明显确认，表现了资本或权威的最不容置疑的证明，资本乃满足被纳入生物的和社会的本性中的要求的能力，而权威准许忽略这些要求：因此在语言方面的自如要么体现在某些成功上——这些成功旨在超越被严格意义上的语法或语用学

限制所要求的東西，比如製造自由聯誼或以罕見的詞語和比喻代替普通的措辭或詞語——，要么體現在相對於語言的或情境的要求的自由上，而這種自由體現在法定的隨意或放縱中。這些對立的策略可以超越強加給普通說話者的規則和禮節，但它們絲毫不互相排斥的：炫耀自由的兩種形式，即不斷增加要求和有意違反，能夠在不同的說話時刻和層次中共存，比如在詞彙範疇內的“鬆弛”可能被在句法或語調上的一種額外的緊張所抵消，反之亦然（這一點在屈尊的策略中看得非常清楚，在這類策略中，這樣被保持的語言層次之間的差距本身在象徵範疇內體現了一種距離的雙重遊戲，這種距離恰恰在它被否定的外表之下得到了確認）。這樣的策略——可能是完全無意識的，由此更加有效——不可避免地構成了對自以為是的覬覦者的多餘矯正策略的有力反擊，他們注定總是做得過度或不足，因此被迫對規則和遵守規則的合法方式提出焦慮的疑問，並且被這個本身就是自如的對立面的反思性回顧弄得筋疲力盡，他們簡直不知如何是好。如同人們所說的，那個“有可能”處於對學究或語法學家完全有效的規則之外的人——人們知道學究或語法學家絲毫不傾向於將這些與規則的遊戲納入語言遊戲的规范化之中——作為提出規則的人也就是作為趣味製造者即優雅的仲裁人出現，對優雅的違抗本身不是錯誤，而是一種新時尚、一種新的表達或行動方式的開端或預告，這種方式注定要作為規範推行因而要變成模態的、一般的並且轉化成規則，由此會引起來自某些人的新違抗，這些違人拒絕被歸入時尚之列，拒絕融于、混入由最無法分類的、最不突出的、最常見的、最沒有特色的、286 最不優雅的屬性確定的階級中。這就是順便說明，我們要反對所

有达尔文主义的天真信心,原因在于(以社会学为依据的)“自然区分”的幻想基本上依靠统治者掌握的、通过他们的存在本身强加一种关于卓越的定义的权力,而这种定义不过是他们自身的存在方式,因此注定要表现得既是有区别的、不同的,因而是随意的(因为这种方式不过是诸种方式之中的一种),又是完全必然的、绝对的、自然的。

“自然的随意”意义上的自如不过是“保证一种安乐生活的财产状况”意义上的自如:这是一个自我毁灭的主张,因为也许不需要强调它只是它的所是,如果它确实不是也构成其真理的别的东西。客观主义的错误在于未将这个客体的表象纳入客体的完整定义之中,它为了获得“客观的定义”只好摧毁了这种表象;客观主义的错误在于忘记了应该使得对于把握社会事实的客观真理必不可少的还原得到一种最终的还原,社会事实即客体,它们的存在也体现在它们被感知的存在中。³⁰ 应该将人们摧毁的东西重新引到自如的一个完整定义中,与此同时强调自如就像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一样,需要一定的富有(或反之,强调窘迫来自困窘),也就是说,需要那些只要成为他们的所是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应是的人,通过他们的存在实现的强制作用。这种完美的契合就是自如本身的定义,这个定义反过来证明了存在与应在之间的契合以及这种契合包含的自我肯定的力量。

³⁰ 涂尔干的名言,“应该把社会事实看作物”,包含了对其自身的否定:我们注意到,如果一般认识——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事实并且也有助于制造社会事实——对待社会事实一直如同科学要求人们对待社会事实那样,那么就没有必要不断宣称这一方法论原则了。

与随意和各种形式的与自身疏远相关的价值,来自这个事实,即与自身的疏远和觊觎者焦虑的紧张相反,既证明了一种强大的(语言或其他)资本的拥有也证明了相对于这种拥有的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对必然有支配权的一种附带肯定,而觊觎者对他们所拥有的感到紧张并总是对他们自己 and 他人疑虑重重,即便在他们傲慢时也是如此。言语的雄辩或艺术作品的物质消费和象征消费意味着的时间或金钱的无偿付出,甚或在次要程度上,造成“富人的苦行”(马克思说到塞内加时用的词)的有意为之的限制和节制与成为所有“纯粹”美学的根源的拒绝取巧,这些都是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的这种变种的多次重复——有产者通过这种辩证法证明他们对自己财产的占有,由此增加了他们与被剥夺财产者的距离,后者不甘心服从各种形式的必然,仍有被占有欲占有的嫌疑,因此也被他们没有或尚未拥有的财产潜在地占有。³¹

³¹ 漠然的贵族主义无疑是对“消费社会”的众多谴责的根源,但这些谴责忘记了对消费的谴责本身就是消费者的一种观念。

第三部分

等级趣味与生活风格

“我们的自尊心对别人谴责我们的趣味之难以忍受，超过对别人谴责我们的观点之难以忍受。”

——拉罗什富科：《箴言录》

290 为了让对生活风格的描述具有它应该具有的经验证明的价值，应该回到调查本身并将一种方法所表现的共同性与人们从区分原则出发构建的共同性进行对照，因为具有相同的条件和制约因而具有统一的习性，并由此具有统一的实践的高贵阶级是按照区分原则确定自己的。而这种方法似乎恰好适于同时（*tota simul*）把握收集到的全部观察结果，并在不规定任何前提的情况下从这些结果中得出内在的结构，这种方法就是对应关系分析。这样的做法在反方向上再现共同认识（*perception commune*）产生的变

化,当共同认识把被社会构造的认识和评价模式用于行动者的实践和属性时,它把这些实践和属性变成了可区分的生活风格,共同认识在这些风格中大致可辨别出社会条件。¹

如同亚里士多德所教诲的,正是因为身体共有一种颜色,我们才能看到某些身体的颜色与其他身体的颜色不同,不同的事物之所以互相区别是因为它们相似,同样地,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之所以互相区分,恰恰由于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上的阶级,也就是由于成为他们权威之根源的资本种类并由于与之关联的卓尔不群和显示高雅的不同方式。

1 我们仅限于调查所收集的数据,就像语言学家一样,后者满足于由一系列有限的启动装置引起的有限的语句素材,而不是随意从实际上完成或语法上可能的语句的无限空间中无限取材,于是我们放弃了说明每种生活风格的无限丰富性的可能性。但仍然存在着一种纯粹理论上的可能性,因为,若不是这样,我们会受到博尔赫斯提到的跟国家一样大的地图的实证主义诱惑,我们会通过一种本身漫长的——若不是没完没了的——写作劳动,寻找最能够说明某些特征的语言,这些特征就像微分包含曲线一样,凝聚了一个实践的空间。为了避免参照仅在调查中使用的指标的单调,我们本来可以每次都用不同的对等物代替实际上给出的作品或作者(比如用《哥德堡变奏曲》或《安娜·玛格达莱娜·巴赫的笔记簿》代替《平均律古钢琴曲集》,或者在歌曲方面,用雷贾尼*、费拉·巴尔巴拉或格雷科代替布雷尔和杜埃,或用马塞尔·阿蒙**、阿达莫或米雷耶·马蒂厄代替阿兹纳武尔)。尽管趣味的逻辑不断地在从社会标志出发隐约领会到的对等的阶级内部实施这样的替换,我们还是放弃了这个毕竟完全符合趣味逻辑的过程,这是因为对等的阶级的性质本身依靠被运用的分类系统,而且在这个人只看到“高雅音乐”等级的可互换因素的地方,那个人则拒绝(因作曲家、创作时间、形式和风格的一致性而)看起来最正当的替换。

* 雷贾尼(Serge Reggiani, 1922-2007), 法国演员、歌手。——译者

** 马塞尔·阿蒙(Marcel Amont, 1929-), 法国歌手、演员,他的演唱事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顶峰。——译者

根据从拉波波尔^①借鉴而来的一个例子，人们可以谈论云彩或森林，尽管在两种情况下，树木和水滴的密度是一个持续的功能，而且明确的界线并不存在，那么同样地，人们可以谈论阶层，尽管无论在何处都不可能划出一条这样的界线，也就是人们无法在这条线的一边或另一边找到一个人，这个人拥有界线一边的所有最常见属性而丝毫没有另一边的最常见属性。其实，在这个连续性空间中，构建和观察活动最终将（相对）一致的个体集合分离出来，因为在统计学和社会逻辑学上不同程度地互相联系的属性集合，或者，不如说，被差别系统分开的群体，显示了这些个体集合的特征。

^① 拉波波尔(Anatol Rapoport, 1911-2007), 俄裔美国数学心理学家, 在一般系统理论、数学生物学理论、社会互动数学模型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译者

第五章 区分的意识

如果如我们试图证实的,统治阶级构成一个相对自主的空间,²⁹³这个空间的结构由其成员之间的不同种类的资本分布得到确定,这种分布的某种概况说明了每个阶层固有的特点,某种生活风格通过习性与这种概况对应;如果阶层之间的经济资本分布和文化资本分布表现出对称的和倒置的结构;如果不同的财产结构与社会轨迹一起成为习性和习性在所有实践领域产生的有系统选择的根源,而被公认为审美的选择是这些有系统选择的一个维度;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应该在生活风格的空间中,也就是在这些不同的属性系统中重新发现这些结构,不同的配置系统表现在属性系统之中。¹ 这就是我们对收集的全部数据进行对应分析试图确定的东西。²

首先,经过对图的一种有系统的解读,我们对统治阶级的 ²⁹⁴

¹ 这里呈现的对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的分析,仅保留了目前的一系列研究(其中某些研究已经单独发表)中对解释生活风格方面的基本差别必不可少的东西。

² 关于分析方法,见 L. Lebart, A. Morineau et N. Tabard, *Techniques de la description statistique. Méthodes et logiciels pour l'analyse des grands tableaux*, Paris, Dunod, 1977; 关于理论基础和应用的逻辑条件,见 J. Benzécri, *L'analyse des données. Leçons sur l'analyse factorielle et la reconnaissance des formes et travaux du Laboratoire de statistiqu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VI*, Paris, Dunod, 1973, 2 vol. 。

成员(n=467)为不同系列的问题(参见附录1,问卷)提供的答案进行分析,以确定这些得出的结构和解释因素是否随着所考察的实践领域的不同而变化:有针对绘画或音乐方面的认识或偏好和针对博物馆参观的一系列问题,它们全都衡量合法的才能;有关于能否以被提出的21个主题之一拍出漂亮的、有趣的、无意义的或丑陋的照片的一系列问题,它们衡量审美配置;有关于歌曲、电台、阅读方面的偏好、关于对演员和导演的了解、关于摄影的一系列问题,它们是中等文化方面的配置的众多指标;还有在室内装饰、家具、烹饪、衣服、朋友品质方面的一系列选择,伦理配置通过这些选择表现得更加直接,等等。在所有这些分析中,第一个因素使在文化资本上最富有的阶层与在经济资本上最富有的阶层互相对立,商业经理和大学教授或艺术家处于轴线的两极,而自由职业者、管理者和工程师占据了中间位置。在考虑中等文化的偏好指标的分析状况中,中学教师(而不是大学教授或艺术生产者),按照已经在小学教师的歌曲偏好中观察到的一种逻辑,与商业经理的对立最显著。在针对伦理配置指标的分析状况中,艺术生产者由此显示出他们的随便和不在乎体面,因此与教授、工程师和国营管理者对立并占据着与商业经理位置接近的位置(他们在其他方面与商业经理对立最显著,在这种状况下其他方面是由第二个因素把握的)。

由此我们在每种状况中都指出了最确切的指标,为了避免因收集的信息(参见附录1,问卷)量大而产生超载作用,我们从最终的分析中取消了表达不当的问题(比如关于喜欢的

衣服或作品的问题)或很难分类的问题(我们也放弃了关于可拍摄题材的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另作分析),以保证大致衡量相同配置的问题(比如关于烹饪的问题),呈现在这里的只是最终分析的结果。由此我们保留了关于喜爱的室内装饰的品质(12个形容词)、朋友的品质(12个形容词)、愿意款待朋友的菜肴(6种可能性)、家具购买(6种可能性)、喜爱的歌手(12个)、喜爱的古典音乐作品(15部)、喜爱的画家(15个)、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或卢浮宫的次数、对作曲家的了解(分为4个层次)、对绘画的评论(5种)的数据(我们对这些数据进行编码更替)。为了让论证发挥全部力量,我们选择把主要的特征即年龄、父亲的职业、文凭、收入作为典型的变量,而所属阶层虽构成最有力的解释因素,并不照此发挥作用。³

对应分析使我们有可能通过连续的分割将有关联的不同偏好系列隔离,这些偏好系列在有差别的和区分性的配置系统中找到了它们的根源,这些配置系统既由它们之间保持的关系又由将它们与它们的社会生产条件连在一起的关系确定。衡量文化资本(我们已经知道文化资本大致与经济资本的指标成反比)的那些指标对第一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占整个惯性轴的5.8%,相对而言,第二个因素和第三个因素占整个惯性轴的3.6%和3.2%)的形成所做的贡献最大⁴;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收入最低且能力最强

³ 我们分析中产阶级和民众阶级的答案正是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⁴ 在整个这一段中,如同在后面的行文中,括号里的数字代表了所考察的变量对相应因素的绝对贡献。

的人,他们了解音乐作品(6%)和作曲家(7.7%)最多,声称他们喜欢某些作品,这些作品需要最纯粹的审美配置,如《平均律古钢琴曲集》(1.8%)或《赋格艺术》(1.7%),以及需要最普遍的、最能适用于不大被承认的领域如歌曲和电影甚或适用于饮食或房屋装饰的审美配置,他们对抽象派绘画感兴趣,经常去现代艺术博物馆并希望他们的朋友有艺术气质(2.4%);他们的对立面,则是那些收入最高且能力最差的人,他们对音乐作品和作曲家几乎一无所知,喜欢有责任心的朋友(1.5%),偏爱二流的、被降级的或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化作品——《阿莱城的姑娘》(3%)、《蓝色多瑙河》(2.9%)、《茶花女》(2.1%)、《匈牙利狂想曲》、布菲、弗拉曼克^①、于特里约、拉斐尔(2.3%)、华托、达芬奇——和轻歌剧——盖塔里(1.8%)、玛里亚诺——或最流行的歌曲——佩图拉·克拉克。⁵

我们通过直觉发现,这些不同的生活风格指标据以形成的结构符合被如此建立的生活风格空间的结构,因而也符合位置的结构。其实,从个体方面来看,商业经理及次之的企业主与大学教授和艺术生产者之间的对立最为显著,大学教授和艺术生产者在这个分析层次上几乎无法分辨。与表现同一阶层的成员的一系列圆

^① 弗拉曼克(Maurice de Vlaminck, 1876-1958),法国野兽派、立体派画家。着重于自然主义表达,以静物和风景为主要题材。——译者

⁵ 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理解,关于预先形成的判断提出的观点,如,一方面,我对抽象派绘画和古典派绘画同样感兴趣,或者,正相反,绘画很好但很难,或者还有莱奥·费雷、乔治·布拉桑、雅克·杜埃这类歌手的选择,由第一个因素得到充分的解释。

点对应的虚线部分按照预想的结构分布。⁶ 投影,作为位置的决定因素的补充变量(收入、文凭、社会出身、年龄),说明了这种结构符合资本种类的分布结构,学校教育资本在第一条轴线上按照从无文凭到大学以上文凭分布,而收入呈现一种(同样分散的和非线形的)颠倒的分布。文化资本在工商企业主的资本结构中份额越小,他们就越接近第一条轴线的极端:他们当中处于自由职业者一边的是经营文化财产的工业家或商业经理(古董商、唱片商、书商等),他们都拥有高于这个阶层的平均水平的文化资本(大学或重点大学)。商业经理(文化财产出售者除外)在(通过第三个因素把握的)另一个方面,在他们的文化偏好(《蓝色多瑙河》、盖塔里、佩图拉·克拉克)上,也在他们投入最多伦理配置的选择(涉及室内装饰和理想中的朋友时,他们提到民众阶级或中产阶级常常列举的品质,比如容易保养和实用、有责任感和稳重)上,非常接近中等文化;他们在这方面与工业家对立,工业家总体上更接近资产阶级的趣味。⁷ 至于大学教授,他们甚至在不被承认的领域如电影中也有很大才能,他们占据着第一条轴线的另一端:他们的偏好在某种大胆与一种谨慎的古典主义之间摇摆,而且他们拒绝“右岸”趣味的浅薄但又不会到艺术先锋派中冒险,他们的探索与其说趋

6 我们没有用虚线表现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管理者,因为他们在图上太分散。

7 可以肯定,从文化、语言和生活风格方面来看,与民众阶级的分界线无疑是相当不清晰的,而且这种分界线在独立经营的职业部门(尤其是商业)中比在雇佣劳动者一边位置更高,在雇佣劳动者中,这种分界线从职员层次就开始显示出来。如同在食物方面,小企业主在说话方式、(对体育、杂耍歌舞剧场等的)爱好、价值(比如男性气概)方面更接近工人阶级而不是职员,尽管职员与工人在所有方面对立最明显,但是在政治立场上与工人阶级非常接近。

向“发现”，不如说趋向“重新发现”，与其说趋向现在的先锋派，不如说趋向最罕见的过去作品（热烈的和混合的充满奇思异想的室内装饰、布拉克^①、毕加索、勃鲁盖尔，有时是康定斯基^②、《火鸟》、《赋格艺术》、《平均律古钢琴曲集》）。

298 自由职业者占据一个中间位置并且尤其在文化资本方面分为两个单独的子群：最重要的子群处于被艺术生产者占据的一极，尤其包括巴黎的建筑师、律师或医生（只有几个牙医或药剂师）；第二个子群，更接近企业主的一极，大部分是由相对年老的外省牙医、药剂师和公证人等组成。前者列举了最罕见的作品如布拉克、康定斯基、《左手钢琴协奏曲》，最“智性”的电影（《杀戮天使》^③、《萨尔瓦多·朱利亚诺》^④），往往了解被列的电影导演；而后者显示出中等趣味的最平常偏好，弗拉曼克，雷诺阿，《蓝色多瑙河》，并且看大众电影（《阿弗莱城的礼拜天》^⑤）或场面壮阔的历史片（《最漫长

① 布拉克(Georges Braque, 1882-1963), 法国画家和雕塑家, 立体派创始人之一。主要作品为静物画和风景画, 画风简洁单纯、严谨统一。代表作为拼贴画《单簧管》(1913)等。——译者

② 康定斯基(Kandinski, 1866-1944), 俄国画家、艺术理论家, 抽象艺术的创始人。他认为绘画的颜色独立于形式, 试图以纯粹的精神创造代替对物质世界的外在现实的形象表现和模仿, 几何元素在他的绘画中占重要位置。代表作品有绘画《蓝色骑士》(1903)、《蓝山》(1908-1909)、《黄—红—蓝》(1925)和艺术理论著作《艺术尤其是绘画中的精神性》(1911)、《平面上的点和线》(1926)等。——译者

③ 墨西哥电影, 拍摄于1962年, 揭露了大资产阶级的虚伪, 西班牙裔墨西哥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 1900-1983)的代表作之一。——译者

④ 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isco Rosi, 1922-)1962年导演的意大利历史片, 显示出客观地讲述历史事件的电影档案风格。——译者

⑤ 塞尔日·布尔吉依(Serge Bourguignon, 1928-)1962年导演的法国电影。——译者

的日子》^①)。

因此,鉴于与资本总量相关的差别部分地被(分析用于同一个阶级的成员且这些成员在这方面大致同等这个事实)遏制,每个人在由两个首要因素确定的空间里的位置主要取决于其财产结构,也就是他拥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轴线1)的相对比重,以及他的社会轨迹(轴线2),他的社会轨迹通过相应的获得方式,支配着他与这份财产保持的关系。⁸ 与在资产阶级中或长或短的资历相关的配置的指标对第二个因素的绝对贡献最大:作为一种社会轨迹的和一种文化资本的获取方式的被归并痕迹,伦理的和审美的配置主要表现在与合法文化的关系中和日常生活艺术的细微差别中,并将拥有大致等量的文化资本的个人分开。我们看到,在个人方面,这第二个因素在每个阶层内部使很久以来进入资产阶级的人与刚刚跻身资产阶级的人对立,也就是使那些拥有特权之特权、特权之资历的人与暴发户对立,使那些很早就经常接触稀有的和“高雅的”物、人、场所和场面从而获得其文化资本的人与那些通过紧密依靠学校教育体系或偶然地通过自修机会努力获取其文化资本且与文化有一种更严肃、更严格甚至更僵硬的关系的人对立。这第二个因素显然使阶层按照其成员来自资产阶级亦或其他阶级 299 之成分分布:一边是自由职业者和大学教授(且在较低的程度,是私营部门的管理者),另一边是工程师、国营部门的管理者和中

^① 美国电影,拍摄于1962年,由盟军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作战和指挥行动的片段组成。——译者

⁸ 这就意味着,要素分析的第一个因素与社会空间的第二个维度相符,而第二个因素与社会空间的第三个维度相符。

学教师,这些等级代表了跻身统治阶级的特别途径(通过学业成功),企业主则大致与两极之间保持同等距离。第一类人按照第二个因素的客观价值组成群体,他们的共同点是(最初)通过家庭内部的熟习获得他们的资本并显示了他们从属于资产阶级世家的标志,如拥有继承而来的家具(3.1%)、经常光顾古董店(2.4%)、偏爱舒适的室内装饰和传统的烹饪(1.5%)、经常参观卢浮宫和现代艺术博物馆(1.8%)、喜欢《左手钢琴协奏曲》——我们知道这种爱好几乎总是与弹钢琴有关。而其他人的资本主要来自学校以及一种高等的学校教育培养所支持和包含的迟来训练,他们与前者对立,表现在他们喜欢意志坚定的朋友(2.6%)和有进取精神的朋友(3.6%),而不是像另一方那样喜欢有修养的或有艺术气质朋友,他们喜欢整齐而干净(3.2%)、简约而朴素(1.6%)的室内装饰,喜欢资产阶级的中等文化作品,如《马刀舞曲》(5.1%)、于特里约和梵高,或在另外一个层次上,雅克·布雷尔或阿兹纳武尔、布菲或《蓝色狂想曲》——这么多处于上升阶段的迹象。他们通过谨慎的因而相对一致的选择显示出自身的特征:他们从不屈就有平庸或庸俗之嫌疑的作品,如《阿莱城的姑娘》或《蓝色多瑙河》,他们只是难得地到已经变得不那么“经典”的作品如《儿童与巫术》之中冒险,这些作品往往被文化中间人和艺术生产者所选择。

父亲的职业、年龄、文凭、收入等这些说明性变量的客观反映,显示出区分的原则就是社会轨迹:对立在更年长且出身于最古老和/或在经济资本上最富有阶层的统治阶级成员(自由职业者、工商企业主)与父亲是职员、中等管理者或工人、在经济资本上相对不富有且更年轻的人之间建立起来。在阶层空间中的位置即在资

产阶级中的资历与(同样与前两个因素相关的)年龄之间所具有的复杂关系,对理解统治阶级成员的许多伦理或审美差别——比如在体育运动或穿戴方面的差别——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了解到从统治阶层到被统治阶层,“暴发户”的比例是上升的(首先是那些通过一种积累学校教育资本的举动进入统治阶级的人数量增加——管理者的分散无疑部分地来自这个事实,即他们的社会出身越低,他们就越有可能只在年纪较大时跻身这些位置),这种复杂的关系就可以理解了。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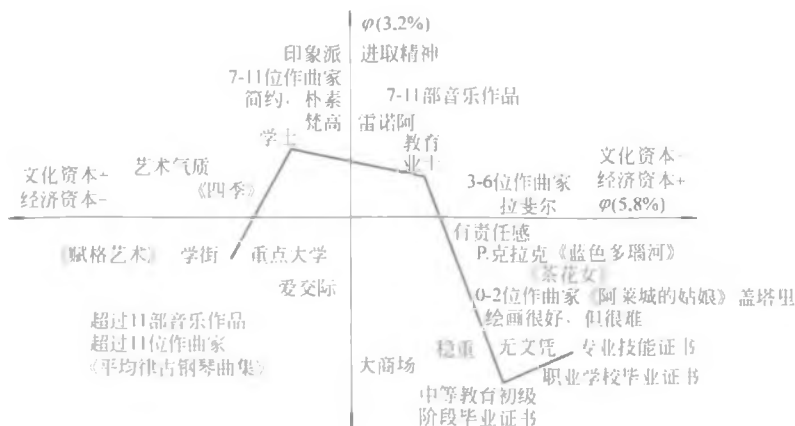


图 13 占统治地位的趣味的变种

在这个简图上,我们仅仅呈现了其绝对贡献率等于或大于 1.5 的变量。在这些说明性的变量中,我们仅仅呈现了文凭。

⁹ 在要么针对同一系列的指标(尤其是为了最后的综合而保留的指标),要么针对不同系列的指标连续地进行的分析中,第一个因素表现得更加稳定(它的意义没有受到阶层在相对位置中的这种或那种置换的影响),而第二个因素,即在资产阶级中的资历,可能在某个领域中退居第三位。

第三个因素,在个人方面,使大部分教授尤其是艺术家——艺术家比教授更倾向于表现他们对资产阶级趣味的拒绝——和商业经理,与自由职业者、工业家和管理者中(从出身、住所和修养上来看)最典型的资产阶级部分对立,这个因素尤其倾向于使这些等级的“资产阶级趣味”与所有其他阶层的趣味对立,主要是与更有实力的和更大胆的“智识趣味”对立,但次之,也与一种从负面定义的并兼具中产阶级趣味和民众趣味特征的趣味(大商人的趣味)对立,因此这个因素体现了“资产阶级趣味”的特点。资产阶级的或上流社会的趣味乃模态的或时髦的趣味——正如对印象派画家的好评的赞同(4.2%)所证明的,这种赞同由选择梵高(2.1%)或雷诺阿(2.1%)确认——并建立在一种中等能力基础上(了解7—11部作品的,占3%,了解7—11位作曲家的,占3.2%),这种趣味基本上是一种传统的趣味(喜爱法国传统饮食的,占1.3%,或喜欢在古董店购物的,占1.0%,或喜欢有教养的朋友的,占1.5%)以及一种有节制的享乐主义(比如,选择一种舒适的但简约而朴素的室内装饰的,占1.8%,选择私密的室内装饰的,占1.2%,)和在大胆中也要审慎的享乐主义(选择《火鸟》或《蓝色狂想曲》的,占1.3%,或喜爱有一种进取精神的朋友的,占1.7%——与艺术家相反)。这种趣味尤其通过与一系列指标的对立为自身定义,这些指标描述了一种文化的特点,这种文化更具“学校教育”特点(了解超过12位作曲家的,占3%,了解超过12部作品的,占1.9%,喜欢达芬奇的,占1.6%,等等),与此同时——相对而言——更大胆(选择康定斯基的,占1.4%,选择毕加索的,占1.3%)但也更具有苦行色彩(喜欢戈雅或《平均律古钢琴曲集》,到跳蚤市场购物,等等)。

一个有俄式茶炊风格的温暖舒适的房间

“伊莎贝尔·多尔纳诺，部长的弟媳，把她的卧室变成了她的房间的主导。一部巴洛克风格的杰作。”

“‘我知道我多么热爱生活。装饰是表达生活的一种方式。’她把不考虑风尚和惯例的原则用在由绿色人造大理石和软百叶帘组成的华丽的不合规则的整套房间上，尤其用在卧室上。一个有点过时但非常现实的房间，伊莎贝尔（为她丈夫三年前推出的“西斯基”化妆品的销售）工作时，这个房间用作她的办公室，它充当五个孩子的电视厅，它与几个会客室相通，有可能在盛大的晚宴时行使第二个客厅之职。起初，这是一个灰暗的、奢华的和烦人的图书馆，她把它变成了一个热烈的地方，而且‘温暖舒适’，如她所说的。

首先建造一个环绕房间的几乎半高的环形阳台……围绕一个中心——床——组织房间的通行。不是什么都行！……伊莎贝尔·多尔纳诺喜欢‘有力度的’家具而且想要一张‘让人想起威尼斯轻舟的床’。她的家具商完活儿可花了一年半时间！

她不顾重要的传统规则，将不同风格的（家具若不是所有风格）的家具摆在一起。一张用细木镶嵌装饰的路易十六时代的‘圆柱形’写字桌，第二帝国时代的装软垫的‘低矮安乐椅’和炉边取暖的矮椅，在一个马德里古董商手里买的格兰哈^①手工工场的一盏巨大的18世纪枝形全水晶吊灯，一两件带搁板的精致的19世纪末英国小家具，搁板上放了植物、书和一盆兰花（‘唯一能活的

① 西班牙的一个城市。——译者

303 花’),花很便宜的价钱从德鲁奥^①买来的罩着现代灯罩的两盏玻璃灯,由一个高级细木工新近制作的两个带踏板的床头柜。

她大胆混合色彩和材质……

什么都被她拿来当点缀,但没有小工艺品(‘它们没什么用’),有的是十几幅照片……柳条筐装满各种杂物。儿童杯里插满铅笔。小说、展览目录、装饰杂志(她从这些杂志上剪下有用的地址,贴在纪念册里)散放各处。还有其他很特别的细节,比如这些被她拿来贴壁炉台的彩色瓷砖……总之,她采用了一种新颖的 and 个人的装饰风格。乃至当我问担任装修技术顾问的室内装饰家昂利·萨缪埃尔如何为这个房间定义时,他回答说:“这是最纯粹的多尔纳诺风格,这可是一种赞誉!””

《费加罗妇女》

D. 德圣索弗尔,《费加罗杂志》

1978年10月7日



① 巴黎的一条街,位于第九区,拍卖行、艺术品商店、古董店云集于此。——译者

艺术作品的占有方式

但是,如果这种统计学分析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成为这种分析所展示的分布的潜在逻辑;如果我们虽然证明了既在共时性又在历时性中被确定的资本总量和结构构成了实践和偏好的划分原则,却无法揭示一种可辨认的社会-逻辑关系——这种关系把与文化资本的特点不相称的一种财产结构和与艺术作品的确定关系相连,且无法解释也就是无法彻底理解为什么审美配置的最有苦行色彩的形式与文化上最合法的和经济上最节省的实践(比如在文化实践方面,经常参观博物馆,或在体育运动方面,登山或行走),很有可能以一种特定的频率出现在文化资本方面(相对)最富有和经济资本方面(相对)最贫困的阶层中,那么,这种统计学分析就无法真正完成其验证的目标。

当直觉在教授对纯粹的作品如巴赫或布拉克、布莱希特或蒙德里安的作品严肃性的喜爱中,辨认出表现在他们所有实践中的同样的苦行配置时,当直觉在这些表面纯洁的选择中预感到一种不过是与性或金钱的更隐秘关系的征候时,或当直觉猜测到表现在对通俗喜剧的魅力或对印象派、对雷诺阿的盛装的和戴花的妇女、布丹^①的撒满阳光的海滩或杜菲剧场装饰的爱好中的整个世界观或生活观时,应该听从这种直觉,但这是为了验证这种直觉。 304

^① 布丹(Eugène Boudin, 1824-1898),法国画家,印象派先驱之一,最早在室外描绘风景的法国画家之一,擅长描绘海景。——译者

如同我们在戏剧或绘画中看到的那样(但对其他艺术同样适用),某种东西通过这些不连续的或不协调的迹象表现出来,我们必须通过这些迹象进行衡量,这种东西是与艺术作品的两种对立关系甚或两种占有作品方式,两种形式颠倒的财产结构表现在这两种占有方式之中。因此,比如,如何理解,平均支付的看戏费用,从教师的 4.17 法郎(这个数字低于私营部门的中等管理者同意支付的 4.61 法郎和国营部门的中等管理者同意支付的 4.77 法郎),到国营部门的高级管理者的 6.09 法郎,自由职业者的 7.00 法郎,私营部门的高级管理者的 7.58 法郎,商人的 7.80 法郎,企业主的 9.19 法郎,如何理解我们因此重新发现了按照其经济资本总量分布的阶层的一般等级?¹⁰ 如何解释,反之,如果我们考虑他们在不那么昂贵的剧院中出现的比率时,阶层的等级就会颠倒过来? 过快地理解相对便宜的先锋派戏剧与知识阶层之间或昂贵得多的通俗喜剧与统治阶层之间的有选择的一致性(只在当中看到经济花费与经济手段之间关系的一种直接作用),我们有可能忘记,每个阶层对构成艺术作品本身价值的东西和把艺术作品据为己有的合法方式形成的整个表象,通过他们同意为观看艺术作品支付的价钱,或更确切地,通过物质费用与预期的“文化”利益之间的关系表

¹⁰ 我们普遍看到,在文化资本的范围内,文化实践的直接费用越高(比如戏剧或展览),或文化实践越受到拥有昂贵器材的制约(比如听唱片,演奏一种乐器,如钢琴,或电影爱好者大量看电影),文化实践就越与收入成正比。参观艺术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在空间的分布上比剧院或音乐厅——相对——更平均)则仅仅依靠文化资本(显然,当门票的价格保持在一种较低的水平上时尤其如此),若本身与经济资本密切相关的旅游不强化这种实践的话(这就解释了为何经济资本方面最富有的统治阶级阶层在具有强烈的旅游吸引力的博物馆中的出现比例比在“普通”博物馆中高)。

现出来。¹¹

对无论是公认的还是刚入门的知识分子而言,看戏、看展览或看艺术电影这些实践,都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于以最低的经济费用求得最大的“文化收益”,而这些实践的频率和它们从属于几乎职业性的常规这一点足以除去它们的一切超乎日常性,这就意味着放弃一切炫耀性消费并放弃作品的象征占有所提供的满足感之外的一切满足感(“到剧院是为了看戏,不是给人看的”,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他们从作品本身、作品的稀缺性和他们关于作品发表的言论(一出剧院,“在喝一杯时”,或在他们的课堂上,他们的文章或他们的书中)中期待其实践的象征收益,而且通过这种言论,他们竭尽全力把作品的一部分区分价值据为己有。相反,统治阶层把剧院“夜场”变成一次消费和炫耀消费的机会。他们“穿上盛装”(这要花费时间和金钱),他们按照在其他领域致使购买“最好的东西”的逻辑,购买最昂贵剧院的最昂贵座位,他们在演出结束后去吃晚餐。¹² 他们选择他们的剧院就像选择一个“店铺”一样,¹³ 这个

¹¹ 我们通过这种逻辑可知,所期待的价格为第一个因素所做的绝对贡献最大,对巴黎剧场及其观众的一个样本的一系列特征的对应分析阐明了第一个因素(SEMA, *La situation du théâtre en France*, Annexe, tableau 231b)。或者,认为博物馆门票便宜或非常便宜的倾向,按照一般的等级,从文化资本方面(相对)富有的人到经济资本方面富有的人猛增,自由职业者仅仅通过两种方式的分佈(中等-非常便宜)而得到区分。

¹² 我们曾经指出,座位的价钱在看戏的费用方面只占很小一部分(还要加上交通费、花费的时间、晚餐的价钱、“临时照看小孩”的费用),而且全部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cf. Thomas Moore, 《The demand for Broadway theater ticket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8(1), fév. 1966, pp. 79-87》)。这就意味着“外出”看戏的总体费用,按照从知识分子到自由职业者和工商企业主,无疑既由于座位本身的价钱也由于附带的消费而大幅增加。

¹³ Cf. P. Martineau, Social classes and spending behavior, *Journal of Marketing*, 23, oct. 1958, pp. 121-130.

306 店铺标志着所有“优良品质”的特征并能够避开“意想不到的麻烦”和“低级趣味”：他们首先选择一位称职的作家，他对“喜剧的手法，一种情境的来源，一个恰当的词的逗笑或辛辣的力量”一清二楚，总之，他堪称一个金银匠甚或一个珠宝商，在“拆卸艺术”上成了大师并对“戏剧艺术的诀窍”了如指掌¹⁴；然后是一些以某些才能著称的演员，他们能够进入作家给予他们的“珍贵角色”并能够用完美技师的热烈驯服态度为这个戏剧艺术的综合工科大学毕业生“服务”；¹⁵最后是一场戏，它包含着“一切让人快活的东西”，“毫无让人不满意的和粗俗的成分”，正好能“让一群平静的观众感到轻松，让他们以一种健康的轻快找回平静”，因为这场戏只提出“所有人都提出”的问题，“只有幽默和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能够摆脱这些问题。

这里我们不再对一切包含在资产阶级戏剧与先锋派戏剧之间的对立中的东西进行分析，而仅仅停留在由调查直接提供的材料的范围内，这样，我们可以很快地展示在电影方面看到的对立，在电影方面，对“雄心勃勃”并需要一种巨大文化投资的作品的爱好与对最引人入胜的和最公开地为娱乐而制造的影片的爱好的互相对立（这些差别往往与门票价格和电影院在地理空间中的定位的差别相伴而生）。无疑，有一些到处适用的电影，这些电影的特点是得到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及其评论家）的一致认可：在提供的名单中，如《诉讼》^①，“有力而

¹⁴ 引号里的词语是从让-雅克·戈蒂耶写的关于弗朗索瓦丝·多兰的理想型剧本《转变》(*Le Figaro*, 12 janvier 1973)的理想型文章中借鉴而来的。

¹⁵ 人们说的是一位作家或他的剧本被演员“很好地演绎”。

① 美国电影，1962年由曾经执导《公民凯恩》的美国著名导演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 1915-1985)根据德国作家卡夫卡的同名小说改编。——译者

严肃的作品,思想大胆,不可错过”(Le Monde, 25-12-1962), 阿兰·德龙主演的威斯孔蒂的《罗科和他的兄弟们》^①, 尤其是马斯特罗扬尼主演的《意大利式离婚》^②, 《战斗报》(2-6-1962)认为它是“诚实的商业电影”, 《世界报》认为它是“具有惊人的厚颜无耻、残酷、大胆”的喜剧电影。无论如何, 在空间的两极之间差别非常明显, 自由职业者照常占据一个中间位置。于是工商企业主选择历史片, 比如《最漫长的日子》, 展现上一次战争的“最精彩战斗”的“恢弘复原”(Le Monde, 12-10-1962), 像《北京 55 日》^③那样的“巨片”。它是“聚集人群的电影的范例”, “场面豪华, 小心地去掉唯智主义, 非常卖座, 因为它们知道如何刺激公众的好奇心”(Le Monde, 17-5-1963)。还有“获得商业成功”的电影, 比如瓦蒂姆的《罪恶与美德》^④, 一部“构思严密, 以一种不可否认的精湛技艺拍摄的”电影, 它使得“一种温和的虐待狂被所有人理解”(France-Soir, 2-3-1963)。最后是喜剧电影和喜剧演员, 如费南代尔^⑤、达里·考尔^⑥, 等等。相反, 中学教师几乎总能说出他们看过的电影

①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1960 年拍摄, 威斯孔蒂的杰作之一。——译者

② 杰尔米(Pietro Germi, 1914-1974) 1961 年执导的意大利喜剧电影。马斯特罗扬尼(Marcello Mastroianni, 1924-1996), 意大利著名演员, 曾两次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译者

③ 雷(Nicholas Ray, 1911-1979) 执导的美国电影, 拍摄于 1963 年, 讲述了中国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的外国使馆区被围困 55 天发生的故事。——译者

④ 法国意大利 1962 年合拍的电影, 导演为瓦蒂姆(Roger Vadim, 1928-2000)。——译者

⑤ 费南代尔(Fernandel, 1903-1971), 法国歌手和演员, 战后法国喜剧电影的代表人物。——译者

⑥ 达里·考尔(Darry Cowl, 1925-2006), 法国音乐家和演员, 曾两次获恺撒奖。——译者

的导演和演员的名字,他们一贯将非常有喜剧色彩或获得极大商业成功的电影排除在外而且偏爱(几乎全都被电影史保留的)“经典”电影,比如布努埃尔的《杀戮天使》,《世界报》的批评家将它比作萨特的《禁闭》。还有《萨尔瓦多·朱利亚诺》,“弗朗西斯科·罗西的一部热烈而且非常优美的电影,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艺术家的抒情描述了西西里人生活的一个时刻”,属于“提出意大利南部问题的风俗研究”(Le Monde, 6-3-1963)。最后是皮埃尔·埃泰的喜剧电影《求婚者》^①,批评家预见他“有一天将会在从迈克·森尼特^②经马克斯·林德^③、卓别林、基顿^④和其他几个人到塔蒂^⑤的伟大谱系中占一席之地”(Le Monde, 16-2-1963)。能说明问题的是,为了证明内行的读者从“严肃的”日报中期待的命令(“要看”、“不可错过”等),我们可以在这里引用在那里不过是一种被全盘否定的东西(关于《诉讼》——“无非是一种好看的娱乐”,Le Monde, 25-12-1962)。

① 皮埃尔·埃泰(Pierre Etaix, 1928-)1962年执导的法国电影,讲述了一个害羞的恋人遭受的挫折。——译者

② 迈克·森尼特(Mack Sennett, 1880-1960),美国电影演员,最重要的无声电影导演之一,被誉为“喜剧之王”。——译者

③ 马克斯·林德(Max Linder, 1882-1925),法国喜剧电影导演,对卓别林影响很大。——译者

④ 基顿(Buster Keaton, 1895-1966),美国无声电影喜剧演员、导演,与卓别林齐名。——译者

⑤ 塔蒂(Jacques Tati, 1907-1982),法国喜剧导演、演员,代表作有《于洛先生的假期》、《我的叔叔》等。——译者

中学教师	自由职业者	工商企业主
《意大利式离婚》	《意大利式离婚》	《最漫长的日子》
《杀戮天使》	《诉讼》	《意大利式离婚》
《罗科和他的兄弟们》	《阿弗莱城的礼拜天》	《北京 55 日》
《萨尔瓦多·朱利亚诺》	《罗科和他的兄弟们》	《诉讼》
《雨中曲》	《杀戮天使》	《罪恶与美德》
《求婚者》	《猎豹》	《罗科和他的兄弟们》
《诉讼》	《七侠荡寇志》	《剑与秤》
《阿弗莱城的礼拜天》	《最漫长的日子》	《雨中曲》
《剑与秤》 ^①	《雨中曲》	《求婚者》
《猎豹》 ^②	《求婚者》	《阿弗莱城的礼拜天》
《最漫长的日子》	《一个流氓的叙事诗》	《猎豹》
《七侠荡寇志》 ^③	《剑与秤》	《杀戮天使》
《一个流氓的叙事诗》 ^④	《萨尔瓦多·朱利亚诺》	《可恶的海关职员》
《可恶的海关职员》 ^⑤	《罪恶与美德》	《一个流氓的叙事诗》
《北京 55 日》	《帝国维纳斯》	《七侠荡寇志》
《比亚利茨之旅》 ^⑥	《北京 55 日》	《比亚利茨之旅》
《群岛冒险家》 ^⑦	《比亚利茨之旅》	《萨尔瓦多·朱利亚诺》
《罪恶与美德》	《可恶的海关职员》	《群岛冒险家》
《帝国维纳斯》 ^⑧	《群岛冒险家》	《帝国维纳斯》

图 14 看过的电影(按照喜爱程度递减的次序)*

* 这里仅仅指巴黎人的选择。我们(按照已放映的电影)为里尔地区的被调查者列出一个不同的名单,他们的选择按照一种类似的结构形成。

① 法国和意大利合拍的警匪片,法国导演卡亚特(André Cayatte,1909-1989)执导,1963 年上映。——译者

② 威斯孔蒂执导的法国和意大利合拍电影,该片通过细腻的美学上的历史复原,剖析了农村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获 1963 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译者

③ 斯特奇斯(John Sturges,1910-1992)执导的美国西部片,根据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翻拍,1960 年上映。——译者

④ 博纳多(Claude-Jean Bonnardot,1923-1981)执导的法国侦探片,1962 年上映。——译者

⑤ 阿莱格雷(Marc Allégret,1900-1973)执导的法国警匪片,1962 年上映。——译者

⑥ 格朗吉耶(Gille Grangier,1911-1996)执导的法国电影,1962 年上映。——译者

⑦ 一部意大利海盜片。——译者

⑧ 法国和意大利 1963 年合拍的电影,由法国导演德拉努瓦(Jean Delannoy,1908-2008)拍摄。——译者

艺术博物馆与“资产阶级”剧院、歌剧院或展览(不用说首演或盛大的庆祝晚会)对立,后者为社会仪式提供了机会或借口,使得一群风雅的观众能够通过遵守上流社会日历的既统一又有差别的节奏,显示并感受他们属于“上流社会”,而艺术博物馆则在随便什么时刻(在可利用的文化资本的范围内)集中了随便什么人,没有穿衣方面的任何限制,也不提供与上流社会的盛大活动相关的任何社会满足感。此外,艺术博物馆与剧院尤其是音乐厅和杂耍剧院不同,它只提供纯粹美学所要求的高度净化的和升华的快乐,而且在这方面接近图书馆,它往往要求一种严肃的和几近学校教育式的配置,这种配置既趋向经验和认识的积累,或辨认和辨识的快乐,也趋向单纯的愉悦。¹⁶

在对博物馆的严肃庄重和这种严肃庄重所支持的“静思”的必不可少的颂扬之中,往往透露了参观博物馆的实情,即把参观博物馆当成一项总是有点艰巨的事业,人们强迫自己完成这项事业并以一种有条不紊的执着进行到底,这项事业既在尽责任的感觉中也在直接的观赏快乐中得到报偿。“博物馆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寂静,也是空荡荡,但这也许是寂静引起的。但这适合观赏作品,进入作品。我不是特别陶醉,因

¹⁶ 中产阶级的参观者和教授——其次是工程师——最倾向于将博物馆与图书馆联系在一起(“我最喜欢的东西?图书馆:它收藏了有价值的著作而且要愿意去才行”——工程师,康布雷,44岁,里尔博物馆)。同样是这些人最倾向于将观赏与记录(比如记笔记)和收藏(比如买复制品)的做法联系在一起。此外,我们看到,教授最倾向于拒绝把对艺术作品的直接体验与博学的认识分开(他们也最倾向于拒绝这种见解:“谁画了画和怎么画的,对我来说无所谓,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画好看。)

康布雷(Cambrai),法国北部加莱省的一个城镇。——译者

为实在枯燥。有条不紊地参观博物馆让人疲惫,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一条规矩;这成了一种束缚而且我有点消化不良。我觉得我很快就看完了,因为我希望能告诉自己我看过这个博物馆。非常单调,总是绘画。应该不时地用别的东西更换作品”(工程师,亚眠,39岁,里尔博物馆)。这位参观者的看法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的看法一致,后者将他的博物馆看成“参观者能够在当中锻炼眼部肌肉的一个体操房”(谈话由 R. 莱恩斯记录, R. Lynes, in *The tastemakers*, New York, Universal Library, Grosset and Dunlap, 1954, p. 262.)。

我们看到,从音乐会或先锋派戏剧、传播水平高且旅游吸引力低的博物馆或先锋派展览,到场面恢弘的展览、上流社会的音乐会或“传统”剧院,最后到通俗喜剧剧院和杂耍剧院,按照文化资本递减或经济资本递增的次序分布的不同阶层——也就是教授、行政管理者、工程师、自由职业者、工商企业主——的出现频率倾向于有系统而持续地变化,这样,按照在观众中的比重分布的阶层的等级倾向于颠倒过来。¹⁷ 教授和工业家或大商人在观看两类展演的

¹⁷ 在利用图书馆(cf.《La lecture publique en France》, *Notes et études documentaires* 3948, 15 déc. 1972), 被认可的先锋派剧院,如奥德翁剧院、东巴黎剧院、国家人民剧院、帕纳斯山剧院(cf. SEMA, *Le public des théâtres*, Paris, 1964——这里将无职业者与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集中到一起), 博物馆(参见我们1965年的补充调查)、“传统”剧院,如作坊、法兰西喜剧院,最后是通俗喜剧院(SEMA, 同上)的全部统治阶级成员中,(1968年占统治阶级的16.3%的)教授分别占54.4%, 39.5%, 34.1%, 27.7%和13.5%。对国家统计局和经济研究所关于娱乐的调查(S. C., IV)的二度分析说明,统治阶级成员声称1)每个月至少去一次图书馆,2)每年至少听五六次音乐会,3)在不到六个月之前看过一次艺术展览,4)经常去博物馆,5)每年至少去五到六次剧院,6)一年至少去杂耍剧院看一次演出,在这些人中,(占抽样的统治阶级成员中的13.7%的)教授分别占1)40.9%, 2)38%, 3)27.1%, 4)19.4%, 5)16.1%和6)6%。工业家和大商人的数量变化则严格成反比,比如他们在看杂耍演出的统治阶级成员中占18.6%。

比率之间的对比曲线图上占据对称的位置,这两类展演表现了相反的属性,一边是音乐会和艺术展览,另一边是演出和展销会,自由职业者和高级管理者在两种情况下占据一个中间位置。自由职业者,不经常光顾图书馆或博物馆,在展览的观众中比在博物馆的观众中所占比例更高,他们去剧院(“资产阶级”剧院或“杂耍剧院”而非传统剧院或先锋派剧院)相对更频繁。

博物馆与画廊对立,博物馆乃是展示被排除私人占有的物品的礼拜场所,经济中立使这些物品倾向于被“中立化”,这种中立化为“纯粹的”领会下了定义,而画廊如同其他奢侈品商业(“店铺”、古董店等)一样,提供可能被欣赏但也可能被购买的物品;这就类似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层的成员尤其是参观博物馆人数很多的教授的“纯粹”审美配置与统治阶层的少数几个幸福的人的审美配置对立,这少数几个幸福的人有办法在物质上将艺术作品据为己有。当绘画、雕像、中国花瓶或古董家具属于可能被占有的物品的空间并因此进入人们拥有的奢侈财产系列时,其实他们与艺术作品的整个关系已发生了变化,他们无需证明这些奢侈财产提供的快乐和它们表明的趣味就可以享受它们,即使当他们个人不拥有这些奢侈财产时,这些奢侈财产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他们所属的群体的法定标志,装饰着他们占据的办公室或他们常去的熟人的客厅。

一个“风格独特”的大资产者¹

S., 律师, 45岁, 是律师之子并属于一个巴黎大资产阶级家庭³¹⁰; 他的妻子, 工程师之女, 毕业于政治科学学院, 不工作。他们的四个孩子在巴黎最“好”的天主教私立学校上中学。他们住在16区的一幢超过30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 一扇很大的门, 一个巨大的客厅, 一个餐厅, 一个书房, 若干个房间(办公室不在房子内)。

客厅里, 有现代元素(大靠垫、大沙发、椅子), 有古董, “一个非常漂亮的古代希腊头像”(结婚礼物), 一件男主人称作他的“个人祭坛”的物品(“一件非常漂亮的圣物, 我从我父母那儿弄来的”——他的父亲收藏各种艺术作品, 从一个当过旧货商的俄国人买过“成堆的东西, 法琅、圣餐杯、十字架等”), 他让十个专家陪同从佛摩萨^①的一家古董店里买的“一件唐朝的陶器”, 多幅绘

1 所有这些谈话都是在1974年进行的, 以便尽可能有系统地清点每种生活风格的最能说明问题的特征, 而在这个时刻即将完成的对调查的分析有助于抽出这些特征; 我们受到对发生公式的一种预先认识的引导, 而这个发生公式是被调查者的属性及其实践的根源, 因此我们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即有条不紊地将(常常与调查者通过家庭关系或熟人关系连在一起的)被调查者引向他的生活艺术的最核心区域(由此, 被涉及的主题的异质性与统计学调查应该收集的数据的牵强的同质性形成了对照), 向被调查者提出所有保证和再保证, 甚至所有强化和强调——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情景中期待从某个被“当成知己”的人身上获得的。最后我们尽力把这种有系统的全体性的具体形象即生活风格——统计学分析就在它借以揭示这种具体形象的活动中破坏了这种具体形象, 推向最强烈的程度, 让人可以直接感受到它。这是通过强化谈话实现的, 一种直接的、非直接的或半直接的风格的交替使用有助于强化谈话。

① 葡萄牙人对台湾的旧称。——译者

画，一幅保尔·塞吕齐埃^①的画（“它有某种魅力，说到这儿，我倒乐意用一幅现代绘画替换它”），餐厅里有一幅荷兰的静物。

“风格独特”

他买东西时，“完全不是为了投资”。对他而言，重要的“首先
311 是物件、物品的美，其次，不要求它是独一无二的，但要求它是手工的”：“你能重做，但你会弄糟。因此，它的风格独特，因为你无法把同一个对象、同一个主题复制两次……构成一张面孔的美、一座雕像的美的东西，是微笑，是目光……你无法将这种美重复两次。你可以用石膏重做，但你无法用同一种材料重做。材料更重要，至少跟整体一样重要……我很想有一件漂亮的青铜器。有一些绝对不同寻常的青铜器”。

“这有点像暴发户”

他很少去画廊，也不“定期”光顾古董店或德鲁奥公馆。他买（一个物品，一件家具……）是因为这让他“此刻感到快乐”。他不大肯迁就那些“想要投资但是没有时间”的人：“他们自己没有时间关心。他们感兴趣的主要不是让他们快乐的东西而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们也构成了这样的群体：“他们每年缴 X 法郎；他们派别人采购。这一方面是投资，另一方面是完全的无能，在墙上给他们随便粘上一块泥，只要说这泥值钱，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这有点像暴发户，想要说明他有什么东西……或他也能有什么东西。这就像找一个室内装饰家，委派某个人一样”。

^① 保尔·塞吕齐埃(Paul Serusier, 1864-1927)，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他的绘画追求纯粹的、生动的色彩，试图赋予绘画其自身的装饰和象征逻辑，代表作为《护身符》。——译者

“你找了很久,最后你找到了它”

“物有内在的和心灵的价值,若你对它渴望已久,你找了它很久。你想要的就是这个而且最后通过某个偶然,你找到了它……这是一种启示……如果我乐意,价格不是问题,比如买管风琴(‘一个小玩意儿,电子风琴’),我想要,我就有了……这再次说明,人们通常把自己限制在有可能实现的范围内;我不买夏特特大教堂”(他很“愿意拥有一座教堂并且改造它……我觉得美的,是石头,石头的形状,拱顶,石头是美的”。他出身于天主教家庭,但不再参加教会活动,他经常半嘲讽地提到宗教)。

“为了我个人的快乐”

312

为了勃艮第宽敞的乡村房屋(“毕竟有1000平米需要添置家具”),它被比作一个“情妇”,他在一个“兔皮商人”那里买了家具:“我遇上了一个家伙,一个旧货商,他有颇具乡村风格的实木家具,我还买了别的东西,也有用稻草填充的动物”,尤其是用稻草填充的野猪,“买时激起众怒,我除外……因为这很有趣。快乐,就是有趣的东西。”

我很烦那些买东西仅仅为了展示、为了说他们拥有这些东西或为了把这些东西放在某个地方的人。价钱并不重要,从中发现的乐趣最重要……我买了野猪,就是为了我个人的快乐或仅仅是因为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这很可笑或这让别人不快。”这幢房子“太潮湿,没法放钢琴”,他想要“有一架三角钢琴……在娱乐场,有他们淘汰的三角钢琴……也许缺一两个音”。

“遗产,开玩笑吧”

他用来装饰这间房子的通过遗产继承的东西,对他来说微不

足道。他的妻子提醒他有这样的东西，他对她说，“遗产，开玩笑吧，有三件家具”；她明确指出，“我结婚的时候，X 姑姑去世了。我继承了一些银器，好，这是第一份遗产。接下来是 C. 夫人，第二份遗产，接下来是 L. 小姐，第三份遗产。这样我就有了一些餐具、古董和家具。我们从没有家具问题，因为我们继承了一些家具。第四份遗产，我的公公婆婆淘汰了一些。我们继承了椅子……”

要是他不喜欢这些家具，他就“扔掉”他们：“别太拥挤”。“应该有一个足够大的房间，有一些能保持某种室内的宁静、不拥挤的房间，相反，应该有别的房间放所有个人物品，这些物品不是——在这儿该扔进垃圾箱的——纪念品一类的，而是一个人喜欢放在身边的物品”。他“讨厌旅游纪念品”，而且从不带这些东西（“除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这物件，中国的陶器……我买一些给亲友的小玩
313 意儿，但不堆满房间；……人家看不出我们去了什么地方。在当地买的当地纪念品没任何意义”）。而且在旅游时，最好精神自由，“双手插在兜里，观看周围，而不是眼睛盯着照相机”（在远东，“我们照了相”，他妻子重申，但他补充道，“我们看了照片，给别人看了两次，”现在照片“被搁在一边”）。

“出于快乐，在荷兰、意大利的博物馆度过许多时光”

他有一个画室，他在画室里度过许多时光（“他喜欢画画”，他妻子强调），但他觉得他画的“无意义”，不愿意谈画画的事。相反，他愿意承认，他“出于快乐，在荷兰、意大利的博物馆度过许多时光”。他被“意大利绘画，列奥纳多·达芬奇，威尼斯画派，锡耶纳画派，我们在罗马的博尔盖塞博物馆看到的所有绘画，波提切利……深深地被打动、教育了”。他也对“荷兰绘画的特点深有感

触，弗朗斯·哈尔斯^①，伦勃朗；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绘画，因为它含糊得多，浓重得多……还有某些马蒂斯或科克托的画”。他喜欢的绘画不“必要”是形象的。相反，他对“恶作剧式的绘画完全无动于衷”，比如一幅“被撕得四分五裂的”白画布。他的妻子明确地说，她“不把这叫绘画”，他稍稍纠正，“说到底，这不是绘画，这是一种艺术，一种表达”。

“爱，意味着自己拥有”

对他而言，“一幅画，就是某种让人久久冥想的东西，人们总是怀着同样的快乐观看它。也许由于每个人之所是或者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的多种多样，快乐也不同。”“标准就是弄清楚我是不是愿意让它挂在家里……爱，意味着自己拥有。”他补充道：“可爱的东西，是不必要的东西。我活着不是为了攒钱……我活着是为了活着。我尽力活在此刻，这并不总是很容易的。”

“像煤气灶一样必不可少”

没有高保真组合音响，他就没法活，这套音响是十多年前买的，花了大约八千法郎（“这不是名牌，而是不同的组合，我请教了 314 别人，如此而已。像买风琴一样，我也是请教了别人，如此而已。”）“这是某种像煤气灶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即使身无分文的人也需要音乐，这是一种像食物一样的需要。”在这些唱片中，有“维

^① 弗朗斯·哈尔斯(Frans Hals, 1580/1583-1666), 荷兰巴洛克画家, 与伦勃朗和弗美尔同为荷兰黄金世纪的重要画家, 擅长画肖像画, 对现实主义画派和印象派产生了很大影响。——译者

瓦尔蒂、巴赫、巴赫的许多大合唱、《弥撒曲》、《安魂曲》、蒙特威尔第^①”。他对“现代音乐有点无动于衷……不是因为他想无动于衷，而是因为这是一个耳朵的习惯问题”：“马勒、若利韦^②、梅西安^③，是我的智力完全能够达到的东西”，但“在某些纯属音列范畴的电子音乐中，有相当好的东西，也有在我看来是恶作剧的其他东西，如同在绘画上一样”。

“当一部重要的作品出现时，你会知道的”

他很少听音乐会而且不属于那些“由于应该看什么东西就看”的人，他不读《世界报》（他的日报）的演出评论，更愿意参考一个朋友的批评或评价：“当出现某种成为一部重要作品的东西时，无论是在戏剧、电影还是其他方面，你会知道的。你会知道的，因为你总是跟许多人有联系，正因为如此，我不读评论。如果要读，应该全读。”最近，他去看了《一人秀》（*One man show*），“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毛派分子，独自在舞台上”：“我看了一半就离开了，因为他演得糟透了。”要是他去看戏，他不一定要在看完戏之后吃一顿丰盛的晚餐：“人不能干很多事情……应该充分地享受事物。”

① 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 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意大利歌剧的创始人之一，处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音乐的转折点上，作品主要有牧歌、宗教音乐作品，代表作有歌剧《奥尔菲斯》（1607）、《尤利西斯返乡》（1640）等。——译者

② 若利韦（André Jolivet, 1905-1974），法国作曲家，试图追求一种人道的、宗教的、魔法的、咒语的音乐，作品体现了抒情、明晰、大胆、简洁、晦涩的复杂特点，代表作有《神力钢琴曲集》（1935）、《第一钢琴奏鸣曲》（1945）等。——译者

③ 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 1908-1992），法国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20世纪下半期最有影响的作曲家之一，他的作品技法独特，浸透了象征主义色彩和神学思想，主要有《耶稣升天》（1933）、《时间结束四重奏》（1940）、《图伦加利拉交响曲》（1946-1948）、《圣灵降临节的弥撒》（1950）等。——译者

“我自视很高”

他拒绝在穿衣方面的任何“讲究”：“如果有人想见我，并不是为了我脚上穿的鞋，我的手帕或扣眼儿，或我系的领带。如果有人想见我或邀请我，他们邀请的是本来的我。换句话说，我自视很高”，他明确地说，再次抓住机会表明他既与资产阶级趣味又与（作为他妻子家族成员的）社会学家向他提出的问题保持距离。他补充道，“我觉得五百法郎对一件衣服足够了，花一千法郎在一件衣服上，没有必要，我不在乎”。

“烹调，是一种精神状态”

315

他非常忙，中午几乎没有时间，他“期待人们发明一种药丸，免去白天吃饭……烹饪，是一种精神状态”；为了能够品味它，应该“放松”：“鲟鱼子，某些俄式菜肴，实属美味。就烹饪而言，不仅是做菜，还有环境。比如吃熏鳗鱼，在阿姆斯特丹的鱼市吃比在一家可笑的饭馆吃更愉快……一种经过烹调的菜肴，但是一种真正经过烹调的菜肴，也就是说做一道马德拉调味汁需要两天，用文火慢慢炖某种东西，这才是烹饪，这才是艺术。但人们今天谈到烹饪时，不再是一种烹饪了，人们把各种东西掺和到一起并且在五分钟之内完成烹调，这是经过解冻的半成品，其实这不是烹调。再也没有准备过程，再也不是一门艺术。”

“某种礼拜仪式”

他喜欢在《米其林指南》或《戈尔和米尤》^①上“寻觅饭馆”并且

① 法国一家美食杂志，由两个记者与专栏作家戈尔（Henri Gault）和米尤（Christian Millau）于1969年创立，他们也推出了同名的美食评论指南，倡导一种回到食物原味的“新烹饪”。——译者

回味“三年前喝过的酒，一种香气，一种波尔多葡萄酒，一种特定年份的特殊的圣埃斯特福红葡萄酒”：“我对1923—1929年装瓶的……波尔多葡萄酒记得很清楚……我还有十几瓶1923年的葡萄酒。另外我还有四瓶1870年的烧酒。”一瓶好酒，“不应该跟随便什么人喝……需要某种礼拜仪式，这种礼拜仪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让这酒与室温相同，是为了喝酒。这是领圣体，（只能）与能够享受同样方式的人一起（庆祝）……我宁愿一个人喝，也不愿意与那些不懂享用的人一起喝”。“喝香槟酒的晚餐，有点民俗的色彩……酒是有差别的，不同的，把香槟比作酒，有点像把一种短笛比作一个乐队。”

“我喜欢快活”

他的图书馆里的书“来自一位祖母”或从“普罗旺斯路的一种店铺里”买的，在这些书中，有精装的“17世纪风格”的书，保存这些书是“因为书外表漂亮而不是对内容感兴趣……薄叙埃^①的《³¹⁶ 316 词》，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一本17世纪的书，这是一本当时被认为淫秽的书，很奇特”。在巴黎，他只剩下“有点类似于哲学和宗教”的书，“还有点诗歌”；“小说类”的书（大约有两千册）都在乡下的房子里。他还有关于德国历史、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书……除了“精装书，这有点可笑的方面”之外，“书对我而言，更多是一种阅读工具而不是为了书的书”。他不属于任何俱乐部（“有些人喜欢有统一的制服或加入某个团体、某个东西、某个俱乐部。我则

^① 薄叙埃(Jacques-Benigne Bossuet, 1627-1704), 法国教士、布道者、作家, 代表作有《论普遍的历史》等。——译者

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自我和个人主义”)。他不再打猎,“因为要远走,因为很累,也因为很贵”;他在假期打打网球,“有兴致”就去滑雪。“我不会把滑雪板扛在肩上,如果旁边有缆车。我喜欢下坡而不是上坡,我喜欢快活”。

只要打开一本《艺术知识》(*Connaissance des arts*)这样的杂志就可以发现统治阶层将艺术作品纳入其中的系列,一个区别的和区分的、被选择和有选择的奢侈品空间:珠宝、毛皮服装、香水、地毯、挂毯、古董家具、挂钟、灯具、青铜器、瓷器、上彩釉的陶器、银器、精装本、豪华汽车(沃尔沃、SM^①、奔驰、劳斯莱斯等)、高档香烟(黑猫、金边臣、箭牌、乐富门),高级时装(迪奥店和老英格兰)、城堡、乡村别墅、领地、乡村小城堡、“有特色的产业”、“带池塘的花园”、香槟酒、波尔多葡萄酒、勃艮第葡萄酒、白兰地、旅行、摄影。巴黎的估价拍卖公司将它在德鲁奥公馆或加列拉宫^②的拍卖品的插图精美的公告,登在为伏尔泰码头和圣-奥诺雷郊区的古董商开辟的两个广告栏旁边,这些古董商提供“家具和艺术品”、“古彩釉陶器和古瓷器”、“绘画、雕像、家具和艺术品”。一则关于展示美国极现实主义的阿尔蒂画廊的广告与一则提供“法国和英国19世纪室内家具”的“收藏品”广告比邻,而一则介绍马克斯·阿戈斯蒂尼(据说是出生于1914年的后印象派画家)的马丁-卡耶画廊(圣-奥诺雷郊区)的公告与杜邦打火机的一则

① 雪铁龙的一款高档车。——译者

② 指巴黎市时装博物馆。——译者

广告相对。¹⁸

物质占有与象征占有之间的结合赋予奢侈财产拥有一种平庸的稀缺性,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将奢侈财产变成卓越的特别象征:“白兰地王子:为了谈论白兰地王子,需要白兰地语言中非常古老的词语。丰腴:一种白兰地的体质。白兰地王子是丰腴的,但是是一种不油腻的丰腴,一种不过是强壮的轻盈的丰腴。这是波提切利之于鲁本斯。香气:上等烧酒的葡萄气味的味道,白兰地贵族。白兰地王子这种陈年的上等烧酒,有某种气味,一种优雅的、纯洁的气味,这种气味是沁人心脾的,是纯粹的。红棕色酒桶:非常古老、非常文明的酒桶,抛弃了它们的生硬,脱去了它们过多的丹宁。白兰地王子在红棕色的酒桶中老去。于是它就变得辛辣、清澈、醇厚,但适度。乐园:就是人们所说的桶装酒的储藏库,陈年的白兰地窖藏保存在这里。白兰地王子在奥塔尔家族的乐园中,在白兰地城堡中被养大。白兰地王子是限量生产的——每年只有几千瓶——,它只出现在精心挑选的商店和饭馆中。”(p. 16)

对勃艮第葡萄酒而言,也存在着同样的爱用古词的玄奥作用:“在勃艮第,到了 *épondage*^① 的时节。最末一次葡萄收获的回声几乎还未消失,人们已经开始忙着栽葡萄了。葡萄种植者用剪刀干净利落地剪掉没用的长茎并准备让葡萄藤接

¹⁸ 考虑到合理信息的密度与其质量同样重要,我们选择仅仅从一期杂志(1973年11月)中提取在这里使用的全部文献,对这本杂志两年(1972-1973)的认真考察,使得我们有可能保证这一期杂志的代表性。

① 意为“整枝”。——译者

受来年春天的修剪：这就是 *épondage*，棘手的活儿，这活儿要求很多技巧，由莫亚尔^①为您监管。在最负盛名的气候中为您的快乐精心挑选的勃艮第葡萄酒，只供给有资格的经销商。”(p. 200)

行家掌握了一种附加的、一种带有技术偏好的古老而深奥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将博学的品尝与无能为力而被动的、局限在无言的快乐瞬间之中的简单消费分开，由此，行家被公认为有资格把他通过物质手段获得的稀有财产在象征上据为己有：“对几个行家来说，在法国只有一种啤酒。这倒也没什么。但一个行家越在行，他就越挑剔。固执己见。如果说某些行家只看重 1664 年，这不过是因为一瓶 1664 年的酒能提供一种独一无二的快乐。一种如此稀有的快乐……另外，这是一种三百年的快乐……有时有必要重新找到真正的趣味。”(p. 187)“几乎没有人能够解释什么是一种优质白兰地，白兰地城堡的男爵则有权解释。1795 年，奥塔尔男爵决定在白兰地城堡定居。……他也在城堡的拱顶之下发现了让他的白兰地成熟的优选之地。要是人们知道一种优质白兰地需要漫长的岁月变陈，才能成为 V. S. O. P(四年半以上藏品)，他就可以理解这是多么重要了。自 1795 年以来，白兰地城堡丝毫未变。拱顶未变，陈酿未变，对这优质白兰地的照管未变。”(p. 155)

最终，购买一个“无价”之物意味着炫耀性和无动机的消

^① 法国勃艮第地区的市镇努伊-圣乔治(Nuits-Saint-Georges)的一个葡萄酒交易公司。——译者

费,这种消费构成了承认无价之物会被赋予的价值的最不容置辩的方式,于是这种方式成了唯有金钱能实现的不可将爱归于金钱的绝对证明:“什么是真正的奢侈?——这是精致:对那些能买得起的人是一种必需,对那些一见便心生向往和喜爱的人是一种手段,她们能在最简单的物如披肩、裙子、鞋子中找到这种奢侈,如果它是美丽的。——可是,昂贵?——高级时装,就是绝对的严格而且绝对是无价的。”(马克·博昂,克里斯蒂安·迪奥公司的艺术指导,访谈)“应该成为佩里耶-茹埃^①并拥有克拉芒^②山坡的葡萄园才能提供并为我们提供这种癖好:一种几乎专门用最贵的葡萄酿造的香槟酒。但这18世纪的酒瓶里装的78厘升对为了香槟而喜欢香槟的人而言是无价的。尤其是涉及一瓶标有制造年份的好酒。”(p.14)“为了突出您的个性,我们制造了奢华的、精致的、小巧的手表……我们只生产了有限的系列。我们的每只表都强调那个懂得选择它的男人或女人的性格……您将拥有一只唯一的和珍贵的手表。”(p.81)

我们好像在读马克思写的一段话:“人一下子就成了私有者,也就是说成了绝对拥有者,这个绝对拥有者显示他的个性,与他人区分开来并通过这种绝对的拥有与他人相关:私有财产是他个人

① 佩里耶-茹埃(Perrier-Jouët):法国香槟酒生产企业,创立于1811年,以生产“美好年代”香槟酒闻名。——译者

② 克拉芒(Cramant):法国香槟-阿登地区马恩省的一个市镇,著名的香槟酒产区。——译者

的、有区别的存在方式，因而是他的基本生活。”¹⁹对具有物质基础的象征物品如绘画的占有，赋予财产的区分有效性一种新的力量，把纯粹象征的占有方式贬至象征替代品的低等地位：将一件艺术作品据为己有，就是宣告自己是物品和对这个物品的真正爱好的绝对持有者，于是这个物品变成了对所有那些不配拥有它的人的物化否定，那些人由于不具备把它据为己有的物质手段或象征手段，或简而言之，不具备一种足以“为它献出一切”的强烈占有欲，所以不配拥有它。

艺术作品的消费，即这些分析的几乎过分明显的例证，不过是这些区分实践中的一种而已。让我们想想对自然的新崇拜吧：别墅的时髦和小资产阶级对旅行的拒绝使对自然的新崇拜再度流行，这种新崇拜与统治阶层的最“古老”层次的“古老法国”生活风格有一种深刻的联系。动物、花草、打猎、美食、自然环境、骑马、花园、垂钓、葡萄酒工艺、远足，这些《乡村知识》的常设专栏，呈现了合法的物品及占有方式的一种详尽纲要，《乡村知识》之于有关自然的高雅品位，相当于《艺术知识》之于有关文化的高雅品位。把“自然”、飞鸟、花草、风景据为己有，意味着一种文化，是那些出身世家的人的特权。拥有一座城堡、一幢乡村别墅，甚至一所住宅，只是一件关乎钱的事；还应该把它据为己有，把酒窖和装瓶据为己有，装瓶被描述为“一种与酒深深交融的行为”，“爱酒者”应该“至少完成一次”这种行为，应该把打猎的回忆、垂钓的秘密和园艺的

¹⁹ K. Marx, 《Manuscrits parisiens, 1844》, in: *Œuvres*, t. II, *Economie*, Paris, NRF, 1965, p. 24.

秘诀据为己有,这些能力既是古老的又是慢慢获得的,如同烹饪或对酒的认识,总之,应该把贵族或农人的生活风格、他们对逝去的时间的漠然和他们在持久事物中的根深蒂固据为己有。“没什么比腌制小酸黄瓜更简单了”,我母亲声称,“条件是采摘小黄瓜时正当新月,用亚麻布擦拭小黄瓜,唯有亚麻布的表面才这么粗糙,然后用粗盐在粗陶罐里渍二十四小时。条件是放进擦干的而不是干瘪的小黄瓜并且把小黄瓜卷起来码放在密封的罐里,等等。”(《乡村知识》,1973年9月)拿出一罐“自制的小酸黄瓜”,“祖母的小酸黄瓜”,且以这样一种修饰语搭配,就像凭着人们会在古董商那里发现的“一个18世纪法国乡绅的小画”,或人们在旧货商那里找到的“迷人家具”,来炫耀所耗费的时间和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只能通过长期接触有修养的老人或老物件,也就是从属于一个古老的群体才能获得,这个群体是拥有所有这些属性的唯一保证,这些属性之所以具备最高的区分价值,是因为它们是经过漫长的时间过程积累起来的。

起作用的,就是“个性”,也就是个人的素质,这种素质体现在将一件有品质的物品据为己有的能力中。²⁰ 具备最大的区分能力的物品是那些最能证明占有的品质进而最能证明物主的素质的物品,因为对物品的占有要求时间或能力,而能力,比如绘画或音乐修养,意味着一种漫长的时间投入,无法匆忙地或者间接获得,因

²⁰ 我们看到,个人主义倾向和对个人独特性的各种形式的赞扬之倾向被纳入配置的最深处。按照阶层也就是按照资本种类发生变化的,是(事实上和法律上)构成特别被颂扬的人格属性,即智力价值、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等,而资本种类是阶级从属的主要基础。

而表现为个人的内在素质的最可靠证明。由此,对卓越之寻求给予所有这类实践的地位便可得到解释,这类实践,如艺术消费,要求一种纯粹的、无目的的以及对无疑最宝贵和最稀罕的东西的耗费——尤其是在那些拥有最大的商业价值、最不该浪费这种东西的人身上——这就是时间的耗费,这时间用在消费上或用在合宜的消费意味着的文化获得上。²¹

在所有力求创造或积累象征资本的转变方法中,购买艺术作品作为“个人趣味”的具体证明,是最接近最无可指责的和最不可模仿的积累形式的方法,这种积累形式也就是以自然“区分”、个人“权威”或“修养”的形式对区分符号和权力标志的归并。专门占有无价作品与炫耀般地挥霍财富并非没有相似之处:这种占有允许无可指责地炫耀财富,这种炫耀也不可避免地是向所有那些无法将他们的存在与他们的拥有分开、无法达到非功利性的人发出的一种挑战,是个人优异的最高体现。正如文学和艺术修养被 321
赋予高于科学或技术修养的特权所证明的,人们称为“一种高度修养”的东西的专门持有者不过是将时间虚掷在社交节日中,他们不考虑直接收益,将时间消耗在越无用就越有威望的活动中。

²¹ 事实上,应该一方面考虑这个事实,即时间无疑是一种最难以回避的人类学局限性之一,尽管有可能间接地把别人的时间据为己有,或通过所有合理化策略节省时间,尤其利用反季节和反地点的自由来避免拥挤的后果;另一方面考虑以下事实,即时间的商业价值——这种价值或多或少按照获得报酬的方式,比如医生的出诊时间、月薪或外快被体会到——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而增加。这样,就可以理解时间节日(potlatch de temps)的价值,所有旨在“给予”或“赠与”别人时间的行为——在接待中奉献的东西的重要方面——构成了这个节日,当然,也就可以理解所有这类娱乐,这类娱乐的象征价值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自支配时间和金钱的能力,这种能力通过这种做法即“不慌不忙”也就是徒然地消耗具有这样一种价值的一段时间得到证明。

统治阶层没有垄断艺术作品的用途，这些用途在客观上——有时在主观上——受到对独占之寻求的支配，独占证明了物主的独特“个性”。但是当物质占有的条件缺乏时，他们在寻求排他性方面只剩下占有方式的独特性：以别的方式喜爱同样的事物，以同样的方式喜爱不大适于得到赞美的别的事物，存在着这么多重复、超越和转移策略，这些策略作为趣味的永久变化的原则，使得某些被统治阶层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获得专有权，这些被统治阶层在经济上不那么富有，进而注定要几乎专事象征占有。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最有风险的但也是最有收益的区分策略有一种特殊的偏爱，这些策略旨在显示属于他们的特定能力，从而把微不足道的对象，或更糟，把已经被其他阶级或阶层以另外一种方式视为艺术作品的对象（如拙劣的艺术品），变成艺术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是消费方式如是创造了消费品，而且是难以理解的乐趣把交付大众消费的“普通”财产如西部片、连环画、家庭照片、涂鸦变成了高雅的和区分性的文化作品。

占统治地位的趣味的变种

当我们在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构成的系统中重建这些实践时，当我们由此被迫提出文化和象征占有的意义问题时，这些实践的苦行色彩表现得非常明显，而文化和象征占有是统治的劳动分工留给穷亲戚的所有物质占有的和所有人间食粮的高贵的和升华了的替代品。与统治阶级场的对立两极相对应的生活风格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明确而彻底的，而教授与企业主之间（以及也许

尤其是两个等级的中小企业主之间)的对立则让人想起将人类学意义上的两种“文化”分开的对立。一方致力于阅读,阅读诗歌、哲学随笔和政治著作、《世界报》和(偏向左派的)文学或艺术月刊;而另一方则致力于打猎和赛马赌博,若阅读,则阅读历史故事,《法兰西晚报》或《黎明报》、《汽车报》和《大众阅读》。对于前者,是戏剧,尤其是古典戏剧或先锋戏剧(比如普朗雄^①导演的《达尔杜弗》或《推迟》、洛尔迦的《流血的婚礼》^②或屠格涅夫的《村居一月》),博物馆,古典音乐,法国音乐台,“跳蚤市场”,露营,登山和步行;对于后者,是旅行和工作餐,通俗喜剧(罗贝尔·拉穆勒^③、马塞尔·阿沙尔^④、弗朗索瓦丝·多兰)和杂耍歌舞剧场,电视娱乐节目,展销会,拍卖行和“高档店铺”,豪华汽车和游船,(三星级)旅馆和温泉城。²

① 普朗雄(Roger Planchon, 1931-2009),法国导演、剧院经理、演员。《推迟》是他本人创作的一部农村题材的剧本(1962)。——译者

② 西班牙诗人和剧作家洛尔迦(Federico Garcia Lorca, 1898-1936)1932年创作的诗体悲剧,描述了西班牙农村的仇杀风俗和无法克制的、不可实现的爱情,表现了作家对乡土的眷恋。这部剧作因作家受到超现实主义影响而具有奇幻的色彩。——译者

③ 罗贝尔·拉穆勒(Robert Lamoureux, 1920-),法国演员、戏剧导演、电影导演,1950年代最高盛名的通俗喜剧演员。——译者

④ 马塞尔·阿沙尔(Marcel Achard, 1899-1974),法国作家、演员、导演,成功地创作并上演了许多轻歌剧和通俗喜剧。——译者

² 我们在这里依靠对法国民意调查公司(S. C., V)调查的对应分析的结果,我们在上面研究过这项调查,在这里将不详细列举这些结果。如同在我们的调查中,第一条因素轴使拥有(相对)更多自由时间和文化资本但在经济资本方面(相对)更贫乏的阶层(教授,以及在次要程度上,国营部门的管理者)与在经济上最富有和涉入经济生活最深但相对而言最缺乏文化资本和自由时间的阶层即工商企业主互相对立,工商企业主由于财产,由于企业财政管理,也由于股份和在从业过程中通过工作获得的一种能力,而不是通过求学或阅读经济和金融报纸,涉入经济生活。私营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在这两个方面占据一个中间位置。

奢侈趣味

动物	Courrèges	珠宝店	
购买	Dior	Boucheron	
Oisellerie du Pont-Neuf	Hermès	Cartier	
Oisellerie Vilmorin	Lapidus	Chaumet	
动植物标本店	Rabanne	Van Cleef et Arpels	
Nérée, Boubée et Cie	Saint Laurent	Mauboussin	
古董店	Ungaro	租赁	
Aaron	室内装饰	工匠	
Bensimon	Carlhian	Marouani et Tavel	
Hagnauer	Demachy	船	
Jansen	Jansen	International Sea Service	
Kugel	殡葬	城堡	
Lagrand	Ets Marette	Préfecture d'Indre-et-Loire	
Laroussilhe	Robiot	仆人	
Lévy	儿童	Bons Secours	
Litybur	玩具	火车	
Mallie de Fonfais	Le Nain Bleu	S. N. C. F. D. C. P.	
Mancel	家具	汽车	
Perrin	Bonnichon	Murdoch	
Taillemas	Thireau	食品店	
银器	服装	Côte de France	
瓷器	Baby Dior	Dominique	
Andrieux	Dominique	Fauchon	
Helft	Enfantillage	Godiva	
Kugel	Petit Faune	Hediard	
Nicolier	Petite Gaminerie	Petrossian	
浴缸	Minimómes	Maison de la Truffe	
Au bain de Diane	焰火	占星家	
Juif-Delepine	Ruggieri	Belline	
鞋店	花店	Criss	
Roger Vivier	Boullet	Delya	
诊所	Lachaume	Martinez	
Clinique du Belvédère	Lambert	Sabato	
兽医诊所	Moreux	皮件商	
Clinique du Dr. Neienat	Veyrat	Hermès	
Clinique vétérinaire de	皮货店	Morabito	
Maisons-Alfort	Révillon	医生	
Fondation Windsor	美容院	Boivin	
Hôpital Frégis	Arden	Chartier	
理发店	Carita	Dolto	
Alexandre	Guerlain	Duhost	
Arden	Harriet Hulshard Ayer	Hervé	
Carita	Langome	Lacan	
Jean-Louis David	Monteil	Lagache	
服装店	Helena Rubinstein	Leibovici	
Balmain		Nacht	
Cardin		Vellay	
		地租	送餐饭馆
		Benadava	Battendier
		Catan	Casimir
		洗染店	Lenotre
		Billard	Marquise de Presles
		Bobin	Pons
		Pouyanne	Pontel et Chabot
		Starisky	Scott

活动索引

· 此索引为法国奢侈消费名录。——译者

女仆和男仆,女厨师,园丁,并严格规定他们的报酬。

家仆		
膳食总管	月薪	1 500 法郎
管家	月薪	1 500 法郎
司机	月薪	1 200 法郎
保姆	月薪	1 200 法郎
男仆	月薪	1 000 法郎
女厨师	月薪	1 000 法郎
分工不同之园丁	月薪	800 法郎

他对于在法兰西剧院没有终身包厢感到遗憾,而且他也许不无恶意地蔑视盛装夜场的订票价格。

法兰西剧院	
季度预定:	
盛装夜场	108 法郎
普通日场	85 法郎

他谈到时髦的医生,神秘的出诊费用,不管是产科医生,如埃尔维医生、杜博医生、韦莱医

生或夏尔捷医生,还是精神分析医生,比如拉克医生、达尼埃尔·拉加什医生、萨沙·纳赫特医生,莱波维西医生,多尔托女医生。

医生	
无名气的精神分析医生	每次 60 法郎
有名的精神分析医生	每次 200 法郎起

他描述了上塞纳布洛涅的贝尔维代尔诊所的朝向花园的套间,但这里禁止接通电影放映机,以避免电子设备的可能干扰——但这条禁令在经过负责人的特许之后,可以撤销。

诊所	
最贵的:贝尔维代尔诊所	
分晚全套价格:	
包括:产房,护理,膳宿和常用药。	8 天
朝向天井的小房间	800 法郎

不同文化实践的风格、这些文化实践牵涉的社会哲学观和世界观,会表现得更明确,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实践依赖的实践空间;如果我们知道先锋派戏剧或阅读诗人或哲学家的著作与资产阶级戏剧或杂耍歌舞剧场对立,与阅读历史故事或惊险小说或插图周刊对立,就像教授的步行、露营、在乡村或山区度假,与体现旧资产阶级特点的一系列奢侈活动和奢侈财产如梅塞德斯或沃尔沃、游艇、旅馆度假、温泉城疗养对立,与成为自由职业者特权的一系列最昂贵和最有声誉的文化和物质消费如美术书、照相机、录音机、游船、滑雪、高尔夫、骑马或滑水对立一样。

没什么比审美领域中两个在文化资本方面如此接近的等级间的对立,即自由职业者与教授之间的对立,能更好地证明审美选择

从属于一系列构成生活风格的伦理选择，²³这种对立是以与不同轨迹相关的伦理配置之间的对立为依据的，并在如此不同的经济条件中找到了强化和实现的条件。实际上，除了考虑资本结构方面的差别之外，只需考虑属于轨迹的差别，尤其是以下这个事实，即通过积累学校教育资本而进入统治阶级的人的数量从统治阶层到被统治阶层逐渐增加，就可以理解教授，其次是工程师和管理者最倾向于将他们的苦行配置转向文化资本的积累了，这种苦行配置是通过并为了从前的积累而培养的，而且他们贫乏的经济资本越使他们无法奢望很多竞争性的利益和快乐，他们就越本着单一的良好意愿行事，而自由职业者拥有实现奢侈放纵的配置的手段，这种配置与一种资产阶级出身相关并在意味着一种强大的象征资本积累的职业要求中获得了鼓励。教授（和国营部门的管理者）的苦行的贵族主义与自由职业者的奢侈趣味对立，如同我们看到的，教授（和国营部门的管理者）有系统地选择费用最低和最有苦行色彩的娱乐，以及严肃的甚至有点严苛的文化实践，如参观博物馆，尤其是外省的博物馆（而不是像自由职业者那样参观大型展览、画廊和外国博物馆）；而自由职业者则集中了（文化上和/或经济上）最昂贵和最奢华的消费，如阅读插图月刊，经常光顾音乐厅、古董店和画廊，在温泉城度假，拥有钢琴、美术书、古董家具、艺术作品、照相机、录音机、外国汽车、滑雪、打网球、打高尔夫、骑马、打猎或

²³（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给予的宽泛定义的）行政管理者在较大比例上出身于民众阶级或中产阶级，由于趣味上的苦行主义，他们非常接近中学教师，尽管他们学历不高，但更倾向于选择不那么奢侈的文化活动，如观看古迹和城堡。

潜水。²⁴ 自由职业者既没有必要的能力也没有必要的配置,因而无法将一种经济效益很高的文化资本提供的利益再次有效地投入到经济之中,他们的修养和他们的生活风格使他们与“智识价值”密切相连(他们输送了许多业余作家),²⁵ 他们在所从事的高雅运动和游戏中,在招待会、鸡尾酒会和上流社会的其他交流中,除了得到这类活动提供的内在满足和它们实行的教育作用之外,还得到高雅的社交机会,这些社交机会使得他们有可能建立或维持关系并积累对他们的从业而言必不可少的信誉资本。²⁶ 这不过是奢

²⁴ 如同在关于我们调查的分析中一样,关于法国民意调查公司的调查的对应分析所抽出的第三个因素,使得自由职业者与其他阶层对立,自由职业者倾向于消费和奢侈的娱乐,正如对这些(按照递减的次序排列的)特点的简单列举所证明的,这些特点对第三个因素的绝对贡献最大,包括:订阅插图月刊,拥有照相机,潜水,拥有录音机、美术书,打网球,在温泉城疗养,打桥牌、打猎、滑雪、骑马、出席职业鸡尾酒会,等等。我们知道,《艺术知识》或《法国家居》这些杂志的读者中,自由职业者占很大部分(15.5%和18.5%),此外,我们能够从广告媒介研究中心1970年进行的调查出发,将这些刊物的读者身上特别常见的属性如拥有古董家具和艺术作品、经常光顾拍卖行和画廊归于这个阶层。最后我们通过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关于娱乐的调查得知,自由职业者通过经常举行招待会而与众不同。

²⁵ 被收入《世界名人词典》的法官中的14.5%和医生中的13.5%(与高级官员中的9.7%或企业主和工厂主中的4.2%相对)至少写过一本非专业(政治或文学)著作。

²⁶ 这些普遍的倾向按照职业、专长、住所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因此,医生的储蓄比率比全国平均比率高出很多(可利用收入的30%对15%),但收入也高出很多,他们总体上消费这份高收入的比例也很大,尤其是在度假(可利用收入的10%)、汽车和不动产方面:他们常常(超过三分之二)是他们房屋的主人,往往有别墅、出租的房屋、农场、树林和土地(实际上从来没有工厂),还有股票。但对乡村内科医生而言,买不动产比金融投资更常见,金融投资一般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对外科医生和专科医生而言更常见(cf. Centre de recherche économique sur l'épargne: *Enquête sur les comportements patrimoniaux des médecins exerçant en pratique libérale*, Paris, CREP, 1971, 3 vol.). 我们可以假设,外科医生和其他专科医生——尤其是巴黎的——将他们的一大部分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尤其是购买艺术品上。

侈的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奢侈,即这种“约定俗成的大肆挥霍”,如同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作为发挥“信用手段”作用的“财富展示”,是一种“职业的必要性并用来炫耀”。²⁷ 相反,教授的选择(比如他们显示出对一种和谐、简约和朴素的室内装饰或对简单但摆放漂亮的菜肴的偏好)中没有一种不可理解为某种乐意做迫不得已之事的方式的,他们是通过最大程度地扩大他们能够从他们的文化资本和自由时间中获得的利益(与此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他们的金钱花费)这样做的。如果说前者并非总是具有与他们的财力相称的趣味,后者则几乎从不具有满足他们的趣味的财力,而且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这种差距迫使他们满足于一种苦行的审美态度(艺术家生活风格的更具苦行色彩的变种),这种审美态度“利用”它所拥有的东西,用“田园风格”代替古董,用罗马尼亚地毯代替波斯地毯,用装修的谷仓代替祖传的乡村别墅,用石版画(或复制品)代替绘画,这么多隐藏的替代品,如同真正穷人的汽油或赝品一样,都是贫困向富有的致意。²⁸ 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或更确切地说与学校教育资本之间的差距,毫无疑问是他们倾向于对社会秩序提出抗议的根据之一,他们的学校教育资本是被证实了的文化资本形式,而这种社会秩序之所以没有完全承认他们的价值,是因为它承认一些分类原则,这些分类原则却有别于曾经承认他们的学校教育系统的分类原则。这种能力主义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贵族主义的)反抗夹杂着忠实、拒绝和不可能性或

²⁷ K. Marx, *Le capital*, livre I, chapitre XII, in: *Œuvres*, t. 1, *Economie*, Paris, NRF, 1965, pp. 1097-1098.

²⁸ 作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一种类似差距的产物,同样的配置形式也出现在中产阶级的新阶层成员身上(参见后文中关于一个“生活充满激情”的女护士的访谈录)。

不可能性的拒绝时,它的力量增强了,而忠实、拒绝和不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拒绝,与一种小资产阶级或民众阶级的出身密切相关,而且附属于纯粹经济的限制,妨碍他们彻底跻身资产阶级。²⁹相反,对那些像自由职业者一样靠向一类顾客出售文化服务来谋生的人而言,积累经济资本与积累象征资本,也就是说与获得一种才能的名声以及一种威望和名誉的形象,混同起来,而这种名声和形象很容易转化为地区或国家名流的政治地位: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他们是而且自感与现行(道德)秩序一致,毕竟他们通过日常干预大力促进了现行(道德)秩序,他们的医生公会宣言或政治立场和行动不过是这些干预的最显著形式。³⁰

²⁹ 一些矛盾来自文化资本是一个被统治的统治原则这个事实,而摆脱这些矛盾的主观上可接受的方式之一,在于以管理者的身份参加负责表达和维护被统治阶级利益的组织。因此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的成员在觊觎政治代理人地位(并有不等的成功机会)的那些人(对立法选举的候选人的社会特点的分析有助于对政治代理人的地位有所了解)在场中的分布,与他们各自的阶层在相对自主的统治阶级场中的分布相当严格地一致,我们看到,统治阶级场本身也是按照与社会阶级场的结构相似的一种结构形成的。于是,政治斗争也是为了推行合法的(也就是占统治地位并照此被忽视的)统治原则而进行斗争的领域之一。

³⁰ 依据法国民意调查公司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之前对全国200名医生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59%的医生宣称有意投票给吉斯卡尔,16%宣称有意投票给密特朗,9%宣称有意投票给沙邦-戴尔马*,11%宣称有意投票给另一位候选人,其余的人(5%)尚不确定;当被问及在他们看来哪个候选人最有可能当选共和国总统时,71%提名吉斯卡尔,12%提名密特朗,3%提名沙邦-戴尔马,1%提名另一位候选人,13%无法确定(*Le Quotidien du médecin*, n° 710, 3-4 mai 1974);如果我们读读医生选中的吉斯卡尔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的尤其符合医生期待的访谈,无疑可以对医生推选这个人这一点有一种比较正确的看法,他在访谈中宣称赞同大学生的选拔,把自己变成了自由行医、家庭医生与公共医疗和私人医疗共存的维护者,声言准备与社会保险的“某些浪费根源”做斗争,赞同医生公会的存在,他看不出医生公会有任何需要改革之处。

* 沙邦-戴尔马(Chaban-Delmas, 1915-2000),法国政治家,曾担任法国国民议会议长、法国总理。——译者

一位“非常传统的”教授

让·L., 获得了物理教师学衔, 乌尔姆街的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 36岁, 是巴黎一所大学的助教并住在西北郊区; 他的父亲获得了语法教师学衔, 是中学教师, 他的祖父是小学教师。他的妻子, 药剂师的女儿, 是牙医, 她是一所牙科学校的教师并拥有一家诊所。

“在跳蚤市场找到的一张路易十三时代的修道院餐桌”

他爱好“简约”和“朴素”, 不喜欢“大靠垫和大窗帘”, 也不喜欢“室内装饰家设计的”房间, 他对“室内的整体和谐相当敏感”: “如果有运气找到一件非常漂亮的家具, 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件非常漂亮的家具, 这就行了; 这对一个房间来说就够了”。 “在我们家, 不太久之前, 有我们结婚时买的便宜家具——这样就有一点现代感, 还不错——, 镶柚木的家具, 不贵, 只是椅子快要不行了……现在, 我们有一两件我们寻到的古董家具, 真正的古董……一件路易十三时代的餐桌, 还不错, 是在跳蚤市场找到的, 有人指点我们, 还有一个路易十三时代的衣柜, 也不错”, 这是在亚眠的一个古董商那里发现的。 “自然, 路易十三时代的椅子, 我们没有, 因为太贵了, 而且也不结实, 如果真的是路易十三时代的; 那么, 我们可以让人做路易十三时代风格的椅子, 但不想让人当成古董。” 房子的陈设和装饰尤其是他妻子的事情, 她很重视这件事情; “她很懂行, 我完全不行, 尤其是在价钱上……我很乐意, 可是最终, 要是我一个人, 我想我真的不会为此花什么时间, 我在这上面没什么品味, 但我妻子很有品味, 而且最后我很喜欢”。 他的妻子非常喜欢古陶: “我很愿意陪她, 要是她说‘走吧, 我们去看看陶器’, 我会很高兴, 我觉得

她比我更有感受力……有种东西我很愿意买,但我还没有买,我有时去看看,这就是古代科学仪器,因为人们做出了相当了不起的东西,无论上个世纪,还是三四个世纪之前”。

“我更喜欢读某种比较简练的东西”

328

在家里,他做点儿修修补补而且“由于迫不得已”：“我妻子让我做的,说这个或那个东西需要修修了,我干活会不必要地细致,我在消磨时间;我做事可以更快,要是我干得不太好的话,但我从中得到了快乐,想到这东西能修好,又是我力所能及的”。

他没有电视,但他时不时有机会看电视。“事物本身的价值在电视中往往过分被冲淡;关于一个固定的主题,我更喜欢读某种比较简练的东西。不过还是有些事情对我而言是不可替代的。我承认,我曾在母亲家看到人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类似这样的事情……我记得看过伊凡·伊里奇^①五分钟,我永远都会记着,我很高兴看到了他而不只是读了关于他的事,很高兴看到这是什么类型的人。”

“我的全部阅读都曾经以《世界报》为依据”

他会收到《社会主义论坛报》——“不太差”,他有时读《新观察家》。他妻子会收到《快报》：“他们看事物很肤浅;偶尔有不错的访谈。我的全部阅读都曾经以我订的《世界报》为依据,现在我不经常读了。”他读严肃的读物,而不是侦探小说或传奇故事：“我还是读了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因为我妻子说‘你应该读读’”。他最

^① 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 1926-2002),奥地利哲学家、政治生态学思想家。他从教育、医学、劳动、能源利用、经济发展角度对当代西方文化制度进行了批判,代表作有《无学校的社会》(1971)、《能源与公平》(1974)等。——译者

近也读了伊凡·伊里奇的《无学校的社会》(“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康拉德·洛伦兹^①的《偶然和必然》、《攻击的本性》。他有一部七八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史:“它真是太好了,它不是叙事,尤其不是叙事,若有人物一类的东西,我就不感兴趣。考古学,我很感兴趣……有一本书,我看得很多,叫作《考古学词典》”。

“非常传统和非常庄重的东西”

“一幅弗米尔的画,我在这幅画面前站了两个小时而且我很满足,这个(别人送他的一个叫埃舍尔的家伙的一本图画书),则不然。”他很喜欢收入弗朗卡斯泰尔^②主编的一套书中的一本艺术史:“这本书的正文尤其好,没有很多复制品插图,插图并不特别,而是相对新颖,但是很好,因为他们仔细分析画家的观念(并不只是轶事),这些观念如何与那个时代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互相联系。”他“没跑遍所有博物馆”但是“很愿意”去:“我很喜欢,要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有这么一个东西,或者我看到或读到……我很愿意去,我会在那儿待一段时间”。他去了托斯卡纳很多次,而且“非常喜欢在那里能看到的一切……我很喜欢将这个时期的画家彼此互相联系,我暗想,安杰利科^③还画这个,而这个画家已经画了那

① 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 1903-1989),奥地利生物学家和动物学家,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他提出了比较动物学的研究方法,用以研究动物和人类的行为。——译者

② 弗朗卡斯泰尔(Pierre Francastel, 1900-1970),法国历史学家和艺术批评家,创立了比较历史社会学理论。他认为艺术不只是一种审美愉悦,而是与政治、宗教和科学密切相关的一种社会产物。代表作有《艺术与社会学》(1948)、《绘画与社会》(1951)等。——译者

③ 安杰利科(Fra Angelico, 约 1395-1455),意大利佛罗伦萨派画家。画风优雅,充满抒情气息,代表作有《受胎告知》、《从十字架上放下基督遗体》等。——译者

个。”他非常喜欢“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波提切利、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也非常喜欢弗米尔、华托”：“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从材料上，还是从手法上……我很喜欢画面，然后是这种优雅，迷人，忧伤。”他知道画家不能不用技巧，但他不喜欢卢梭使用的技巧：“在他的做法中有某种不自然的、刻意的、存心的、复杂的东西”。“比如，马蒂斯，有非常传统和非常智慧的东西，我非常喜欢；毕加索，我通常也比较喜欢；我也喜欢维庸^①，从我了解的不多作品来看。说真的，我对现代绘画了解很少……有一件对我而言不属于绘画的事情，这就是整个超现实主义。在我看来，这纯粹就是一种精神活动，达利之流，我很厌恶。”

“《赋格艺术》，我更喜欢由管风琴演奏”

他没有高保真音响（“我很想有一套，但对我而言这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有一个“不错的电唱机”（“我四五年前花600法郎买的一个单声电唱机”）。“在我看来，应该去听那些创作音乐的人演奏的音乐，这是最好的方式，要么就在家听，只要有不太差的机子和好的演奏就够了……我对演奏不大有感觉，但我喜欢。”他的“简化手法的意识”，他对“简单”事物的喜爱，“他的科学训练也”使他倾向于喜欢“纯音乐”。“《赋格艺术》，很典型，我更喜欢由管风琴演奏而不是由乐队完成的，这确实是纯音乐，这不是音色问题。”相反，他不喜欢“浪漫派音乐，太夸张，太浮华”：“比如，我非常喜欢柏辽兹，但是《幻想交响曲》，太浮华了”。尽管他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小规模活动”，他“每个星期仍有四个晚上忙于小规模聚会，小

^① 维庸(Jacques Villon, 1875-1963), 法国立体派画家、版画家。——译者

规模的声乐排练”，是与一个合唱队一起的，他进这个合唱队已经十年了：“另外，这段时间，我跟一群歌剧爱好者在一起，唱了一部
330 歌剧，弹了钢琴，最终获得很大成功”。“对我来说，音乐的巅峰，就是《女人心》，就是莫扎特……总的来说，我对普朗克^①很钦佩，非常喜欢德拉朗德^②……我还喜欢《沃采克》^③。我在歌剧院看了布莱兹指挥的《沃采克》，从前我并不知道它。”他每年去听四五次音乐会：“这个星期，我去听了菲舍尔-迪斯考^④，对我来说，他是声乐之王”。他根本不看演出或演唱会，从不买歌手的唱片（“我很喜欢布拉桑，但我不听他的歌”）。

“借微末之物，以俭省的手段”

他“在电影方面不大在行”；他常常“只是随意地去 D. 处的电影院，流行的大片不会太差。”他很喜欢特吕福^⑤，但是他“对美国艺术持排斥心理”（“我觉得许多美国电影中都有某种幼稚的东西，伍迪·艾伦除外”）。看历史片不多，“显然有阿贝尔·冈斯^⑥的

① 普朗克(Francis Poulenc, 1899-1963), 法国作曲家、钢琴家。作品带有新古典主义风格, 主要有歌剧《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1953-1956)等。——译者

② 德拉朗德(Michel-Richard Delalande, 1657-1726), 法国小提琴家、管风琴家和作曲家。巴洛克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 经文歌创作大师。——译者

③ 三幕歌剧(1917-1920), 由奥地利作曲家贝尔格编剧并谱曲, 乃第一部用无调性音乐写成的歌剧。——译者

④ 菲舍尔·迪斯考(Dietrich Fischer-Dieskau, 1925-), 德国男中音歌唱家、指挥家、音乐学家, 20世纪最伟大的歌唱家之一。——译者

⑤ 特吕福(François Truffaut, 1932-1984), 法国电影导演、剧本作家、电影评论家, “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

⑥ 阿贝尔·冈斯(Abel Gance, 1889-1981), 法国电影导演, 现代电影语言的创始人之一, 以其抒情风格独树一帜, 代表作为《我控诉》、《车轮》等, 《拿破仑》是他执导的最成功的法国无声电影之一。——译者

《拿破仑》，这是我看过的，或《战舰波将金号》或《亚历山大·聂夫斯基》^①。“我对一切属于过于笨重的表演的东西非常厌恶；我非常喜欢某个人让我感受到他借微末之物并以俭省的手段强烈地感受到的某种东西。”

他既不是“美食家”，也不是“鉴赏家”，但他对别人给他吃的菜肴“相当有感受力”。“当朋友们邀请我时，我会留意，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桩乐事”。他尽量让家里“有像样的酒”（“我发现了一个博若莱小酒商，他有些我觉得不错的东西，我在他那儿买”）。

“我快走”

他“很喜欢下棋”且有时玩拼字游戏。他搞一点摄影：“我每年主要在假期拍完两个36张的胶卷……我去山区度假时，特别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拍风景……我拿着地图花数小时准确辨认我看到的東西”。在假期，“我快走，可像个傻子一样，第一天，我走了40公里，然后，我脚疼了两个星期。我只要走，强度相对就很大，但可惜我很久都没走了……这一年来，我养了一条母狗，我需要遛狗，我带它飞奔；星期六我遛狗，一半是奔跑，快走10公里”。

我们看到，我们通常在“知识分子”或“左岸”趣味与“资产阶级”或“右岸”趣味之间制造的对立，不仅建立在对当代作品（这里，在所提供的名单范围内有毕加索、康定斯基、布莱兹^②）的爱好与对更传统的和得到更多认可的作品（印象派绘画，尤其是雷诺阿、

① 苏联电影导演爱森斯坦执导的史诗电影，1938年上映。——译者

② 布莱兹（Pierre Boulez, 1925-），法国作曲家、教育家、指挥家。他是先锋派音乐的代表，把数学构思与自由的情感表达结合在一起，代表作为《无主人的锤子》（1954）。他致力于诠释现代音乐作品，指挥风格精准、冷峻。——译者

华托、《匈牙利狂想曲》、《四季》、《小夜曲》)的爱好之间,在对绘画、音乐、电影或戏剧方面的可靠价值的爱好与对新奇的偏好之间,还建立在可以说两种世界观、两种生存哲学之间,这两种生存哲学可以说是由雷诺阿与戈雅(或莫鲁瓦^①与卡夫卡)这两类选择的中心人物所代表的。这两类选择即玫瑰色与黑色;美好的生活与悲惨的生活;通俗喜剧与先锋派戏剧;无问题的人的社会乐观主义与有问题的人的反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物质和精神享受加上私密而低调的室内装饰及法国传统烹饪,与审美和智力探索加上对异国情调的——或反之——简单的菜肴、对混合风格的(或反之)容易维护的室内装饰、对从跳蚤市场购买的家具和先锋派演出的爱好。³¹

为了从构成生活风格的一系列选择上重建由康定斯基与雷诺阿之间的对比所象征的纯粹审美的偏好系统之间的对立,只要考虑与《艺术知识》的读者类似的一群读者的特征就够了:这份奢侈的文化杂志,售价较高,同时也是奢侈财产尤其是艺术作品买卖的一种广告媒介,无疑提供了由“资产阶级趣味”而聚在一起的群体的一种相当准确的形象。最有上流社会特点和最昂贵的文化活动,如高雅的展览、歌剧院的盛大庆祝晚会、戏剧“首演”、上流社会的盛大音乐会等,将这些群体集中在一起。私营部门的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以及人

① 莫鲁瓦(Andre Maurois, 1885-1967),法国小说家、随笔作家、传记作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尤以《雪莱传》、《乔治·桑传》、《雨果传》、《巴尔扎克传》等闻名。——译者

³¹ 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比其他所有阶层更明确地把一个受伤男人的照片当成丑陋的予以摒弃。

数已经明显减少因而经过精心挑选的教授和工业家,组成了这些公众,他们全都投入到奢侈和高级的活动(高尔夫、骑马)及一些文化实践中,这些文化实践至少既趋向物质占有,又趋向单纯的象征占有,即经常光顾——多是右岸的——剧院和画廊、拍卖行、古董店和奢侈品商店。表现他们特点的“资产阶级趣味”不仅与“知识分子”趣味对立,而且(主要通过拥有艺术品、光顾画廊和剧院)与大部分工业家尤其是大商人的“中等趣味”对立,大部分工业家尤其是大商人读《汽车报》,只把能够用钱买来的那部分稀有资源如豪华汽车据为己有(S. C., VI)。³²

电视报 1971年10月

333

“艺术爱好者”雅克·西克利耶

巴黎内分泌诊所的主任医生,吉尔贝·德雷福斯教授开了一次门诊,然后他讲述了他青年时代如何突然发现了伦勃朗。我们同样看到,在这次“视野”节目中,一个郊区医生多尔迪斯医生,一个为了“悦目”的绘画收藏家,对埃及学和考古学充满激情;阿佩尔鲍姆医生,“为找回自己”而画画,热依-卡塔洛医生,在他的接待室

³² 为了衡量“资产阶级”公众和“知识分子”公众之间的距离,只要注意以下这一点就够了,即在大学生、教师和艺术家中有53%出席圣特古乐节,60%出席拉罗歇尔国际当代艺术大会,66%出席——专为戏剧艺术创作的先锋派举办的——南希国际戏剧节,83%出席鲁瓦扬当代音乐节;而且参加音乐活动的频率在相同的方向上变化,从圣特古乐节人均3.5场,到拉罗歇尔国际当代艺术大会人均5场,南希国际戏剧节和鲁瓦扬当代音乐节人均7场(cf. J. Henrard, C. Martin, J. Mathelin, *Etude de trois festivals de musique*, Paris, CETEM, 1975 et F. X. Roussel, *Le public du festival mondial de théâtre de Nancy*, Nancy, CIEDEHL, 1975)。

里挂现代画家的绘画并主持一家画廊。

“视野”的制作人希望理解并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医生是艺术爱好者。德雷福斯教授给出了答案：“因为他们像艺术家一样热爱生活并厌恶死亡。”节目按照这个主题展开。曼特尼亚^①、列奥纳多·达芬奇、热里科^②、塞尚的作品，与维萨尔^③的研究、解剖台和这些用于医学研究的“解剖模型”在反抗死亡的斗争观念中会合，而这些解剖模型通过它们被展示的方式，变成了艺术品。

三个导演共同完成了这一期报道，剪辑的灵活、无处不在的均一的彩色画面之美给予这一期一种引人注目的风格一致性。还应该再加上图像的丰富。

“艺术爱好者”是视野节目讨论的最有趣的主题之一。哎呀！这是倒数第二个，若不是最新的，因为皮埃尔·施奈德^④和罗伯特·瓦里^⑤这一期被禁了。——（第二频道）

认为艺术家与医生之间的关系是生产者与被委任的主顾之间的关系的人是幼稚的；医生和艺术家的共同点是“热爱生活并厌恶

① 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 1431-1506),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他与十五世纪中期的哥特风格决裂, 将审美叙述与历史真实结合在一起, 注重细节描绘和透视效果, 体现了中世纪后期的综合主义与现代的柔美之间的过渡风格。——译者

② 热里科(Théodore Géricault, 1791-1824), 法国浪漫派画家, 代表作为《美杜萨的木筏》。——译者

③ 维萨尔(André Vésale, 1514-1564), 比利时解剖学家、生理学家, 代表作为《人体结构》(1543)。——译者

④ 皮埃尔·施奈德(Pierre Schneider), 加拿大魁北克解放阵线的活动分子, 主张魁北克通过社会革命独立的1963年4月宣言的起草者之一。——译者

⑤ 罗伯特·瓦里(Robert Valley), 当代动画艺术家, 在视觉风格和影片制作方面处于先锋地位, 曾为耐克、可口可乐、依云等品牌设计商标。——译者

死亡”。想想这一点就够了。这种否认的明确性得到了电视节目制作人的认可——因为他们以这种否认为主题，得到了报道节目的记者的认可，无疑也得到了不止一个事先被说服的读者的认可。

当“智识”阶层更多地要求艺术家对社会现实和“资产阶级艺术”³³⁴赋予社会现实的正统表象进行一种象征质疑时，“资产阶级”则期待他们的艺术家、作家、批评家如同他们的高级妇女时装店经营者、他们的珠宝商或他们的室内装饰家一样，提供区分的标志，这些区分的标志同时也是否认社会现实的工具。³³ 奢侈品和艺术作品不过是资产阶级存在或至少这种生活中私人的、家庭的和礼拜日的部分所围绕的这种布景的最明显特征，这种生活基本上是双

³³ 事实上，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为自身所下的定义，与其说依据它对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或艺术家进行的总体判断（尽管反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的一种决定性特征），不如说依据它在生产场为它提供的范围内选择的艺术家和作家。因此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的反智主义可以表现在他们对某些知识分子的选择中，这些知识分子在知识场中的位置注定了他们是反智主义的；事实上人们离最“纯粹的”体裁，也就是说离最彻底地除掉对社会世界和政治的任何参照的体裁（在这个范围内，是音乐、诗歌、哲学、绘画）越远，统治阶层承认的生产者（即剧作家和戏剧批评家或哲学家和政论家）离生产者自身承认的生产者越远。此外，艺术家的生活风格，尤其是这种生活风格中否定年龄（或社会地位）与衣着或行为如性行为或政治行为这类象征属性之间的平常关系的一切，引起了处于衰退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对，正如这种反对强调的，这种生活风格及其否定的一切包含了对一些实践前提的一种揭露，这些实践前提是资产阶级生活艺术的基础。澳洲神话中的老妇人，通过神奇的方法保持她们二十岁时的细腻光滑的皮肤，颠覆了代与代之间建立的关系的结构，如同这些老妇人一样，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像萨特拒绝诺贝尔奖那样或到了一定年纪仍与年轻的左派交往，而别人在这样的年纪则追求荣誉且只做有权威的人，这样，他们有时可能对埋藏得最深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即斯宾诺沙所说的恭顺（obsequium）提出质疑，而恭顺乃那些“尊重自己”且自感有权要求尊重的人的配置。

重的并在一种虚假划分中且通过这种虚假划分虚假地得到统一，这种虚假划分与自身对立，表现为无关利害与利益对立、艺术与金钱对立、精神与物质对立。被审慎地政治化或炫耀式地非政治化的开明的政治报纸、室内装饰杂志和艺术书、旅游指南和游记、地方主义小说和伟人传记，构成了这么多挡在社会现实面前的屏障。作为资产阶级存在形式之一的几乎非现实化的表象，“资产阶级戏剧”，连同其漂亮的布景、美丽的女人、轻而易举的风流韵事、轻浮的看法、令人安心的哲学观念（另一整套名词和形容词的组合同样是可以接受的），无疑是被资产阶级承认的卓越艺术形式，因为资产阶级在这种艺术形式中认出了自己。资产阶级期待艺术（不必说他们称为文学或哲学的东西）能够加强他们的自信，这既是由于自负也是由于无能，他们永远无法真正承认先锋派的大胆，甚至在最中立的领域如音乐中也是如此：几个有见识的爱好者像德·康布尔梅夫人一样明白，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就可在“艺术上总站左派一边”，但人们不该由于这几个人而忘记所有这样的人——他们今天作为福楼拜或马勒的崇拜者，与他们过去的同类一样，无法忍受混乱甚至象征性的混乱，并厌恶“冲动”，甚至经过艺术升华的“冲动”。

必须考虑艺术生产场的整个逻辑和艺术生产场与统治阶级场保持的关系，才能理解先锋派的艺术生产注定要不同程度地并总是在短期内让资产阶级的期待落空。³⁴ 其实，这种分析只有通过

³⁴ 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基本差距使最先进的生产者只能拥有死后的市场和利益。关于这种差距，参见 P. Bourdieu, *Le marché des biens symboliques*, *L'année sociologique*, vol. 22, 1973, pp. 49-129; *La production de la croyance: contribution à une économie des biens symbolique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3, 1977, pp. 3-43.

一系列对立才触及艺术先锋派趣味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一切看来都好像是这样的:尽管生产者的先锋派趣味代表了艺术合法性,但这种趣味几乎以否定的方式,将自己确定为对社会承认的所有趣味的拒绝之总和:拒绝暴富的大商人和企业家的、福楼拜提出的“小市民”的或许尤其是今天的小资产阶级的中等趣味,“小市民”是艺术家设想的“资产阶级”的体现之一,而小资产阶级的文化抱负令他们趋向于一般文化财产或合法文化财产中最容易接受并随即由于这种占有而贬值的部分(诸如轻歌剧和最易懂的通俗喜剧);拒绝资产阶级趣味,也就是典型“右岸”的奢侈趣味,这种趣味在一部分艺术家中找到了同谋;最后拒绝教授的等,³⁵这种趣味尽管与前者对立,但在艺术家眼中不过是资产阶级趣味的一个变种,由于它的沉重的、推理的、被动的和贫乏的说教性质,它的严肃精神尤其也许是它的谨慎和它的等而受到轻视。因此,双重否定的逻辑可能导致艺术家似乎出于挑衅而重拾大众趣味的某些特殊偏好:我们看到他们与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低层达成一致,尽管他们在一切方面都被截然分开,他们都选择容易打理的和实用的室内装饰,“资产阶级的舒适”的对立面;同样,他们能够复兴最受贬低的大众趣味形式如拙劣的艺术品或蹩脚彩色画片,但这是以富于暗示的形式。艺术家的生活风格通过与所有其他生活风格及其世俗依附保持距离来确定自身,它意味着一种特殊形式的财产,空闲时间在这份财产中扮演了一个独立的、可部分代替经济资本的

336

³⁵ 为了说明生活风格,我们总要在一种中性的然而不大说明问题的用语(苦行趣味)与本地“标签”(学究趣味、资产阶级趣味)之间进行选择,这些标签很可能重新让人落入它们在当中被制造的象征斗争领域。

因素的角色。³⁶ 但是空闲时间和通过放弃这段时间可能让人得到的东西来维护这段时间的配置,意味着足以使放弃成为可能的(也就是可忍受的)(继承而来的)资本,和这种高度贵族化的导致放弃的配置。

时间的标志

无疑,在无论什么阶级中,都不如在统治阶级内部,青年与老者、覬覦者与把持者之间的对立,以及并不总是与以上对立重合的阶级内部的资深者与新来者之间的对立(因为至少在某些领域中,资历最老的人也是来得最早的人),更具有决定性了,统治阶级只有在能够克服危机的情况下才能保证自身的永存,这些危机的潜在性存在于为了规定统治的支配性原则而进行的阶层之间的竞争中,并存在于继承斗争中,而每个阶层都是继承斗争的地点。在职位的定义中或取得这些职位的制度化方式中,也就是说在负责占据这些职位的人的生成方式中,产生的变化

³⁶ 艺术家常常通过对平常世界观的一种差不多彻底的颠倒,将(往往通过与他们的职业无关的工作赚的)金钱视为购买时间的一种手段,用来工作和过“艺术家生活”,这种生活与他们的特殊活动结成一体(我们若要找到关于艺术家利用时间的有趣说明,可参见 B. Rosenberg and N. Fliegrel, *The Vanguard Artist*, Chicago, The Quadrangle Books, 1965, 尤其是第 312 页)。因此,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用金钱,他们能够赚的金钱换取时间,他们毫不吝啬地花时间生产经常(在短期内)没有市场的产品,并“发现”他们促使产生稀缺性和价值的物品和地点,古董、小饭馆、新演出等,而且他们几乎绝对地将公共财产或机构、博物馆、画廊或文化电台据为己有。空闲时间和与时间的关系的变化,连同不等的消费倾向,属于这样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使得消费在相当不等的程度上表现了不同阶级的财力。

越大,代与代之间的差别(和代与代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³⁷ 于是,来自在某个固定时刻取得职位的方式之多样性的差别(这些差别从这方面来看在相当分散的人口如管理者和工程师中非常清楚),同时也夹杂着职位的定义和取得职位的条件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以及尤其是不同的取得方式的相对比重的变化所带来的多样性,后一种变化与学校教育系统的转变及这个系统和生产机器之间的关系的转变密切相关。³⁸ 尽管这些与历史相关的变化,在最直接地与经济相连的阶层如工程师和管理者的状况中特别重要,并以更不易察觉的方式影响了整个统治阶级,但是这些变化很有可能被忽略,因为它们从来只与年龄相关,因此可能被当成一种生物年龄甚或社会年龄的作用,而非生成的作用,还因为这些变化在轨迹也就是个人历史中再现,而个人历史是对集体历史为整个一代人在客观上提供的机会的一种

³⁷ 官方统计使用的分类系统必然与分类斗争的一种过时状态相对应,这些分类系统忽略了来自新职业的出现和旧职业的消亡或重新定义的差别。

³⁸ 看重最具苦行色彩的伦理配置的年长者与在最典型的现代背景的价值中确认自己的年轻人之间的对立和管理者和工程师身上——其次在教授和自由职业者身上——相当明显:比如,在整个阶级中,45岁以上的人选择一个“有责任心的”朋友的,占51.5%,与年轻人中的24.5%相对,年轻人中则有39%提到“有活力”,与年长者中的19.5%相对;在管理者和工程师中,42.5%的年轻人提到“有活力”,与8%的年长者相对,而15%提到“有责任心”,与54%的年长者相对(我们看到在形容词的状况中,同样的变化总是在管理者和工程师身上更明显,“意志坚强”像“有活力”那样变化,或“教育水平高”像“有责任心”那样变化)。我们看到在合法文化方面的趣味上的一种相同方向的变化(这种变化无疑与文化资本的普遍增加有关):因此,不到45岁的管理者和工程师经常提到《蓝色狂想曲》(32%对17.5%)或《四季》(47%对24%),不经常提《阿莱城的姑娘》(14.5%对28%)、《匈牙利狂想曲》(32%对58.5%)、《蓝色多瑙河》(13%对30.5%)。

338 确定状况的诸多回应。自由职业者(或至少,医生)懂得如何保持职位和职位要求的能力的传统定义,尤其通过维护受最大限制的取得职位的条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了历史和代与代之间的划分;而诸如管理者和工程师这类等级与自由职业者不同,他们将既在轨迹方面又在世代方面被分隔的若干个体集中在一起,世代被理解为与客观机会的一种类似状况相关的同一种发生方式的全部产物。其实,由于通过学历和破格晋升的取得方式及相应划分的二重性,这些等级更直接地受到学校教育的扩张作用的影响,因为相应的划分为有组织地维护取得方式和相应特权设置了障碍,而学校教育的扩张增加了赋予就业权利的学历的数量,改变了学历和职位之间的实际关系与学历的持有者和非持有者之间为了职位而进行的竞争的形式。³⁹ 此外,经济的变化体现在不同的管理和领导职能之间数量和等级之关系的一种变化上,同时导致了机会系统的混乱,这些机会呈现给了不同类型的教育产物:直接从底层晋升的自修者、来自普通大学的工程师、理科名校的学生(综合工科大学、高等矿物学校等)、政治科学学院或高等商业学校的学生。可见,不同个体对源自经济变化的转变分别给予的不同回答的原则,仍旧存在于社会出身和学校教育出身的差别中,而社会出身和学校教育出

³⁹ 教授在这方面占据自由职业者与工程师或管理者之间的一个中间位置。由于无法控制入门条件,他们试图至少在高等教育层次上控制晋升条件(cf. P. Bourdieu, L. Boltanski et P. Maldidier, *La défense du corps*, *Information sur les sciences sociales*, X, 4, 1971)。

身的差别曾经在所有时代决定了个体之间的重要差别,尽管这些个体在一个固定时刻占据了形式上相似的位置。比如,金融和商业领导相对于技术领导的加强,源于银行对工业统治的加强并源于工业集团及其资本、领导者、文凭的国际化的加强。这种加强引起了对导向这些位置的学历和学校的一种重估,一边是政治科学学院或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另一边是综合工科大学和其他工程师学校,并同时决定了呈现给资产阶级阶层的机会有再分配,而这些学校是由资产阶级阶层资助的:因此,借助经济结构的变化并借助处于权力学校的特定教育等级底层的政治科学学院,巴黎大资产阶级无疑比从前更彻底地把国家经济和高级行政管理的领导职位重新据为己有(这就导致了综合工科大学毕业生的集体的和个人的有力反击,比如他们去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的越来越多)。另外,大量新位置的出现倾向于打乱机会有差别的利益系统,新位置能够提供至少与现行位置的利益相同的利益、可准确预见的前程的范围,但不提供相同的安全保障:至少在这个阶段,这些处于社会结构的关键点上的位置呈现最大的风险并提供最大的利益,它们首先吸引了这样一些人,这些人从他们的社会出身中获得冒险投资的倾向、实现投资的必要关系和对投资的成功必不可少的信息。 339

因此,我们可以在工程师这个等级中,区分与若干个体的子集对应的趣味类别,而这些个体既在文化资本方面也在资产阶级中的资历方面被分开:在一端,是已经年老的工程师的

小资产阶级趣味,这些人出身于中产阶级或民众阶级,被破格提升或毕业于二流学校;而在另一端,是年轻工程师的资产阶级趣味,他们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并至少在一代时间内归属于资产阶级。⁴⁰

同样的划分首先出现在管理者的后备等级中,在这个过渡区中,可同时遇到老工程师、行政管理者、年轻管理者,最后是一种新型管理者。老工程师拥有一种传统的(往往是理科的)文化资本并行使(被委派的)权力职能;行政管理者(在国营部门中通过内部竞争)付出很少被学历(除了“内部”文凭)认可的大量学校教育补习而达到晋级;年轻的管理者出自重点大学(综合工科大学和国家行政管理学院),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注定要在私营企业占据高位;而新型管理者往往被委派商业职能或管理职能,拥有在商业学校或政治科学学院获得的一种学校教育资本(如果他们有学校教育资本),并倾向于一种不同于“老资产阶级”的生活风格,尽管他们出身于

⁴⁰ 在工程师中,48.8%毕业于工程师学校,6.5%获得其他高等教育文凭,10.6%持有需要在中学毕业后学习一两年的文凭,9.2%至少有中学毕业文凭,8.3%有技师文凭,5.0%有结业证书,3.8%有专业技能合格证书,4.7%有职业教育证书,3.1%没有任何文凭(S. C., II)。在同一个团体中,两个从一开始便被一段6年或8年的职业差距分开的等级可能彼此相邻,而这段差距接下来只会扩大:一边是X的毕业生,另一边,则是通过内部竞争上来的人,后者在其新团体中失去了其资历在低档上的收益,可能要花很多年才能赶上其出身团体中的一个收入水平。后面这些晋升的人只会在退休前几年获得总工程师的头衔,而综合工科大学的毕业生在35岁与45岁之间就获得了这个头衔,等着到某个私营企业“享清福”。

“老资产阶级”。⁴¹

一切似乎都说明,差别很大的前程与学校教育资本和(通过破格晋升或学历)拥有的社会资本所决定的不同任职方式是一致的,对于学校教育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持有者而言,升职要快得多,尤其是在任职的下半阶段(观察家们一致认为,自修者在从入行到处在大约 35 到 40 岁的任职中期,机会最多)。但是职业生活的阶段也依靠企业,唯有进入规模最大的企业的文凭持有者才能获得官员类型的前程。其实,正如人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在大私营企业的管理者中,资产阶级生活的新风格的所有特征表现得最清楚。 348

一个“懂生活”的年轻管理者

米歇尔·R.,巴黎一家广告公司的管理者,一个顶尖跨国企业的法国分公司的总经理之子,他在十七区的一个天主教私立学校上了中学,然后就读于政治科学学院;他的妻子,伊莎贝拉,外省一个工业家之女,也毕业于政治科学学院并在一家周刊工作。他 340

正如人们所说的“到私营企业享福”(也就是国营企业的“精英”外流到私营企业)这一点证明的,人们习惯上归入高级管理者等级的行政管理职位——也许中央行政管理的高级领导职位除外——对那些最权威文凭的持有者而言,只代表一个临时的职位,他们的社会出身越高,这个职位就越受到轻视(因此,出身于统治阶级的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学生,尤其是高级官员的子女,比出身于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学生更倾向于认为,从国家行政管理学院毕业之后或最终进入私营企业是很正常的);相反,这些行政管理职位对那些从底层破格“晋升”的人而言,则是“一种值得赞赏的前程的顶点”;实际上,在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归入“高级管理者”的个人中,6.2%称没有任何文凭,16.7%称只有职业教育证书,10.9%称有专业技能合格证书或同等文凭,而11.8%称有结业证书(S. C., II)。

们分别 30 岁和 28 岁，有两个孩子；他们住在巴黎十五区的一所现代的五居室房子里。他们喜欢的，是“有点软绵绵的舒适”；他们不爱修修弄弄，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布置房间。“装饰，是之前住这里的人做的。餐厅的绿色我不大喜欢，有点深了，我们将就了，而且我很烦干家里的事”。至于门和线脚，“我觉得很难看，我想把它们拆掉；仿 16 或 18 世纪的壁橱或者说不清楚的什么东西，在这所现代的房子，太糟了。我忍了，但这很烦人”，米歇尔说，他已经拆掉了一些，但没有“勇气继续下去”。

“祖父母的房间”

他们的房间，“有点像曾经是大资产阶级的祖父母、曾祖父母的房间”：米歇尔祖父的绘画，他“一辈子都在画画，从未工作过”；别人赠送给他们的其他绘画，一幅是博丹^①的，另一幅是比西埃^②的，还有一幅是福隆的。但米歇尔“总体上喜欢印象派画家，尤其是博纳尔^③和莫奈或马奈，画了很多风景画的人，毕沙罗”，他不喜欢房间里的画。

他也不喜欢静物，不喜欢“提问题”的绘画，“费尔南·莱热，这类东西难看，沉重、笨拙；看两三幅布拉克的画，很有意思；当你看了两百幅全都具有相同体系的画，你总是碰到相同的東西，我觉得

① 博丹(André Beaudin, 1895-1979)，法国画家，雕塑家，属于巴黎画派。他的作品处于立体派和非具象派之间，具有诗意的风格、纯净的色彩和清晰的结构。——译者

② 比西埃(Roger Bissière, 1888-1964)，法国画家，属于新巴黎画派，1950年代开创了非具象画派。——译者

③ 博纳尔(Pierre Bonnard, 1867-1947)，法国画家，擅长油画、版画、插图等。他受到印象派和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作品显示出对色彩的颂扬、对形式的简化和对日常生活的理想化。——译者

这有点阴森,有点恐怖……我在绘画中寻找一些风景的情形……我的祖母家里有一幅博纳尔的画,这是她拥有的唯一一幅昂贵的画;我们,不会继承它,因为后人很多,但拥有这幅画很奇特,令人难以置信。我想要那些一点儿也不时髦的、足够永恒的东西”。

伊莎贝拉并不完全同意她丈夫的观点:“我喜欢很多现代的东西,是因为颜色让我愉快……比如比埃拉·达席尔瓦^①(她对名字 341 有点犹豫),博丹就在你后面,我很喜欢”。两个人有时去画廊,每年看两三次展览:他们看过布拉克的展览,他们肯定要去看看迪朗—吕埃尔画廊的印象派画家展览。

“我们看到很多平庸的东西”

餐厅里桃花心木的桌椅,属于英国18世纪风格,是他们结婚后不久在伦敦买的:“我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这样做……我们买了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从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肯定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见过很多古董商之后,他们“终于买了一件很贵的东西;在巴黎要花双倍的价钱,我们看到很多平庸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不喜欢’”。把家具运回巴黎“没有问题,免关税;只要付增值税就可以了”。客厅里,古董家具和现代家具都有,在罗什-博布瓦买的一个书橱、在瑞士村的一家店铺买的一个长沙发……

米歇尔只有“一辆老式404汽车”,他的上司们则“有捷豹,业务经理有一辆阿尔法-罗密欧,一辆蓝旗亚”;“时不时有人问我,‘你还不换汽车吗?’我换汽车他们就如释重负,他们担心我开我的

^① 比埃拉·达席尔瓦(Vieira da Silva, 1908-1992),葡萄牙女画家,属于巴黎画派,战后最重要的抽象派画家之一。作品构图繁复,形状支离破碎,空间模糊,像城市迷宫或图书馆书架,旨在表达对认识和绝对的一种永恒追求。——译者

汽车见客户”。

“这对从事广告的人很合适”

周末,他在家穿“一条不好看的邋邋裤子”,在职业生活中,他穿衣非常仔细和优雅;他在广告人的成衣店巴尼(Barnes)买西装,这家店铺在巴黎维克多·雨果大街。“这对在广告业中的成功人士很合适,英国料子,带点奢华的浅色方格细呢……高级官员不愿穿这样的衣服,银行家也不会接受……在银行里,需要一件单色衬衫,银行不是炫耀的地方,而在广告行业,人人都把钱花光……干我们这行的,很容易看清人,存在着等级和社会特权阶级,这就意味着把一件产品归于一个特权阶级。某个新人来公司的时候,人们立刻就打量他一番……穿大翻领的丝绒西服的人,是一个努力弥补什么的人,不太自信,想要向别人炫耀。”有一段时间,公司里有一个“出身很低微的财务经理,他来的时候,穿得很不得体,甚至妨碍了客户的扩展……他穿得像一个勤勉的小职员”。“他有一件小翻领的西服,下摆瘦,有点短,颜色扎眼,穿了一件不相配的衬衫,戴了一条紧巴巴的领带,按照这里的标准,很难看。”

“跟某些女秘书的赶时髦不一样”

“相反,过分时髦,也很难看”,伊莎贝拉补充道,她让孩子们穿得“比较传统”,非常注意颜色的选择:“我偶尔喜欢有褶饰的漂亮裙子,我也很喜欢英国大衣;其实,这是时髦,但这跟《快报》某些女秘书的时髦不一样,她们让孩子穿刚创牌子的小店铺的衣服,这些小店铺,叫作小东西、小脸蛋、小全面一类的,非常贵,而且是小大人的式样”。这些女秘书“全都穿着得体,按照我的标准,她们在颜色上一点儿也没出错……有些女孩子刚来的时候,穿

衣品味差极了,平庸,廉价,便宜,难看……四年过去了,她们终于上路了。”伊莎贝拉有一个女朋友,穿着总是“很有风格,总之,就是很迷人,我觉得,就是优雅,有品位……在任何方面都要追求形式”。米歇尔的父亲也“穿着得体,从不过度,从未有一种颜色不协调,雅致,没有任何炫耀,他的成衣商在伦敦”。米歇尔的母亲“也过度,她总是穿着裁剪合体的漂亮毛皮大衣”,她也经常去伦敦置衣。

“做小风车、小矮人的外省小职员”

“小资产阶级没有任何趣味,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说法,尽管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种族主义者”。(因此米歇尔和伊莎贝拉不断地显示他们与大资产阶级的老一代的做法“保持距离”——尤其是因为他们在一个社会学家面前,这个社会学家是一个朋友的姐姐。)伊莎贝拉的父母,外省的工业家,更严厉或不那么宽容:“说到小资产阶级现象,外省小职员在花园里做小风车、小矮人这些讨厌东西,妈妈说‘太可恶了,应该禁止他们弄这东西’,这是很专横的,法西斯主义的,在这儿,我们捍卫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品味的观点。”343

“非常清淡的饮食,熟菜,奶酪”

在饮食方面,像在穿衣和室内陈设一样,同样地拒绝炫耀、“过分”,同样具有“区分”意识。米歇尔并不是“一个区分不同年份的葡萄酒工艺学家”,但他“对葡萄酒比较在行”;他的岳父有一个酒库,几个酒窖,慢慢教会了他们;他们去他家时,喝“1926年的马尔戈酒,在饭馆再也喝不到这些神奇的东西……比如在我的圈子里。

由我在饭馆点酒,我不会做出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知道卡奥尔酒^①与圣埃斯泰夫酒^②、圣埃米利庸酒^③味道不同;一般来说没人知道如何点酒,如果你知道一点儿,你就像懂得生活的人了”。他们家里有几大瓶他们买的1962年的凯歌香槟酒^④：“好东西,我们每个月喝两三次,而且年末有礼品……如果是威士忌,我们就喝芝华士,我们还是很挑剔的。”他们“在波尔德莱葡萄种植区花15或18法郎买40法郎一瓶的酒,非常好的酒”。晚上他们独自在家的時候,他们“吃得非常清淡,熟菜,奶酪”。他们喜欢招待朋友们吃“奶油肉片、爆牛肉、咖喱饭、鲑鱼,我们有时买这些菜”。米歇尔非常喜欢“炭烤葡萄鲜鸭肝,焖鹅肉冻”。他曾经去过戈尔和米尤列出的100个最佳餐馆中的30个,许多是商务午餐(“30个餐馆中,只有10个是我出钱的”)。他也喜欢老式菜肴,“实际上是老太太做的饭”,但不大喜欢小饭馆和“外国菜、意大利菜、中国菜”。

“这很健康”

米歇尔和伊莎贝拉加入了一个高尔夫俱乐部：“好极了,但那里的人不好;在法国,尽是一些老家伙,社会特点很明显,但在日本,30%的人口加入俱乐部。”加入俱乐部时花了一百万法郎,有了孩子以后他们不再去了,但仍在交会费。米歇尔不再打网球了：“太

① 产于法国西南部的葡萄酒,名气不如波尔多葡萄酒大。——译者

② 波尔多葡萄酒。——译者

③ 最有代表性的波尔多葡萄酒,圣埃米利庸是波尔多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译者

④ 法国最名贵的香槟酒。——译者

累了……要跑动、要上网,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问题,我背痛……,高尔夫,不那么剧烈”。“他们受了时髦的害,今年冬天人们大谈高 344
尔夫”,他们要去越野滑雪。他们也买了二手的越野自行车,去年夏天玩了很多地方,“这很健康”。

米歇尔上大学时,去国家人民剧院、奥贝尔维里耶剧院,看贡布罗维奇^①、布莱希特的戏剧,但现在不再去了;他们最近去了凡塞纳的弹药库剧院、歌剧院,他们也经常看电影。他们有一套高保真音响,一个录音机,听法国音乐台的唱片论坛节目。米歇尔很喜欢听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舒伯特的《四重奏》,巴赫,贝多芬的《四重奏》。“纯粹现代的东西,韦伯恩^②的东西,我听不进去”。米歇尔不大读文学、小说,想要读托尼·迪韦尔^③(他喜欢“有点刺激”的书;他读了《橡皮》,但“没读进去”)。他尤其读了“有关人文科学的一切”,心理学著作,经济学著作。

① 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 1904-1969),波兰小说家和戏剧家,他受到滑稽小说的影响,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谈论存在问题,作品以深刻的心理分析、悖论意识和荒诞的口吻为特色,主要有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尔克》(1937)、《横渡大西洋》(1953)、《宇宙》(1965)等。——译者

② 韦伯恩(Anton Webern, 1883-1945),奥地利作曲家,属维也纳十二音体系乐派,以管弦乐《帕萨卡里亚》、室内乐和歌曲闻名。他的作品表现出新的风格特征:断续的旋律与和声、大音程的跳进、不和谐音等。——译者

③ 托尼·迪韦尔(Tony Duvert, 1949-2008),法国新小说派作家。他以童年、淫秽、痛苦、性、变童癖为主题,公开承认自己的变童倾向,代表作有《幻景》(1972)等。——译者

管理者的肖像

对《世界报》一个星期当中刊登的招聘启示的简要分析,足以
345 说明新型管理者的典型特征系统,这些管理者大多转向企业结构
的新状态要求的商业化。

作为“产品经理”、商业工程师、商业经理助理、“销售总经理”、“销售工程师”,他应该首先是一个“协商者”,他应拥有各种关系(1973年7月3日),而且他应该:

* 善于“与高层接触”:知道如何使用“交际手腕”(7月4日);对“接触各个层次”有敏锐的认识(7月4日);“能够接触各个层次”(7月7日);“习惯与最高管理层接触,有很出色的协调能力”(7月7日);“善于联系高层”(7月5日);“高级的协调能力”(7月5日);“与银行的协调能力”(7月3日);“负责与管理部联系,在职业机构中代表公司”(7月3日);“喜欢接触和指导”,“喜欢人事问题和跟人接触,口才好”(7月4日);

* 善于内部协调,这就是说,对一个销售管理服务部门的经理而言:“在销售与经营之间永久的协调和调停作用”(7月3日);对一个购买负责人而言,“这项职能要求完全掌控一个营销部门与一个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对一个商业工程师而言,“他要进行的协商需要他的能力授予的一种理解态度和一种创造精神”(7月3日);最后,就是“顾客、销售者、管理部门、售后服务技师和制造商之间的协调者”;

* 毕业于下列某个新学校,这些学校包括高等商业学校、欧洲高级商业管理学院、高级商业学校、高等商业学院,它们往往被一起指定——若有可能,“曾在一所美国大学访学”(7月6日);

*具有加入跨国企业要求的或从事国际贸易的能力和态度(“英语绝对必不可少”;英语词:营销、推销等,和来自英语的外来语:“机遇”等)。

*喜欢“团队工作”(7月7日)并且有“指导”(权威的替代物) 346
意识:“有活力,性格温和……能够融入一个团队”(7月6日);“能够领导并带动一个20人的小组”(7月3日);

*有创造力且有活力(像企业自身一样,“开拓迫使企业越来越致力于出口”)(7月4日):“领导、指导、培训一个团队”,“活力,企业精神,综合精神和团队精神”(7月3日);

*年轻(青年管理者);

*活跃,他必须准备经常出差尤其是到美国短暂停留。

同样的情况也来自对“稀缺的、因而收入高的职业”的变化的描述,人们可以在《开拓杂志》(1973年6月,第64期,第139页)的这一期上读到这种描述,标题为“新珍稀鸟类”:“开发经理一向按照70000-80000法郎的年薪招聘;管理监理,则按照60000-90000法郎的年薪招聘。”内部审计的需求量很大,人们总是更喜欢到毕马威(Peat Marwick)^①、安达信或普华(Price Waterhouse)^②这些事务所寻找这类人。一个“新人”的年薪是70000到80000法郎;而一个“老手”的年薪是110000到120000法郎。证券分析师仍旧至少每年要付60000法郎。培训经理年薪暴涨:去年是45000

① 世界知名的跨国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计、税务和咨询等方面的专业服务。——译者

② 著名会计师事务所,1998年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Coopers & Lybrand)合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审计、税务、咨询等方面的专业服务机构。——译者

到 70000 法郎,今年则是 50000 到 80000 法郎。在大银行中,甚至可以拿到 110000 到 130000 法郎。超市经理的年薪也是同样的竞抬高价。今年,出现了五个争夺职位:面试经理,旅店经理,销售经理(他在营销计划的范围内,试图促进品牌进入新的销售渠道)。基层的商品推销专家,他浏览超级市场的货架,从而为他维护的品牌保留最大的商品陈列“面积”;行政管理方法经理(他分析行政程序 and 标准,像审计一样,他的薪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出自于哪家事务所);工厂监理(这个职位的盎格鲁-撒克逊起源致使寻找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的候选人)。明天如何?两种新珍稀鸟类出现在地平线上,销售审计和公共关系审计。

1973 年描绘的现代管理者肖像似乎后来发生了变化,这无疑³⁴⁷是因为危机为过去的支配方式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因此,我们看到“领导人”重新出现了——按照一个知情者的说法,领导人“可以在不解释的情况下说不”——而且受过实地训练的生产专家和商业经理的需求增加了),也因为工程师学校对管理学校的增加作出了反应(比如 1977 年在巴黎综合工科大学创立了行动科学学院)。根据《新经济学家报》(1976 年 11 月 8 日)对 5000 个公司的人事经理的调查,企业总是要求有“开放精神”、“活力”、“适应能力和联络能力”、“综合精神”和“上进心”,但坚持要“忠实”(圣戈班公司^①)和“团队精神”[布索瓦-苏雄-纳弗塞勒(BSN)和欧莱雅公司]。最后,49%的企业说看重政治和工会选择,而 33%的公司说不看重这一点(而 18%的公司无答案)。

① 法国一家大型的建筑材料生产和销售企业。——译者

尽管管理者和工程师垄断了表现为工具、机器等的文化资本之象征占有工具——这些象征占有工具对于经济资本对文化资本实施权力是必不可少的——,尽管他们从这种垄断中获得了在企业中的一种真正的控制权和相对的权威,但是他们的文化资本产生的收益至少部分地被有权支配这种资本的人占有,这些人就是拥有必要的经济资本以保证文化资本的集中和利用的人。因此,管理者和工程师在统治阶级中占据一个不稳定的位置,这个位置导致他们对企业和“社会秩序”的一种充满矛盾心绪的赞同:在请愿或暴动中,他们既听从与普通劳动者保持合法距离——这种距离是学校教育判断建立的——的考虑,或听从因被当成普通劳动者那种对待而生出的能力主义者的愤怒,又听从一种真正的状况一致性的感受;相反,他们对与阶级一体化的焦虑寻求,或为了他们自己,或为了他们的子女,总是保留着他们对某些赌注的充满矛盾心绪的怨恨,这种怨恨的多少是随着他们利益的现状而变化的,他们无法全部占有也无法彻底忽略和拒绝这些赌注。这个等级总体上的所有这些特定配置无疑在一些人身上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这些人由于不持有学校教育资本或没在固定时刻持有最宝贵的学校教育资本(比如,重点大学文凭而非普通大学文凭或经济-法律学识而非传统的文学或科学学识),或者没有必要的社会资本足以使这种学校教育资本在提供最高利率的市场上产生利润,他们被降到技师也就是执行者的位置上,执行者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政治或文化权力:他们将小资产阶级配置带到统治阶级的低级位置中,小资产阶级配置使他们达到这些位置,因此他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来自重点大学和往往也是来自大家族的年轻管理者对立,后者在私营企业

提供的新职位中占很大一部分。⁴² 阶层是单纯的官方统计等级，但也是行会式的防御运动，这种运动表现在它呈现的和对自身形成的表象上，因此阶层的分散表达了“管理者”位置的客观暧昧性，
349 他们注定要在合作与距离之间摇摆，因而要拿归附策略作赌注。这些策略使他们有可能拿他们与统治阶层利害一致讨价还价；这种分散来自这个事实，即“管理者”一词是这些头衔之一，这些头衔作为与占据一个位置相关的报偿，是明与实的游戏的特别工具之一。

尽管新位置及其相应的生活风格与稳固位置之间的对立，并非严格地与私营部门和国营部门之间的对立契合，但“新资产阶级”的典型生活风格还是出现在私营部门的管理者身上。⁴³ 由此，尽管调查只是较差地把握了新资产阶级的特征，⁴⁴但它仍旧记录了国营部门的管理者与私营部门的管理

⁴² 在场的另一个领域，许多“靠个人奋斗成功的”大中企业主也是如此，他们的习性，如同休谟说的继续滑行的船一样，倾向于延续他们的苦行和节俭的品德、最初的趣味和兴趣：这就是说，企业主不仅按照他们领导的企业规模和地位区分，而且，与此同时，按照他们拥有的财产证书和重点大学文凭区分，但也在次要程度上，按照将他们导向他们的地位的轨迹区分。（这些分析后来被对法国两百多家大企业的老板的属性的分析所证明并确认——Cf. P. Bourdieu et M. de Saint Martin, *Le patronat*, *Actes de la recherche*, 20-21, mars-avril 1978, pp. 3-82）。

⁴³ 法国民意调查公司的调查，将私营部门管理者与国营部门管理者区分开来，指出私营部门管理者中 22% 不到 35 岁，而 49% 不到 49 岁，分别与国营部门的行政管理者的 14% 和 40% 相对（S. C., V）。担任公职的高级管理者（A 类）平均每个家庭拥有一份 47323 法郎的财政收入，与其他高级管理者的 62803 法郎相对（S. C., I）。

⁴⁴ 1963 年进行的调查部分地受到了把握相对不受时间束缚的深层配置之意图的启发，由此，这次调查不是把握与历史条件相关的实践和偏好系统的变化的最优良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助于对有关“管理者的消费”的一次市场调查（S. C., V）的二度分析，这种分析受到预测奢侈财产的需求之想法的左右，对新生活风格的最具区分性质的消费很适用。

者之间一系列微小然而有系统的对立,前者往往出身于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并更接近工程师,而后者更年轻,总体上出身于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往往毕业于高等商业学校和政治科学学院,与自由职业者接近。私营部门的管理者更常逛古董店,选择达利和康定斯基而不是国营部门的管理者喜欢的弗拉曼克、雷诺阿和梵高,选择《赋格艺术》、《左手钢琴协奏曲》而不是《阿莱城的姑娘》、《茶花女》、《众神的黄昏》、《小夜曲》和《一千零一夜》,甚或选择阿兹纳武尔、弗朗索瓦丝·阿尔迪和布拉桑,而不是贝科、皮亚夫和雅克·布雷尔,选择哲学随笔和诗歌,而不是游记、历史故事和古典作品;他们将理想中的朋友描述为有艺术气质的、有良好教养的而不是有责任感的、乐天的和稳重的,将梦想中的室内装饰描述为混合风格的、充满奇思异想而热烈的,而不是简单的、和谐的和朴素的。总之,私营部门的管理者与国营部门的管理者在严格的文化能力(对作曲家的了解)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在所有

353

属于精神气质范畴的领域内都截然对立。

若两个等级没有各自包含表现对方等级中主导属性的一部分个体,这些差别就更加明显:出身资产阶级的重点大学毕业生,担任了国营部门的高级职务之后,非常接近综合工科学学校毕业的工程师或自由职业者,而出身中产阶级或民众阶级且没有文凭的私营部门的管理者,非常接近国营部门的管理者和普通工程师。

但是,新资产阶级主要通过¹与老商业资产阶级的对立显示自己的特点。私营部门的管理者年纪较轻便达到权力位置,往往有

学历,通常属于更大的和更现代的企业,他们通过一种更“时髦”和更“新鲜”,总之更符合领导者的占统治地位的新定义的生活方式,与工商企业主即传统资产阶级及其温泉城度假、招待会和社交礼仪区分开来(尽管同样的对立出现在企业主中间):因此,他们读金融报《回声》(126%,与企业主中的 91%相对)与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周刊(224%,与企业主中的 190%相对)的人数最多;他们似乎不大倾向于将他们的资本投入到不动产方面;他们更经常从事优雅的、活跃的和往往“可操控的”运动,如帆船、滑雪、滑水、网球和次之的骑马和高尔夫,以及既“要求智力”又高雅的上流社会游戏,如桥牌,特别是象棋。他们尤其更彻底地与面向国外(他们与国营部门的管理者和工程师一起,成为出国最多的人)和向现代观念开放(正如他们参加大量职业讨论会或研讨会证明的)的现代管理者角色认同。我们在一个事实中看到了这种对立的最后一个标志,尽管这个标志表面上微不足道,但非常能够说明问题,这个事实即私营部门的管理者家中有威士忌的人(在比例上)明显更多,而工商企业主则更喜欢香槟这种特定的传统饮料。⁴⁵ 这种同时包含奢华的和理性的若干属性的组合,使新商业资产阶级既与教授又与传统的企业主对立,这些属性似乎是不相容的,因为它们通常与统治阶级中截然对立的位置相连,而传统企业主的豪华汽车、旅馆度假、游艇、高尔夫,让人想到后来被视为有点“过时”的伦理配置。

⁴⁵ 81%的私营部门管理者、80%的工程师、74%的自由职业者、69%的国营部门管理者、62%的企业主、60%的商业经理、58%的教授声称家里有威士忌,而80%的企业主、75%的商业经理和自由职业者、73%的私营部门管理者、72%的国营部门管理者和工程师、49%的教授声称拥有香槟酒。

但这种组合也通过积极参与经济生活,通过一种职业活动,与自由职业者对立,与表现自由职业者特点的稍稍有别的奢华和文化的组合对立,读经济日报(《回声》)和周刊(《拓展》、《企业》)证明了他们积极参与经济生活,而这种职业活动意味着一种现代的和国际的生活风格,包括遥远的(乘飞机)和频繁的商务旅行、职业聚餐和鸡尾酒会、讨论会和研讨会。

“商务旅游”

350

行话所说的“奖励研讨会”和“豪华研讨会”,构成了现代企业向其管理者提供的全部隐形利益。“住宿研讨会”(就是超过一天并在企业之外举行的会议,1973年的会议估计有25000次),属于一种非常繁荣的产业,这种产业将专门从事“商务旅游”的旅馆(Novotel, Frantel, Sofitel, P. L. M., Méridien, Mercure, Motellerie)、连锁店(如 Seminotel)、创意公司(Cegos 或 Sema)及其心理社会学家和联合起来,连锁店以4%的营业额,承担所有专事研讨会和代表大会的旅馆的推广,创意公司及其心理社会学家提供可自由选择(参见 Cegos 的目录及每日报价200到600法郎的294种“配套服务”)的“创造性会议”和负责组织这些会议的“推广人”。弓箭研讨会(séminarc)是欧洲高级商业管理学院的一个资深人士的创造,这项创造为了让射箭基地在秋天和春天这六个月的淡季中赢利,将这个基地变成了一个研讨会中心。这些信息来自一份经济周刊(《拓展》,1973年12月),正如这份周刊指出的,“秋天和春天适合接待高级管理者”。冬天的淡季留给“为工作出色的销售系统准备的进修-奖励研讨会”,而旺季则接待高级管理者的豪华研讨

会和重要客户。我们可以相信了解内情的吉尔贝·特里加诺^①的说法：“在俱乐部中，20年中，无疑会有50%的虚假会议，50%的真正假期。”那些对通货膨胀的原因提出疑问的人，除了其他被遗忘的因素，应该考虑这个事实，即实业家，连同他们的“商务旅游”，他们的“企业礼物”，他们的公务车，是他们做成好买卖的一个根源。

组织您的会议，
是我们的职责，
地中海俱乐部。

“一个与会者的告白”

“俱乐部女招待天使般地微笑着，手续迅速办完，飞机准时到达（我告诉您我们去突尼斯了吗？），我承认，旅行非常愉快，乡村里的接待也是如此。温暖的杰尔巴岛是真正的小天堂。不久从里昂和布鲁塞尔来的团队也到了，像我们一样是乘专机来的。换衣服（温暖的阳光由不得你），然后介绍活动内容和俱乐部。接着我们去俱乐部的“丰膳”，从美食家的眼光来看，名不虚传。然后，是的，我穿上了短裤：不滑水能干什么呢？

工作？明天开始而且在以后的日子继续进行，总是在早上。在良好的条件下进行：一个舒适而且设备齐全的会议厅，有放映机、供发言的麦克风，等等。这又是俱乐部的一个优点。

这有助于发言和讨论，发言和讨论是很活跃的，而且本着最好

^① 吉尔贝·特里加诺(Gilbert Trigano, 1920-2001)，法国商人，曾任著名旅游企业“地中海俱乐部”总经理。——译者

的意图。剩下的时间：远游，音乐会，运动……但不是强制的，闲暇和演出，晚会，不要忘了还有夜总会。直到最后一日的盛大晚宴。

就是这样。哦，这样的研讨会！而且很有成效：我们在良好的条件下工作，很有效率，同时又能真正地放松。我不想自吹自擂，但您能有比这俱乐部更好的提议吗？”

《拓展》，1973年5月第63期

“三星级研讨会”

351

“5家旅馆：

三弓箭旅馆(非常舒适)

瀑布旅馆(豪华)

皮埃尔·布朗什旅馆(非常舒适)

隐居旅馆(非常豪华)

高尔夫旅馆(非常豪华)

所有房间包括：浴室和独立卫生间、基地里的自动电话、电台等。皮埃尔·布朗什弓箭旅馆有12家饭馆，而在高海拔处，尚特尔弓箭旅馆有2家饭馆”。



“人们在当中呼吸的研讨会”

“大自然统率弓箭旅馆：基地俯视伊塞尔山谷，这个山谷在此地不过是一股山间激流。这条山谷的特殊走向有助于充分利用阳光。

无论从我们旅馆的房间，还是从我们的工作室，您一眼就能看到勃朗峰的全景。”

弓箭研讨会资料



1975-1976 年价格

352

(1975年12月1日-1976年11月30日)

600个“三星级旅馆”房间。每人每天的价格

参加人数	旺季 (学校假期—24-1-76 — 20-3-76)			
	季节	2天1夜 3天2夜	4天3夜	5天4夜 6天5夜 7天6夜
10—25	170	250	235	205
26—50	165	245	230	200
51—75	160	240	225	195
76—100	155	235	220	190
101—200	145	230	195	185
201—300	135	225	190	180

“我遇到了快乐的与会者”

“要说能够办好代表会议或研讨会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肯定是在勃朗峰群山之中心的(上萨瓦省)梅热夫的达尔布瓦山。

我遇到了参加研讨会和代表会议的人,他们皮肤晒成古铜色,精神放松,总之他们很高兴在这儿。当然是为了工作,但在一种适于换环境和放松的背景下进行。

在工作方面,达尔布瓦山旅馆符合每个企业的特殊要求。设备非常齐全:会议室和餐厅能接待20到200人,视听设备,同声翻译间……每项服务都‘为您量身’订制。

您可以乘坐阿尔卑斯航空公司的飞机到那里(从巴黎到达尔布瓦山需要90分钟),乘火车从首都出发要一夜,开车可自由选择路线。

在娱乐方面,简直是天堂。随季节不同,您可以在梦幻般的勃朗峰群山的怀抱中滑雪或在法国最美的高尔夫球场做一次漫游。旅馆也可为您提供网球场或带桑拿的游泳池和健身房。

那些不喜欢运动的人,尽可以在一种特别的景色中和迷人的梅热夫村中非常愉快地散步。在旅馆里,可以按照需求组织配备布景、乐队甚至明星的欢庆晚会。在饮食方面,这家高级旅馆为您提供一种无可挑剔的菜肴,而且服务是相当周到的。至于价格,您放心,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尤其是在九月和十二月。说服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向达尔布瓦山旅馆咨询并进行比较(电话:50 21 25 03,找托迈恩先生或齐格勒先生)。

最后一个细节,海拔高度能促进智商已经得到证实。达尔布瓦山海拔 1300 米……您的研讨会将更有效率。”

(广告)

《企业报》,977,1974 年 5 月 31 日

了解经济报纸和周刊阅读在新资产阶级的构成特点中所起的决定性力量的同时,再强调以下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根据法国民意调查所 1973 年从事的一项调查,20%的《企业》读者属于职员超过 1000 人的企业;20%的读者在化学、航空、汽车、机械或电子企业工作,而相应的企业仅占法国企业的 2.6%;只有 6%的读者属于建筑和公共工程企业,这些企业占全部企业的 13.5%;金融机构、服务和销售部门在订阅者中占相对大的比例,与(在企业中占很大比例的)商业企业如旅馆、咖啡馆和饭馆相反;而且在企业内部,4.6%的读者是企业经理或领导层成员;15%的订阅者担任一项商业职务,12%担任一项行政职务,仅有 10%担任一项生产职务。(Entreprise, caractéristiques professionnelles des lecteurs, Résultats de

l'enquête IFOP, Paris, Régie presse, 1973, 20 p.)。此外,我们知道(S. C., VI),《企业》和《拓展》的读者(表现出类似的但无疑更明显的特点)和《回声》的读者,与其他新闻刊物的读者区别很大,体现在他们喜欢谈论经济和商业,他们在法国和国外从事频繁的商务旅行,他们拥有一张信用卡,他们阅读外文杂志,他们拥有一份现代产业——这个指标是相当模糊的,尽管我们可以看到新资产阶级、新住宅区、现代公寓和现代产业之间的一种有系统的联系。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欧洲商业管理学院的毕业生的群体特点,说明这个新资产阶级的形象,这群人大部分出身于传统资产阶级,他们在一种独创的学校教育制度中(授课大部分由通常受过美国培训的一个国际教授机构用英语完成)获得必要的的能力,从而实现朝跨国企业尤其是美国跨国企业(特别是商业和行政管理的)管理职位的一种成功转行。这些“充满活力的年轻管理者”是《拓展》的读者(63.5%)、《快报》的读者(53%)、《企业》(33%)的读者,以及次之,《新观察家》(22.5%)的读者,他们滑雪(71.5%)、打网球(58%)、驾驶帆船(37%)、骑马(23.5%)。他们的妻子往往加入新兴的行业(她们中工作的人中有10%是记者,6%是翻译,12%是医生或心理学家),具有相同的现代主义配置(84% 355 至少说一门外语),与此同时更忠于传统的文化形式(28%每月至少参观一次博物馆或展览)(Cf. J. Marceau, *The Social Origins, Educational Experience and Career Paths of a Young Business Elite, Final report for SSRS Grant of 1973-1975*, Paris, 1975, 117 p., 打字稿)。

分类斗争在企业内部展开，力求让生产服从广告，工程服从于销售，每个领导级别都力求通过这种斗争提高自身的职业利益，让人接受一种价值等级，这种价值等级把这个级别感觉最胜任的职能置于等级的顶点，而且所有在统治阶级的领导阶层内部展开的相同形式的斗争，都与价值冲突密不可分，价值冲突涉及整个世界观和整个生活艺术，⁴⁶因为这些冲突不仅使得等级利益互相对立，还使学校教育的和职业的前途互相对立，并由此使得不同的社会招聘进而最终的习性差别互相对立。因此，比如，大型企业的财政主管（参见《拓展》，1975年4月和1975年7—8月），几乎全部来自政治科学学院或高等商学院，他们拥有一种非常可观的社会资本（家庭关系、同学），经常隶属于若干俱乐部，几乎全部出现在《世界名人词典》中，相当一部分人出现在《绅士名录》中。他们无疑在构成生活风格的一切方面都与从事“研究—开发”的主管对立。后者往往从工程师学校毕业，常常出身于民众阶级或中产阶级，他们的娱乐非常接近于教授的娱乐（登山、远足等）。这就是说，职位

⁴⁶ 在这些斗争中，关于社会世界的话语——哪怕是有科学标签的话语——几乎一向是（不自觉的）象征强制策略，而援引“权威”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此而来的是“美国研究”的丰厚象征收益，美国研究自发地被认为具有一种“科学”的客观性，而这种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双重中立的，因为是外来的。比如，我们知道约翰·迈克·阿瑟*和布鲁斯·斯科特**的批判分析派上了什么用场，按照他们的观点，法国企业对技术问题之重视，超过对财政管理和销售问题之重视，对按技术进步和寻求新方法的思路来设想的产业未来之重视，超过对按生产真正赢利的大众产品的思路来设想的产业未来之重视，等等。

* 约翰·迈克·阿瑟(John Mac Arthur, 1939-)，美国宗教作家，以他主持的电视节目“主赐福于你”和编辑的《圣经》读本《麦克·阿瑟学〈圣经〉》闻名。——译者

** 布鲁斯·斯科特(Bruce Scott, 1943-)，澳大利亚政治家。——译者

(及其占据者)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整个象征作用,这种象征作用力求使职位(及其占据者)在表象中得到承认;进而伴随着一场永久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在意图推行新分类体系的人与守旧者之间进行的。趣味是这些象征斗争的根源,这些象征斗争每时每刻都使统治阶级的各阶层互相对立,而且如果这些斗争不依靠将每个行动者与其生活风格相联系的这种原始赞同和基本信仰,就不会这么彻底、这么全面:唯物主义将偏好还原为偏好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以及表面上最无关利害的实践完成的社会功能。这种还原不应该使我们忘记,在文化方面,投入并不仅仅是经济的,还是心理的。关于艺术或生活艺术的冲突的真正赌注是在统治阶级内部这个或那个更特定的场内部推行占统治地位的统治原则——或者,换句话说,获得对一个人最富有的那种资本最有利的转换率——若这些冲突不涉及人的终极价值即这种高度升华的利益形式,它们就不会表现出一种如此引人注目的形式(比如,我们可以想想关于教育指导规划或学校教育大纲的讨论)。³⁵⁶

新资产阶级是新经济所要求的伦理转变的创始人,新资产阶级从经济中获得其力量和利益,新经济的运行既依靠需求的和消费者的生产,也依靠产品本身的生产。经济的新逻辑以一种建立在信用、消费、享乐基础上的享乐主义的消费道德取代了建立在节制、节俭、节约、算计基础上的苦行主义的生产和积累道德。这种经济试图使社会世界通过人们的消费能力、他们的地位、他们的生活风格,同样也通过他们的生产能力来评判他们。这种经济在出售象征财产和服务的新资产阶级中找到了其自信的发言人,即旅游和新闻、出版和电影、时装和广告、室内装饰和不动产推销这类

企业的经理和管理者；新品味制造者通过他们暗中强制的建议和 他们树为典型的一种生活艺术的榜样，提倡一种可还原为消费、花费和享乐的艺术的道德。通过表面上是建议或警告的让人遵守秩序的要求，他们尤其在妇女即消费行为的特选主体和客体身上，维持一种恐惧，因为她们害怕无法达到“自由的”生活风格所包含的数不清的消费者义务；并维持一种感觉，即道德低下之感的新形式，因为她们感到无法拥有对于完成这些义务必不可少的配置。

新资产阶级由一些统治阶层的成员构成，他们实行必要的转行，以适应企业场的结构转变所要求的新的利益占有形式，他们是在资产阶级内部完成的伦理配置和世界观转变的先锋，而资产阶级本身也是生活风格的普遍转变的先锋（如表 22 揭示的），这种普遍转变在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和实行统治的方式之范畴内是特别明显的。新资产阶级创造或（从美国）引进了新统治方式，这种新统治方式是以在学校、在教堂或在工厂的温和方式为基础的，并以这种“放松”的生活风格为依据的，这种“放松的生活风格”首先通过对所有社会距离的表现——尤其是着装表现——的委婉化和对能保证这种距离的贵族式刻板的一种有意放弃显示出来。在对权力的象征性已进行过如此多的历史研究之后，只有天真的人才会无视这一点，即着装和化妆方式是统治方式的一个主要因素。“古板”与“时髦”之间、不妥协的守旧经理阶层与了解最新管理技术、公共关系和群体活力的新潮经理阶层之间的整个对立，可以在大腹便便、故作高傲的老板与晒黑的、纤细的和“放松的”管理者之间的对立中，在管理者的举止中，在他的风度中，在鸡尾酒会中，以及在与他称为“社会伙伴”的人的关系中看出来。

资产阶级的区分总是既在说话方式中,又在举止方式中,通过紧张中的放松、约束和克制中的自如得到确定,而紧张中的放松,约束和克制中的自如是互相对立之属性的罕见的、极端不可能的组合。一切的发生就好像使老资产阶级与新资产阶级对立的斗争,是以对立的一方或另一方被给予的特权为赌注的,而区分必然会协调对立的双方:当统治阶级的新生代和新资产阶级揭露矫揉造作的老资产阶级僵硬的刻板并宣扬“松弛”和“放松的”生活风格时,老资产阶级则谴责新资产阶级“放荡的”生活风格并在语言或风俗方面要求更多的约束和克制。

表 22 伦理配置的变化

357

	农业 劳动者	工商 企业主	工人	职员 中等管理者	高级管理者 自由职业者
男孩 18 岁之前可单独出门(1959)	39	29	42	40	62
女孩 18 岁之前可单独出门(1959)	12	5	14	14	26
应该让 18 岁男孩看他们喜欢的电影(1971)	56	62	69	70	69
应该让 18 岁女孩看她们喜欢的电影(1971)	55	58	63	66	66
男女同校对男孩的教育是件好事(1971)	59	64	75	81	87
男女同校对女孩的教育是件好事(1971)	55	64	74	78	86
可未经父母允许向未婚的未成年人出售避孕药(1967)	8	18	13	20	32
流产并不是犯罪(1971)	24	*	44	56	47
最好相信孩子,留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1972)	60	60	58	65	70
年轻人不可能(不花钱)过别生活(1972)	*34	41	42	48	41

续表

	农业 劳动者	工商 企业主	工人	职员 中等管理者	高级管理者 自由职业者
男孩(只)能在满 18 岁之后单独出门 (1959)	58	71	56	58	38
女孩(只)能在满 18 岁之后单独出门 (1959)	83	88	82	82	70
不该让 18 岁男孩看他们喜欢的电影 (1971)	38	33	25	26	26
不该让 18 岁女孩看她们喜欢的电影 (1971)	38	38	31	30	28
男女同校对男孩的教育是件坏事 (1971)	21	22	18	13	8
男女同校对女孩的教育是件坏事 (1971)	24	24	20	15	9
(只有)经父母允许才可向未婚的未成年 人出售避孕药(1967)	74	70	78	76	62
流产就是犯罪(1971)	59	*	43	36	43
最好跟孩子说明他们应该做的且不要 对他们心软(1972)	36	34	40	29	25
年轻人花钱太多(1972)	50	47	45	37	37

* 在这项调查中,企业主与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曾被归在一起。

来源:法国民意调查学院

在这里,如同在对家庭伦理的一切提问中一样,自由主义或宽容主义倾向有随着社会等级(这种关系时常颠倒过来,只要涉及的是社会秩序而非道德秩序,正如许多未抄录在这里的统计资料所揭示的)升高而增强的趋势。无需对所有变化进行深入分析就可看到高等阶级总是伦理创新的先锋。一切(尤其是职员和中等管理者在 1959 年的调查中比在后来的调查中更加刻板这个事实)似乎表明,新的教育伦理和与之相关的新的性伦理倾向于逐渐推广开来,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妇女杂志与专门从事妇女和家庭教

育的机构不断实施的合法性强制作用造成的,但也是并尤其是借助资产阶级少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普及实现的,高等教育既通过对大学生状况的延长体验,也通过教育内容的作用,引起了对资产阶级道德中压迫妇女的一切,尤其是对妇女注定遵守的所有价值的 358 一种改变。

职员和中等管理者的等级在这里聚集了地位稳固的小资产阶级和新小资产阶级(年轻职员、社会医疗工作者等),新小资产阶级受中等或高等教育的更常见且时间更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新小资产阶级对他们渴望的新生活风格的合法性更加敏感,他们代表了新伦理的特别渗透之途径。

我们可以从《企业》杂志(1972年10月27日第894期)介绍的“不动产推销商”的形象出发,描绘新资产阶级的身体素养的一种综合形象:“高大,纤细,晒黑的皮肤,穿灰色衣服,戴玳瑁眼镜,W. S., 32岁,法学学士,毕业于巴黎高等商业学校,工业家之子,自称对工作充满激情,但懂得拿出时间来打 360 高尔夫球和网球并读几本当代小说。”“高大,纤细,光脑门,面带微笑”,J. C. A., 55岁,法学学士,巴黎证券交易所附近的证券银行家联合会主席之子,他“无论在同行当中还是面对当权者时,都是自如而自信的……可以说他很多年以来就对扑克失去了兴趣,他喜欢在空闲的时候到高尔夫球场上‘呼吸新鲜空气’或演奏管风琴。”因此,理想的或理想型的不动产推销商几乎总是出身于大商业资产阶级,先后就读于巴黎一所有名的中学和一所高等院校,声称热爱艺术或古典音乐并从事至少一种优雅的运动,通常滑雪、打高尔夫或网球,但也骑马、

潜水捕鱼、驾驶帆船、打猎、飞行——这表现在他的“运动姿态”和他“晒黑的”脸上，但也从负面表现在他的“纤细”上。正如我们在别处曾经指出的（cf. P. Bourdieu et Y. Delsaut, 《Le couturier et sa griffe》, *Actes de la recherche*, I (1), Janvier 1975, pp. 7-36），衣服依赖与身体的关系及表现在这种关系中的伦理配置。至于衣服的用处，只要列举《费加罗报》（1975-12-1）的一篇文章就够了，这篇文章首先指出安托万·里布，BSN 的总裁，喜欢运动和休闲服装，而吉尔贝·特里加诺则很少系领带，然后它证明，衣服如同语言或其他任何一种属性一样，进入几乎有意识的“操控”策略之中：“一个法国青年企业家告诉我们：‘我有三种装束。当我去参加地区发展委员会的会议时，我要与银行家和官员会面，我要穿得非常正式；在生意场上，我穿得很随意，因为我在家具行业工作，这个行业接近室内装饰；视察工厂时，我穿套头衫和大翻领衫露面’。”（着重是我加的）

新伦理先锋的生活风格非常直接地表现了其财产结构，财产结构是新伦理先锋的权力和生存条件的根源。国营或私营（在这个层次上，区分是相当人为的）的国家大企业管理者或现代的、通常是跨国的大企业经理，不像地方企业的小经理那样固守一隅，后者是地方显贵，他们的权威离不开一个真正互动的空间和整个表象活动。大企业管理者或经理不断参照一个“中心”，他们期待这些中心领导给予他们指示或提升，他们的大部分威信和权力来自本身或国家的或国际的学历，因而不受地方特权和威信的束缚，随着经济市场和象征市场逐步统一——这将他们重新置于国家的或

国际的等级之中——，地方特权和威信越来越贬值了。这些“有活力的管理者”坚信他们的地位就是来自他们的学历以及人们认为学历应该保证的技术和“人格”能力（“活力”、“斗志”等），他们深受在政治科学学院或商学院学到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与这种文化相关的现代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世界观念的影响，而且他们也促使这种观念在他们的研讨会、委员会或讨论会中产生，他们放弃了“旧法国”企业主的香槟（和整个世界观、整个法国观和与之俱来的 361 法国在世界中的整个观念），改喝“管理者”的威士忌，放弃了委托给妻子的“纯文学”崇拜，转而喜欢以英文写作的经济信息。他们是对从前企业主的否定并且是其未来，但他们也是从前企业主的继承人，归根结底他们只是通过时间，因而常常通过年龄与那些人分开——这会让人相信世代这个词在一般意义上的作用——，他们是为了更好地保持而进行超越的人。

当领导阶层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直接从经济资本而是从学校教育资本中获得若不是权力至少是权力的合法性，当学校教育资本是在一种表面上纯粹和彻底的学校教育竞争中获得时，不仅统治阶层的内部结构而且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关系的结构，都倾向于发生深刻的转变。新经济领导者从他们拥有的新文化即他们世界观的合理化中汲取对社会行为持有一种智识权利的权威感，而他们世界观的合理化随着一种用于企业管理的经济科学分支的发展，倾向于越来越广泛地被人接受。⁴⁷ 因此，知识分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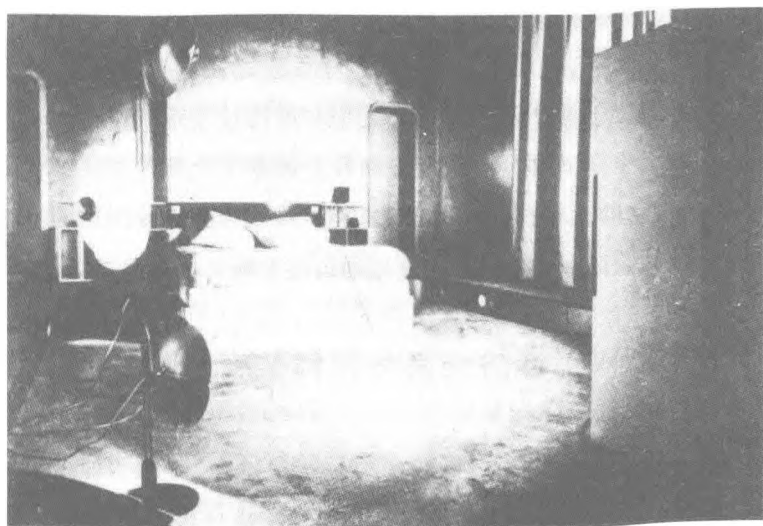
⁴⁷ 关于这种世界观，参见 P. Bourdieu et L. Boltanski, 《La production de l'idéologie dominante》, *Actes de la recherche*, II(2-3), juin 1976, pp. 3-8.

“无关利害的文化”与封闭在自身活动的一般利益中的“资产阶级”的“没文化”之间的对立，让位给了知识分子的无动机的、非现实的和理想主义的文化与“现代管理者”的经济或综合科技文化之间的对立——后者意欲转向行动，但还没被贬至一种单纯“实践经验”之低下地位——，这种转换不独发生在新资产者身上。

359



物品在这里并不是为了完成一种技术的甚或审美的功能，而仅仅是为了说明这种功能并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它们的资历让这种功能变得庄严，它们因年代久远而生出的光泽证明了它们的资历。因此它们被还原到一种仪式工具的状况，从来没人询问它们的功能如何，也没人询问它们舒适与否；它们构成了关于“自然而然”的风尚的公认必然，它们的使用者应该顺应这种必然。



“在一所资产阶级的房子里……一个相当现代但还称不上变革性的房间”，按照《房屋和花园》的记者的说法，J.J. 塞尔旺-施莱伯^①的房间就是这样。房间里的一切都服从于对效用和舒适的追求：“房屋主人的房间。贴了银纸的墙壁被一盏有三个聚光灯的落地灯照亮……从床的每一侧，小房间入口形状的通道都通向浴室；非常讲究的是，一个开关能让人从床上打开浴室的灯”。

Maison et Jardin, n° 162, avril 1970.

也许从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表面上保留了对合法文化实践或至少对规定这些实践的定义的垄断，但这只应归因于文化生产和传播机构（尤其是学校教育系统）的惰性，归因于习性的滞后作用——习性在以下事实中得到了一种永久的强化，即文学和艺术修

^① J.J. 塞尔旺-施莱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 1924-2006), 法国记者、随笔作家和政治家, 曾担任《世界报》外国政治主笔, 著有畅销书《美国的挑战》、《世界的挑战》等。

养仍是“无关利害的文化”的特别形式并因此是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合法标志之一，而且无疑也应归因于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将妇女置于趣味判断的特权之中和维持传统形式上的文化资本的功能之中，将转向行动、经济和权力的新文化留给男人。领导362 阶层将“行动的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视为男女之间对立的一个变种的倾向，若必要时，后者则通过这种新文化得到了证实。⁴⁸

世俗荣誉与精神荣誉

不同种类的资本，昔日的“出身”、“财富”和“才能”，如今的经济资本和学校教育资本，既是权力工具又是进行权力斗争的赌注，对不同类型资本的拥有确定了所属的阶级，不同类型资本的分配决定了在构成权力场的力量关系中的位置，与此同时决定了在这些斗争中有可能采取的策略。然而，按照不同时刻当然也依据不同阶层，权力工具和斗争赌注实际上是强弱不一的而且被确认为权威原则或合法区分符号的程度也不均等：阶层之间的等级定义，

⁴⁸ 杂志的读者的性别分布，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兴趣划分（尽管如人们所知的，这种分布在统治阶级中不如在任何其他阶级中那么明显）：妇女在技术、汽车、经济或科学这类杂志的读者中比例很低，只要政治出现（在表达政治观点的报纸和周刊上），妇女的比例就很低，只与男人看文学、家居、电视、艺术这类杂志的比例相当。另一方面，鉴于女性化比例——若涉及首先以政治为导向的报刊，女性化比例则很低——从《黎明报》到《法兰西晚报》、《世界报》、《费加罗报》、《快报》、《新观察家》，也就是随着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的比例减少而被统治阶层的比例增加而逐渐增加，我们有理由假设，赞同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的传统表象的频率按照同样的逻辑在不同阶层之间变化，最为“女性化”的阶层最不倾向于接受关于某些使命的定义，按照这个定义，妇女被排除或主动退出政治。

或同样地,合法的等级化原则的定义,也就是合法的斗争工具和赌注的定义,本身也是阶层之间斗争的一个赌注。⁴⁹

鉴于那些参与游戏的人对赌注至少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以争夺赌注,我们可以随意地要么强调使他们在敌意中联合的共谋,要么强调使他们在共谋中分开的敌意。只要想想艺术家与艺术保护人之间矛盾重重的关系就可以了,至少在 19 世纪,艺术保护人就是商人。艺术保护人通过一种父权主义的保护,以一种对于文化财产的生产者是什么的实际上相当现实主义的印象的名义,回答艺术家的象征性挑衅,文化财产的生产者是决裂的资产阶级子女或被打发到这些替代轨迹的穷亲戚;艺术保护人甚至能够标榜他们是在保护文化财产的生产者免受其“理想主义”和缺乏“实用”意识的影响,由此找到作为他们剥削文化财产的生产者的借口。⁵⁰而知识分子尤其是艺术家能够在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关系与被统治阶层和统治阶层的关系之间的结构同源性中,找到一种与被统治阶层的切身的且有时真正的一致性的原则,与此同时利用其象征自主权,“资产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承认这种象征自由权,哪怕是因为他们被迫承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通过否定民众的物质主义特别显示出的精神荣誉感,而艺术家对“资产阶级”物质主义的

⁴⁹ 当且只有当经济等级化的原则真正占统治地位时,统治阶层才是其所是,至少从长期来看,甚至在相对自主的文化生产场中也是如此,在这个文化生产场中,特定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的不一致倾向于逐渐消失。

⁵⁰ Cf. A. Boime, *Entrepreneurial Patronage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in E. Carter II, R. Forster and Moody (eds.), *Enterprises and Entrepreneurs,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France*,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37-208.

否定就包含了这种荣誉感。那些在统治阶级内部占据世俗统治地位的人，实际上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这种矛盾的境地促使他们与文化财产和文化财产的生产者保持一种充满矛盾心绪的关系：他们被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归到粗俗的物质主义和强烈的反智主义一边，但当他们考虑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时，他们会援引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为反对他们而援引的一切。这样他们就无法完全满足于“他们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艺术家（也就是在文化生产场中占据一个世俗上的且暂时的统治位置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这个位置与他们自身在统治阶级中的位置是同源的）为他们提供的答案：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艺术家下定义的、与世俗权力和相应利益之间的关系本身，难道不让人对“无关利害”产生疑问吗？而这种“无关利害”在统治者的眼中，正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本质定义。

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如此处于社会空间中，以至他们与无关利害以及一切普遍价值和普遍被认为最高级的价值相互关联（他们越接近文化生产场的被统治一极，就越是如此）。他们为了贬低统治阶级空间中对立阶层的实践的权威性而求助于意识形态的策略（“左岸”批评家对“右岸”戏剧的意见很好地说明了这些策略），这些策略的几乎自动的完善性来自于这个事实：鉴于不同种类的资本分布的交叉结构可能使一个级别中的先来者在最大可能上成为另外一个级别中的后来者，因此他们只要把必然变成乐事，就可以把与其他必然相应的“乐事”抛入随意性之中。超越世俗等级的一种颠覆希望，是在对“世俗”荣誉的等级与“精神”荣誉的等级之间的不一致的、被视为可耻的体验中产生的，这种希望作为一种实践

的明证性强加给文化生产者,尤其是那些在文化生产场中占据这样一个位置的人,而这个位置与文化生产者总体上在统治阶级场中占据的位置是同源的:一些作家和艺术家与一部分生产者对立,如同文化生产者总体上与统治阶层对立一样,这些作家和艺术家从世俗上且暂时处于被统治地位,因为他们的产品必须产生自己的市场,而这部分生产者则提供直接符合占统治地位的趣味的产品,因此在世俗中得到最大的认可,鉴于这一点,作家和艺术家注定是末世论希望的承载者,由于这些希望支持他们“在尘世中的苦行”和他们的“使命”感,它们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鸦片。这一与宗教的类比并不是不自然的:其实在两种情况下,对严格意义上的世俗利益的最无可置疑的超越来自利害相关的斗争的内在性。

Œuvres Choisis
de la Pensée et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s Contemporaines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杜小真 高丙中 主编

《区分》通过各种社会统计调查和时尚采样，揭示出各种所谓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费其实是各阶级或阶级内部各阶层相互斗争的场域，反映的是社会的区分与差异，而这种文化消费又再生产了这种区分与差异。

《区分》告诉我们，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

《区分》是布尔迪厄这位二十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法国思想家对社会的最深刻的批判，他的洞察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观念，极具穿透力。

